

已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8943

1158943

巴金全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北京第1版

1988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223-4/I·224

书号 10019·4255 定价 5.20 元

1757/10

目 录

火

第一部	3
后记	173
第二部	175
后记	373
第三部	375
尾声	608
后记	613

附 录

《火》第三部初版本的“书尾”	615
致树基(代跋)	619

火

第一部

《火》(第一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由开明书店初版,
迄一九四九年四月,共印行十二版(次)。

“文淑！文淑！你等一下！”

文淑猛然把门拉上，气冲冲地跑下楼梯，也不管母亲在后面呼唤，她一口气跑到弄堂口，还皱着眉嘟着嘴里咕噜着：“你不要以为我是个没出息的女孩子，你不要看轻人。我不靠你也可以活下去。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给你看！”她这时还想到父亲无情的责备，就仿佛看见他那含威逼人的眼光和带怒的黄瘦面孔，所以气愤地说了那些话。她走出弄堂也不再往下说，气略略平了一点。一个熟识的黄包车夫拖了车子过来，在她面前放下，笑着唤声“小姐”，要她坐上去。她并不理睬他，却转身走向右边的人行道，用快步子走着，手里还捏着护士证、口罩和三四本要带到医院去的战事画刊。但是她还没有打定主意到什么地方去。此刻去医院又嫌早。

一个巨大的声音突然在她的耳边震响起来，她吃惊地抬头看天。秋日的晴空显得十分高朗，广阔。正午的太阳照在头顶上，她并不觉得十分热，虽然从她的鼻端略略沁出了汗珠。她的略带近视的眼睛只看见一片淡淡的金光在深蓝色的天幕上闪动，在那上面甚至找不到一个苍蝇般的点子。

“飞机！飞机！”一个穿短裤的年轻人伸了手指指着北方，

一面叫，一面张大眼睛望那个方向。文淑站住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仍旧看不见什么。但是那熟习的轧轧声却很清晰地进了她的耳朵。接着又是一声爆炸。她烦躁地皱了一下眉毛，埋下头正要向前面走去，却听见那个圆脸的年轻人气恼地骂起来：“×他个娘！今天炸了一天还不够！就只看见东洋飞机！我们的怎么看不见？连高射炮也不响了！”

“不要性急，今晚上我们的飞机就会来的。‘九·一八’那晚上炸得多厉害！吓得东洋鬼子拚命乱放高射炮，”旁边一个站在街口看飞机的中年人眉飞色舞地说。

文淑无意地看了那个人一眼，她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最近几个晚上中国飞机的确飞到虹口、杨树浦一带轰炸过敌军的阵地。满天的探照灯光和接连不断的高射炮响，便是敌军感到恐慌的表现。她自己也曾跟着家里的人在晒台上看过，昨天晚上高射炮只响了十多下就静寂了，她一个人还站在晒台上等候飞机再来，直站到中夜，虽然她的母亲几次唤她进房去睡，她也不肯进去。她这样一想便觉得心里痛快许多。刚才和父亲不愉快的争吵渐渐地在她的心上淡了。她不再在天空里找寻飞机，却昂起头沿着街口一家关了门的日本商店转一个弯，走入热闹的霞飞路上去。

整洁的霞飞路还保持着抗战以来的畸形的繁荣。银色电车爬虫似地在光滑的柏油道上蠕动，载着一车一车的乘客往相反的两条路上去，车里总是满满的，有时还把容不下的几只膀子露到外面。电车去远了，街道稍微显得空一点。拿着短棒的巡捕涨红着脸往前飞奔，追赶拖了车子逃跑的黄包车夫。

几辆车子挤在一堆，堵塞了路。于是一些汽车的喇叭开始长鸣。两旁人行道上立着不少看飞机的人，从他们的口里发出了各种论调。几家银行的铁门拉紧了，门前还有巡捕看守，在那里有两三个年轻的报贩高声叫卖着新出版的《抵抗》三日刊^①。从别处迁来的商店露出了油漆崭新的门面，时时有服装整齐的顾客，拿着纸包从里面出来。在街口杂货店旁边，或者在玻璃窗上钉了木板暂时停业的外国商店门前，或者在人行道的几块空地上都有着临时报摊，陈设了各种抗战的报纸和刊物，吸引着不少青年的贪婪的眼光。三五个男女青年有的腋下挟着一束报纸，有的手里拿着刷子和浆糊，他们谈着话兴奋地走过，找寻可以张贴壁报的地方。在一个大的弄堂门口站着一堆刚由卡车卸下的从战区逃出来的难民，质朴的农民的脸上全是些失神的眼光和疲倦的面容。

文淑继续往前面走。二辆用树枝伪装了的卡车从后面开来，在她前面六七步光景停住了。车上插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是从前方开回来的。车身溅满了泥土，树叶也已经枯黄了。两个司机和四五个工役模样的人从车上跳下来，往别处走了，就让空的卡车停在路旁。文淑走过那里，带着好奇的眼光看卡车，看从前方带回来的泥土和树枝，她不觉揣想着前方的生活。她一边想，一边慢慢地移动脚步。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拍她的肩头，她吃惊地回头一看。一张熟习的年轻面孔望着她微笑。她快乐地唤了一声“刘波！”便转过身把手伸给他。

^① 《抵抗》三日刊：邹韬奋编辑的抗战刊物。

刘波用他的带着尘土的手把那只柔软的手紧紧捏着，笑问道：“你到哪里去？”

“我随便走走，”文淑缩回手笑答道。接着她又加一句：“我等一会儿到医院去，”她那腮略略一动，健康色的两颊上立刻现出了一对酒涡。

刘波看见她的左手里捏的护士证和口罩，明白了她那句话的意思，便称赞道：“你到医院里做看护了。真不错，真不错！到底是我们的文淑！”

“刘波，你不要又挖苦人！我晓得你在笑我，”文淑抿着嘴笑道，她那两颗圆圆的漆黑的眼珠顽皮地在刘波的清癯的脸庞上滚来滚去。

“文淑，你不要误会我。我真心在夸奖你，”刘波连忙分辩道。

“不，不，”文淑接连地摇摆着头、装着生气的样子说，“我晓得你们都看轻我，你们都说我是小姐，不会吃苦。爹不要我到医院去，他要我去读书。哥哥也笑我。妈一个人平日顶疼我，她也说，‘你听妈的话，不要去，那边的苦你吃不消。’可是我偏要去，我偏要做给他们看，我不是小姐。我刚才还跟爹吵了架，饭也没有吃完，就生了气跑出来。”她嘟起嘴，两只眼睛圆圆地睁着，最近留长了的童化的头发飘盖到脸颊上来，还有两根细发横过眼睛直搭到鼻上，她并不把它们挑开。

“你不要翘嘴巴好不好？”刘波忍住笑调皮地说。这句话就把文淑引得噗嗤笑了，她说道：“呸！人家在跟你讲正经话，哪个要你来开玩笑！……”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雄壮的声音忽然在旁边打岔似地响了起来。这是前面那家百货商店收音机的大喇叭里放送出来的歌声，唱着大家听惯了的《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要再讲这些闲话了，”刘波警觉地说。“你既然没有吃完饭就出来，那么我们一块吃饭去。我有些话要跟你谈。”

“吃饭我不去。我不想吃，”文淑把嘴一撇摇摇头说。她又笑起来，微微侧着头问道：“请我吃冰好吗？我要两点钟才去医院，现在还有时间。”

“好，我就请你吃冰。你这个脾气还没有改！你在医院里也吃冰吗？”刘波玩笑地说。

“我不许你再说这种话！要请吃冰就快点请，”文淑故意装起烦厌的样子说，但脸上的笑涡还没有完全消失；她不等刘波答话，又改变语调温和地问道：“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你没有看见我在这里做的事？我刚刚换了班下来，正打算去吃饭，”刘波惊讶地说，他侧过身子，指着旁边一个报摊给文淑看。那里陈列的全是些进步的抗战刊物，大约有二三十种，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坐在一个矮凳上对着他们微笑，在那个人的身边竖着一块硬纸板，写着《抵抗》三日刊和《烽火》周刊的广告。“我们几个朋友不会演说，也不会写文章。要募捐，又不愿意看一般有钱人的面孔，而且捐了钱，能不能用在兵士和难民身上也不晓得。所以我们宁愿到这里来卖报。自己亲手把救亡书报一本一本地送到青年的手里，心里也很痛

快，虽然比不上你们在医院工作的人实际，”刘波兴奋地对文淑解释，话并不多，他却用力说着，他好象要把他的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刻印在她的心上、使她同意他的话、相信他的话似的。

“你今天怎么这样客气起来了？”文淑说着不觉满意地笑了。她看见刘波还望着她不肯移动脚步，便忍住笑催促道：“快走罢。你难道不饿？老是望着我做什么？”

刘波笑着说：“好，我们就到‘冠乐’去罢。”他刚刚拔步要走，看见文淑已经先走了两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连忙追上去问道：“你那个医院远不远？”文淑侧头把医院的地点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等一会儿我送你去。”

“好，那么我先谢谢你。”文淑愉快地往前面走了。

他们到了“冠乐”，坐在楼下角落里的散座上。两人对面坐着。刘波要了一盆炒饭。但是文淑要的橘子刨冰先来了。她衔着吸管慢腾腾地吸着冰水，一面抬起长睫毛盖住的不大不小的眼睛，调皮似地偷偷望着刘波，静静地听他一个人的长篇的叙述。他宣传似地（其实是诚恳地）、絮絮不休地说着，他好象要把“八·一三”以来他的行动和思想都在这次谈话里说出来似的。但是他说了许久，直到他把炒饭吃完，她也吸光了两杯橘子刨冰以后，他还不知道她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因为她虽然现出注意地听话的样子，却不曾发表过她自己的意见，不过偶尔说两三句开玩笑的话打岔罢了。其实他的话已经被文淑完全听进去了，而且引起了她的赞美。

时间过得很快，他们刚坐下不多久就到了一点二十分钟，

文淑嚷着要走了。刘波便付了账，跟着她站起来，两个人一路走出了饭馆。

马路上和人行道上的人似乎比先前多了些。许多人伸长了颈项在望天空。他们刚走出门口就听见一个霹雳似的爆炸声，比文淑先前听见的响得多。文淑吃惊地轻轻叫了一声，一把抓住刘波的膀子。

“不要紧，文淑，你不要怕，”刘波看看文淑，大声安慰道。

文淑有点不好意思，马上松了手，瞅他一眼，撅起嘴嗔道：“哪个害怕？你不要看轻人！”便赌气般地往前面走了。

刘波知道她是假装生气，因此也不着急，顺口唤了一声“文淑”，便迈开大步追上去。她听见他的脚步声，故意不理他，却加快脚步往前面走，想不要给他追上。她走了不多远，忽然觉察到刘波的脚步声消失了。她回头一看，看见刘波正和一个穿着整齐西装的中年人讲话。她便站住带了好奇的眼光望着那个陌生人。她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人的照片。突出的前额和低低的鼻梁是令人一见就不能忘记的，他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头搁在短小的身子上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文淑睁大了眼睛望着那个样子古怪的人，她想不起他的名字，而且她刚刚一想，就忍不住抿嘴微微笑了。她站了两三分钟，看见他们还在讲话，两个人的面容都很严肃，她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她等得不耐烦了，便向前走了几步，但又偷偷地回头去看那边。他们还在谈话。这时正走到十字路口，她不再前进了，便站在那里等候刘波。她看了看手表，决定再等他五分钟，如果他还不走过来，她就一个人到医院去。这里一家白俄

开设的商店的玻璃橱窗里有一件颜色鲜明的红毛线衫，她每次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地要把眼睛掉去看它一眼。她一直在打算有一天把父亲引到这里来，要父亲给她买下。但是今天她跟父亲吵过架以后，她决定不再向父亲要钱，也不再想买下这件红毛线衫了。所以站在玻璃橱窗前面，她忽然觉得不舒服起来。她皱一下眉头，便猝然掉转了身子。她决定再看刘波一眼就走开。但是她刚刚抬起眼睛，就看见刘波慌慌张张地向她走来；他动着眼睛向前面张望，显然是在找寻她的面影。她高兴地迎上去。

刘波和那个朋友谈着那些使人兴奋的话题时，完全忘记了文淑在等他。直到朋友走了以后他才记起她来，他以为她已经走远了，觉得很抱歉，还想追上她，或者就到那个医院去向她解释几句，因此正吃力地跑着。他只顾看前面，并不曾注意两旁的人，他走过了她的身边，却没有看见她，依旧急急向前走着。她也不唤他，却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他果然没有觉察到。她用手帕掩住嘴暗暗地笑着。但是过了大半条街，她忍不住了，终于噗嗤地笑出声来。这样使得刘波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

“你还是那样地小孩脾气，我怕你一个人生气走了，还想跑到医院里头去找你。你看我连汗都跑出来了，”刘波高兴地抱怨文淑道。

文淑站在旁边听刘波说话，她把第二根手指头衔在嘴里吸吮着，头微微俯下来轻轻地在摇摆，两颗漆黑的眼珠滴溜溜地上下转动。她等他住了口，才抬起头得意地抢白道：“谁叫

你不理我，把我丢在这里，只顾跟朋友讲话！”他还没有答话，她马上收起笑容正经地问道：“那个人是谁？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似的。”

刘波说出了那个人的姓名。那是一个大家熟习的文化人的名字。

“就是他！怪不得我好象见过他似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文淑兴奋地说。她又好奇地追问道：“他跟你谈些什么事，可以告——”

她还不曾讲完这句话，一声巨响又把她的话头打断了。她闭了嘴，脸上立刻现出严肃的表情。

刘波紧紧皱着他的浓眉，沉着脸一声不响地走了几步，他不回答她的问话，好象就没有听见一般。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压倒了脚步声、车辆声和嘈杂的人声。

她抬起头看他一眼，立刻明白了他的沉默的原因。她轻轻地挨近他，低声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心里难受吗？”

刘波把脸掉向着她，这意外的温柔语调震动了他的心，使他那被忧郁纠缠着的心绪突然开展了。惊喜的微笑刚刚浮到他的嘴边，他还来不及说半句话，一个比先前的爆炸声更响的“孔隆”的声音就迎头打了下来。他觉得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膀子，他想安慰她，但是痛苦的拘挛把他脸上还未完全露出的微笑赶走了。他诅咒般地说：“你数数看，他们丢了多少炸弹！我们就什么都不拿出来，让他们尽量地炸！真气人！五百磅的炸弹，每一个要炸死多少人，毁掉多少房屋！”他们正走到一家糖食店门口，应该转进那条横街去。他便在街口略停

一下仰头看天。天空还是十分晴朗，在西北角上三架飞机从容地低飞着，灰色的机身衬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显得非常分明。“你看！飞得这样低！”他愤怒地伸出指头指着那个地方对文淑说。文淑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似乎瞥见了飞机的影子，但是它们绕着圈子往前面飞，已经被房屋顶遮住看不见了。文淑还着急地接连问着：“在哪里？”

“看不见了，”刘波答应一句，便推了推文淑的膀子催促道：“我们快走罢，不然你到医院又会迟了。”他刚说完，又听见炸弹爆炸的响声，便气愤地骂道：“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屠杀！自己躲在安全的上空看见人死，简直没有一点人心！”

“可惜我们女孩子不能够加入空军，”文淑忽然怀了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叹息道。

“这是什么意思？”刘波惊讶地问了一句，他并没有仔细咀嚼文淑的话，他的脑子里还装满了炸弹巨响的余音。

“我在医院里头看见炸伤的弟兄们的痛苦，我只恨我是一个女孩子，不能够到战场去给他们报仇，”文淑把眼睛睁得圆圆的，两颗眼珠骨碌碌地滚动着，气恼不堪地大声说，好象在跟谁吵架的样子。

“这仇恨是一定要报复的，”刘波声音颤动地说。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觉得血液在血管里燃烧起来。话堆积在他的心上，积得很多，他不能够控制它们，就让它们自己冲出他的口腔，他挣红着脸，一面走一面说：“我见过先施公司门前的炸弹，我见过南火车站的炸弹，我见过一群一群的难民身上带血手牵手地走过马路，我见过那些血淋淋的无头缺臂的尸首。

南京路落炸弹的那天，我同一个朋友正坐在一路电车上。电车刚开到跑马厅，忽然‘孔隆’一声，把车子上的人都震傻了。我从没有听见过大响的响声，连我的耳朵也差不多震聋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见许多人慌慌张张地从新世界那面跑过来，电车不再向前开，却往后倒开了半条马路才停下来。路上秩序乱得很。我那个朋友吓得到处乱跑，我找不到他，就一个人走过去。马路上还在冒烟。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血。几片人肉粘贴在墙上，新新公司门前人行道上横着两只女人的膀子。我看见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头已经没有了。身上还穿着崭新的旗袍。我还看见一个穿长袍的人一只手按住胸口，埋着头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快到我面前忽然倒了下去。旁边一个童子军连忙搀扶着他，把他的头扳起来，一脸尽是血，眼睛鼻子都炸掉了……这些仇恨，这些无辜者的血！……现在又是炸弹的声音。单是在今天就不晓得丢了多少个！每一个炸弹落下去要吃多少人的血！都是我们同胞的血！我只恨我不能够马上给他们报仇！不能够找到一个更紧张、更直接的工作！”

这绝望的呼吁一直达到文淑的心里，把她的心也搅乱了。他的叙述把一幅一幅惨痛的图画放在她的眼前，用残酷的景象折磨她。她不敢多想，也不敢看他，只是默默地在他的旁边走着，听着。她觉得他的苦恼也就是她自己的苦恼，他的愤怒也就是她自己的愤怒。她无法排开它们。已经走到医院的对面了，她还不想进去，也不想知道时间的早迟。她停住脚听他说到最后一句话。左手轻轻地挨着他的膀子，她抬起头看他，

他的清瘦的脸微微发红，眼睛有些湿了。这眼泪是她料想不到的，但是她很感动。她忘了自己地唤一声“刘波”。他侧过头温和地看她，短短地说：“你到了。快进去罢。”

文淑看看刘波，忽然亲切地微微笑了。她声音清脆地说：“再见，我明后天到报摊上来看你。”她孩子似地带跳带跑穿过了马路，站在医院的篱笆门口，把手里捏的护士证交给门前守卫的童子军验过，然后进了门，匆匆地向着那座耸立在草地上的高大洋房走去。

二

在医院里，文淑刚换上护士的衣服，正在三楼那间窄小的休息房间内和一个叫做素贞的同伴讲话，忽然看见两个年纪较大的同伴带着烦厌的神气匆匆走进房来，几里古鲁地抱怨道：“又吵着换药！真讨厌！”说着就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解开衣领的扣子，疲倦地嘘着气。

文淑惊诧地看看她们，微微露出不满意的颜色，然后又回头去看素贞，对这个熟习的朋友用眼光表示她的意见。她想说明两句讽刺的话，可是话还没有出口，她就听见茶房唤“小姐”的声音。茶房站在门口探一个头进来说：“小姐，三号房间请你们哪一位去一趟，那位姓方的吵着要换药，他忍不住痛了。”

“我去，我去！”文淑自告奋勇地答道。

“真讨厌！又是那个姓方的兵！”那两个坐着休息的女护士中间一个长脸的周小姐把眼睛一竖抱怨起来。她讨好地阻止文淑道：“冯小姐，你不要去！你不要理他！郑医生吩咐过的，现在还不能换药。”

文淑对那个同伴笑了笑，答道：“不要紧。我反正没有事情。我去问问郑医生。”她又对素贞说：“素贞，我们一块儿去罢。”她们扬长地走出去了。

她们先到医生休息室去。郑医生在那里。文淑鼓起勇气走到他的面前，兴奋地把换药的事情一口气对他说了，她以为郑医生一定会听她的这番话。她怀着希望地望着他那略带方形的胖脸。

郑医生把两只颇小的眼睛差不多挤在一起，略略张开被浓密的唇髭盖着的嘴唇，从牙缝里透出两下笑声，然后谦和地说：“冯小姐，请你去叫他多等一等。他的药一定要在手术室里面换。现在手术室忙得很，还有好几个人等着施手术。请你叫他不要发急，等等也不要紧，再过一阵就有空了。”

他的脸上丝毫没有感动的表情，声调也很平板，只是敷衍似地说着话。他刚刚把话说完，就转过身子和别一个医生谈论什么事情去了。

失望在文淑的脸上涂了几笔阴影。她痴痴地立在那里，望望郑医生，又看看素贞。她先前认为是很有把握的事情，现在象梦一样完全消失了。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或者去对那个受伤的弟兄说些什么话。素贞在她的旁边催促道：“走罢。”她似乎没有听见。她想了一想，忽然省悟似地跟着素贞转身走了。她撅着嘴似乎在心里说着赌气的话。

她们用快步子向病房走去，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素贞自语般地说：“不晓得又出了什么事情。”文淑不作声，怀着紧张的心情跑进里面去。

房里显得很乱，靠窗的第二号床铺前后围着许多人，茶房，男护士，女护士，看护长都在那里。还有两个女护士在后面伸长了颈项惊惶地张望。

“什么事？”文淑过去一把抓住一个女护士的膀子，发急地问道。

“他要自杀，用裤带勒自己，”那个同伴激动地答道。

“不要紧罢，”文淑耽心地说了一句，也不等那个同伴答话，便挤进人丛中去了。没有人理她，只有那个“教婆子”型的矮小的看护长责备似地瞪了她一眼，但是她不曾觉察到。她只顾注意地看第二号床铺上的姓方的兵士。那个年轻的弟兄两只手都被茶房和男护士紧紧地拉住了，他疯狂似地挣扎着，哭叫着。他们在解开他颈项上的裤带。他绝望地哭叫着：“我不要活！我不要活！我的伤反正医不好。为什么还要叫我多受痛苦？”别的人都不对他说话，只有看护长象哄骗小孩似地在安慰他。他似乎不曾听见。但是裤带已经被拿走了，他的两只手被人紧紧握住，丝毫不能移动。他的力气也竭尽了，他不能够再作任何反抗的举动。他于是呜呜地伤心哭起来，孩子似地骂着：“你们好狠心！连死也不让我死！”看护长传教似地继续说着安慰的话。人渐渐地散开。他的哭声也渐渐地小了，后来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男护士和茶房也陆续散去。文淑和素贞都站在床前垂着头感动地看那张睡脸。另一个女护士，年纪比文淑大一点的王小姐正俯着身子在整理被单，小心地将病人的身子盖好。

“你们要小心地看守他，”看护长带着严肃的表情，慎重地小声对文淑和素贞说，便悄悄地走出去了。

素贞应了一声。文淑却摸出手帕弯着腰轻轻地揩去那个人脸上的泪痕。房里没有人说话，一种悲哀的静寂笼罩着这

个房间。王小姐整理好被单便出去了。文淑站直了，把手帕插回到腋下钮扣上。素贞提醒似地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你把它拿去洗洗。”文淑点了点头，但是她仍然站在床前不动。“去罢，有我在这里，”素贞催促道。文淑才把头扬起往四处一看。她看见到处都是带着善意的脸。

“小姐，你们真好，”旁边床铺上一个左手受伤的弟兄坐起来发傻地望着文淑，不知道怎样才好地称赞道。

文淑想不到会听见这样的一句话。她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回答。她起初得意地不好意思起来，微微红了脸对那个人笑了笑。但是她的眼光触到那张带一点滑稽样子的发傻的脸庞，她的感情就立刻改变了。她觉得心里难受，好象有一种力量在压迫她，推动她，揉她的心，磨她的思想，使她感到自己的无力，自己内部的空虚，自己的渺小。她忽然不能自主地掉下了两滴眼泪。她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眼泪，她不愿意让这个感情长久控制着她。她便竭力装出愉快的神情，低声哼起她爱唱的《五月的鲜花》，走出病房去了。

“我究竟有什么好处？”文淑立在走廊上栏杆前面，忽然疑惑地自问道。她从来不曾对自己发过这样的疑问。她简直没有想到过。关于自己，她就没有起过疑惑。她相信着自己，她相信着自己所爱的那些人。她喜欢新的、年轻的、活泼的一切，她憎厌和她的性情不相合的一切。她把世界看得很简单：每个人，每件事就只有她的脑筋所能描摹的一点轮廓。她生活在她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却没有人告诉她这理想跟现实差了多少远的路程；也许有人对她含糊地说过，可是她毫不注意地

忽略了。她这样地生活下去，直到现实的面目一点一点地从理想中透露出来，这对于她是意外，但是并不曾引起她的怀疑。父亲近来态度的改变，对于她的行动的企图干涉，这使她愤怒，但也不曾引起她的疑惑和深思。然而如今一个受伤兵士的一句话，却意外地激起了她的心海里的波涛。她想着，想着。但是她似乎就永远触不到这个问题，她不能够给一个回答。她觉得有点苦恼，就赌气不再去想它，她摘下了帽子拿在手里，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又轻轻哼起《五月的鲜花》来，两只眼睛毫无目的地望着楼下的景物。她的眼里充满着绿色。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深绿色的树叶正得意地迎着风微微舞动。这温和的风也挨到了她的前额和脸颊，它还在玩弄着她的浓发，把它们吹起又让它们慢慢地落下，或者吹过额角搭到前面去，就象一只温柔的手爱抚地玩弄着它们。这只无形的手还拂拭着她的脸。她觉得一阵爽快。先前的那个问题已经去远了，她的苦恼也去远了。她不再想什么，口里只顾哼着她唱惯了的那支歌。她看见几个穿西装的青年男女手里拿着小小的白旗子，抱着慰劳品，由一个童子军陪伴着穿过广玉兰中间的路，向着楼房走来。她忽然把身子动一下，即刻离开了栏杆。她知道是慰劳队来了。她觉得十分高兴。这三四天来她都没有见到慰劳队的影子，医院里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就象按照一个规定的呆板的日程进行。空气有点沉闷。重伤病房里弥漫着药味和伤臭的气味。在她的耳边时时响着令人心紧的痛苦的叫喊。每一个枕上放着一张苍白色的脸，失神的眼睛绝望地望着人。她们做护士的虽然殷勤地看护、

真诚地安慰，也似乎温暖不了那些战士的心。只有慰劳队的到来，用热情的语言和感谢的表示暂时给这个阴暗的房间添一点亮光，给护士们加一点兴奋。在轻伤病房里病人平时就可以自由地谈笑，可以在廊上散步，可以下棋消遣；她们有时还可以从他们的口里听到壮烈的战绩，但是只有在慰劳队代表民众来向他们致敬的时候，他们才有尽情叙述的机会。慰劳队的人（大半是青年）分配着慰劳品，站在兵士们的床前用颤抖的声音说：“弟兄们，你们为我们民众流了宝贵的血，带了荣誉的伤……”那时候房里再没有别的声音，许多只眼睛望着说话的人的脸。那个人的眼里也冒出了泪珠。兵士们接着就谈起作战的情形来。当他们说到冲锋过去跟敌人肉搏的时候，他们是那样地激动，他们的眼里冒着火，嘴里吐着白沫，或者伸出一只完好的手，捏成拳头宣誓般地说：“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把日本强盗赶出去！”那时全房间人的心里都响着同样的声音。仿佛每个人都含着眼泪微笑，每个人都亲切地互相看望，每个人都忘了自己，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好象成了一颗心似的。这情景使文淑太激动了。她虽然流了眼泪，但是她觉得畅快，似乎心里轻松了许多，她好象已经见到了黎明。所以她喜欢这样的时刻。三四天不看见慰劳队的影子，就使她感到寂寞。现在单是白旗子和慰劳品在她的眼前晃动，虽然她那略微近视的眼睛还不能够分辨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她就高兴起来了，她不去洗手帕，她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她并不细想，便匆匆戴上帽子，整理一下身上的衣服，又把口罩取下，拔步走下楼去迎接他们。她走到二楼，看见两

个轻伤的兵士立在栏杆旁边谈话，两人中的一个在安徽一家中学里读过，书左手的手指全被炸去了，现在还包扎着，但伤处渐渐地好了。她和素贞上星期在二楼服务过，和一般弟兄处得还好，尤其和这个安徽兵士谈得来。他看见她走过，便亲切地叫了一声。她即刻站住，含笑地对他点点头，走过去说：

“同志，你现在好得多了。”

“冯小姐，谢谢你，我想我不久就可以出院了，”安徽的弟兄愉快地答道。

“怎么这么快？”文淑一怔，忽然留恋地冲口道；她连忙改正说：“我说，你的伤还没完全治好，应该在医院里多住几天。”

“我住得久了，应该出去了，”他谦逊地说。后来他又露出苦笑，说下去：“别的弟兄们在战地上得不到看护，这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实在不好意思占住床位。”他埋下了眼光。

“你不要这样说，你已经为我们民族尽过力了，”文淑感动地说。

他们站在二号病房门前的栏杆旁谈话。房里的弟兄都看见了文淑的背影。有两三个人高声叫道：“冯小姐！”文淑听见声音，便回过头去看那里面。

“冯小姐，请进来，”好几种口音同时叫着。许多人的眼光一齐射到她的脸上，她微微红了脸，用本地口音说普通话道：“什么事？”

“冯小姐，请你唱个歌给我们听，”那个在吴淞受伤的保安队的弟兄，躺在床上带笑央求道，头侧着，两只眼睛紧紧望着文淑的脸，笑容下面还隐约地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冯小姐，请唱个歌。小姐，——唱罢。给我们唱一个，”许多声音杂乱地响起来。多数人的态度都是诚恳的。

“冯小姐，你就唱一个罢，”那个安徽弟兄也加入要求道。

“冯小姐，请唱一个罢，”那个断了一只腿的方脸的四川兵士忽然坐起来，伸长了颈项央求着。

“你不要起来！你不要起来！”文淑连忙跑过去阻止他。她刚刚说完话，那个弟兄已经力竭似地倒下去了，脸色十分难看，被单凌乱地盖着他的半个身子。她走到床前给他盖好被单，一面温和地说：“同志，你好好地躺着不要动。我唱，我等一会儿就唱。”

“你现在就唱一个好不好？”方脸的兵士疲倦地低声求道。

“朱小姐，你也来唱一个，”一个麻脸的兵士忽然嚷道。安徽弟兄和另外几个兵士恳切地齐声附和。

文淑回头一看，素贞正含笑地大大方方地向她走过来。素贞很有办法地推辞道：“我不会唱。”于是众人的眼光和话语又集中到文淑的身上了。

“不要唱，医院里的规则不许可，”素贞轻轻地在文淑的耳边提醒道。

文淑看了素贞一眼，不说什么，只是摇摇头。她迟疑一下，又看看四川弟兄的脸、安徽弟兄的脸和别的几个弟兄的脸，那些殷勤地期待着的眼光感动了她。她回过头对素贞说：“不要紧，我给他们唱一个。慰劳队来了，院长、看护长们一时不会上来。”

兵士们听见文淑答应唱歌，大家都很高兴，都伸起颈项

等待着。

文淑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微微红了脸，好象不敢看人似地仰起头，低声唱道：

打回老家去……

打走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地方是我们的……

素贞要阻止她也来不及了，便让她唱下去，心里却替她发急，只怕院长或者看护长跑来撞见。文淑却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她专心唱着歌。她渐渐地不害羞了，声音也稍微高了一点。她把头略略埋下。许多只眼光停留在她的脸上，她也不现出一点窘态。

文淑唱完了，害羞地说了一句：“我唱得不好，”连忙拉着素贞轻轻地跑了出去。她们在医院里都换上了软底鞋，走路来很方便。

“我们下去看看，慰劳队来了，”文淑走出房间兴高彩烈地对素贞说。

“不要去。慰劳队来了，会上来的。我们下去给看护长看见又算触霉头，”素贞小心地劝阻道。

“不要紧，我们看看就回来。怎么来了这么久，还不见他们上来，”文淑固执地说。素贞拗不过她，便跟了她下楼去。

她们刚到楼梯旁边，便看见院长陪着几个客人走了上来。她们吃惊地退了回去，但已经被那几个客人看见了。一个戴深色眼镜的三十岁光景的客人忽然叫了一声：“冯小姐。”

文淑马上站住，等候那个人走上楼来。她还分辨不出这是谁的声音。那位颧骨高、脸长而带黄色的客人上了楼，便走到文淑的身边，向她伸出手，一面露齿笑道：“冯小姐，你在此地！我还不晓得！”

素贞把文淑腋下钮扣边插的那方手帕抽出来，拿在手里，低声说：“你还没有洗。我替你洗去！”便独自走了。

文淑把那只手轻轻地捏了一下，她马上记起了这是一位近来很活跃的剧作者，便笑了笑，愉快地说：“曾先生，你戴了一副眼镜，我差一点不认识你了。”她在院长的面前故意压低了声音讲话。

“想不到你真的到医院工作了，”曾明远好意地称赞了一句。

这时院长陪着其余几个人慢慢地往前面走，进了一间病房。

“我说过要来，当然是真的！我知道你看不起人家，”文淑撅起嘴说，她的脸发红了。

“刘波现在在哪里？他还住在老地方罢，”曾明远换过话题问道。

“对啦，”文淑点头笑答道。她便把刘波卖报的事情告诉了他。

“刘波倒是一个实际的人。他有些见解我并不赞成，不过他能说能做倒也不容易，”曾明远听完文淑的话，点了点头，略带赞叹地说。后来他又加一句：“我哪天想找他谈谈。”

“他就在霞飞路金神父路口卖报，你吃中饭以前去找他，

一定找得到，”文淑热心地接口说。过后她又问：“你怎么不跟着他们一道去？你是来慰劳弟兄们的。”她的眼睛一霎一霎的，一对笑涡分明地嵌在红润的两颊上，一张小嘴包不住笑，她把右手第二根指头伸到嘴唇边挨了一下，立刻警觉似地缩了回去。她只顾望着曾明远微笑，他不知道她为着什么事情这样高兴。

“你说什么慰劳！你们院长一定不肯放我们上楼。后来交涉了好久，他才答应把慰劳品留在下面，由医院分配，他自己陪我们到病房看看，还叮嘱我们不要讲一句话。这怎么能说是慰劳？”曾明远停了一下说，声音不高，不会被院长听见。但是他说到后来气更大了。他觉得院长没有理由拒绝别人来慰劳在前线受伤的弟兄。

“为什么缘故呢？弟兄们欢迎外面的人来慰劳他们，每次有人来，他们都很高兴，”文淑惊愕地说。

“院长说，上面有命令来：要严防汉奸，怕汉奸混进来捣乱，”曾明远忍住气冷冷地说。

“这不对！汉奸不见得就会混进这里面来，我们不能因为怕汉奸就把什么事情都放下不做！”文淑气青了脸翘起嘴说。

院长陪着客人从另一间病房里出来了。文淑便改换了语调催促曾明远道：“你快去罢，我在三楼等你。”她撇下他独自走上三楼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曾明远一行人走到三楼的廊上，文淑正替一个兵士写好了一封家信，拿着它从病房里出来。这一行人的脸上全带着严肃的表情，大家沉默着，而且低着头慢慢地移

动脚步，只有院长一个人声音平板地说了几句解释的话。文淑迎着他们走去，她走过曾明远的身边，对他点一下头笑了笑，就往休息室里去了。她到了休息室刚刚坐下，喝了半杯凉开水，就听见隔壁房间里叫人的声音。她连忙站起来，急急地走到那里去。

一个保安队的弟兄躺在靠近门的病床上，看见她进来，便用本地话指着隔三个床铺的兵士对她说：“小姐，这个弟兄要什么东西。”

她的眼光跟随着他的手指望去。她看见一张灰白色的脸：颊上的肉已经消失了，两只眼睛微微睁开疲倦地望着她，似乎没有看见她，又闭上了。她立刻走到那张病床跟前，躺在床上的伤兵听见脚步声又把眼睛睁开，求助般地望着她。

“同志，你要什么？”文淑俯下头温和地问道。

那个兵士把眼睛睁大了一点，用力说道：“小姐，我要糖，”然后力竭似地把头一动，眼皮也垂了下来。

文淑以为听懂了他的话，也不再发问，只点点头，说了一句：“好，我就去给你拿来，”便匆匆地走出房去。她走得很快，到了事务处要了一碟白糖，拿着又回到病房去。她想早一刻办好这件事情，免得错过跟曾明远见面的机会。

那个弟兄正闭着眼睛，她的脚步声唤醒了他。他睁开眼睛看她，但是眼珠已经不能灵活地转动了。

“同志，糖来了，”她带笑地说，把一碟白糖递到他的手上。他不大明白地看了看，忽然失望地摇摇头，伤心地哭起来，他说：“你不懂我的话！”便把头掉向里面去。

“你要什么东西？好好地说，我去给你拿来，”文淑惶恐地立在床前，半道歉半安慰地说。她已经把盛白糖的碟子接过来了。

那个弟兄好象没有听见似的，不理睬她，他的哭声渐渐减低。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困窘地红着脸，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小姐，你不要着急。这位弟兄的话我也听不懂。你歇一会儿罢，他就会好的，”对面一个北方的兵士安慰文淑道。

门边那个保安队弟兄隔着三个床铺传过话来：“小姐，你们待我们太好……”他的话还未说完，忽然被隔壁房间里的叫声打岔了。一个弟兄喊道：“哎哟，痛死我了！”

这样的喊叫和呻吟仿佛震动了这个房间。于是来了一阵沉默。文淑打了一个寒颤。她仍旧立在那里，手里拿着碟子，在等候那个兵士的回答。

这样地过了片刻，直到一个低微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来，她回头去看，这是姓章的男护士的声音，说着“他已经死了，死了。”

文淑看了那个弟兄最后一眼。她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便回转身子急急走了出去，手里还捏着那一碟白糖。

她埋着头走出门。曾明远在廊上等候她，她也没有看见。曾明远唤了一声“冯小姐”，她才站住，走到他的身边去。

“什么事情？你哭了！”曾明远诧异地问道，他看见泪珠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一个弟兄死了，”文淑象孩子在大人面前诉苦似地说，她

用那只空着的手揉眼睛。

“你不要伤心，我们的弟兄是死不尽的，”曾明远鼓舞地说，他的声音带了一点颤动。

文淑不说什么。她的痛苦的眼光穿过泪水望着曾明远。

他们这样地对望了片刻。曾明远忽然一笑，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快乐的表情。他感动地说：“看见这些弟兄，我就觉得我们民族始终有希望。他们真是拿性命来拚的。昨天英文《大美晚报》上说一个外国教士到前线去，看见中国兵冲锋，一排人过去，没有看见敌兵，只见一阵烟，人就全没有了。后面的人再冲上去，又碰着一阵排炮，一阵烟，人又全光了。这样一排一排的死掉，却没有一个人畏缩。那个外国人看到后来，忍不住伤心地哭了。我们是拿人的血肉来跟最新式的炮火拚的。”曾明远说到后来，声音颤得厉害，他也十分激动。他看见文淑一直在流眼泪，又想起他的朋友们在下面等候他，他也不再说什么，便告辞走了。他临走时还递了一张名片给文淑，殷勤地对她说：

“你有功夫请到我们团里来看看，青年救亡团，这张卡片上有地址，离你们医院也不远。”

“好，我一定来，”文淑爽快地答道。

三

刘波冒着细雨穿过霞飞路，走入一条横街。深黑色的天空矮矮地罩在他的头上，夜已经来了。尘埃似的小雨点粘聚在他的头发上面，一张燃烧的脸被微凉的雨水打湿了，但是他并不曾感到一点冷意。他的心情十分紧张。周围的景物在他的眼前只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占据着他的脑子的是另外一个景象。那里似乎有着够多的温暖和够多的光明，给他照亮了黑暗、冷静的路，使他象赴盛会一般地迈着大步急走。

时候还早，夜却是相当地静了。环龙路上只有寥寥几个人影，雨湿了的柏油路上有一两处映着街灯的微光，镜子似地在发亮。两旁人行道上的广玉兰枝叶间积了不少的雨水，秋风吹起，枝叶一动，雨点沙沙地迎头洒下。刘波没有提防，略略吃了一惊。但是他并不在意，不过站住抖动一下身子，把雨水抖落一些，便继续往前面走了。

炮声从远处响起，一声，两声，三声，静下去，又不再响了。夜又落在静寂里。刘波走完一条马路，就只看见两个穿长衫的人默默地迎面走来，跟随着一阵风很快地过去了。前面不调和地起了笑语声，两个白俄巡捕立在一家关闭的商店门前，跟站在树下的一个穿雨衣的白俄老妓调笑。他们轻蔑地看了

刘波一眼，刘波刚走过，那个老妓忽然发出了鹭鹭叫声一般的怪笑。

这笑声给刘波引起了一点憎厌的感觉。但是他马上又象拂拭尘埃似地把它拭去了。炮声又响起来，轰隆的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一切重新被静寂的网覆盖着。他走到一段更阴暗的地方，忽然从树后转出一个鬼魂似的影子。一只无力的手向着他伸过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哀求着：“先生……”

刘波愤然想着：“为什么要阻拦我？”他头也不回地只顾往前面走。那个穿黑衣的瘦弱的女人在后面紧紧跟着他，手差不多要抓到他的衣服了。呻吟似的声音在他的耳边磨来磨去：“先生，我不是讨饭的，我家住在虹口华德路，丈夫在香烟厂里做事情。……我们一家人从虹口逃出来，走到大世界，给炸弹打散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到处找，都找不到……”

永远是这同样的故事。到处都是苦恼。到处都是同样的平凡的悲剧。每个人，甚至最渺小的人也遭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什么需要着这么多、这么大的牺牲？这思想使他痛苦。

“先生，我不是讨饭的，我家住在虹口华德路，……”那个女人唠唠不休地哀诉着，不肯放松他，似乎要将她所受到的苦难让他完全知道。他不能够忍受了，便伸手进衣袋里去，把袋里仅有的两个角子抓出来，放到那只微微颤抖的瘦得见骨的手掌上，不等她说一句道谢的话，连忙走开了。

他转过一条横马路，走进了一个弄堂，在过街楼下，一些妇人和小孩正摊开被头睡在水门汀地上。中间留着一条过道，但已经被带泥水的脚步弄得滑脚了。他走入一条窄巷，到了

一家后门口。厨房里也没有灯光。他不去敲门，却站住唤了一声“永言”。亭子间的窗户立刻打开了，一个人探头出来看，他在下面点点头。厨房里电灯亮了，那个叫做永言的人来给他开了门。门一开，他马上走进里面去。他听见关门的声音。他回头对那个开门的朋友道歉地说了一句：“我来迟了。”

亭子间的门微微掩着，灯光从里面射出来，屋里有人唧唧啾啾地谈话。刘波连忙走上楼，推开房门进去。他认识的几个人都在那里。

房里有一张小小的方桌和一张条桌。没有床，地板上铺着宽大的草席。七八个人坐在席子上，留下那把唯一的椅子给刘波坐。方桌上凌乱地放了两个热水瓶和六七个杯子，还有一滩溅出来的水。这使人想到房里先前有过一番热烈的争论。条桌放在屋角，一个蓬头发的青年把头俯在条桌上专心地抄写稿件。

刘波坐下来，望着郑永言，关心地问道：“谈的结果怎样？”

郑永言是一个长脸无须的中年人，在这间屋子里他的衣服最整齐。银白色背带在他的蓝条子绸衬衫上闪闪地发光，下面是一条折痕显明的咖啡色西装裤和一双黄色的拔佳皮鞋。他的头发向后梳，新擦的头油使它们成为雪亮。他严肃地答道：“刚刚叫子辉打电报到南京去了。这两天战况不大好，租界当局态度开始软化。我们又要搬家了。不过那件事我们还是要做。先把那个东西干掉再说。”

刘波的心情顿时紧张了。他看见永言脸上没有一点惊惶的表情，忽然想起一个星期前永言穿着一身破烂的学生装、头

发蓬乱地到报摊上来找他时的情景，他一阵眼花，几乎疑心在他面前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知道并不是这样。他也多少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且总是带着崇敬的眼光看他们。他常常在他们的中间感到自己的渺小。每一次看见他们，听他们热烈地谈话，他总是十分激动，觉得牺牲之火在自己的内心燃烧。这一次他又不能制止心的猛跳了。房里简陋而杂乱的陈设已经在他的眼前消去。他看见的只是几颗人的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也掏出来献给他们。他又问道：“刊物没有问题罢？”

“第二期还是照常出下去，稿子齐了，子成正在抄写。不管怎样，这两国青年的联合刊物是应该维持的，”永言坚决地说。

“不过我耽心的是销路的问题，我们怕发不出去，”一个叫做鸣盛的青年说。

“要不是法租界卖报现在有了限制，我一定拿到街上去卖，每期至少也可以卖它四五百份。然而现在什么都有限制了。这么大的地方只发两百多张照会，这怎么够！帝国主义者的手段总是那一套，”刘波气愤地说。

“刘波，我们刊物上写文章的人太少。就只有我们几个。太单调。以后你给我们多写一点罢，”永言直截了当地说。

刘波迟疑一下，便答应下来，说：“我尽力做就是了。”他又把眼光掉去看那个在角落里写字的青年。那里很阴暗，射到角落里的灯光很难使人分辨清楚细小的字迹，房间里谈话声也没有断过，但是那个瘦长的青年却俯在矮小的条桌上，把铁

笔在那张铺在钢笔板上面的蜡纸上用力划着，脸差不多要挨到纸上了。他仔细地将原稿上潦草的字迹一字一字地搬上蜡纸。他是那么安静，好象房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似的。

这种专心工作的精神打动了刘波的心，他不觉感动地唤了一声：“子成。”子成回过头来看他，头往上一扬，嘴上带着微笑，两只眼睛不住地颤动，眼皮肿起，眼睛里布满了红丝。

“你太辛苦了。怎么不戴眼镜？你看得清楚吗？”刘波关心地问道。

“看得见，我已经习惯了，取了眼镜倒方便一点，”子成毫不在乎地答道，脸上还带着笑容。

“啊，我记起来了，刊物我寄了出去，今天有个朋友写信来问是不是你写的‘钢笔板’。你写的这种字是很出名的，有些朋友一见就认得，”刘波赞叹地说。

“我写得并不好。不过他们都忙，没有功夫做这种事情，”子成谦虚地说。他伸手去揉了揉眼睛，又说：“还有一点了，我把它写完罢。今晚上就要印出来的。”他便转过身子俯下头去。铁笔落在钢笔板上的声音又飒飒地响了起来。

“那个东西前天又在虹口演说过一回，他说：‘一·二八’战争中间，我们同乡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很对不起‘大日本帝国’……”永言看见子成掉过头去写字，便对刘波讲起另一件事情，可是刘波不等他说完便气愤地插嘴道：

“没有做什么事情？尹奉吉^①的炸弹，影响也就不小了！”

^① 尹奉吉：朝鲜的爱国者，“一·二八”战后在虹口日本人的庆祝会上投弹，炸死炸伤白川大将等人。

“他那种东西怎么想得到!”另一个须根布满脸颊的中年人气冲冲地接下去说。

“他还说在这次战争里我们同乡应该替皇军尽力,又说了许多肉麻的话。这种人真是我们里面的败类!”

“他拿了日本人的钱到处收买我们同乡,给日本人做事情。有些无知的同乡真的被他收买去了。我们如果不去掉他,中国的弟兄会认为我们都是他们的敌人,所以……”永言下了决心地说,说到“所以”两个字,他的脸上忽然露出残酷的微笑。

刘波完全明白了。他知道那几个人的性情和生活方式,他也略略知道他们过去做过的几件事情。他明白他们不轻易发出诺言,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地说出来的,里面都带着行为的力量。他对这些话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时他仿佛看见一支手枪对准一个人的胸膛预备开放。他只说了“这也好”三个字,点了点头,便把眼光掉去看别的朋友。

那个满颊须根的中年人和一个头发灰白而年纪不过三十几岁的友人,正在用他们的本国话低声谈论。叫做鸣盛的青年拍一下永言的肩头对他说了几句话。铁笔的声音忽然停止了。子成在角落里发出一声叹息,就站了起来。

“子成,我看你也够累了,你休息一会罢,我来替你印,”刘波殷勤地对子成说,他也站起来。

“我来印,”鸣盛突然从席子上立起来抢着说。这个工作是他做惯了的,他不愿意让给别人做,在他们的团体里面,油印刊物和传单的时候,总是子成写钢笔板,他做印刷的事情。

“我并不累，”子成在回答刘波的话。但是他又坐下去，微微叹了一口气，一面把写好的蜡纸叠在一起。鸣盛到另一个角落里把放在地上的油印机搬到条桌上。

“子成又在想家乡了，”那个头发灰白的朋友同情地向刘波解释道。然后他又自语般地说：“其实多想也没有用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好象就没有‘过去’一样。我也记不起我有过家乡。我那一点点个人的情感也已经完全消失了。我觉得我仿佛就是一副机器。”这声音并不是平板的，它带了一点苦涩味在颤动着，这证明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还不是一副机器。

“朴元，子成跟你不同。这也怪不得他，他过去那一段回忆是很难忘掉的。我知道你不相信永久的爱这种话。可是亲眼看见自己的未婚妻被一只魔手从他的身边抢走，以后还得到她从另一个环境里送给他的消息，后来就没有下落了，这种事情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子成已经算是能够忍耐的了，”永言这样替子成解释道。

子成离开了条桌，过来坐在席子上，就坐在朴元旁边。他戴上了眼镜。眼睛红肿了，眼皮不住地震动，他略略摇头，苦恼地分辩道：“不，并不单是那件事情。不单是为着个人的事情。别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刚强，也许是我们的环境把我们养成这样。不过我比你们都脆弱，我忘不了那许多事情。我出来得最迟。我看见那些良善的农民无缘无故被人捉去，挖地坑，倒煤油去烧他们。我在宽大的马路上常常看见六匹马拖着的四轮车经过，里面装的尽是从乡村里捉来的青年，和我

一样的青年。‘我们的性命还不如一只蚂蚁，’我们在那边常常说的这句话，你们应该还记得罢。……”

“不要说了，”那个满颊须根的人烦躁地嚷起来。“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处？路隔了那么远，连望也望不见！”

“我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回到那边去，可是并不象一只老鼠那样地回去，象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永言忽然昂起头，充满了自信地用力说。

“不要说这么远的话了，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现在都不知道。说不定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马上就会来的，”那个须根满颊的人烦躁地说。

“光韩，你为什么老是说这种话？他们要是真的来了，我们这里准备好了家伙等着他们，还怕什么！”永言责备似地说，光韩沉着脸不做声了。

鸣盛站在屋角条桌前印刷刊物，刘波在旁边给他帮忙。子成独自阴郁地低声唱起故乡的歌曲。朴元开始和永言轻声讲话。屋里稍微静了一点。忽然窗下弄堂里响起了吹哨声，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听见没有？”光韩神情紧张地说。

“老九的信号，我要走了，”永言变了脸色自语道。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取了那件挂在门上的西装上衣穿在身上，又对朴元说：“朴元，明天在那个地方见面，不要忘记啊。”

“也许有了什么意外事情，”鸣盛惊诧地掉过头说。

“刊物印完没有？”子成连忙站起来问道。

“还有一点，马上就要完了，”鸣盛简单地答道。他仍旧埋

下头去，加快地推动胶棍。刘波在折叠已经印好的报纸。

“我先带两百份去，”永言说。他走到条桌前面，从刘波的手里接过报纸，用当天的《申报》包好，挟在腋下，打开亭子间的门悄然走了。

“我也要走了，”光韩和另一个中年朋友都站起来，差不多同声地说。

“你们也带点刊物去，”子成嘱咐道。他们也走到条桌前面去拿了两束刊物，不再说什么，就轻轻地移动脚步走下了楼梯。

鸣盛印完刊物后把油印机收拾好，从条桌上搬回到另一个屋角，刘波仍旧躬着腰在折叠桌上的报纸。子成和朴元静静地坐在席子上，好象在思索什么。窗下的吹哨声又一次响起，声音短促，响到第三次就消失了。

朴元霍地站起来，声音低沉地对鸣盛说：“把那个东西给我带去。”

鸣盛点点头，便去把方桌下面那口箱子打开，取出一件用粗布包扎的沉重的东西，递到朴元的手里，低声叮嘱道：“你当心一点。”朴元接过布包，郑重地放在他的西装上衣的袋中。他的脸上并不现出一点紧张的表情，他安静地带笑说了一句：“我知道。”子成正用了激动而带忧郁的眼光默默地看他，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子成的肩头，安慰地说：“子成，你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罢。”子成也不说什么，只是苦涩地一笑。朴元走到门口，忽然掉过头来又问了一句：“刘波，你不走吗？”

刘波把埋下的头抬起来，短短地说：“我就走。你不要等我。”

房里只剩了刘波、子成、鸣盛三个人。刘波还在数印好的报纸。子成默默地在席子上躺下来。鸣盛拿了用过的稿件走出房去。

“刘波，你应该走了，”子成烦躁不安地催促道。

“这些我都带去，”刘波自语道。他又掉头殷勤地对子成说：“地址也给我带去，我替你们寄发。放在我那里不要紧。”

“也好，”子成说着立刻站起来，从方桌下的箱子里取出一本记事册，递给刘波，小心地嘱咐道：“你要把它检好，我后天来拿。”

“还是我给你送去罢，”刘波接过记事册谨慎地放好在衣袋里面。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严肃地问道：“你们就要搬家吗？”

“说不定明天就搬，”子成低声答道。“现在还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我后天上午去找你。……”

炮声轰隆地响起来，声音很大，好象这个房间也被它震撼了似的。第一声的余音还未停止，第二声又响了，以后便接连地响下去。鸣盛空着手从外面进来。他走到方桌前，把茶杯放好，又用抹布揩桌面，一面自语般地说：“已经九点多钟了。”

“我走了，”刘波惊醒似地说。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约会，他不能够在这里多留一刻了，便拿起那束报纸匆匆地告辞出去。

弄堂里地上还是湿的，但雨已经住了。铁门关上了，只留

下一道小门让人进出。避难的妇人和小孩沉沉地酣睡在被窝里，皮鞋的声音也不曾惊醒他们。马路上除了巡捕外只有两三个行人的影子。刘波走了一条马路，才看见一辆黄包车。他也不讲价钱，就坐上车，要车夫赶快把他拉回家去。

车夫是一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他拉着车走了几条马路，忽然胆怯地跟刘波谈起话来。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先生，仗还要打多久？”

这突然的奇怪的发问，使刘波一时回答不出来。但是那个车夫又问了：“先生，我们几时才把东洋人赶得出去？”

“我也不大知道，总要几个月罢，”刘波敷衍似地答道，他还在想别的事情。

“先生，我不是拉车的。我原是虹口蛋厂的工人，家住在杨树浦，给东洋人打光了。只有我母亲妻小逃了出来。我没有法子，只得拉车挣点钱吃饭……”年轻的车夫一面走一面在诉苦。

又是这同样的故事，又是这平凡的悲剧！痛苦是没有止境的。在任何地方他都得不到安宁。甚至这一个年轻的、结实的男子也要拿个人的痛苦来折磨他。“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他刚刚这样想着，车子已经到了他的家，车夫放下车，直立着嘘了一口气，两只眼睛求助似地瞪着他。这时是同情战胜了。他对车夫说了两句安慰的话，要车夫在后门外等候他，把他从这里再拉到一个医院去。

刘波回到自己屋里，放好刊物和地址簿以后，连忙走出来，坐上原来的车子，很快地就到了医院，他掏出表来看，刚

巧是十点钟。他很高兴，便多付了一倍的车钱让那个车夫走了。

许多灯光从那所高大楼房的窗户里射到草地上，里面还有人声。但是医院门前一盏大的电灯寂寞地照亮着半湿半干的柏油马路。童子军拿着棍子静静地立在门口。好几辆黄包车停在竹篱门外，车夫们坐在踏脚板上打盹。没有人从里面出来。刘波立在对面，他的焦盼的眼光穿过了大门，希望抓住一两个人影，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觉得老是站在那里没有意思，便走下人行道，信步在马路上踱着。他走了七八步，便又走向医院门前。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子说着话从里面出来，黄包车夫看见她们，便拖着车子拥上去，她们一个一个地坐上车走了。这里面并没有文淑。刘波焦急地等待着，不眨眼地凝视着草地。于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他熟习的影子。

文淑用快步子走出来。她的手挽着一个同伴的膀子，她们带说带笑地走到门口，她看见刘波，禁不住欣喜地唤了一声，便拖着那个同伴的膀子向他走去。她们穿着同样的蓝布旗袍，头上留着同样没有烫过的童化头发。另一个女子身材比文淑的稍微低一点，脸庞稍微瘦一点，眼睛更大一点，表情更沉静一点，年纪也要大些，两个人走在一起就象两姊妹一样。

她们走到刘波的身边，文淑把素贞介绍给他。素贞对他点一个头，她的嘴唇包住笑。文淑命令似地带笑说：

“刘波，你送我们回去罢。”

刘波点头微笑着。

“你倒很讲信用。你等了多久？我倒怕你不来，”文淑得意地说，她拉着素贞的手往前走了。

“我接到你的信怎么会不来呢？我有点事情，到这里刚巧十点钟，”刘波直率地笑答道。

素贞在旁边低声笑了，文淑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了一下。

他们一路上愉快地谈论着。文淑兴高彩烈地叙述医院里的事情，她有时把脸侧向着刘波，有时把脸侧向着素贞，在她说话的中间素贞也插进来说了几句。不久就到了素贞的家，刘波和文淑站在弄堂门口，素贞进了里面还回过头来对他们挥手。

夜更静了。马路伸长在黑暗的天幕下，街灯象星星似地寂寞地闪光。没有一个步行的人，凉气渐渐侵到了他们的身上，脚步声单调地升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升起来，老是那同样的声音。

刘波温和地向文淑问话，文淑回答着，谈的仍然是医院里的事情。四周的空气太静，太凉了。文淑有点受不住，她又有点害怕，又有点烦。她需要温暖，需要安慰。她把身子靠近刘波，伸出右手挽住了他的左膀。

“你今天累了罢，”刘波关心地问道。

“不，我一点也不累，”她摇摇头答道；“我心里有点烦。我在家住不下去，”她苦恼地说，“父亲近来大变了，他一点也不疼我，每天故意找事情跟我吵。他希望我同他一个有钱朋友的儿子订婚。我一定不答应！他把我逼得厉害了，我就跑！”

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只要有人肯帮忙我。我也可以吃苦的，我可以给人家做娘姨，”她撅起嘴赌气地说。

“你不要为这种事情难受。现在时代不同了。只要你自己不愿意，你父亲也不敢强迫你，”刘波同情地安慰她道。

“是的，他不敢强迫我。我不怕！”文淑理直气壮地说，她听见同情的话，知道有一个人站在她这一边，她也感到一点安慰。她的烦恼立刻减了许多。但是另一个思想突然来抓住了她。她侧过脸去看他，两颗眼珠不住地对着他转动，笑涡在她的脸颊上出现了，她开玩笑地问道：“我问你，要是有一天我去做娘姨，或者去做一个女工，你还理不理我？”

刘波并不相信她会走那样的路，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也不反驳她。他同情地把她的脸看了片刻，那一对细小的眼睛在阴暗中也是很明亮的。他半开玩笑地答了一句：“那么我天天来看你。”

“呸，哪个相信你的话？说得这么好听！”文淑噗嗤笑了起来。她接着又问道：“曾明远来找过你吗？他对我说过要找你谈谈。”

“曾明远？他会来找我？我好久没有见他了，”刘波惊诧地说。“他哪里有功夫找我？他是一个作家，我不过是一个大学生。……”

文淑不知道刘波的心情，她不等他把话说完，便打岔地说：“他要我到他们青年救亡团去看看。我想过两天就去。”

“青救倒还不错，曾明远也算做了一些事情，”刘波改变了语调说。

文淑突然记起来了：刘波平日不满意所谓“职业的作家”，对曾明远也有一点成见，她便对他解释道：“其实曾明远对你还不错。”她刚说了这一句，忽然指着天空惊叫起来：“你看！”使得刘波吃惊地抬头向上面看。

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景象。天静静地横在他们的头上。在一个角落，好象谁用画笔涂了一抹红霞，从一些屋顶后面，红光一阵一阵地升起。此外再没有别的异样的景物；只有少数高耸的屋顶被包围在红光里，忽然现出摇摇欲坠的样子。刘波的眼前就只有一片红光。

“火！”文淑痛苦地叫了一声，她差不多把身子完全倚在刘波的身上，眼睛望着天，慢慢地跟着刘波移动脚步。她的重量压着他，使他不能够走快。他觉得她的身子在发颤，他知道她这时心里很难受，但是他还不明白她究竟单是为了这火，抑或是为了她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只是同情地望着她。

“烧罢，痛快地烧罢，索性把大上海烧成一个火山，让你们都烧死在这里！”文淑忽然提高声音咬牙切齿地诅咒道。

过了片刻，刘波勉强抑制了激动和苦恼，温和地劝慰她：“文淑，不要难过了。我们快点走，你就要到家了。”

“好，”文淑埋下头来看了刘波一眼，顺从地吐出了这个字，振作精神地站直了身子，她想到刘波还要在戒严时间以前赶回家去，便不再说什么，急急地跟着他往前面走了。

四

文淑从医院回到家中，娘姨正在厨房里煮面，看见她进来便带笑唤了一声“大小姐”。

“怎么这个时候还煮面？先生没有睡？”文淑诧异地问道。往常在十点钟左右她的父亲就上床了。

“马先生来了，夜里就住在此地，先生在陪客讲话，”娘姨答道。

文淑不说什么，她只把眉头一皱，好象听见了不愉快的消息。“马先生”是她素来讨厌的客人。他自己说是她父亲的远房亲戚。他有一张尖脸和一对往下吊的小眼睛，还有那最使她看不顺眼的鼻下一撮日本式唇须。他的话就象他的面容那样讨厌。他常常到她家里来，爱跟她的父亲、母亲谈种种事情。“八·一三”以后，他的唇须便不见了，据说是怕别人把他当作东洋人看待，他怕挨群众的拳头。不过他因此对那般“反日”的群众暗中更加嫉恨。他最近跟别人谈起中日战事，他喜欢讲的话就是：“靠不住！中国人怎么打得赢日本人？这简直是在做梦！别的不说，人家每年产几百万吨钢，我们究竟有多少？”报上刊出日本飞机被打落几架的新闻，他谈起来就摇头说：“造谣！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我们的空军幼稚得很！”他看

见报上中国军队冲到汇山码头的标题，又气愤地说：“假话！人家东洋军队全是受过训练的精兵！我们军队怎么打得过？”这些话深印在文淑的脑子里。她起初还跟他辩几句，有时会因此挨到父亲的责骂。后来她不能再忍耐了，他的一句话也会引起她的烦恼，她甚至不愿意和他见面。她常常躲避他。她如果在家里遇见他，她就躲在亭子间里不出来，或者借故跑到外面去。她有时候还对母亲骂他做“汉奸”，骂他做“失败主义者”。母亲不能了解女儿，也没有女儿的那种见解，母亲或者笑笑，或者劝女儿对待人不要任性，不要忘掉规矩。母亲还说了许多话，虽然那些话都是用温和的语气说出来的，文淑还是听不进去。她始终讨厌那个姓马的。她想不到他居然要在她家里住宿一夜。为了什么缘故？有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她也不想去管这种事情。她只觉得心里不痛快。

她想再到外面去。但是现在是戒严时间了，而且她也没有去处。她觉得疲倦，她又想回到自己房里去睡觉。她在厨房里站了一会，想了想，她还是走上楼梯，打算到自己住的三楼亭子间去。

她经过二楼房门前，看见那里灯光十分明亮，听见她的父亲和客人同时发出的笑声，她加快脚步连忙转弯往三楼走去。她走到亭子间门口，推开门，扭燃电灯。她就站在门口嘘了一口气，她仿佛逃出了地狱一般。她安慰自己地说：“我还是早点睡罢。”

但是意外地从二楼送来了唤声：“文淑，文淑。”

她并没有听错，这的确是她父亲的声音。她不愿意答应，

她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她的亭子间到下面去。然而父亲似乎不肯把她放松，父亲又在二楼唤她了，这次他的声音更响亮，而且好象还带了一点怒气。她只得发出应声。接着父亲又大声吩咐：“你下来。”

她知道拒绝是没有用的，眼看就有一场争吵在下面等着她，她无法避开。她对自己说：“要闹就闹，我还怕挨骂？”便壮起胆子走下楼去。

她走进了二楼的房间，父亲和客人坐在中间隔着一个茶几的两张沙发上。母亲坐在对面靠墙的方桌旁边。她只得忍耐着压低声音招呼了他们。

“你从医院回来？”父亲严肃地问道，瘦脸上两只眼睛威严地望着她。

“是，”她短短地回答，在平时她也许会多讲几句话，现在她倦得连多动一下也不愿意。她的眼皮也变得沉重了。

“你以后可以不去了。我看干这种事情也没有好处，说不定将来倒有危险。你还是在家里看看书罢，”父亲开始教训似地说话，但是他的声音里不带一点感情，它们进了文淑的耳朵，使她起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

“既然已经去过了，要退出来也不好意思。况且现在学堂又没有开学，”文淑低声回答道。她本来想说的不是这几句话，但是她还没有开口就看见母亲的关切的和焦虑的眼光往她的脸上射来，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说：“忍耐一点罢，不要跟他争吵，就让他说几句也不要紧。”她这次算是听从母亲的话，改变了答语的口气，其实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疲倦，她只想早

些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我的话都是好话。你应当好好地想想。象你这样一个中学生，什么都不懂，你在医院里能够做些什么事？只有白白地浪费光阴！再说，做看护又有什么前途？学堂也应该开学了罢。其实学堂没有开学，你在家温习功课也不是一样！我花钱送你进学堂，你不肯好好读书，天天在外面活动。现在又天天在外面闹‘抗日’，整个上海滩都要‘抗’光了，你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你看你父亲得到好处没有？”父亲板起面孔说下去。

在平时她一定会大声地插嘴分辩，或者赌气地走开。这次她却埋着头一声不响，她在咬自己的嘴唇皮。

“我不高兴我的女儿做看护。我叫你不要去医院，叫你少管闲事，你总不听我的话，”父亲继续说。“你不要以为你有办法。我老实告诉你，你父亲这一点点家产都要给这回抗战抗光了。我刚刚才知道我们南市的房子已经烧掉了……上海就要完了，我也要完了。你有办法，你就搬出去走你自己的路，省得将来跟着我们去讨饭。”

文淑气得掉下眼泪来，她抬起头想顶撞几句。但是话未说出口，她看见父亲的脸色很难看，眼圈也红了，她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有什么事情，便又把头埋下，把身子靠在门边那个五斗橱上。她咬紧牙齿，赌气地在心里说：“我等你骂个够。我不哭。”

倒是母亲心软了，文淑的眼泪和气恼的表情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不忍看见女儿受委屈，便在旁边解围地说：“你也

不要再说了。她在医院里忙了大半天，刚才回来，一定累得很。你让她早点去睡罢。”

父亲板着脸不做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母亲说：“她的精神很好，你不要耽心。”

马先生刚刚把手里一支茄立克抽完，安闲地将烟头丢进痰盂里去，这时便插嘴说话了：“大哥这番话很有道理。大嫂，你就让他发挥一下。她们年轻人在外面也难得听到这样的好教训。”

母亲有点不高兴，便不响了，但是她的脸上只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人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文淑抬起头憎厌地看了马先生一眼，把嘴一撅，然后又埋下头去。

父亲没有说话，他咳了几声嗽。马先生却抓住这个机会来发挥他的道理：“不怪大哥太激动，现在一般年轻人也实在太嚣张。他们拿了父兄的钱不好好地在学堂念书，专门在外面活动。真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得罪了友邦，打起仗来，受害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日本人不过想跟我们做做生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大家都有好处。……”

“不见得罢。这次的战争还是敌人发动的。他们先开炮，他们先打我们。我们要维持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才不得不抗战，”文淑忍不住插嘴辩驳道。她仍旧不抬起头，她不愿意看见那个人的脸。

“这就是你们年轻人的那一套，”马先生讥笑地说；他看见娘姨端了面碗进来，但是他还不慌不忙地继续说下去：“年轻人只会说漂亮话。他们从来不想到我们拿什么去同人家打！”

我们怎么打得赢人家！连英国、法国都害怕它，我们这个小国算什么？要有办法，从前就不会割掉那么多地方了。……”

冯太太连忙指着茶几上的面碗，用微笑掩饰她的焦虑，殷勤地对马先生说：“请用点心罢，看冷了。”其实她只有一个思想：打断他的话。

文淑的忍耐力完全失去了。她不能够留在房间里听这种汉奸式的论调。她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抬起头气愤地驳斥道：“这简直不象中国人说的话！你敢到马路上去跟大家讲一遍！”她只说了这短短的两句，便气冲冲地走出去，也不顾母亲在后面的唤声。

文淑刚走到门外，就撞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一只手抓住她的左膀，带笑地说：“你又生气了，现在到哪里去？”

“你放开我！”文淑恼怒地说，她在挣扎。

“你说了，我才放你。你是不是在医院里受了气，没有地方发泄？”她的哥哥故意开玩笑地问她。他穿一件睡衣，大概是工作完毕了从三楼下来的。

“你不要管，我要回房去睡觉！”她仍然气愤地说。

“好，我送你回房去，”她的哥哥说；虽然她的父亲在里面唤“文良”，但是她的哥哥仍然拉住她的膀子，陪她上楼去了。

他们进了亭子间，文良一松手，文淑立刻奔跑似地扑到床上去，她把脸压在枕头上，开始哭起来。

“大妹，你这个脾气真没有办法。我晓得你又在跟爹吵架了，”文良正经地说，他的圆脸上还留着笑容。“爹装满了一脑筋的旧思想，你偏偏喜欢跟他争论。你跟他多吵，又有什么用

处?”

“我是生成这个脾气的，”文淑呜咽地赌气说。

“改一改也不要紧，”文良又带了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就坐在她的书桌前那把椅子上坐下来。“爹就是那个脾气。你不肯答应跟他选定的人订婚。你不知道他要靠你去联络江家，你却偏偏不听他的话。所以他很不高兴。他说什么，你就让他说，他骂你，你就让他骂。他说完了，也不会管你照不照他的话做。他想起又会再骂，骂过又会忘记的。他近来脾气大一点，这也难怪他。他在闸北、江湾有好些产业这次都打光了，又天天在外面听到一些谣言，他心里怕得很，都是为那些钱啊……”

“我不怪爹。我恨那个姓马的！”文淑不耐烦地打岔说。

“姓马的，我晓得，”文良马上把声音压低认真地说，“那个‘准汉奸’。……”文淑听见“准汉奸”三字觉得一阵痛快，立刻坐起来，也不去揩脸上的泪痕，就坐在床沿上注意地听她的哥哥讲话。“他明天要到天津去。我看他这次去不是去干好事情。好象他说过他在那边认识几个日本朋友。他多半想干点下贱事情，发一笔横财。先前爹要我把床铺让给他睡，我没有答应。现在给他睡二楼亭子间。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爱国活动，不过对他这种准汉奸我很看不起。”

“爹为什么要同这种人做朋友，我真不懂，”文淑接着说。

文良笑了笑，然后解释说：“他会拍马屁。爹就喜欢这一套。而且说不定爹还在梦想他给爹帮忙。爹正为了南市的弄堂在生气……”他说到这里，听见外面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便

住了嘴。

冯太太的略带憔悴的面容在亭子间里出现了。她走到床前，也在床沿上坐下来。她低声对文淑说：“你爹喊你下去给马先生陪礼。”

这意外的命令激起了文淑的极大的反感，她撅起嘴答道：“我不去！”

“你爹喊我来带你下去，”冯太太又说，其实她自己也不愿意看见文淑向马先生陪礼，不过她不能不传达她的丈夫的命令。

“我说不去就不去！”文淑恼怒地答道，她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勇气。

“我也不赞成你去。爹做得太过火了，象那种‘淮汉奸’（冯太太插嘴警告说：“小声点！”）还理他做什么！”文良感到不平地说。

“但是我怎么去对你爹回话？”冯太太茫然问道。

“妈，你就说大妹睡了。爹再要说话，大妹就把房门关紧，爹也不会进来吵的，”文良答道；他又站起来对文淑说：“大妹，你关门睡觉罢，我陪妈下去。”

文淑关好房门睡到床上以后，还听见父亲在下面带怒地大声讲话。她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不过她知道是和她有关的。她不愿意听那种声音。她用铺盖蒙着头，赌气地说：

“你们不要看轻我。总有一天我会做点事情出来给你们看。我偏偏不听你的话！”

五

上午,文淑对父母说要去朋友,便早早地出去了。她找到了曾明远写给她的地址。那是一家俄国菜馆的统厢房,走廊上站了六七个男女青年,他们愉快地高声谈论着,看见文淑进来,大家用好奇的眼光欢迎她。文淑不问一句话,便往那间开着门的厢房走去。

房间不小,里面放了几张写字台,有好几个人在那里办公。文淑看见曾明远埋着头在写字,便高声唤道:“曾先生。”

曾明远抬起头,笑着应了一声“冯小姐”,便放下笔站起来,走去迎接她。他先说:“你的信收到,事情已经办妥了。不过请你签个字。”他把她引到他的书桌前面,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志愿书,要她在上面写下她的名字。文淑也不看纸上印着什么样的字句,便兴奋地签了名。曾明远把志愿书接过来,放在抽屉里,笑着对她说:“你现在是我们的会员了。”

“那么给我一点工作做,快点给我工作,”文淑高兴地说。

“我介绍你认识的朋友,”曾明远满意地对她说。她跟着他去见了每一个人;大家都带着笑容欢迎她。

门外的年轻人中间有三个走进来。曾明远瞥见一张小孩似的面孔在门口张望,便叫了一声:“周欣!”随着应声进来一

个身材矮小的女子，她走到曾明远面前，笑吟吟地打量着文淑。曾明远开玩笑似地说：“周欣，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冯文淑，她的脾气跟你的差不多。你们一道在宣传组做事罢。”

“欢迎，欢迎！”周欣说着，对文淑伸出手来。文淑紧紧握着周欣的手，客气地说：“请你指导我。”

“你还会说这种话！”周欣噗嗤笑起来。

“你不必跟她客气。她的小孩脾气比谁都厉害，”曾明远在旁边对文淑说：“好，你们谈谈罢。周欣会给你介绍其他的朋友。她会告诉你怎样工作。”

文淑便开始和周欣在一起做事情。她们两人占据了屋角的一张条桌。周欣在整理壁报的稿件。她把这一期壁报编好，就交给文淑抄写，因为文淑对她讲过自己在学校里常常做壁报的抄写员。文淑的确有过不少这样的经验。她可以画报头，也可以用两三种字体誊写性质不同的文章。她拿起墨笔在那张已经用铅笔画好了行格的白报纸上专心地写着。她写得不算慢。她抄录到一些激烈的辞句时，她的笔动得更快，字迹也显得潦草了。

“你不要写得太潦草了，有些人会看不清楚的，”周欣在旁边提醒文淑道，这时文淑已经写好一张，第二张也写到一半了。

“要我写得慢，我就不会，那么你来写罢，”文淑含笑地抬起头，把笔往桌上一放，故意谦让地说。

“我要写，你也要写。我们两个人写还来不及，你还要罢工，这不行！我们至少要写好五张，他们在等着拿出去贴！”周

欣笑着说。“你看，他们就要来催了，”周欣把脸掉向门外，那里有两个穿白衬衫的青年正伸起头对着她们微笑。一个长脸戴眼镜的向周欣问道：“好了吗？”

周欣点一个头，匆匆地答道：“再等一会儿，就好了。”她马上埋下头拿过一张白报纸，急急忙忙地折出几条痕迹，就抓起笔，依着折痕，兴奋地写起来。

“你什么时候加入青救的？”文淑忽然抬起头好奇地问道。

“你快写，不要说话，”周欣头也不抬低声催促道。

“一面说话一面写，也是一样。你不回答我，我就不写了，”文淑固执地说。

周欣忍不住笑了，她从纸上略略举起头望了望文淑，霎霎眼睛，低声笑道：“你的脾气跟我的差不多。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

“早点来找你？我昨天连你的名字也不知道！”文淑觉得有趣地小声笑道。“你怎么不到医院来看我？”

“医院？我记起来了，”周欣一边写字一边说，“曾明远对我讲过你。他那天在医院里碰见你。我想不到你也会参加我们的团体。我参加也不过一个月。你为什么又不做护士了？”

“我还是要去，现在我是派在夜班，所以白天有功夫，”文淑答道。“我只想做点事情。我不愿意闲着。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你倒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周欣忽然称赞一句，把文淑的话打断了。她没有笑，人不知道她是真的在称赞，抑或在开玩笑。

“人家跟你说真话，你听不听？”文淑发急地说，她撅起嘴来。

“不要生气，快写罢。我也是真心称赞你，”周欣忍住笑回答道，“你的意思是对的。你白天夜里都不肯休息，把全部力量贡献给抗战，我们年轻人都应该这样做。”

“这算得什么？在前线拚命的将士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牺牲的是鲜血，我们出一点力又有什么了不起？”文淑谦虚地说：“你再说那种话，我就不同你好了。”

“你快点写，我就不说了，”周欣满意地带笑说，她喜欢文淑的性格，她高兴自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朋友。

“我写到第三张了，你还催我！”文淑不服地辩道。她看见周欣不作声，停一下她又说：“其实这样的工作我也并不满意。我只想到前线去。”

“到前线去？真的？你能够吃苦吗？”周欣故意激励地问道。

“你不要轻视人家！我不信我吃苦就比不上你！”文淑带着自信地分辩道，她的脸有点发红了。她甚至赌气地说：“只要有会，我一定去。我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就不要理我。”

周欣满意地笑了。她抬起头望着文淑说：“没有人轻视你。我知道你很勇敢。你去，我就同你去。我也想去。一定有机会。曾明远他们正在筹备这种工作，说是要组织战地工作团，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成功。”周欣说完对文淑笑了笑，便又把头埋下了。

“那么我现在就去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动身，”文淑十分高

兴，不能忍耐地说，她放下笔站了起来。

“你坐下，不要着急，”周欣连忙阻止道：“你现在去问他，他也不能够确实回答你。有了出发的日期，我自然会告诉你。你还是安心写你的东西罢。我们下午还有别的事情。”

“我就是这个脾气，你对我说了，我就不能够闷在心里头。我这个人是不住秘密的，”文淑笑着解释道，她不再说话了。她专心地继续抄写壁报。周欣举头默默地看她一眼，也不说什么，依旧埋下头去。

房里不时有人进出，话声就没有停止过。忽然一个江北口音大声说起话来，使得房中起了小小的骚动。曾明远匆匆地走出去了。他站在走廊上和那个江北口音的人讲话，不过他的声音不高，文淑听不出他在讲什么。

“什么事情？”文淑看见好些人走过去围着那两个人，听他们讲话，她又听见那个陌生人说出“我们吃外国人的饭……”一类的句子，她觉得奇怪，便问周欣道。

“你想还有什么事情！又是来逼我们搬走的。那个家伙来过两次了。法捕房要我们团体搬出法租界去，”周欣愤慨地答道。

“岂有此理！他们有什么理由赶走我们？我们偏不走，看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文淑撅起嘴赌气地说。

“他们管什么理由！那班人还不是很势利！他们看见这两天我们战事失利，才出来欺负我们，”周欣责骂地低声说：“目前我们也只好忍点气，曾明远他们已经在公共租界看过房子，不过还没有讲好，也不能立刻就搬过去。他们等不得又来

催了。”

“真气人！到处都遇到不痛快的事。不晓得哪一天才是我们真正出气的日子？”文淑气恼不堪地说：“依我的脾气，我们就不搬，等他们来赶！”

“你还怕他们不敢吗？你难道忘记了双十节那天的事？好些散传单贴标语的学生都给捉进巡捕房里关过。万一我们军队再打一两个败仗，他们真会不客气把我们都捉去关起来的，”周欣说到这里，忽然用极大的努力忍住愤怒，换过话题说：“我们不要再讲这些废话了。你写好没有？”

“就只有几行了。你呢？”文淑接口说。

周欣不答话，她又埋头写了一些字，然后掷下笔站起来，对文淑说：“我好了。”她把文淑写好了的两张报纸拿过来和她自己写的叠在一起，然后站到文淑背后，把头靠在文淑的肩上看她写字。

文淑也写到最末两行了，她这时更潦草地结束了它们，说声：“我也好了，”回头对周欣一笑，让周欣把这张报纸和先前写好的卷在一起，拿去交给在走廊上谈话的青年。

曾明远已经把法捕房的人送走了，这时正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他无意间一掉头看见文淑一个人坐在条桌旁边东张西望，便站起来，走过去，慰问似地说：“冯小姐，今天辛苦了。”

“你以后就喊我的名字罢。你再喊冯小姐，我就不来了，”文淑笑着说。

“好，我就听你的话，”曾明远笑答道。他又问：“这里的工

作你做得惯罢？”

“我还可以做，我只怕我做得不好，”文淑客气地答道；她又怀着希望说下去：“不过我想到前线去。听说你们要组织战地工作团，什么时候会成事实？”

“我知道周欣会告诉你的，”曾明远好意地笑起来；“我们还在跟司令部接洽。大概不久就可以成事实。你高兴去，我们自然欢迎。”他又说：“你要回家吃饭罢？下午还希望你来，周欣正需要人给她帮忙。”

“我不回去，我随便在外面吃点东西就是了，”文淑诚恳地答道；“下午还有什么事情？”

“我们捐到些钱，打算做一千件棉背心送到前方去。布已经买好了。听说慕尔堂那边可以代做。我们要周欣下午到那边去交涉一下，就请那边代做。最好你能够和周欣同去，”曾明远带笑解释道。

“我一定去。有事情做，我总高兴，”文淑兴奋地说。

“在我们这里总会有事情给你做的，”曾明远满意地说。“你要是闲着，只管来找我好了。”

“用不着找你，我这里事情多得很，”周欣在旁边插嘴说，她从外面进来，回到条桌前，听见了曾明远的话。接着她又问曾明远道：“刚才‘包打听’来，你怎样把他送走的？”

曾明远皱皱眉，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仿佛有几片阴云盖上了他那张黄色的脸，他低声答道：“这个星期，一定要搬了。”话说完他沉默片刻，好象在想什么，她们在等待他说下去，他忽然觉察到了，把头略略一动，笑容又在他的脸上展开

来。他接着说：“不要紧。我有办法。我就要出去。”他和她们分别的时候，他还叮嘱周欣：“你今天要招呼冯文淑吃中饭。”

周欣把桌上的纸件略略整理一下，看见文淑在旁边闲着，便看看壁上的挂钟，然后对文淑说：“我们走罢，下午再来好了。你到我家里去吃饭，我就住在这条街。”

“不，我还是回家去，”文淑客气地说，她不愿意到新认识的朋友家里去吃饭。

“你就不痛快了！这还用得着客气？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的家和你的家是一样的。我家里也没有别人，就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小妹妹，”周欣殷勤地挽留道，她的眼睛里还露出一一点责备的表情。

文淑终于答应了。周欣欣喜地对她一笑，便拉着她的膀子一起出去。

她们高高兴兴地走到门口，看见一个长头发、瘦面孔、满脸热气的青年进来。那个青年唤住周欣问道：“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正要找你。”

“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回家去吃饭，”周欣答道。

“《战鼓》的校样齐了。稿子还不够。你答应我下期的稿子现在就给我罢，我看见你已经写好了，”那个青年从西装裤袋里掏出手帕揩着额上的汗珠，他把左手里捏的一束校样在周欣的眼前晃了一下。

“我的文章并没有写完，”周欣答道。她又问：“你就没有别的稿子吗？”

“现在来不及了，无论如何要你帮忙，不然后天就出不

了，”那个青年着急地说。

文淑不作声，她的两颗亮眼珠不停地在这两个人的脸上轮流转动。

“好，你等一等，我马上就给你弄好，”周欣爽快地答道。她又掉头把文淑介绍给那个青年：“冯文淑，新来的；李南星，他就是我们的《战鼓》的编辑。”她看见李南星同文淑握了手，便对文淑说：“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好，你快去写罢，我等你就是了，反正我没有事情，”文淑鼓励地说。接着她又带笑地加上一句：“等一阵我倒要拜读你的文章。”

“我不给你看！我的文章哪里有你的写得好？”周欣说着还回过头来对文淑一笑。她走到条桌前面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那篇未完的稿子，埋下头专心地读了一遍。然后她拿起笔继续着上次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文淑坐在周欣对面，半惭愧，半羡慕地望着周欣。她看见周欣手里的笔飞也似地动着，她又看见周欣停住笔把左手第二根指头放在嘴里轻轻地咬着，她忍不住微微笑了。她低声说：“你这个脾气跟我的一样。我写不出文章，也会咬手指头。”

周欣忽然抬起头看文淑，她说：“那么你也来写一篇。”她的思想似乎还在别处，她说了一句话，马上又埋下头去写字。

“我一定写不好，”文淑不好意思地笑答道。她又自语似地说：“不过什么时候我想写一篇试试看。”

周欣没有答话。文淑看见周欣在专心写文章，她也不再

打岔这个同伴。她觉得闲着无聊，便掉头朝屋内四处张望。曾明远不在这里了，她刚才碰见的长头发的青年正坐在曾明远的椅子上看校样。在这个青年的对面仍旧坐着那个有短须的中年人，他把一管羊毫笔高高地捏在手里，微微摇着头，在苦思，或者在低念着什么句子，他一定是在起草公函罢。在另一张写字台旁边，那个大学生和他的弟弟一面讲话，一面在空白的簿子上写下什么，或者从簿子上抄录字句。另一张写字台旁边，那个总务组的负责人正在和一个商人模样的来访者谈话。一个在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散文的青年作家，站在电话机前面讲着广东话。在屋角一张小圆桌旁边坐着三个女学生，她们正在卷纱布。

“我到那边去罢，”文淑自语地说，便站起来，脚步轻快地向着小圆桌走去。

三个女学生中有一个是她先前见过的，叫做张利英，大学二年级学生。张利英看见她过来，便对她点头微笑。

“我没有事情，这个我也会做，”文淑自告奋勇地说，她搬过一个凳子来坐下了。另外两个女学生马上掉头看她。她不害羞，却亲切地对她们讲话，介绍自己道：“我叫冯文淑，今天才来的，张利英知道我。”

张利英马上把那两个女学生的姓名告诉文淑，还说了几句介绍的话。那两个女学生也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文淑才知道她们是某教会女中的学生，也在一个伤兵医院里做过短期的护士，她们参加这个团体不过半个多月。她们的年纪也许刚刚超过二十（张利英的年岁稍稍大一点）。可是她们不象周

欣，没有一点小孩脾气。她们的面貌秀丽，举止稳重，声音温和。文淑觉得自己的性格跟她们的相差很远。然而她和她们谈了一阵话以后，就觉得她也喜欢她们，她们好象是她的姐姐一样。她坐在她们中间，用她的熟练的手指卷着纱布，卷好一卷就放进纸盒子内。装满一个盒子，她们就把它盖上。

文淑愉快地继续工作。在工作中间，她们也常常交谈，互相讲一些自己服务过的医院里的事情，或者叙述两三件有趣味的故事。她渐渐地忘记了等待周欣的事。后来周欣在那边唤她，她应声以后，等着把手里的纱布卷好放进了纸盒子，才站起来跟那三个女学生告别，转身去找周欣。

周欣已经把文章交给李南星了，因为文淑吵着要看才又去拿了回来。

这是一篇散文，叙述作者半天的见闻，这里面有作者目睹的第一次的上海空战，和外白渡桥上的混乱情形，还有那可怕的最初的闸北火灾。文淑默默地读着，她咬牙齿、咬嘴唇地读着，想着，她的血沸腾起来了，她仿佛见到那些可怖的景象的重演。它们在压迫她，包围她。它们不让她的心找个躲避的地方。她终于读完了文章。她愤怒地叹一口气，她甚至叫出了一声。

“什么事？”周欣惊讶地问道。

文淑把文章交还给周欣，她说：“你写得太好了。我想我也应该写一点东西。我一定写不过你。可是我不能再闷在心里了。”她的两只眼角各嵌了一颗明亮的泪珠。

“你心里难过吗？你怎么哭了？”周欣关心地小声问道。

“我一点也不难过，我只想哭，”文淑答道，眼泪就象线一样地落下来。她连忙转过背去，把脸向着墙壁，她一面用手帕揩眼泪，一面自责地说：“我不行，我的情感太脆弱了。”

“这不是脆弱。你的情感太丰富了，”周欣感动地安慰文淑道，她把手搭上文淑的肩头，又在文淑的耳边说：“现在到我家里去罢。”

六

老娘姨给周欣开了门。文淑跟着周欣从后门经过厨房走进客堂去。

一个中年妇人坐在方桌前缝衣服，一个九岁光景的小女孩跪在旁边一张凳子上。小女孩看见周欣，马上跳下凳子来大声唤“姐姐”。中年妇人也放下针，抬起头来看周欣和她的朋友。

周欣把母亲介绍给文淑了。那个太太的脸上立刻浮出和蔼的微笑，她温和地对文淑说：“冯小姐，请坐罢。”她又吩咐旁边那个女孩：“阿敏，你去喊老娘姨倒茶来。”

“姆妈，人家还没有吃过中饭，我带冯文淑来吃饭的，”周欣用撒娇的语气对母亲讲话。文淑觉得不好意思，正要开口，却被周欣用眼光阻止了。周欣又抢着说：

“姆妈，人家肚子饿了。”

“你总是这个脾气，当着客人面前，还象小孩一样地讲话，不怕给冯小姐笑坏了，”周太太溺爱地责备道；“今天我们吃饭还等你好一阵，你怎么这样迟才回来？饭菜都留得有，你去喊老娘姨给你们把菜饭热起，另外再炒一盆蛋。……你快去。你要怎么吃，你自己去吩咐也好。”

周欣答应着，就往厨房里去了。她的脚步动得快，与其说走，不如说是在跳。周太太目送着这个女儿的背影，满脸带笑地对文淑说：“冯小姐，你看阿欣在家里就是乱蹦乱跳的，不晓得她在外面是不是这个样子？”

文淑觉得自己要发笑了，又连忙忍住，她的脸上略略发红，她短短地回答道：“她在外面很好。”下面应该说什么话，她就知道了。

“冯小姐，你和阿欣是同学罢，”周太太又问道，两只小眼睛睁大了一点，眼光就在文淑的脸上盘旋。眼光很温和。一张端正的圆圆脸，两腮丰满，嘴微微张开，旁边有两道线。仔细看去，人容易发见她和周欣的相似处。

“不是，”文淑短短答道，她有点窘，她希望周欣马上回来。

“那么你一定是同她一起在那个什么团里面做事情，”周太太猛然省悟似地说。

“是，”文淑只能够回答这一个字，她连忙把眼光掉去看墙壁，看天花板。她听见了脚步声，她知道周欣回来了，自己又高兴起来了。

“你们年轻人热心做事情，也很难得，”周太太忽然赞叹地说。这时周欣进来了，在后面跟随着周敏，周敏手里捧着一个茶杯，端到文淑旁边，在茶几上放下。

周太太还继续往下说：“如今究竟比从前好一点。你们年轻人也能够做事。阿欣不爱穿，不讲打扮，就喜欢读书，做事。不过我耽心她那个脾气。她心太直了，讲话也很随便，又不大肯听别人劝。说不定有一天会闹出事情来的……”

“姆妈，你又讲这种话！”周欣笑着打岔道，“其实，你跟她讲也没有用，她的脾气跟我一样。”

“人家哪里会象你！”周太太不以为然地说：“你看冯小姐多沉静。”

文淑红着脸，想笑，又不敢笑，想说话，又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她口里唯唯应着，却不住地把眼光朝周欣的脸上射去。她的眼光在说话。

“姆妈，你说她沉静？真要笑死我了，”周欣噗嗤笑起来，指着文淑对周太太说。“你不要再对她说这种话，你要把她窘得哭了。”

“你当面说谎！”文淑翘起嘴对周欣说，“我正高兴你挨骂，我怎么会哭。”她把眼睛睁得很圆，两颗漆黑的眼珠就象要滚出来似的。

周太太温和地笑了。周欣连忙走到文淑旁边，伸出右手按住文淑的肩头，友爱地说：“人家在给你帮忙，给你解围，你反倒怪我。你心肠真不好。要是你高兴听姆妈的话，那么我就走了，让你一个人听她讲去。她一天一夜都讲不完。”

文淑还未答话，周太太先说了：“冯小姐，你不要信她的话，你听她越讲越没有礼貌。不晓得她在外面是不是这样？”

“姆妈，你刚才已经问过一次了。你看你的记性！”周欣插嘴笑道。

对这重复的问话，文淑这一次却给了一个不同的回答：“她做事情倒很负责，他们什么事都要找她。伯母，她很能干，比我强得多。”她说完掉过头对周欣做了一个鬼脸，周欣不作

声，却把她的膀子拧了一下。然后两个人相对地笑了。

周太太把头略略抬高一点，她的眼光对着门上的玻璃，她似乎在想什么。后来那两个年轻女子的笑声又把她的眼光引了去，等到她们笑够了，她才问道：“你们笑什么？”

“没有笑什么，我们两个人想笑就笑了，”周欣带笑地答道。

“你说话总是这样。你在外面做事，我真不放心，”周太太皱起眉头带点焦虑地说：“说话也该仔细点，小心点。外面不比得家里。这两天战事不大好，你们做事情更要谨慎点。先前听见隔壁十七号黄先生讲起我们军队早晚总要撤退，我怕那时候你会出事情。……”

老娘姨端菜饭进来了，打断了周太太的话头。饭菜都放在方桌上。周太太便站起来招呼文淑吃饭。她把未缝好的衣服放到那个带镜子的红木柜上面去。周欣依旧安静地带笑说：“姆妈，你的脑筋，我真不懂。象你这样耽心这个、耽心那个，怎么你自己又在给前线将士做棉背心，而且你又做得这样起劲！矛盾！矛盾！”周欣说完端着饭碗得意地望着她的母亲笑起来。

“总是你有理，你会讲话，我讲不过你，”周太太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但是她的脸上又现出了温和的微笑，她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红木柜上面未做好的棉背心，她带着感情地说：“我也是中国人。连老娘姨也捐了半个月的工钱，为什么我就不该做几件棉背心？不过我们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有用了……”这一句没有说完，她忽然换了话题说：“好，阿欣，你高

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拦阻你。我们中国也真该翻身了。”

“姆妈说得对，这一次我们中国真的要翻身了，”周欣放下碗，高兴地接口说。她又问文淑：“你觉得姆妈老吗？单凭这句话就可以断定姆妈精神不老！你想不到她做棉背心已经做好六七件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文淑停住筷子抱怨周欣道。她又睁大眼睛，眼珠不转动地望着周太太。周太太脸上略略发红，带笑地责备周欣：“阿欣，你又拿我开玩笑。让冯小姐笑我们没有规矩。”

“不会的，不会的。我要出去宣传伯母的爱国热诚。伯母都这样热心，我们真该羞死了，”文淑带着尊敬的感情分辩道。

“姆妈，你听见没有？冯文淑也是这样说，可见并不是我在拿你开玩笑，”周欣更加得意地笑道。

“不许你再说了。你看冯小姐就不象你这样多话。快点吃，等一阵饭就冷了，”周太太溺爱地看着她的女儿，一面用责备的调子催促道。她又谦虚地对文淑说：“冯小姐，没有小菜，请你不要见怪，不要客气，就当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多吃一点罢。”

“伯母还说没有菜？菜已经很多了。我第一次来就吃饭，伯母还说我客气，”文淑含笑地答道。她的确认真在吃饭，这时她感到肚饥了，同时周太太的和蔼的面容使她很快地就熟习了这个新环境，而且对周太太发生了好感。她高兴听周太太母女的谈话，她高兴看她们的笑容。她不再感到拘束了。

周太太带着慈祥的微笑满意地望着她们吃饭。周敏忽然从楼上拿下来一本《战事画报》，央求她的姐姐：“姐姐，你吃完饭，把这些图画讲给我听。”

“你去请冯家姐姐讲，她讲得好，”周欣指着文淑对周敏说。

“小妹妹，你不要信她的话。你姐姐比我讲得好多了，”文淑连忙带笑说。

周敏望望文淑，忽然含笑说：“两个人都要讲。你们都讲得好。”这两句话使得众人发笑了。

就在众人的笑声中，响起了巨雷似的炮声。虽然这是听熟了的声音，它却使众人的心情马上改变了。依旧是那单调的“轰隆”、“轰隆”。它们驱散了欢笑，驱散了愉快的心情。这些声音使人明白在这一刻有若干弟兄牺牲，若干同胞被杀，若干房屋被毁。这不是笑的时候，笑不能泄愤。人在这时候应该怀着愤恨加倍努力地工作。甚至年轻的少女象周欣和文淑也知道这一层，感到这一层。她们的脸色立刻改变了。愤怒出现在这两张脸上，完全掩盖了先前的笑容。她们的眼睛里也射出充满青春活力的怒火。她们不说话了，她们似乎在倾听，似乎要将那些可怖的声音完全捉住，不让它们逃走。

“炮声！这是我们军队开的炮！”周敏忽然高兴地大声叫起来。她的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笑容。没有人答话。周敏又自语地说：“浦东打过来的。”

文淑惊讶地掉头看周敏，她奇怪这个小女孩怎么会知道许多事情。一道光掠过她的脸，她似乎笑了一下。她想说话，

却没有说出来。周欣也落在沉思里了。周太太皱着眉头痛苦地低声说：“你小孩子懂得什么。不见得就是浦东打来的。”话是对周敏说的，周太太并不看周敏，她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她又说：“我听见这种声音，我的心就乱了。我只望我们军队早一天打胜仗，早一天见到太平。”

“下个月我们就打胜了，”周敏又从画报上抬起头来高兴地说。“轰隆，浦东的炮队又在放炮了。”

“我们的炮队多半在夜里放炮，白天怕敌人飞机找到炮位好来轰炸，”周欣忽然开口对她的妹妹解释道。她又带着痛苦的声音对她的母亲说：“姆妈，这个仗恐怕要打几年呢！”

“几年？怎么会这么久？”周太太吃惊地说，她不相信周欣的话。

“仗打起来了，就不容易结束。这一次是我们拚死求活的战争，总要打出一个解决来，”周欣的脸上有了光彩了。她带着毅力和热情说话，这表示她坚决地相信她自己的主张，而且准备随时说服别人。

周太太摇摇头，说：“我不相信。‘一·二八’那次还打不到两个月。”上了年纪的人总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

“这次和‘一·二八’不同。这次是全国抗战，全民抗战，”周欣理直气壮地反驳她的母亲道。“我们只要有一点力量，就要用一点力量来抗战。我们不达到目的，战争就不会停止。上海守不住，还有南京，还有汉口，还有重庆，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地方。”笑容又透过愤怒的云雾在她的脸上露出来了。

“哪个要听你演说？”周太太觉得自己说不过她的女儿，便

责备道，不过这依旧是慈爱的母亲的声音。然后她又注意地看看周欣，焦虑地问道：“你想，上海真的会守不住吗？”她不等着周欣回答，又侧头向文淑问道：“冯小姐，你相信她的话吗？她是不是又在骗我？”

“姆妈，我又不是军人，我怎么晓得？”周欣接着坦白地说：“我只说即使上海守不住，也没有关系。文淑，你说对不对。”

文淑马上答道：“伯母，她的话是对的，她没有骗你。”文淑的面容也开展了。她相信周欣的话，周欣的意见跟她的差不多。

周太太又看了文淑一眼。老娘姨端了面盆进来，绞了毛巾送给两位小姐揩了脸。周太太把要说的话暂时咽住了，等到文淑和周欣离开方桌以后，她才又严肃地、小心地对她们说：“这两天消息不好，谣言也很多。上半天十七号黄先生来讲起——”

周欣不等她说完，就不耐烦地打岔道：“姆妈，你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要听那种话。我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

文淑也接着说：“伯母，不会的，不会的。”文淑说话的态度很坚决，她甚至不能够想象那样的事情。

“你们年轻人总是这个脾气，”周太太温和地说，话里仍然带一点忧虑的调子，“人家黄先生在外面做过多年事，晓得的事情多……”她这次又没有机会把话讲完，一阵打门声打岔了她。老娘姨在厨房里。周敏好奇地跑出去。周太太默默地望着面前这两个少女，焦虑的颜色露在她的脸上，她似乎在等候什么人向她报告不好的消息。

“太太，童子军来捐雨衣，”老娘姨进来报告道。

周欣马上站起来，她听见周敏在厨房里跟一个年轻男人讲话。

“捐十块钱罢，”周太太爽快地说。她又吩咐老娘姨：“你请那位先生坐坐，倒杯茶给他吃，人家也不是为自己事情。”然后她掉头对周欣说：“阿欣，你上楼去，在我手提包里拿十块钱下来，抽屜钥匙在我枕头底下。”等到周欣走出客堂以后，周太太觉察到文淑带着赞美的眼光在看她，她便对文淑解释说：“这个年头把钱留在家里也没有好处，还不如捐出去做正用好。”

文淑点头答应着，便趁这个机会发表了她自己的意见。她本想到厨房去看看那个来募捐的童子军，但是她找不到托辞离开周太太。她说了一些话以后，也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她看见周太太微微地点头，又看见周欣牵着周敏的手在对她微笑，她也感到满意，她还回答周欣一个微笑。

“捐款的人走了吗？”周太太抬起头问周欣道。

“走了，收条在这里，”周欣答道，她打算把手里捏的纸条递给她的母亲。

“就放在你那里罢，”周太太挥手说；“捐点钱不过尽一点心就是了。哪个要看收条？”

文淑觉得这意思不错，便说了两句附和的话。她接着又想：要是我的母亲也象这样，那多么好。她开始羡慕起周欣来了。

周欣不表示意见，她埋下头看看自己的手表，便对文淑

说：“文淑，不要多讲话了，我们走罢。不要耽误了去慕尔堂的事情。”

“那么现在就去。我等一会儿还要到医院里去，太迟了难为情，”文淑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向周太太告辞。

七

青年救亡团的新会所在爱多亚路上，斜对面便是那所从前是大众娱乐场、现在成了难民收容所的高大建筑物“大世界”。“大世界”已经失掉昔日的光辉的装饰了，如今只剩下一副骷髅似的空架子。在它的前额上还保留着“八·一四”的大炸弹的伤痕。其实不仅在“大世界”，便是在这周围的建筑物的门面上，甚至在青年救亡团新会所的门前，人们都可以看出那两颗炸弹的烙印。店铺的招牌倾斜了，墙壁陷入或者破裂了，有一两家商店的屋檐下或者路中电杆上还挂着类似人皮的东西。还有几辆炸毁的老虎车和黄包车躺在路边。人们从法租界走到英租界，经过“大世界”门前，一眼就见到路中间的一个大坑，这是上海的土地受到的一个大伤。虽然捕房的人在这个大坑的四周竖起了木栏，但是行人经过那里，他们的眼光总要越过木栏在坑里停留一会儿。坑里有的只是泥和水。这泥和水就吞食了无数悲痛的故事。

然而不管这一切，在这附近有的还是活动与生命。这里还是一个行人拥挤的十字路口。

这一天是很好的晴天。蓝空高高地盖在这个大都市的上面，在那里浮着几片棉花似的白云。上午吹着凉爽的微风，

似乎要给人吹散胸中的闷气。但是从早晨起就响起了那种绞痛心人的飞机声。绘着侵略者的标记的飞机不断地在晴空涂下污点。

上午十点钟光景，文淑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她在木栏前站住了。她是从法租界来的，要到马路那一面的青年救亡团的会所去。这时人和车辆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同许多行人站在路旁，她的眼光却越过了马路飞到对面人行道上。那边便是青年救亡团的会所。那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旧址，没有木牌，也没有标记。别人看不出那个半新旧的建筑物便是一个救亡团体的活动的根据地，她却认识站在那所建筑物门前守卫的年轻学生。她看见一个年轻女学生推开建筑物的玻璃门进去了。她又看见那个守门的学生在和一个人讲话。她的眼光慢慢地往别处移动，忽然触到一个熟人的面孔了。她几乎要惊喜地叫出声来：“刘波。”她注意地看刘波，她发觉他在跟两个穿西服的中年人讲话：一个身材略微肥大，有着满脸的须根；另一个衣服整齐的人却是长脸无须的。他们不知道在谈论什么事情，不过样子很严肃。她的好奇心鼓舞着她，她的脚在地上微微跳动起来，她恨不得立刻跑过去拉住刘波，问明白那两个中年人是什么人，他跟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

路口忽然松动了。人象决了堤以后的水一样冲过对面去。文淑挤在人群中，紧张地到了对面人行道上。她宽慰地嘘了一口气。她看见那张长满须根的脸还在前面，脸上忽然露出微笑。她觉得这笑容有点可怕。她楞了一下。她奇怪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她继续朝那个方向走去。这时她

才注意到刘波往西走了。她还瞥见他的影子。她再用眼光去追他，但是她已经失掉了他的踪迹。另外的两个人却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低声讲话。不，他们也在移动脚步，他们也往西走，不过脚步下得慢。文淑怀着好奇心跟随着他们。她经过青年救亡团的会所，也并不推门进去。她听见有人在后面唤“文淑”，她知道这是周欣的声音。她并不答应，却加快步子往前走，她追过那两个人，她听见了他们的话。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她便走下人行道，掉转身站住了。她带着顽皮的微笑看那两个人。从那张无须的长脸上射过来威严的眼光。真象电光一闪，那张面孔马上又掉开了。接着布满须根的圆脸也掉转来，两只锐利的眼睛探索似地望了望文淑。于是什么也没有了。那两个人加快脚步急急地走了。

文淑无法追上去。她失望地望着前面那些似熟识似陌生的背影。她把右手第二根指头放进嘴里含着。她还没有决定应该怎样做。周欣的声音意外地把她从茫然中唤醒了。她看见周欣在对她笑。周欣抱怨地说：“怎么喊你你不答应？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在发神经病？”周欣对她做了一个可笑的怪脸。

文淑噗嗤笑了。她走上人行道，一面说：“我刚才看见一个熟人，我追他没有追上。”

“你为什么不到团里去？”周欣又问。

“我本来就是到团里来的，”文淑答道。

“那么我请你到对面冠生园去喝可口可乐，”周欣含笑说。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现在应该去做事情，”文淑疑惑

地说。

“哪个跟你开玩笑！喝了可口可乐，我们一道去办事。你怕不怕到巡捕房里去？”周欣说着，又对文淑霎霎眼睛。

“我晓得是为了《战鼓》的事情。不是说好李南星去吗？”文淑接口说。

“李南星有别的事情。曾明远要我去。我也想，女孩子去，或者更好讲话，”周欣颇为得意地答道。

“好，我陪你去，不过你先答应请我喝两瓶可口可乐，”文淑满意地说。

“两瓶算什么！你要喝十瓶都行，”周欣笑道；“喝够了，我们就去四马路中央捕房，”她拉着文淑的手走下人行道，往对面去了。

在冠生园支店里，两个人喝了五瓶可口可乐，觉得肚子有点胀了，才边说边笑地走出来。她们看见转弯处站着一大群人，都抬起头，或者伸起手指着天空讲话。她们就站在冠生园门前也举起头望高爽的蓝空。三只轰炸机在东北面飞翔，似乎在寻找目标。那种熟习的蜂蝇叫似的机声又开始来折磨她们的脑筋。

“这些魔鬼！”文淑骂起来。炸弹爆炸声在绞她的心。

“快走罢。这些东西有什么看头！看了更叫人生气。你听，又在丢炸弹了，”周欣愤愤地说。她挽着文淑的膀子走到无轨电车停车的地方。

十七路无轨电车正要开驶了，她们连忙挤上车去。小小的车厢里全是人。人们还在谈论战事，发表了种种的意见。车

里闷热，文淑的鼻子上沁出了汗，周欣觉得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幸而过了两站便有人下车，以后每站都有人下去。车厢里稍微松动一点。于是电车在中华书局门前停了。她们连忙跳下车，半走半跑地到了中央捕房。

从一道小门进去，她们站在电梯前面。没有人。过了一分钟，电梯便落下来，门开了，从电梯中走出来两个高大的华捕。他们诧异地看了她们一眼。文淑侧头对周欣微笑，周欣回答她一个怪脸，便拉着她的手走进了电梯，对开电梯的人说：“六楼。”

电梯往上升到三楼，便停住，门打开，一个西洋人手里拿着一束文件走进来。那个西洋人好奇地看了她们一眼。电梯又在五楼停住，把那个西洋人送走了。然后开电梯的人报告：“六楼到了。”

走出了电梯，这两个女孩子象乡下人似地站在走廊上东张西望，不知道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文淑几乎要笑了。周欣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纸片来看。一个中国巡捕向着她们走来，问她们来找谁。周欣便把纸片交给他，纸片上写着六百零六号房间和负责调查刊物的职员的名字。

那个巡捕把她们带到六百零六号房门口，嘱咐她们就在那里等候，他便走进里面去了。他很快地又走了出来。她们还站在门前，听见从各个房间里送出来的没有停止过的打字机声，她们看见一个穿西服的中国人从这个房间出来，拿着几张文件往对面一个房间去了。他没有穿上衣，在他的屁股后面，皮带旁边插着一支手枪。文淑好奇地指着手枪，对周欣微

微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的中国人在她们眼前出现了。他穿着一件灰呢长袍，脚上穿的也不是皮鞋，他走出来，并没有多大的响声。他的脸上露出带世故的微笑，他用惊奇的眼光把她们打量了一下，似乎奇怪来的会是两个这样年轻的女子。他看见周欣要开口，便做个手势对她们说：“你们请进来罢。”

周欣和文淑跟着他走进房间。里面有好几张办公桌和好几个人。这位老先生的办公桌就在离房门不远的地方，是一张条桌。桌上放了几份新出的抗战刊物，她们的《战鼓》也在里面。老先生在椅子上坐了，叫她们站在对面，他一面翻着《战鼓》，一面向周欣问起刊物的编辑人和发行人的履历以及刊物经费的来源。他的态度很温和，脸上永远带着老年人常有的微笑。因此周欣也就没有拘束地随意答应。她说的大半是假话，不过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假话，倒使那位老先生觉得惭愧了。他在劝告她们“以后发表文章要谨慎一点”之后，还解释说：“我不是在干涉你们，我是在保护你们。”于是他进入正题，拿出一张登记表来，要她们拿回去填好送来。

“这应该怎样填？我们没有填过。我们不会填！”周欣不大高兴，便照她平日讲话的口气拒绝道。

“这是新的办法。不填不行。外国人吩咐要办好的，”老先生认真地说，脸上的笑容淡了一点。但是他看见她们不作声，也不拿登记表，便又温和地对她们解释登记表应该怎样填写。他还允许她们：“登记证很快地就会发下来，并没有别的

手续。”他又提醒她们：“没有登记的刊物就不许在租界卖。”他更警告她们：“我们怕东洋人会来打麻烦，才用这个办法。”

周欣还想说话，文淑却不耐烦地在旁边触她的膀子，低声向她说：“我们走罢。”周欣迟疑一下，才拿起那张登记表。那位老先生连忙带笑地说：“你填好，仍旧送到此地来，六百零六号房间。”周欣答应一声，对他点一下头，便挽着文淑的膀子出来了。

电梯把她们载到楼下。她们走出大门，文淑忽然伸出舌头，望着周欣笑了笑，说：“我也进过巡捕房了。”

“这算什么？又不是捉你进去的。你一句话也不讲，”周欣哂笑道。

“我看见你跟那个人讲话，我只想笑。他那个样子真滑稽，”文淑一边笑，一边说。

“真是小孩子，”周欣带笑责备道；“不是你催我走，我还不走。这张东西拿着真讨厌，我倒想撕掉它，”她说着便做出要撕碎登记表的样子。

“你不要撕。他不是说过，不登记就不许卖吗？”文淑连忙捏住周欣的手腕阻止道。

“我晓得。他们已经到代售的书店去讲过一次了，”周欣收敛了笑容皱起眉头答道。她慢慢地把登记表折好。以后她又烦躁地说：“你不要相信他的话。明明是他们看见我们军队有点支持不住了，自己在打算等我们军队一撤退，就动手来压制抗日运动。”

“那么，到了那时候，我们怎么办？”文淑焦急地问道。

“怎么办？哪个怕他们！”周欣依旧烦躁地说：“其实我在上海也住厌了。我只等曾明远的战地工作团出发，我就跟着工作团到前线去。总要比在这里痛快些！”

文淑听见这两句话马上兴奋起来，她的焦虑消失了，她怀着希望地说：“曾明远的战地工作团好象快要成功了。”

“我今早晨听见他说，已经接洽好了。现在正在筹备出发的事情，”周欣接着说。

“好，我们马上去找他！我要参加，我要到前线去，我什么苦都可以吃！快，我们快去！”文淑差不多高兴得要跳起来，她大声说。

“不要叫，别人听见，会当你发神经病的，”周欣笑了起来，把文淑的膀子拧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反正少不了你。”

“不着急？倘使曾明远把我忘记了，等我去报名，名额已经满了，那又怎么办？我看见你们都走了，自己留在这个鬼地方走不动，那才急人！”文淑说着真的着急起来了。她恨不得马上找着曾明远，把事情说定。但是无轨电车老不见来，她们已经在五洲大药房门前站了好些时候了。

“你放心，我已经替你报过名了，”周欣带笑地安慰文淑道，“我不会忘记你。我要去，一定会拉你去。少了，你我们两个都不开心。”

“真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象亲姊妹一样。我没有姐姐，我就叫你做姐姐罢，”文淑满意地说。她看见一辆无轨电车正往这面开过来，连忙拉着周欣走下人行道，准备抢先挤上车去。

八

九点钟敲过不久，弄堂里就静得象一个劫后的荒村。一切的苦恼全被一张无形的大口吞下了。风带着低声的哭泣在空中盘旋，盘旋……

一个人的单调的脚步声在窄巷子里响起来，又静下去，但是过一会儿又响起了这同样的声音。

“鸣盛，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子成忽然放下书侧耳倾听，他吃惊地对鸣盛说。

躺在床上的鸣盛站起来，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看子成，安慰道：“没有什么，只是一个过路人。你早点睡罢，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

“不对，让我去看看，”子成焦躁地摇头说。他便走到窗前去，去看下面窄巷里的情形。地是湿的，雨水映着路灯光在发亮。一个黑影晃过去，等到他注目去看，人影已经转了弯不见了。

“不对，我说今天晚上不对，他们会来的，”子成掉转身子苦恼地自语道，他的脸上一刹那间就布满了黑云。

“子成，你今天晚上太激动了，不要老是去想那些事情。我们刚刚搬了家，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来的，”鸣盛温和地劝慰道。“而且即使他们来也不要紧，我们这里已经弄干净了。”他

又在床沿上坐下来。

子成失常地笑了笑，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答道：“我还留着一支枪在这里，我准备好等他们来的时候用。”他说这几句话似乎很费力。他咬了咬嘴唇，埋下头不作声了。

鸣盛用惊疑的眼光看了看子成，起初似乎不大相信子成的话，但以后也就明白了。子成近来逐渐增加的烦躁，他也看得清楚。这个朋友不爱多说话，却喜欢把一切都包藏在心里。虽然年轻的脸上还照常带笑，但是吞在肚里的痛苦和烦恼有时也从子成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流露出来。子成夜里睡得很迟，常常用沉默的工作摧残自己。这个年轻人很少发过什么怨言。然而如今忍耐的限度终于打破了。那未来的爆发倒有点叫鸣盛耽心。鸣盛觉得心里象被什么虫咬着似地痛了一下。他连忙摇摇头说：“他们不会来得这样快，现在还用不着你那件东西！”他又问：“你什么时候向朴元要来的？其实还是给他们好。”

子成固执地短短答道：“我更用得着。”他在方桌前站了一会儿，后来又去窗前去。鸣盛抱膝坐在床沿上，默默地望着子成的举动。他因为找不到可以说服子成的话而气恼。房里没有声音，窗外也没有声音。这静寂压得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子成忽然用低沉的声音说：“他们来了，我们给围住了。”

“真的！几个人？”鸣盛跳起来，吃惊地问道。子成好象没有听见鸣盛的话似的，依旧站在窗前，看外面。但是他的眼光并不向下，却停留在墙壁上，除了墙他看不见别的东西。然而土红色的砖墙上现出了人和动作。

鸣盛跑到窗前去，下面依旧是静静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紧张的心松弛了。但是另一种使人不愉快的感觉抓住了他。他把手压在子成的肩上，关心地问道：“子成，你今天晚上究竟怎样了？为什么老是说这种奇怪的话？”

在子成的眼前现出了一些黑影，他们聚在窗下后门口，他们开始打门，后门开了，他们一拥而入，现在走在楼梯上……他聚精会神地望着。——但是鸣盛把他突然唤醒了。他惊愕地掉过头去看：鸣盛的诚恳的面容给他掩盖了一切。他放心地嘘了一口气，自语般地低声说：“这不过是幻想。”

鸣盛的肥大的手友爱地抚着子成的肩头，他安慰地说：“你这几天也太累了。你应该找个地方休息。”

“休息？”子成责备似地说，那短时间的安慰马上消失了。“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休息？也许明天我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明天他们就会来的。”

“你不要再说这种扫兴话。明天也许我们就得到自由了，”鸣盛哂笑道。

“自由？”子成神气沮丧地说：“你还在想自由？他们随时都会来，把我们带到更不自由的地方去。我们就只知道躲避，永远躲避……但是他们仍旧是要来的。你还在梦想自由？”

“然而自由一定会来的，”鸣盛起劲地反驳道，“这一次是总结算，我们多年来受的苦这一次就会完全消失。那时候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去了。”

子成的脸上闪起一股亮光，但马上又消失了，代替它的是痛苦的哂笑。“你倒想得这么好。难道他们不会在这一切还

没有到来之前把我们捉去吗？”

“要捉就让他们捉去好了。这又有什么可怕！……”鸣盛气恼地说。

轰隆！轰隆！……大炮声突然响了，就象要把静夜的天空冲破似的，连这个小房间仿佛也被它震动了。两个人闭了嘴默默地对望着。炮声继续响了一阵。后来鸣盛鼓起勇气开口了：

“你听，这不是帝国主义的丧钟？它在报告：我们的自由就要来了。”

“你还说什么自由？照这两天的战况看来，恐怕连上海也会给敌人占去，”子成烦恼地打岔道。

“我不相信中国军队就会退得这么快，”鸣盛怀着信心地说。“他们打了两个多月，打得那么好！决不会退得这么快。”

“可是全拿血肉跟炸弹大炮拚，这是不行的。这简直是屠杀！”子成焦躁不安地说。

“但是人的血肉毕竟跟炸弹大炮拚了这两个多月了，”鸣盛理直气壮般地说，他又加重语气地添一句：“而且我相信以后还会拚下去的……”

“你是个乐观派，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子成苦恼地打断了鸣盛的话。“我们天天等待，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总是做写钢笔板的事，这种小小的工作，小小的刊物有什么用？别的人都是拿血肉在拚。”

“你不能这么说。难道我们就不是拿血肉来拚吗？你算算看，这些年我们究竟牺牲了多少人……”鸣盛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子成打断了。子成听见一声轻微的口哨。声音十分熟悉，他知道是从谁的口里发出来的，连忙阻止鸣盛道：“不要响。你听，老九的信号！”

鸣盛静下来。哨声又响起来了，接连地响了三下。鸣盛说：“我去开门！”就走出了房间。

不久鸣盛引了一个三十岁光景的西装男子进来。那个人一进屋，气急败坏地说：“事情很不好，这两天战局有大变化。大场已经给敌人占去了。中国军队马上就会撤退。”

“朴元、永言他们怎么说？”鸣盛变了脸色，张皇地问了一句。

“朴元搭车到南京去了。他本来打算明天走，可是事情太紧急了，他临时决定提前走，”老九答道。

子成咬紧牙齿不作声，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心事。鸣盛还关心地不断发问：“你这些消息从哪里来的？的确可靠吗？”

“我今天去过虹口，”老九简短地说。子成沉着脸，用力咬嘴唇，他差一点把嘴唇皮咬破了。老九前额上那三四道犁痕似的皱纹横在一对奕奕有神的眼睛上面，黑瘦的面颊配着炯炯的目光显得更黑瘦了。

“在那边他们自然非常满意，他们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他们相信这就是胜利，”老九带着愤怒接下去说。他的面部搐动一下，露出了残酷的狞笑。然后他突然改换了语调，用斩钉截铁般的声音短短地添上一句：“其实他们在做梦。”

“不知道这个失败会不会影响到抗战的前途，”这些时候都不作声的子成忽然耽心地小声说。

“不会的，不会的！”鸣盛辩驳似地答道。

“今天我碰见了那个东西，”老九不谈这个话题，却报告另一件事情。“他倒不认识我。可惜他跟一群敌人混在一起，我不好下手。”老九有点懊恼，但是以后他又高兴了。“不过我知道他常常秘密地到租界上来。我知道他喜欢去哪一类地方。我总有机会干掉他。”

“那是永言的事情，”鸣盛接着说了一句，他相信永言一定成功。

老九带着自信地微微笑了，他说：“永言能够干掉他最好。不过那个东西太狡猾，应该多方面对付他才行。”他忽然抬起头望着子成：“子成，把你那个家伙给我。”

这句话是子成料不到的，因此子成起初不明白它的意义。他楞了一下回答不出来。但是老九的炯炯目光射进他眼里的时候，他便惊醒似地摇头说：“不，我要留着用。”

老九站起来，伸出手命令似地要求道：“给我，你现在用不着它。”

老九的意外的要求倒使鸣盛感到满意了。他知道先前他不能完成的使命，现在却能够由老九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便插嘴对老九说：“他说他们就会来，所以他留着这个家伙对付他们。”鸣盛仿佛只是公平地叙述事实，不加一点私见。其实并不是。

“这太过虑了。现在他们哪儿敢做这种事情？”老九哂笑起来，接着坚决地再向子成要求一次。子成也不说什么话，就走去从床下一口小皮箱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包，毅然递到老

九的手中，一面说：“你拿去罢。”老九把那个东西接过来，放在西装上衣的外面口袋里，左手也就插进那个口袋中去捏住它。他走到子成身边，拍了拍子成的肩膀，同情地安慰道：“你不要难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对于自己太苛刻，也是不好的。”子成埋着头不作声。老九走开一步，但又回转来说：“我差点忘记了。永言约你明天上午十点钟到国泰大戏院后面老地方，第五根电线杆下面见面。他要把这期刊物的稿子交给你。”子成答应了一个“是”字。等到老九往门口走去的时候，子成忽然郑重地在后面嘱咐了一句：“你路上要当心一点。”

老九没有说别的话，他和鸣盛一道出了房门，走下楼梯去了。

第二天早晨，子成到国泰大戏院后面蒲石路去，他站在那根指定的电杆下面。他经过国泰大戏院的门前，看影戏院里的挂钟，知道已经是十点零五分。但是永言还没有来。永言这个人从来不失约。这次可能有什么临时发生的事情绊住了永言。然而他想不到这究竟是什么事情。他站在那里把买来的一份《申报》打开。他先前已经读过标题，知道中国军队从大场撤退了。老九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报上尽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记载。他读了三四段，便不想再读下去。他折起报还不见永言的影子。他向街中一看，忽然注意到今天街上显得特别拥挤，每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都带着仓皇或者激动的神情匆匆地走过。黄包车载着人和行李拚命在人海中找路，接连不断地牵成了一根线，车夫吆喝着，车子碰撞着，网篮，箱

笼，盒子在车上摇荡。年轻的报贩挥动着小幅的报纸高声叫喊，一面用跑步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忽然人们无缘无故地惊扰起来。几个衣服简单的中年妇人提着布包喘着气动着小脚往前面直冲。没有飞机声，枪炮也不响了。天空是灰白色的。

“完了，七十四天的功夫，真想不到！”两个穿绿色制服的邮差边走边谈论，从右面一个人的嘴里吐出来这句绝望的话。

“我有个朋友还不肯相信，后来我带他去看，北站大厦屋顶上已经插了太阳旗。还有什么话好说？”另一个带着悲愤地回答。他摇摇头又说：“真作孽呀！到处都是黑烟，今天的火一定不小。”

子成把一切的感情全压住，侧耳去抓那些宝贵的话。他甚至跟着他们走了三四步。但是那两个人却闭上嘴不再响了。他张皇地回到那根电杆旁边。意外地他的左膀被一只有力的手腕捉住了。一个熟习的声音迎面扑来：“你到哪里去？”

子成吃惊地抬头一看，见是永言，便放了心，却问道：“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迟？还是你自己约定的十点钟。”

十月尾的天气已经够凉爽了，但是永言的额上却积着不少的汗珠。他的脸发红，显然是从远处匆忙地赶来的。他伸手在他那未被帽子盖住的前额上拭了一下，声音略带颤动地说：“事情有了大变化。日本旗已经插遍闸北了。我倒想不到这样快。”

“我们走着谈罢，”子成提议道。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仿佛血也在血管里沸腾起来，似乎有一种力量在他的身体内搅动

着。他希望来一个爆发，即使这爆发会使他自己粉碎，他也情愿。

永言跟着子成往迈尔西爱路走去。他一面讲话，一面留心看四周的行人。这条马路上行人不多，没有人来妨碍他们谈话。

“你看将来怎样？”子成发出了这样的问话。

“战局的变化很难说，”永言沉吟地答道。“中国军队现在都往沪西退，中山路的桥已经炸断了。看来是准备守的。不过能守多久还难说。日本得到的也只是暂时的胜利，”他说到这里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小心地轻声说：“不管怎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更困难了，因为我们已经在敌人的包围中了。”

子成点一下头。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话，这时转过了国泰大戏院往霞飞路走去。

“鸣盛呢？”永言问道。

“他在家，”子成短短地答道，他似乎在想另外一些事情。

“我们今天下午七点钟在你家里开会，”永言又说。

“老九怎么没有告诉我？”开会的提议使子成的激动的心感到满足，他惊奇地问道。

“早晨才决定的。我现在找光韩去，”永言这样解释了以后，便把手里捏的一束纸交给子成说：“这期稿子交给你。你快去抄写罢。我们以后更需要它了。”

“好，”子成用力说出了这个字，毫不迟疑地接过那束稿子来。

九

天阴着，人的心上也布满了暗云。火焰在天空中画出了浓黑的山影。山形变化着，山形扩大着。北边的一角被笼罩在烟雾里。天显得低了，空气变得很窒息，似乎天就要坠下来，压在人的头上。夜还没有来，但是夜色已经覆盖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衣服破槛的小孩和成人挟着晚报激动地嚷着跑过马路。人抢着买报纸，拿在手里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摇头叹气。人拥挤着，人张皇地走路，人在街头徬徨，人失常地发出各种声音。汽车，电车，黄包车，被阻塞在宽大的红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华捕得到外国巡捕的帮助正在努力肃清道路，他挥着手，吹着哨子，忙着开关红绿灯。但是往北去的人潮也似地从法租界那面涌过来，他刚刚送走了一批，另一批又拥挤在十字路口。只等着哨子一叫，那一群人就象水一般地向前流了过去。脚步声和话语声就象击岸的怒涛，直往发出浓烟的地方冲去。

人流挟着不可抵抗的力量往火灾场冲去，但是在一个桥畔被拦住了。可是它不肯往后退，就停留在那附近。人们远远地观看隔岸的景物。越过铁丝网是静寂的楼房和荒凉的市街，在重叠的楼房后面，从高低不一的屋顶下冒出大股黑烟，

象旋风似地伸向天空去。烟越来越浓，几股烟互相接近，很快地就卷在一起成了一大股。下面露出红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推动着黑烟，使它增加速度再往剩余的灰白天空中扩张势力。

稀落的枪声响起来，又静下去，它们在人的心上添了憎恨和悲愤。每一个人站在河这边望着对岸的火光，心里想：在那边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还有多少我们的房屋？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叹息地摇着头，他们以为：这是劫数，逃不掉的劫数。年轻的人咬着嘴唇，捏紧拳头，眼睛发红，暗暗地在咒骂：烧罢，我们的一切损失都会向你们找到补偿的。

刘波含着一腔的怒气掉转了身子。他不能够往对岸多看一眼，单是一小股火头也会使他的身子战栗，使他的血沸腾。他不相信这眼前的一切全是真实，他不相信暴行会战胜正义。但是火焰掩蔽了他的信念。黑焰在他的眼前扩大了。在黑焰中站起来成人和小孩，男男女女，仰着头，流着泪，从那些因痛苦而扭曲的口中仿佛流出来继续不断的呼吁和哭诉：“我的家……我的亲人……”他们也是同样的人啊！起先是那些不幸的同胞，以后应该他罢，他也是这个受难的民族的一份子，他也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这时他仿佛听见了侵略者的得意的笑声，仿佛看见了那些带色情狂的狞笑，许多暴行的故事立刻浮上了他的脑际，他在跟它们挣扎，他只顾埋下头走着，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他忘记了他身边还有一个友人。

“这样的火，我们那边也有过的！”鸣盛自语似地说了这一句。

“让它烧罢，中国人是烧不尽的，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

的！”刘波忽然抬起头愤慨地说。

“对，这不过是个开始，还谈不到胜败，”鸣盛用坚决的调子答道。以后他换过语调焦虑地说：“但是子成近来很烦躁，他也太累了，应该换个地方休息才好。”

“我看不要紧，在这种时候谁都很烦躁，”刘波还是在想自己的事，顺口回答鸣盛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鸣盛着急地说：“我们这种人的生活，今天顾不到明天。激情常常会毁坏人的判断力……。”

“当心点！”一个轻微的声音飘到耳边，一只手拍着鸣盛的肩头，老九的带着严肃表情的脸摆在鸣盛的右边。老九用另一种语言说了几句话。鸣盛也用另一种语言回答。刘波只能够了解他们两人的表情。他注意地轮流看这两张面孔。但是一个清脆的女孩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带走了。有人在唤“刘波”。

刘波知道是文淑在唤他。他看前面：文淑和素贞两个人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被一个车夫拉了过来。

“你等等我，”斜坐在素贞身上的文淑一边对刘波讲话，一边吩咐车夫停车。

“你也来了，”刘波象在异乡遇到一位亲人似地惊喜道，便迎上去。

“你看那边火多大！真把我气死了！”文淑下了车，站在刘波面前气恼不堪地说，脸红着，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刘波，忽然从眼角绽出了两滴泪珠。

“文淑，不要怕。你还记得火中的凤凰吗？它们从火中得

到新生。我们也应该在火中受洗礼。这是我们的苦难……苦难可以锻炼我们……”刘波感动地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她道。

“谁要你说！难道这一套话人家不知道？”文淑撅起嘴发急地阻止道。

“让他说下去罢，人家好心地在安慰你，”素贞在旁边拉拉文淑的衣服，低声提醒她说。

文淑不作声了，她回头瞪了素贞一眼，素贞温和地微微一笑。

刘波正要说话，忽然文淑发出一声惊叫阻止了他。接着文淑的身子向前一扑，素贞也摇晃地往旁边退了两步。他连忙扶住文淑，一面惊愕地问：“什么事？什么事？”

文淑一边噓气一边弯下身子用手揉了揉右腿。两部黄包车莽撞地从她的身边过去了。

“伤了吗？痛不痛？”刘波关心地问道。素贞也过来亲热地挽住文淑的膀子发出同样意思的问话。

文淑站直了，默默地摇摇头。她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唤着刘波的名字，两个人向刘波扬手。

“我们先走了。不要忘记啊，”鸣盛还叮嘱了一句，就和老九一起挤进人群中去了。

刘波朝那个方向点点头。然后他掉头问文淑她们道：“现在到哪里去？”

文淑不回答这句问话，却另外问：“又是你那个朝鲜朋友吗？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我那天不是对你讲过？”

刘波怔了一下，后来解释地说：“他们忙得很，近来环境不

好。”

“我倒高兴认识他们，”文淑羡慕地说。

“那么我哪天给你介绍，”刘波接口说道。

“文淑，我们走罢，老是站在街上讲话有什么意思？当心又给人碰伤，”素贞在旁边暗暗地拉文淑的衣袖，低声催促道。

“好，我们走罢，你们往哪里去？”刘波看见了素贞的动作，知道她的心思，便又把先前不曾得到答复的问话重说一遍。他还问：“今天不去医院？”

“不去了，我们今天请了假，”素贞答道；她侧头对文淑说：“我们回去罢。”

“我们再往前走几步好不好？我要看看火，”文淑坚持地说。

天色暗起来，马路中间和两旁店铺的电灯发出微光，黑暗更往下坠，好象快要触到人的头上了。空气更显得窒闷。浓黑的烟在逐渐加深的阴暗的天幕上慢慢地变了颜色，黑烟融合在夜色里，新起来的红光烧燃了北方的天空。人们都往北走。许多人伸长了颈项抄着手站在河这一面，观看对岸那一片晚霞似的火光。老年人摇头呻吟道：“劫数啊，上海滩遭了大劫。”一条河隔出来两个世界。这里有的是欢乐和享受，有的是温暖和安宁。在那一边却只有残杀、毁灭和死亡。大火中仿佛传出来烧焦的肉臭和救命的呼号。其实并没有。这应该是心灵的感应。在那边落在敌人手里受残害的也是住在同一土地上、说着同一语言、遵守同一习惯的兄弟姐妹们啊，刘波的心跟随着那边兄弟们的心在受难了。

“不要去看了。我看见那边的火光就仿佛我自己的心在那里燃烧。烧掉的好象就是我自己的家，”刘波痛苦地说。

“你看那边火花又冒起来。素贞，你们的家不是在那边吗？那个水塔还看得很清楚。啊，那边一定是你们的房子！”文淑愤慨地对素贞惊叫道。

素贞微微一笑，显然是用笑容来掩饰她的不快，她做出平静的样子说：“烧不烧都是一样，横竖地方都给人占去了。不过我爹爹喜欢那些东西，‘八·一三’以来他差不多就没有开颜笑过。其实损失一点东西也算不得什么。人家连性命都牺牲了。”

“他们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另一样想法。我爹爹也是这样。他不过受到点生意上的损失，就好象碰到了天大的灾祸，整天板起面孔寻人生气。问他要钱买点东西，刚刚开口，他就骂我用钱不知道节省，说什么不久就要讨饭，真是叫人家生气！”文淑说着自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她不等别人接口，自己又说：“我们还是朝前面走罢，我要看看火。”她拉着素贞就走，要刘波也跟着她们去。

眼前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无数的背影跟着嘈杂声在前面晃动，一层杏红色光亮罩在黑影上，土地也被火光烤红了，在北方的天空中火光连成了一片，不停地在天空涂抹血迹。火光在晃动，在一两个地方还撒起点点的火星，火星升起来又落下去，然后再爆发似地往四处散去。

文淑不顾阻碍地往前面直冲，把刘波和素贞留在后面。刘波正在回答素贞的一句问话，一转瞬间不见了文淑，便和素贞

赶上去找她。但是文淑被挤到人丛中去了。他们看见前面隔三四个人有一个童化头发的少女，很象文淑，便朝那个地方挤去。刘波用力把一个中年人推开，从那个人身边钻过去，叫了声“文淑”。文淑回过头来看他。但是从侧面来了一股力量，使刘波站立不住，身子一晃，往后面退了两步。素贞在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呼一声：“刘先生。”刘波站定后连忙回头看素贞，迎着那关切的眼光回答道：“朱小姐，文淑在前面。”他刚刚把话说完，前面忽然起了一阵喧闹，人们开始退下来。人在推他们，口里嚷着“快走，走！”人们象一堵墙倒塌似地散下来了。刘波和素贞被人推动着跑了半条街。连比较镇静的素贞也吓得变了脸色，她挽住刘波的膀子不肯放，等到人们停住了脚步，她才将手缩回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没有动静。刘波向人问：“有什么事情？”人回答说：“不知道。”退后的人又转身挤上去。素贞着急来问道：“文淑呢？”她想起文淑还在那边，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去找她，”刘波也有点发急地说，又陪着素贞往前走。退散的人又聚拢起来，仍是那么一大堆，他们无法挤过去，只听见好些声音在叫：“打！”

“大概是打汉奸罢，”刘波顺口说。但是他仍旧不能够挤到前面去看个明白。文淑一定在人丛中，然而他的眼睛找不到她的影子，素贞不断地问：“看见她吗？”他却无法回答。

“让开！走开！走！”两个华捕陪着一个西捕昂着头走过来，华捕用短棒在驱逐站着不动的人，他们叱骂着：“走开，有什么好看的！”

在一阵骚动之后人们散开来，让出了一条路。但是巡捕刚刚走过，他们又聚拢，甚至把巡捕也包围在里面。刘波因为陪着素贞，无法挤进去，他仍然看不见什么。找不到文淑，他又不便走开。包围圈里面起了一阵吵闹，人又散开来，一个华捕挥舞着短棒威胁行人，另一个华捕拖着一个满面流血的身材短小的男子从人丛中走出。那个人埋着头一路上吐着大口的血，一件灰色罩衫被扯破了好几处。聚在街旁的人纷纷地议论着，忽然又有人扬起声音嚷出“打”字。走在后面的高大的西捕忽然叱骂了一声，举起手枪好象要对着什么人开枪似的。人声静下去了。刘波憎厌地掉开头，他看见素贞紧紧地挨在他的身边，脸上带着畏惧和愤慨的表情。她霎动眼睛胆怯地望他两眼，忽然小女孩似地嘟起嘴说：“怎么看不见文淑？她跑到哪里去了？”

“等等她就会来的，”刘波低声安慰她道，但是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焦急的表情。

人们跟着巡捕冲过去。刘波和素贞站在街旁用眼光去找寻。他们看见的全是陌生的人脸，那些脸在漫天的杏红色光辉下都显得严肃，悒郁，痛苦。人们泄愤般地嚷着，议论着。仍然看不见文淑的踪迹，好象大地张开口把那个活泼的女孩子吞食了一般。刘波和素贞的惊虑增大了。

“我们到前面去看，”刘波说；他还未动步，忽然看见文淑带着叫唤扑了过来，他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你们原来在这里，累得我到处找你们，”文淑喘吁吁地说。

“我们还不是到处找你都找不到!”素贞放心地接口道。

“我去看打汉奸，头都打破了!”文淑得意地说。

“我们现在找个地方吃饭，好不好?”刘波提议道。

“不，我还要回家，我等一会儿要到周欣那里去，”文淑连忙摇头道。“现在时候不早了，我先坐车走。刘波，你送素贞回家罢。”

素贞不拒绝，刘波也没有话说了。他帮文淑雇了一辆黄包车。文淑坐上车子，忽然说：“我过两天早晨到你家里去，”她不等刘波答话，便让车夫把她拖走了。刘波陪着素贞慢慢地往南走去。

他们都不想开口，两个人身子挨得近，却仿佛有什么东西隔在他们的中间。眼前是淡淡的杏红光，和罩着红光的黑影。然而他们是往更多灯光的地方走去的，于是黑影和红光都在强烈的电灯和霓虹灯的亮光下消失了。电车声掩盖了人们心上的哀诉和呼吁。汽车的喇叭点缀了繁华的市街。马路两旁商店的华丽橱窗里灯烛辉煌。他们似乎回到和平的时代了。但眼前的景象也只是个表面。惊惶、悲痛的空气甚至在这个地方也重重地压住每个人的心，窒息了每个人的呼吸。在人行道上听见的只是严肃的话声，欢笑似乎逃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在这一天全上海人的记忆中就失去了“欢笑”的名词。他们知道只有在另一个角落里，在火与血、野蛮与疯狂所统治的那个角落里另外一种人在欢笑，在庆祝地安排血宴。然而他们是没有权利欢笑的。这个思想刺痛了两颗年轻的心。两个人都想着：我们有什么罪过呢？在绝望之外又加上了悲愤。

一个民族的悲哀的担子沉重地压在年轻的肩膀上。

无线电收音机不再播送欢乐的音乐和柔靡的爱情歌曲；一个沉重的声音借着它们响遍了整个城市，报告阵地的转移：“……自动撤退……中山路桥……梵王渡……龙华……。”

只有断续的字句进入刘波和素贞的耳朵，他们看见一堆一群的市民立在一些商店的门前静静地倾听播音。那里有的是严肃、沉默和同样表情的面孔。然而他们不得不撇开人群，转弯往比较清静的横街去了。

素贞想：也许是在做梦罢，昨天报上还登着很好的消息。但是刘波却意外地出声了，他安慰她道：“不要灰心，这不过是战争的开始。我们争取的是最后胜利。我相信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可以说是他挣扎的结果。他用这个来鼓励她，也鼓励自己。

这只是几句空泛的话。但是它们把素贞从疑虑中唤醒了。男性的有力的声音给她带来一点温暖。她抬起头望了刘波一眼。他那昂着头、眼睛冒火不知道屈服的样子使她感动。她信任地、温顺地说：“是的，我知道。”

后来他们走近了素贞的家。路上灯光昏暗，只有三五个行人。虽然入夜未久，却好象逼近了中夜。街树上残留的树叶随着风发出叹息般的声音，一棵树象一个黑影，低头缩颈地立在路旁，这里好象是一个被人忘却的角落。在这里没有喧哗，没有火焰，也没有斗争。但是斗争之火在两个年轻的身体内燃烧了。年轻的心是不容易被征服的。从前埋在一颗少女的心里的幼苗如今发芽了，素贞记起那件事情，她恳切地但有

点胆怯地问道：“刘先生，我可以参加你们的团体吗？”

“我没有团体，你可以找文淑介绍你加入曾明远他们的青救，”刘波坦白地答道。

素贞停了一下，鼓起勇气说：“你不要骗我，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团体在做抗敌的工作。我要参加你们的团体，我愿意帮忙你们做点事情。”

“哦，我知道了，这并不是我们的团体，”刘波以为她指的是永言他们的团体，便向她解释道：“老实说连我自己也没有参加，我不过帮点忙罢了。那个团体对你对我都不大适当。其实你们在医院里不是做得很好吗？”

“不，”素贞略略皱起眉毛答道。“在那里也有些麻烦。医院里也有些我看不惯的事情，听说医院不久要搬到别处去或者要改组。今天那边也很恐慌，我们去了一下就告假出来了。我只想做点有用的事情，我想我也能够吃苦。刘先生，你给我介绍一个工作罢。让我跟着你们学学做点事。”

这诚恳的自白打动了刘波的心，热诚唤起了热诚，刘波象看见一线亮光似地觉得眼前发亮了。斗争的火在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他感动地甚至有点慌张地答道：

“我一定给你想办法。我看是不成问题的。过几天就给你答复。”

他终于透露了一点消息。他说有把握，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刚刚成立的青年团体，而且他今晚要去参加这个团体的会议。

素贞还想说什么话，可是她已经到了弄堂口，那里进出的

人不少，她不愿意让认识的人看见她和刘波在一起谈话，她决定把一切全留给以后会面的机会。她忽然开颜微微一笑，说声“谢谢你”，再点一个头，然后慢慢地走进那个窄巷似的弄堂里去。

十

会议刚刚结束，人们站起来预备走了。严肃的空气突然被一个人的笑声打破，老九得意地说：“明天那个东西再不能够狂吠了。这个庆祝的礼物是最好不过的。”

众人满足似地齐声笑起来。光韩已经走出门外了，还回过头警告般地嘱咐一句，“无论如何要当心，不要太乐观了。”

“不要说这种话，他明天一定逃不过这个关头，”老九充满自信地答道。

子成立在角落里不作声，他沉着脸，眼光向各处扫射，他留恋地看看房里的人和物，他想自己明天也许要跟这一切分别了，明天他便会睡在另一个地方。再要象从前那样在这里安静地做着油印工作，在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了。他和那个“败类”不能够存在同一个世界上。那是罪恶的代表，他必须将“它”摧毁。他摧毁一个人就象摧毁一个制度。他必须将拳头打下去，毁灭罪恶，牺牲自己。只有这唯一的办法能够洗去许多痛苦的回忆，勾消一切过去的旧帐。他对于这个决定再没有一点疑惑。一张女性的憔悴的面庞含泪地在他的眼前一闪，从可爱的口里唱出《阿里朗》的歌曲：

阿里朗，阿里朗，
越过阿里朗山岭去了。
门前的沃土给谁拿去了呢？
寄身在满洲地方又是为着什么缘故呢？
阿里朗，阿里朗……①

他突然一怔，象从梦中醒过来似地凝神朝四处一望。一阵淡烟滚过他的眼前。依旧是黯淡灯光下的凌乱的房间。永言走过来问道：“子成，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想，我没有想，”子成简单地答道。

永言亲切地在他的肩上一拍，说：“我走了。明天早晨再来。明天的事情全靠你们两个。”永言停了停又说：“刘波来时你告诉他我有事先走了。”

“好，好，”子成接连地答应着。

老九走在最后，他走下两级楼梯又回来对房里的鸣盛和子成说：“我等一下还要来。”

二十分钟以后，老九果然又在外边敲门。他拿了两瓶黄酒、两包油炸花生米和一包豆腐干走进来。黑瘦的脸上露出了求宽恕的微笑，他道歉地说：“对不起，我又要喝酒了。今天晚上实在忍不住，”他把东西全放在桌上。

“为什么？今天晚上要喝酒？”鸣盛惊奇地问道。

“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老九很自然地说了出来，接着又对

① 译意，这是朝鲜著名的民歌。

他们微微一笑。

“不，不是你，”子成象受了针刺似地突然惊叫起来。

“老弟，安静点，你不要这样兴奋，”老九象长兄一样温和地安慰子成道。“这是我的专长。我已经干过好几次了。你还是喝点酒罢。”老九拔起瓶塞，拿了三个茶杯，把杯里残余的茶汁倾在地板上，满满地斟了三杯酒，粗声说：“我们三个人痛快地喝光这两瓶酒。”他自己先举杯喝了一大口。

子成默默地走到桌子前，举杯便饮。鸣盛知道子成平日不喝酒，这时不觉惊愕地看了子成一眼，他自己把杯子送回到老九面前说：“我不会喝酒。”

“今天情形不同，你怎么学起女孩子来了？你看子成平日也不喝酒啊，”老九责备地说。

“我觉得还是不喝好，”鸣盛固执地答道。子成仍然不响，他一面嚼花生米和豆腐干，一面大口喝酒。他的脸上泛起了红色。

“你太拘谨了，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沉醉。今天晚上我要痛快地喝一下。”老九对鸣盛说了，又举起酒杯对子成说：“子成，我们干了这半杯罢。”他把杯子和子成手里的碰了一下，一口气将酒喝光了。

子成默默地喝光杯里的余酒，自己又拿起酒瓶斟了一个满杯。他的脸发火似地红起来，连耳根也红了。

“子成，你少喝点。你脸上红得这样厉害，”鸣盛关心地劝阻道。

子成摇摇头，用嘶哑的声音答道：“我不会醉。”他的嘴又

闭上了。

鸣盛不以为然地瞅了子成一眼，也就不再说话，焦虑地坐在那里，拿起一块豆腐干慢慢地嚼着。

老九又喝光了一杯酒，满意似地自语道：“今天晚上喝得痛快。”

子成不响。鸣盛含糊地应了一声，后来却烦躁地说：“奇怪，怎么刘波还没有来？未必他出了什么岔子？”

“不会的，”老九说。他又解释道：“刘波近来常常跟两个女学生在一起，今天下午不是也碰见过她们吗？说不定他和她们还有什么约会。”

“这不大好。在这种时候他应当小心一点，”鸣盛不大高兴地说。

“对刘波你不要这样看法，他们究竟跟我们不同。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老九感慨地说，他的声音有点改变了。

鸣盛埋下头去不响了。子成沉默着，只顾喝酒。老九干了第三杯，忽然烦躁地自言自语道：“我今天晚上有点不对。今天晚上有点心慌。那种事情我也干过好几次了。我从没有心慌过。难道对那个坏蛋我还下不了手！”

“你酒喝得太多了，从前也没有见你在这种时候喝酒，”鸣盛关切地说。

“喝是喝过的。不过——”老九停顿一下，“这种生活我也有点厌倦了。这样零碎地解决，要到什么时候为止？我希望搞更大的公开的运动，有更多更多的人参加，我们正面攻击敌

人。我希望回到家乡去，和那许多人在一起……”他忽然断念似地用决断的声音改正道：“这种废话还是少说罢，眼前的事情更要紧。”

“对，明天的事情更重要。我相信明天——”鸣盛激动地说，他刚说到“明天”，话就被子成的叹息打断了，同时他也注意到老九并未用心听他讲话。老九的脸色和子成的恰恰相反，老九愈喝酒脸愈发白，子成喝得脸色象雄鸡的鸡冠。

“子成，你不要喝了。其实老九喝得太多了也不好，”鸣盛诚恳地说。

子成抬起眼睛看鸣盛，他微微地摇头。他的眼白也泛起了淡红色。他的眼光停留在鸣盛的脸上，眼角上有泪珠，一瞬间清亮的泪水就把眼珠掩盖了。

“子成，你做什么？”鸣盛同情地惊问道；他又耽心地加了一句：“你心里难过罢？”

子成点了点头，他忽然张开嘴呻吟似地说：“我看见那些忘掉了的面貌了。还是那么清楚。他们都在责备我，怪我胆小，我听见他们在唱那首歌。……就跟在昨天一样……居然一眨眼就是几年！……明天我应该——”他说不下去，泪珠已经流到了他的上唇边。他伸起右手去按住前额，接着声音嘶哑地说：“我在这里喝酒。又想起了老白……”那个死在故乡牢里的同志的面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老白是一个酒量很大的人，还是因为一个暗杀事件被捕的。

没有人接下去说话。连老九也放下酒杯垂头沉思了，过了半晌他才抬起脸猛然拍一下桌子，酒醉似地说道：“明天一

一切都改变了。我和仇敌躺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是最痛快的事。我的手不会错的！”

但是事实不会完全照老九和子成所想的那样进行。第二天上午他们到了和永言、光韩约好见面的地方。永言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消息：那个东西患着小病，昨天晚上搬进虹口日本医院去了。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然而他们得到的是确实的情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还应该忍耐，应该等待更好的时机到来。然而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候要大家放下手，也不是容易的事。

“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一定有人泄漏了消息，那个东西躲起来了！”老九感到失望，气愤地说。

“不会有人走漏消息，”永言镇静地说，“不过那个东西运气好，病救了他。”

“我们应该马上想个办法，不然会让那个东西逃掉！”子成苦恼地小声说。

“你不要耽心，这也是没法的事。难道我们还怕他逃掉不成？我们目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朴元那里也该有长信来了。他这次的成绩还不坏，联合的事情可望成功，听说大联合的宣言已经起草好了。我们也该好好地准备响应，”永言安慰子成道。

光韩和老九两人坐在旁边不出声。子成烦躁地接口说：“你的话自然不错。不过你知道，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却

要走另外的路，这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权利依照自己的性子做事，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管住我们，”永言冷冷地说。

“永言的话有道理，子成，你应该沉静一点，”光韩忽然站起来，走去拍一下子成的肩头，劝慰地说。他又严肃地自语道：“我们没有个人的选择。什么时候牺牲来唤我们，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急躁不会有好处。”

老九不耐烦地开口了：“不要再讲这些闲话了。我们还是谈正经事罢。我们另外想个办法来干掉他，说不定他明后天就会出院的。他不能够老躲在医院里。”

“对。这几天那边正需要他出来活动，日本人不会让他闲着，”永言响应似地接口说，他的嘴角又挂出了微笑。

“那么，我今天再进虹口去，”老九忽然下了决心说。

众人楞了一下。还是永言先开口，他点点头说：“也好。不过你今天去，应该当心一点。”

“我知道。等我得到确实情报再告诉大家，”老九点头说。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九点钟在这里碰头，”永言接口说。

十 一

从这一天起半个城市的居民都到泥城桥附近，对着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遥遥地致诚挚的敬礼。一座洋楼吸引了全上海人的眼光，人们潮涌似地从法租界奔向北方。

刘波也到过那里，他去得比较迟，那是在第四天。这几天来他和一些同伴在不利的环境下面绝望地努力工作，却不曾得到他们预期的成绩。年轻人的理想常常走得离事实太远，有时候他们甚至希望在一两天内就会看见世界改变面目。刘波还是一个比较切实的人(他自己常常这样想)，他也知道少数青年的努力无法完成伟大的事业。然而现实的环境给他们的打击太大了。闸北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就把他们的年轻的心放在火里煎熬。他怀着痛苦的心度过了这些日子。

这是一个阴天。浓黑的烟从北方升上来，直耸在空际。这浓烟在这些日子里似乎就不曾淡过一刻。这浓烟象一个巨大的魅影压在全上海人的头上。但是在它的威胁下，一面颜色鲜明的旗帜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升起来，昂然随着风翻飞。仅仅这一面大旗就使得在闸北天空中飘扬的无数的“日章旗”黯淡无光。这一面旗帜代表一种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体现这种精神的便是那几百个愿以少数人的热血跟胜利的侵略者

作决死战斗的中国壮士。

刘波站在拥挤的人丛中，伸着颈项朝北面眺望。一间矮屋遮住他的视线。他往旁边移动，换了一个位置看过去，这一次他的眼光越过了屋顶，达到那座象堡垒一般的四行仓库。仅有的一面在天空飘扬的国旗鲜明地映入他的眼睛。他再留心看。屋顶上，就在旗下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持枪的兵士。那钢盔，那枪刺，那动着的头，他都看得清楚。只有脸孔成了模糊的一片。在他的身边，有人在说：“看，那边还有两个，他们在挥手。”他更注意地用眼光在那个屋顶上搜寻。他一共找到了五个中国兵。他们似乎也看见了这边的人，他们在向这边挥手。

在刘波的前面，好些人揭下了帽子在空中挥舞着，许多只手举了起来。他也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他的手跟着那许多只手接连地挥动。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的袭击，他的眼睛突然被泪水打湿了。他这时并没有悲哀。他觉得在那个屋顶上挥动着的手把他的心从火焰中救了出来。这阴霾的天也因为那些手挥去了暗云，而射出了亮光。他感动地想道：“不管胜败，你们是为着我们的命运在那里战斗……”

河那边响起了爆炸声，以后又是接连不断的机关枪响。河这边的人看不见什么。仓库顶上没有什么变动，不过挥动的手突然停止了。机关枪在更近的地方响着，人还听得见手榴弹的爆炸声。刘波继续地想：“八百人……五百人……你们是在为我们的将来奋斗……有一天我们会让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忘恩的人。”

“又打起来了！那几百个人怎么抵得住？听说东洋人要轰炸仓库。他们还有什么办法？真急煞人！”旁边一个店员模样的年轻人焦急地对同伴说。

“他们是准备牺牲的了。不过我们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拼命，不能出力，真是惭愧！我们都是中国人啊！”那个同伴回答道。

刘波听见了这两个人的谈话，他又想：“这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只眼睛注视着你们的命运，多少颗心在为你们痛苦。你们决不是孤独的。”

枪声停止了。河那边好象又安静下来了。四行仓库仍旧高耸在对岸。那一面颜色鲜明的旗帜毫无损伤地在屋顶上飘扬。刘波忘了自己地小声说：“谢谢你们，你们为我们举起了希望。”他怀着一颗颤动的心走了。

晚上刘波走到医院门口，那里静静的，只有两个童子军站在门外守卫。他看表，才知道他来得太早，离护士下班的时刻还差半点多钟。他沿着马路走了一会儿，才转身回来。快回到医院了，他埋着头，正在思索，没有留心一个影子迎面飘过来。但是一个惊喜的声音进了他的耳朵。那个女子叫着：“刘先生。”

“朱小姐，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刘波抬起头惊讶地问道。

“文淑离开这里了，”素贞低声答道。

“奇怪，她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刘波更加惊奇地问道。

“前天看护长说她不该常常唱歌给伤兵听，又说她态度不

大庄重，她一生气就走了，”素贞带了一点不愉快的调子说。她又问：“她没有告诉你吗？……她现在在曾明远那里工作。”

“我晓得。这两天我倒没有碰见她，”刘波带点怅惘地说。他沉默了片刻，忽然注意到素贞睁着一双大眼忧郁地望着他，便温和地说：“那么朱小姐，我送你回家罢。”

“谢谢你，”素贞感激地说了这一句，她微微地笑了。

两个人走在清静的马路上，刘波不说话，他用同情的眼光望了望素贞，她低着头慢慢地移动脚步。

“刘先生，你收到我的信了？”素贞声音略带颤抖地问道。

“我收到了信才来的，”刘波温和地答道。

“我晓得你看不起我，你以为我是千金小姐，不能够吃苦，”她仍旧用颤抖的声音说。

“没有的事，”刘波笑着分辩道。

素贞的身子本来跟刘波的离得不远，这时她便靠过去，态度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刘波的胳膊底下，挽住他的右膀，仰起脸看他，笑着追问道：“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你们团体？是不是你以为我做不了事情？你说，不要骗我。”

刘波掉过脸，看见一对燃烧的眼睛在那张纯洁可爱的脸上闪烁。他有点诧异，又有点喜悦。他想到一件事情，他的心跳得厉害。他连忙掉开脸，有点窘地回答道：“朱小姐，你想得不对。我正在给你办那件事情。你要参加，不会有问题。我们自然欢迎你。我从没有把你看做千金小姐。”

“那么你为什么还叫我做朱小姐？就叫我素贞好不好？”她柔声地说。

刘波忍不住又掉过头去看她，依旧是那一对燃烧的眼睛。她的美丽的大眼睛吸引住他的眼光，吸引着他的心。他的心在反抗。他做出笑容说：“这当然可以。”他只说出这短短的一句话。

炮声突然响起来，把静了好一会儿的空气震动了。一声，两声……大炮似乎就在这两个人的周围开放，把两颗心逼得更贴近。两个人抬头望天。深蓝色的天空中涂抹了一片杏红。

刘波望着天空，悲愤和仇恨绞着他的心。他痛苦地慢慢移动脚步。

“刘波，”他听见素贞的声音。这个少女痛苦地、求救似地唤他。他觉得他的膀子被挽得更紧。他埋下头看她。燃烧的眼睛被泪水浇灭了火光，只有余烬在冒烟。他仿佛看见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他对她突然产生了怜爱的感情。他柔声问她：“你怎样了？”

她不答话，仰起头，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脸，好象求保护似地偎着他。

他的心软化了。他好象在庇护一个心爱的人，不让一种野蛮的势力将她抢走一样。他伸手抚着她的肩头，俯下脸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不要怕，我在这里。”

“你会走的，你会离开我的，你们都会离开我的，”素贞含着眼泪说。

“不，我不会，”刘波摇摇头，小声答道。他的心被激情抓住了。

“你带我走罢。我怕得很。你带我到别的地方去，更自由的地方去，”她象抓住一个希望似地低声哀求道。她抓着他的手。

“素贞，你不要这样激动，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他温柔地安慰她。停一下他又说一句：“现在还不是走的时候。”

素贞不作声。刘波又关心地问道：“你冷吗？你的身子在打颤。”

“我不冷，”素贞摇摇头柔声答道。她又抬起眼睛去看刘波，她激动地说：“我不冷。我的心热得很。我心里不好过。”

刘波仍旧温和地安慰她：“你今天晚上太激动了。你回家休息一下，就会好的。再转个弯就到你的家了。”

这时他们走到一棵街树旁边，天很暗，街灯也很暗。刘波正俯着头对素贞说话。她似乎注意地听着。他说到“到家”这一句，她忽然动一下头，把脸靠上他的脸，把嘴压上他的嘴唇，她热烈地吻他一下，才把脸掉开。她也不说话，却将脚步放快，急急往前面走去。

“素贞，”刘波兴奋地叫了一声，她才放慢了脚步。

“你为什么走得这样快？”刘波追上去问道。

“我怕你会对我说你不喜欢我，”素贞低声回答。

“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刘波微笑了。他又爱怜地责备道：“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女孩子！你真会折磨人。你把我的心抓去了，还说我不喜欢你。”他抓起她的一只手紧紧捏住。

“那么我明天早晨来看你，你在家等我，”她愉快地说，她又对他一笑。刘波满意地说：“好，你明天来，我们一道去看

四行孤军。”她望着他，拉住他的手催促道：“快点走。前面有人来了。”

刘波也不注意前面有什么人走来，他让脚步声在他的耳边响起又消失了。他的心里只有一个素贞。他只听见她的话，看见她的面容。

弄堂口静静地没有人声，铁门已经关上，开着小门让人进出。看守弄堂的巡捕坐在一把藤椅上打盹。

“你陪我进去，我们就住在弄里第六家，”素贞央求道。

“好。”刘波伴着她走了一段路。他们转了弯，素贞忽然叮嘱道：“你就站在这里。等我一个人走回去。你看见我朝你招手，你才走。”

刘波果然站住，他看见素贞走到第六家门口，掉过头对他一挥手，他还留恋地看了她一眼，才转身走了。

十二

第二天早晨刘波到鸣盛家里去，没有见着一个人。他刚回到自己的弄堂口，便看见素贞从一辆黄包车上下来。他高兴地对她打了一个招呼。

“我要你在家等我，怎么你又出去了？”素贞含笑抱怨道。

“我有点事情，你看我不是连忙赶回来等你吗？”刘波陪笑道。

“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同文淑有约会吗？”素贞故意追问道。

“我昨晚还告诉过你，我这两天没有看见文淑，我怎么会同她有约会？”刘波带笑地分辩道。

“我不过随便说一句，你不要着急，”素贞微微一笑，也就不往下追问了。

他们到了刘波住的地方。娘姨给他们开了门。素贞跟着刘波上楼，进了那个颇为宽大的亭子间。

“你的房间倒还清爽，”素贞感到新奇地向四处望了一下，赞了一句。

刘波站在她的身旁，他还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她又说：“现

在到底安静了。炮声也听不见了。”她忽然掉转身子，两只手贴住他的两肩。两只大眼热情地望着他的脸。他的激情上升了。他忘记了一切一下就搂住她，狂热地将嘴压下去，压在她的红红的嘴唇上。她紧紧抓住他的肩头急促地呼吸着。

后来刘波放松手，举起头唤一声“素贞”，温和地对她一笑。她忽然不好意思起来，把脸靠在他的肩膀上，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她还拉着他的衬衫，略微含羞地问道：“你不会后悔罢？”

刘波温柔地望着她，摇摇头，说：“不会的。我爱你。还有什么后悔的理由？”

“可是我使你多了挂念，我给你添了累赘，我怕我将来还会给你增加痛苦，”她迟疑地说。

“这有什么害处？在这时候知道有一个人关心我，倒也好，我至少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只是我怕我不能够报答你的热爱，”刘波感动地回答道。

“我也这样想过，这时候我也需要一个关心我的人，”素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接下去说：“我的心太空虚了。你还不知道我的生活。我的处境和文淑不同。我年纪也比她大。她虽然抱怨，其实她父母都爱她。我母亲死了，父亲对我们姊妹都很冷淡。姐姐一天只知道交际、跳舞、看电影。我父亲有个姨太太，他就只听姨太太的话。在他们的生活里并没有国家、民族、社会。我有个哥哥，从前为着婚姻事情跑掉了。一个小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在这个家里我看不见一点希望。永远是冷冰冰的空气。我什么都只有忍在心里。我从没有遇到一

个象你这样的人。我永远看见那些冷冰冰的面孔。我需要温暖。我也有一腔热情。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带我走罢。去陕北、去新疆、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她激动地说，从眼角落下了几滴泪珠，她把脸贴在他的胸前低声抽泣起来。

刘波轻轻抚摩她的头，充满爱情地说：“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太苦了。”

她哭得更伤心了。他温柔地劝道：“素贞，不要哭了，哭是没有用处的。我会使你快乐。”

“我怕，我怕这只是一场梦，”素贞抬起头用泪眼看他，呜咽地说。“你过些日子也会走的，会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不会的，不会的！”刘波挣扎似地反抗说，他紧紧地抱住她，好象害怕会把她失去一般。

“那么你带我走罢，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她突然用两只手环抱着他的颈项，有点害羞地将脸压在他的脸上。

一切都消失在热吻中。两颗年轻的心连在一起了。然而这只是从痛苦的包围中逃出来的暂时的陶醉。

热情烧着这两颗心，给他们带来幸福的幻景。热情使这小小的亭子间变为广大的世界，好象在这里燃起了美丽的烟火一样。但是火渐渐地灭了。

意外地起了一阵炮声。沉静的空气被震动了。刘波放开素贞的脸，又摸出手帕在她的脸上揩着。她带着微笑温顺地让他这样做，好象是一个顺从的小女孩，跟先前那个热情奔放的少女仿佛是两个人。

“我现在不怕了，”她满意地说。“我知道你真的爱我。”

刘波用赞美的眼光望着她。她又说了一句：“现在至少有一个关心我的人。”

“难道真的除了我以外，就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刘波忍不住怜惜地问道。

“现在有了你，我什么都有了，”素贞骄傲地回答他。

“你就这样相信我？”刘波感激地问。

“我爱你，”素贞笑答道。她昂起头自语似地说：“以后即使有一千个炸弹在这里落下来，我也不怕。”

“要这样才对。这个时代的青年是不应该害怕的，”刘波点头称赞道。他又问她：“你现在饿不饿？我们出去吃饭去。”

“也好，”她应了一声。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便说：“你还忘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你说，”刘波惊讶地说。

“你不是答应过今天陪我去看四行孤军吗？你就忘记了？”她指着他含笑道。

刘波仿佛受到迎头一瓢冷水，他呆了一下。他痛苦地说：“他们已经退出了。你今天没有看报？”

“退出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素贞失望地、惊愕地说。“你告诉我，他们怎样退出的。”

他摇摇头说了两三个字又停止了。他略略皱着眉对她说：“我说不下去。等一会儿还是看报罢。”

“这样快！我真想不到！”她懊悔昨天不曾到那边去。

“租界方面要求他们撤退，说是免得危及租界居民的安全，”刘波安慰般地对她解释道：“有一张外国报纸说得对：这

样的撤退不是败退，是凯旋。”

“是的：‘不是败退，是凯旋’……”她茫然地跟着他说。

掩着的门忽然开了，进来一个穿军服的人，使他们两人都吃了一惊。

“素贞，你在这里？”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来。

素贞脸上发红，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才来的。”

“文淑！”刘波惊喜地唤道。文淑揭下帽子，露出一头浓密的黑发，她把军帽拿在手里当扇子摇着。这服装使她显得身材更小，而且更带孩子气。她扬扬得意地望着他们，她开玩笑地问道：“奇怪，你们是几时好起来的？怪不得这两天总看不见你们。”

“我每天还是到医院去，”素贞红着脸分辩道。

“文淑，你怎么这样打扮？”刘波在旁边打岔地问道。

“我就要到前线去。我可以看见战争了，而且我还可以做点事情，”文淑得意地昂着头答道。一头浓发的圆圆脸，配着整齐的军服，使她显得比平时更好看了。

“你怎样去法？”刘波惊喜地问。

“我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到军队里工作。我们青救里有好几个人去。曾明远是副团长，”文淑说，两颗漆黑的眼珠不住地转动。“现在不会有人轻视我了。”

“你家里肯放你走？”素贞怀疑地问。

“这是为国家，为民族，他们反对也没有用。我自己先就报名加入了。我父亲是个‘失败主义者’，他老是耽心他那点财产，耽心整个上海会毁灭，又害怕东洋人会这样那样。我

想，我走了对他也有好处，免得给他添麻烦，他不会跟我为难。好在我母亲同哥哥都不反对我走。我这一身衣服在家里不好穿。还是在周欣家换的。”

“你几时走？”素贞留恋地问道。她希望文淑还能够 在上海多住几天，她们可以多聚几次，多谈些话。

“也许就在明天晚上，我们自己有卡车，”文淑毫无留恋地回答，她的眼睛已经被她的幻想中的一些景象迷住了。她没有想到跟朋友们分别会是痛苦的事。

“好，你先去，我们将来会跟着来的，”素贞羡慕地说。

文淑看见他们两人这些时候挨得近，还不时交换亲密的眼光，她便走近素贞，轻轻抓起素贞的手，半好意半开玩笑地说：“好姐姐，告诉我，你们几时请我吃喜酒？”

“呸，”素贞红着脸啐了她一口。

“我倒高兴你同他要好，”文淑低声在素贞的耳边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很开心。”她又把眼光射到刘波的脸上，她对他微微一笑，倒笑得他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素贞在旁边用感激的眼光看文淑，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住。

“文淑，我同素贞……”刘波迟疑一下，终于坦白地对文淑说出他和素贞相爱的事。

“我知道，”文淑不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我在前线会给你们祝福。刘波，你要好好地待我姐姐，否则我可不答应你。”

“呸，你说话，好象你是我母亲似的，”素贞笑着责备道。

“谢谢你的祝福。你知道我不会待差她，她也相信我，”刘

波诚恳地说。“她过去太苦了，我要好好地爱护她。”

“那就好，我也放心了，”文淑含笑地说。

“你走了，什么时候回来？”素贞又问。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文淑的声音里带上一点惆怅的调子。她留恋地看了看这两张熟习的面孔，她换了语调露出愉快的样子说：“我恐怕来不及吃你们的喜酒了。你们今天先请我吃一顿俄国大菜罢，在前线吃不到这种东西。”

“在前线生活相当苦……”刘波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文淑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撅起嘴打岔说：

“你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够吃苦。我什么生活都可以过。我问你，究竟请不请客？你不请，我马上就走。”

刘波噗嗤笑了，他接下去说：“你还是那个脾气。我又没有挖苦你。我们正要出去吃饭。好，现在就算是给你饯行，素贞，你说是不是？”

“你等等，我到浴间去一趟，”素贞说；她又问文淑：“你去吗？”

“我也去，”文淑答道。素贞拿了手提包，文淑高高兴兴地牵着素贞的手走出了亭子间。

十三

刘波、文淑和素贞在环龙西菜社二楼宽敞的大房间里吃着俄国大菜。这里除了一对中年的白俄夫妇外，并没有别的客人，他们可以自由地谈话。他们谈得很畅快，谈了许多事情。他们喝完红茶以后还谈了大半个钟头。后来文淑说要走了，她第一个站起来。刘波和素贞还依恋地望着她。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你？我想来送你，”刘波说。

文淑想了想，然后带笑地答道：“那么明天晚上七点钟见，在周欣家。我写个地址给你。”她说罢又坐下来，在餐桌上拿了一张擦刀叉用的纸，又从袋里摸出自来水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地址，递到刘波伸过来的手中，她同时还说：“你找周欣，周家大小姐好了。她和我同去。你们一定会喜欢她，她的脾气跟我的一样，她却比我能干。”她说到这里又露出一个微笑。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留恋的表情。

“我也去，我也要送送你，”素贞带点惜别的感情说。

“你不要来了，你还要到医院服务，”文淑说。

“不要紧，明晚上我可以请假，”素贞打定主意地说。

第二天仍是大炮声、飞机声、炸弹声点缀这个沉闷的日

子。天空中布满着阴云。没有风，没有雨。只有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郁闷，和一种象磐石那样搁在人们心上的压迫。这好象是一个不吉的预兆，使人觉得有一件他所害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人们从在街头发卖的早报、午报、晚报中，从无线电收音机中猜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人们用惊惶的调子在四处谈论，有些人甚至怀着绝望的心情等候着奇迹来挽救一切。

但这些也只是一部分的表面的现象，它们掩盖不了信仰和热诚。虽然有些悲观的人认为上海就要毁灭，但是有坚强的信心勇敢地继续工作的人还是多得不可计数。年轻的心更不是一时的困难与失败所能制服的。

因此晚上七点钟光景，刘波做完工作从会里出来、找到了素贞、他们一起到周家去看文淑的时候，他仍然昂着头，充满信仰，想到将来的胜利。

周欣给这一对年轻人开门，并且亲切地接待他们。周欣从文淑那里知道了他们的为人，她非常愿意结识这两个朋友。后来她又听说他们要来给文淑送行，所以听见敲门声，她连忙跑到厨房里去。她并不需要旁人的介绍就跟他们谈起话来。

刘波和素贞走进客堂，又见过周欣的母亲和妹妹。他们在周太太的慈祥的面容上看见一点忧戚的痕迹，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个母亲的心。周太太正在照料老娘姨整理一个绿帆布袋里的铺盖等物。地板上立着两只不大不小的箱子，已经锁好了。另外还有一个手提的小藤包。他们都不坐下。刘波看见周太太伸手去提袋口，他连忙动手给她帮忙。

文淑嚷着从楼上半走半跳地下来了。她仍旧穿着军服。她看见刘波和素贞，便高兴地说：“你们真的来了。”她立刻走到素贞面前紧紧地握住素贞的手。

“今天晚上出发吗？”刘波问道。他便离开帆布袋，让周欣去提袋口，他和文淑、素贞两人走到茶几前，那里放着周欣刚才给他们端来的茶杯。

“嗯，今天晚上，等一会儿就动身，”文淑带笑答道。

“你的行李呢？”素贞问道，她看了一眼地上的箱子。

“那个就是我的箱子，铺盖跟周欣的放在一起了，”文淑指着一只箱子和那个帆布袋对素贞说。“妈要我多带点东西，我都没有带。她不晓得我又不是出门旅行。到前线去，多带东西有什么用处？”她的脸上似乎露出哂笑，但是她的脸色马上改变了，她低声说：“妈今天一天没有吃饭。她跟我讲话，就流眼泪。”她把头埋下去了。

“你母亲不是赞成你走吗？”刘波问道。文淑没有答话。素贞在旁边轻轻扯了一下刘波的袖子。素贞也觉得心里不好过。

文淑揉了揉眼睛，才抬起头来，她的眼圈红了。她低声答道：“妈不比周伯母明白，她并不了解抗战。不过她喜欢我，她也知道我在家里过不下去。我要走，她就让我走了。”刘波和素贞都不讲话。素贞同情地紧紧捏住文淑的手。文淑又说下去：“爹不在家，妈给我理好箱子。吃过晚饭，哥哥提着箱子，妈嘱咐我好些话。我们走到弄堂口，哥哥雇好车子，我们上车的时候，妈还叮嘱我在外面做事要小心。我在车上回过头去

看她，我还看见她站在弄堂口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还用手帕揩眼睛。我这个时候，真想回家不走了。我晓得我的感情脆弱。”文淑说到这里，泪珠从她的眼角滴下来，她自己似乎还觉得。她慢慢地抬起眼睛，她不看他们，她仿佛在看另一个景象，还留在她的脑子里的母亲在弄堂口揩眼泪的景象。

“是你哥哥送你到此地的？”素贞感动地问道。

“他走了还不久。他有事情，坐了一阵，就走了。他走了我才上楼换衣服，”文淑答道，她擦去了脸颊上的泪珠。

“你不要难过，我以后有空会去看你母亲，我会写信给你，告诉你母亲的情形，”素贞把嘴放在文淑的耳边低声安慰道。

“谢谢你，”文淑感激地点点头。但是她马上又摇头说：“我们跟着军队跑，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收到你的信。”

素贞不再说话，只是捏紧文淑的一只手。周欣同她母亲和老娘姨已经把帆布袋装好锁上了，现在她在整理箱子，她一面对母亲讲笑话。

“文淑，你勇敢点，我不相信你感情脆弱，”刘波忽然鼓励地对文淑说：“你看周欣，她现在还是有说有笑的，她不是也要离开家吗？”

“我知道，”文淑低声回答了三个字。

“那么你就不该流眼泪。这是光荣的工作，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倒有点羡慕你，”刘波继续说。他的脸色似乎是很平静的。其实他也有内心的斗争。怅惘的思想已经偷偷爬进了他的脑子，他正在努力驱逐它。

文淑忽然把头和身子摇动一下，她平日那种愉快的表情

又开始在她那圆脸上出现了。她提高声音说：“我不再难过了。现在什么都过去了。”她点点头，自语般地说下去：“我知道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不应该看重个人的情感。我们要参加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我们要贡献出我们的一切。……我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战士……”她说，脸上又现出了信仰的光彩。但是她还没有把话讲完，就被周欣过来打岔了。周欣开玩笑地说：“文淑，你又在发表演说吗？让我来听听。”

“我随便讲几句话，你又来挖苦我！”文淑掉头看周欣，带笑地分辩道。“提到演说，哪个比得过你？我晓得你又会骂我搬弄新名词。”

周欣只是笑着，还不曾答话，刘波就接口说：“其实跟着军队跑，做民众工作，演说也是需要的。我看你们也免不了要常常对老百姓讲话。不过新名词太多了，老百姓不懂也不大好。我看我们都有这个毛病。”

“刘先生的意思很不错，”周欣接下去说；“不过这个毛病也可以慢慢改掉。我们在乡下跑久了，就会有进步的。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还没有一点经验。我们只能说是学习。我们还希望文化界的朋友多多指教我们。”

文淑忍不住噗嗤笑起来，她抓住刘波的膀子，指着周欣说：“你看她多滑稽。当着你说这种话。真要把我笑坏了。”这一来把众人都惹笑了。这里所谓众人，除刘波、素贞外，就只有周欣和周敏。周敏跟着大家笑，也不知道什么是可笑的事情。老娘姨跟着周太太到楼上去了，但是客堂里并不因此减少热闹。众人一面笑一面讲话。大家畅快地谈笑，渐渐地忘

记了离别的事情。

忽然有人来敲前门。门上铜环的响亮声音使得众人立刻静下来。周欣连忙走下天井，发出声音，问叩门的是谁。她听见了那个熟习的声音的回答，才打开门，让客人进来。

客人就站在门口跟周欣低声讲了几句话，周欣答应着。她也问了几句。客人匆匆地把话讲完，正要转身出去，忽然瞥见了客堂里那张熟识的面孔，他惊喜地叫出声“刘波”，便往里面走去。

刘波伸出手来和曾明远握手。他听见曾明远说了一句：“我正要找你。”他却另外发出一句问话：“你们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发？”

“八点半钟，”曾明远短短地答道。他还点头招呼了文淑和素贞。

“我希望你们这次得到最好的成绩，”刘波诚恳地祝贺道。

曾明远好象没有听见这句话似的，他不回答，却做出严肃的神情，在刘波的左膀上轻轻一拍，低声说：“我有几句话跟你说。”他把刘波引到角落里，他们就站在那里唧唧啾啾地谈了一阵。后来刘波点头表示同意了。曾明远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他又对刘波讲了几句，刘波也讲了一些话。曾明远摸出笔和名片，在名片上写了一些字，把名片交给刘波，又同刘波握手告别。然后他又走去嘱咐文淑、周欣道：“我在那边等你们，八点半一定出发，”他急急忙忙地走了。

“刘波，他跟你讲些什么话？”文淑捺不住好奇心，问道。

“没有什么，”刘波短短地答道；他又加上一句解释：“他要

我们同青救合作。”他不想把他和曾明远的谈话在这里重述。

“你怎么回答他？”文淑往下追问。

“我自然答应，”刘波回答了一句。周太太进来了。

“刚才什么人来过？”周太太大声问周欣道，她无意地把刘波的话打断了。

“我们团里的曾先生，”周欣答道。

“怎么不留他多坐一下？”周太太惋惜地说：“我倒想跟他讲几句话。”

“人家有事情来不及多坐，”周欣说。

“那么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周太太忽然问道。

“八点半，”周欣说出三个字便停一下，周太太的脸色突然一变。周欣又说：“我们先到他那边聚齐。快要走了。我现在去换衣服。”

“你等等，”周太太慌忙地止住周欣，好象害怕这个女儿马上就要消失似的。“你不要就走，”她低声说。她就在方桌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来，不转眼地望着周欣。

“姆妈，”周欣感动地唤了一声，便走到周太太面前，又问一句：“你要跟我说什么话？”

周太太仍旧望着周欣，似乎要说话，但是嘴唇动了一会儿，只吐了一句：“让我多看你几眼。”她没有掉泪，然而她的脸部表情却使得周欣想哭了。

“姆妈，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周欣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让它奔放出来，她苦痛地说，把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肩上，用她的两只泪眼看母亲的慈祥的面颜。她想：过十分

钟、二十分钟、半点钟，她就再看不见这张脸了。她不敢往下想，她不愿意在这时候多流眼泪。

刘波和素贞掉开头低声在讲话。文淑在周太太的脸上看见了自己母亲的面容，她又回忆起自己母亲在弄堂口揩泪的情景，她的泪水也迸出眼眶来了。周敏却走到她姐姐的身边，挨着姐姐，听姐姐跟母亲讲话。

周太太看见周欣的泪眼和脸部表情，便明白女儿内心的斗争。这位母亲知道多用私人的感情折磨女儿，也没有好处，并不能阻止就要到来的分离，也不能把女儿安全地拴在家中。那个年轻的孩子正想往自由天空中飞去，母亲不能在她刚要展翅的时候，拉住她，让她在家里憔悴。她的心已经飞走了，母亲不能留住她，况且她这次是为了抗战的大事业。那么就索性让她走罢，让她快快乐乐地去罢。

“好，你走得了，你快去换衣服，”周太太勉强做出笑容对她的女儿说。她看见女儿还站着不动，便又半安慰半鼓励地往下说：“我知道你会回来，打了胜仗你就会回来，我们都在上海等你。我同你妹妹都会给你写信。”

“我写不来，姐姐会笑我，”周敏拉着周欣的衣服说。

周欣还是答不出一句话，她的身子靠在方桌旁边，她埋着头，不敢再看母亲和妹妹。

“不要紧，姐姐不会笑你，姐姐会给你写信，”周太太勉强装出平静的声音代答道。她看见周欣仍然埋头立在她面前，便催促道：“阿欣，你该走了，快上楼去换衣服。”

“周欣，时间到了，”文淑揩好眼泪，便顺着周太太的口气

催促道。她觉得现在应该动身了。

周欣不答话，忽然把身子一扭，跑出了房间。

“姐姐，姐姐，”周敏惊奇地在后面唤道，她正要追她的姐姐，却被她的母亲唤住了。周太太吩咐周敏道：“阿敏，你要老娘姨出去叫一部汽车来。”

周敏一走，文淑、刘波、素贞三个人都过去安慰周太太，跟她随便谈了一些闲话。后来周欣换好军服下来了。周欣的脸上不再有泪痕，她还带着平静的微笑，加进来插嘴讲几句话。周太太又放心、又难过。这个中年妇人的确有着极大的自制力，她不让别人看见这一颗复杂的母亲的心。

喇叭声和车轮声表示汽车进了弄堂驶到门前来了。刘波走下天井去开了大门。汽车夫正从车里出来。接着是一阵忙乱的情形。老娘姨、刘波和汽车夫动手搬行李，文淑和素贞也多少帮一点忙，文淑把小小的藤包提到车上。周欣没有动手，她的母亲拉着她絮絮地讲话，叮嘱她一些在外面应该小心的事情。

汽车快要开走的时候，文淑、素贞、刘波都跟周太太说过告辞的话先后坐进车中了，周欣还站在车外对母亲讲话，母亲最后放弃似地挥手说：“你去罢。”她看见女儿还不肯上车，忽然叹了一口气，怅惘地低声说：“可惜我老了，不能够跟你去……”她马上改变语调催促道：“你快进去，不要让冯小姐他们等你。”她说完便掉开头不再看女儿。她吩咐老娘姨付了车钱，也不等着看汽车开出，就转过背走回屋去了。立在门前送走汽车的只有周敏和老娘姨两个人。周欣在车中回过头来，

从后面小窗里，还可以望见她的妹妹的挥动的手，她不觉记起了妹妹的话：“你快点打走了东洋人回家来！”

路不远，汽车很快地就到了目的地。那所洋房的绿色铁门大开着，门前停了两部卡车。后面一部卡车旁边站着好些人，他们正把行李搬上卡车去。

汽车一到，几个同伴便拥上来。里面男女都有，他们看见了周欣和文淑的脸，高兴地招呼她们，并且帮忙把行李搬下了汽车。

张利英的秀丽的长脸也出现了。她带笑对文淑和周欣说：“你们来得正好。快要走了。”

“你也去吗？”文淑看见张利英穿着一件深色带花的旗袍，觉得奇怪，便问道。

“我不去。我来送你们。我住得很近，”张利英答道。

“我们快点把行李搬上卡车罢，”另一个男同伴在旁边插嘴说。他便动手去提帆布包。

“等我来，”刘波说，但是那个人已经把帆布包拿走了。刘波便提起一只箱子。另外两件行李也被同伴们拿上了卡车，文淑和周欣便站住，同素贞、张利英两人谈几句闲话。

刘波搬好行李，走回来找素贞她们，正看见曾明远从铁门里出来，他便走去迎着他，问了一句：“就走吗？”

曾明远带笑地点一个头，答道：“马上就走了。”他又说：“我已经和青救的人讲过了，你明天去。”他这时候看见一个长头发瘦面孔的青年在旁边走过，便唤住那个人，一面对刘波介绍道：“这是李南星，《战鼓》的编辑，他在宣传组做事，你明天

先找他也好。”他又和李南星谈了几句话。

卡车的喇叭响了。一个决定的时刻到了。对于一部分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兴奋的生活的开始；对于另一部分人，这却是别离，这却是想念的开端，虽然后一种人在这里就只有寥寥几个。

天重重地压下来。晚霞似的杏红色涂满了整个天。整个天空容纳不下这耀眼的红光，还把它尽量往下洒；地上、建筑物上、人的脸上、身上都一样地染上红色。夜开始发亮了。

人们陆续跳上了卡车。文淑和刘波、素贞两个讲了一些话握手告别以后，到了车上。于是卡车慢慢地动了，刘波、素贞和别的五个同伴们一面走，一面在车子旁边挥手。两部卡车接连地转了弯。周欣忽然兴奋地自语道：“新的生活开始了。满天的火光送我们离开上海。”

文淑在旁边看了周欣一眼，低声说了一句：“你说得多么残酷。”她的眼里还留着刘波和素贞的影子。

周欣奇怪地看文淑，不了解这句话的意义。过了片刻她才回答文淑道：“我应该说火光给我们照亮道路。你想想，就会明白的。”

文淑没有作声。卡车蒙着火光渐渐地逼近南市了。

十 四

一个声音把刘波从梦中唤醒，他睁开眼睛，看见子成站在床前。子成脸色苍白，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命令似地催促刘波道：“快起来！我有话告诉你。”

“什么事？”刘波揉揉眼睛，一翻身就坐起来。

“你还问什么事？”子成责备地说，“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你那天早上来也不等一会儿。你在忙些什么事？是不是又跟那两个女学生在一块儿玩？”

刘波脸红了。那天早晨的确是为了素贞的缘故，他才没有在子成的家中等候。他现在也不分辩，却着急地催问：“有什么事？快告诉我。”

子成在书桌前藤椅上坐下，他的脸上有了血色了。他激动地说：“老九给抓去了。”

“老九给抓去了？在什么地方抓的？”刘波打了一个颤，吃惊地问道。

“在虹口，”子成皱着眉头答道。“他自己也不小心。这几天他为了那个东西，天天去虹口。也不知道是怎样抓去的。”

“你们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是不是你们的计划让人知道了？”刘波惊恐地、关心地问道。

子成摇摇头坚决地答道：“我想不会，他们不会知道。老九是昨天下午被捕的。我们还有朋友在虹口，昨天晚上就得到了消息。”

“你们打算怎样办？”刘波又问一句，他也没有什么主张。

“我们还是要干那件事情，”子成声音低沉地说：“老九被捕，据说，好象是他接连几天在虹口街上跑来跑去，引起敌人疑心，才把他抓去的。我们正在设法打听实在的情形。”

刘波看了看子成的瘦脸。这张脸上堆满了黑云，看不见一线阳光，只有那对近视眼睛在镜片下面常常闪出亮光。他觉得他不了解子成这些人。他们似乎比他深沉，比他坚强，而且比他容得下更多的痛苦。虽然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和做法，但是他们的生活与行为引起了他的敬爱。他小心地嘱咐一句：“我看你们这几天要特别当心。”他明知这样的话是多余的，他还是说了出来。

子成看了刘波一眼，答道：“我们今天就要搬家。”他又加一句：“你不要到我们那里去。”

“但是我以后怎样见到你们？”刘波问道。

“我们会来看你。多半在早上来，”子成简短地答道。他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倾听一下，便说：“鸣盛来了。”

果然鸣盛推开掩着的门走了进来。他带着满脸汗珠，气咻咻地说：“中国军队退出沪西了。”

“报纸上说的吗？”刘波好象挨到一下迎头的打击，半晌才说出这一句话。

“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连浦东也退出了。大部分往内

地退，一部分守南市，”鸣盛激动地答道。

“南市怎么守得住？”刘波焦急地说，他觉得脚下的地也开始动摇了，他不能够想象以后的情形。

“总可以守几天，还有警察和保卫团，”子成苦笑地插嘴道。接着他又用本国话向鸣盛问一件事情。

鸣盛也用本国话回答，他说了好几句话，刘波只听出一个带鼻音的“纳”(我)字，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子成忽然发出狞笑(这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还是相当和善的)，用中国话说了一句：“这一次我总可以试一试了。”

刘波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情，他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了子成一眼。

子成和鸣盛继续用本国话交谈着。刘波不懂他们的话，他自己心里又装了许多事情，他觉得房间里很闷，心里很急，他只想到外面去。他便留下他们两人在房里，自己到浴间去洗了脸。他回来时他们还在谈话。他等他们谈完以后，才问鸣盛道：“朴元有信来没有？”

“有，他托人带了信来。大联合宣言已经发表了。他们正在组织义勇队。他还要永言到南京去。他自己要到汉口走一趟，”鸣盛答道，他提起朴元的事情，脸上也有了光彩。依旧是信仰和希望在他的脸上闪光。他和子成不同，他永远抱着单纯的信仰，他渴望着在自由的天空下，和同伴们一起走到许多地方，做多方面的工作。他现在瞥见了在他前面闪耀的一线亮光。

“永言去不去？”刘波问道。

“他等着把这件事情办好就走，不会久的，”鸣盛答道。

“你倒永远是乐观的，”子成说着，脸上露出了苦笑。

“我看老九被捕的事情会引起那边的疑心。你们的计划恐怕要延迟一些时候才好，”刘波关心地劝告说。

“不要紧，不出两个星期，”子成脸色阴沉、声音坚决地说。

“这个家伙胆子倒不小，昨天还在扬子饭店开房间玩向导^①。我不相信他有多大的本领，就逃得过，”鸣盛兴奋地接嘴说，他说到最后一句，带点得意地笑了。

“走罢，”子成忽然烦躁地说，便站起来。

鸣盛看了子成一眼，也站起来，他还对刘波说：“我今天晚上还有点东西要放在你这里。”

“那么，你早点来，太迟了也不好，”刘波嘱咐道，他想起了晚上十点钟他要到医院去找素贞的事。

“我不会迟，”鸣盛短短地答道。

“我跟你们一道出去，”刘波说，他希望还能够同他们走一节路，谈几句话。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害怕跟他们分开以后，便永远见不到他们。但是这心情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这时想的是别的事情。子成摇摇头说：

“我们先走，你最好等一下。便是我跟鸣盛也不能走在一路。现在应该当心。”

“那么我晚上在家里等你们，”刘波说，他退回房间里去了。

^① 向导：指解放前向导社的向导女郎，一种变相的妓女。

下午，各报的号外证实了中国军队从沪西撤退的消息。这个消息给上海租界带来了很大的悲愤和恐慌。可怖的谣言在各处散布开来，引起了一些骚动。但是无线电收音机里仍然发出来坚定的声音，安慰着市民的痛苦的心。

刘波从青年救亡团的会所出来，就在这条街的转角遇见了李南星。他先看见李南星的长头发下面露出来的灰白脸，便大声唤起那个人的名字。李南星站住了，痛苦地握着他的手，默默地对他摇头，过了半晌才说半句话：“想不到……”

“这也是免不了的事。我们的土地大得很，这次是长期抗战，”刘波勉强做出坚定的声音安慰听话的人，同时也在安慰自己。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许多痛心的事情马上就要跟着来了，”李南星带着悲愤地说。

刘波还不大明白李南星的意思，便问道：“你从哪里来？”

刘波的简单的问话触到了李南星的伤处，使他马上爆发似地说起来：“我从巡捕房来。《战鼓》的登记证拿回去了，这就是说我们要停刊。那个负责人还劝告我们早点结束青救的活动。他说，这是出于好意。他说敌人对我们很注意，我们替四行孤军募捐，送接济品的事情，日本报纸上也提起过。你们的团体怎样？得过劝告没有？”

“没有，”刘波短短地答了两个字。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不能够相信。两个多月里的许多使人兴奋的景象不能够是一场梦。为什么现在必须完全改变？而且怎么能够完全改变？

这使他太痛苦了。不过他有着自制力，他还可以把痛苦全咽在肚里。

“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其实法租界更厉害，我们还不是从法租界赶出来的？你们的活动比较秘密，他们大概不知道，不然他们决不肯放过，”李南星似乎不知道刘波的心情，他为了宣泄自己的悲愤，只顾说下去。

刘波好象被困在一条死巷里，他东碰西撞都找不到一个出路。但是他还在挣扎，他用尽力量挣扎。他忽然瞥见了一线光明。永言、鸣盛一班人的脸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的勇气增加了。他觉得自己找到出路了。他坚决地回答李南星道：“我们的团体成立不久，所以他们不知道。也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们要继续活动，不管敌人打到什么地方，我们的活动决不会停止。”

“你们决定做秘密活动吗？”李南星掉转头向四处看一下，然后低声问道。刘波点点头。李南星的灰白脸上露出了微笑，说了一句：“这倒好。”他停了一下，再说：“不过我们不行。我们没法秘密。巡捕房对我们太注意。我们打算跟着军队转移到内地去。”

“这也好，内地也需要工作的人，”刘波顺口答道，他看看李南星，他在那张脸上看出的是激动、痛苦和悲愤，但是那里并没有怯懦的表情。他便安慰李南星说：“在内地做工作倒更自由、更畅快。”

“是的，不象在这里处处受气，我们早点走也好，”李南星接口答道。其实他对转移的事也没有具体的计划，他们团体

里有人谈过转移的话，却还不曾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件事情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实现他也没有把握。

两个人无意地抬起头看天空。东边的灰白色天幕被一大片墨汁染污了。墨汁还在往四处流动。那是烟，一大股一大股往上冒的黑烟。是那样浓，是那样可怕的黑烟。烟在天幕上滚，仿佛就向着这一面滚来。两个人默然了。这似乎是一个象征：黑暗努力向他们压下。黑暗的势力在扩张。黑暗在摧毁他们所关心、所热爱的一切。愤恨无处发泄，全积在心里，堆成痛苦。他们觉得整个身心都被痛苦占有了。人在他们身边走过，说着话，叹着气，带着悲愤和绝望的表情。但是他们不能够注意到周围的一切了。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人，甚至这时候还有着两三百万人分担着他们的痛苦。他们默默地对望着，似乎说一句话，也很困难。

“我明天到青救来，”毕竟是刘波开口了。他说了这一句，似乎费了很大的力气，他不再停留，甚至不愿意再看他的同伴一眼，便匆匆走下人行道，虽然他差一点就会被一辆黄包车撞倒，但是他终于安全地到了法租界，更往南走了。

晚上八点钟光景鸣盛来找刘波。他的胳膊底下挟了一包东西。

“这包东西在你这里放两三天，”鸣盛说，就把那个布包递给刘波。刘波看了看鸣盛的脸色，知道形势还不十分紧急，便放心地接过布包来，放进床底下的皮箱里，锁上了。

“有没有老九的消息？”刘波站起来关心地问道，鸣盛已经

在那把藤椅上坐定了。

“他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了，”鸣盛严肃地答道，“恐怕会把他押送回去。总要关几年罢。”

刘波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也许还不是他们那种人的最坏的命运。然而黑暗的监狱、单调的岁月会使年轻人的热情枯死。那个人很少有机会健康地走回人世了。而且在他（刘波）的眼前那个瘦脸的朋友将永远地消失，他不能够再听见那种沙哑的声音。这是一个打击。在他这一天受到的种种打击之上，现在又加了这一个。他有点木然了。

“不过他们似乎还不大清楚老九和我们的关系。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准备干的那件事情，”鸣盛又怀着希望地说。他接着又加一句：“所以我们还是要实行那个计划，早些干掉他。”

“那么让我给你们帮忙，我也要干点事情，”刘波突然爆发似地央求道。

“你真有这个意思？”鸣盛疑惑地问道，他的眼光在打量刘波。

刘波渐渐地静下来，他恳切地说：“你去跟他们商量，让我也参加这个工作。我只参加这一次。不过我一定尽我的力量。”

鸣盛站起来，拍拍刘波的肩头，说：“没有问题，你放心。我们正打算找你帮忙。”

“那么你答应了？”刘波惊喜地说。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的影子在门口出现了，刘波掉头唤

了一声：“素贞。”

素贞看见房里还有别人，便在门口站住不走了。她红了脸，不作声。

鸣盛也看见了素贞，他又轻轻地拍一下刘波的肩头，低声说：“我去找他们商量。事情决定了再通知你。”他经过素贞的身边，略略点一下头。素贞连忙还礼，但是他已经走到楼梯口了。

“你怎么这样早就出来？我还打算十点钟到医院去接你，”刘波带笑地说。

素贞走到刘波身边，抓起刘波的一只手，激动地说：“我们医院就要搬家了。他们要我去，说是护士太缺乏。”

“你去不去？”刘波着急地插嘴问道。

“我去倒想去，只是我不愿意离开你，”素贞低声答道，她抵抗不住一阵感情的袭击，便把身子靠在刘波的身上，伸出两手去按他的肩头。她不想再说话，只愿意紧紧地偎着他，拿他身体的热气来温暖她的心。她的心里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渴望。她渴望着他的爱，她害怕会有一种力量来把她跟他分开。

“素贞，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刘波柔声安慰道。他看见她不答话，便捧起她的脸来。两只大眼睛晶莹地在发亮，泪水明珠似地沿着脸颊滴下。是那样纯洁的少女的脸，是那样渴求爱情的脸。两种互相冲突的感情在刘波的身上斗争着：一种利他的、想帮助人的感情，和一种想占有的激情。他忘了一切地捧着这张脸狂吻起来。

激情在燃烧，这好象一堆旺火，在发过高热以后便开始慢慢地消散了。没有炮声来打扰它。稀落的枪响在这时也没有多大的力量。激情在烧毁自己，终于成为灰烬而灭了。

刘波放开素贞。素贞也离开了刘波的怀抱。她柔情地看他，忽然带了喜色地说：“我们一块儿离开上海好不好？我跟着医院走，你也到内地去。在内地一样地做工作。……我真不愿意在家里，在上海住下去。”她说到最后，又想起在上海家里的日常生活，她烦厌地皱起眉头。

刘波不回答，他一面望着她，一面在思索，他在考虑她的提议。

“你真的去吗？我们一块儿到内地去。我就去医院对院长讲好，”素贞又挨近刘波，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她看见他不说话，还以为他表示同意了。

刘波迟疑一下，摇摇头苦笑地说：“我现在还不能走。我在这里还有事情。不然我倒很愿意跟你一起走。”

“你可以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你在内地也可以做工作。很多人都到内地去，你为什么不能走？”素贞兴奋地辩道。她觉得刘波应该同意她的看法，她还以为她可以说服他。这是突然在她的眼前闪耀的一线希望，她要抓住它，不让它飞走。

“走的人多了，留下几个人在这里也是好的，”刘波淡淡地说，他的脸上并没有显著的表情，上面的话好象是顺口说出来的。他带着痛苦的表情望着素贞，眼光是温柔的，似乎这眼光里也含着深的感情。他忽然把她的一只手举起来放在嘴上吻了一下（她默默地让他这样做，却不知道他这时的心情）。他亲

切地唤一声：“素贞，”他看见她怀着柔情地对他点头，他努一下力，声音略带颤动地说：“我很愿意跟你一起走。你应该知道我的心。……”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我在这里的工作并没有完。大家都忙着，我怎么能够放下工作到内地去另找事情。……”

“那么我不走了，我留在上海陪你，”素贞突然热情地打岔道，她用那么温柔的眼光看他，她亲密地紧紧挽住他的膀子，站在他的身边。

刘波侧过脸感激地看素贞，他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他把下面一句话轻轻地送进她的耳里：“你对我这样好！”素贞没有回答，却把他的膀子挽得更紧。他又爱怜地看看她，提高声音再往下说：“素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还是先走罢。”

“为什么要我先走？我愿意陪着你，”素贞故意撒娇地说。

“因为医院里需要你们这些护士，”刘波鼓起勇气，大声说。“你不去，就是放弃你的责任。你看连文淑也到前线去服务了……”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素贞突然气恼地撅起嘴问道，她把手从他的胳膊底下拿了出来。

“你不要生气，素贞，这也是真话，”刘波恳切地对她解释道：“我是不要紧的。你犯不着陪着我在这里受苦……”

“我爱你，这说不到犯得着犯不着，”素贞的怒气早已消散了，她相信他的诚挚和关心，但是她仍然打断了他的话。

刘波鼓起更大的勇气，抱着说服素贞的决心，继续对她解释道：“我不能够为了个人的安慰把你留在这里。而且这里又

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在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为什么不到自由的中国土地去？那些地方是需要你的。你留在这里，我实在不放心。况且你老早就表示过希望离开上海。”

“要走我们一起走，不然我就留在上海。这是我情愿的，你用不着责备自己，”素贞坚决地说。

刘波痛苦地摇摇头，他望着素贞含笑的脸，央求道：“素贞，你还是先走的好。你走了，我以后也可以去。我一定去找你。我决不会跟你分开。为什么定要一起走？在这个时候个人的情感不应该看得太重。倘使我们都做了奴隶，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会有什么幸福？有什么快乐？我们个人的幸福是跟大众的幸福，跟抗战的胜利连在一起的。倘使抗战不能给我们带来解放，你我也不见得就能够在一起！那么为什么我们目前就——”刘波愈说愈兴奋，热情从心底升起来，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取出来给她看，要她相信他的每一句话。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讲完，又被她打岔了。

“你真的希望我走？”素贞突然两眼含泪地低声问道。她不等他回答，马上又加一句：“要走恐怕很快，说不定就在明天。”她不敢再说什么，她的心在发痛。

“明天？”刘波脸色突然一变，痛苦地念着这两个字。他把头埋下去不看她，但是很快地他又抬起头来，望着她，说：“我一定会来找你，我决不能长久离开你。”他的声音颤抖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脸色惨白，下嘴唇皮上现出一排深的齿印。他又说一句：“我的心永远在你的身边。”

素贞轻轻叹了一口气。她迟疑一下，终于决定了，她说：

“那么你现在陪我到医院去。我也明白，‘八·一三’以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弄得家破人亡，我们不见得就能够免掉这样的命运。不过我相信毁不掉、分不开的还是我们的心。我走了，你也不会忘记我。”她说完，似乎完全丧失了勇气，不等刘波答话，就扑在他的身上，头靠在他的胸前呜呜地哭起来。

刘波抱着她的柔软的身子，温柔地安慰道：“我决不会忘记你。我有空就给你写信，不管你收得到收不到。”

“我还是希望你快点来找我，没有你我会寂寞——”素贞抬起头含着眼泪望刘波，她咽下了以后的话。

十 五

下午一点钟左右，素贞挽着刘波的膀子从霞飞路广州食品公司出来。人行道上显得十分拥挤，这里有不少匆忙的行人，也有好些人站在路旁，仰起头在看西南方天空中飞机的活动。发动机的声音，夹杂着爆炸声响彻了空际，这期间大炮又作为拍子似地不断地在叫吼。人叹息着，怒骂着，惊叫着。卖报的成人和小孩拿着报纸响亮地嚷着惊心动魄的题目，跑过马路，直往西去。在他们的后面追赶似地跟随着人的脚步和唤声。

“不晓得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素贞耽心地自语道，她没有听清楚卖报人的话。

“我也没有听明白。不过我想也不会再有什么更坏的消息了，”刘波痛苦地说。惜别的情绪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你听，又是炸弹声！这么响。一定很近！”素贞惊恐地叫起来。她紧紧地偎着刘波。

“我们还没有吃饭的时候就炸起来，已经炸了一点钟了，”刘波愤恨地说。素贞不再作声。刘波忽然吐出一句呻吟似的话：“今天晚上你就不会在上海了。”

素贞侧过脸看刘波，她知道他这时的心情。她听从了他

的劝告和别人的劝告，她满足了自己好些时候来的渴望。但是在这刻她并没有感到快乐。她有的只是怅惘和痛苦。她觉得自己就要失去那个最可宝贵的东西——爱情，离别那个她最爱的人。并没有人逼她做这件事，是她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了的。她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是她觉得这仿佛是一场梦。她做这件事并没有多少热情，却象是在尽义务。她现在并不后悔，只是带点惋惜地对刘波说：“我的心是不会走的。”

“我晓得，我晓得，”刘波接连说了两次。

两个人默默地在人丛中穿过，走了一阵，素贞又说：“想不到我倒比你先走。其实我当初简直没有想到我会离开上海。”

“上海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地狱，你早点走了也好。这个地方真不值得留恋，”刘波用这样带愤慨的话安慰素贞，他不愿意用离别的情绪折磨她。

素贞叹了一口气，痛苦地说：“但是还有这么多的人留在上海，我怎么能不留恋这个地方？……”她停了一下，又用更低的声音加一句：“我更不放心的是你，”再补一句：“我耽心你一个人，你的工作。”

刘波觉得一阵鼻酸，他连忙忍住悲痛，他不愿让她看见他的一滴眼泪，故意做出平静的声音说：“你放心，我也知道谨慎。我等到工作告个段落就来找你。”

“你很快地就来罢。不是说青救要搬到南京、汉口去吗？你们也应该早点搬。我到了安徽，马上给你打电报来，那个时候你也该动身了，”一个念头忽然飘进素贞的脑子里，她的脸上绽出了一丝微笑，她带着希望地拉拉他的膀子，急切地说。

刘波又掉头看看她，这张纯洁的脸象磁石吸铁那样地吸引住他的眼光和他的心。他亲切地答道：“我得到你的电报就动身。我在安徽、汉口都可以做事情。我不会在上海久住的。”他这时并没有打算离开上海，也没有想到去安徽。他说上面的话只是为了安慰她。

“那么我们年底又可以见面了，”素贞有点高兴地说；“你要去汉口，我也跟你去，我可以在伤兵医院里做事。我们也可以象在上海那样常常见面，而且我们还可以……”她不再往下说，却在继续做梦，一些美丽的幻景在她的眼前掠过，她也不去抓住它们。

刘波凄凉地微笑了。他知道素贞在做梦，他不忍打破她的那些梦境。他用怜悯的眼光（怜悯她，也怜悯自己）看她：那张脸在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眼睛又象明镜一样的秋水。再见的快乐掩盖了离别的悲痛。在那里闪耀的是将来，是信仰。虽然这只是一时的景象，但是它也把他深深地感动了。他想向她倾吐这时在他身体内奔腾的情感。他想帮助她建造她的梦境。他望着她。他正要开口，有人在后面重重地拍一下他的肩头，他吃惊地回过头，正看见鸣盛的肥大的手掌从他的肩上拿下来。那张年轻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一个急促的声音说：“我刚才到你家里找过你。”

“什么事？”刘波带着紧张心情低声问道。

“事情决定了，你跟我去，”鸣盛命令似地低声说。

刘波发楞了。这句话象一个晴空霹雳地打下来，使他失掉了自制力，他心里没有定见，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怎样回

答鸣盛才好。

刘波的迟疑不决的神情并没有逃过鸣盛的锐利的眼睛。他不了解刘波的心情，他觉得刘波的发楞是一种完全意外的举动。这使他有点不满意。他把眼光移到旁边素贞的脸上去（素贞带着好奇的眼光在看他，这时触到他的眼光，她马上不好意思地把脸掉开了）。然后他又望着刘波，问道：“怎么样？你去不去？”意思是：“是不是还要陪你那个女朋友玩？”

刘波明白鸣盛的意思，他受窘似地微微红起脸来，他看了看素贞。她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他不能够在这时候离开她！他决定了，便诚恳地望着鸣盛说：“等一会儿我来找你行不行？她今天就要跟着医院走了。我现在送她到医院去。我就只送她到那里。”

鸣盛把眼光又移到素贞的脸上去，这个纯洁的少女寂寞似地悄悄站在那里。她也在为着民族解放的事业尽力，她也贡献出个人的感情！他感动地微笑了。他伸出手把刘波的膀子轻轻捏了一下，温和地说：“不要紧。你到医院去了回来也好。我告诉你地址。你早点来。”他把地址对刘波说了。

“我一定来，我一定来，”刘波高兴地接连说。

鸣盛笑了笑，又嘱咐一句：“你记住，过了三点钟就找不到人了。”他把手一挥，就走下人行道，穿过车辆往来不绝的马路，消失在对面的人丛中了。刘波和素贞都用眼光去追他，却已失掉了他的踪迹。

“什么事情？”素贞关心地问道，“很要紧吗？”

刘波点点头，他的心情立刻变成严肃的了，他低声答道：

“一定是开会，也许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并没有说假话，不过他对她隐瞒了一些事。

“你不会耽误罢，”素贞耽心地说，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他。

“不要紧，现在才一点半钟，”刘波看看表回答道，他还用平静的眼光去安慰她。

“怎么就一点半了？这样快？”素贞改变了脸色，痛惜地低声惊呼道。

刘波知道是什么思想使她痛苦，他看见这个少女脸上的拘挛，这同样的思想把他也抓住了。在这时候跟一个亲爱的人分别，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也许是永别，他以后也许永不能和她再见，这是可能的。他知道事情比她多，也看得比她远。她没有想到永别，她有时还沉溺在梦境中，只有他才看见她的那些梦境是何等模糊。她这时就被离别的悲痛压倒了！以后还有那些未知的长的岁月！他应该拿什么来安慰她？同时他又能够拿什么来安慰自己？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素贞。”但是他又想，两个平凡的青年在这个艰苦的时代中，为着一个伟大的事业，献出个人的微薄力量，忍受个人的痛苦，他们遇在一起，互相安慰，现在又分开，拿再见的希望来互相鼓舞——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这里面并没有不公平，也没有残酷。这是他们同辈的青年的普遍的命运，也许还是较好的命运。他终于鼓起勇气来回答她那求助似的眼光道：“时间是过得很快的。也许我们不久就会再见。”

“但是我们分别的时间就到了，”素贞怅惘地说。她感到

一点空虚，再见的时间似乎隔得太远了。

“这也是没法的事，”刘波叹息地说。这时他们走过一个大的弄堂口，听见了一阵嘈杂的人声，许多妇人和小孩提着箱子，抱着被褥，抬起憔悴的苍白脸，惊惶地在叙述逃难的经过，有的人流着泪放下仅有的财产，就在水门汀地上坐下了。从一个穿短袄的少妇的口中，刘波听见了这样的话：“真作孽呀！就让他炸！只要我们有几架飞机，几尊高射炮也好。”刘波的心猛然大跳几下。这也是同样的中国百姓，难道单单她们应该遭受侵略者暴力的蹂躏？一个受难者的话在他的耳里变成警钟了。他似乎打了一个冷噤。他严肃地补充一句：“在这个时候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付出代价。”

“我晓得，”素贞点一下头说，但是她又反抗地加一句诉苦的话：“不过我一生就少有快乐的时候。”

一句熟习的话陡然浮上刘波的心头：“我们不是生来求快乐的。”但是他知道素贞的身世，他了解她这时的心境，他不能够拿这句话来反驳她。他只能编造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话：“你以后就不会再有痛苦了。”

素贞不回答，她仍旧用她那带着怅惘与痛苦的低声说话，她说：“我还不及文淑，她走的时候你还可以送她上车。我走，你只能送我到医院门口。”

刘波答不出话来，他的心开始发痛了。

“这半个月来，我仿佛做了一场梦，”素贞自语似地继续说，“我这个人太矛盾了。昨天匆匆决定跟着医院走，我也明白你说的道理不错。今天先前我还是高高兴兴的，现在临到

快动身的时候，我的心倒飘摇不定了。我有点害怕。……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耽心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可是我又觉得你说得对，我也应该为我们民族尽一点力，医院要我去，我不该躲开。……可是我走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结果？你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我的心真放不下……我现在真不知道要怎样才好……”

这些话一字不漏地进了刘波的耳朵，他还看见她频频用手帕揩眼睛。她把他的眼泪也引出来了。他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残酷的人。他不能抹去他的爱，压下他的同情。他不能够冷静地用一篇大道理来封闭一个寂寞的女孩的口。而且在这以外，他自己还有被压下的激情，和不曾满足的渴望。公和私、义务与感情又在他的心里起了激斗。在这中间他只能重复地说着安慰的话：“素贞，不要难过。”直到后来内心的斗争停止了，他渐渐恢复了勇气，他才用平静的声音对她说：

“素贞，不要太想到个人的事情，那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你多想，只是白白苦了你自己。”他停了一下，炸弹爆炸声打岔了他，后来他又说：“在这种时候，一个人两个人的安全是太渺小了。你听，这颗炸弹又不晓得会炸死多少人！哪个人又能够保定自己的安全？只有我们民族是要活下去的，我们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我们的抗战会得到胜利的！”他这时不象是在对素贞一个人讲话，他仿佛在对许多动摇的同胞演说，不，他好象是在对那些飞机大炮发出抗议的呼声，他有一种激昂的心情。“我们为什么不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

面？我们民族是不死的，我们多想到我们民族，想到民族解放的成功，我们哪里还会放心不下！即使个人会死，民族却可以永生。……”他说到这里，信仰的光辉透过泪眼射到素贞的苍白色的脸上，平静的（其实是带一点兴奋的）微笑在他的清瘦的脸上出现了。这时医院的篱笆门就立在他们的面前，他看见那里停着几辆汽车和卡车，人匆忙地从篱笆门进出。这离别的时间并没有带给他悲痛和怅惘，他相信这篱笆门（甚至任何别的东西或力量）不能够把他们分开，而且他又记起了前一天从她的嘴里吐出来的那一句话，他立刻接下去再说：“素贞，你不记得你自己昨天说过的话：毁不掉分不开的还是我们的心。为什么要害怕这短时期的离别？”

素贞最后抬起头来，她知道离别的时间到了，她紧紧地捏住刘波的两只手，她用力说：“我相信你的话，我会慢慢平静下来的。我以后放得下心了。我会好好地安心做我的工作。……你回去罢。我现在好了。我会等你。我会永远记着你。”在泪痕狼藉的脸上微笑象一朵花似地慢慢开放了。

十六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爆竹似的枪声震动了法租界居民的心。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南市在敌人的进攻中英勇地作最后的挣扎了。

刘波坐在亭子间里用了绝大的努力镇压下自己的烦躁和痛苦，把他的思想放在面前摊开的稿纸上，他在为子成他们的联合刊物写一篇文章。这是一篇重要的宣言和表白，准备在那个重大事情发生以后使用的。一切的计划都决定了，而且是根据着确实的情报决定的。刘波兴奋地接受了派给他的工作。这篇文章便是工作中的第一件。他们交给他一个大纲，他现在用慷慨激昂的话把那些意思表达出来。他自己的心渐渐地进到文章里面去了。沉痛的历史和英勇的斗争使他的心猛跳，使他的血沸腾。……但是接连不断的、十分响亮的枪声打岔了他。那些机关枪、那些步枪，没有一次是白放的。这也是英勇的斗争，沉痛的历史！……而且现在要轮着他来目击、身受了。悲愤的思想似乎在他的脑子里结成了一块铁一般的東西。他感到一阵重压。他放下笔对着糊上白纸的玻璃窗发楞。

房门半开着。他听见房东太太在楼下着急地嚷，她吩咐娘姨快去小学校接回她的孩子。他还听见那个中年的胖太太

绝望地呼吁：“东洋人要打进租界里来了！大家往什么地方跑？……”他痛苦地蒙住两只耳朵。

一声枪响惊动了他。这颗子弹似乎就落在前面天井里，声音是那么清脆。他放下手，掉头四顾。房间里仍旧和先前一样。只有楼下的房东太太嚷得更厉害了。从隔壁送过来女人的叽叽喳喳的话声。

接着是同样的第二声枪响，第三声。他的房间里仍然很安静。机关枪又在较远处密放了，中间还夹杂着小炮声。于是整个弄堂都在动了，到处都是人声：许多人在嚷，在说话，在奔跑。

“我出去看看，”刘波自语着，就站起来。他的手一动，无意间把一张纸推到地下。他连忙俯下身子拾起它来。那是永言的字迹，就是那篇大纲。他说了一句：“他们下午就要。”他的心情变得更紧张了。他马上又坐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赶快写完它再出去。”他用了绝大的努力，埋下头，又把心放在纸上，拿起笔，急急忙忙地写下去。

枪声继续响了二三十分钟，又渐渐地静下去了。嘈杂的人声也逐渐地消失。刘波始终努力地写着，他有时候还激动地低声念出一些字句，有时候忽然抬起头嘘一口气，或者带着愤激的眼光往四处看。他的脑子发热，他的心也发热，一种无处发散的热情，一种无处宣泄的怨愤充塞在他的心里。他把这一切全发泄在纸上。他的文章写成，他的力气似乎也竭尽了。他疲倦地叹一口气，就站起来，把文稿塞在衣袋里，锁上门，匆匆地走出去了。

下午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刘波站在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门前等候子成。这是第一场影戏开始的时间。到这个头等的电影院来的大半是西洋的观众，其中也夹杂着少数衣服整齐的中国绅士和艳装的华妇。他们走到门前或者从汽车里出来，并不在人行道上停留，就匆匆走进去了。也有少数人立在门前等候伴侣。

没有人注意到刘波，连在影戏院门前徘徊的白俄巡捕和华捕也把他当作一个在等候伴侣的观众。但是他的心并不在这里，他想的是另外地方的事情。他有时也掉头看他的周围，然而他用的却是一种奇异的、带憎恶的眼光。

观众继续地来，西洋的夫妇，高等华人男女，……这里面却少有中国的青年。戏院里廊上的灯光突然灭了，已经到了开演的时刻。人渐渐地少起来。刘波突然觉得地方空阔了。他便走两步，转身看墙壁上的广告。《红楼双燕》，四个触目的红色大字打进了他的眼帘。他霎霎眼睛，又瞥见“香艳滑稽巨片”一类的字眼。他愤激地想：上海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他的旁边人们在享乐，在电影场中轻松地发笑；同时在另一个地方，跟这里只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在哭诉、在呼号、在受蹂躏、在跟死亡挣扎、在贡献生命。这是他不能了解的！这是他不能忍受的！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了，这是从东边来的，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连忙向着那个人走去。

来的是穿一身崭新西服的鸣盛，他走到刘波面前，低声

说：“子成要我来的，你跟我走。”他不再说什么解释的话，就把刘波引到国泰电影院里面。他让刘波坐在走廊里沙发上等候他，便走进那个木笼似的公共电话间去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鸣盛回到刘波的身边，他就站在那里跟刘波讲了几句话。然后两个人一起出来，沿着霞飞路往西走去。

他们谈着话走过亚尔培路，他们走近那一块作过煤厂堆栈的空地，一个意外的景象使他们惊愕地站住了。在那个篱笆门前停着一辆大卡车，一群徒手的中国兵士被两个手执短棍的法国巡捕押着陆续跳下车来，站在人行道上，等候搜查。两个兵跨过了篱笆门，就站在门口让安南兵和法国巡捕解开制服，仔细地在衣袋里搜来搜去。门口有一张条桌，条桌旁泥地上放了一堆东西，那里有钱包、有笔记本、有小刀、有各种随身带的物品，都是在中国兵的身上搜出来的。搜查过后，两个中国兵就被赶到里面去了，另由新来的人填上他们留下的地位。

这块空地上已经容纳了很多的人。刘波和鸣盛只看见光头和制服，只看见那些带怒容的年轻面孔，他们却数不出那些人的数目。

刘波站在人行道上，呆呆地望着篱笆门内的景象。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小兵被搜查时那张端正的脸变得通红，嘴闭得紧紧的，自己心里更加难过。恰恰在这时，有两个陌生人在他的背后谈话：“说不定有两三百，也有保卫团和警察。听说这是命令啊。我在南阳桥那边看见，有些兵丢了枪过铁门时还掉眼泪。也有人走到铁门口听说要缴枪，又转身跑开了。”另

一个人接口说：“是啊，好象囚犯一样，电车、汽车一车一车地装进来，哪个中国人看见不伤心？”

刘波突然觉得鼻子酸痛，连忙咬紧了嘴唇，两只垂下的手捏成了两个拳头。法国巡捕扬起棍子威胁地驱散聚在门前的行人，刘波仍然站着不走。鸣盛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走罢，我们还有别的事情。”鸣盛了解他的心情，拍一下他的肩膀，终于把他拉走了。

“我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不会忘记这一天，”刘波走在路上还激动地接连对鸣盛说。

他们到了鸣盛的新搬的家，在那里见到了永言和子成，谈了许多话，就把计划重新商定了。不用说，刘波讲话最少。这种事情他并不熟悉，他也提不出具体的意见。他只有一个决心：尽自己的力量，帮忙这些朋友做好这个工作。他也有点喜欢这种紧张的工作。他们从鸣盛的家又坐车到扬子饭店去，在六楼一个房间里他们见到了光韩。几个人就在这个房间里决定了第二天的计划的细节，他们仔细地研究了许久，不让这个计划有什么漏洞。

刘波从旅馆出来，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他转了弯匆匆地往南走去。他走过一些横街，两旁屋檐下或立或坐挤满了人，都是从南市逃出来的难民。他们只携带着零星的随身东西。没有住处，没有饮食，没有希望，只有尚未消逝的恐怖的记忆。他们象一群被遗弃在荒原上的迷路者，等着黑夜来吞食他们。

夜来了，这是一个凉夜，刘波忽然接连打了两个冷噤，他

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街头的那些受难的同胞，他带着憎恨地自语道：“我不会忘记这一天。”

他走进了法租界，夜显得更凉了。他急急地迈着脚步，一口气走到了家。他打开亭子间的门，扭燃电灯，觉得眼前突然一亮。他推开窗，对着黑夜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好象要把一肚皮的闷气吐尽似的。夜并不是黑暗的，天空中闪动着杏红色的光。南市在燃烧。这样的大火似乎延烧到他的心里。他离开窗前，疲倦地往床上一倒。但是他刚刚躺下去，马上又站起来，他站在这个寂寞的房间里，忽然发誓一般兴奋地自语道：

“我不走，我一定不走。我要守在这里。”

十 七

中国军队完全退出了上海。从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人们知道还有少数孤军，不肯离开自己的土地，在南市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默默地倒下了。南市还在燃烧，浓黑的烟笼罩着这个不幸的角落。通法租界的铁门全关上了。一道门就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在铁门里商店照旧开门，车辆照常飞驰，照旧有欢笑、有享乐、有温饱、有繁荣。在铁门外，却只有恐怖、饥饿、烈火和死亡。

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上，每一道铁门外面，都拥挤着若干不能到租界里来的难民，人丛中还有车辆、箱笼和杂物。人头在动，呼吁的声音飘过了铁门，从铁栅栏的空隙里伸进来若干黄瘦的手。

他们已经在门外站了两天了。没有食物，没有避雨露的屋檐，黑夜用寒气侵袭他们，阳光又使他们暴露在敌人枪刺的威胁下。他们忍受了痛苦和屈辱，怀着一线微弱的希望，哀求着铁门内同胞的援助，哀求着在铁门内挥动短棍的法国巡捕和安南兵打开铁门，让他们进来喘一口气，吃一顿饱饭。

法国巡捕和安南兵听不懂中国人的语言，他们的心也许是和铁门一样的冷硬，那些手不会放下木棍，去做一件合于人

情的动作。铁门始终紧闭着。对于中国难民的哀求，唯一的答复便是木棍的挥动。有些手敢于伸进铁栅栏来要求什么，但终于受到木棍的重击缩回去了。外国人的脸上现出了轻蔑的笑容。

然而铁门内的同胞不能够完全漠视受难者的哀求。他们的响应来了。他们抬了水桶，买了橘子，做了馒头、包子，送到铁门前面，从铁栅栏的空隙里把这些微薄的礼物递到受难者的手中。

每次食物一到，铁门外就起了一阵骚动，许多只手争先恐后地从空隙里伸进来。大家用各种各样的叫声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又是巡捕们使用木棍的机会了。有的手抓到一个包子，同时却带回红肿的伤痕。有的人带着尖锐的叫声将空手缩了回去。外国人的脸上又露出轻蔑的微笑。

刘波把这一切都看进了眼里。他没有掉泪，也没有咒骂。他有一种比悲痛和愤怒更深的感情。他觉得有一种火似的东西在烧他的心。他的心在跟着那些同胞经历痛苦。一种复仇的渴望，一种想诉于正义的渴望在他的身体内生长。他自己被挤在人丛中，似乎人们正从四面八方不断地跑来。他掉头往四面看，都是陌生的、同样带着痛苦表情的脸，在他前面一个人回过头来苦笑地对同伴说：“我们真是在隔岸观火。”

这句话刺痛了刘波的心。他想：大家都袖手旁观，这有什么用？他愤然看了看众人，又愤怒地用力搔自己的头发。但是他马上想到了他今天担任的职务，他觉得找到一件东西来镇静他那渴望复仇的心了。

一个钟头以后，子成也到过这附近。他在这里只停留了三五分钟，便往公共租界那面走去。他并没有刘波的那种心情。那些景象本来可以引起他的若干惨痛的回忆，但是一个主要的思想占去了他的心。那里没有多余的地位来容纳别的事情了。

子成从人丛中挤出去。他一直往北走，走了好几条街，才在一个商店门前停住脚。他整理一下西装大衣，又拭去额上的汗珠，然后掉头四顾。他惊奇地想：怎么还是这样多的人？他又往前面走，他故意在绕圈子，他走到了南京路。

街道仍然是拥挤的。人们匆忙地跑过马路。卖报小孩拿着号外奔跑叫卖，高声嚷着惊人的标题。一对年轻男女经过他的身边，留下一句话：“今天国泰的片子好，”这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他走到一家百货公司门前，看见一辆漂亮的汽车停在那里，车门刚打开，走出来两个艳装少妇和一个留唇髭的中年人，他们从容地进了百货公司。又是一班电车到了站。站台上的一堆人立刻疯狂似地拥进车厢去。在车头悬挂着大光明戏院放映名片的广告牌。这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它们跟他中间似乎隔着一道墙。他的心和那些人的心是不相通的。他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平静地生活。他不能了解他们这时有着什么样的心情。他觉得这个环境对他是陌生的，他仿佛到了一个新奇的地方。没有人会了解他。“是的，他们都不知道我，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他想着，不觉惨然笑了。但是他没有多的思索时间，思想在他的脑子里转动得很

快。他抬起头看看跑马厅的大钟，他知道现在不能耽误了。

子成转进横街。过了一条街，一个穿着崭新的人字呢秋大衣的男人迎面走来。这是永言，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到了？”子成激动地低声问道。永言点一下头，轻轻地叮嘱：“不是我，就是你。注意刘波的信号。不要错过。”永言若无其事地、扬长地走了。

子成轻轻地答了一句：“我知道。”他把手伸进西装大衣袋里捏着那件硬的东西。

到了旅馆门前，子成先朝对面那家烟纸店一望，刘波穿着整齐的青灰色西装立在街角，那顶八成新的呢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刘波的瘦脸上忽然露出了微笑，接着眼珠一动。子成知道刘波看见他了。“还没有动静，”他放心地想道。他又转到另一道门前。那里停着几辆汽车，光韩立在车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讲话。他的心猛然一跳。……

他回到他的岗位去。他刚刚转弯，就瞥见前面有一张熟识的面孔。他们的一个新近被收买了的同乡正挽着一个向导女郎扬扬得意地走上人行道来。他吃了一惊，连忙埋下头去。那个人只顾和身边的女人讲话，没有注意到他。他抬头看对面的烟纸店。刘波的脸庞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等到那个“败类”进了旅馆，他也在一个比较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站定以后，他再往那个地方看，刘波的面颜又在烟纸店门前出现了。同时象闪电似地，鸣盛的脸也在那边晃了一下。

子成仍旧立在旅馆门前，好象在等待一个朋友。人和车辆拥塞在马路中间。浓装的少女扭着腰肢嘻笑地从旅馆进

出。人在叫嚷、在谈论、在争吵。生命的流在他的眼前动荡。但是这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刘波头上的一顶帽子。

时间过得很慢。一分钟似乎比平日的一点钟还更长久。但是他能够忍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扰乱他的注意力。

又过了一会儿，附近汽车声大作。沉滞的空气给搅动了。子成本能地转头一望，没有看见人出来。他连忙掉回眼光去找刘波，刘波的帽子忽然揭下了。他马上扬起头用稳定的步子走过去。右手紧紧捏着袋里的那个东西。他刚刚走到旅馆门前。枪声意外地响了，是接连的三声。他吃惊地退后一步，脸上立刻现出了失望的表情。

在附近似乎发生了一个巨变。人疯狂地奔跑着、呼喊。喇叭声失常地乱鸣，汽车仓皇地往别处逃去，在这些杂乱的声音中间忽然响起来一声较长的口哨。子成知道是永言做完事情走了。刘波的影子也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他们发了信号要他走。他放心地吐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便做出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样子安静地往大街走去。

街上很乱，忽然好几个声音叫起来：“那个人！那个人！”一个巡捕在追赶什么人，后面隔五六步远又跑着一个巡捕，一路上在吹哨子。子成的心紧张起来。他看不见被追的人是谁，但是他可以断定逃跑的是永言他们中间的一个，而且他知道那个人不容易逃出警吏的罗网。这个念头使他打了一个寒噤。但是他的思想动得很快，他马上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也跟着追上去，口里也嚷着捉凶手的话。没有人注意

他。他看见前面那个巡捕正要转弯，他连忙拔出手枪对着那个人的阔背放了一枪。那个高大的身子立刻倒了下来。他一秒钟也不放过，接着又向第二个巡捕开枪。子弹虽然出去，但是已经迟了，他没有能够把第二个巡捕打倒，两颗子弹差不多同时从后面打进了他的身体。他的身子摇晃一下，带着从前面飞来的第三颗子弹倒在地上。他的身体挨到了地面，那支手枪才离开他的手。他似乎还在挣扎想站起来，然而又一颗子弹使他寂然了。

子成躺在血泊中，他的近视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不能够回答那些陌生眼光的注视。但是他终于离开了钢笔板，完成了他的志愿，得到永久的安宁了。

被追赶的人是刘波，他对这种事情没有经验，这天他又有一种古怪的心情，他走到旅馆门前去看永言的成绩，不当心被人误认作凶手。然而他毕竟在意外的枪声中安全地逃走了。

十 八

那个自以为征服了上海的侵略的势力，从此失掉了一个得力的爪牙。它知道这次的暗杀不过是一个信号。它动员了它的全部特务工作人员，也不能够发现第二个“阴谋”。但是它知道上海人的心是没法征服的。

关于这个政治暗杀事件，捕房除了子成的沉默的尸首外，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但是子成临死前的决心，终于被他的几个朋友知道了，而且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其中对子成怀着更深的感激的是刘波。

素贞的电报来了，她要刘波离开上海。他却毫不迟疑地回信说，他愿意留下工作。

在刘波的信里还有这样的话：

住在上海的并不止有我一个，这里还有几百万的中国儿女。国土沦陷了，但是人民还活着，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丝毫没有在敌人势力下面低头的心思。我愿意为他们工作，而且我更应该参加他们的工作。……

刘波在信里不止一次提起的“他们”，不用说，都是指上海

的人民。关于子成的死他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因为一则他不便写；二则，他以后就不曾继续参加鸣盛他们的活动。但是他永远忘记不了子成的面貌。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让素贞知道这个朋友的事情。

后 记

《火》第一部十八章是我的试作。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在广州写了这小说的头三章，后来敌机连续的大轰炸使这小说中断了。九月我从汉口回到广州，续写了第四章（即现在的第八章），不久敌人的军队就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发了。十二月我在桂林的大火（这是敌机投下的烧夷弹引起的火灾）中继续写了第五、第六两章（即现在的第九第十两章）。今年七月我在上海刚写好第十一章，敌人的大搜查就阻止了我的写作。现在我终于在昆明把《火》第一部写成了。

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中国的希望。老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但是看看写完的十八章，自己也觉得这工作失败了。也许我缺少充足的时间，也许我更缺少充分的经验和可以借用的材料（几年来我搜集的一点有限的材料都在上海散失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替自己的浅陋辩护。我也没法多找一些托辞来要求严正的读者的宽宥。

然而这小说（第一部）的完成也给我自己带来一点愉快。我毕竟做完了一件工作。而且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

有机会，对我的几个异国朋友表示了敬意。我想努力绘出他们的面影，但是我知道我把他们的主要的精神失掉了。对这个我应该表示歉意，我希望将来我还能够弥补这个缺陷。

我还应该感谢这几个朋友，他们有意无意地供给了我一些材料。《阿里朗》的歌词也是他们抄给我的。

另外一个朋友给我供给了伤兵医院的材料。那全是她亲身的经历。我自己虽然“走马看花”地参观过两个“救护医院”，但是我看到的也只有表面的设备。那个朋友的叙述倒给我那一章小说添了不少的真实性，我应该感谢她。

最后我还要感谢这里开明书店的L先生：他不但给我安排了一个舒适的住处，使我能够安静地写到深夜，他还替我抄写了一部分的原稿。没有他的帮助，我不会这么快地完成这个小小的工作。

这一部以后当然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有动笔的机会，不过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

巴 金 1940年9月22日在昆明。

^① 不用说，我后来改变了计划。关于刘波在上海的活动这一部分，我始终不曾动笔。

第 二 部

《火》(第二部)，一九四一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初版，
迄一九五一年七月，共印行十一版(次)。

—

“我就要回来的，我就要回来的！”一个带哭的女性的声音从满屋子沉重的鼾声中挤出来，它在屋子里乱撞乱奔，好象在艰难地找一条路，要从一个“枪眼”飞出去。没有人阻拦它，这声音终于远走了。屋里仍是一片窒息人的沉闷。鼾声接连地堆积起来。这中间夹杂着可怖的磨牙齿的声响。屋子里的黑暗开始在褪色，但是那搔着人心的臭味却继续增加。

于是“哇”的一声，一个人哭了。还是那个女性的并不响亮的声音。在屋角一只白的膀子把铺盖掀起，在空中挥动了两下。一个披着浓发的头突然抬起，跟着坐起来一个穿白色内衣的年轻女性的健康身体，她一只手抓住铺盖，一只手慢慢地揉眼睛。

“文淑，你在做什么？”这是从旁边的被窝里发出来的一句问话。一张盖着一头短发的少女的脸庞动了一下，两只眼睛好奇地望着她的同伴。

冯文淑猛省似地拿开手，掉过头来看这个还躺在被窝里的同伴，轻轻地说：“我做个梦，我哭了。”

听话的人失声笑起来，开玩笑地责备道：“你又在想家了，真没出息。”

“呸！哪个想家？人家梦到我妈妈……”冯文淑着急地辩道。她不说下面的话，却俯下身子去拉同伴的铺盖，一面说：“快起来，欣，你还睡着干什么？”

“天还没有亮。昨晚睡得迟，大家都没有起来，我们还是躺着讲话罢，”虽是这么说，周欣却也坐起来了。

“还没有亮？你眼睛生来做什么？不要管他们。我们两个出去走走。空气实在闷得很，我受不了，”冯文淑说，她摇了摇头，伸起两只手把长头发拢在一起，用力往下一抹，然后拿过昨晚折好放在旁边的军裤穿起来，把一双袜子就塞在裤袋里。

周欣看见冯文淑站在被褥上穿衣服，只好也起来把衣服穿好。她在冯文淑的膀子上轻轻捏了一下，抱怨道：

“你这种脾气，改不了，总不肯依别人的话！”

这时从那些方形的“枪眼”里射进来的阳光已经赶走了黑暗。屋子里的景物完全显露出来，不过好象还罩上一层雾似的。摊在地上的铺盖和毛毡盖着一些年轻的身子，带着各种表情的脸都露在外面。鼾声减少了。有人在翻身。也有人在咳嗽。一张脸略略抬起来，向她们这面望了望，又默默地倒下去。

冯文淑和周欣都睡在一个角落里，在她们旁边靠里，还有两个被黑发掩住半边脸的头，她们静静地不作声。冯文淑和周欣弯着腰在叠铺盖，似乎也没有把她们惊醒。两个人轻脚轻手地穿上鞋子，在自己的小皮箱上拿了各人的毛巾、牙刷、牙膏、漱口杯、肥皂等等，把它们卷在一起，就轻轻走过那一段挂着一块蓝布、隔开男女同志睡处的空地，到了楼梯前面。忽

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后面追着问：“你们到哪里去？”

“洗脸，”冯文淑简单地回答。周欣没有做声。她们知道谁在发问，都不曾回过头去。冯文淑先下楼，周欣跟在后面。冯文淑刚踏过最下一级，就听见一阵军号，便加快脚步，跑到门前。周欣也赶来了。两个人把大门打开，一阵新鲜的阳光带着雄壮的军号声迎面扑来。

冯文淑的头差一点要撞到门上了，但是她不注意这个。她愉快地往外面一跳，仿佛奔赴军号的召唤似的。她在土坡上跑了两步，把身子摆动几下，摇摇她的头，让她那云浪似的漆黑的浓发在清晨的微风里飘来卷去。她挺起充实的胸脯去接受带着香味的山野的新鲜空气。

在冯文淑的旁边站着周欣。她的脸上也带着满足的喜悦的表情。她的眼光忽然转到同伴的头发上，不觉赞叹地说了一句：“你的头发真好看。”她自己的头发却剪得短短的，和男孩子的极相象。

“那么你的头发为什么又要剪成这样？”冯文淑掉过头，指着周欣的短发说。

“我觉得方便些，”周欣直率地答道，她无意地伸手在自己的头上摩了摩，一种轻快的满意的表情浮上了她的脸。她挨近冯文淑，把左手伸过去搭在冯文淑的肩头，脸颊挨到冯文淑的柔软的发上，两只眼睛欣赏似地眺望着眼前的景物。

左边是一重一重的山，一重比一重高，最高最远的山峰就仿佛贴在发亮的淡蓝天幕上，和云彩挤在一起。从黄的山到灰的山，到那和山峰相似的灰色云片，这个少女的眼光在一瞬

间就跑了一个来回。云在移动，在变颜色，灰暗的亮了，深色的淡了。只有山影是不动的，而且一道金边开始镶在那上面。

“我喜欢留长一点。我觉得留这样的头，穿军服更好看些，”冯文淑解释地说。

周欣含糊地应了一声。她并不反对冯文淑的意见。她还在移动眼光，从近的黄黄的山又移到山坳中去。在那里一片凸出的红色留住了她的眼光。在周欣的眼里，这红色并不是陌生的，在这个碉堡中她虽然还没有住上半个月，这一带枫林就已经深印在她的脑子里了。她每次走上山坡，她的眼光就要去找它，在树木中她最爱枫树。在她的家乡，山坡上或者小溪边常常生着这种有美丽的三个尖的叶子的树。她看见大自然把树叶一片一片地染红，又看见风把红透了的叶子吹落在路旁或者溪沟中、白石上，有时她也拾起几片来夹在自己喜欢的书页间。秋天她和同伴们登山，在铺着绿毡似的山坡上，常常惊喜地发见一团团银珠绘就似的红叶。她极爱这幅天然的图案画。如今在这远隔家乡的北方的山镇中，她觉得好象有一只大手不厌烦地把一团一团的砾砂全为她从那巨幅绿毡里拔出来移植到这里，堆成一丛一丛的枫林，一簇一簇的红叶，来点缀平静的山景，并且为年轻的心灵添一点鼓舞的活的颜色。

周欣的眼光愉快地沿着山坳跑，它跟着枫树转弯倒拐，虽是匆匆的一瞥，但是它不会遗漏什么，连枫林中稀稀落落的两三平屋，也不曾逃过这个少女的注意的眼睛。

碉堡里哨子突然清脆地响起来。周欣的眼前也突然发亮了。太阳驱散峰顶的云片，带着金红光从山后爬上天幕。它

那普照一切的光辉迅速地往四处散布，枫叶立刻给镀上一层金，炉火似地燃烧起来。

冯文淑听见哨子声，忽然省悟地对周欣讲一句：“我们快走，他们起来了。”她摆脱身子跳跃地移动脚步。她张开两手象一只鸟张开翅膀似地往右边下坡的路跑去，她跑得快，也不等候周欣，只是回头看了看，欢呼似地嚷着：“周欣，快来呀！”

周欣从枫林上收回眼光，她连忙转过头，看见冯文淑的鸟飞似的下坡的身子，她笑着大声应道：“慢点跑，等着我呀！”便拔起脚用跑步追上去。

她只顾追赶冯文淑，却没有留心有人从碉堡第一层楼的“枪眼”里发出了唤声，也没有看见从“枪眼”里追出来的一个年轻人的热烈的眼光。

两个人追逐地在黄土路上跑着。路不宽，转弯不大，一直往下倾斜，使她们的脚步容易轻快地滑下去。冯文淑跑着，不时回头去看后面，看见周欣离她有十多步光景，便鼓舞地催促道：“跑呀！快点！”冯文淑跑了一段路，看见周欣还没有追上，便在一座孤坟旁边松树下站住了。她带笑地在嘘气，拿手里的毛巾揩去额上和鼻上的汗珠。等到周欣赶了上来，她一把抓住周欣的膀子，满意地说：“欣！你跑不赢我，我们还是慢慢儿走罢。”

“哪个跑不赢？你又‘阿Q’了。我们再跑跑看！”周欣故意不依地说。但是她却亲切地挽住冯文淑的膀子，不让她跑到前面去。

“好，我也不同你争了。大清早就跑出一身汗也犯不着，”

冯文淑笑答道。

“我还好，我不象你，我又没有用力，也没有出汗，”周欣说。

两个人手挽手地往前面走了。她们经过一丛矮树，听见里面有索索的声音。冯文淑侧过脸看了一下。周欣的一句话引起了她很大的兴趣，她故意带怒地大声回答说：

“呸，哪个还有功夫谈这种事情！我要是连这种男人也要，我已经有几十个了。”

“啊，好大的口气！”周欣挖苦似地说一句。她噗嗤笑了。

冯文淑不依地辩道：“你不要说我。我看王东对你也不错，前天在工作批评会议上还把你恭维一通，他倒不觉得肉麻。”

周欣对着冯文淑霎霎眼睛，笑起来：“你看，你就着急了。王东这个家伙看见女同志就追。方群文最讨厌他。她总说他是道地的小开。她本来要在前天的会议上把王东结实批评一下，后来不知怎样又没有说什么，大概是看见时候太迟了。”

“人家本来是小老板啊。这次算是王东运气好，方群文的嘴是不肯让人的，”冯文淑笑着接口说。

她们已经走完山坡，到了平原。前面横着一片黄绿色的稻田，田畔稀落地点缀着白杨和矮林。她们走进一条岔道，略微转个弯，就到了一条小溪旁边。溪水带着轻微的私语缓缓地流动。水上浮着晨光，清莹地映入她们的眼里。溪畔好几棵大树，其中有三棵丹枫。

冯文淑看见溪水，两只细小眼睛象发见宝物似地欣喜地

发亮了。她马上摔开周欣的手，带跳带跑地到了溪边，就蹲下去。她的手在清凉的溪水里愉快地动了几下，然后舀了水起来漱口，又绞起毛巾用力揩了脸和颈项。好象一阵凉风吹入她的肺腑似的，她感到十分爽快。她擦了肥皂，洗了脸，又用毛巾揩干净了。

冯文淑还在溪边搓洗毛巾。周欣却已收好洗脸用具，在枫树下一块石头上坐了，她仰起头看枫叶，一面低声哼起一首歌。冯文淑抬起头看她，这张小孩似的面孔上有一种带幻想的表情，似乎这红叶引起了她的一些回忆，带着她的思想走了很远的路程。冯文淑忍不住笑了，用清脆的声音唤道：“周欣！”

周欣慢慢地移下眼光，望着冯文淑似乎在问：“做什么？”

“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在做诗？”冯文淑笑问道，她看见周欣不回答，只是略略摇头，便向周欣招招手，亲密地说：“过来，我们来洗脚。”

周欣果然走到冯文淑旁边。冯文淑在溪边坐下来，从袋子里摸出一方蓝地白花的丝头巾，束在头上，在颈项间打一个活结，把头发全盖在里面。

周欣笑起来，一只手搭在冯文淑的肩头，责备似地说：“怎么你连这种东西也带出来了？”

“是我妈妈买给我的，我昨天刚刚从箱子里找出来，”冯文淑答道。她一面在脱鞋子挽裤脚。

“怪不得你昨晚上要做梦，”周欣同情地说。她的笑容慢慢地沉下去消失了。在这小溪边枫树下，她忽然看见了那个慈祥

的面颜，想起了临走时对自己母亲说的话：一定要回来的！这一年来（已经有九、十个月了）她哪里起过回家的念头，她唯一的思想就是把自己年轻的精力完全花在抗战上面！只有偶尔在空闲的时候，母亲叮嘱的话才飘上她的脑际。今天冯文淑的一两句简单的话，冯文淑的梦，把她跟母亲分别的情景给她带回来了。这情景使她痛苦。……她对自己说：我今天要给姆妈写封长信……

扑冬一声，水花溅了上来，接着是“辟亚”、“辟亚”的声音。两只雪白的脚在水里互相打击。母亲的脚消失了。周欣看看水，看看四周，无可如何地叹了一口气。

“你在想什么？怎么好好地叹起气来？”冯文淑惊讶地问道。

“我也做了一个梦，”周欣低声答道。她也坐下来，埋着头在脱鞋。

“算了，不要再讲这些事情，在此地多讲也是空的。”周欣似乎还要说话，冯文淑却不耐烦地挥手阻止道。她又往下说：“讲多了，我就会哭起来的。哪个又没有家？没有母亲？”这些时候一直出现在她的颊上的一对酒窝果然不见了，她撅起嘴，好象在生别人的气一样。

“那么还是那个老标语有道理：抗战第一，”周欣说，其实她是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她脱下了袜子，也把脚伸进水中去。

冯文淑不答话，只顾俯下头用手擦着脚背，大声唱起她在上海时爱唱的歌《五月的鲜花》来。

“哪天我们也打回老家去!”周欣忽然兴奋地自语道。冯文淑好象没有听见这句话似地还继续在唱歌,又用脚接连地打水面。白杨树上响起了鸟声。风吹起来,树叶飒飒地哼着,溪水也浮起皱纹。一片叶子漂到水上,又顺着水势缓缓地流过去。水中现出两个女性的头,也浮着树影、日光。

“游击战,游击战……”从大路那边送过来响亮的歌声,这是多数人的合唱。她们把头掉向那一面看。

一股一股的尘土云烟似地跟着风卷过来。在云雾中接连现出一张一张熟习的面庞。同样的草绿色制服,同样的敏捷的步伐。前面两三个人飞也似地奔过来,他们跑得似乎比风还快。只听见一声欣喜的叫唤:“文淑,”又一声“周欣”,一个身材短小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就到了她们身边。说是身边,其实还离开她们三四步光景。

“王东!我们在洗脚,你到那边洗去!”冯文淑对那个短小的青年命令似地说。她指着右面一丛矮树,要他走到那里去。

“不要紧,我不在乎,”王东望着冯文淑放在水中的一双白脚,含笑地答道。

“不,我不要你在此地洗!”冯文淑激怒地说,脸上现出嫌厌的表情;她把脚伸出水来,用毛巾揩干它们,然后从裤袋里掏出袜子来穿上。

“好,我就到那边洗去,”王东含笑地答道;他挥舞着毛巾,朝矮树那面走去,好象他很高兴听从冯文淑的吩咐似的。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周欣在旁边低声对冯文淑说。她也洗好了脚在穿袜子。

人接连地来，不到一会儿功夫，溪边就充满了各种愉快的声音。水吵闹地响着，仿佛它也跟着这些年轻人在欢笑，在讲话，在辩论。许多只年轻的手小鸭似地在水上漂动。清莹的溪水立刻成了混浊的泥潭。

这小溪每天也有它的忙碌的时刻。这时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动了。连小小的灰粒由于兴奋也反复地往空中跳去，又无力地落下来，带着喜悦的年轻声音接二连三地在空中追逐着。

冯文淑和周欣被包围在这些似乎还带着各种灿烂颜色的声音中间，她们立在一棵枫树下面，欣赏地望着这活跃的景象。她们有时又用家乡的语言谈着一些事情。但是响亮的笑语吸引了她们的注意。眼前十个人就显出十种性格。永远做大家的长兄似的团长曾明远，带着和善的表情慢慢地在搓洗汗衣。他的脸显得更长，眼睛也更近视了。在他的右边是她们先前还提起过的女同志方群文，她正站着在刷牙，一副没有边的眼镜增加了她的年龄，显得略瘦的端正的脸上配着一张爱议论别人的小嘴。但是蹲在她的旁边洗手帕的张利英却从没有说过一句别人的坏话，她的秀丽的瓜子脸，常常显露出一颗温淑的女性的心。她终于抛弃了大学生活到这里来了，和她同路离开上海的，除了方群文外，还有那个长头发瘦面孔的长身青年李南星，和年纪最小的吴平。吴平现在十七岁了，却还是小孩的身材，红红的脸颊上永远保留着愉快的微笑，一根塌鼻子有点滑稽地嵌在他的脸中央。他是不知道悲观的。他已经洗好脸，弯着腰在地上拾红叶，找不到一片好

的，他便过来央求李南星替他在树上摘取。李南星带笑地问他拿树叶做什么用，他老实地答道，要寄给在上海的姐姐。李南星不再说什么，旁边另一个人杨文本却插嘴哂笑道：“这时候还想到在上海的姐姐！上海不晓得已经成了怎样一个妖魔世界！”杨文本是从吉林来的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他那张苍白色的四方脸却被好些纹路画乱了，左颊上还有一条短而窄的刀伤。他不肯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人，不过别人知道他从没有忘记在那个沦陷的土地上的经历。李南星并不赞同杨文本的意见，他满足了小弟弟吴平的要求。李南星和在上海时相比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他剪去了给人以不好的印象的长发，他的脸给北方的阳光晒成了褐色。年轻的两弟兄姚民瑞和姚民锋坐在溪边，两个人年纪都在二十内外，相貌也极相似，都是皮球似的圆圆脸与和尚头，不过看起来，倒是哥哥姚民瑞更年轻，他永远把一支铅笔和一本拍纸簿带在身边。这又是他写生的时候了。他拿背靠着他的兄弟，脚踏在土地上，带着很大的兴趣给站在枫树下谈话的两个女同志留个影子。姚民锋却动着赤脚在享受溪水的清凉。做过高中音乐教员的方天行（他的疟疾好了不过一个多星期）似乎完全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一个人舞着手吹着口哨沿着小溪走来走去。最后女同志们所讨厌的那个王东在溪边小心地用一把精致的梳子梳光头发，又带笑地走过来对周欣讲话：

“周同志，我们下午到镇上馆子里吃饭去，好不好？”

“王东，你请她怎么不请我？”冯文淑开玩笑地说。

王东脸上略略发红，回答道：“我又没有正式请客。就只

怕我们冯同志不肯赏脸。”

“哪个高兴去！我不要吃，”周欣板起脸说。

“去，去，我们大家都去，”冯文淑推着周欣的膀子鼓舞地说。她忍住笑低声吩咐王东：“你去请方群文。我会把周欣给你拉去。”

王东果然向方群文走去。周欣对冯文淑霎霎眼睛，悄声说：“你又作弄他。”冯文淑抿着嘴笑起来，然后得意地说：“这种人不让他多碰几个钉子不知道好歹。反正他家里会寄钱给他。”

果然王东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他摇摇头对冯文淑说：“方同志不肯去。”

周欣又向冯文淑动动眼睛。冯文淑忽然做出仗义的样子安慰王东说：“不要紧。我替你请，”她低声问一句：“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二三十块，”王东答道，其实他有的还不止这个数目。

周欣在旁边，为了忍住笑，只得拚命咬自己的嘴唇。

冯文淑知道王东身上有钱，也不再对他说什么，便扬起声音向众人嚷道：“各位同志，我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王东同志请客，在镇上——小蓬莱。大家都去。”

王东红着脸，几次张开口都找不到插嘴的机会。他看见好几个同志跑过来围着他，同他讲话。他只急得眼珠往上翻。他知道自己一张嘴讲不过几个人。他猜不到冯文淑这颗玲珑的心里还有些什么花样。他想到一个干脆的办法：不请客。

吴平絮絮地向王东问起请客的钟点。姚民锋赤着脚穿起

鞋子赶来了。方天行站在王东面前等候宣布他的决定。张利英带着善意的微笑旁观着。

冯文淑勉强忍住笑对王东说：“如何？我一请，众人都来了。只等你说什么时候——午饭？晚饭？”

王东只是摇着头，红着脸，半天只讲出几个“不”字。

“没有这个道理，说定了哪里可以反悔？”冯文淑故意冷笑地说。

“王同志，你自己吹过好多回牛，说要如何如何请客，从没有一次兑过现。今天再不请，以后大家都不理你！”姚民锋抓住王东的另一只膀子说。

“报告诸位同志，王东同志身上还有二三十块钱，”冯文淑的清脆的声音又响起来。王东马上瞪了她一眼，他又急又恨，但是望着这张露着一对酒涡的可爱的脸，他简直没法对付她。然而冯文淑还要残酷地补上一句：“是他自己亲口说的。”

这句话把王东放在更不利的地位上了。在团体里王东的自私和吝啬是众人所不满意的。这常常成了他们谈笑的资料。暗嘲和热讽都不能给他一点损伤。平日的小小的不满现在却找到发泄的机会了。王东必须加厚脸皮来抵抗那些尖锐的攻击。他的脸更红了，他讲话也口吃了。

冯文淑看见王东受窘，觉得痛快，她满意地笑着。姚民瑞走了过来。他把拍纸簿在冯文淑的眼前一晃，天真地笑问她：“你要不要看？”

“你又在画什么？”冯文淑顺口答了一句，脸上露出友爱的微笑，就伸手去抓。

姚民瑞把拍纸簿收起来，一面说：“你答应不扯掉，我才给你看。”

“好，我答应你，”冯文淑着急地说，她又伸出手来，她的漆黑的圆眼珠就盯着那本小小的簿子。她看见姚民瑞扬起手，一把就将簿子抢过来。

一棵枫树，两个年轻女子，还有那丝的包头巾。冯文淑楞了一下，忽然高兴地说：“送给我！”接着又加一句：“这个很象周欣。”她没有说出的话是她自己在画里显得很美。

周欣伸了头过来看，她也抢着说：“给我，我要。”她要伸手去拿。

年轻画家的圆圆脸（他是剪着光头的）上绽出来一丝一丝的满意的笑，他挥手阻止地说：“不要抢，免得撕破了。我明天再给你们画一张。”

冯文淑把画从拍纸簿上撕下来，又将簿子递还给姚民瑞，她再看看画，然后才对周欣说：“我们一道寄回家去。”周欣点点头。冯文淑正要折画，张利英却伸过手来温和地说：“给我看看，”她便把纸递到张利英的手上。在张利英旁边闪过来方群文的脸，那张小嘴自语似地说：“他们还在跟王东闹，这有什么意思？”

王东还受着众人围攻。这又引起了冯文淑的好奇心，她对周欣眨眨眼睛，暗暗地推动周欣的肘，低声鼓励道：“你也去讲几句，今天不要放过他。”

周欣果然走过去，大声叫起来：“王东，你到底请不请？是不是你讲话全不作数？今天我们都高兴去，你不请，以后你再

请一百趟,我也不吃了。”

冯文淑的清脆的声音接着又打进了王东的心:“他要请。他要请。我们都去。方群文、张利英也要去。”

王东只觉得有几颗黑亮的眼珠在他的脸上滚着,几个名字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他不再抗拒了。他的手有意无意地按了按放钱的衣袋。他提起精神慷慨地大声说:“好,今天我请吃晚饭,小蓬莱,全体同志都在。”

“我才不去,”方群文不愉快地冷冷地说。但是这句话给吴平一班人的笑声压倒了,只有张利英一个人听进耳里,而且她还劝道:“何必呢!既然大家都去,你一个人也不要赌气了。有时候小地方倒可以不必认真,都是在一道工作的同志。”

“哪个才跟王东这个人赌气?赌气倒是太看得起他了,”方群文仍然带点气恼地说。

冯文淑象一个战胜者一样,得意地转过身来,把手搭在方群文的肩头,她亲密地说:“今天你也去。看我的面子,你不要生气罢。”然后她又低声在方群文的耳边说:“今天我们好好地作弄小开一下,算是惩罚他。”

方群文会意地点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张利英看见这情形,脸上又浮出了善意的微笑,好象大姐姐在哂笑妹妹们的顽皮。

周欣猛然在冯文淑的肩上一拍,埋怨地说:“怎么还不走?人家肚子饿了。”

“真的,闹了这阵子,我也饿了,”冯文淑响应地答道。

方群文抬起头,眼光透过镜片,越过田地,望着被一丛矮

林和几棵大树半掩盖着的几间农家平屋，灰白的烟从那里冉冉地升上天幕，渐渐地淡了，乱了，散了。阳光静静地覆盖着前面一片平野。只有熟习的狗吠声似乎在报告一个活动的消息。她欣慰地自语说：“早饭应该烧好了。那么就走罢。”她刚说了这句话，就听见哨子声，又听见男同志们嚷着出发的话。

十二个人分成几组向着冒烟的地方出发了。在路上王东忽然耽心地说：“今天天气这样好，敌机又要来的。”

“你不用害怕，你请的这顿晚饭总不会没有人吃，”姚民锋嘲笑地答道。他觉得敌机来不来对他好象没有关系似的。

二

夜幕覆盖了一天的忙碌生活。战地工作团的十二个人在小蓬莱里面享受了休息的乐趣以后，趁着空中还闪着淡淡的白光，动身回碉堡去。

路是大家熟习的。树木、矮林、田坎、野草、水沟，都不能阻碍走惯了脚。前面横着已经失了轮廓的田野和山坡。后面留着点缀得有昏黄灯光的小镇。四周很静，只有时起时落的狗吠声还跟着晚风在空中追逐。

虽说有风，空气还是相当闷热。大家的脚步下得慢。几个年轻人都敞开衣领，把军帽拿在手里当扇子摇。冯文淑时常摸出她的小手帕揩鼻上的汗珠。十二个人分成几组，一路上自由地谈着各种事情。

谈笑声常常从这些人中间飞起来，又被类似的或者更响亮的声音追赶着，逃走了。它们搅动了闷热的空气。新的声音追着旧的，紧紧不舍，似乎成了一个雁阵，向着那面碉堡飞走了。

但是在这些人的眼前，碉堡却深深地躲藏着。他们用电筒照，也只照出黄绿色或者赭褐色的田地和深绿色的大树和矮林。黑暗象墨水似地从夜幕浸下来，把白光也染成了深色。

不知谁撒下一把银粉，使得田畔林边起了点点的闪光。

绿豆大小的萤火虫不知道躲避行人的脚步，得意地展翅飞翔。它们象蚊虫一样，叮着开始入睡的田野。

走过一条转弯路，一丛草象怪兽的黑影伏在旁边，好些粒银绿光点忽然一齐从那里飞起来。冯文淑惊喜地轻轻一叫，就跳过去，躬下身子，用手一抓。光点散乱了，熄灭了。周欣收回空空的右手，搭在冯文淑的肩上，好奇地问：“抓到没有？”

“你看罢，”冯文淑快乐地答道，她把手半张开，掌心里一点可爱的萤光一亮一暗的。

“这个小生物生得真奇怪，”周欣说。

前面的人又多走了一段路。在后面的曾明远走过她们的身边，他知道她们在做什么事情，便哂笑地说：“文淑，你的小孩子脾气还没有改。”

王东也走过来了。他本来在跟张利英讲话，便伸过头来说：“给我看看。”他左手拿着电筒，右手捏着帽子，现在把帽子戴在头上，就要用右手去拿，他的身子和冯文淑的靠得很近，手腕差不多要挨到了冯文淑的肩头。

冯文淑不高兴地将身子略略让开，也不回答王东，好象就没有听见那句话似的。她把手一扬，同时自语似地说：“放你去！”她回头对王东骄傲地一笑，然后挽住周欣的膀子扬长地往前面走了。她们的脚步动得很快。

“冯同志，你们当心点，看跌跤！”王东并不扫兴，还关心地在后面嘱咐道。他忽然满意地笑了，轻轻地、用了差不多只有他一个人听见的声音哼了几句外国歌。

“王东真没有办法，你骂他，你给他钉子碰，他都是当你在说好话，”冯文淑听见他还在后面讲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也不理他，却发牢骚地对周欣说，她并不把声音压低，好象故意说给王东听似的。但是话刚说完，她忽然想起今天在馆子里王东的那副脸相，她又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什么事情？你又在笑！”周欣问道；她把冯文淑的手用劲捏了捏，自己又接下去说：“是不是又想到你今天的杰作？”她在冯文淑的耳边轻轻问一句：“你作弄人就不怕别人报复？”

“我怕什么？他这个小开有什么办法报复？”冯文淑不以为然地答道。她又自负地说：“你们都应该感谢我。没有我，今天哪有这顿饭吃！”

“你不要吹牛，我也有功劳。下次看你一个人还有什么本事再敲他一顿？”周欣不服地笑辩道。

“你不信，我们打个赌，好不好？”冯文淑兴奋地提议道，她对这件“小事”有充分的自信。周欣正要答话，忽然踩滑了脚，右脚几乎要顺着草滑下田坎去，身子晃了一下，差一点把冯文淑带得摔一跤。两个人都发出了吃惊的声音，使得前面的曾明远、李南星，后面的方群文、张利英几个人都站住了，惊讶地问：“什么事？”电筒的白光从前后射过来。王东连忙跑上前去，张皇地问：“碰伤没有？”

冯文淑和周欣的回答是一阵清脆的笑声，两个人都笑得弯下腰来。她们不说什么话。曾明远善意地摇摇头，就和李南星继续向前走了。他们还听得见姚民瑞、吴平几个人在前面大声讲话。方群文却在后面批评道：“这两个人好象拣到了

金子似的，一天到晚就这么爱笑。”她的话象是说给张利英听的。张利英却象大姐姐似地替那两个小妹妹辩护道：“她们还是小孩子，让她们多笑笑，多快乐罢。只是她们爱作弄人，这个脾气不好。”温和的笑容又浮上了她的秀丽的瓜子脸。

“不过象王东这种人也该受点作弄，我倒赞成。”方群文说，她想到刚才在镇上的情形，嘴角也浮起满意的微笑。她觉得这句话还不够，又加上两句：“我就讨厌这种恶形恶状的人。你还能够听他讲许多话，我在旁边都听得作呕了。”

张利英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然后解释道：“你们几个人都是一种脾气：讨厌一个人，就觉得他简直是天地间最坏的人；称赞一个人，就把他说得好得不得了。其实王东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说讨厌是有点讨厌的，我也看不惯他有些举动。不过你们对他也有点过火。他并不是坏人。”

方群文听不进这几句话，她觉得张利英故意在替王东辩护，不大高兴地接下去说：“我对他还算是很客气的！前天在工作批评会议上我本来打算把他好好地指摘一通，后来临时发了恻隐心，就忍住了。谁教他对女同志总是这种态度？好象他一辈子就连母亲、姐姐也没有见过似的。”她说到这里，忽然抬起头望前面，她手里捏着的电筒的白光也跟着射过去。冯文淑和周欣的影子靠在一起，膀子挽着膀子，摇晃地走着。在她们旁边，落后一步的光景，就是王东的短小身子。王东用电筒给她们照路，却不知道她们谈到什么事情。她们笑，他也笑。方群文皱皱眉头嫌厌地说：“你听，他又缠着文淑她们了。他这种人抗战不抗战是没有关系的。我敢说，如果没有女同

志，他恐怕早走了。别人是抗战第一，他是恋爱第一。”

张利英停了一下才含笑地劝道：“你这句话未免刻毒一点，看人也不要太苛刻了。他放下小老板不做，出来参加抗战工作，也算难得。这里又没有人跟他讲恋爱。你何必管他这些。我看慢慢过下去，他也许会变好一点。”

方群文摇摇头，接着说：“你是个好人，你看什么都是好的。”她加重语气再说一句：“我就不这样想。”

“其实你的办法也可以说是自寻烦恼，”张利英温和地、劝解似地说。

“但是严肃认真……这是工作的第一条件，”方群文坚决地说。

这时象回答似地在前面响起了歌声：

游击战……游击战
敌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来
咱们自有游击战……

这是流水似的清澈的少女的声音。它们以极大的速度渗透了夜的空气，闷热似乎全被洗去了。这柔软的声音又象一阵微风拂去了张利英心上的尘土。她感到一阵清凉，一阵爽快。她便带着自信地回答方群文道：“可是你忘记了这里都是些年轻人。年轻人不大肯受形式的拘束。”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形式主义者，”方群文觉得张利英把她说的话解释错了，连忙分辩道。“不过有不对的地方就应该纠正。”

张利英没有答话，她的注意力被歌声拉去了，这时响在她耳边的不单是冯文淑、周欣她们的声音，这是许多人的合唱，各色各样的音响汇合在一起，成了一股灿烂的彩色瀑布。它还是沸腾着的，冒着气的，向这个地方倾泻下来，立刻迅速地往四处散开去。似乎全个地方都被淹没了。水还在流，在激荡。她自己也受了这个力量的鼓动，不觉轻轻地跟着有力的年轻的声音哼起来。

“其实平心而论，我参加过的几个团体中，这个还是我最满意的，”方群文看见张利英不响，便提高声音补充似地再说一句。

张利英微笑了，这句话是听清楚了。她诚恳地说：“我出来就只参加过这一个团体。我也知道自己能力薄弱，不过我愿意贡献自己的小小力量做点事情。在这里我过得还好，我觉得大家对我都还不错。”

方群文不作声了。张利英的话，张利英的谦逊的态度，使她感到一点惭愧。她忽然想起了一年来的经历：走了好几个地方，做过好几样不同的事情，现在离开她那单调平板的小学教师的生活的确太远了，但是她有过什么看得见的成绩？她有什么胜过别人的地方？张利英的无心的话使她感到了一点烦恼。她用电筒照路，她用力按着电钮，雪亮的白光在她的眼前闪了一下，以后就留下一片黑。她再按，仍然没有光，灯泡坏了。她叹了一口气。

先前那股彩色水流，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全浸润在土地里，消失了。没有歌声，只有含糊的余音在两个人的耳边回响。

张利英听见方群文的叹气，才觉得眼前突然暗起来。她不知道这个同伴叹息的原因，便关心地问道：

“你还在等嘉兴的信么？”

方群文摇摇头，短短地答道：“我也不等了。有没有信都是一样。”停了片刻她又说：“现在想也是空的。有什么用？一切全变了。”

“正是这个道理，”张利英同情地说，只有她知道方群文的事。在嘉兴城里住着方群文的丈夫，那是一个中学教员。他们结婚两年多，感情淡得很。女的在夫家处得也不好，后来便到上海当小学教员。男的患肺病在家闲住，“八·一三”以后就断了音信。女的经过汉口，曾经从一个同乡朋友的口中，知道丈夫住家的那条街被炸弹毁成了一堆瓦砾。此后各处探听，再也得不到一点关于那一家人的信息。她后来写信去问，也等于石沉大海。女的有一次告诉朋友（就是张利英），她并不悲惜那个人的死，不过她愿意确定地知道他的存亡，好使自己的心安定。

“我只愿意能够忘记，我想我会慢慢忘记的。不过现在我偶尔还会想到，”方群文痛苦地小声说。

“其实象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张利英感动地说。她失悔不该提起这件事，她还要说话，但是一个声音打岔了她。方群文一把抓住她的膀子，这个同伴手里的电筒落在地上了。她关心地叮嘱一句：“当心点，慢慢走罢。”她这一阵就因为没有亮，谨慎地下着脚步，现在便停住俯下头去帮忙方群文把电筒拾起来。

路在转弯，她们已经走上了山坡。远处有几道闪光，同志们已经走远了，只有她们留在后面。阴暗中显着朦胧的灰白色的路，象蚯蚓似地在坡上爬着。阴影一般的矮树的背景上，嵌着银灯似的几点飘动的萤光。天空相当亮，星星更明亮。在这两个女子的眼里，带柄的斗形的北斗七星是熟识的星星。它们在天上一闪一闪的，好象眨着眼睛在给她们指路。

“我们只顾讲话，不知不觉就落后了，”张利英说。

“想不到偏偏我的手电又坏了，”方群文懊恼地说。

“还好，今天晚上还看得见。慢慢走不要紧，”张利英安慰她的同伴说。“不过我们落后了。晚上还有好些工作，又要害得大家等我们。”她想到这个，有一点歉意。

“其实路也不太远，”方群文刚刚说了这一句，忽然惊讶地指着前面道：“怎么那里还有亮？难道还有人在那里。”她的确看见白光在黑影后面一亮，但是她留神再看，亮光又没有了。

“不会有的。他们恐怕到家了。一定是你看错了，”张利英说。但是她仿佛也看见了一线亮光。

“你看，又有亮，说不定还有人落后的，”方群文欣慰地说。

“是的，还有脚步声，好象有人来了，”张利英觉得奇怪地说。

再转一个小弯，忽然响起一个亲密的叫声：“姐姐！”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唤：“方群文！”都是少女的清脆的声音。

两个人同时高兴地答应了。她们知道是谁在唤她们。

唤声向着她们跑过来，亮光向着她们跑过来，两个活泼的跳动的影子向着她们跑过来。两个少女一下子扑到了她们的

身上。

“姐姐，我还以为你们迷路了，”冯文淑象一个快乐的小女孩拉着张利英的膀子撒娇说。她和周欣都高兴叫张利英做“姐姐”，因为比她们年长的张利英是和她们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周欣这时在跟方群文讲话。

“就只有你们两个！”冯文淑和周欣的回来使张利英很感动，她惊喜地说了一句。

“我看见你们两个没有了，特地赶回来接你们的。怎么你们不用手电照？我正在着急，不晓得你们走到哪里去了，”冯文淑兴高彩烈地拉着张利英的膀子只顾讲话。

“我的手电坏了，”方群文不等张利英开口，便接下去说。她又问一句：“怎么王东没有缠你们了？”

“我叫他在那边等我们，不准他跟来。这还是他的手电，”冯文淑说，她把电筒一扬，不觉得得意地笑起来。

“幸好只有一条路，不然你们走另一条路回去了，会让他等一晚上的，”方群文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便老实地说了出来。

“你想他会等一晚上吗？我看他不会这样忠实，”周欣说，她也感到兴趣地笑了。

“我看他会的，只要我们叫他这样做，”冯文淑觉得有把握地说：“他就是这个毛病。你说句笑话，他也会当作真的。”

周欣又笑起来。方群文的嘴里也吐出了没有牵挂的笑声。张利英忍住笑捏捏冯文淑的手，责备地说：“你们小孩子嘴总是这样。我要是王东，我就赌气不理你们。”

“那么我下次不作弄他了，姐姐，好不好？”冯文淑象一个

被溺爱的孩子似地把嘴快要挨到张利英的面颊，亲热地说。

“你这张嘴就靠不住，哪个相信你？”张利英故意摇摇头说：“要是有一天你也给别人作弄了，我才不给你帮忙。”

“我不怕，没有人作弄我！”冯文淑昂起头骄傲地说。她掉头看看周欣，听见那个同伴发出带讽刺味的笑声，她又往下说：“除非是周欣，但是我相信周欣不会的。”

“你看，她在拍我的马屁了，”周欣在那边得意地对方群文说。

冯文淑听见周欣的话，不直接回答，却继续着先前的话再说一句：“因为她也怕我作弄她。”自己嗤的一声先笑了。

“哪个怕你？”周欣笑骂道。她放下方群文的膀子，走到冯文淑面前，撅着嘴，挑战地说：“你再要信口胡说，我就把你推下坡去。”

“现在是内战了，”方群文带笑地在旁边批评道。

“周欣，我们还是和解罢，我不跟你闹，”冯文淑噗嗤笑道。

周欣还未答话，她也在笑。方群文忽然瞥见前面孤坟边松树下立着一个黑影，象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但是影子不动，也不响。她指着那个地方惊讶地说：

“你们看那是什么？好象是一个人。”

冯文淑马上把电光射过去，叫了一声：“王东！”没有回答。她自语道：“一定是他，”便向前跑两三步，接着她再唤两声那个人的名字。

王东发出了应声。他过来对冯文淑笑道：“冯同志，你们都回来了。”

“你为什么跟到这里来？我不是叫你在那边等我们吗？”冯文淑大声责备道。

“我等了很久，你们都没有回来，我才过来接你们，”王东带笑地答道。

“那么你怎么不走过来，也不响一声？我叫你，你也不答应！你是不是存心来吓我们？”冯文淑不肯放松地追问他。

“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王东辩解道。

“假话。文淑，他完全在扯谎！”周欣插嘴说。

“我在做诗，”王东老实地答道。其实冯文淑的叫声他是听见了的，诗把他耽误了。

“你还在做诗？”冯文淑疑惑地问一句，她笑了。笑的不止她一个，周欣和方群文也同时笑起来。不过方群文只抿嘴笑了两声，周欣却畅快地笑了。

“我刚刚走到坟边，忽然想起了两句诗，我就站住想下去，我怕过一下灵感就飞走了，”王东听见笑声，脸上略略发红，直率地解释道。

“你写什么？是不是《夜的孤坟》？……”冯文淑挖苦地问道。张利英在旁边扯她的袖子，低声说：“不要再讲了。”

“不，我的题目是《战士的死》。开头两行是‘紧紧地捏住手里的枪，一个无名的士兵倒下了。’……”王东正经地答道。

“以后呢？”周欣抢着问道，她极力忍住快要冲出口来的笑声。

“以后……我只想起中间的两句：

一张最后的脸，一个最后的梦，

他闭上了燃烧的眼睛。

“其余的还没有想好，就给冯同志打岔了，”他带着惋惜的语调说。

“想不到我们王东同志还是一位诗人，真是佩服得很，”冯文淑故意称赞道。

张利英不愿意冯文淑她们再跟王东开玩笑，便插嘴说：“文淑，不要再讲了。人家在等我们。我们回去罢。”她说完抬起头，才注意到碉堡的黑影就威压地立在坡上。灰黄的亮光从“枪眼”里射出来，好象是母亲的衰老眼睛在呼唤她们。

年轻的声音伴着强的电光迎着她们跑下来。那些声音亲密地呼唤着几个名字。是吴平同着姚民瑞、民锋兄弟来迎接她们了。

冯文淑拉着周欣的手跳跃似地跑过去。她们两人的快乐的笑声立刻从年轻男人的嘈杂的语声中间飞起来，而且超过它们，飞得高高的，把它们都压倒了。

“到底是她们年轻些，”方群文羡慕地说。

“这是我们的家，孩子们回到家，自然应该高兴。”张利英用柔和的声音说，她感动地迎着那两股正在等候她们的电光走上坡去。

三

在碉堡的第一层楼中，夜从“枪眼”外面偷偷地爬进来，但是又给灯烛的亮光赶走了，只留下一些顽强的影子躲在角落里。

屋子里仍然铺满被褥，不过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屋中间略略偏右的一段空地上，蓝布已经拉开，那里横放着两根白木长板凳：一根靠壁，上面放着一盏矮脚瓦油灯；另一根板凳上放了一些文件，李南星摊开纸捏着笔坐在铺上写字，他右手边一个小漱口杯翻转来驮着一支洋烛。灯光带着凄惨的灰黄色，烛光却象发寒颤似地摇晃着。燃着的洋烛不止一支，在屋角冯文淑坐在自己的铺上，用小皮箱做桌子，上面也放着一支洋烛，旁边摊开一张未写完的稿纸。她的手里捏着一管自来水笔。她这时正托着腮听杨文木讲话，一个蚊子叮上她的手，手一动它又带着嗡嗡声逃走了。她伸起左手搔了搔被咬的地方。

“你把洋烛吹灭了罢，”坐在她旁边的周欣轻轻地说。

冯文淑摇摇头，悄声答道：“就让它点着也好。我喜欢亮一点。”张利英和蔼地射过眼光来，点点头，意思是叫冯文淑不要做声。长脚蚊子又飞上冯文淑的脸，嗡嗡声停止了，冯文淑

的手立刻压到脸上去。

杨文本继续讲下去。他的面容很严肃，额上的皱纹加深了，脸却因为兴奋发起红来。他的手略略舞动，使人想到他一半是为了加重语势，另一半恐怕是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自然我们谁都没有权利责备别人。自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没有做事，就没有成绩。大家每天都热心地在做事，谁也不肯让自己比别人少做一点。但是我总觉得做得太慢，做得太少。只有这点小小的成绩，太小了，简直看不见。我们应该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得多一点？做得快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使全个乡，全个镇，全个城都动起来？一定是我们做得不够！我们的工作太松懈了。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以后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做。……”

杨文本的话使得屋里的空气变成十分严肃，它们象鸡毛掸帚的拂拭，扫去了每张脸上的笑意。大家沉默不响，有的人屏住气息，有的人却沉重地呼吸，似乎有许多东西从上面压下来，又仿佛有一些东西要从他们的胸腹中吐出来，在喉管里被堵住了。大家望着杨文本的嘴和他的脸部表情。但是灯光在他的脸上涂了一些阴影。屋里只有那使人厌烦的蚊子叫声，这些小虫常常用它们的尖嘴向人的皮肤进袭，人们的手半意识地招架着，不时发出拍拍的响声。

杨文本略略停顿一下。王东受不住这种沉闷的空气，便趁着这时机插嘴说：“我看做事情并不是容易的。杨同志的话也说得过火一点。固然责备我们自己是应该的，不过我们也

只能尽各人的力量，慢慢做。”他忽然望望女同志坐的一个角落，接着又说一句：“张同志，你说对不对？”

张利英的脸上浮出了温和的微笑。她大方地看看众人，便望着杨文本说：“杨同志的话自然不错。刚才王同志的话也有道理。我们力量薄弱是事实，应该加倍努力也是真话。以后我愿意跟着大家尽力做去。”

“但是王同志说慢慢做，我们还要慢到什么时候呢？敌人还会给我们多少功夫呢？”杨文本迫切地抢着说，他开始搓着那两只粗大的手。

“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敌人今年打不过来，”王东觉得理直气壮地说。他勇敢地伸起手，打死了掌心里的一个蚊子。

“你知道！你又不是军事家！”姚民锋奚落地插嘴说。

“打不过来？这里离前线多远，你算过没有？”杨文本略带轻蔑地反问道。

“那你到司令长官部问去，”王东也赌气地说。他这一来把沉闷的空气打破了。冯文淑在周欣的耳边说了一句话，两个人忽然忍不住迸出了笑声。于是其他几个同志也笑起来。姚民瑞拿着拍纸簿在作“速写”。方天行在和李南星讲话。杨文本生气地往四处看，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才好。

“请大家守秩序，不要笑……”主席曾明远高声说，他的声音和表情都很温和。

“这是认真的讨论。这是严肃的问题。请大家不要开玩笑，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应该去掉才好，”杨文本不大高兴

地提高声音说。他觉得肚子里装了一大堆真话，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想了解他。

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冯文淑的清朗的声音响了起来，“我接受杨同志的批评，我就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的脾气。我承认我的工作做得不够，不过这些弱点我一时克服不了。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自己完全改造过来。”她的脸颊上现出了一对酒窝，眼睛是明亮的。人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觉得她充满着青春的精力。

方群文咳了一声嗽，接着说：“杨同志责备大家不努力，我也接受这个批评。不过最好由杨同志给我们提出一个具体办法，让我们大家来认真地讨论。我这个建议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冯文淑抢着说了，她好象害怕别人不给她说话的机会似的。

“这个……”杨文木迟疑了一下；“我目前也没有具体方案。……还是请大家仔细讨论，”他终于坦白地说了出来。后来他又补一句：“我只觉得我们做得不够。”

角落里有人发出一声低笑，但是没有人注意。男同志中也有几个人做出要笑的怪脸。

“真是太慢了，你们都不会觉得，”杨文木激动地搓着手接下去说：“我总是这样想，我们不能什么事都依赖长官部，也要靠自己，也得有自己的打算。而且我们做得太慢，的确做得太慢。譬如访问农家，譬如演戏……效果慢得很。我常常，我每天都听见那个声音：‘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又听见那样的声音：‘你们做得太慢。’七年了，我还回答不出一句话。我们做，

总是做得太慢，我们刚刚动手做，别人就来了。你们不晓得，你们没有听见那样的声音。那真是折磨人。的确我们做得太慢。”杨文木的脸上起了一阵痛苦的拘挛，他在扭自己的手指，他似乎极力想使别人了解他的话，但是他反而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不过同志们现在开始了解他的心情了。他并没有说假话，的确是那种声音在折磨他。他们知道又是那个沦陷的土地上的回忆抓住他了。他不喜欢对人谈起他的过去。每当同志们披肝沥胆似地报告自己身世的时候，他总是沉默着，让自己关在寂寞惨痛的思想里。人们从他的脸部表情，可以猜出他有一种难言的悲痛，他们不愿意触动他的创伤，便让他静静地坐在一边，或者用别的话驱散他脸上的阴影。这时他一定又想起那同样的事情了。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他们想安慰他，但是他们中间多数人自己都有一些惨痛的记忆，也都留下一个不能忘记的家在被蹂躏的土地上。

冯文淑把洋烛吹灭，连忙掉过头，轻轻地对周欣说：“我不要看他。”她用力咬自己的嘴唇。她紧紧地捏住周欣的手。

周欣明白冯文淑的话，她的眼光还在皮箱上摊开的稿纸上面扫了一下，那是冯文淑给母亲写的信。她自己心里也很难过，她想起了慈祥的母亲和天真的妹妹。将近四个月没有信来了。蚊子又飞上她的脸，她也不去赶它。冯文淑却伸手轻轻地一下打死了那小虫。

吴平和姚民锋都挽起袖子在左膀上搔痒，张利英拿右手在自己的脸前慢慢地挥动，似乎在驱逐蚊子。曾明远皱着眉头，用力在前额搔了几下。他用同情的声音对杨文木说：

“杨同志，你太激动了。你歇一会儿罢。我们和你有一样的感觉。不过这也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要使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动起来，总得花点功夫。而且说一句实话，我们大家对这工作从来就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差不多都是从大城市来的，而且大家都是拚着这一腔热血，来为这个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服务，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总之尽力到力尽为止。……”

“不过我们应当鞭策自己，应当有长远的计划，应当希望做得更多些，更具体些，更实在些，不应当放松自己，”杨文木仍然烦躁不安地说，他的激动渐渐地静下去了。曾明远的话在他的心上也产生了一点影响。

“这就是我们常常开工作批评会的用意，”李南星接下去说，他摇摇他那张安放在长颈上的瘦长脸。一个蚊子很快地飞到他的没有衣领保护的颈项上（他的领扣解开了）贴住了。他随意伸手一抓，没有抓到蚊子，他的手便留在那里搔发痒的皮肤。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批评会开得不够认真。大家互相批评的程度也不够。每次开会讲话总是客客气气的。我看大概有些同志把‘批评’误当作‘攻击’解释了，所以不肯多讲话，怕得罪人，”方群文忽然正正经经地说出这一番话，她略略停顿一下，眼光往高处射，就象在看屋顶，别人不知道她心里藏着什么意思。

“我并不是怕得罪人。我觉得我们的同志都不错。大家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地方，”冯文淑带笑地说，声音清脆得就象鸟叫，她的眼泪已经干了。

“我赞成冯同志的意见，我们大家处得很好，譬如我对同志们就没有不满的地方。”张利英望望冯文淑，温和地笑了。

“冯同志和张同志都没有把我的话听明白。我对同志们并没有恶感……”方群文仍然带着严肃的表情说，她也笑了笑，不过她的笑容里并没有笑意。

“那么你们三位的意思就是一样了，”王东笑着插嘴说，他显然是怀着讨好冯文淑她们的用意来讲话的，一方面他也不想借此打断方群文的话头。

王东的话似乎触怒了方群文，她嘴一动，哼出一声带轻蔑味的冷笑。但是她并不理睬王东，却继续对张利英说话，她望着张利英的温和的面颜，便收敛了轻蔑的表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工作跟感情分开来讲。这是两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的。没有认真的批评就没有进步。敷衍的恭维是没有好处的。希望大家最好坦白地讲话。被批评的同志也不要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就对发言的人暗地里怀恨……”

众人注意地望着她的脸和嘴唇，知道她要说的不是寻常的话。冯文淑好奇地悄悄问周欣：“她在讲谁？”周欣忽然轻轻一笑，低声答道：“该不是说王东？”但是这个少女又把笑容收藏起来，脸上浮起疑惑的表情。

“譬如我们的同志中间，就不能说没有人对工作不热心，”方群文从容地接下去说，“其实不大热心的人是有的，不过大家都抱着原谅宽容的态度，不肯指摘别人的缺点，好象害怕说出来会伤害同志的感情。我觉得这种态度不大好。……”

“空话，她为什么不直接说出她的意思？”冯文淑听得有点

不耐烦了，她略略摇着头在周欣的耳边轻轻地说。周欣抓起冯文淑的手，低声答一句：“你等等罢。”她侧过头对冯文淑做了一个可笑的怪脸。

“譬如王东同志，”方群文把头略略放低，伸起手把眼镜架子稍微移动一下，“王东”这两个字是用清朗的声音吐出来的，她说出这个名字以后，便抬起头把威严的眼光射到王东的脸上，王东的脸马上红起来，他茫然望着方群文，不知道她心里有什么主意。

方群文咳一声嗽，又接下去说：“他做工作不热心，总带着敷衍的样子。……”

“不……我……并不……”王东红着脸结结巴巴地插嘴辩道，一面还用手赶面前的蚊子。

方群文不理他，只顾说自己的话，她的声音比王东的响亮。她又说：“还有王东同志对女同志的态度也不大好。我们应该排除浪漫的习气，应该认真工作。”她让一个蚊子叮在她的左额角上。

冯文淑忍不住轻轻地笑出声。她连忙用手掩住嘴，她感到兴趣地望着王东。王东一脸通红，头抬起来又埋下去，嘴不住地动着，却说不出一句完全的话。方群文的声音把他的心搅乱了。

“王东同志太多小资产阶级的脾气，他的工作太不够紧张，”杨文木板起面孔说。

“不是小资产阶级脾气，是小开脾气。他老是缠着女同志，不管你有事没事，常常跑来跟你讲闲话，耽误你的工作，”

周欣似乎看准了攻击的机会连忙接口说。冯文淑轻轻地拧了她一下。

王东又气又窘，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声音不清楚地辩道，“我不是这样……”

李南星不让王东说完，便抬起头抢先说下去：“我同意周欣同志的话，王东同志见着女同志就有说有笑；跟男同志在一起，连话也不肯多说。譬如今天到镇上找私塾先生谈话，他一路上板起面孔，到了那里也不肯多讲几句话。”

“不错，前天在小蓬莱他一个人的话最多，”姚民瑞插嘴道。

“前天是我请客，”王东没有技巧地分辩道，却不想这句话反倒引起人们更多的不满，他又加上一句：“还是你们大家要我请的。”

冯文淑噗嗤笑起来，周欣也笑了。男同志中间笑出声来的人是吴平和姚民瑞、民锋弟兄。方群文和杨文木却依旧沉着脸不出声。

“我说的是真话，大家笑什么？前天吃饭大家都是有说有笑的，为什么单单怪我一个人？”王东气恼地说，但是脸上还现出那种可怜的窘相。他不住地摇摆着头，好象在躲避蚊子。

“还有今天你没有得到张利英的许可，就拿她的揩面毛巾去用，这对不对？”周欣提出来。说。

“这是我拿错了的，我已经对张同志道过歉了，”王东回答道。

“拿错了？”冯文淑不信地念着这三个字，她又笑了；周欣

笑起来，把身子靠在冯文淑的身上。房里好几个人笑着。张利英依旧带着温和的微笑。

笑象传染病似地抓住了房里大部分的人。大家没有顾虑地笑着。冯文淑接连拍着周欣的膀子。周欣有时也敲一下冯文淑的头。曾明远在咬自己的嘴唇。吴平对着姚家弟兄做怪脸。姚民瑞又拿出拍纸簿在画什么景象。

王东茫然望着众人，他的眼光似乎在问：“有什么好笑的？”

“大家都不要笑了，请遵守秩序，”曾明远提高声音说；“各位同志对王东同志还有什么话讲？要是没有讲的，那么就让王东同志来答复。”

“还有王东同志经济不公开，有钱总要瞒着别人，”吴平举起手说。

“既是共同生活，经济就应该公开，况且我们又不会抢他的钱，”姚民锋补充地说。

“大家批评得够了，还是让王同志来答复罢，”张利英不忍见王东的滑稽的可怜相，便好意地发言替他解围。

“我……没有……什么话讲，”王东象受了欺负的软弱孩子似的，过了片刻才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类似赌气的话。

做主席的曾明远微微一笑，他用温和的声音对王东解释道：“王东同志，你不要误会大家的意思，这是好意的批评，而且是为了以后的工作。要有批评，才有进步，这不是大家常说的吗？说得对可以照改，说得不对尽可自由回答辩驳。”

王东埋下头，端坐着，等到曾明远闭了嘴，他才慢慢地抬

起脸，望了望眼前几个人，象受了责罚后的小孩子似地说：“我明白……我慢慢地改就是了。”他又把头深深地埋下，垂在胸前，仿佛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脸上的表情。

这样的答语和动作都是众人没有料到的。但是它们却使得最爱笑的嘴也闭上了。接着是一阵静寂。房间里只有蚊子的叫声和人们的咳嗽。

“一个人有缺点，只要能改，就没有问题。我对于王东同志勇于改过的精神表示钦佩，”曾明远作为结论似地、对王东温和地说了上面的话。然后他侧过脸望望方群文和张利英，又看看李南星等人，说：“我们还是讨论别的事情罢。”

在碉堡外面，夜正在进行，逐渐加浓的黑影又爬进房里来。灯光一摇一晃的，似乎受不住黑夜的压迫。蚊子迷路似地在众人的头上乱飞。房里渐渐地阴暗起来。只有李南星旁边那支洋烛，还鼓起勇气在挣扎。

“刚才我们讨论的加强工作的方案，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总觉得我们非立刻决定不可……”杨文本的充满忧郁和焦虑的声音又响起来。

冯文淑把皮箱从膝上拿开，皱着眉头站起来，走到一个“枪眼”旁边，她无心地把眼睛放在“枪眼”上看外面的黑夜，一股凉气扑上脸来，她舒畅地嘘了一口气。她害怕多听杨文本的声音。

外面是无边的黑暗和静寂，仿佛横在她下面的是一片大海。她听见杨文本还在说话，又听见有人在唤“文淑”，那是张利英和周欣的声音。她头也不回，就答应一句：“我站站，就回

来。”她的眼睛仍然望着“枪眼”外面。她渐渐地能够分辨夜的颜色了。山影和树影都成了夜的装饰，在一两处带了点灰白色发亮的应该是山中的溪流。她觉得眼前银光四射，原来在路边，在林畔，在溪旁，一亮一暗的，闪烁着星点似的萤光。现在正是那些小生物活动的时候，它们带着它们的神奇的亮光，逍遥自在地四处飞舞，仿佛想用那无数的小光点照出一个白昼来。

“可爱的小东西，”她忽然高兴地小声赞道。她觉得身子轻快了许多。她想：“它们多么有趣，自己带着光明到处飞。”她不自觉地动了动两只手，她又想：“我也要飞的。”以后她又为这个念头轻轻地失声笑了。

她的这种心情是别的同志所不知道的。他们没有注意她。大家又开始了辩论。她听见李南星、方群文、方天行、杨文本抢着在讲话，仍旧是在讨论加强工作的问题。她又皱皱眉头，小声地讲了一句：“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话？”她掉过头去看他们。

“快过来，”周欣微微笑着，对她招手。

她点点头，她的眼光无意地落到皮箱上那张信纸上面。她忽然想道：“妈妈现在不晓得在做什么？她会想到我这时的情形吗？”这样一想她又有点不高兴了。她走回去，把信纸检起揣在怀里。她心里仍然不舒服，虽然坐在那里，别人的讨论她也听不进去。

“你在想什么？怎么突然又不高兴了？”周欣关心地小声问道。

她茫然摇摇头。

“你瞒不过我，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事情，”周欣捏紧她的手，亲切地问道。

“我要高兴，我不再想那些事情，”冯文淑忽然警觉似地对自己说。她下了决心要管住自己。她回答周欣道：“没有什么。”她勉强笑了笑。

“明天早晨还要排戏，你台词是不是念熟了？”周欣用疑惑的眼光看看冯文淑，顺口问道。

“他们老是讲不完地在讨论，”冯文淑略带烦厌地说。她搔了搔右边鬓角，然后回答周欣：“还差一点。”

“就是杨文本老爱说他那套话。这也难怪他，他的环境跟我们的不同。他一家人都在那边，”周欣悄悄地说；“我就怕看他那条刀伤，他不高兴的时候，伤口显得特别深，好象是才没多久砍伤的。”冯文淑轻轻地触着周欣的膀子，但是周欣还往下说：“我今天晚上还要写壁报。”

“我还要写信，给妈妈的信今天也应该写完了，”冯文淑说。她忽然打了一个呵欠，连忙把口掩住，她自己也有点奇怪：怎么睡意一下子就来抓住她了？她用手挥开在她面前徘徊飞舞的蚊子。

“我的信还没有写……”周欣说，这只是半句话，以后的被人打断了。

“不要讲话，”方群文侧过头来干涉道。那张女修士一样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这是全体同志工作的问题，希望大家特别注意，”杨文本

严肃地接口说，他用愁烦的眼光看这两个年轻的女同志。他的话把众人的眼光都引到这里来。冯文淑和周欣的脸上都泛起红色，文淑略略把嘴一撅，却并不说什么。她发觉王东的眼光停留在她的脸上，她生气地回看他一眼，王东立刻把眼光收了回去。

周欣咬了咬嘴唇。她忽然扬起声音望着曾明远说：“主席，我今天晚上还有工作，我还要写壁报，明天早晨就要贴出去。”

“我们就快讨论完了，”曾明远答道。他马上又改变主意说：“周欣同志，你可以一方面做你的工作，一方面参加讨论。”

“但是这里怎么好写字？你白天就应该写完的，”冯文淑看看周欣身边一个小皮箱，抱怨地说。

“那么，请主席答应我现在告假。我到楼上写去，”周欣从容地对曾明远说，好象她对这事情很有把握似的。

曾明远看看众人，大家都没有异议，他便答应了周欣的要求。这个少女提着小皮箱，拿着这时刚点燃的洋烛，刚要动步，冯文淑低声问她一句：“要不要我帮忙？”

“你等一下来罢，”周欣答应道，便对冯文淑做了一个怪脸（这是冯文淑看惯了的），然后高高兴兴地往第二层楼上去了。

“我们应该发动一次真正大规模的宣传，”杨文本的声音突然兴奋地响起来。这不象是在讲话，倒象是在喊口号。“我们要早早地把民众组织起来，作游击战的准备。否则我们老是跟着军队退来退去，永远生不了根。”

热烈的谈话搅动了房里的沉闷空气。黯淡了的题目又带

着新的闪光亮起来。那些略微疲倦的心仿佛得到了一服兴奋剂。吴平欣喜地叫出来：

“我要做游击队！我要做游击队！”

“游击队”三个字在冯文淑的眼前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完全理想化的图画。她好象感觉到一股力量在身体内震动，便愉快地昂起头来。

四

上午，阳光把碉堡里照得相当亮。第二层楼中，正进行着排戏的工作。房间是空阔的，没有家具，除了一张旧桌子和一根板凳。一个角落里堆着一些作为道具的小东西。

曾明远担任导演的职务，手里拿了一本小书在对冯文淑讲话。冯文淑一面点头，一面匆忙地答应着，她似乎完全明白曾明远的意思，不愿意听他再往下讲。她的注意力被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吸引去了。现在她应该把这个人的遭遇表演出来。

这是第三次，她为这个戏已经花了两天的功夫。现在那个不幸的少女对她不再是陌生的了。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想想自己应该做的那些动作，她觉得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被放在另外一种境遇里面。她穿着浅蓝色旗袍和皮鞋，这装束跟她分别了一年了，这应该是那个少女的服装。秦月英，那个孤女，如今正落在日本军人的魔手里。的确，她和那个少女成了一个人。她被人拖到一个日本军官的面前。在那里她眼见着她的哥哥受到汉奸们的残酷鞭打。

杨文木扮日本军官，李南星演少女的哥哥。被蹂躏的东北土地留给那个同志的忧郁、愁苦和愤恨，如今借着兽性军

人的残暴行为发泄出来了。他演得那么逼真。那刀伤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可怕。李南星呻吟着，叫号着，诅咒着。他在用绝大的力量表现中国青年的不屈服的英勇精神。那是她相依为命的哥哥，一个乡村小学校长。她要跑到他的身边，但是被人拦阻了。两对眼睛互相望着。她绝望地唤着“哥哥”，她的眼泪流下来，这是真的眼泪，这是那个少女的眼泪。她觉得全身的血都冲上脸来，鼻上和额上都积着汗珠，她忘记她自己是在碉堡里面。

“好，这样好，”曾明远接连地说，频频点他的头。

做哥哥的更激烈地痛骂日本军官，而且愤慨地责斥汉奸。虽然膀子被绑得紧紧的，虽然汉奸继续挥着鞭子或者使用拳脚，但是他仍然勇敢地挣扎。只是叫声渐渐地减低了。

妹妹哭着对哥哥讲话，她也在骂他们的敌人。于是日本军官站起来，掏出枪，一下就结束了哥哥的生命。枪声没有响。李南星也没有倒下去，他却无意地把演汉奸的王东撞了一下，叫王东差一点跌在地上。冯文淑忘记了两句台词。

曾明远吩咐暂时停止，他对大家说了几句话，紧张的空气松弛了。冯文淑用手帕揩着汗珠，也揩了眼泪，她真的哭过了。她看看周欣和张利英，想在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对她的表演的意见。周欣对她眨眨眼睛。她满意地嘘了一口气，她相信自己的表演并没有完全失败。

故事继续发展。日本军官的凶恶的、吃人的眼光盯着她——秦月英的脸，他对着她狞笑。他“格格”地笑起来。他说出侮辱的话。汉奸们谄媚地陪笑着，敌兵蠢然地陪笑着。她的

怒火上升了，她说教般地责骂汉奸。台词背得很熟，感情也很真实，她真的在发泄一肚皮的悲愤，这时又好象是冯文淑在讲话，不象是那个可怜的孤女秦月英了。

故事逼近了结尾，军官把敌兵和汉奸都遣走了。只有他和她两人留在房间里。他好象一只蜘蛛得意地、贪婪地向着网内的生物走近。她被畏惧的感觉抓住了。她想逃避，但是他一下子就抱住了她。她着急地、又怕又恨地在挣扎。她逃开了。她跑，他追。又一次她快要被捉住了，却又逃开了，她看见桌上有一把手枪，是他先前打死她哥哥时放在那里的。她便跑过去把枪抓在手里，对着敌人瞄准。日本军官轻视地迎着枪口走过来，嘴里还说着侮辱的话。于是她开枪，敌人摇晃地向后退。她又开枪，敌人倒了。他并没有倒下去，却靠在壁上。

空枪还捏在手里，冯文淑放心地吐一口气，她想她把比较吃力的一段演完了。周欣赞扬地拍起掌来。王东、吴平等附和着。曾明远却走过来指出追逐的一段中两个人的地位不大对，要他们重做。

冯文淑有点扫兴，不过她并没有抱怨的心思。她揩过汗以后，又耐心地照曾明远的意见重做了两次。

曾明远点头表示满意。故事接着发展：敌兵和汉奸又进来了。仍然是那四个人。他们意外地看见一支手枪正对着他们瞄准，便马上改掉早先那种凶恶样子。他们恭敬地向她求饶。于是她说出剧本里派定她说的那一大段话。这是长篇大论的宣传。结果汉奸觉悟了，敌兵投降了。她最后又说一大

段话，这是对老百姓说的，怎样抗日，怎样组织起来打击敌人，怎样准备而且从事游击战。她说得很清楚，很有力量，偶尔也漏掉一两句，让曾明远和周欣给她指出来。

最后大家同喊口号。敌兵做了俘虏，当地民众在秦月英的领导下发动了游击战。

在同志们的拍掌声中，冯文淑半羞惭地跑过去在板凳上坐下来，她谦虚地带笑嚷着：“我演得不好。你们不要笑我。”

“演得很好。明天的演出一定会成功，”张利英长姐似地夸奖道。

“曾同志，还要排一次吗？”冯文淑刚揩了汗，把手帕当做扇子摇了两摇，她故意问曾明远道。

“行了，普通宣传剧演到这样也就够了。你休息休息罢，”曾明远点头答道。

“不，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我们还要练习歌咏，”方天行着急地插嘴说。

“你们许多人，有没有我都是一样，”冯文淑接口说，她觉得热，也想休息片刻。

“不，你不能躲开。你唱得好，少了你大家兴致都差些，”周欣连忙挽留道。周欣知道冯文淑好动，爱唱歌，只要有人在旁边鼓动，哪怕她再疲倦，她也会参加练习的。

“对，冯同志一定要来，”吴平高兴地说。

“好，”冯文淑爽快地答应了。她站起来，把手帕系在腋下纽绾上。“你们不要等我，我去把衣服换过。”

“不要换，就穿这身衣服好。好久没有看见你穿旗袍了，

倒很好看，我就爱看你这样打扮，”周欣半开玩笑地说。她偏着头打量冯文淑的身子。一个美丽的、苗条的女郎！她满意地笑了。

冯文淑听见周欣的赞语，脸上现出了喜色。她不自觉地望望身上的旗袍。她的确喜欢它，就象她第一次穿军服时喜欢那种和男人衣服一样的军装。她的女性的爱美心又被唤起了（其实她并没有失掉过它！）。她感到象小孩子穿上新衣服似的得意。在这里只有她一个人穿这种衣服，而且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仿佛都是赞美的眼光。她觉得好象只有她一个人才是女子似的。她的脸上虽然始终带着笑容，但是红晕却泛上脸来。她觉得好象还在演戏一样，动作有些不自然了。她听见张利英在跟曾明远讲话，仿佛是在谈论她，她也没有听出什么话来。她看看周欣的震动的眼睛，便略略偏起头问一句：“你想起在上海的日子吗？”

周欣不知道冯文淑的话含得有什么意思。她的确想起上海的日子，但是这思想象一道电光很快地就过去了。她并没有感伤，她只觉得这时候喜欢看冯文淑穿这身衣服。她就回答道：“我只记得我同你在俄国菜馆统厢房里抄壁报的情形。”她的嘴包不住笑，好象这记忆是很愉快的。

“那天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冯文淑解释地接嘴说；“我还看见你咬手指头。”冯文淑笑了。

“真不害羞，这样大的人还吃手指头！”吴平过来奚落周欣道。

“哪个跟你讲话！你这个小汉奸，”周欣笑骂道。

“我不是汉奸，我已经反正了，”吴平得意地回答；他又指着姚民瑞弟兄：“他两个还是我的俘虏！”

众人大声笑起来。只有方群文板着面孔不做声；她看见杨文木一个人先走开了，便静静地跟着他走下楼去。

“不要耽搁了，我们下去罢，现在要开始了，”方天行大声催促道。

“好，我们就下去，”吴平、姚民瑞几个人附和道。他们拥着方天行下楼去。方天行在楼梯上还回过头来嘱咐道：“冯同志，你们要来呀。”

“我就来，我就来！”冯文淑不加思索地答道。她等方天行走了，忽然侧过脸低声对周欣说：“方群文今天好象很不高兴，板起面孔，一句话也不说。她有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周欣摇摇头答道。她马上想起了一件事情，便加一句：“昨天她接过一封信，不晓得信上说些什么话。”

“你没有问她？”冯文淑说。

“你知道她的古怪脾气。她不高兴的时候，你问她，她一个字也不说，”周欣答道。

张利英刚刚跟曾明远讲完话，走了过来，听见她们的问答，便插嘴说了一句：“她昨天刚知道一件不幸的事情。”

“什么事？什么事？你告诉我，”那两个年轻女子齐声问道。

“她的家完了，”张利英叹息地答道，她觉得心里很不好过。

“她家里还有什么人？”两个人又是差不多齐声发问。

“真是好奇的女孩子！这样的故事不是到处都有吗？你们还要多问！”张利英责备似地说。

“不是，我们是同情她，”冯文淑马上接嘴说，她不肯让周欣先开口。

张利英温和地看了冯文淑一眼，用了叹息的声音说：“其实完了倒好，也省得牵挂，现在究竟确定了。”她想起了方群文告诉她的话，又象长姐那样地说：“你们是不会了解的。”

“我们去，我们快去安慰她！”冯文淑并没有了解张利英的意思，她只觉得自己的同情心越来越强，她再也忍不住，便拉着周欣的手说。两个人匆匆地走下去了。

她们用快步子走下楼梯，冯文淑觉得旗袍的下幅有点妨碍她的腿，便抱怨道：

“这种讨厌的衣服，下回我一定不穿它。”

张利英望着她们的背影，曾明远羡慕似地称赞了一句：“到底是她们年轻些。”他脸上浮出了微笑。

下面，碉堡门前摊开一片阳光。视野突然开阔了。草香、土香跟着新鲜的微风来迎接她们。两个人好象被风吹落似地跳到地上了。

方天行和几个同志正拿着抗战歌谱随意哼着。他看见她们出来，高兴地说：“我们在等你们。”

冯文淑答道：“你们先唱罢。让我们歇一会儿。”她用眼光找寻方群文。那个同伴孤独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脸向着山下，似乎在眺望山坳中那一带枫林。杨文木也独自沉思地踱

来踱去。她觉得奇怪。不过她也不去管杨文本，就一直向着方群文走去。

冯文淑到了方群文的身边，周欣也跟着到了。方群文连头也不掉过来，好象不知道她们走近了一样。在那边方天行领着众人开始了抗战歌曲的合唱，冯文淑想：也许是歌声把脚步声掩盖了。她正要开口唤方群文，就听见了周欣的声音：“方群文同志。”周欣提高声音再唤了一次。

方群文吃惊地突然掉过脸来。她含糊地答应一声：“嗯。”脸色很阴沉，好象永远不曾受到阳光照耀似的。眼神也显得无力，但是它们似乎隐藏了许多东西。眼睛是干燥的。她们现在才觉得她在一天功夫就瘦了许多。

冯文淑下楼时觉得有许多话要对方群文说，这时却被一个简单的“嗯”字窘住了。一个“我”字在她的喉管里梗住，她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表达出她的感情。她侧过脸看周欣，周欣也正掉头来看她。周欣的眼光在问：“说什么？”冯文淑用眼睛回答：“你先说。”

“你们不去唱歌？”还是方群文先开口，她干巴巴地问道。

周欣觉得有话说了，便答道：“我们听说你得到不好的消息，是那件不幸的事情……”

方群文连忙打断周欣的话，她冷冷地说：“已经过去了。”她好象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提起那件事情似的。

“我们怕你心里难过。你今天一句话也不说。其实大家都……”冯文淑连忙接下去说，她觉得喉管突然畅通了。但是她刚刚说到“都”字，方群文又把她的嘴堵住了。

“我也晓得，”方群文冷冷地说，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她频频地点着头。“我感谢你们的好意。”她勉强地笑了笑，这笑容也是冷冷的。“是张利英告诉你们的吗？”她突然问道，但是不等她们回答，她自己又说：“她知道我的事情。”

“我看你今天精神很不好，你应该保重身体，”冯文淑感动地说。

“方群文同志，事情完了，伤心也没有用。你就忘了它罢，”周欣劝道。

“我并不伤心。既然得到了确实消息，我的心倒也安定了，”方群文低声答道；“我好象做了一场大梦，现在醒过来了，可是我也说不出做的是怎样的梦。我也说不出为什么要难过……”

“冯同志，冯文淑同志！周欣同志！”方天行和吴平、王东几个人在后面唤她们。两个人都朝那边看了看，顺口答应着：“就来。”但是她们还在注意地听方群文讲话。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会慢慢忘记的，”方群文用同样近乎悒郁的语调接着说；她听见那边又在叫她们，便对她们说：“你们快去，免得别的同志老等。”

“那么你也去，”冯文淑友爱地拉起方群文的手说。周欣在旁边附和道：“你跟我们一起过去。”

她们的举动在方群文看来是意外的，倒把她感动了。她望着这两个年轻的同伴，眼睛渐渐地亮起来，脸上的阴影也开始在消失。她的嘴唇一动，她想笑，干燥的眼睛忽然润湿了，她控制不住，让几句感情的话不经过她的思考，直接吐了出

来：“还是你们好。你们比我大量。我总是想着个人的事，我被那些事磨得够苦了。”泪珠开始滴下来，方群文连忙把头掉开。

方群文的眼泪是不容易见到的，现在跟着诚恳的自白落在她们的前面，把这两个少女的心搅乱了。冯文淑觉得自己心里激荡得厉害，不知道讲什么话好，不敢再开口，只是紧紧地握着方群文的那只手。

“你们在讲些什么？”张利英的温和的声音解围似地在冯文淑的背后响起来。仍然是那个平静的善良的面容。她知道她们在谈什么事，而且她听见了方群文的话，现在她故意发问来打岔她们。

“没有什么，”方群文答道，她用手帕在揩眼睛。她不把脸掉向张利英，却补充地加一句：“她们拉我去练习歌咏。”她的左手还被捏在冯文淑的手里。

“那么我们就去罢，”张利英催促道。

方群文回过头来，看看她，提醒地说：“你们忘记了我是左撇子？”

“不要紧，我们快走，他们又在催了，”周欣答道，她还对冯文淑眨眨眼睛。冯文淑和她两人便把方群文拥着走到方天行的面前。

“真难请，架子好大……”姚民锋看见冯文淑她们过来，便嘲笑道。

“人家有事情，”冯文淑顺口答道。

“什么事？有秘密话改天说不是一样吗？”姚民瑞接口说，

他只顾望着她笑。

“我不跟你说。为什么你们大家今天老是望着我？难道还不认识我吗？”冯文淑昂起头带笑地问道。

“我要给你画张像。你今天特别漂亮，”姚民瑞摸出拍纸簿来说。

“这样才象一位小姐，”王东忍不住羡慕地接上一句，但是他马上又想起那个晚上她们对他的批评，连忙闭了嘴，埋下头来。

“我不许你画！”冯文淑撅着嘴说，她的脸马上红起来，她有点害羞了，不过她的表情还是很愉快的。

“不要再讲空话，现在人齐了，我们再来开始罢，”方天行挥动着指挥棒，大声对众人说。

众人果然静下来，方天行又说：“我们唱第一支歌，《我们是中国的老百姓》。请大家站拢一点。”

没有舞台，也没有指挥台，只有碉堡前面的这块平地。众人背朝着碉堡站成一排，面向着在阳光下闪烁的重叠的山峰。

空气似乎静止了，苍蝇的叫声显得特别响亮，众人都很兴奋，仿佛一股力量等着要从他们的胸膛里奔出来。

“预备——‘我’——”方天行开始大声说，跟随着他的指挥棒的舞动，大合唱响起来了：

我们是爱自由和平的人民

我们是中国的老百姓……

“听，飞机！”吴平忽然警觉地叫起来。

众人立刻闭上嘴侧耳一听，果然是飞机的马达在响。所有的脸都仰望着天空。

明亮的蓝天使人眼花撩乱。众人的眼睛通过那无数道金光费力地在空中找寻。

“不象是轰炸机，”曾明远的熟习的耳朵使他发出这样的推论。

机声渐渐逼近，自小而大。声音似乎就在众人的头上。许多只眼睛在空中搜索。

“在那里，”姚民瑞忽然叫起来，他伸手指着天空。随着他的手指望上去，他们看见了两只灰白色的铁鸟，刚刚从头上斜斜掠过，飞得不高，翼下的太阳标记十分鲜明。他们的眼睛受不住强烈的日光，一下子就失掉了铁鸟的踪迹。等到他们再看见那两架敌机，它们已经向着县城飞去了。

“侦察机，现在过去了，”曾明远放心地说。

“不要管它，我们还是唱我们的歌，”冯文淑微微一笑，大声说。她又望着方天行：“方同志，请你再从头唱起。我们跟下去。”

五

太阳象一团火在人们的头上燃烧，热气沉重地压下来，尘土象受了煎炒一般紧紧地贴着地面。空气仿佛就停滞在空中。没有风，没有活动。坡下是一片黄。连绿树也现出病态的黄色，仿佛沾染了黄沙一样。枫林中正吐着烈焰，好象有人点起一把火，叫整个树林熊熊地烧起来。

陆续从碉堡里走出来，众人觉得一片金光直射着眼睛，叫他们几乎不能睁眼。

“太阳好厉害！”冯文淑揉着眼睛自语道，她似乎说出了每个人心里的话。

“你怕吗？这样的太阳也不会有多久了，”周欣霎霎眼睛对她笑道。

“哪个才怕！我哪天不是来来回回跑过几趟的！”冯文淑不服气地说，她的嘴从来不肯认输。

“你看你鼻子上又在出汗了，”周欣指着冯文淑的鼻尖说。

“你不要讲我，等一下你头上就要冒汗的，”冯文淑笑着辩道。

“你们两个小妹妹真没有办法。一讲话就要吵。这种小

事有什么可争的？”张利英插嘴哂笑道。

“天气这样闷热，要不开口嚷嚷，人都闷死了，亏你做姐姐的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冯文淑笑道。

同伴中有几个人发出了毫无牵挂的笑声。空气似乎被笑声搅动了，让一丝丝凉风透进来。大家觉得心里稍微爽快一点。

这一行人走着下坡的路，仍然是十二个同志。有的挟着壁报和宣传画，有的拿着零碎的东西。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们听见饥饿在自己的肚里叫。面前这条蚯蚓似的黄土路好象就没有尽头。但是年轻的脸上始终露出愉快的表情，没有人发过半句怨言。大家动着轻快步子，有的人还哼着抗战的歌曲。

路终于缩短了。熟习的脚步知道已经踏过了若干路程。眼睛还可以给它们作证。土在燃烧，在冒烟，大地似乎变成了蒸笼，每个人的内衣都浸透了汗水。但是没有什么力量会使脚步停住。他们很快地就过了那座孤坟。

“王东，你的诗做好没有？”冯文淑看见坟边松树就想起了那个晚上的事情，便含笑问道。

“就要好了，就要好了，”王东得意地答道；“我只等改一改，就拿给李南星同志，我已经跟他说好登壁报。”

李南星在后面看看王东，也没有说什么。王东说的是真话。

“登壁报？老百姓恐怕看不懂罢，”周欣插嘴说。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王东迟疑地说。

“我看这样的好诗还是寄到武汉的大刊物上发表好，”冯文淑故意嘲弄地说。

“这倒是真话。武汉好几个刊物的编辑我都认得，”王东并没有撒谎，不过他跟那些人并没有特别的交情。

“那好极了。我还记得什么‘一个梦’，又是‘燃烧的眼睛’，……的确是好诗，”冯文淑鼓舞地说。

王东受宠若惊地非常高兴，脸上全给得意的喜色占据了。他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才适当。他忽然用略带颤动的声音问冯文淑：“你看他们会登吗？”

“他们一定登，你不是说认得编辑吗？”冯文淑答道，她费了大力才把笑声咽下去了。周欣的嘴里却迸出一声笑来。冯文淑连忙触一下周欣的膀子，不过王东并没有注意到，他完全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了。

“我想他们一定登的，”王东充满自信地说。然后他又点点头，加一句：“他们向我要过稿子。”

没有人相信王东的话。姚民瑞从前面回过头来，故意讽刺地问道：“那么你介绍我给武汉刊物投点漫画稿，好不好？”他不等王东答话，又加上一句：“靠你的面子一定没有问题。”

“那自然，”王东有把握地答道。但是他听见了一些窃笑声，他的自信心有点动摇了，他迟疑一下，连忙补充一句：“不过现在信常常交不到。”

别人并没有注意王东，他们开始谈论另外的事情。前前后后都是谈话声。姚民瑞的头正靠在他弟弟的耳边。他听见王东的后一句话，忽然哈哈地笑起来。

王东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不再说话了。他听见别人的笑声，他知道这是讥讽的笑。他脸上的皮肉开始在搐动，觉得有点发痒似地不舒服。

但是笑声和类似讽刺的话语很快地就消失了。他听见曾明远在他后面说：“杨同志，你还是回去躺躺罢。”

“不要紧，我还可以走，”杨文本用干涩的声音答道。

王东惊讶地回头看，杨文本一张脸突然变得象涂上了一层墨汁似的。两眼失神地睁开一半。他虽然仍旧在移动脚步，身子却摇晃起来，不象平日那样步履坚定了。

“杨同志，你还是回去罢，我看你的老毛病又发了，”方天行关心地劝道。

杨文本没有答话，他还在往前走，脸色非常难看，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显然那个老朋友——疟疾——又找到了他。

“杨同志，你不能再走了。你还是回去休息的好，”张利英温和地说。她又提高声音：“哪位同志陪杨同志回碉堡去？”

“我赞成王东同志去，今天王东同志工作不多，”冯文淑在前面响应似地大声说。杨文本勉强抬起眼睛瞪了冯文淑一眼，似乎怪她不该在这个时候开玩笑，不过冯文淑和别人都不曾觉察出来。

“不，我不会照料病人，”王东着急地说。

“你是不是怕挨饿？不要紧，我们给你带馒头、饼子回来，”冯文淑故意作弄地再说一句。周欣在旁边推她的膀子，低声劝阻道：“不要作弄他了。他哪里肯去？杨文本也不会要他陪去的。”

王东听见冯文淑的话，以为众人真要派他回碉堡去，他更着急了，振振有辞地辩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怕挨饿，我是不会照料病人。我看还是让一位女同志陪去罢。”

杨文本有点生气了，不高兴地在后面嚷起来：“我不回去，我也不要耽误你们的工作。”他刚闭上嘴，突然觉得心里一阵难过，又象是在发冷，四肢发软，有点支持不住，便收回先前的话，有声无气地说：“我一个人回去。”说了，他不等别人讲话，就掉转了身子。

“那么你把我的棍子拿去。”曾明远忽然想起了自己捏的那根手杖，便把它递给杨文本，他接着又说：“我送你回去，我等一阵再出来。”

杨文本感动地勉强笑了笑，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快乐的影子。他低声说：“有了棍子就行了。你还有很多工作。”

“我送杨同志回去，”方群文突然提高声音说。这是一句意外的话，好几个人眼光都射在她的脸上。她从容地说下去：“我今天不大想吃东西，我又没有多少工作。我还可以顺便照料杨同志。”

杨文本没有答话。他默默地看她一眼，身子摇晃一下，他连忙用棍子撑住。众人在这时才发觉方群文的脸色也不好看，那里没有一丝阳光，却悬垂着不少疲倦的阴影。

“好，你也该休息一下，我看你气色也不大好，”张利英关心地说，她又叮嘱方群文道：“不要多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在外面还是自己身体要紧。你就好好地休息一天罢。”

方群文点头答应着，她对张利英笑了笑，亲切地说：“我晓

得。你放心罢。”

“你要不要我们给你带点吃的东西？”周欣过来问道。

“我不想吃什么。家里还有水，”方群文答道。

“我们给你带点饼子回来，”冯文淑友爱地插嘴道。她看看方群文和杨文本，然后又用对自己哥哥姐姐说话的调子道：“我今天早点回来看护你们，”她还怕他们不了解她的意思，便又加上一句：“我是当过看护的。”

“你们不要多耽搁他们，还是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罢，”曾明远在旁边提醒地说。他又嘱咐方群文：“方同志，你要早吃奎宁啊。”

杨文本、方群文两人便跟众人告了别，转身朝碉堡的方向走了。

曾明远和三个女同志都回过头看他们的背影。冯文淑和周欣接连掉头三次，都看见同样的景象：两个人走得慢慢的，杨文本在前，他的棍子搅起了不少的尘土，方群文在后面跟着。

“希望方群文不要病倒才好，”周欣低声说。

“想不到她偏偏遇着那种不幸的事情，”冯文淑接嘴道，她只是简单地知道方群文丧失了一个家。她又掉过头去看后面。方群文的背影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只有一股一股的尘土在阳光里寂寞地飞舞。

不久他们到了村子里。一阵蝉声迎着他们。看见那黄土的矮墙，那空地，那树荫，那矮门，好几个人愉快地唱起来，加快脚步走过去。躺在地上睡觉的黑狗便突然站起，欢迎似地

向着他们叫了几声，慢慢地摇着尾巴走了几步。一个中年妇人抱着婴孩从屋里走出，摇着扇子带笑地招呼他们。冯文淑和周欣便走过去跟她讲话。

一阵“伊呀”、“伊呀”的声音从屋里送出来。这声音对他们已经是很熟习的了。但是冯文淑还不能完全驱除她的好奇心，她就让周欣跟那个妇人讲话，自己先走进屋里去。她揭下帽子，把它同手里拿的图画等等都放到那张方桌上，便走到屋角去看老妇人摇纺车。这个瘦小而有精神的老妇，很象她的祖母。她的祖母死去不过三年，祖母临死前冯文淑还到家乡去看过她。年纪已经过了六十，祖母还有着壮年人的精力。种花，指挥佣人照料房屋，打扫园子，念经，从天亮到晚上就不曾有过一刻的休息。面前这个老妇有着和她的祖母一样的身材，一样的年纪，一样的颧骨凸出的瘦脸，也有着一样的缠过的小脚。她每次到这里，总看见她坐在矮凳上，纺车旁，用她那生茧的手不停地、专心地摇着车柄，挽着线子。她不爱多讲话，工作时即使有人站在她旁边，向她问话，她除了简单地回答一两句外，并不掉头看别人。但是她的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安静的微笑，这笑容里含得有一种极大的忍受的力量。

“老奶奶，你休息一下罢，”冯文淑亲切地说。她习惯了用这种称呼叫那个老妇。她听说这个老年人不论昼夜，只要有功夫，就会在纺车旁边坐下来，勤快地纺着线子。她常常好奇地想，一个人怎么可以安静地长久过着这样一种单调的生活。她有时候也曾偷偷地观察过这个老年人，她便发觉老太婆虽然和蔼地看人，但是她（老太婆）的眼光却常常是迟钝的，脸上

的表情也很呆板。因此她每次看见她在纺车旁边工作，总要同情地说一两句话劝她休息。

“俺老骨头做惯了，不累，不累，”老婆婆回答道，象平常那样，她的手仍旧熟练地动着。这次她却略略侧起头来看冯文淑，温和地说：“先生，你们才来？今天热啊！”她的脸又俯下去了。

“今天真热，你不怕吗？”冯文淑接着说。她把领上扣子解开，用手帕揩汗。

同志们陆续地走进来。李南星的声音唤着冯文淑的名字，他还说：“你不做事，站在那里做什么？”

冯文淑还没有开口，周欣正抱着那个妇人的小孩进来，便替她答道：“她看见纺车就不肯走。这样大的人还没有见过纺车，真笑人！”

“自然啊，在上海住惯了的小姐，怎么会见到这种东西？”姚民锋接下去说。

“不要你们管，就算我见识浅，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冯文淑装出嗔怒的样子说，她的嘴角却还挂着微笑。她看见周欣抱着小孩显出不大合式的样子，便走到周欣的身边说：“给我抱。”她从周欣的手里接过了孩子。两颗小黑眼珠有趣地望着她，那张小黄脸动了动。她觉得孩子变得重了，她两手小心地捧着。方天行过来逗弄小孩。小孩开始乱动。她觉得手酸了，把小孩换了换方向，小孩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她抱着他，不知道怎样才好，也不晓得应该如何把小孩诓得不哭。她试了试她的方法，没有用。同志们在旁边笑起来。她把小孩

还给周欣，周欣不肯接。她没有办法，正在发急，看见张利英端了菜碗出来，等张利英把菜碗放下，她就走过去把小孩交给张利英。

“我不要抱，我还有事，”张利英虽然口里推辞，两只手却不得不把小孩接过来。

“我总有办法，”冯文淑笑道，她得意地看了看众人。

张利英刚刚抱过小孩，正在逗他，那个纺线的老妇突然停了车，摇摇地走过来了。

“先生，给俺抱，”老太婆温和地说，把手伸了过去，干瘪的脸上挂起笑丝来。张利英愉快地把孩子交给她，看见她马上把孩子弄得服服贴贴的，看见她俯着头在对孩子讲话，张利英也微微笑了。

吃饭的时候，众人围了方桌站着。虽然捧着土碗，用南瓜、豇豆几样素菜，下着糙米饭，大家却吃得津津有味。

“伊呀”的纺车声又响起来。小孩如今在母亲的怀里闭上眼睛要睡了。这位母亲大约有三十多岁，黄黄的椭圆脸上总是现着那种温顺的、呆板的表情。她在旁边看他们吃饭，心里永远有这样的想法：她委屈了他们，没有让他们吃到好的饮食。她看见有人放碗了，就道歉地说：“先生吃不饱罢，没有好菜。”他们安慰她，夸奖她。她一时高兴，一时又觉得不安。她又高声唤她的女儿：

“银姐儿，茶拿出来。先生们吃好饭啦。”

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清脆地答应着。她那清秀而缺少血色的脸上还有天真的表情，她提着一把大瓦壶走出来，另一只

手还拿了两三个空碗。一根大辫子跟着她的头微微摇摆。她把碗放在板凳上，从热气腾腾的壶嘴里，倒出淡黄色的茶汁来。她一边斟，一边看看张利英、冯文淑她们，亲切地邀请说：“官长，请喝茶啊。”

“我们自己来倒，”冯文淑说着，连忙走过来，但是两个碗都斟满了。银妞儿含笑地把壶放在板凳脚边。冯文淑只好嘱咐她：“你以后不要这样客气啊。我们是天天来的，还有你又忘记了，喊‘先生’，不要喊‘官长’。”银妞儿不作声，只是站在旁边，侧着头好意地用微笑来回答。冯文淑喜欢她这种态度，便高兴地对她再说：“银妞儿，你就象我们的小妹妹一样。”银妞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冯文淑又说：“你就象我们大家的小妹妹，你懂我的话吗？”银妞儿点点头。

“你恨不恨日本鬼子？那些杀人放火的鬼子兵！”周欣跑过来，插嘴问道。关于日本兵的事，她已经对银妞儿讲过好几次了。

银妞儿点点头低声答道：“俺恨鬼子兵。俺听见先生们说过鬼子兵杀人放火。”

“我今天还带得有图画来，”周欣说，“我拿给你看。”她跑去把大幅的宣传画拿来了。

“周欣真不愧为宣传家！”冯文淑觉得有趣地赞了一句，她这句话是对着姚民瑞说的。他端着碗在旁边喝茶，眼睛却向着这面。冯文淑省悟地看那根板凳，斟好的茶给人端走了。她觉得口干起来，便着急地对姚民瑞说：“你们把茶给我吃了。我先来的。”

“你拿自己吃过的饭碗倒茶，不是一样？哪个叫你不先喝！”姚民瑞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他接连喝了两大口茶，就象在喝甘露一般。

“把你的给我，人家口渴得很，”冯文淑命令似地说，其实倒象是小孩子的口气；她一半的注意又给周欣的话吸引去了。周欣正在给银妞儿看一幅图画，一面在解说画中的事实。

“好，不要急，我让给你罢，”姚民瑞说，他的圆脸上露出了友爱的笑容。他把剩着大半碗茶的饭碗递到冯文淑的手里。冯文淑满意地说声“谢谢”，捧着碗接连喝了几大口，差不多喝光了。她听见姚民瑞轻声说：“等我给银妞儿画个像，”她看见他从衣袋里掏出拍纸簿，连忙把空碗交还给他，说一声：“对不起，请给我拿过去。”

“你总是这样的脾气，什么时候才改得了？”姚民瑞带笑地抱怨道，他仍旧带着友爱的表情接过了碗。冯文淑听见这句话忍不住笑了。她不再说什么，心里想：大家都对我这样好！她觉得一线温和的光突然射进她的心中，她没有牵挂地、畅快地微微笑起来。

周欣的解说还没有完。画上现出正在燃烧的房子，一个半裸的妇人死在屋前地上，旁边还躺着一个七八岁男孩的尸首。一个鬼子兵用刺刀在戳一个跪在地上的农人的胸膛，旁边站着几个鬼子兵拍掌大笑。冯文淑听见周欣愤怒地说：

“鬼子兵打进一个地方，不管是城里乡下，他们就是这样地对待我们老百姓。没有例外！（这句话是随口说出来的。）鬼子兵都是凶狠的、恶鬼一样的东西。你看刺刀多亮。这个老

百姓跟他们又没有冤仇。他们烧了他的房子，杀了他的孩子，害了他的妻子，现在又用刺刀来戳死他。”她用手指头指着那些拍掌大笑的人：“这些鬼子兵看见杀人，好象在看戏一样，还在高兴地发笑！他们一天不晓得要杀死多少人。听说杀了人还要照像。”

抱着小孩的妇人走过来听周欣讲话。纺线的老妇人也走了过来。还有几个同志也站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周欣大方地继续着她的宣传工作，没有露出丝毫害羞的样子，虽然王东不转睛地望着她，脸上似笑非笑，现出可笑的奇怪的表情。

“真是伤天害理。这些人不晓得是啥鬼怪变的。也是俺们活该遭劫！”老太婆啧啧地叹息道，她的脸上罩起一层阴影，她同情地望着画中的三个受害者。

“人家先生们说，是鬼子兵闯进中国来害俺们的，俺们的大兵要赶他们出去，”抱小孩的妇人为了表示自己知道得多一点，就把她从年轻的先生们那里听来的话解说给婆婆听。她的脸上忽然现出一阵兴奋的喜色：“妞儿的爹那天带信回来，不是说他把鬼子兵赶出中国就回家？”

“是啊，”老妇人半信半疑地点头说。她似乎沉在思索里面了。但是她想的总是过去的事，现在她想起了大半年前，她的儿子出门时候的情景。过了片刻她又回到纺车旁边坐下去。

“先生，你认识这家人吗？他姓啥？”银妞儿忽然指着图画畏怯地问道。

“这是图画，”冯文淑略带哂笑地说。但是周欣却另外地

回答银妞儿：

“他也姓王，我们走过那个地方，见过他的。”

“这个弟弟乖不乖？”银妞儿指着画中的小孩又问道。

“我们跟他玩过。他很会讲话，又白又胖，”周欣做出说真话的神气答道。接着她又严肃地往下说：“可是他给鬼子兵杀了。死得多惨！”她看见女孩的天真的眼睛罩上了怜悯和怨愤的表情，便突然问道：“你恨不恨鬼子兵？”

“俺恨！”银妞儿不加思索勇敢地答道，她那略带憔悴的脸因了兴奋的红色显得健康了。

“你喜欢不喜欢你爹去打鬼子兵？”周欣又问。

“俺喜欢，”银妞儿立刻回答，骄傲的微笑象闪电似地在她的脸上亮了一下。

“要是鬼子兵打到这里来，你干啥？”周欣正经地追问道。

“俺……”银妞儿答了一个字，就接不下去了。她不自觉地看了一下图画，脸上现出畏惧的表情，但是这表情很快地就消失了。

“你怕鬼子兵？”周欣还不放松地继续问道。

银妞儿羞惭地点点头。

“你是一个人才怕鬼子兵呢？还是有很多人在一起，你看见鬼子兵也害怕？”冯文淑温和地插嘴问道。她听见银妞儿的前两个回答还拍过手，这次她觉得自己了解银妞儿害怕的意思，忍不住出来帮忙，向银妞儿解释清楚。

“人多俺就不怕，”银妞儿笑着回答。

“那么你不跑？”冯文淑又问道。

“人多俺就不跑。”

“你打不打鬼子兵？”周欣问道。

“俺不知道，”银妞儿摇摇头。

“要是有人给你一支枪，你看见鬼子兵来了，你打他不打他？”冯文淑再问道。

“俺不知道。俺不会打枪，”银妞儿摇摇头答道。

“不会打枪，就用斧头，用刀！”周欣接着说。

“俺们妇女不打仗，”银妞儿迟疑地说。

“打鬼子兵，男女都是一样。你不打他，他就要杀死你，烧你的房子。你不打，你就让他杀死你吗？”

“大家打鬼子兵，俺也打，”银妞儿爽快地答道。她又恳切地问：“先生，你们也打鬼子兵？”

“鬼子兵是大家的仇人，是我们全中国人的仇人。我们大家一齐打鬼子兵。要把鬼子兵全赶跑了，才过得到幸福的日子，”冯文淑忽然挥着手演讲一般兴奋地说。

“先生，你说鬼子兵真要到这儿来吗？”银妞儿的脸上虽然没有畏惧的表情，但是她在冯文淑闭了嘴、周欣还没有开口的时间中，还耽心地问道。

这时曾明远同张利英把银妞儿的母亲（抱小孩的妇人）招呼到门口去讲话。

“不要怕，鬼子兵打不到这里来，”冯文淑凭着她那个单纯的信仰勇敢地答道。

拿着铅笔在作速写的姚民瑞忽然笑起来，开玩笑地说一句：“你保险？”

“只有汉奸才希望鬼子兵打过来，”冯文淑故意做出嗔怒的样子答道。

“好个公式主义者！”李南星移动着他那鹭鸶般的长腿大步走过，听见这句话，顺口讲了一句，也不看冯文淑，就拿着东西出去了。方天行和吴平在外面等候他。

冯文淑微微红了脸，抬起眼睛去看李南星。在外面狗忽然汪汪地叫起来，接着响起了吴平的笑骂声。银妞儿的母亲笑容满面，张着嘴接连说：“先生们太好了，俺说不要这么多。……给先生烧饭算啥呢？……先生们自己的大米。……还要你们给钱。……你们先生们都是为国家做事，远远地到俺们这个小地方来，吃没有好的，喝也没有好的。……你们还要给这么多钱。……俺收一半就是了。……俺不好多要先生们的钱。……谢谢先生们，谢谢先生们。……多歇一会儿罢，今天真热，多喝碗茶也好。……银妞儿，银妞儿，你看茶喝光了没有？再给先生们烧茶啊！……”

银妞儿马上答应着就跑开了。她提起瓦壶走进里面去。周欣卷起画来。她看见姚民瑞还在旁边动着铅笔，便说：“画了几张了？给我看！”她伸过手去。

“不要动；你等他画完罢，”姚民瑞没有理她，倒是在旁边专心看他绘画的他弟弟姚民锋着急地阻止道。

冯文淑已经走到张利英旁边了。银妞儿的母亲正把钞票揣在怀里，红着脸露出感激的表情说：“先生们，请坐啊，请坐啊，俺给先生们拿扇子来。……真热啊。”孩子在她的怀里睡着了。她不揩去额上积满的汗珠；苍蝇飞上她的左颊，叮在那

里，她也不把它赶走。她还要去给他们找扇子抬板凳。

“王大娘，你不要动了，我们就要走的，”张利英感动地劝阻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天热啊，多坐坐罢，你们先生们也太辛苦了，”王大娘诚恳地挽留道。

“我们要走了。我们天天来的，你不要客气，反正下午还要来，”曾明远温和地答道。

“走罢，”李南星催促道。周欣和姚氏弟兄也拿了各人的东西走出来。

王大娘看见挽留不住他们，只得惋惜地说：“茶就烧好了，喝碗茶再走罢。”她又恳切地邀请道：

“先生们，下半年早点来啊！”

六

镇上充满着阳光、灰尘和苍蝇。低矮的屋前有熟习的、朴实的脸。迎接这些年轻人的都是亲切的眼光。在大树旁边小蓬莱饭馆门前，一个胖子敞开衣服坐在板凳上喝茶。

“曾团长，从哪儿来？有啥新闻？喝碗茶罢，”胖子热诚地招呼曾明远道，他拿着扇子站起来。

“我就要到城里去，刚才喝过茶了，”曾明远笑着答道。

“天热啊，进来坐坐罢，先生们都很辛苦，请进来喝碗茶，”胖子客气地邀请道。

“不坐了，时候不早了，我还要赶着今天回来。郑老板，都是熟人，你何必客气。”

“各位都到城里去？回来请到小店吃饭。”郑老板堆着满脸笑，望望其余的团员。

“不，只有我跟李同志两个人去。他们在镇上有工作，”曾明远说，他指了指李南星。

“郑老板，我们后天要演戏，你看不看？”冯文淑和周欣等一路讲着话走过来。她站在树下，高兴地对胖子说。

“是不是还在李家祠堂里演戏？”胖子兴奋地问道。这在他是一个好消息。“编的新戏吗？”

“对啦，”两个字答复了两句问话。

“郑老板，你一定要去看啊，我们冯文淑同志演主角，很——”吴平顽皮地笑着插嘴说。他信口说下去，但是说到“很”字，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容词了。他迟疑了一下，连忙凑数似地说出“热闹”两个字来。

冯文淑瞪了吴平一眼。郑老板却满意地答道：“一定看。冯先生上回演戏俺看过，跟真的一样。”

听说要演戏，隔壁店里的人都跑过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小，大家围着冯文淑几个人絮絮地问话。

郑老板再邀请曾明远他们进馆子喝茶，曾明远仍旧辞谢，这次却拉着李南星走了。剩下的同志便分散开，开始做各人的工作。

吴平同姚氏弟兄，拿着写好的壁报，走到李家祠堂门前，在墙上贴起来。好几个人跟着他们走到那边去。

“快看啊，鬼子兵杀人！”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看过图画以后激动地嚷着，朝斜坡下面跑了，他也许回去找别人来。

冯文淑和周欣几个人仍然被那些爱问话的人包围着。大家必须答复那些似乎就没有完的问话。张利英和方天行走开办事去了。王东还留在她们的身边，但是他的舌头这天却好象不大灵活似的，他说话特别少。

“周欣，把你那张漫画拿出来，”冯文淑忽然想起了周欣拿的那张画，脸上露出兴奋的颜色，她小声提醒周欣道。

周欣点点头，就把图画展开来。冯文淑连忙介绍道：“请大家看看周同志的这张画。”

众人的眼光全射在一张宣传画上。人声嘈杂，脸和手争先地挤过来。一些人凭着自己的单纯的见解发表言论。

周欣象一个传教者似地拿着画讲起来。还是那同样的解说，那同样的浅显道理，那同样的带煽动性的语句，直诉于那些朴素的心。

对于冯文淑这全是听熟了的话，但是她仍然静静地听着，甚至带了赞赏地听着。她羡慕周欣那张会讲话的小嘴。后来她也不能够沉默了，她不时发言补充周欣的解释。

她们的话在听话人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同情和憎恨。而听众数目在增加，同情和憎恨也在增加。人声仍然嘈杂。这中间可以听出咒骂鬼子兵的话。空气变成严肃。听话人的表情也变成严肃。周欣的声音也跟平时不同了。这个身材短小的少女站在树下，阳光没有射上她的脸。但是她的脸上自然地罩着一片红光，军帽下面前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眼睛里发出好象要照透人心似的亮光。她挥动着右手（她手里的那张画，已经交给王东拿着了，同时捏着图画纸角的，还有听话人的两只手，那是自然地慢慢伸过来的），她显然是被感情和理想带到另一个境界里去了。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她忘记了自己的时候——鼓动着她的好象并不是她那颗高中学生的心，却是一个在苦难中奋斗的民族的心。她是在为许多人工作，为许多人说话。所以站在一些年纪比她大的陌生人面前，她可以勇敢地滔滔不绝地讲话。不但讲话，她还在编造故事，而且好象在叙述真正事实一样详细地、激动地描绘着。女人的眼圈发红了，男人的眼睛发火了。她的话吸引着

每一只注意的耳朵和每一颗单纯的心。

冯文淑看到眼前这幅动人的图画，她感动，激动，并且也得到很大的鼓舞。她似乎和那些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有着同样的感情。周欣的话也就是她想说的话。那些人所表现的同情和憎恨，也就是她的同情和憎恨。

阳光似乎在燃烧，心也似乎在燃烧。汗珠聚在每个人的额上。但是大家都挤在小蓬莱前面，忍受着烈日的烘烤。空气干燥，沉重，仿佛漫天的尘土压下来，重甸甸地压着每一颗心。

突然周欣的响亮的声音象一股风似地吹散了众人心上的尘土：

“你们看过这张图画，听过这个故事，你们现在说：恨不恨鬼子兵？”

“俺恨！俺恨！”各种各样的声音嘈杂地回答。

“你们要不要打鬼子兵？”

“要打！俺要打！”

“你们怎样打鬼子兵？”周欣出乎众人意外地又问了一句。

迟疑一下，两个人先后答道：“俺当兵打鬼子。”别的人一时答不出话来。

“答得好，”冯文淑忍不住赞了一句。

“对啦，”周欣接着说。“该当兵的自然去当兵。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齐心打鬼子，不愁把鬼子打不跑。有事情的人还是照旧做事情，不过大家要组织起来，这就是说不要你顾你，我顾我的，大家要有一个心。万一鬼子打来了，我

们大家就齐心对付他。我们要当游击队，我们的一颗米，一口茶，都不要给鬼子吃。他们没有东西吃，就住不下去。”

“俺不给他们，他们要抢啊！”一个中年妇人耽心地插嘴说。

“我们晓得鬼子们要来了，就把吃的东西先搬开，什么都不让他们抢走，”冯文淑解释道，她的声音比周欣的清脆。周欣的声音有点嘶哑了。

“俺没枪怎好打鬼子？”小蓬莱的伙计，十七岁的黑脸青年问道。

“没有枪，不要紧。有扁担的用扁担；有锄头的用锄头；用刀也行，用什么东西都行！”周欣叫喊似地答道。

冯文淑看见那个青年的脸上现出不大了解的神气，便补充地接着说：

“游击队不比得正规军，用什么武器都可以。譬如说，鬼子兵来你就躲开，趁他不提防，你就给他一下。他人多，你就让开；他人少，你追过去打他。他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却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象这样做，你就只有一根扁担，也会打倒一个鬼子兵，夺过他的枪来给自己用。”

冯文淑应用了她关于游击战的知识，她自己觉得还解释得相当清楚。周欣带笑意地看了她一眼，她颇为得意。

“鬼子真的要来，俺就一个人给他一刀，”那个伙计点点头好象很有把握地说。

发问的自然不止一两个人。周欣和冯文淑必须回答种种的问话。她们觉得话说够了，冯文淑又提议教老百姓唱《游击

战》的歌。

这一次王东也开口了。三个人一字一字地教着，解说着，直到后来一部分人跟着冯文淑的高音唱起来：

游击战，游击战，……

有的人不好意思地小声哼着，有的人脸上现出滑稽的笑容。女人们好奇地望着那些张开的嘴。年轻的人，少年和孩子，男的和女的，都唱得很起劲，他们没有顾虑，也不知道害羞。

冯文淑、周欣和王东都闭了嘴，年轻人还用不和谐的声音继续唱着。黑脸的伙计端了三碗茶来，客气地送到冯文淑等的手里。

“先生，请喝茶啊！”黑脸伙计带着诚恳的微笑说。冯文淑满意地接过了茶碗，虽然是浮着油的淡黄色茶汁，她也当作上好龙井一般地喝了。水是微温的，她喝了一大口以后，望着周欣，忽然含笑地说：“周欣，我看见你刚才说话的神气，我想起了《电》里面的李佩珠。就是在工会门前广场上大声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挖苦我，”周欣笑了笑，故意不承认地说。

“你说她是李佩珠，那么你就是慧，”王东自鸣得意地望着冯文淑插嘴道。

冯文淑冷笑一声，自语似地说了一句：“我可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呀！”

周欣噗哧一笑，把最后一口茶呛了出来。黑脸伙计连忙

把茶碗接了过去。“笑什么？笑什么？”冯文淑追问道。

“看你那一头浓发，你倒有点象慧……”周欣答道，她带着神秘的微笑向冯文淑霎霎眼睛，冯文淑知道她还有话咽了在肚里，便威胁地指指她说：

“回去我再跟你算帐。”

王东在旁边傻瓜似地微笑着，他的嘴唇奇怪地、微微地搐动，他似乎想说话，又不敢说出来。

周欣把嘴放到冯文淑的耳边，轻轻地说：“王东倒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冯文淑看了王东一眼；她听见周欣第二句话，明白那个意思，便抢先答一句：“大概是为了你。”她得意地笑了。

“哪里是我？明明是为了你！”周欣报复地说。她指着冯文淑的脸颊：“你看你这对可爱的酒涡。”

冯文淑的脸颊一直是红红的，这时红色突然加深了。她马上啐了周欣一口，就拿着茶碗往小蓬莱跑去。黑脸伙计虽然也伸过手来，但是冯文淑却笑着不给他，她自己把茶碗放好在饭馆里的方桌上。

“冯先生，你再喝一碗？”胖子老板殷勤地说，“我来给你斟！”他走过来拿茶碗。

“不喝了，郑老板，谢谢你的茶，”冯文淑连忙道谢说；她揭下帽子，用手帕揩了一下额上的汗，把军帽当作扇子摇了摇，预备走出去。

“冯先生辛苦了，不坐坐？”胖子陪笑道。

“谢谢你，我们还有事情，”冯文淑客气地答道。她走出了

门，忽然又回过头来嘱咐道：“郑老板，后天来看戏啊！”她笑了笑。“你多找些人来罢。”

“一定的，一定的，”胖子动着他的肥腮连连笑答道。

周欣带着满意的微笑在等候冯文淑。一个年轻女人过来向她问一句话。她简单地、恳切地回答了。冯文淑听见了答语，知道那个女人问起出征的丈夫的安全，便用同情的眼光看看那个女人。是一张端正的黑黑的健康脸，一对大小合式的眼睛。周欣的答语显然使她满意，她带着信赖和放心的神气感谢周欣，愉快地走开了。

“她们才是为着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贡献的，”冯文淑这样想着，她注意地望着那个农妇的侧面影子。

“今天成绩还不错，”周欣不知道冯文淑的心情，她伸手拍拍冯文淑的肩头，满意地说。

冯文淑回过头去看周欣，友爱地说：“你嗓子都叫哑了。热吗？”

“还好，我还没有出汗，”周欣仍然带点兴奋地答道。

“没有出汗？你脸上是什么？”冯文淑失声笑了，她揭下周欣的帽子，仿佛一股热气朝她扑过来，帽子也给汗水打湿了。

周欣伸手去摸自己的前额，手指上全是汗珠。她自语似地笑道：“我还不觉得，”连忙用手帕去揩汗。旁边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连声唤着“先生”，递上一把扇子来。

“你拿回去，我不要，”周欣望着孩子吩咐道。

“你扇，你扇，”孩子天真地望着她，重复地念着这两个字。

周欣拿起扇子，用力扇了几下。她又看那个孩子，他正

掉过头去看后面一个中年妇人，那个妇人正对孩子点头示意。

“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真好，”周欣对冯文淑赞了一声；“其实我们的工作做得并不够。”

“到处老百姓都是好的。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对你不会差的，”冯文淑感动地说。

“这里比我们那边好得多，”周欣说，她自己马上解释般地接一句：“我知道我们那里离那个国际都市上海太近了。”她把扇子再摇了两下，就交还给那个孩子，一面道谢说：“小弟弟，谢谢你，我不要了。”孩子又把扇子拿给冯文淑，冯文淑说不要。孩子固执地要她拿去。冯文淑只好笑了笑，就接过来。

“在上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朴素的人，”冯文淑忽然感叹地说，她把扇子摇了几下。“我没有想到在外面会过得这样快乐。”她的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一对酒涡十分明显地嵌在两颊。

周欣真想伸手在这个酒涡上轻轻地按一下。她故意顽皮地问一句：“那么你现在还想回家吗？”

冯文淑摇摇头，脸上仍然现着同样的愉快的表情。她唱歌似地轻轻说：“我不想家，我什么也不想了。”但是她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片暗云，好象她跑得正痛快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阻碍一般。她低声自语道：“只是我妈妈，就是有时候要想起她。”她不作声了。

“我也是，”周欣用了充满怀念的声音说。她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那个慈祥的面颜。她一怔。接着她又暗暗地对自己说：“这有什么用？”她马上鼓起勇气对冯文淑说：“我们走罢。”

她似乎要用这四个字来驱走那些现在不应该有的思想似的。

“好，”冯文淑马上表示同意。她把扇子还给孩子了。

“王东呢？他到哪里去了？”周欣惊讶地问道，他发觉王东已经不在她们的身边了。她们连忙用眼光去找寻，没有见到他。她们以为他先到李家祠堂去了，便朝着那个方向走了两步。

“王东说不定又做诗去了？”冯文淑想起那个晚上王东站在孤坟旁边的事情，觉得好笑地说。

“我们叫他一声看看，”周欣提议说。两个人都叫起来。她们刚刚叫了两声，那几个跟在她们后面的小孩子中，有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忽然拉着周欣的衣角接连说：“先生在那儿。”她们跟着她的指引，走入转弯处松树下一块空地。好几个少年包围着王东，他在教他们唱歌。

“不要打岔他，让他多做点工作，”周欣站住对冯文淑说。

“那么我们先走罢，反正他会到李家祠堂来的，”冯文淑表示赞同地说。

“我们先招呼他一声也好。我们的东西都在他那里，我们自己也可以拿一点，”周欣说。

“好，等我对他说，”冯文淑答道。她便走近两步，大声叫起来：

“王东，我们先走了，东西要不要分点给我们拿？”

王东连忙叫那些唱歌的少年静下来。他看见她们两个人来找他，又听见冯文淑的问话，他心里非常高兴，便自告奋勇地说：“不必分了，我一个人可以拿。”他接着又说：“你们等我

一下，我就完了。”他这时两手空着，东西是别人替他拿着的。

冯文淑马上说：“我们在李家祠堂等你。你慢点来也不要紧。”她就拉着周欣走了。

李家祠堂的墙边立着几个人在看壁报，有的人还大声把字句念出来。张利英和方天行站在祠堂门前，同一个瘦小的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讲话。她们认得他是这里的保长，也就是这个镇上唯一的茶馆的老板。他看见她们走来，便含笑地打个招呼。

“杜保长，”冯文淑唤了一声，她们也对他点点头。

“那么俺先走了，后天一早在茶馆里恭候，”杜保长垂下手躬躬身子，告辞说。他那两撇唇须盖着的薄嘴唇微微张开，做出了应酬似的微笑。他向张利英、方天行鞠个躬，又向冯文淑、周欣鞠个躬。四个人先后举手起来，用军礼回答他。

“怎么你们这么久才来？”张利英温和地问道。

“我们在做宣传工作，”冯文淑答道。

“王东呢？”方天行问道。

“他在那里教小孩子唱歌，”周欣回答。

“刚才杜保长来说，前线相当吃紧，敌人逼近六安了，”张利英皱着眉头严肃地小声说。

过了片刻，冯文淑才慢慢地答道：“今天晚上曾明远同志回来，一定有消息。”

七

傍晚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周欣、冯文淑、王东三个人回到碉堡。他们快走到门前，冯文淑忘了这一天的工作带给她的疲倦，高兴地对着那个屹立在小坡上的灰色建筑物挥手，大声喊道：

“方群文！……方群文同志！”

从“枪眼”里传出来熟习的应声，声音不高，却含着喜悦。

“她一定没有睡倒，”冯文淑欣慰地对周欣说，她提着那个放东西的印花布小口袋，跑到碉堡的门前。

门打开，方群文带着亲切的笑脸出来迎接她。

“今天你们回来得早。怎么就只有你们三个人？”方群文惊喜地说。

冯文淑把那个印花布小口袋递给方群文，笑着说：“馒头、饼子都买回来了。你饿不饿？”

“还好。我刚才还在门口。我想等你们回来，后来又想时间还早，就进去了，”方群文答道。她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拿东西，摸出两块饼子来。“你们不吃？”她问了一句。

“我们很饱，”冯文淑答道；“我害怕你会睡倒，我看你上午脸色不大好。”

“我回来睡过一觉，就不觉得怎样了。大概是很疲倦，天气又热。杨同志还在睡。”

“杨同志怎么样？他又在打摆子吗？”周欣关心地插嘴问道。

“是打摆子，不过好象并不厉害，他一直盖着铺盖在睡觉。先前醒过一次，喝了大半杯水，又睡了。现在只盖着一张毯子，”方群文一面吃饼子，一面答道。

“要不要叫醒他吃点东西？”冯文淑向方群文问道。

“还是让他睡罢，”周欣接着说。

“你的意思不错。他不想吃，就不给他吃。倒是让他多休息好。这些天他也够累了。他又比别人更性急，”方群文关心地说，她的声音不高，好象她耽心杨文木会在楼上听见似的。

“你吃馒头罢，大概还是热的。我们动身的时候才在小蓬莱拿的，”冯文淑看见方群文又伸手进口袋去，想起了那六个热气腾腾的馒头，便提醒道。

方群文拿出一个馒头来，她说：“果然还是热的，”便把它送到嘴边。冯文淑和周欣不转睛地望着她的嘴动。

“你喝水吗？王东的暖水瓶里有，”周欣问道。

王东正望着那一片晚霞似的枫林出神，听见周欣的话，便惊醒般地转过身子，连忙说：“我这里有。”他解下了挂在胸前的暖水瓶。

“那么请给我一点，”方群文客气地对他说。

“我就倒给你，”王东恳切地说。他取下瓶盖，斟了大半杯水在里面，递给方群文。他又带笑地说：“方同志，你还是坐下

来吃罢。”他的态度很诚恳，似乎完全忘记了方群文在晚会里大窘他的事情。

方群文就在门限上坐下来，慢慢地吃着馒头喝着水。门限上还可以坐一个人，周欣却坐在方群文脚边的地上。冯文淑还站在前面，方群文便对冯文淑说：“冯同志，在这里坐罢。”冯文淑答应一声也就坐下了。

王东伸一只手过来，问道：“方同志，再喝一杯罢？”

“对不起，我不要了，”方群文道谢地动了一下身子，把瓶盖递还给王东。她又问冯文淑：“他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还以为你们会一道回来的。”

“他们快回来了，现在还早，”冯文淑答道。

“那么你们是为了带馒头给我，才特地赶回来吗？”方群文忽然省悟地问道。

冯文淑不直接回答，却夸口似地说：“你看我们跑得多快，馒头还是热的。”

“我们还耽心你在家不舒服，你今天就只吃过早饭，”周欣掉过脸来亲切地说。王东也满意地看着方群文吃东西。

方群文沉吟片刻，忽然低声自语道：“我倒没有想到。”她埋下头默默地吃着馒头。

“你说什么？”冯文淑好奇地问。方群文似乎没有听见。周欣却接下去说：“今天王大娘很关心地接连问起你。”

方群文抬起头来，短短地说了一句：“我应该很高兴。”她勉强笑了笑，但是眼里的泪水透过镜片发亮了。

“方群文同志，你想到了什么？你心里还难过吗？”冯文淑

不了解方群文的心情，那眼泪使她有点惊奇了，她还以为是为了那件不幸的事情，她温和地问道。

“我感激你们，”方群文突然抓起冯文淑的手紧紧地捏住，小半块馒头落在地上了。

“馒头掉了，”王东叫起来。

“另外拿一个罢，”周欣说。

“我心里高兴得很，我应该欢喜饱了，还要吃什么馒头，”方群文忍不住爆发似地说。

现在三个同志都明白她的意思了。但是她还加上一句：“大家对我都好。”

接着是一阵沉默。方群文取下眼镜，用手帕揩着眼泪。周欣和冯文淑，连王东在内，他们默默地望着。后来还是冯文淑开口，她装出嗔怪的样子说：“不许你说客气话。我们这里原是一个家。大家都是一家人，你是我同周欣的姐姐。妹妹给姐姐做点事，还要说什么好不好？”

“不过我平日对大家都不……”方群文越发感到惭愧地说。但是不等她把话说完，周欣和冯文淑都先后发言来阻止她。

冯文淑说：“我们不要再说这些话。你看，月亮多美！”她指着高挂在山峰上的一钩新月，浅蓝色天幕上分明看得出那个圆圆的黑影，发亮的、闪着金光的只是它的一小半。在它旁边不远处，有一颗非常明亮的小星。“好象舞台上的布景似的，……真象。”

周欣要说的是另外的几句话，不过她的声音被冯文淑的

压倒了她，她便闭了嘴，听冯文淑讲话。

方群文的眼光跟着冯文淑的手指望去。月亮、星、山、天，什么都没有改变，周围静静的，看不见一点战争的景象。跟在几年前，似乎全无分别。但是心境不同了。她的心静下来，思想却开始了飞行似的路程。在嘉兴，在上海，在武汉，还有别的地方……到今天，她走了这么远的路了。她渐渐地一点一点地在摔掉肩上的重负，心上的黑影。

只要月亮长明……流水长青……

冯文淑轻轻地哼起几句英文歌词，这是过去流行的电影歌曲中的句子，现在已经没有人唱它了。冯文淑看见山影月影，不知不觉地在回忆中找到以上的歌词，照原句唱了出来。她并没有特殊的感触。

方群文有一个时期常常听见人唱这样的歌，她知道歌词的意思。她的思想的旅行还没有结束。她自语似地感叹说：“我做过这样的梦，可是又给自己添了一身债。今天才觉得心上轻快多了。”她仿佛还看见那条过去的黑黑的路，那里留着她不少的足迹。她皱着眉尖用柔和的声音问道：“你怎么忽然唱起这首歌来？”她同情地看看冯文淑，她还以为这个妹妹似的同伴心中藏着什么秘密。

“我看见月亮就随便想起的，”冯文淑坦白地答道，声音是很轻快的。

“啊，”方群文轻轻地吐出一个声音，她不禁哂笑自己的多疑和敏感了。但是冯文淑的答话也使她得到一点安慰。“在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不幸的遭遇，”这样想着，她不觉为别人的幸运微笑了。

冯文淑不知道方群文的这种心情，她又继续唱起英文歌，王东站在前面低声和着。

周欣没有唱，她便向方群文低声说：“听说前方相当吃紧。敌人渐渐地逼近了。”

“你在哪里听来的？”方群文吃惊地问道：“怎么起先不告诉我？曾明远到城里去了？”

“杜保长说的。曾明远同李南星到城里去了。等他们回来就有确实的消息，”周欣答道。

“你们在镇上看出什么没有？”方群文耽心地问道。

“镇上还是那个样子。”

“我们后天还演戏吗？”

“当然要演啊，”冯文淑连忙停止唱歌，插嘴道：“反正还隔得不近。照这样打法，总有好些时候才会打到的。”

“不晓得杨文本能不能演？他的病没有好，当然要让他休息，”方群文说。

“刚刚要演戏，偏偏他又病倒了，”冯文淑着急地说。她又改变语调接一句：“曾明远可以代他演。”

“用不着人代，我自己来演，”忽然从后面飘起来低沉的声音，她们吃惊地掉过头。杨文本象鬼影似地立在她们背后。他的黑瘦脸上闪着一双发光的眼睛。

“噢呀！”冯文淑低低叫了一声，连忙站起来。

“不要怕，是我，”杨文本疲倦地微笑道。

“你怎么就起来了？不多睡一阵？”方群文关心地柔声问道。

“我不想睡了，听见你们唱歌，我下来看看，”杨文本温和地答道。他两只手都撑在手杖上面。

“你把我吓了一跳。你来了，怎么不先叫我一声？”冯文淑定了心，抱怨地说。不过看见杨文本走到下面来，她倒很高兴。“你坐罢，”她把自己刚才的座位让给他。

“杨同志，你现在觉得怎样？好些没有？”周欣问道。

“大概不要紧了。起先那一阵真不舒服，直想倒下去。不然我会跟你们走到镇上的，”杨文本微笑地答道，声音仍然微弱无力。

“你饿不饿？要吃东西吗？”冯文淑含笑问道。她指着方群文脚边那个印花布口袋：“这里饼子、馒头都有。”

“我这里还有开水，”王东好意地说。

“我不要吃，”杨文本说。他望着王东：“劳驾给我一点开水。”一个蚊子飞上他的额角，他挥一下手，略带厌烦地说：“蚊子真讨厌。”

冯文淑和周欣听见杨文本的话，觉得自己脸上、手上也在发痒。她们默默地搔了几下。

杨文本拿着瓶盖，喝了三四口，忽然问道：“你们刚才说打到什么地方？有不好的消息吗？”

“说是前方吃紧，敌人渐渐逼近了，”冯文淑略带紧张地答道；“我看总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打到的。”

“这回武汉外围战也把敌人拖得够久了，”周欣说，“看情

形我们还可以在武汉过年。”

“岂但在武汉过年？我们还希望到南京过大年夜！”冯文淑兴奋地大声说。

“你们也太乐观了，”方群文温和地责备道，“尽做好梦。”

“年轻人自然应该乐观，难道你要我们学那些失败主义者？”冯文淑理直气壮地说，她得意地笑起来。

“不过你们的梦做得太大了。我看要在武汉过年也不容易，”杨文木摇摇头说，“我们动得太慢，而且不断地后退。敌人比我们快得多。……”

冯文淑不愿意再听杨文木的苦恼的声音，便故意打岔道，“敌人来了，我们就打击他，打不赢，我们还有游击战。”

“你说游击战？”方群文疑惑地说，“我们还没有把民众组织好，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够。恐怕——”

“的确，我们做得太不够，我们的工作太差，”杨文木马上接下去说。

“那么做呀！努力做呀！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老百姓又相信我们的话。譬如今天我们几个人访问两处农家，效果就比以前好。我看来一次比一次进步，反应也渐渐地强烈了，”冯文淑兴奋地争辩道。

“你们还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并不是爱说泄气话，我不过比你们想得多一点。我又不是失败主义者。我是说我们眼光浅短，没有计划，又没有决心，”杨文木痛苦地慢慢解释道。

“我们不要再讲了。文淑，你看杨同志病还没有好，让他多多休息罢，”方群文象姐姐似地吩咐冯文淑道。

冯文淑应了一声：“是。”她转身向外面，山坡下一切全没入黑暗中。山坳里浮着稀疏的灯光，因了黄色才不致被误认作山间四处飞动的点点萤火。新月仍然嵌在深蓝色的天上，远远的山峰猛兽似地在月下蜷伏着。微弱的月光照不出山中的景物，只在那一面撒下了一点金辉。从这里望去，那个地方就象是一片海面，海水载着轮船的灯火浮动。

“你们看，那里真美，真象一片海！”冯文淑忽然拍手欢呼道。

周欣马上站起来，到冯文淑的身边，去看她说的那美丽的海景。

王东自然附和着她们。方群文和杨文本连看也不看一下。方群文带着好意地批评道：“真象一个小孩，总是这样高兴，这样爱动。”她又侧头对杨文本说：“你不要跟她争，我看她太天真了。”

“她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遭遇，有些事情她还不知道，”杨文本叹息般地说：“这也不怪她，她的经验太少。”

“究竟是她年纪轻，环境好，我也有点羡慕她，”方群文说，她现在喜欢冯文淑了。“不过，”她的话头又转到杨文本的身上，“你的性子也太急。其实谁都愿意做得快，成绩多，可是也要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我们的能力也差。我们只能说是为抗战做点摇旗呐喊的工作。”

杨文本不作声，他在思索方群文的话。另一个思想忽然抓住了他，他忍不住喃喃地自语道：“并不是我性急。七年了。象这样不断地往后退。我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才能够回去？”

我不知道在那里还能够找到几个家里的人……”

“我们又没有拿起枪打仗。往后退又不是我们的错误，跟我们几个人做得快做得慢也不相干，”方群文低声插嘴道。

“我说做得慢，并不单指我们几个人……”杨文本苦恼地说。“我是指上面那些掌握——”

“他们回来了！”冯文淑忽然高兴地叫起来，打断了杨文本的话。

方群文感到一股热气透进心里，她欢迎这个消息，但是她不去理会冯文淑，她却同情地安慰杨文本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也不必难过。最好不去想过去的事情。我也是一样的情形，也曾让那些回忆折磨得好苦。现在我应该把它忘记了。这样对自己也只有好处。”

“方同志，你也失掉了家？”杨文本感动地问，他想不到这个不喜欢讲自己过去的女同志也有着类似他有过的遭遇。

“我父母早死了。‘八·一三’以后夫家全家炸光了，最近得到信证实了这个消息，”方群文恳切地向杨文本说出她的身世，这些话以前只有张利英听她讲过。相同的恶运使两颗心互相接近，杨文本取得了她的信任。

“啊，”杨文本悲叹地吐出这个声音。他的遭遇在方群文的简单的叙述以后突然减去了阴暗的颜色。他觉得似乎有一只手提起他心上的重压，它立刻减轻重量了。他开始忘记自己，想起别的不幸的人。他想帮助她，他想减轻她的恶运的重担，第一是用话。可是同情虽然不断地增加，他的嘴却找不到适当的言词。

冯文淑和周欣在那边讲话。王东的快乐声音夹杂在两个少女的清脆的笑语中间。周欣的声音有时略带嘶哑。冯文淑的声音骄傲地、悦耳地压倒了一切。那三个同志兴高彩烈地谈论着，似乎故意把方群文和杨文木留在门限上，让他们有互相表示同情的机会。

“方同志，你比我更不幸，你都受得住，我也应该忍受下去。……我一向总以为自己的遭遇跟别人不同，把什么事都闷在心里。……我只知道抱怨别人，……其实我不及你，”杨文木激动地说，态度十分诚恳，他好象要把他的胸怀剖露给她看一般，他的话却反而成为断断续续的了。他没有能够一口气说完他的话。

“你不要客气。都是一个团体里的人，就该象兄弟姊妹一样，还用得着客气话？怎么说你不及我？”方群文带笑地说。夜渐渐地凉了，但是她和杨文木都觉得身上暖起来。同情、关心和了解增加了他们心上的温暖。方群文还有话要说，然而机会失去了。她听着吴平和姚民瑞的声音，于是眼前电光飞舞，那些人就向着门前扑来。

一股电光射到方群文的脸上。她的眼睛畏怯地眨了几下。她看不清楚对面的人脸。她叫了一声“啊，”连忙用手去保护镜片下的眼睛。她听着吴平的喜悦的声音：“你们都没有病倒！”这个声音在她的耳边显得非常亲切。她便象大姐姐一样地说：“小孩子，不要拿电光乱照。”又问：“你们都回来了？”

吴平没有回答，只顾讲他自己的话：“杨同志，你的摆子好了？我们在路上还惦记着呢！”

杨文本温和地笑了笑，说话的声音仍旧很低：“我这个老朋友总不肯忘记我，它时时光顾。不过它毕竟客气，不肯多跟我为难，所以我又坐起来了。”

在阴暗处响起了张利英的温柔的声音：“你们都在这儿？馒头吃了吗？我还担心你会不舒服。”

“吃了。杨同志没有吃，他不觉得饿。我还好，休息了大半天。只是你们辛苦了，”方群文觉得心上一阵畅快，恳切地甚至带点歉意地说。

“张同志，听说前方吃紧，你们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杨文本忽然严肃地问道。

“现在还不要紧，我们军队后退了倒是真的，不过还守得住新的阵地，自然敌人是渐渐地逼近了，”张利英安静地答道，显然她在避免说出引起人焦虑的话。

“那么我们的工作会有变动罢？”杨文本沉吟地说。

“现在还不晓得，要等到曾明远回来才知道。且看司令长官部那方面怎么说罢。不过情形还不太严重，”张利英仍旧安静地说。

“但是据我看，情形相当严重。敌人进攻既然得势，要阻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攻势太厉害，我们军队总是往后退，”杨文本皱紧眉头沉着脸说。他迟疑了一下，才接着说下去：“我看司令长官部并没有死守的决心。他们到这里也要不了多少天。我们应该早作准备，免得临时束手无策。”

“不过这里老百姓很不错。敌人来了，他们会发动游击战，”冯文淑站在张利英旁边，头差不多亲密地放在张利英的

肩上，她不愿意再听杨文本的那套议论，就插嘴说，她喜欢单凭她个人的印象和简单的信仰讲话。

“不管情形严重不严重，现在总没有问题。我们用不着板起面孔多谈了。今天大家累了一天，回来也该休息休息，”姚民锋也不高兴听杨文本的议论，便不耐烦地嚷起来。他又对冯文淑说：“冯同志，我们还是来唱歌罢。”

“好，我赞成。我们唱我们的，谁高兴就跟起来，”冯文淑快活地说。她马上离开了张利英向姚民锋那边走去。她看见周欣正在跟姚民瑞讲话，便唤一声：“周欣，过来，我们一块儿唱歌。”她说了，一个人对着下面一片黑暗山谷发泄胸中闷气似地大声唱起来：

谁愿意作奴隶？谁愿意作马牛？……

参加唱歌的只有一部分同志；张利英、方天行两人还在那里跟杨文本、方群文谈话。方群文问到这一天在镇上工作的情形，他们不得不详细地说明。在谈论中，四个人都盼望着曾明远和李南星回来给他们报告一个确实的消息。但是四周并没有人的脚步声。歌声停止了，冯文淑几个人笑着讲话，声音还是毫无挂虑的、愉快的；此外就是虫子的叫声。那些小生物似乎也在快乐地唱歌。

唱歌的同志们，也在等候曾明远他们的消息。一首歌唱完了，没有动静，冯文淑的声音又领唱起第二首歌。歌声使人兴奋，使心情高扬，使愉快的感情渗透一个人的全身，自己的声音跟别人的溶合在一起，感情也跟别人的溶合在一起，成了

一股力量，首先就把自己的心吸引去了。这力量渐渐地冲散了黑暗，造出一个另外的世界来，自己的心就进入到那里去。冯文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她轻快地不时摇着头，挥动着手，她的喉管似乎成了歌声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她没有疲倦，只有畅快。她望见黑暗的山谷渐渐地亮起来，灿烂地开起一片美丽的花朵；她望见那片黑暗在对她微笑。她忘了曾明远，忘了碉堡前的一切。她只顾快乐地、温暖地唱着，唱着。她不去分辨哪些是自己的声音，哪些是别人的声音。

在碉堡门前谈话的四个人，还在继续谈话。除了方天行外（方天行的心早被歌声吸引去了），歌声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们带着焦虑地在等候曾明远回来。

“是不是他们不回来了？或者司令长官部有什么事情留住他们，”杨文本自语似地说，他感到了疲倦。

“他们说过要回来的，”张利英答道，她想起了曾明远动身时对她说过话。不过她现在又想，他们也许被什么事耽搁了。她也听出杨文本的声音中的疲倦，就柔声劝他：“杨同志，你上楼去休息罢。你刚打过摆子，应该小心保养啊。”她又对方群文说：“方同志，你也不要等他们了。你还是早点休息罢，你今天幸好没有生病。”杨文本果然努力撑着手杖站起来，方天行站在旁边，连忙伸手扶了他一把。张利英又说：“我们再等一下，他们不回来，我们也要上楼工作了。”她看见方群文不肯走，杨文本也说要再等一阵，便下了决心对方天行说：“方天行同志，我们陪他们上楼去。”

方天行的回答是打起电筒照路。四个人终于走进了碉

堡。他们在楼上燃起油灯，整理了各人的铺陈。外面的歌声突然停止了。

“他们怎么不唱了？该不是曾明远回来了罢？”方天行疑惑地自语道。

方天行的揣测并没有错，曾明远和李南星正跑得气咻咻地回到唱歌的同志中间了。不久他们就被那些年轻人拥上楼来。

“方同志，有你一封信，”李南星递了一个西式信封给方天行。他还问一句：“是你太太来的罢？”

“谢谢你，”方天行高兴地接过来，就拿到灯前去。

“曾同志，有什么消息？”杨文木焦急地问道。

“没有什么要紧的。我们后天还要在镇上演戏，”曾明远带着微笑慢慢地回答。他揭下帽子，头发上还在冒热气。

“不是说前线吃紧吗？”方群文接着问道。

“说是快逼近六安了，不过司令长官部今天下午还接到前方的报告。打得很好，敌人的攻势挡住了，六安在最短期间没有问题，”曾明远好象愉快地答道。他把领扣解开，亲切地望着杨文木问道：“杨同志，你摆子没有发？”

“现在过去了，”杨文木答道；他又把话题转回到战事上面：“不过我们应该早点准备，不要把该做的事情放弃了。”

“对，”李南星接着说；“司令长官部还提到要我们准备搬回城里去，我和曾同志谈过，等演过戏再说。看大家的意见怎样？”

“我想稍微等一下，就开晚会，我还有些事情要报告，”曾

明远道。他看看大家，又说：“下个月的补助费已经领来了。”

冯文淑跪在自己的铺上，点了蜡烛，读着她哥哥从上海寄来的信。她一面看，还不时对坐在她身边的周欣说：“我哥哥”怎样，怎样……她说着又高兴地吃吃在笑。

周欣却对冯文淑叙述她母亲在上海的生活。她埋着头在读她母亲的笔迹。她也象冯文淑那样地又说又笑。

张利英走过来，对她们说：“你们老是在笑些什么？要开会了。”

“等一下罢，我就看完了。姐姐，我告诉你，妈妈给我兑了一百块钱来，我哥哥加入了海燕剧社，”冯文淑象孩子似地兴奋地仰头看张利英，笑着说。

“你妈妈倒很关心你。你哥哥不是在洋行里做事吗？”张利英温和地问道。

“不，他已经离开了，现在进了《文汇报》。他也热心地在做抗战工作了，”冯文淑得意地说。“他们在上海做了好些事情。他现在跟刘波很熟，海燕剧社就是刘波那班人组织的。”

“这倒是好消息，”张利英答道。她也认识刘波，而且在她离开上海前，还和他一起在一个团体里做过工作。她又问一句：“你妈妈呢？”

“妈妈很好，她回乡下去了，说是秋天再出来，”冯文淑愉快地答道。她埋着头继续在看信。

“我妈妈看见我那张照相，开心得很，她说我胖了，”周欣折好信笑容满面地对张利英说：“她叫我不要想家，她说我在外面做事，她很放心。要不是她年纪大了，她也会赶到我这里

来的。她还叫我代她问候你。”

“问候我？”张利英惊讶地说。

“我写信告诉姆妈，我有了一个姐姐，所以姆妈问候你，”周欣解释地说。她又用亲切的语调，讲起另一件事情：“我妹妹跟着学堂里的先生到孤军营去过，她说她看见了谢团长，她们小学生还唱歌给兵士们听，大家高兴得很。”她还想说下去，但是李南星迈着长腿走过来，温和地打岔道：

“现在要开会了，你们有话，等一阵再说罢。”

八

这是一个灰色的阴天。早晨太阳露了露面，不多时它就躲藏在厚云堆里了。有一点风，天气也不热。到下半年，那一叠一叠的灰云还不曾散去。可是看天色，也不象要下雨的样子。

曾明远一班人自然喜欢这样的天气。下午他们的戏按时开演了。地点是镇上李家祠堂。土阶作为舞台。一张蓝幕把他们跟观众隔开了。演员在里面化装。曾明远立在幕前对观众讲话。

在这样的场合里讲话，这大半年以来，曾明远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他望着各种各样的人头，无数的差不多带着同样表情的朴实的脸，话很自然地和他的嘴里吐出来，就象喷泉那样，没有一点停滞。准备好了的腹稿现在加上了血肉和感情，于是很容易地打进了听众的心。他对这个镇上的人讲话，已经不止一次了。时间和接触拉近了他跟他们中间的距离。

他讲的自然还是关于打日本鬼子的话。不过因为敌人的逼近，他必须说些更紧要、更急切的事。组织民众发动游击战，成了他这次讲话的中心。他要用浅显明白的语言，把一个坚决的、共同的意志打进无数听众的心中。他起初亲切地说

着，为了使人容易了解，他还举出一些实例。事实有的很惨痛，这激起了他的悲愤和仇恨。他的声音渐渐地高起来，右手捏成一个拳头，不停地挥动着。他自己很激动，讲话的调子也成为慷慨激昂的了。

他说得多，而且比他自己预计的还多，他的口的确成了无穷尽的话语的泉源。他在叙述惨痛残酷的事实，这类事他确实见到、听到太多了。象一个人受了一辈子的冤屈，如今遇到一个亲人，他得从头至尾倾吐出来。所以对着那些亲切诚朴的老百姓的面颜和无数不转动地殷殷望着的眼睛，他简直止不住他的话头。

泪水从一些女人的眼睛里迸出来，人丛中响起了各种表示同情和愤慨的声音。诚挚的言语得到诚挚的回应。曾明远的心感到一阵温暖。他忽然忘了自己地大声叫起来：

“鬼子兵抢占了我们的地方，杀死了我们的亲人，烧毁了我们的房屋，他们不让我们活，不要我们做人！我们要打鬼子！我们要赶他们出去！”

有些年轻人响应地大声叫起来。不管男或女，老或幼，大家都相信曾明远的话。而且在听了许多残酷的血淋淋的事实以后，谁都觉得上面这段话是唯一合理的结论。差不多所有在场的男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思想：“我要去打鬼子。”

“爸爸，给俺一支枪，俺去打鬼子，”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兴奋地对他父亲说。孩子的父亲是镇上成衣店的裁缝，他埋下头看孩子一眼，带笑说：“你还小，你会打枪？”

“俺要去！俺跟你去，俺要学打枪，”孩子这样地纠缠着

父亲。

“不要急，等鬼子兵来，俺带你去打，”父亲说，他拍了拍孩子的光头。

一个穿短衣的年轻人跟旁边一个梳大辫子的姑娘讲了两句话。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红着脸，两只滚圆的眼睛盯了他一眼，笑着轻轻说：“你去，俺等着你回来。”

“鬼子打来了，你不是没人管？”年轻人故意这样问一句。

“镇上又不止俺一个人？俺跟着俺家，跟着大伙儿打鬼子，”大姑娘不加思索勇敢地、爽快地说。

曾明远已经把话头扯得很远了，这时才连忙收回来。他接着说起怎样打鬼子的办法。他说得很详细，很具体。他很快地就说到了游击战。

“俺知道，俺要做一个游击队！”银妞儿穿得干干净净立在人丛中，这时忽然高兴地对她的母亲说，她的母亲抱着小孩站在旁边。

“你不怕鬼子兵？比豺狼还凶的！”母亲说。这里小孩们害怕豺狼，据说有时候在静夜里还可以听见狼叫。

“我不怕，我恨他！”银妞儿骄傲地答道。

“你不怕，就好啦！下回向官长讨支枪，”母亲说，她也把眼光射到台上去。她用信任和尊敬的眼光看曾明远。孩子在她的怀里动着，并且低声哼叫，但是没有发出哭声来扰乱她的注意。

“俺明白，俺明白，一锄头打他一个！”小蓬莱的黑脸伙计

点头说。他听见曾明远后面的话，又赞同似地重复说：“对啦，大伙儿把粮食都带走，都藏起来，谁都不卖东西给鬼子兵，看鬼子兵来吃啥，用啥？”

“你当兵，俺就做个游击队，”大姑娘忽然含笑地对她的年轻朋友说。

“你会放枪？”年轻人欣喜地看着那张圆圆脸和圆圆眼睛，因为高兴他才故意这样地问一句。

“俺不会学？”大姑娘故作嗔怒地瞪他一眼；她又加一句：“俺还会放哨，”这也是从曾明远的话里学到的。放哨，这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她还可以找她的弟弟陪伴她。

年轻人满意地笑了。

在台上曾明远加重语气好象在作结论地说下去：

“每个人都要记住今天说的话：鬼子来就没有我们；我们在，鬼子就死。我们决不要让鬼子住我们的房屋，吃我们的粮食。他们来就要叫他们都死在这里。我们大家，镇上的全体民众，不论男女老幼，都要和和气气组织起来，就好象我们是个大的家庭一样，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要记住鬼子是我们大家的仇人，是你的，他的，她的，他的。”（他指着一些人的脸）“我的，我们大家的，……”（台下的人纷纷地议论着。）

“鬼子打来，大家一齐对付他。你拿枪，你拿锄头，你拿刀，你拿擀面棒，你放哨，你打听消息……”曾明远随便指着一些人。人丛中起了一阵哄笑。几个年轻的声音兴奋地叫着：“还有我，还有我！”

“我们现在有了办法，就不怕鬼子兵！”曾明远说了一些别

的话以后，忽然捏紧拳头打出去，大声叫起来。好些人快乐地响应着：“我不怕！”“我不怕！”

“……不过我们要趁早作准备，现在就要准备，在鬼子兵还没有打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组织好。第一我们要使他们到这个镇上来不了，来了也跑不出去……”曾明远用坚决的语调接着说下去。他听见冯文淑的声音在后面催他，他讲完这一段略略停一下，又说：

“现在戏要开演了。你们一定等看戏等得发急了，我不再耽搁你们的时间。看了戏我们还有话跟大家讲。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演的戏不是随意编出来的，都是真的事情，象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请大家认真看戏，看过仔细想想，想过再对我们说说大家的意见。”他笑了笑，这是诚恳的带着友谊的微笑，又说：“现在请看戏罢。戏演完还要请杜保长讲话。”

曾明远行了礼，便退去了。人丛中响起了拍手声和欢呼声。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忽然锣声一响，场子里马上静下来。所有的眼光全射在幕布上。幕拉开，现出另一个世界。留着一撮唇髭的日本军官骄傲地坐在办公桌前面抽纸烟。两个汉奸奴隶似地站在他旁边谄谀地对他讲话。

“鬼子！”“鬼子！”好些人低声叫出来，含怒地指着台上的杨文木。

“真可耻！汉奸简直不是人！”一些人开口骂起来。

“俺抓住这个家伙，当头就是一刀，”黑脸伙计红着眼睛骂道。

姚民瑞两弟兄拖着李南星出来。在观众的眼中他们是两

个鬼子兵和一个中国读书人。发议论的嘴闭紧了。大家差不多屏住气息望着故事的发展。

接着是审问的场面。鬼子军官骄傲地说话，汉奸们谄媚地奉承。中国读书人慷慨激昂地演说，全是带宣传性的词句。李南星勇敢地立在台上，燃着热情在痛骂敌人和汉奸。话语浅显易懂，都是说给台下一般观众听的，它们不断地引起了观众的大声赞美。

于是鞭打开始了。演得不怎么好，但是激起了诚朴的观众的愤怒。鬼子军官命令汉奸打自己的同胞，单纯的心不能够接受。被打的人虽然叫痛，却也不停止他的傲慢的骂声。

“这是英雄，俺要学他！”年轻人翘起大拇指对旁边那个大姑娘夸耀说。

“你不怕痛？”女的看他一下，低声问道。

“英雄不怕死，还怕啥痛？”男的若无其事地说。

女的又看他一下，赞许地点点头，脸忽然红了。

姚民锋两弟兄已经出去了。他们又拖进来一个中国人。观众觉得眼前一亮，这次出现的是一个可爱的少女。她给他们带来一点新奇的感觉。但是看见她处在这样的境地，他们又有点不安了。从几个妇女的口中发出来“啧啧”的声音。

“冯先生，”银妞儿指着台上的少女对母亲说。“你看冯先生多好看。”

母亲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她一面看戏，一面又要照管怀中的孩子，不过她的眼睛总是向着台上的时候多。

少女一出来，就获得观众的同情。她的一言一动，在观众

的心上都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渐渐地忘记了她是那个穿军服的冯先生，在台上她的名字是“月英”。那是她的受难的哥哥。她哭着，挣扎着。她的眼泪引出许多人的眼泪。她的哭声感动了好些善良的心。

大姑娘用手擦着眼泪，侧过脸问年轻人：“要是俺也给鬼子兵抓去，你来救不来救？”

“俺一枪打死他！”年轻人英雄似地答道。

台上果然开枪了，打死的却是少女的哥哥，那个读书人立刻倒在地上。

年轻人愤恨地咒骂一声。观众的情绪更紧张了。许多人在替那个少女耽心，大家捏着一把汗，注视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称赞她那勇敢的态度和热烈的话语。这使他们的焦虑渐渐地减少，呼吸也渐渐地畅快起来。

“俺要学她。她才是英雄！”大姑娘开颜一笑，得意地对年轻人说。

“你看，你比得上她？”男的故意做出怀疑的样子讲话。女的似乎在表示不高兴男的看轻她的神气。但是她的注意力被台上的追逐吸引去了。这是类似猛虎捉羔羊的情景。少女的一动一跑，使得许多颗心激烈地跳动着。

忽然她抓到了手枪。她举起枪。她真的开枪了。鬼子终于倒了下来。

许多张嘴在吐气。紧张的心情松弛了。大姑娘也嘘了一口气。年轻人也嘘了一口气。他又伸起右手的大拇指，夸奖道：“这个大妞儿真英雄！”大姑娘满意地笑了。笑的不止是她

一个，好些人的脸上都有了笑意。

“好！冯先生打死了鬼子官长，打得好！”银姐儿赞美地说。

接着是先前被遣出去的鬼子兵和汉奸们进来。军官倒下了，手枪捏在少女的手里。他们卑屈地向她求饶。少女讲了一大篇宣传的话，这也是特地给观众听的。于是汉奸觉悟了。鬼子做了俘虏。游击队也组织起来了。

最后冯文淑借着少女的嘴，说了一大段关于游击战的话，主要的意思跟曾明远起先说过的差不多。不过这时候她的话特别容易打进观众的心。在台下有人暗暗点头，有人发言表示同意，有人大声赞美。

“俺要跟她当游击队，”裁缝的十岁男孩跳跃不止地说，拚命地拉父亲的手。

“再等两年罢，你还小，”父亲含笑答道。

“打鬼子不管老小。你给俺一支枪，俺就去，”孩子忽然带着大人气答道。

“好，好，我请冯先生带你去当个小游击队，”父亲笑起来说。他摩一下孩子的脸颊，颊上还是润湿的。父亲伸回手，问道：“你热不？”

“我不热，”孩子答了一句，就大声跟着台上的人喊口号。台上和台下终于打成了一片，雄壮的声音似乎就要震破了祠堂的瓦屋。

幕拉拢来，关住了一个令人兴奋欢快的热烈景象。一些人的眼光仍然留恋地望着舞台，似乎在盼望那个美丽的面颜

又在那里出现。

台上响起了脚步声，四个同志穿着整齐的制服，走到幕前，就并排立在台上，方天行也走出来，恭敬地、带着微笑地向台下观众行了一个礼，然后转身向里对着四个同志，挥动他的指挥棒，唱起了那个叫做《游击队歌》的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雄壮的歌声象一股巨大的力量提高了观众的情绪，不住地升高升高……但是人丛中忽然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私塾先生王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从两里外的村子里赶来了。那些学生进了祠堂便往人丛中钻动，很快地就消失在人群中间。王老师带笑地眯着他的近视眼，拿着旱烟管，安静地走过人丛中。人们客气地给他让路。他一路上只顾点着头一步一步地走到前面去。他找到空地方站定了，含笑地望着台上，开始抽他的旱烟。

台上刚刚唱起了《游击战》，这是一部分人熟习的歌。好些年轻人听见这歌声，脸上发亮了。他们跟着台上唱起来。

歌声停歇，同志们退进幕后去。王老师掉头往左右看。他移动了几步，招呼了杜保长。他们交谈了几句话。

锣声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幕拉开。台上现出一老一小的卖艺人：穿蓝布大褂束腰带、须发花白的老头子，和一个穿

花布衣服、垂大辫子的小姑娘。

“各位先生，各位观众，我的师傅要我唱一个歌，”女孩子声音清脆地对台下讲话。她天真地一笑，两颊立刻现出一对酒涡来。她开始唱起一支悦耳的小调。这首歌使得大家都满意，他们想：唱得真好听。

老头子吩咐小姑娘再唱，小姑娘顺从地又唱起了那首“九·一八”小调。声音还是那样地清脆。但是她唱到中间，忽然流下泪来，她的喉咙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她只能吐出断断续续的几个字音。

“她为啥哭？”银妞儿奇怪地问她母亲。

“她想起她家，她一家人都给鬼子杀死了，”王大娘同情地回答，她的眼圈也红了，“可怜啊。”她是看过这个戏的。

“冯先生，”银妞儿想了半晌，忽然指着小姑娘叫道。

老头子生起气来，他逼着小姑娘再唱，她始终唱不下去。他又逼她练把戏，她也练不好。一个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变成了可怜的孩子。有些观众同情地说：“就让她歇歇罢。”但是老头子却拿起鞭子打她。小姑娘哭着用手臂保护自己。

观众中好些人不平地议论着。年轻的私塾学生发出了不满的叫声。

“不要打她！不要打她！”有人这样地叫起来，不过声音不够高，让观众的议论声压倒了。

“这个老家伙是个孬种！”一个学生愤慨地骂道。

“不要打！不要打！”忽然响起了雷似的吼声。一个长身青年在人丛中跨着大步一下就迈到台上去。“放下你的鞭子！”

他命令似地喝道，一把抓住老头子的膀子。这个青年的出现颇使一些人吃惊。但是等到他在台上站定，跟那个老头子争吵的时候，每对熟习的眼睛都认出那个被鬼子军官打死了的读书人来。

“办不到！”老头子固执地回答。

“这老头儿真狠心，”大姑娘不高兴地批评了一句。

“要不是演戏，俺就揍他一拳，”年轻人英勇地答道。

“偏偏要你办到！”青年的拳头立刻落下去。

“打，打，打得好，”台下的学生助威似地叫着。声音从四方八面发出来。

“不要打，不要打，都是自己人，”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丛中透出来。没有人注意到这是姚民瑞的声音。

老头子跟青年和解了，小姑娘劝止了这场争吵。她向青年说明她同老头子的关系，她讲起自己的故事。这是够悲惨的：家毁了，娘死了，父女两个逃进关里来，就靠着卖艺过苦日子。他们本来是安居乐业的东北的老百姓。不怪她父亲，这都是日本鬼子造的孽。

小姑娘哭着，诉着，很有条理地叙述她的不幸的遭遇。整个场子忽然变得非常安静了。似乎许多人的心都悬在她那张伶俐的小嘴上，她说一句话便叫许多颗心跳一下。

年老的、中年的女人都在擦眼睛，年轻的女人眼圈也红了。“好惨！”那个大姑娘对她的男同伴说了这两个字。

小姑娘带着孤苦无靠的样子、描写敌人残暴行为的时候，许多人觉得有一只手在搔他们的心，搔得很重，他们非常不舒

服。忽然一个有力的声音响起来，依旧是姚民瑞的声音：“打倒日本鬼子，打倒那些禽兽！”

这个声音叫出了许多人的苦闷。于是空气动了，心也动了，大家响应地齐声喊起来。人们畅快地呼吸着。

就在这个时候，台上的青年对着父女两人讲起道理来，都是些浅显的句子，但是连在一起，却非常中听。他热情地说服他们，也说服台下无数的观众。他的结论是：不把鬼子赶走，中国人便不能够过安乐的日子。最后三个人齐声喊着：“打倒日本鬼子！”

姚民瑞在台下带头，台下无数的观众也跟着喊起了同样的口号。在这喊声中许多人的心似乎连结成了一颗，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跳动。残暴行为和悲惨遭遇似乎都被勇敢、热情和坚强意志赶走了。大家的眼前仿佛现出了一片光明的境界。

幕突然拉拢了。它再拉开的时候，全体演员都并排站在台上（冯文淑、杨文木、李南星就穿着刚才演戏穿的衣服），他们跟着方天行的指挥棒的舞动，唱起那首《我们是中国老百姓》来。

曾明远和张利英都没有参加唱歌。先前《放下你的鞭子》还没有演完，曾明远正在台下跟杜保长讲话，忽然有人来找杜保长，在杜保长的耳边轻轻讲了两三句，杜保长带着严肃表情匆匆地走出去了。王老师还站在旁边，曾明远便趁这个机会跟他谈论改编课本和向民众报告新闻的问题。王老师的态度十分诚恳。这是第二次的商量，他们不久便商妥了办法。但

是杜保长仍然没有回来。曾明远看见时间快到了，着急起来，只得出去找杜保长。

杜保长不在茶馆里，据说他陪着三个官长走了。曾明远失望地走回祠堂，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利英。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战事有了变化，”张利英低声说。

“恐怕是这样。不过杜保长说过他要讲话，”曾明远沉吟地说：“其实他不讲话反倒好些。我们就老实向群众报告他有事情走了。”

“不大好，”张利英摇摇头说：“群众会奇怪，也许还有人想到前线吃紧的事情。”她突然问一句：“可以不可以请一个人替他讲几句话？”

曾明远没有回答。歌声在催逼他。他想了想，忽然露出了笑容说：“我有好办法，就请王老师讲几句罢。”他不等她再发表意见，就跑到场子里去了。

歌唱完了，私塾先生王老师代替杜保长讲话。曾明远出来向大家报告这个消息，他听见从台下各处传来的拍掌欢呼声。

王老师拿着旱烟管慢慢地走到台上，他睁大他的近视眼看下面，那许多清晰的和模糊的面颜使他的脸上浮起了亲切的微笑。他微微摇着头，象对学生讲书似地说起来。他的话来得慢，也缺少热情，不过能够把事情解说得很清楚。

“……俺们要打鬼子，就应当大家存一样的心，做一样的事。千万不要存私心，你顾你，俺顾俺的。就是说俺要‘团

结’，要‘组织’呀。一个人力量小，团结的力量大！你们听见戏里那个大妞儿说过，俺们中国人先前没有‘团结’，没有‘组织’，出了事还是你顾你俺顾俺的，所以才给鬼子打进关里来啦。……”

场子里相当静，王老师的不够响亮的声音还能够达到大部分人的耳里。他的话没有带来火种，它们却使紧张的心情渐渐松弛，使热情慢慢放散。但是因为听众保持着平日对他的敬意，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听他的话，所以它们也产生了效果。

王老师又用近视眼看看下面，他看不见人堆中一个学生在他做怪脸，另一个学生暗暗摹仿着他说话的姿势。他拿着旱烟管指指点点地讲下去。

“……你们一定相信俺这话。只要大家‘团结’、‘组织’起来，就可以抵挡住千千万万的敌人。……说到‘组织’、‘团结’，曾团长先前一定给你们详细说过了。杜保长以后会有好办法教给你们。”他停了停，又说：“还有俺向各位报告，从明天起遇着赶集的日子俺来念新闻给各位听。”

教书先生的嘴突然闭上了，他带点不大自然的表情（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向台下点点头，就走下场子。他听见拍手声和笑声，他用感谢的眼光向四周看了看。

台上静寂。少数的观众开始退出了。方天行走到曾明远的身边，问道：“还要不要等杜保长？”

“不等了。我们宣告散会罢。”

“那么我们再唱一首歌就散会，”方天行说。

“最好唱一首他们熟习的歌，要他们也跟着唱，有不会唱的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教他们唱，”曾明远提议道，“现在就由你去报告。”

这首抗战歌的合唱正在进行的时候，忽然茶馆里的一个伙计带着满头热气走到台前，招呼曾明远道：

“曾团长，保长请你去。”

“保长回来了？”曾明远顺口问道。

“还有城里来的官长，”这便是曾明远得到的简单的答复。曾明远略微一怔，他转身对张利英低声讲了几句话，便跟着那个伙计往外面走了。他走出祠堂的大门，还听见那个雄壮的歌声。

九

从镇上回到碉堡，战地工作团的全体同志带回来疲倦，但也带回来兴奋和紧张的心情。疲劳的身体似乎需要短时间的休息，然而强健的精神却追求着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

大家把带回的物品在屋子里放好以后，没有一个人在铺上停留一下，他们全跑到门前来，就在这个坡上，放了两根板凳，他们或立，或坐，或者蹲在地上（除了板凳，门限和石头都是座位）。在这里开始了团体的紧急会议。

曾明远的沉着的声音在傍晚的柔和空气中响了一会儿，别的人差不多屏住呼吸在听他讲话。于是他的嘴闭上了。接着是片刻的宁静，这是一种非常郁闷的宁静，就象那种暗示着大雷雨就要到来的宁静一样。

“我不赞成这个意见，”杨文本的带点愤慨的声音冲破了宁静升起来；“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这里。我们的工作刚刚有了一点成绩。我们正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倍努力工作。倘使现在就卷起铺盖离开，那么这两个多月的工作岂不是等于白费！”

“不过杨同志也应该顾到战局的变化。我们的军队在前线转移了阵地，我们也只好跟着转移我们的阵地。这种情况，

司令长官部一定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当然要服从他们的调动，”王东蹲在地上，侧过脸望着杨文木说。

“司令长官部说不定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我们可以派人到城里去接洽。他们会让我们留下来的。况且我们又不是司令长官部的直属团体，”杨文木固执地说。

“我赞成留下来，我喜欢这个地方，”冯文淑坐在门限上，这时忽然站起来大声说。

“我也愿意留在这里。现在住熟了，做什么事都比别处方便，”坐在冯文淑旁边的周欣立刻响应道。

方群文坐在板凳上皱一下眉头，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最要紧的是我们应该跟司令长官部保持联络。否则敌人一旦打过来，我们临时要撤退也没有办法了。其实到处都是做工的地方。”

“方同志这段话很重要。我们如果跟司令长官部失了联络，那很危险，”王东附和道，他觉得不跟军队一道进退，却留在这里工作，实在是冒险的举动。

“那么我们就打游击，”吴平不负责任地说了一句，脸上泛起了微笑，他时常做着这样的梦：在星夜拿着一支枪，站在矮树背后对着敌人的哨兵开放，或者跟随着十多个同志埋伏在树林中等着押辎重的敌兵到来。

“我们又不是本地人，对地方情形也不熟习，怎么可以打游击？”王东立刻反驳道。

“这倒是真话，”方天行点头表示赞同道。

“然而你却忘记了我们还有那许多老百姓做后盾！我们

还可以帮忙他们组织起来，”杨文本兴奋地大声辩道。

“不过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不是几天功夫可以办到的。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的老百姓很好，”张利英温和地说。她的面容是十二个人中间最平静的。她坐在方群文的旁边，身子和方群文的挨得很近。

“其实张同志也是过虑。要做事只看自己有没有牺牲的决心，何必管什么来得及来不及！”杨文本着急地说。

“牺牲自然是伟大的。不过我们也不必轻言牺牲。有时候做事情也需要慎重的考虑，”张利英略带焦虑地说。她忽然转向着李南星问道：

“李同志，你的意见怎样？”

“我愿意留下来准备打游击。不过我们应该在事前决定一个计划。如果空谈牺牲，我看倒不如走的好，”李南星直率地答道。他闭了嘴，马上又落在沉思里去了。人觉得他这时似乎就在想他所说的计划。

“我并不是空谈牺牲。我们有了牺牲的决心，自然要拟出一个计划。李同志，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不是那样说法，”杨文本着急地说，他的脸也挣红了。但是夜网已经罩下来了，靠着简单的一瞥，别人不会看清楚他的脸色。

李南星笑了笑，连忙解释道：“杨同志，你不要以为我在讽刺你，我决没有这个心思。我是指一般的情况说的。的确，要留下来打游击，非先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不行。而且也得先跟司令长官部商量，不然枪支从哪里来？你调查过没有，这个镇上究竟有几支枪？”

杨文木一时回答不出来，他生气地板起了脸孔。

“我想，司令长官部知道我们留下来打游击，一定高兴。枪支不会有问题，”冯文淑乐观地说，她仍旧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周欣不响，她觉得李南星的话有道理。

“你想会有这样容易的事？”姚民瑞忽然把脸掉向冯文淑，讥笑地说一句。

“我没有跟你讲话！”冯文淑撅着嘴回答道。她把脸一偏，不看他那个发亮的和尚头。天色更深，地上却开始亮起来，现出了淡淡的人影。

“我说的是事实，听不听由你，”姚民瑞仍旧带笑地说。

“请大家不要开玩笑，现在是在开紧急会议，”杨文木不耐烦地嚷起来。

冯文淑扫兴地低声对姚民瑞说了一句：“今天算是让了你们。”她本来还有别的话，却被杨文木的干涉阻止了。

姚民瑞看了杨文木一眼，他知道这个同志的脾气。他便趁这个时候提高声音说：“那么我就说我的意见，我赞成搬到城里去。”

“我们应该仔细想一想，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杨文木听见姚民瑞的话，觉得好象有人迎头泼了他一瓢凉水，心里非常不舒服，他看见希望渐渐地飞走了，便设法挽回地说：“我们随便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会后悔的。我觉得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又得从新开始，我们逃来逃去，不知道要逃到什么时候为止。”他停了停，又说：“你们不了解，你们没有这种经验，我等了七年了，七年了。”他忽然抬

起头望天，镰刀似的月亮嘲讽地望着他。他想，月亮是知道的，什么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没有人想答话，大家都感到一种压迫，好象一只手蒙住他们的嘴，他们有点透不过气来。冯文淑捏了捏周欣的膀子，她听见周欣惊怪地低声说：“你在做什么？”她不回答，她昂起头，真想大声唱起歌来。

“杨同志，我们了解你，”终于方群文开口了，她用了略带颤动的声音说：“不过我不赞成你那种只图一时痛快的主张。我们做工作并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徒然冒危险谈牺牲，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好处。现在撤退到别的地方做工作还不是一样？要应付困难的局面，我们十二个人能力太不够了。我看还是服从司令长官部的调动，趁早撤退好些。不然到了危急时候，要走又来不及了，会弄得没有一点办法。我们上次在徐州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不知道别的同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有过，”方天行点头说：“我们那个演剧队从徐州突围出来，在路上还给敌人打死了一个队员。”他觉得当时的情景又在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个同志的血似乎浸入了他的心，他痛苦地闭紧了嘴。

“那么，我们还是趁早撤退罢。我看现在情况很紧急了，”王东有点紧张地说：“不然司令长官部决不会要我们先搬到城里去。”他又加上一句：“我看最好明天就走。”

“不过明天走也太急了；走得太快，我们怎么好对老百姓讲话？”周欣表示不赞成道。

“对，镇上还很安静，我们就走了，多不好。你们看，这周围多么美，”冯文淑留恋地说。她又朝四周看了看。“哪里象战争逼近的样子？老百姓多么朴实可爱。他们对我们真好。我简直不愿意离开。”她停了一下，又说：“就要走，也得多住几天，让我们跟老百姓多聚会几次。”

“最好请你多演几个戏给老百姓看，”姚民瑞忍住笑接下去说。

“哪个象你那样高兴演戏？这又不是出风头！”冯文淑知道姚民瑞在挖苦她，便装出嗔怒的神气说。其实她很高兴演戏，而且这句话也不曾激怒她，不过她的嘴是不肯让人的。

“既然要走，就索性早走，拖泥带水地留下来，我不赞成。好地方，好百姓，到处都是，”姚民锋故意用这样的话来激怒两个人：一个是冯文淑，他高兴跟她斗嘴；一个是杨文本，他不喜欢杨文本说话的口气。

“多留两天也好，我倒赞成冯同志的意见，”王东说这句话，完全为了讨好冯文淑和周欣，尤其是冯文淑。她的姿态在这静夜里显得太可爱了。他愿意让她高兴，他愿意听她的笑声。

“不走就不走。单单多留几天还是要走，这有什么意思？”杨文本不满意地说。

“那么就决定走罢，我看还是赞成走的人多，”姚民锋立刻接下去说。

“我看，还是来表决一下罢。”曾明远这一阵子都没有开口，他注意地听着每个人讲话，不曾漏掉一个字，他觉得这时

候他应该发言了。他自己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在感情上说，他愿意留下来；在理智上说，他主张服从司令长官部的调动。他明白搬到城里去是比较安全的办法。他对十一位同志的生命安全是负有责任的，他不能不在事前仔细地考虑。他从板凳上站起来，看了看众人，然后用手指头指点着：“方群文同志，张同志，王同志，方天行同志，姚民锋同志，姚民瑞同志，都是赞成走的。已经有六个了。周欣同志好象也不反对走。”周欣点点头。“吴同志，你怎么样？”他指着吴平问道。

吴平正用手揉着他的塌鼻子，那里刚刚被蚊子叮了一下，他听见曾明远的问话略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服从多数，大家说走我就走。”他那个梦已经被同志们这一阵子的谈话打破了。

“那么李同志方面也没有问题了，他赞成留下原是附得有条件的，”曾明远急转直下地说。“反对走的只有两个人，就是杨同志和冯同志。……”

“我也是服从大家的意见，”冯文淑连忙插嘴说。

“那更好，我也主张走，这是绝对的多数，”曾明远答道，“现在就算是决定了。大家没有异议罢？我们再来商量别的事情。”

“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李南星马上大声说，好象他害怕迟了就会失去机会似的。“既然决定要走，我看不妨多留两天，让我们跟老百姓多谈几次话。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他们多做点工作，多留点影响，使他们将来可以组织起来，对付敌人。我看那个教书先生王老师将来倒可以负点责任。”

“对，对，我就有这个意思，”曾明远高兴地接着说：“我看王老师倒是个有心人。他信仰坚强，做事沉着，他将来很可能领导当地民众跟敌人斗争。”

“那么我们应该多送点书给他，”冯文淑兴奋地说，她忽然又高兴了。

“我已经想到了。我今天还对他提过。等一阵我们不妨把书清出来，”曾明远点头说：“个人的书愿意拿出来送的，我们也欢迎。”

“那么，我们决定哪天走？”方群文问道。

别的人都不响，曾明远迟疑一下答道：“那么暂定大后天怎样？如果情况不好，后天也可以走。”

“那么就是大后天罢，”李南星插嘴道。他走到张利英面前，低声说：“张同志，我们走罢。”他又对曾明远说：“我们现在到姚家去。”

曾明远点头说：“好。我们的会还要开下去。你们现在去，时间不迟吗？”他知道他们要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谈话，这是今天下午约定了的。当时他们还没有料到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现在还早，”李南星短短地答道。

冯文淑知道他们两个要到什么地方去，她很兴奋，忍不住小孩似地叫起来，马上从门限上站起，麻木的腿几乎使她摔倒：“我也去。”她又向曾明远要求：“曾明远同志，我也要去！”

曾明远知道她的脾气，也不留难，立刻答应了，只问了一句：“你今天不累，还要跑这许多路？”

“不，我高兴做这样的工作，”冯文淑得意地答道。她把疲

倦忘记了，这时只觉得身子轻得象要飞起来似的。她含笑地问周欣：“你去不去？”

“你不要再拉人走了，我们还要开会啊！”曾明远连忙大声阻止道。王东本来已经站起了，听见这句话，便又坐下去。

“不去也好，我晚上还要给姆妈写信，”这是周欣回答冯文淑的话。

“冯同志，你要小心，最好带根棍子去，免得在路上碰见狼，”姚民瑞开玩笑地说。他也想走一趟，不过还没有打定主意。

“呸，”冯文淑啐了他一口，“路上哪里有狼？哪个象你这样胆小，有本事你敢跟我们一道去！”

“好，我就跟你们一道去。我还可以画几张画儿回来，”姚民瑞爽快地答道。

他果然得到曾明远的许可，跟着冯文淑走了。

十

转过几棵白杨树，前面灰黄的灯光使这一行四个人忘记了四围迷茫的山色。平屋的黑影静静地坐在斜坡下，好象一个知道若干秘密等着告诉人的魔术师。冯文淑觉得心突然跳得更厉害了，她听见李南星严肃地小声说：“到了，就在这里。”她连忙加快脚步顺着这土坡走下去，但是从那棵枣树旁边意外地飞起了狗的狂吠。她不自觉地退后两步，把身子往张利英的身上靠去。

“不要怕，他们会喊住的，”李南星在后面安慰地说。他走到前面去，把狗赶开了。

狗还是向着坡上叫，它似乎就要扑上来。冯文淑还站在那里，不想走，姚民瑞马上笑着激她一句：“真不中用，跑出来快一年，还害怕狗！”

“哪个怕？我就走给你看！”冯文淑不加思索、赌气地答道。她真的就鼓起勇气跑下坡去。

“好，这才是我们的新女性，”姚民瑞称赞道。但是狗的叫声已经停止了，有人从屋里出来唤住了它。

李南星听见唤狗的声音，他知道出来的是什么人，便远远地向那个人打一个招呼。于是他们听见了亲切的欢迎的话。

他们到了平屋门前，迎着他们的是那个姓姚的农民，身材相当高大，花白的胡须在淡淡的月光下发亮。在这高大的身躯后面又转出来三张朴实的面孔。

“我们来迟了，”张利英用道歉的语调说。

“先生们路远啊，”姚老头和蔼地笑答道。“请进去喝茶罢。”他把他们请到屋里去了。

屋里正中放着一张旧方桌，桌上有一盏油灯和一个盛茶汁的瓦壶。桌子旁边几张黑黄的脸，一齐掉向门口。这几个人看见李南星走进，全站起来。

“你们等久了罢，”张利英温和地点头招呼他们说。

“俺也才来。先生辛苦啊，”一个年轻人笑答道。他穿着壮丁的制服，每天参加镇上壮丁的操练。

“那么大家坐下罢，”李南星招呼众人说。他又看看他那三个同伴，说一句：“我们挤一挤罢。”

这四个同志就在一根板凳上坐下来。农民们也坐了。几只手立刻放了四碗茶在新来的客人面前，还递了两把大扇子在他们的手里。

没有人讲话，也没有吵闹的声音。蚊子飞过来又被扇子赶走了。屋角和门外有蚊子的叫声。在另一间屋里“伊呀”、“伊呀”的纺车声始终不曾断过。热气渐渐地散去了。

冯文淑捧着一碗凉茶，象甘露似地一口气就喝尽了。她放下碗，又拿起扇子接连扇着。她坐在张利英旁边，只有半边屁股坐在板凳头上。有几对尊敬的（但也带了一点好奇的）眼光停留在她带笑的天真的面颜上。他们看过了她演的戏，这些简

单朴实的心不能了解：象这样一个小孩似的大姑娘怎么能做出那许多动人的情节？冯文淑忽然觉察到这情形，有点不好意思，便做出镇静样子，望着门外。张利英对她微微一笑。于是几张诚朴的脸也跟着笑了。冯文淑也看见了这些亲切的笑容，她的心又渐渐地静下来。她听见李南星开始讲话。他的声音清晰而亲切，话语浅显。他向他们报告时事，顺便解释抗战进展的情况。这些话在她的耳里是十分熟习的。她不必听下去，但是她也用心听着，因为这是静寂中唯一显示生命的声音。纺车也已停止动作。那个象患贫血病的中年女人也出来坐在屋角一个矮凳上，听李南星讲话。

屋子里没有别的人声，蟋蟀的哀鸣也是时起时辍。冯文淑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向着李南星的嘴，她便暗暗地把眼光移去观察每一张脸。对这些脸她起初给了笼统的一瞥，她觉得它们都是一样的，厚厚的嘴唇，浓浓的眉，睁大的眼睛……以后她才慢慢地看出区别来，脸颊有瘦有肥，颧骨有高有低，头发有多有少。大部分人有着相同的表情。这就是恨不得把李南星的话全吞进肚里似的急切的表情，其中自然也有差别。年纪大一点的人一面听话，一面点头；年纪轻一点的就张开口不转睛地望着说话的人。在那些脸上现在看不到丝毫的笑意。那里有的全是严肃。显然他们相信李南星的话，而且努力了解他说的一切。他们的感情跟着他的叙述在变化，似乎他的嘴可以左右他们的心。她看见愤怒象黑云似地堆在他们的脸上，一片一片地堆起来。但是意外地响起了笑声。李南星讲起一个鬼子打败仗的故事，大家感到痛快地失声笑了。

“他能讲话，他能讲话，”冯文淑心里这样想，她也微笑了。他继续讲下去，也没有人打岔他。张利英的脸上永远带着鼓舞人的温和的微笑。“我要学学他，”冯文淑又在心里说了这一句。她喜欢他这样说法，他不是演讲，他是在说故事。

她觉得李南星的嘴真象一条小河，水不住地流，不住地流。但是水忽然停滞了。她听见几个人粗重地在嘘气，她听见几个人在咳嗽，李南星也咳了一声嗽。房屋主人姚老头连忙给李南星斟了一碗茶，殷勤地说：“先生，请喝茶啊！”

还没有人发出疑问。李南星喝着茶，他准备再讲，他还应该提起他们的注意。他还不大明白自己的话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李先生，你看鬼子就要打来吗？”发问的是那个黑脸伙计，他跟李南星他们相当熟。

“他们要来的。他们就象一伙强盗，只要有东西可偷可抢，他们怎么肯不来？”李南星不慌不忙地答道，他接着又用一些可怕的形容词，描写强盗们的贪婪和凶残。

冯文淑看见黑云又罩上了那些诚朴的脸。她觉得那里有畏惧的表情，不过愤怒更多，原始的正义的要求使这些脸显得更有力量。她想起这几个人是李南星特别挑选的，他们在他们中间一定下过工夫。她看见那个年轻的壮丁忽然捏紧了拳头，气恼地骂一句：“鬼子来，我们就打他个落花流水！”

“就怕他们人多，俺们这里抵挡不住，”黑脸伙计自语似地说，“俺们军队还打不过他们。”

冯文淑皱皱眉头。她想，这个年轻人那天不是说过要拿

刀砍鬼子吗？怎么现在动摇起来了。这样的话使她感到不舒服，她想开口辩驳一番。但是她听见李南星忽然大声唤这个伙计的名字。他接着正言厉色地说：“你害怕鬼子吗？那么你回家去躲起来，穿上花衣服装女人去！”（最后的几个字使得冯文淑不满意地把嘴一撅。）

黑脸伙计马上红了脸，他接连口吃地解释道：“俺不怕。俺怕就不是人！”

“你不说鬼子人多吗？那么鬼子来，你就快点跑开！免得他们碰到你。不然你甘心做汉奸？！你还赶不上戏里那个大姑娘！”李南星用热烈的语调激励这个年轻人道。

“俺不跑！俺不怕！俺要打鬼子！俺打死那些汉奸！”黑脸伙计又恼又急、脸红颈胀地说。“李先生，你瞧着。俺一刀砍他一个脑袋。不怕鬼子人多，俺有这条命！”他勇敢地拍拍胸膛。

“好，”李南星赞道，他伸起大拇指说：“小子，你真有种！”他的脸上透出一片笑云，他看了看别的几个人，然后庄重地（声音不象先前那样严厉了）说：“你们要打鬼子，我就跟你们谈打鬼子的办法。鬼子人多，我们用不着害怕。只要有办法，鬼子再多，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打走。我们今晚上就是来谈这件事情的。”

冯文淑感到一阵畅快。她好象刚走入一条迷径，又忽然发见了大道似的。李南星的那几句话是她没有料想到的。但是听见它们，她却暗暗地点头想：是应该这样说的，是应该这样说的。她钦佩地看了李南星一眼，无心地把右手第二根手指头放进嘴里衔着。

李南星继续讲下去。他现在真的在讲打鬼子的办法。他在解释游击战。他不用术语，不用普通的名词。他谈到实际情形和实际办法。他分开一件事一件事地说。他指出一个步骤，然后再说第二步。他说明为什么鬼子们会渐渐地逼近，又解释为什么别地方的人打鬼子没有得到成功。他不断地鼓舞他们，但是他不用热情，却只用他们明白而感到兴趣的实际事例。他把信念注入那些人的头脑中，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确可以打退鬼子。他给他们指出了切实的容易着手的办法。他渐渐地给那些脸涂上昂扬，涂上欢快。他的坚定的声音（这坚定不断地在增加）象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抓住了他们的心。

“就是他一个人在说，”冯文淑轻轻地对张利英说。她好象在抱怨，其实她很高兴。张利英看她一眼，就知道她的心理，于是回答一句：

“他能说，就让他说罢。”

“你也应该说几句，”冯文淑悄悄地鼓动道。

“你听他说，”张利英又答一句。她微笑着，把嘴一动，意思是要她专心听李南星的话。姚民瑞拿着铅笔和拍纸簿，但是不常绘画，也不常发言，却总是用一只手撑着下巴注意地听人讲话。

油灯仍然寂寞地发射着灰黄的灯光，灰暗的墙上动着李南星的上半身的黑影。淡淡的月光从门外窥进来，狗静静地睡在门前枣树脚下，身上盖着树影。蚊子闲适地在方桌的四周巡游。但是李南星的话却使这个房间显得很明亮，而且给这里带来了活跃的生命。他的话把另一个令人兴奋的世界放

在众人的眼前。

冯文淑和那些农民一样跟着李南星的话走；张利英也是，后来终于到了尽头，站住了。张利英看了看李南星的微闭的嘴，她觉得现在需要她发言了。她望着那些农民的脸，依旧带着她那温和的微笑，声音清朗地说：“他这些话，你们都懂罢？你们要是不懂，可以随便问他。你们问什么话都好。只要是不懂就问。他会给你们说清楚。你们不要怕人笑，有话，就说啊。”

她的话产生了效果，于是人们发问了。他们坦白地吐露出了他们的胸怀。有的人耽心打鬼子会妨碍他们的农事，有的人害怕鬼子对他们的家室加倍报复，有的人耽心官家不给他们帮忙，有的人又害怕别的同胞不跟他们一块儿行动……总之问题不少。李南星用简单明瞭的话一一地回答了，这次他还得到了张利英的帮助。她常常帮忙他解释，这使得冯文淑更加兴奋起来，这个少女也凭着她的知识插嘴补充几句。只有姚民瑞一直不讲话，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欣赏”这个情景。

“王老师会跟俺们在一起罢？听说他家里有枪，”又是黑脸伙计在问。

李南星用确定的口气回答他，王老师今天不是在会上讲过话吗？王老师不但要跟他们一起打鬼子，王老师的那些学生也是他们得力的帮手。

这个回答使他们高兴。他们也想起了王老师今天讲的话。王老师还要在赶集的日子里念新闻给他们听。他们都希望鬼

子打来的时候有人组织游击队，他们好参加。他们高兴有人教他们打仗，他们愿意每个人都有一支枪。他们最盼望的是大家先操练好，守住地方不让鬼子打进来，他们知道在这一带地方，哪些人家藏得有枪，哪些人家可以出钱。他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齐心打鬼子。他们更希望有经验的人来领导他们，他们愿意不顾死活地保卫家乡。

谈话继续着。大家不分次序地讲话或者发问。李南星看看表，时间不早了，但是他必须忍耐地对他们解答一切。张利英也看自己的手表。她略略怔了一下，然后脸上又泛出她常有的微笑。她很安静地观察而且帮助这谈话的进行。冯文淑却没有注意时间的早迟，她始终带着兴奋的喜色领略这种在她觉得是“新奇可爱”的气氛。她甚至不曾想到这样的谈话会有完结的时候。

朴实的农民脸上的表情慢慢地在变化，但这是向着明朗爽快的方向走的。李南星他们就象用一把拂尘轻轻地扫去了他们脸上的疑虑，愤激，或愁苦，另外涂上明朗的希望。于是松弛的微笑飞上了每一张黑黄色的脸。

李南星又看一下表，他满意地站起来，而且愉快地笑了。他侧过脸对张利英说一句：“我们走罢。”张利英等三个人也跟着站起来。农民们在李南星起立时就推开板凳站起了。冯文淑还留恋地看看屋子和人脸，她想自己再没有机会来这里参加这样性质的谈话了，她感到一点遗憾。但是她听见李南星跟姚老头讲话时忽然露出了还要再来的口气，她觉得奇怪。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躺在门外。枣树也落在酣睡中。狗不

知躲到哪里去了。屋子里却发生了一阵骚动。连蚊子也象受了惊似地四处乱飞。冯文淑走出阴暗的屋子，愉快地回头对张利英说：“我今天真开心。”她忽然注意到李南星还立在方桌前，跟四五个人在讲话，他的声音很低，表情也相当严肃。她好奇地想听出来他在谈些什么，但是她只能听见几个断续的字：“王 老师……明天晚上……早一点……一定……要紧……我……”

狗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回来，突然汪汪地大叫两三声，但是又被主人叱止了。可是这一来却打断了冯文淑的注意力。她离开门前急急地走了三四步。她听见姚民瑞还在开玩笑地问她：“今天晚上你怎么不多讲几句？”她便骄傲地答道：“我总比你说得多，你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看你很少拿起笔在画！”

“我看得出来，起初大家都注意你，后来李南星就成了他们的英雄。他的确比你会讲话，”姚民瑞笑嘻嘻地故意激她道。

冯文淑不回答，她再把脸掉向屋内，李南星已经被几个年轻的农民拥着走出来了。

天空中围绕在月亮四周的白色云片渐渐地完全消失了。月光显得相当地清明。北斗七星象老朋友似地在前面对她眨眼。他们就向着这些指路的星星走去。

在路上冯文淑欢欣地唱着歌，跳跃似地下着轻快的步子，仿佛是赴了盛筵归来一样。张利英紧紧跟在冯文淑后面，她还保持着她那温和的微笑，她象一个姐姐似地时时留心冯文淑的动作。她了解这个妹妹的快乐，而且她自己也有着类似

的感情。她先前走这条路去那个农家时，她还有相当紧张的心情。但现在留在她心里的却是轻快和平静。没有一点阴影，眼前似乎特别开朗了。这时她正走过一片稻田，从那有她半身高的稻丛中送过来温暖的稻子香。月光洒在黄澄澄的稻穗上，稻穗因了微风在微微摇摆，望过去，仿佛是一片闪光的江水。她忽然满足地扬起头，跟着冯文淑断续地低声唱起歌来。

“冯同志，看你这样高兴，你好象就要飞起来似的，”姚民瑞看见冯文淑一下就跳过那条路沟，便在后面带笑地大声唤她道。

冯文淑噗嗤一下笑出来，她的歌声断了。她回答一句：“今天晚上我们哪个不高兴？”她又挺起胸得意地前进了。

她说得不错。姚民瑞也是充满快乐的。碉堡前面开会时的那种郁闷的空气已经完全消散了，因为他现在又看到了希望。希望充实了他的心，他不再说什么，他也唱着冯文淑唱的歌。

李南星一直不讲话。三个同伴的快乐的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心境，因为他在思索，在计划一件事情。只有他的心情还是很紧张的。在这安静的田野中他还给自己描绘了一个斗争的世界。就象建筑一所房屋一样，他慢慢地在架梁木，放砖瓦。他一个人一双手在建造它。他不向别人要求一只援助的手。他害怕别人不了解，别人会阻止他。这一晚的成绩给他带来快乐。但是这只有鼓舞他向着一个更大的目标，向着那个斗争的世界前进。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的秘密。这是

他应该下决心的时候。别人不会了解他。他必须做一个决断的人。来时的李南星和去时的李南星有着相当大的改变了。他终于决定了一件事情，决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这个连张利英也不知道。

走过孤坟畔白杨旁边，冯文淑忽然想起了王东，就带笑地对姚民瑞讲起王东做诗的故事。当姚民瑞正为这个故事哈哈笑着的时候，李南星忽然走到冯文淑的身旁，严肃地小声要求道：“文淑，你那一百块钱可以借六十给我么？”

冯文淑惊奇地看看他，不知道他心里藏得有什么事情。这要求真是她料不到的。使她很想向他问个明白。但是他那严肃声音和庄重态度，使她觉得她不便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发问，她只好回答他道：“可以的，你什么时候要？”她很愿意满足这个同志的要求，而且这在他还是第一次，他一定有什么急需。

“明天早晨。但是请你不要问起钱的用途，”李南星依旧严肃地小声说，他好象已经猜到了她的心理，先用这句话来封闭她的嘴。

“好，”她爽快地答道。她想：你有什么事情，我总会很快地知道的。

十 一

两天的工作、连续的农家访问和没有休息的谈话，在这些年轻人的肩上放下了疲倦的担子。有的人声音嘶哑了，有的人两腿沉重了，有的人口里不停地喘气，有的人脸色成了灰白。但是他们走到王家门前的时候，每张脸上都现出了亲切的微笑。他们一共是九个人。

依旧是黄土的矮墙、冒热气的空地、伞盖似的大树荫和他们进进出出走惯了的矮门。依旧是那条摇摆尾巴走过来欢迎他们的黑狗。依旧是那不知疲倦的蝉噪，依旧是那有节奏的纺车声。一切都和往日一样。狗亲热地叫起来。从矮门里走出银妞儿，手里抱着孩子来招呼他们。

“我要多看几眼，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冯文淑忽然感动地对走在她旁边的周欣说。

“何必这样感伤？我们明天又会到一个新地方的，”周欣笑着答道。

“新地方，我已经走过不少的新地方了，”冯文淑说，她觉得“惆怅”象针一样在她的心上刺了一下。但是她马上又用力把它拔掉了。她接下去唱起了一首雄壮的抗战歌曲。

“还有更多更好的新地方，只要我们用坚定的脚步走去，”

周欣似乎知道她的心情，便点醒似地又说道。

冯文淑终于忍耐不住停止了唱歌，对周欣吐出真话道：“老实对你说，我实在不愿意离开此地，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地方真有点留恋。”

周欣噗嗤笑起来：“你的小姐脾气又发作了。”她推了一下冯文淑的膀子，又说：“他们都进去了，你还站在这树下做什么？”

“不许你挖苦我，”冯文淑翘起嘴说。她忽然正经地问道：“周欣，你还记得我们离开上海的情形吗？”

“记得又怎样？你为什么总要回想过去的事情？”周欣低声答道，她觉得奇怪地看了冯文淑一眼。

“我觉得这大半年我也不算白跑，”冯文淑感动地说：“要是我还在家里，现在不知道我……”

张利英走过来打断了冯文淑的话。她笑着问道：“你们这两个小孩子又在讲什么？”

冯文淑看见张利英的温和的面颜，也亲切地笑了。她说：“姐姐，我们在讲你，你该记得，我们离开上海那个晚上，你来送车，你还穿一件花旗袍，美得很。”

“你又在嚼舌头，”张利英也失声笑了；“我真羡慕你们，你们一天到晚就这样开心。”

“你说她开心！刚才她差一点儿哭起来了，”周欣笑着说。

“姐姐，你不要相信她，她造谣，”冯文淑着急地辩道。

“吵什么？要不要我来画个像？”姚民瑞跑过来问道，拍纸簿还捏在手里。

“要画像，不要忘记给我也画一张，”跟着他跑来的吴平在后面嚷起来。

姚民锋和王东各端了一根板凳出来，向大树那面唤道：“要坐的，快来啊。”他们在门前放好板凳就先坐下了。吴平连忙撇下姚民瑞跑回去。方天行带着沉思的样子从屋里出来，也在板凳上坐了。然后在门框上出现了方群文，她把银妞儿的小弟弟抱在怀里。

“我们这个团体就象家庭一样，你们觉得不觉得？”张利英满意地对冯文淑和周欣说。姚民瑞真的动笔画起来。

“对。所以你是我们的大姐姐，”冯文淑笑答道。

“不过我不喜欢王东，这个人不是坏，却总有点阴阳怪气的，”周欣接嘴说，声音低，但是把姚民瑞惹笑了。

“我也不大喜欢杨文木，他那张脸有时候看起来怪可怕的，而且他总是板起脸说扫兴话，动不动就是那一句‘七年了’。他总说大家做事慢，不努力；问他该怎么办，他又说不出来。他真是一个牢骚主义者！”冯文淑皱起眉头抱怨地说。

“女孩子说话要宽厚点，不要乱批评人，取什么绰号，”张利英声音柔和地答了一句。她瞥见一个熟习的影子点着手杖向这面走来。

“姐姐，我求你，我钮扣又脱了，”冯文淑忽然抓住张利英的手笑嘻嘻地说。

“你也是个女孩子，为什么又要我缝？”张利英笑道。

“我不会。姐姐不缝，还有哪个给我缝呢？”冯文淑撒娇般地说。

“好，不要做怪样子。我向王大娘借根针给你缝就是了，”张利英爱怜地说。她又笑着添一句：“做你的姐姐真不容易。”

“他们怎么还不来？人家肚子饿得没有办法，”王东坐在板凳上大声抱怨道，他的背弯得象一张弓，一只手拿着帽子在玩。

“不要吵，他们来啦，”周欣略带嫌厌地答道，她看见了曾明远的影子。来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看见他们，高兴地说：“事情都办妥了。明天一早伙子就到我们那里去。”

“就只有你一个人？李同志和杨同志呢？”张利英问道。

“他们送书到王老师那里去了，我们吃饭用不着等他们，他们不来了，”曾明远平静地答道。

“那么我去叫王大娘开饭，”王东马上站起来，走进屋里去了。他刚刚进去，银妞儿就从里面伸一个头出来。

“先生们，请喝茶啊，”银妞儿带笑唤道，她从方群文的手里接过了小孩。

姚民锋、吴平等人一齐拥进屋去。冯文淑和周欣也跟着跑进去了。曾明远默默地望着那些背影消失在矮门里，他对着留在他身旁的张利英低声说：“六安已经陷落，敌人还想前进。”

“那么，我们明天一早非走不可，”张利英立刻收敛起脸上的微笑轻轻地答了一句。

“我们吃过饭就回去，赶快把东西收拾好。我们在城里也住不到两天，就得往别处走，”曾明远还要说下去，但是看见冯文淑出来招呼他们吃饭，便闭上了嘴。

吃饭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和平时一样。曾明远不大说话，他放下碗时，看见张利英立在屋角跟老妇人讲话。王大娘堆着满脸的笑容走过来，手里还捏着张利英刚才交给她的钞票，感谢地说：“先生们又给俺钱，俺不敢收下。先生们为国家做事，远远地跑来打鬼子，俺不过给先生们做饭，先生们又给钱……”

“王大娘，你收下，你不用客气，”曾明远带笑地说。

“先生们明早就走？”王大娘顺口问道，脸上露出了留恋的表情。她又问一句：“还要回来罢？”

“明早走，一时不回来了，”曾明远简短地答道。

冯文淑走了过来，她插嘴道：“王大娘，要不是上面来调我们，我们真不愿意走！这个地方真不错，你们老百姓也好得很。”她那两颗滚圆的眼珠就在王大娘的黄脸上滚来滚去，她自己的脸颊上又浮起那一对可爱的酒涡。

“先生们多夸奖。先生们才是好官长啊！”王大娘张开嘴笑嘻嘻地说，态度诚恳得近于可笑。“两个多月一直得到先生们的好处。俺只求先生们多打胜仗，打退鬼子好回来。”

冯文淑连忙用手帕掩住嘴，她害怕会笑出声来。她把头微微掉开，却看见周欣在屋外跟银妞儿讲话，她走到周欣旁边，把一只手搭在周欣的肩头。

“周先生，你自己用罢，俺不要，”银妞儿红着脸略带忸怩地说。她把一张手帕退还给周欣，另一只手还抱着孩子。

“你收下，我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你收下作个纪念罢，你看见它就象看见我一样，你懂不懂？”周欣着急地说。

“周先生，俺收下，俺谢谢你啦，”银妞儿捏紧手帕带笑地感谢道。

冯文淑忽然从衣袋里摸出那方蓝地白花丝头巾，递给银妞儿，不好意思地短短说：“送给你，送给你！”

周欣诧异地看了冯文淑一眼，她知道这方丝头巾是冯文淑喜欢的东西。她看见冯文淑脸上的恳切的表情，她也感动地点头微笑了。

“冯先生，你留着，你留着，”银妞儿红着脸推辞道。

“你收下，我真的送给你。这是从上海买来的，你不喜欢吗？”冯文淑亲切地说。

“俺喜欢，”银妞儿两眼发光地答道。她用手指摩了摩丝巾，多么柔软，多么光滑，她不觉赞了一句：“细得很，细得很。”她又抬头看冯文淑：“很贵罢？”她听见冯文淑接连说：“你拿着，你拿着，”就把它接过来，爱惜地看了看，又听见周欣也劝她收下，她看看她的母亲，那个女人还在门前跟曾明远、方群文、方天行等讲话，她便对冯文淑千恩万谢地说：“冯先生，俺谢谢你，冯先生，俺谢谢你。”她诚恳地望着周欣和冯文淑，要求似地说：“周先生，冯先生，你们再来罢。”

一个声音从旁边插进来：“你们真是女孩子，又在送纪念品了。”这是姚民瑞在讲话，他的拍纸簿还捏在手里。

“我们要来的，鬼子打退了，我们就回来，”冯文淑用这样的话安慰银妞儿，也安慰她自己。她听见周欣在嘱咐姚民瑞：“姚同志，现在不许你开玩笑，”便掉过头看他一眼，反唇讥讽道：“你老是拿着你那本宝贝簿子，就没有看见你画出几张画

来。”

“不管你事，我要给银妞儿画一张，”姚民瑞说。

“好，好，你就画，你快点画，”冯文淑立刻换了语调，高兴地说。她又嘱咐银妞儿：“你站好，让他给你画张像，我们好带起走。”她马上又兴奋地说：“等我把头巾给你包好，一定美得很。”说着她不管银妞儿不好意思，硬把那方丝巾束在银妞儿的头上，然后拍着手赞道：“真漂亮，真漂亮！”银妞儿有点害羞，但也显出满意的样子。孩子仍然抱在她的手里，安闲地吃自己的指头。她笑嘻嘻地站在那里，不时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姚民瑞的手，让他画下去。

“银妞儿，银妞儿！”王大娘在屋内大声唤起来。银妞儿答应着，正要走开。

“你不要动，再等一阵，就完了，”姚民瑞连忙阻止道。冯文淑便代她答应她的母亲道：“王大娘，银妞儿有事，等一下就来。”

曾明远等人都走过来，吴平和姚民锋马上挨到姚民瑞旁边去。张利英带笑地问道：“你们又在做什么？要回去了。”

冯文淑留恋不舍地答道：“等一下，等他画完了就走。”但是银妞儿手里的孩子忽然大声哭起来，那个女孩努力诓他，也没有用。

“好了，好了，你去罢，”姚民瑞挥手说，他的画就只差几笔了，他可以很快地画完它。

王大娘从屋里急急地走出来，银妞儿抱着孩子迎过去。孩子到了母亲的怀里就不哭了。银妞儿马上取开包头丝巾，得

意地向母亲夸示道：“冯先生送俺的。”她把它给母亲递过去。

“啊，”王大娘惊喜地轻轻叫出声。她拿着丝巾，仔细地看了看，摩了摩，赞美道：“好东西，一定很贵罢。”

“说是上海买的啊，”银姐儿两眼发光地接嘴道。她又从衣袋里掏出周欣送的手帕，递过去：“这是周先生送我的。”

“都是人家小姐用的好东西啊！”王大娘接过那张可爱的半新的小花手帕（其实这只是普通的、上海女学生常用的一种），抖一抖，又拿到鼻端一闻，“还香啦，你也闻闻。”她把手帕递还给银姐儿。“先生们待俺家真好，又送钱又送东西。俺家就没东西送人。”她把丝巾也还给银姐儿，“今晚俺给你放好。”她又问：“你谢过先生们没有？”

“俺谢过啦，”银姐儿笑笑说。

“俺也去谢谢——”王大娘话还未说完，曾明远这群人就过来向她告辞了。冯文淑还到屋里去看那个老妇人。接着纺车就静下来，老妇人颤巍巍地伴着冯文淑走到外面，给“先生们”送别。

这送别的一幕是简单、朴素的。没有眼泪，没有牵挂。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亲切的微笑。那个单纯的农妇不断地用简单的语言感谢着，盼望着，祝福着。那个表情迟钝的老妇默默地送着慈母般的注视。那个天真的少女象一个小妹妹含笑地追着他们的影子。她一个人跟着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她还站在田坎上，对着那些背影频频地挥手，亲切地唤了好几声“冯先生”、“周先生”和“张先生”。她等着她们有一天再来。

冯文淑还时常回头去看她刚才离开的地方，一直到平屋

被白杨林隐藏，少女的身影淡到没有，她感到了一种近于悲壮的心情。这小小的农家，这平静的乡村，还牵系着她的心，她现在要把这葛藤亲手斩断了。

他们回到碉堡，略略休息一下，就开始清理的工作。除了被褥外，别的东西都收检在皮箱或者藤包里面。信件撕毁了，有的人还用火来烧毁这些过去的痕迹。冯文淑和周欣两人坐在一个铺上，借着一支蜡烛的亮光仔细地读着从上海寄来的旧信，她们一面看信，一面带笑地谈论过去的事情。慈爱的母亲的心感动了这两个热情的少女。她们抱着烧信的目的来重读旧信，但是读完后她们又把这些信郑重地收起。烧掉的只是普通友人的信函。

蟋蟀的寂寞的叫声点缀了碉堡中的静夜。外面是广阔的世界。月光照亮山野。稻田涌起着银浪。从“枪眼”望出去，人仿佛看见了白昼。道路是明亮的，田地是明亮的。“李南星和杨文木应该沿着那条路走回来了，”冯文淑这样想道，她在“枪眼”前立了好一阵。外面静静的始终没有脚步的声音，也没有人影。她又回到铺上，做了一些事，再走到“枪眼”前去。

同志们已经为了李南星、杨文木的不回来，发表过焦虑的议论。这时又有人耽心地谈论起来，谈话的是曾明远和张利英，方群文也加入说了一些类似抱怨的话。冯文淑听得有点不耐烦，就离开了“枪眼”，对周欣低声说了一句：“下去走走。”她看见周欣还在整理东西，便一个人匆匆地走下去了。

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痛快地抖动她那一头浓发，仰起脸承受月光，好象要把漫天的清辉全吸进她的胸膛似的。她的第

一个感觉是畅快。天空是这样阔，眼界是这样宽。她的思想仿佛就要跟着头上的明月航行在一蓝无际的天海里。她挺起胸愉快地走了几步，随口哼起一首歌来。

“你兴致真好，”周欣立在门口对她说；“我倒怕你一下子又感伤起来了。”

“你为什么又说感伤，我有什么感伤？”冯文淑奇怪地问道。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走了，离开这个刚刚住惯的地方，不知道要到哪里才可以歇脚！”周欣的话里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冯文淑笑了起来，她捏捏周欣的膀子笑着争辩道：“你不要以为你比我就有多大的进步。其实你的进步也有限得很。你离开上海不是也流过眼泪？”

“那是因为我姆妈，”周欣简单地解释道。

“这里不也是一个值得留恋的环境？”冯文淑理直气壮地反问一句。但是接着她就改换语调带点疑惑地说：“怎么李南星还不回来？曾明远说他们早就该回来了。该不会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

“不会的，这样好的月亮，难道他们还会摔坏腿吗？”周欣说；“李南星一定有什么计划。不然他向你借钱为什么不说用途？他借那许多钱作什么用？这倒很奇怪。”借钱的事冯文淑只告诉了周欣一个人。

“偏偏今天他又是跟那个牢骚主义者在一起，”冯文淑耿耿心地说。

“这两天他工作得特别起劲，到处跑，到处谈话，比我们都卖力气——”周欣说。

“怎么，你们在赏月吗？”王东的声音意外地在她们的后面响起来。

冯文淑连忙低声嘱咐周欣，“不要说了。”然后她扬起声音回答王东：“什么赏月不赏月？亏你想得出这个漂亮名词。”

“冯同志，你又生气了，我不过随便讲一句，我也知道自己不会讲话，”王东抱歉地陪笑道。

“怎么你今天倒特别客气了？”周欣故意挖苦地说。

“我从来就很客气，”王东老老实实地说；“我对任何人都很好，奇怪的是我总不容易讨人喜欢。”他现出一点苦恼的样子。

“讨不讨人喜欢，有什么关系？你埋头努力做自己的工作，不更好吗？”周欣对他讽示道；“人不是靠着别人的喜欢来生活的。”

“你这话自然有道理。不过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比你们工作都做得少。我接受你们的批评，可是总改不了。我害怕曾团长会开除我。你们都不高兴跟我一起做事，”王东痛苦地说。

“刚才曾明远给他碰了一个小钉子，他今天倒忽然敏感起来了，”周欣在冯文淑的耳边轻轻地说。

“那么你就照着那天大家批评的话把你的小开脾气改掉。不然，要是大家都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做事，曾团长也只好请你早点走路，”冯文淑忍住笑，用这样的话吓王东。

“你说得对。我一定照你的话做。就请你帮忙我向团长解释一下，”王东感激地对冯文淑说；“我的脾气已经改掉不少了。我并不是坏人。只要大家肯帮助我，我一定改得好。我想请你和周同志多多督促我。”王东只顾自己说下去，却不知道冯文淑并没有认真听他讲话。周欣几次对冯文淑做出可笑的鬼脸，他也没有看见。

张利英和吴平两人先后走了出来。张利英温和地问他们：“你们又在谈什么？”她不等待答话，又对冯文淑说：“文淑！你们睡得着，明天一天一定很辛苦。”

“我不想睡，”冯文淑笑答道。

“为什么？在战区又比不得在家里，应该把感情控制一下，”张利英象大姐似地半劝半教训地说。

“李南星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冯文淑另外讲起一件事情。

“我也有点耽心，杨同志身体又不大好，”张利英点头说。

“他们回来了！”王东忽然高兴地叫起来，他看见那两个人影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几个人的眼光都跟着王东的声音朝坡下望去。李南星的颀长的身躯立刻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李同志，我们正惦记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张利英迎上去亲切地问道。

“王老师留我们吃饭，又陪我们到他一个学生的家里去，走了很多路，所以回来迟了，”李南星不加思索地答道，脸上带一点兴奋的颜色，声音却是相当平静的。杨文木板起脸，一声

不响就往门里走，他在门口遇见了方群文，她用惊疑的眼光看他一眼，想说话，又没有开口，就默默地让他走过了。然后她的探索似的眼光又在找寻李南星的脸。

十二

房里颤抖着淡淡的灰白光。沉重的空气压住那些疲倦的睡脸。鼾声和磨牙声浮起来又落下去，还吃力地在重重的臭气中挣扎。蚊子也跟着这声音在臭气中飘浮，时常用它们针尖似的嘴去叮睡脸。睡眠人的身子在翻动，嘴里发出不安的哼叫声。仿佛有一个可怖的梦魇鹰影似地笼罩着整个房间，还伸下它的利爪紧紧抓住那些年轻人的咽喉。夜带着它的黑暗颜色和重浊气味在屋里活动，好象就没有天明的時候。

然而在碉堡外面却是一个美丽的、明朗的、凉爽的、宽阔的月夜。一条明亮的道路从碉堡倾斜地伸下去，直伸到稻田中，消失在白杨林里。这条路还是静静的。在这广阔的天幕下夜带着它的清凉和芳香进行着。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天开始褪色了。

月亮在作最后挣扎似地努力睁大眼睛看这山野，看这道路，它似乎想从偏西地方爬回天顶。可是疲倦的颜色盖上它的脸庞，它反而无力地一步一步往西方退走了。稀落的几颗大星好象也因为这个惊惶起来，它们不安地乱霎着眼睛。……于是远远的，军号似的，响起了雄鸡的啼声。一声，两声，三声……散在几个地方的同伴们大声响应着。月亮立刻吓成了苍白。

李南星和杨文木两个人蹑起脚一声不响地从里面走出来，他们穿着整齐的军服，手里提着简单的行李，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他们站在碉堡前面，转身朝门内看了看。没有动静。李南星忽然用亲切的声音对这个碉堡说了一声“再见”，就跟着杨文木往坡下走去。

他们在这条明亮的路上走了不过二十几步的光景，忽然被一个意外的叫声唤住了。“杨同志！杨同志！”声音不大，但他们听得出这是方群文的声音。“糟了，”杨文木短短地说了两个字，他们只得回过头去。

来的果然是方群文。她跑得气咻咻的。她跑到他们跟前，她不问情由，第一句话便是：“你们要走，把我也带去。”

两个人望着她发楞，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她连忙恳切地说：“不要怀疑我，我不是来追你们回去的。我愿意跟你们一起走那条路。”

“走什么路？你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杨文木板起面孔问道，他的声音里却带了同情的调子。

“我知道。你们不肯跟大队走，你们一定是留下来做工作。我也要留下来，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也可以做点工作，”她热烈地要求道。

“方同志，你不是主张撤退？你不是说我们人少不能应付困难局面吗？我想你一定不赞成我们的工作，”李南星温和地说，他还不能了解方群文的心情。他觉得她的要求，她的这个转变来得太突然了。

方群文痛苦地望着李南星，好象这些话伤害了她似的。但

是她仍然热烈地说：“我主张撤退，那是为着大家，为着团体，不是为着我个人。既然你们两个决心留下来工作，我为什么不可以参加？……”

杨文木对她的同情不断地增加，他在她那张没有欢笑的脸上仿佛看见了自己的面影，他忽然想起她近些日子向他流露的关心，他忽然想着她留下来也是一件使他高兴的事。他的心活动了，但是他还插嘴提醒她道：“方同志，我们自己并没有把握，可以说是完全冒险。所以我们没有多约别人。”

“杨同志，我的家完了，我那不幸的婚姻也完了，我的丈夫死了。我孤零零一个人，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事情不能做？我还有什么牵挂？我还怕什么冒险？……”方群文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让它爆发出来，她的眼里迸出了泪水，弄花了眼镜片。“我活着不活着，都是一样。我死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就带我冒一次险罢。我可以做许多事情。你们要打游击，我也不会连累你们。我还可以取掉眼镜装个乡下女人，我不戴眼镜也看得见。”

“李同志，我们就答应她罢，”杨文木感动地对李南星说，他的脸上浮起了带凄凉味的微笑。鸡在他们的周围叫过第三次了。

“好，方同志，我们欢迎你，”李南星点头答道，黎明前的时辰虽然充满着凉气，但是他觉得有一股热流突然进到了他的心中。他略略俯下头亲切地问道：“你的行李呢？你就空着手赶来的。”

一个微笑冲破了方群文的泪脸，她感谢地答道：“谢谢你

们。我的东西带来了，就在坡上。我昨晚上就疑心你们有什么计划。今天我醒得很早，我还看见你放一包书在冯文淑的枕头旁边。我等你们一走，连忙起来，匆匆把东西收拾好，赶快追来。我怕追不上，才把东西丢在坡上，空手跑过来的。我现在去拿来。”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替你去拿罢。你和杨同志快往前走。我走得快，我会赶上来，”李南星接着说，他立刻动着那双鹭鸶脚似的长腿转身走上坡去。

最初的日光从“枪眼”射进碉堡，赶走房里那个可怖的梦魇。军号声霍地响起来（虽然声音不高），搅乱了沉重的空气。鼾声停止了，代替的是咳嗽，是呼唤，是笑话，是歌声，是哨子叫。于是一个新的日子又开始了。

冯文淑刚从铺上站起，就发见枕头旁边有一包东西，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她奇怪地打开它，看见了李南星留下的信和书。她拿着信激动地大声叫起来：“他们走了！李南星他们走了！”

这意外的消息把众人引到了冯文淑的身边。曾明远伸出手拿过那封信，高声念着：

文淑同志：

我们觉得也应该有人留在这里继续工作，我们也有一个工作计划，我们不愿意离开这里的老百姓，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我们违反了团体的决议，现在自动请求团长和全体同志开除我们。请你们不要来寻找我们。我们的意志很坚决。我们不会改变决心；

跟着你们到别处去。这里有够多的工作消耗我们的精力，也有一些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们准备和老百姓一起死守着这个地方。倘使敌人真的来到这里，我们决不会让他们活着回去。望你们努力工作。你们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两条路都应该有人走，而且你们还可以在外面找到更多的新同志加入，来填补我们的缺额。请不要误会我们对团体有什么不满。说句真话，我喜欢这个团体的友爱气氛。倘使不是因为目前这个工作，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从在上海的青年救亡团时代起，我就和你们（曾、张、周、你四位同志）在一起工作，你们当然知道我说的不是假话。我借你的六十元，是拿来作工作费用的，现在无法还你，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笔款子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感谢你。为了表示这点意思，我送你一部书，作为一个纪念。这是鲁迅先生自己翻译、自己校对、自己发行的小说。我记得当初在上海买它的时候，我还在书店里见到鲁迅先生一面。书名虽然是《毁灭》，却描写了新人的诞生。我非常爱这本书，几年来我就没有离开过它。我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把它带在身边。它给过我不少的鼓舞。希望你多读它，它可以慢慢地帮助你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作者是苏联的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致
民族解放的敬礼！
问候各位同志。

李南星 即日。

曾明远读完后，张利英怅惘地说：“真的，他们走了。”大家马上发觉走的一共是三位同志。

“奇怪，连方群文同志也跟他们走了？她不是主张撤退的吗？”曾明远疑惑地说，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

“我们去找他，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姚民瑞兴奋地说。他想在姚老头的家里一定可以探到他们的踪迹。

冯文淑正拿着李南星留下的一本书在翻看，她听见姚民瑞的话，便抬起头来说：“你以为他们在姚家吗？我看他们一定在王老师那里。”她忽然记起了那天晚上听见的李南星的断续的话。她因为自己多知道一点，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那么我们立刻去找他们，把他们找回来！大家还是一道走！”吴平高兴地嚷着，他以为众人一定会采纳这个建议。

“不必找他们了。即使找到，他们也不会回来的，”张利英带点感伤地说。

“这倒是的，我们还是各人走各人的路罢，”曾明远想了想，下了决心说。他忽然问冯文淑一句：“冯同志，他那六十块钱是几时借的？我们完全不知道。”

冯文淑微微红了脸，答道：“就是前天早晨，他叫我不问他要做什么用。”她又把眼光放在书上。

“我知道，我昨天就说过他一定有什么计划。料不到真是这样！”周欣连忙插嘴说，好象是来给冯文淑解围似的。“李南星就是这个脾气，他常常做了事情，才告诉人。”她把头俯在冯文淑的肩上，看冯文淑手里的那本书。

“对，我看这次就是他一个人出的主意，”冯文淑省悟似地高兴说。她对自己借钱给李南星的事，现在感到非常满意了。她又埋下头看书的封面。灰黄色厚纸上正中印着四个苏联游击队员的画像。长方形框子上印着原作者的英文姓名和书名《毁灭》。框子下面印的是“鲁迅译·三闲书屋校印”。她想起

来了，李南星对她讲过他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的事情。据说还是鲁迅先生亲手把书递给他的。她知道李南星平日很喜欢这本书，好象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现在他居然割爱地把它送给她，可见他临走时还想到他们中间的友情。

“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物了，”周欣抬起头来感伤地说。

冯文淑听见这句话，她的眼前又现出了李南星的瘦长影子。她仿佛听见他那严肃的低声：“我们准备死守着这个地方，”又听见他用感动的调子说：“我感谢你。”她觉得心跳得厉害，好象受到了感情浪涛的冲击似的。她把书递给周欣，短短地嘱咐道：“这本书我从前还不大明白，以后倒应该好好地读几遍。都说这是一本好书。你给我收检起。”她连忙掉开头，紧紧地咬着嘴唇皮，不让眼眶里迸出一滴泪水来。

曾明远和张利英在那边谈话。姚民瑞忽然走过来说：“冯同志，他送给你什么书？给我看看。”他从周欣的手里把书抢了过来，翻了翻，兴奋地自语道：“我知道。我一定要看看。”

周欣没有理睬他，却惋惜地对冯文淑说：“方群文没有留一个字就走了，其实她也应该让我们事前知道。”

“你不要说！”冯文淑觉得心里不好过，马上现出不耐烦的样子阻止道。

“不要难过了。人都走了，你哭起来，也没用，”姚民瑞匆匆地把书阖上，交还给周欣，他看见冯文淑的神情，使用他那开玩笑的态度劝道。他对她做个怪脸，霎霎眼睛，故意要逗她笑。

“哪个才哭？大家都是为抗战尽力，他们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同志，”冯文淑倔强地赌气说。

王东一直忙着在屋角收拾行李，他从热水瓶里倒出一点热水用干毛巾蘸着揩了脸，又用一把小梳子梳了梳头。他觉得事情做完了，便走过来找冯文淑谈话。他顺着冯文淑的口气对姚民瑞说：“我知道冯同志是不会哭的，这又不是什么伤心的事情。”以后他又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抱怨道：“其实他们也不对。就是要走，也该在事前跟大家商量商量。我们在一起做了好些时候的工作，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无论如何，不能走得象路人一样！”

“你既是这样说，那么你就该跑去找到他们质问一通。在这里空发牢骚，他们也听不见，”姚民瑞不高兴他说话的神气，便讽刺道。

“你喊他去？哼，他真要是见到他们，又会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冯文淑觉得王东的话逆耳，不去睬他，却冷笑地对姚民瑞说。

王东知道自己碰了一个钉子，便红着脸，搭讪地说：“我不过随便说一句。我知道杨同志和方同志都不高兴我，其实我并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那么你问问你自己罢，”周欣冷冷地说。

冯文淑还想接嘴，却被曾明远的响亮的声音阻止了，曾明远说：“大家不要讲空话了，赶快准备罢。伙子就要来了。”

“用不着准备，我已经好了，”姚民瑞用轻快的调子答道。

方天行在“枪眼”前站了一阵，这时才转过身来，带着感慨

地说：“伙子已经来了。”

果然过了一会儿，伙子们就在下面叫起来。曾明远正俯着身子在帮忙冯文淑捆行李，便吩咐吴平一句：“吴同志，你去招呼他们上来挑东西。”吴平高兴地答应着，就跑下楼去了。

十几分钟以后，碉堡又从骚动中落入了静寂。下坡路上蜿蜒地拖着长串的人影。尘土迷漫在空中，但是遮不了同志们的视线。冯文淑和周欣差不多同时回过头来，最后一次看她们住了两个多月的地方。灰黄的碉堡仍然静静地耸立在坡上，好象一支铁笔要划破晴朗的蓝天似的。冯文淑感慨地自语道：“以后不知道谁来住这里。”

“说不定李南星他们又会回来住的，这个地方总不会空着，”周欣答道。

冯文淑好象没有听见似地，她对着碉堡一挥手，轻轻地说：“再见，老朋友！”就跟着同志们迎着阳光走去。

十 三

这天上午战地工作团的九个同志就到了城里。还是他们大家认识的古老的小城。城门开着，就象一个熟朋友张开笑口来欢迎客人。守城的兵士听见他们的热烈的歌声，也用兴奋的眼光祝福这一群年轻的工作者。他们招呼着伙子沿着大街走去。他们愉快地唱着歌，还带着亲切的眼光看街景。

但是这奇异的街景刺戟着他们的眼睛。这并不是他们见惯的景象。曾明远最近还走过这个地方，连他也没有料到在极短的几天里它会完全改换了面目。成为这条大街的特征的熙攘景象消失了。那些触目的烟摊、钱摊、商店、饭馆都静静地关上了铺门。暗黄色的门板上常常有用白粉笔写的字样：“××军辎重营驻此”，和“××师××连驻此”。一些街墙上还留着他们从前写好的大字标语。现在在这些标语旁边，也有人新用粉笔画上了指示方向的箭头，再注明“××军××师前进！”一家茶馆开着半边门，里面坐了不少的兵士，嘈杂地在谈论什么事情。三个兵走出来，就站在门前，和街中的两个同伴讲话。

平日坐在商店柜台里的人们，现在三三两两徘徊在街头，样子好象闲适，表情却很严肃。他们看见这一行人，脸上现出

一点惊讶的颜色，用他们那沉滞的、忧虑的眼光望着这些熟习的年轻的脸。他们曾经对着这些脸微笑过，现在他们却默默地让这群年轻人走过去了。年轻的歌声也给他们沉闷的心境带来一点轻快，但这只是一闪的电光，照不亮他们的严肃的面容。

年轻人的脸上没有沮丧的表情，年轻人的脚步不知道灰心地继续前进。站在檐下的一个中年士兵忽然举起手愉快地叫了一声：“同志，敬礼！”年轻人微笑了，亲切地回答：“同志，敬礼！”九只手先后举到额上。另外三四个兵响应一般地叫起来。

这简单的行列进了横街，在一所小学校门前停下来。这个地方两个月来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多了一些尘土和蜘蛛网。他们打发走了伙子，把屋子打扫一下，又把行李安顿好。忽然听见警报钟响了，各人拿了一点重要东西，匆匆地跑出去。

大街上人们惊惶地跑着，都往城门奔去。他们也朝着那个方向跑。王东跑得最快，他第一个跑出城门，把别的同志留在后面。吴平背着一大包东西，在人丛中不见了，众人出城一里路的光景，还看不见他的影子。三四个同志都说没有看见他出城。曾明远又回去找他，走不多远，就看见他坐在一棵大树下，望着面前那个大包袱发呆。

“你怎么啦？走不动吗？”曾明远笑问道。

吴平红着脸跳起来，拍着身上的尘土，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找不到你们，刚才摔了一跤。”他勇敢地又把包袱放在背上。

“快跑！我给你背。你就拿我的皮包罢。”曾明远看见这个小孩子背着一个大包袱，觉得好笑，就把包袱接了过来。

他们赶上了大队，不到几分钟，就听见“孔隆”、“孔隆”的飞机声。曾明远严肃地小声吩咐道：“不要跑了，大家散开，快躺下去。”

冯文淑和周欣两个就躲在田畔干沟里，上面有一棵小树正好遮住她们的身子。她们蹲在沟里仰望天空，蓝天中没有一片云彩，这正是敌机活动的最好时候。

“今天会来投弹罢？”冯文淑带点疑惑地说。她听见渐渐逼近的机声，并没有恐怖，她有的是一种奇怪的、激动的心情。她甚至觉得有点好玩。她又疑心是在做梦。她的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仿佛在夜里一样。

“你放心，已经来了，不会空跑的，”周欣带点愤慨地答道。

好象特地来证实周欣的话，三架飞机在天空出现了。强大的机声在这周围散布着恐怖。它们指示着敌机的航路。是三架轰炸机，飞得不高，似乎就在她们的头上盘旋。她们两个头紧紧挨着，从树荫下斜望过去。“在那里，”周欣低声说，她屏住气，不敢动。冯文淑不作声，注意地看飞机。她看见机翼上的红点映着日光，十分眩目。

在她们旁边田里面，稻草微微地响动。立刻响起了方天行的带点恐惧的声音：“大家不要动，飞机就在我们的头上。”

“不要紧，它们听不见。在哪里？我看不清楚，”姚民瑞还是用他那轻快的声音回答。但是轰然一个响雷似的巨声在不远处突然爆发，马上使他寂然了。附近的地面起了一个大震

动，蹲在沟里的两个少女连自己也不觉得地立刻坐了下来。

“投弹了，”冯文淑吐气似地说，她紧紧抓住周欣的膀子。

“不要响，”方天行在旁边低声干涉道。就在这个时候第二个声音响了。地面跟着这个声音大动一下，那两个女子在沟里也略略感到了颠簸。接着又是两个炸弹。空气稍微宁静一下，忽然又响起了一阵“咯咯”声。

“在扫射了，”周欣说，就把头埋得更低。冯文淑不说话，也跟着低下头，把周欣的膀子抓得更紧。田里起了一些细微的声音。

这单调的机枪声，不久就停止了。冯文淑略略抬起头看天空，周欣的头也抬起来。她们只听见机声，却找不到飞机的影子。冯文淑问周欣道：“你怕吗？”周欣露出苦笑，摇头答道：“我不怕。不过心里不舒服，我们赤手空拳就让它乱炸。”她话未说完，便听见炸弹落下的响声，连忙又埋下头。后来震动停止了，她和冯文淑再抬起头去望城内，一阵烟雾遮蔽了她的眼睛。

这以后就再没有听见爆炸声。机声也渐渐地小起来。于是这周围又落入静寂里。姚民瑞第一个从田里跳出来，他自语似地骂了一句，拍了拍身上的土。他的兄弟姚民锋也出来了。

“走了，”冯文淑高兴地说，便从沟里站起来；她觉得腿有点麻，就把手撑在周欣的肩上。周欣带笑地抱怨一句，也站起来了。她们跳出干沟，看看天空。天空仍是一片蔚蓝，一片宁静。躲在各处的人陆续走了出来，自己把警报解除了。

战工团的同志们集合在一棵大树下。他们在那里休息了

十分钟，看见一部分老百姓走回城里去了。大家正在担心王东的安全，忽然瞥见他提了一个公文袋跟在一群老百姓后面慢慢地走来。

“王东！王东！”冯文淑接连地叫了两声。王东惊喜地抬起头大声答应着，就走到同志们的跟前。他亲热地说：“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你们。”

“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就这样胆小？”冯文淑带点轻蔑地问道：“我们跑不动，也并没有炸死。”

“我并不想一个人跑，不过当时心里一急，找不到你们，就只好跟着老百姓躲去，”王东略带惭愧地解释道。他又掉头对众人说：“刚才真可怕，我以为今天准没命了。”他的脸上还带着恐惧的表情。

“这算什么？跑战地还怕轰炸，真笑话！况且今天不过三架飞机，投弹不过几个。你的胆子难道是面做的？”姚民瑞故意带着骄傲的神气挖苦王东道。

“还有扫射啊！”王东伸伸舌头说。

“扫射有什么可怕？我们都躲在田沟里，有掩蔽的东西。难道子弹有眼睛，会偏偏找到你一个人？”姚民瑞笑着说。

周欣和冯文淑心里非常畅快，觉得姚民瑞在代替她们讲话。先前心上一片阴影已经完全消散了。她们忘记了那个可怕的场面，却带着满意的笑容旁观王东受窘。吴平和姚民锋也有着类似的心情。只有方天行在想别的事，不曾注意到这个小小的争论。张利英温和地微微笑着，她想发言打断他们的谈话。但是曾明远先开口了：“我们快走罢。今天还有好些

事情，不要耽搁时间了。”他又问一句，“你们饿不饿？”

大家本来不觉得什么，经他这一问，却感到肚里空虚了。他们没有异议，便听从曾明远的话急急忙忙地走进城去。

进城的人相当多，在城门口经过了一阵拥挤，他们又走在那条石板铺砌的大街上。街还是完整的，没有什么变化，不过突然显得热闹起来。兵士和市民混杂在一起。大家热心地谈论着，似乎沉郁的空气被炸弹震破了。

“西街落了两个弹：‘一条龙’炸了，打死一个人，伤了三个；一个弹就落在县衙门口。西门外也落了两个弹，”迎面走来的两个小商人，在街上遇见了朋友，一个年纪较轻的就用惊惶的口气报告这个消息。

“县衙门没打坏？”朋友中一个人发问道。

“石狮子头打掉了，”这是回答。

“我们去看，”冯文淑激动地说。她恨不得立刻就跑到西街去。

她知道“一条龙”是一个饭馆，它旁边墙上那幅宣传画就是姚民瑞弟兄画的。

“我肚子饿得很，吃了锅饼再去，”姚民瑞不同意地说。他又问她一句：“难道你就不饿？”

“吃过锅饼，最好先把东西送回小学校去，”吴平接嘴说。

在一家关了门的商店门前，就是那个锅饼摊子。新鲜的黄澄澄的大锅饼发光似地躺在案板上，引诱着年轻人的饥饿眼睛。同志们都不想再往前走了。冯文淑也就同意地说：“也好，就依你，”她是在回答姚民瑞。其实曾明远已经决定了在

这个地方暂时停下来。

同志们放下东西，围在摊子前面，看着卖饼者拿起案板上那把尖刀，把锅饼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每人捧着一块锅饼慢慢地啃着。饼子是冰凉的，没有一点味道，他们又没有水来润湿咽喉。但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话。

“冯同志，我给你画个像，”姚民瑞吃完锅饼，忽然跟冯文淑开玩笑说。

“不要在这里，等一下到县政府门口落炸弹地方画去，”冯文淑兴高彩烈地说。

“我看见你吃东西就象个小姑娘，样子特别有趣，现在先画一张再说，”姚民瑞笑着答道。但是他摸拍纸簿，它却不在衣袋里。

“少糟蹋点你的纸，”冯文淑抢白地说了一句，却听见姚民瑞张皇地嚷起来：“不对，我的本子掉了！”她故作快乐的样子笑道：“掉得好，哪个叫你一天到晚就拿着乱画？”

姚民瑞现出十分着急的神情，同志们都掉过脸来看他。

“大概躲警报的时候掉在田里了，”周欣忽然记起来，便提醒地说了一句。

“对，一定在那里，”姚民瑞的圆脸上现出可笑的、省悟的神情自语道。

“掉了也就算了，何必着急？”冯文淑故意用这句话来激他。

“不行，这是我的心血，我一定要找回来，”姚民瑞焦躁地说。

“那么你快去找，也许还找得到，”冯文淑鼓动地说。

“我现在就去。不过等一会儿我们在哪里找你们呢？”姚民瑞慌张地问道。

“你回来就直接到小学去罢，”曾明远答道；“我还要到县政府和司令长官部去接洽。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大家休息半天罢，等我回来开会。”

“好，”姚民瑞不加思索地答应着。他唤他的弟弟：“民锋，你陪我走一趟。”姚民锋不说什么，两个人就匆匆地走了。

冯文淑含笑地望着姚民瑞弟兄的背影，他们一晃就消失在人丛中间。她觉得一只手在敲她的肩头，她侧过脸，张利英带着温和的微笑责备道：“你这个孩子就是这点不好，你总是幸灾乐祸。”

冯文淑笑了笑，答道：“又不是我跟他开玩笑。是他自己不小心弄掉的。”

“我看你一天笑得太多了，”张利英低声说了一句。

冯文淑注意地看了张利英一眼，她点了点头，说了一句：“谢谢你。”她捏住张利英的一只手，收敛了笑容说：“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这一群人从锅饼摊，走向西街。他们快到县政府的门前，路就被人堵住了，不过人们看见他们，却让出一个空隙给他们通过。少数熟习的面孔还点头招呼他们。

路上散乱地堆着瓦砾，一段石板路破碎了，忽然露出一个大坑。县政府门墙上现着残毁的伤痕，尘土瓦片没有扫尽，掩

盖了平日的光洁的过道。右边石狮子歪斜地蹲在石座上面，但是齐着颈项是一片雪白的斩痕，头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两个荷枪的卫兵仍然端端正正地站在两个石狮子旁边。

曾明远一个人通过卫兵的一道关往里面去了。别的同志却继续朝前走。街上尘土特别多，两旁店门紧紧关住。大幅宣传画、壁报和标语，象老朋友一般亲切地望着他们。这一天它们也显得冷落，而且脸上好象蒙了一层土，染上了一些污痕。

再往前走，他们又到了人们围聚的地方。他们挤过去，发现了瓦砾堆，一间屋子炸光了，四五间房屋震毁了。一个半老的女人对着废墟哭泣。五六个人在砖瓦堆上挖掘东西。冯文淑皱紧眉头，把她的灵活的眼睛移向四处看。她忽然发觉她身边不远处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头上束了一条白布，前额有一团血迹浸在布上，他望着那堆木条和砖瓦发楞。

又是那见惯的悲剧！她的心仿佛受到什么尖利东西的猛刺，她捏紧了周欣的手。

“俺们跟鬼子没有冤仇，他们做啥来害俺们！”在旁边突然响起了这怨愤的声音，就是从那个头上包着白布的人嘴里吐出来的。冯文淑觉得应该走了，但是别的同志还在用眼睛尽量吸收这个景象，一直到曾明远的脸庞在人丛中出现了，他们才掉转身子。

他们离开了拥挤的地方，回到小学校，曾明远告诉他们一些意外的消息：县长下乡去了；司令长官部搬到宋埠去了；敌人打到了叶家集。这都是县政府的张科长告诉他的。他最后

提出他的意见：他们也到宋埠去。

姚民瑞弟兄气咻咻地跑回来，他们正来得及听见曾明远的报告和参加团体的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曾明远的主张：明天一早出发，跨过大别山，赶到宋埠去。

曾明远又到县政府去接洽第二天出发的事情。他从那里出来，在约定的地方跟同志们见了面。他们坐在那个茶馆里，喝着热茶，慢慢地嚼着又冷、又干涩的锅饼，大家以一种近于闲散的心情谈些闲话。没有紧张，没有牵挂，这一天的见闻对他们似乎不曾留下一点影响。他们现在尽量享受疲劳后的休息和忙乱后的安闲。话题忽然转到了李南星三个人身上，冯文淑怀念地自语道：“他们三个人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一定比我们更忙，”周欣接嘴道；“我想他们一定过得更有意思。”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们去？”姚民瑞没头没尾地问道。

“我倒想去。可惜我事先不知道，”冯文淑带点渴望地说。

“现在还来得及，”姚民锋补上一句。

“你们真是两兄弟，说话都是一样，”周欣笑道。

“我的话可没有我哥哥的多，”姚民锋笑答道。

“姚同志，你不要再鼓动了，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几个人了，”曾明远听见姚民锋那句话，便带笑地插嘴说。

“不会的，到了这里，就应该跟着团体行动了，”张利英说，她一面安慰曾明远，一面提醒冯文淑。她听见人提到李南星和方群文，心里也不好过。怀念折磨着她，不过她的理智可以

控制情感，使她不说感伤的话。

“姐姐，你难道还不放心我？我是不会离开你们的，”冯文淑笑着对张利英说。她的态度很诚恳，她坦白地承认：“我知道我有缺点，我有很多的幻想。”

“年轻人有点幻想也是好的，这不是缺点，”张利英答道。

曾明远忽然注意到方天行默默地象在思索什么事情，便问道：“方同志，你这些时候怎么不作声？你又在想太太吗？”

“其实路隔得不算远，你大可趁这个机会请假到长沙去一趟。是我，我一定去，”王东热心地说。

“去又有什么意思？现在不是回家的时候。好在家里有人照料她，”方天行答道，他似乎极力要做出平静的声音，可是声音里仍旧带着够多的忧郁。

外面街上忽然起了小小的骚动。嘈杂的人声搅乱了这个茶馆里的闲散空气。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大家走到外面，正看见一群老百姓携儿带女，每人还背着、拿着一两个布包狼狈地走来，衣上沾染了不少的尘土，脸上现出憔悴的颜色和惊惧、张惶的表情；有的就坐在街边檐下，拿布包当坐垫；有的还支持着继续往前面走。

“俺们是从叶家集逃来的。鬼子打来了。俺家给鬼子烧光了。俺们带了这点东西逃出来，”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喘着气这样答复旁人的问话。

“妈，俺走不动，歇歇罢，俺要吃，”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牵着母亲的衣角哀求道。

“黑妞儿，听妈的话，俺家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东西吃？”

中年的母亲痛苦地用干涩的声音回答。

“周欣，你留住她，我去买锅饼！”冯文淑忽然用了带哭的声音对她的同伴说。她在周欣的肩上轻轻地敲了一下，不等周欣回答，就匆匆地走了。

“这是县政府的事情，等我再去找张科长商量，”曾明远用感动的眼光望着冯文淑的背影，忽然下了决心对同志们说。

曾明远和同志们为难民的事情忙到晚上九十点钟，回来就倒在小学校的地铺上睡了。身体的疲劳使人容易忘记环境的不舒适，他们倒下去不久就沉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冯文淑忽然醒了。房间里是一片黑暗，空气快到了窒息呼吸那样地沉重，蚊子嗡嗡地在她脸的四周乱叫，它们的尖利的嘴从四面八方向她围攻。她用右手保护自己。脸上许多地方发痒，发痛。她又用右手搔搔脸。那尖嘴甚至叮到手上来了。她便把毯子拉起来蒙住头，她希望能够再阖眼沉睡。但是过了片刻，她又觉得透不过气来，只好把头再露到外面。为了躲避蚊子的攻击，为了镇定自己的烦躁，她不住地翻动身子。她看看睡在她旁边的周欣和张利英，她们两个人都睡得很好。她想：怎么单单我一个人睡不着？怎么单单我一个人怕蚊子？她勉强地闭上眼睛，可是白天那些景象立刻电影似地在她的眼前出现了。她忽然觉得背上发凉。土地的冷气透过那层薄薄的稻草和被单冒了上来。这使她的脑子清醒，睡意消失。她生了气，对自己说：难道我就不能够吃这点苦？我应该好好地睡到天亮。但是这样说也没有用。她听见

对面起了轻微的响动，以后又寂然了。她又听见了可怕的磨牙声。她烦躁地说：“吴平这孩子又在磨牙齿。”这个声音象一把小刀慢慢地在她的心上刮，又象一个猛兽刚吃完它的捕获物正预备张口大叫。她紧紧地咬着牙齿，用手蒙住耳朵。但是蚊子趁势又来了一次攻击。她烦厌地接连翻动身子，掀开了毯子，又把它拉回来。

“你在做什么？”周欣半醒半梦地说，她的身子略略动了一下。

“你也醒了？”冯文淑惊喜地小声问道，她仿佛在陌生的地方遇见了熟人一样。周欣没有回答她，却又沉沉地睡去了。她听见方天行在另一个角里轻轻地咳嗽，他却不说不一句话。

空气忽然震动起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远远地传过来“轰隆隆”的声音。它好象自远而近，一下子就进了房间，从上面跌下来，往屋角，往地里，四处散落了。

“这是哪里来的炮声？”冯文淑奇怪地想道。一个同样的巨声又从外面送进来。这无疑是炮声。她打了一个冷噤，便屏住气侧耳静听着。

“炮声！”曾明远在说话了。

“曾同志，你也听见了？”冯文淑感到一点安慰地问道。

“轰隆隆”的声音接连地响着。仿佛整个屋子都在摇动了。人分辨不出是几尊炮在那里开放，只觉得耳里尽是“轰隆隆”的声音。

“现在离前线比较近。前线一定紧张，”曾明远沉着地答道。

吴平忽然从梦中惊恐地叫起来：“什么声音？”

“不要紧，这是前线的炮声，离这里还相当远，”曾明远说。

“是不是日本鬼子打来了？”王东惊醒起来，慌慌张张地问道。他正做着可怕的梦，迷糊中把梦景跟现实混在一起了。

“周欣，周欣，快醒过来！你听炮声！”冯文淑摇撼着周欣的膀子，兴奋地唤道。张利英也已经醒了。

“你大惊小怪的做什么？今天晚上总不会打来的，”周欣揉着眼睛说。但是听见一声炮响，她立刻清醒了，便坐起来。

“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准备走？”王东坐起来，带着惊恐地问道。

“怕什么！就是鬼子打来，也走得了的。况且这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姚民锋冷言冷语地接嘴说。

“正是因为不止我一个人，所以我们应该早点准备，现在不是说漂亮话的时候，”王东赌气地答道。

“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不是明天早晨就走吗？”姚民瑞插嘴道，他在帮忙他的弟弟讲话。

“你们不要老是讲闲话。有事情还是慢慢地商量罢，”曾明远发言干涉道；“在这种时候玩笑开多了也不好。”

“他们两弟兄就是这个脾气。外面响着炮声，他们倒还有闲心跟我斗嘴，”王东诉苦似地说。

“王同志不要多讲了。我们好好地听听炮声，看还有没有别的声音，有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好早作准备，”张利英说，她穿好上衣，坐起来。

在外面炮声有节奏地接连响着，但是声音并没有增大，还

是那单调的“轰隆隆”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炮声突然停止，剩下一点余音在屋角，在地底颤动。然后是一阵死一样的沉寂。紧张的心开始松弛下来。吴平垂着头坐在被单上打瞌睡。周欣又倒下去睡了。冯文淑和姚民瑞、民锋弟兄不住地挥手打蚊子。

“大家睡罢，现在没有事情了。今天晚上不会有问题。我小心警戒着就是了，”曾明远放心地对同志们说。他又补充地加上一句：“要是有什么事，我会叫醒大家。”

冯文淑觉得眼皮有点重，一直在往下坠，她知道疲倦来抓住她了，她感到了睡意，便接嘴道：“不管有没有事情，我现在要睡了。让我在梦里打鬼子罢。”

张利英微微笑起来，她对冯文淑说：“你要好好地睡啊。不要在梦中又大声哭起来。”

“姐姐，我知道，”冯文淑亲热地答应着，马上睡倒下去，口里还自言自语：“明天我们就要跨过大别山了。”她侧头去看周欣。周欣已经闭紧眼睛，而且发出轻微的鼾声了。

十 四

城楼痛苦地默默望着大群拥挤的行人，说不出一句送别的话。手推车依呀地哼着，伙子们忙乱地叫着，同志们激动地大声在谈论。人和行李挨挤在一起，头常常碰到扁担，悬垂在扁担两头的公事箱和行李不时袭击腿和脚，又引起一些争吵的声音。这一切汇合在一处，象一股洪流，不停地往前面冲去。

公路象一条黄色大爬虫蜿蜒地伸展出去，它的头似乎就伸到了无尽处。人群一触到它的尾巴，立刻激起一阵灰黄的尘雾。尘雾跟着人的脚步飞。一部汽车驶上来，尘土一下就遮蔽了半个人，然后打着漩子追着车轮走了，留给行人的鼻子一阵干燥。

太阳炎热，路在沉重的脚步下燃烧起来，风吹到人的脸上也会发烫。许多人的额上都在冒汗。冯文淑的鼻尖上聚集了不少细小的汗滴。她的脸红得象擦了胭脂。她的嘴微微张开，还低声哼着抗战的曲子。周欣走在她的旁边，脸部表情跟她的一样，也是相当轻快的，仿佛充满了朝气。

“真怪，今天要走长路，天气就特别热！”王东抱怨道。

“你就走不动了？还早啦，一共二百八十里，你算算走了

多少，”姚民瑞满不在乎地说，自己却得意地笑起来。

“走不动也只好走。就是天气热，讨厌！”王东不觉得姚民瑞的话里带了挖苦的调子，他还对姚民瑞老实地诉苦道。

“王同志，你走不动，可以象人家那样坐手推车，只要你打摆子……”姚民锋接着说，就噗嗤笑起来。姚民瑞和吴平都笑了。

张利英的瓜子脸上也绽出一丝微笑。她的同情的眼光转到了一辆手推车上，那里躺着一个穿草绿色军服的苍白色的中年人，他的瘦小的身子在颤动，在摇晃，牙齿也在打战。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略略皱起眉毛，回头悄声嘱咐姚民锋：“不要笑人家打摆子，你看人家多痛苦。”

“还好，我们里面倒没有人打摆子，”姚民锋微笑地说。

“杨文木不是常常打摆子吗？”王东驳道：“还有方天行同志也打过摆子。”

“你就忘了说你自己，”周欣忽然在后面大声插嘴说。

“我好久没有打过摆子了，”方天行带点不安地说。他不愿意听见人提起他打摆子的事。他耽心在路上发起病来。

没有人注意方天行的话。王东连忙分辩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们说，这一个多月我打过摆子没有？”

“这点小事，也值得争论？你们又不是小孩子！”冯文淑含笑地在后面奚落他们。

这样的“不费脑筋”的谈话似乎减轻了炎热和沉闷。这几个年轻人不觉得路长，不觉得疲劳。他们只是踏着轻快的脚步前进着，前进着。在这拥挤的人群中他们九个人组成了一

个最愉快的行列。

他们就这样地进了大别山，走上在群山中起伏着、蜿蜒着的公路。

公路是宽敞的，公路又是拥挤的。人不断地增加。路不断地翻腾。山象不知道疲倦似地涌起那一座一座波浪般的峰顶，一匹浪连接一匹浪，仿佛一直连到天边。路跟着山弯，人跟着山动。手推车，扁担，马蹄，人脚，千千万万的缚着裹腿或者单单穿着军裤和布鞋的脚，还有那些逃难的男人的脚，女人的脚，老人的脚，小孩的脚步，络绎不绝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来填塞公路。它们翻过了一个山岭，又爬上第二个去。山好象没有完结，路好象也没有尽头。灰色的碉堡威武地立在每一座山头，骄傲地晒笑着那些渐渐现出疲劳样子的脚步。伙子们的背弯下去了，手推车的声音成为断续的了。谈笑的嘴闭上了，脚步也开始缓慢了。但是山峰一座一座无情地拦在前面。太阳没遮拦地直射下来，晒黑了那些年轻的脸。

疲劳的脚步继续前进着。连磨起了小泡的脚也不知道休息。军队在前面进行，军队在后面进行。系在兵士身上的无数的磁碗和铤铁壶撞擦的声音，有节奏地响成了一片，压倒了手推车的呻吟，同少数逃难者和患病者的哼叫。

冯文淑抬起头看前面，公路被一片草绿色掩盖了。这真是无边无尽的，前头的刚刚翻过山去，后边的又接上来，好象是一根绿色长带子，搭在山脊上，有人在另一面用力拉着，只看见草绿色从这面翻过去又翻过去。前面是草绿色，后面也是草绿色，仿佛是一大片飘动的春草，在草地的两旁还镶着黄

色和杂色的框边。一个师迎面过去了，另一个师又赶上来。便是最灵活的眼睛也数不清人头的数目：那些头，那些被草绿色军帽盖着的头，那些在骄阳下面始终昂着的头。出现在冯文淑眼前的都是黝黑的、积满汗珠的年轻脸，有的还掉向这面，对她和同志们笑一笑。她忽然兴奋地笑着侧头对周欣说：“你看，我们还有这样多的人，这样多年轻的军队！”

“这还只是一小部分，你记住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周欣得意地答道，她的眼睛也因为这个令人激动的景象发亮了。

“姚同志，你怎么不拿出本子来画一张？这才是个伟大的场面啊！”冯文淑兴高彩烈地对前面的姚民瑞说。

“画不得。别人会把你当作汉奸的，”曾明远连忙阻止道。

“我知道，我不会上冯同志的当。我以前碰过了钉子，”姚民瑞笑着回答道。可是他很注意地望着军队的行进，好象他要把这个场面深印在他的脑子里似的。

“人家是说真话，哪里是故意害你？”冯文淑辩白似地说，她也失笑了。她又把眼睛掉向前面，她跟着同志们继续在公路的边上走着。

军队不停地向前进，整齐的脚步，整齐的服装，甚至是相同的表情。他们似乎不知道疲劳、不知道休息地走着，默默地走着。脸向前面，脚步也向前面。尘土飞起来、落下去，落到他们的身上，就积在那里。草绿色开始枯黄了。他们却好象没有感觉地只顾昂着头大步奔向前面。前面是一重一重的山，山坳象一张大口，不知道饱足地吞食了他们。

冯文淑的耳里仍然是那整齐的脚步声和磁碗同镃铁壶的

撞擦声。声音单调而严肃，有一种振奋精神的力量。她看见他们的沉默，却想张开口痛快地唱起一支歌。但是她并没有大声唱出来，她只是低声哼着。

黄色的尘土象被一阵旋风卷起来似地在空中飞扬。单调的声音变为复杂了。得得得的马蹄声，孔洞孔洞的炮车声，火伏的低声哼叫。马载着辎重，火伏背负着大铁锅、铁铲等等用具，兵士背着捷克式的步枪。……这一切都没有停留地翻过山头去了。军队继续前进着。

太阳尽量在发挥它的威力，阳光象烙铁似地烘烤着那些躲在衣服里面的皮肤，“饥渴”如象一只手搔着人们的心和咽喉。但是这些都没有能阻止前进的脚步。茅棚在路旁出现了。茅棚象遮荫的大树似地点缀着公路。在那里老百姓们露出诚朴的笑脸，恳切地招呼着：“老总，来喝点冷开水解解渴罢。”连放在桌上的瓦壶和摆在架子上的瓦缸也好象对着人现出欢迎的微笑。有些兵便离开队伍匆匆地跑到那些地方去。

“我也要喝一碗，”冯文淑自语似地说，便跑进一个茅棚，端起桌上一个蓝花碗，也不问有什么味道，骨都骨都地把一碗冷开水喝光了。老百姓称她做官长，她也不讲什么，只是含笑地道一声谢，就跑出来。她觉得心里爽快了些。她看见周欣、吴平、姚民瑞都进去喝了水。别的人也走到那里去。人们匆忙地从那里进出。茅棚里十分热闹，老百姓忙着把水盛到碗中，他的笑容扩大了。在两三个茅棚里还站着中年的农妇，热心地帮助她的丈夫盛茶。

冯文淑用她那敏感的女性的心看了这个场面，她感到兴

趣地望着，她感动地低声唱起一支熟习的歌：

嗨嗨嗨，我们军民要合作！

嗨嗨嗨，我们军民要合作！

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

.....

她一面唱，一面微笑，好象这是为着她自己唱的。于是他们到了一个小站。路旁现出一些卖饮食的摊子。她觉得腿有点酸了。

军队继续前进着。马、炮车、火伕都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在冯文淑眼前摇晃的仍然是那一片悦目的草绿。它象一股水不停地流向前去。这洪流淹没了那些在公路边上拖着疲乏脚步的男女难民。

军队似乎不知道休息地只顾往前面走。但是在走着相反方向的战工团的同志们却停下来，给他们挑东西的几个伕子也放下了扁担，轻松地伸直身子。年轻的同志们拍去了身上的尘土，高兴地围在摊子前面。伕子们也跟着站到那边去。

饼子、稀饭、油条、麻花等等，象美味一般塞住了年轻人的饥饿。他们贪婪地吃着每一样东西，争先掏出自己身上的钱。每个同志的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些宁静了一些时候的嘴又张开了。疲倦的表情渐渐地从这些脸上消去。

一个师又迎面走过去了。那些脚步默默地、坚定地移动着。草绿色，草绿色，他们望前面，从那里又爬上来无穷无尽的草绿色军帽；他们再看后面，一条草绿色的爬虫正往山坳溜

下去。在他们的眼前依旧是无始无终的军队的行进。

“冯同志，过了多少了？”吴平严肃地小声问道。

“我也不知道，”冯文淑简单地回答，她的眼光还只是在草绿色上面流动。

“那么你猜还有多少？”姚民瑞忽然问道。

“我怎么猜得出？”冯文淑坦白地说：“不过一定是很多很多的。”

“的确，我们的军队是很多的。打了一年了，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军队开赴前线。看起来，真叫人高兴！”周欣兴奋地插嘴道。

“这许多人开到前线去，一定有一场恶战，”王东低声说。

“这样多的人正好跟鬼子大打一仗。你害怕什么？难道还替鬼子们耽心吗？”姚民瑞讥讽地说。

“不是，我觉得惭愧，人家往前线开，我们却朝后方走，”王东出人意外地带了点痛苦的表情答道。

这句话把众人的口封住了，它仿佛在他们的头上泼了一瓢凉水。姚民锋感到不舒服地反驳道：“你不是极力主张早走吗？现在又来说风凉话！”

“走是应该走的。留下来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司令长官部也要我们走，”王东毫不迟疑地解释道。

“那么，你为什么又觉得惭愧？”姚民锋追逼似地再问一句。

“人本来就是矛盾的。我觉得我自己也充满了矛盾，”王东带了一点感伤地说。

“你们这样辩论下去，又有什么用？我们还是走罢，”冯文淑不能忍耐地催促道，她听见王东的话感到不舒服。矛盾、矛盾……这两个字搔着她的心。

于是同志们抖擞抖擞身子，迈开脚步；伙子们擦擦手，弯下身去就扁担。新的行进又开始了。

依旧是绵延不绝的公路，它蜿蜒地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山，在同志们的眼前慢慢地高起来，又慢慢地落下去。黄色的尘土一股一股地在阳光里飞舞着，然后又象细雨似地洒在那些草绿色上面。同志们的刚刚拍去灰尘的军服上又染了枯萎的黄色。冯文淑看了看自己的身上，她也失声笑了。她向周欣笑道：“这一身灰尘要是给我妈妈看见，她一定要骂我。”

“我姆妈还不是？她一定说：‘阿欣，你们年轻人真没有办法！你又从啥地方带了一身灰尘回来？’”周欣也笑着答道。

“这一来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会见到妈妈的信了，”冯文淑带点惋惜地说。

军队的行进始终没有停止。兵士用坚定的脚步踏着公路。他们的步伐是整齐的，他们的表情是同样的。他们就象一股草绿色的急流，不断地迎面涌过来。草绿色，这一片染上灰尘的草绿色，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又一个师过去了。马蹄蹶起更多的尘土。机关枪连过去了。辎重营过去了。工兵营过去了。连一粒一粒的尘土也聚集起来兴奋地跟着军队前进。

军队继续前进着。山在动，公路在动，周围的一切都在动。整齐的千千万万脚步声就象要把大山也踏平似的，就象要把太阳也喝退似的。尘土好象蒙蔽日光的烟幕，在空中

盘旋着。雪亮的枪刺勇敢地对着逐渐往西退的太阳，它们笔直地向着天空，似乎要划破天幕，拨开一个清凉世界。

磁碗和镔铁壶撞擦着，手推车依呀依呀地在呻吟，炮车昂扬地、空同空同地吼叫着，马蹄沉重地打击着公路。马昂着鼻子雄壮地长嘶……这一切声音似乎被一只大手揉在一起，成了一曲雄伟的乐调，来表现这无始无终的伟大的进军。

太阳的威力逐渐地在减退。汽车的喇叭突然响起来，声音是在冯文淑的后面。她和一部分同志回转头去看。几部卡车连接地驶过来，搅起更多的尘土。尘土象一股一股的黄色的旋风，从地上滚滚地卷起，一直在空中打转。这是从前线开回来的救护车。车里歪歪倒倒地躺着一些伤兵，他们脸色惨白，受伤处缚着纱布，血不时从伤口浸出，把纱布紧紧地贴在皮肤上，而且在布上染了几块鲜红色。有的默默地望着眼前的景物，有的露出茫然的眼神，发出低声呻吟。

“我们应该慰劳这些挂了彩的同志，”冯文淑感动地掉过头对周欣说。上海救护医院的生活电光似地在她的眼前闪了一下。她的心中起了小小的波动。

“可是此地离医院很远啊，”周欣只说了一句，她的眼光还停留在那些卡车上。

冯文淑再看卡车，一阵隆隆声向四周喷出大股的烟尘。她的耳膜好象被震破了似的，眼前也罩上了一阵烟雾。在黄沙飞扬中，四部卡车飞驰过去了，它们全消失在山的那一边。先前为了让路，走在公路边上的军队，这时又移进了路中央。沙尘慢慢地在冯文淑的眼前落下来。她擦过了眼睛，眼前又只

是一片草绿色。现在颜色显得很柔和。空气也比较凉爽了。

“真长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过得完？”吴平赞叹似地说。

“你知道一共有多少兵？”姚民瑞故意问他。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数过！”吴平笑答道。

“你就不看见番号？已经过了几师人了，”姚民瑞接嘴说。

“但是你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吗？”吴平反问一句。

“我知道，这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中国有的是兵，”姚民瑞得意地答道。

“那么你就是个‘少爷兵’，”吴平说，嗤嗤地笑起来，他那个塌鼻子似乎笑得陷进去了。

冯文淑和周欣在后面也失声笑了。她们还记得美国丑角斐司开登主演的那部影片。

“你们真是小孩子，走了一天，还是有说有笑的，”张利英回过头来对这几个年纪更轻的人说，她的脸上已经现出了倦容，不过她那温和的微笑还是十分亲切的。

“当然啦。你看那些队伍，他们不知道走了几天了。可是他们还那么有精神，还那么勇敢地开赴前线，”冯文淑在后面笑答道。她又兴奋地说下去：“我一定要写信到上海，告诉我哥哥，告诉我妈妈，说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年轻的军队，说我们打了一年，不但力量没有损失，反而越战越勇、越打越强……”她脸上的汗珠已经干了，她觉得心里一阵爽快。

“冯同志，你是不是又在背台辞？”姚民瑞忽然回过头嘲笑地打断了她的话。

“呸！哪个在跟你开玩笑？”冯文淑低声笑骂道。

他们一面走，一面讲话。从他们的身边又不知经过了多少队伍。草绿色，始终是这一片无穷无尽的草绿色。但是草绿色渐渐地黯淡起来。夜来了。它给每个身体带来舒适清凉的感觉。疲劳的脚步好象得到鼓舞似地又迅速地向前进。略略往下俯着的身子又伸直起来。

军队仍然继续前进着。草绿色渐渐地跟四周的山色混在一起。月亮代替烈日升在天空。天空是悦目地明亮的。公路变成了银白色。山峰仿佛罩上一层薄雾。树木在各处留下黑影。远远地不知从什么地方透出来淙淙的水声。这是一个美丽的月夜。

然而和在炎热的白昼一样，一切照常前进着。没有人想休息，也没有歇脚的地方。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向前走。兵开赴前线，逃难者奔向后方，年轻的工作者到他们新的工作地点。

同志们就这样地走了四十里夜路。在午夜的光景，他们到了一个小镇。

“好家伙，现在该让脚休息了！”姚民瑞看见一排房屋，不觉宽慰地自语道。他脚上那双布鞋已经张开口，让沙土进去，磨着脚指头了。

“我们赶快找个人家借住一个晚上，”王东着急地说。

大家都赞成王东的意见。他们怀着希望分头去叩人家的门。然而结果都是一样：门开了，主人拿着灯出来，睡眼朦胧地回答说，空地方都给军队住下了。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王东焦急地说。大家都站

在最后一个人家的门前。伙子们早已放下挑子，坐在檐下打瞌睡了。

“怎么办？还不是只有在露天里睡一晚上再说！”姚民瑞答道。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王东绝望地问道。

“姚同志说得对，我们只好拣个干净地方睡过今天晚上再说，”曾明远沉着地说。

“我赞成。天做我的帐子，月光做我的铺盖，石头上睡着多凉爽！”冯文淑忽然高兴地说。

“你真是个爱幻想的女孩子。我倒害怕你在石头上闭不了眼睛！”张利英带着爱怜地哂笑道。

“姐姐，你不信，我们打个赌，我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好，”冯文淑带着自信地说。

“哪个跟你打赌？我倒希望你晚上睡得好，”张利英关心地说；“不过我劝你把毯子拿出来铺着睡，也免得着凉。反正伙子都在这里。”

这一晚不但冯文淑睡得好，其余八个同志都睡得很甜。没有噩梦来惊扰他们。他们和衣睡在铺了毯子的石头地上，月光静静地抚着他们的疲倦的睡脸，象母亲的温柔的手一样。夜渐渐地凉起来，但他们的年轻的身体还是温暖的。

早晨天刚刚发白，冯文淑和别的同志就让嘈杂的人声惊醒了。睡在他们附近地上的携儿带女的逃难者，已经拿着行李，眨着睡眼，准备出发了。

逃难者中间有一个中年男子推起一部手推车，车上躺着

一个灰白脸的妇人，身上盖了一床厚棉被，她睁着那对失神的眼睛在看旁边一对十二三岁的男女小孩。手推车依呀地滚着前进。方天行一个人站在他们后面，望着那远去的车影，忽然低声哼起了一首旧诗。

姚民瑞弟兄和吴平带笑地低声谈论着。曾明远慢慢地走到方天行的身边，亲切地说：“方同志，走罢，你又想起了什么事情？昨天你很少讲话。我担心你要发病了。”

方天行默默地过了一刻，才掉过头来，满脸的阴云渐渐地在消散，他叹息似地小声说：“我做了一天、两天的梦。不过……”他马上改变了语调用坚决的声音接下去：“现在没有事情了，我不会发病的。”然后他又解释似地加上两句：“在这个时代单想着个人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有努力多做集体的工作。”

“是的，我们只有努力多做集体的工作，”曾明远响应地点头说。他忽然用一种决断的声音加一句：“即使为抗战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

冯文淑怀着好奇心同周欣走过来，她听见曾明远的后一句话，便热烈地插嘴道：“我就愿意为抗战牺牲我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丽的事。”

周欣听见冯文淑这句象台辞的话，很想笑，可是她没有笑出来，情感就变了。她默默地把冯文淑的手紧紧捏了一下。

他们在镇上随便吃了一一点东西，填塞了饥饿以后，又开始了这一天的新的路程。

公路在他们前面伸出去，象一条巨蟒爬行在群山中间。

连接的山峰手臂似地环抱着公路，也环抱着行人。依旧是路跟着山弯，人跟着山动。一切和在昨天一样：手推车，扁担，马蹄，人脚。草绿色盖满了路，脚步声震聋了山。军队开赴前线，逃难者奔向后方。他们这九个年轻的工作者迎着那无始无终的前进的军队走去。

太阳从山背后升起来，又用它的火焰来烧炙公路。路开始发烫，而且在冒烟了。烟雾似的尘土在空中飞扬。手推车呻吟起来。人们在呛咳。马蹄气恼地打着路面。枪刺愤慨地对着天空。伕子们在沉重的扁担的压迫下流出了汗水。

军队默默地前进着。逃难者默默地奔波着。年轻的工作者默默地走着。但是公路上仍旧充满了嘈杂的声音。好象一切都在动，一切都在叫。没有休息，没有宁静。在这里一个人容易忘记自己的存在，只觉得受着一股力量的推动，自己完全融合在群体中间，成了大的群体的一份子，跟着群体在活动。现在就是这个大群体使这条公路活起来，成了有生命的东西。

冯文淑和周欣就是这样。她们好象消失在这无穷无尽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间，不自觉地跟着这人群活动。她们只有一个思想：向前走。她们不问已经走了多少地方，前面还有若干路程，她们不管自己的起了水泡的脚掌还在微微发痛，腿也略略发酸，她们不顾太阳炎热地烧炙她们的皮肤，汗珠象雨点那样在脸颊上滚滴，她们还是勇敢地、愉快地向前迈步。而且她们每次望见从对面爬上山脊来的或者从山坳转弯过来的潮涌似的草绿色的军队，便有一种雄壮、庄严的感觉。

自然别的同志也是同样勇敢的。张利英始终保留着她那温和的微笑。曾明远保持着他的沉着。姚民瑞弟兄和吴平还保持着他们的轻松好玩的心情。只是吴平却露出了一点焦躁的神气。方天行依旧喜欢沉溺在他的思索里，不过他的面容是相当安静的，而且他常常不自觉地舞着手，仿佛在指挥唱歌队，口里还哼着别人听不见的歌词。只有王东，那个脸上表情时常改变的王东，不时焦急地在前面问：“还有多少路？”“前面还有多少里？”“到小界岭还有多少里？”但是他从伙子、从茅棚里的老百姓那里总是得到使他失望的回答。路越走越长了。他们虽然走了一天半，却好象并没有走多少路似的。

王东又嚷起“肚饿”来。但是眼前一片草绿色并不能给他们一点饮食。他们只得忍耐地继续走了二三十分钟，才在路旁一个茅棚下找到歇脚的地方。

这是一个卖面的摊子，一个老人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在那里照料生意。女孩在土灶后弄火。老人在案桌前端碗调味。同志们就围着这个摊子，有的坐在凳上，有的站在旁边。他们随意闲谈，等候面碗端上来。

冯文淑坐在凳上翘起一只脚看那满是灰尘的布鞋，鞋尖也破了口，让尘沙钻进了鞋里。她便解开布鞋，把尘沙全倾出来。周欣的布鞋破口较小。但是姚民瑞他们的却张开了两片大嘴，走起路来一搭一搭地，好象鞋底快要跟鞋面脱离了。

“你看你的鞋子成了这样！”冯文淑指着姚民瑞的脚笑起来。

“你不知道连它也饿得发慌了，”姚民瑞满不在乎地说。

“你不要笑！再过一天你的鞋子也会弄到这样的！”姚民瑞望着冯文淑的脚笑道。

“那我就买草鞋来穿，象你们这样多不舒服！”冯文淑带笑说。她看见姚民瑞弟兄的脚象舌头似地在那两片大嘴中卷动，觉得心里怪不舒服。

“这时候不知道李南星他们在做什么？”方天行站在摊子前，眼睛向外面看，忽然自语道。

“做什么？我想他们总不会象我们这样狼狈的，”王东烦躁地说。

“王同志，你说狼狈！我一点也不觉得，”姚民瑞高兴地说。

“我也是，我还觉得高兴，”冯文淑兴奋地接嘴说。

“冯同志，你慢点高兴，明天、后天就会走得你不高兴的，”王东带着沮丧的表情说。

面碗开始端出来了，冯文淑还骄傲地对王东说：“你看罢，不说明天后天，就是这样走个十天八天，我也会高兴的。”

王东觉得没有话好说了，便端起一碗黑面条，埋下头吃着。

大家满意地吃着黑面条，一碗又一碗地吃着。茅棚给他们遮住日光，心里有了一点凉意。他们望着一批一批的逃难者在骄阳下面匆匆地走过去。那些人抱着婴儿，牵着小孩，扶着老人，负着包袱，提着箱子；还有少数病人睡在手推车上呻吟。

“这都是日本鬼子干的事！”吴平忽然把空碗在桌子上重重地一放，愤慨地骂起来，他这一声似乎叫出了众人心中的

闷气。

他们付了钱走出茅棚。前面穿草绿色军服的兵士仍旧浪涛似地涌过来。这进军好象真的不会有完结的时候。看番号，他们知道一个师又过去了。但是新的人还是大批地从对面爬上山脊来。依旧是整齐的步伐，相同的表情，依旧是年轻的黝黑的脸，不顾炎热，不顾疲倦，而且不怕危险，勇敢地开赴火线去。

飞机声突然在天空里响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人先听见这声音报告了消息的，在一瞬间整个公路都骚动起来了。草绿色立刻象水一般地散开来，往路的两边流去。逃难者惊恐地、张皇地向各处乱奔，找寻可以作掩蔽的地方。冯文淑、周欣几个人正走在一个茅棚旁边，就躲进里面去，还斜仰着头去望天空。王东和方天行已经走过了这里，又连忙退回来，和大家躲在一起。方天行的面容还是相当沉静的。王东却带来一张惨白色的脸，他蹲下去，把身子紧紧地缩做一团。

周围很快地静下来。机声渐渐地逼近了。

“在那里，三架，”吴平低声惊叫着。冯文淑伸出头去看，她也看见三架轰炸机张着亮翅膀向这面飞过来，好象就要到了顶上一般。

“不要动，敌机好象就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曾明远严肃地小声嘱咐道。机声渐渐地大起来。公路静得就象死去了一般。兵士们也静静地伏在地上。

“这个地方不对，是个目标，”王东恐怖地自语道。

“不要说话，”曾明远谨慎地干涉道。这时敌机就在他们

的头上盘旋着，机声十分响亮。在茅棚里的人都屏住气息蹲在地上。王东忽然站起来，疯狂似地跑出茅棚去。

“不要出去，”方天行低声唤着。他跟着追出去，他想把王东拉回茅棚里来。茅棚里静静的，大家都带着惊恐的眼光看外面，外面有人在低声斥责王东，但是没有听见王东的回应，也没有看见他和方天行回来。飞机忽然带着一阵可怕的俯冲声飞过茅棚上面。茅棚里面的人，连冯文淑在内，都默默地扑倒在地上。

在这一瞬间，一个炸弹下来了。一时耳边只有飒飒声，爆炸声，人们哀叫声……土地震动起来。尘土把天空都遮蔽了。一阵阴暗，一阵风沙，茅棚崩溃似地压下来。人觉得好象山也崩塌了。大家紧紧地缩在一起，谁对自己的生命都不敢存一点希望。同样的声音接连地响了三次。然后又是两排“咯咯”的机枪声。以后就是一片静寂，一片窒息人的静寂。尘土慢慢地落回在地上，让晴朗的天空再现出来。敌机带着马达声从容地向远处飞去。

于是刚才死去了的公路又复活起来。那些躲着、蹲着、伏着的人都带着一身尘土出现了。曾明远七个人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竹头、茅草和尘土，站起来，用暗淡的眼光看了看彼此的惨白脸。茅棚的残废架子还架在他们头上。人们都朝着前面一块地方跑去。他们也跑向那里。

草绿色的军队继续前进着。依旧是整齐的步伐和年轻的脸，脸上表情差不多是相同的：都没有恐惧。他们依旧勇敢地、潮涌似地向前进军。

公路带着痛苦的样子，袒露出它的伤痕，它的背脊上戳了三个窟窿。一部手推车被炸成粉碎。一些衣服什物破碎凌乱地抛掷在四处，连茅棚架子上也挂了一块蓝布片。好几具尸首血淋淋地横在路边。

“王东！”冯文淑忽然惊恐地叫起来。她看见一张嘴边涂着血的瘦脸在微微摆动，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她认得这是王东的脸，他的比较光滑的头发还贴在前额上。她连忙奔过去。别的同志也跟着跑过来了。曾明远脸色惨白、恐怖地叫起来：“方天行同志，方天行同志！”没有回应。

周围都是人，都是声音。路没有被截断。军队仍然照常前进。曾明远张皇地对张利英说一句：“你们看护王东同志，我去找方天行，”便匆匆地挤出了人群。

同志们默默地站在王东面前，旁边是一个只剩下半边脸和一只手的死尸。王东身上全是血，衣服撕破，肚皮裂开，肠子等等都爆出到外面来。他们咬紧嘴唇皮，用眼光抚慰那张白得象纸一样的脸，不觉掉下了眼泪。冯文淑跪下去，打算包扎他的伤口。他忽然挣扎地动了一下，口张开，一边流着血，一边说：“冯同志，谢谢你，你不要挨我，脏得很。我完了。”

“王东同志，你不要紧。你不要说话，”冯文淑忍不住哭着说。她望着肚子上那堆脏东西，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她抬起泪眼望着张利英说：“纱布！纱布！”

“我去拿，”周欣答应一声，她就跑开了。

王东吃力地动着眼珠，看看面前的几个同志，他点点头说：“二十五年，全完了。……请你们写封信告诉我家里。……”

你们不用难过，我总算为抗战尽过力……我不后悔……”他的话已经不大清楚了。他还问“曾团长呢？方天行同志呢？他们还……”

他说到这里喉管中起了一阵痰声，血接连地涌出来，以后的话就只有喉音，他似乎还在用力挣扎，要说什么话，但是他张开口，流出来的只是血，却没有声音。从他的眼角迸出了两颗大的泪珠。他再动一下，就闭上了眼睛。同志们告诉他曾明远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姐姐，他死了，我们怎么办？”冯文淑哭着，大声问张利英道。

“等一下，我们找曾明远同志来商量，”张利英揩着眼泪答道。他对姚民瑞说：“姚同志，你快去找团长来。”她又焦虑地自语道：“现在还不知道方天行同志怎样了。”

姚民瑞刚刚离开，周欣就同曾明远、方天行两人从嘈杂的人丛中挤进来。他们走到王东的尸体跟前，周欣马上淌出眼泪，曾明远默默地埋下头，方天行茫然地望着王东的脸。方天行不住地微微摆着头，他的表情显得很迟钝，别人觉得他在半天的功夫就象老了几岁似的。

“方同志，我们正在耽心你，王同志刚才还问起你，”张利英亲切地对方天行说。

方天行茫然地看她一眼，没有说一句话。

“方同志，你刚才躲在哪里？”姚民瑞关心地问道。

方天行始终不开口，脸上仍旧带着茫然的表情。众人诧异地抬起头，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曾明远忽然用低沉的声音

对众人解释道：“他听不见。他的耳朵聋了。”

“真有这种事？”张利英痛苦地小声说。

“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前面那棵树下，就是现在这样的表情。我对他说了多少话，他才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神经恐怕也震坏了，过些时候会慢慢地好起来的。现在让他安静地休息几天。我们给他雇一辆手推车，”曾明远声音低沉地答道。他又改变语调结束似地加上一句：“我们快点给王东同志办后事罢。”

方天行在旁边连眼睛也不掉一下，还是茫然地望着王东的脸，不住地微微摇头。

十 五

一个星期以后，冯文淑给李南星寄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南星同志：

我不知道我的信能不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觉得我应该给你写一封信。第一，我谢谢你送给我的那部好书；第二，我谢谢你留给我的那封信。其实我真想生你的气，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偷偷地走呢？为什么不让我和周欣两个跟你一道去呢？难道你以为我们两个女孩子就不能吃苦吗？你既然有功夫给我写信，为什么又没有功夫事先通知我一声？想起来我真应该生你的气。不过现在我不气了。说句实话，我还很想念你们呢。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生活，我愿意你或者群文同志，或者文木同志写信告诉我，你们在那边怎样地过日子。记着，要写信来呀！

现在还是让我先告诉你我们的一些事情，我想你一定愿意知道。第一，我们跨过了大别山，一共走了五天，我还穿着草鞋走了一天半路。当我们在小界岭跟大别山分别的时候，我真的掉下了眼泪。并不是我爱哭，你们还不知道王东同志就埋葬在大别山里面。他是在我们跨过大别山的第二天被鬼子的飞机炸死的。他死得真惨，连肚肠都炸出来了。我们平日不大喜欢他，总笑他是小开。可是他这次死得相当勇敢，他说他并不后悔。他说得对，我们

哪个又会后悔呢？那天我们也有机会被炸死的，我们躲在一个茅棚里面，茅棚也震坏了。平时大家都不喜欢王东同志。但是他死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流眼泪。我们把他葬在山中，就葬在他殉难地方的附近。我们只是在墓前竖了一块木牌，曾明远同志说，抗战胜利以后要给他立一个纪念碑。

还有方天行同志的耳朵聋了，就是在那天被炸弹震聋的，他的神经也受了影响。他一天很少说话，总是不住地摆头。你跟他说话，他就对你发呆。我真害怕看见他。他歌也不唱了。我们决定送他到汉口去医病，据说他这病是容易治好的。

我们全体同志都要到汉口去。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计划，已经得到司令长官部的同意了。我们还是留在这个战区工作。我们去汉口，一则是去买东西，我们要添置演戏的道具，还要买许多东西，我们还预备办一种小型报纸，印一些通俗的宣传小册；二则是去补充一些工作同志，找些新的朋友参加。曾明远和我都写信到上海去找刘波出来，不知道他肯不肯来。我们再过三四天就会动身。在汉口我们或许会住半个月到一个月光景。离开汉口好些时候了，我也想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在那里我们也可以过些兴奋的日子，还可以参加那里的保卫大武汉的工作。

说到刘波，我还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我想刘波一定会出来。在战地做工作更痛快，而且他的素贞已经跟着医院搬到广州了。我还想把素贞拉来，我们团体里也很需要护士。

最后我告诉你，你送我的那本书，我从前在上海就读过，可是不大懂。昨天又匆匆翻看了一遍，觉得的确是一本好书。我要带在身边，我还要依你的话把那本书多读、细读。在这样的环境里读那本书，特别有益处。

再会罢，我希望这封信会由王老师转交给你，我猜你们一定和

他在一起做事情。致
民族解放的敬礼！
问候群文、文木两位同志。

冯文淑 ×月×日。

冯文淑写完信，便递给站在旁边的周欣看。周欣把信放回在桌子上的时候，忽然问道：“文淑，你还记得王东的那两句诗吗？”

“什么诗？”冯文淑惊讶地反问她：“你怎么忽然想起王东的诗来？”

“就是那两句：

一张最后的脸，一个最后的梦，
他闭上了燃烧的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做的，我倒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有一天都会这样闭上眼睛的，”周欣带点感动地说。她接着压低声音望着窗外，自语道：“那张最后的脸一定是我姆妈的。”

冯文淑站起来，她不假思索地顺口答道：“这有什么关系？我今年二十岁了。即使这样死去，我也不算是白活了。我一点也不后悔。”她很高兴，而且昂着头挺起胸勇敢地迎着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她并没有听清楚周欣的最后一句话。

后 记

右《火》第二部(一名《冯文淑》)十五章仍是我的试作。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动笔,到五月二十三日写成,这中间停笔约半个月,每天大概写两千五百字。

这是一本宣传的书,但也是一个失败的工作。为了宣传,我不敢掩饰自己的浅陋,就索性让它出版,去接受严正的指责。

不过我对自己的作品多少也有一点偏爱。看见它成书问世,我不能没有些微的喜悦。为这事情我应当感谢两个朋友:一是L. P.,她给过我很多的鼓励;另一个是朋友T.,他供给了我不少的材料,还替我看过一遍原稿。他跨过大别山,我却却没有。要不是他在这里,我不会写出这样的一本书。

其实我并没有意思在今年写《火》的第二部,两个月前我才改变了主张。原因只有一个:去年年底忽然有人在桂林发起“研究巴金”。仿佛预先约好似的,发起之后,在一个地方便接连出现了不少的响应文章。但以后却又寂然了。我象一个候判的罪囚等候着研究的结果。然而我却只见到一些吱吱喳喳的“名文”。有的居然在我的小说里发见了“安那其”,连忙用他的贫弱的脑筋给“安那其”下一个定义,不幸他自己也就

弄不清楚“安那其”是什么。有的还很天真地说我只用中学生常用的字眼来写小说,所以青年爱读(?),这无非表示他比我程度高,至少是大学生甚或是文豪学者,唯恐别人不知。这便是文豪学者之类的所谓“研究”了。

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样的东西。譬如拿这部《火》为例,它便不是“安那其”的书。这理由很简单: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一层自然不在那些“研究者”的范围内。

因此,为了给那些“研究者”添一点麻烦,为了给他们找出一架镜子来照出他们的尊容,我还要继续写我的小说,而且要永久地写下去。^①

巴 金 1941年5月23日在重庆。

^① 这是1942年桂林初版本《火》第二部《后记》的全文,1951年7月开明书店在北京重印这本小书,我删去了后面的三段。这次编印《全集》我采纳树基的建议恢复了《后记》的本来面目。(1987年12月注)

第三部

《火》(第三部)，一九四五年七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共印行七版(次)。

—

青灰色的天空里忽然亮起一道闪光，象一把剪刀似地剪破了天幕。接着一声霹雳响了，静静地睡着的屋子微微震动了一下。于是一切又落入宁静里去。

第二道闪光从开着的窗户射进屋子，把屋子照得雪亮。两顶白罗纹帐垂下来，掩盖了两张窄小的床。靠外面的一张床前放着一双旧拖鞋和一双新的半高跟黄皮鞋，连它们也带着沉睡的样子。

她，鞋子的主人斜着身子躺在被里，眼睛紧闭着，嘴唇微微张开，轻轻地在吹气。又一道更亮的闪电透过帐子扫过她的脸。她伸手在脸上拂拭了一下，口里吐出一句含糊的话，突然一翻身，便把脸掉向墙壁那一面去了。然后一切又落回到宁静里面。

可是她并没有得到宁静。虽然紧闭着两眼，她仍旧看见那个活动的世界。在梦里她仍然在生活。

她跟着一大群人好容易走过浮桥进到城内。风刮得厉害。前面一阵一阵的黑烟在往上冒。天色很阴沉，仿佛天幕就要落下来似的。她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到了十字路口，一堆黑压压的人头拦住了路。她不能通过，心里正着急，忽然看

见人行道旁一堆瓦砾，积成一个小丘，她便站到那上面去。对面一家店铺正在燃烧，火从屋后烧过来，蔓延得很快。她第一眼还只看见一股火，但是立刻对面街上所有的房屋都被火焰掩盖了。她的眼前展开一片火海，火舌象波浪似地在翻腾。

“完了，全完了。日本人跟我们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们？”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在她的旁边诉苦道。

“是啊，”她不由自主地吐出了这两个字。她看见人们象墙塌下来似地跑散了。他们疯狂地跑着，哭着。有的把手里的包袱也丢在地上。有的只是往别人身上乱撞。她不问情由地转身就跑；她刚跑了两三步，就被人撞倒在一家银楼的门前。人们从她身边跑过，一只皮鞋踏在她的腰间。她感到一阵痛，她要嚷，可是她叫不出声音。她极力挣扎，从地上站了起来。

奇怪，那许多人全不见了。她惊恐地拔脚向城门跑去。她快要到城门了，忽然听见一个小孩的声音在唤：“姐姐，姐姐。”她站住掉头一看。骑楼下一个妇人躺在地上，一个四岁光景的小女孩站在妇人身边对她招手。她走了过去。

“你带我回家去，”小女孩接连说着这同一句话，向她伸起两只膀子要她抱。

“小妹妹，我带你到哪儿去？你的家在哪儿？你还没有告诉我啊！”她说。

“我家在街上，有楼的房子。”

“我晓得是有楼的房子，我晓得是在街上。可是什么街，你知道吗？”她又说。

“街就是街呀!”小女孩天真地说。

躺在地上的妇人忽然翻了一个身，自语似地说：“她的家炸光了，她爸爸，她一家人全炸死了。”妇人的脸上全是血。

“呀，你怎么啦?”她惊恐地叫道。话还没有说完，一声巨响把整个骑楼震塌下来。她只觉眼前金光乱跳。她没有来得及吐出一声恐怖的叫喊，就睁开眼睛醒了。

夜相当凉。刚打过一个响雷，现在荷荷地落起大雨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定一定神，睁大眼睛，在帐子里向窗户那面看，纸窗上透进一点灰白的光，窗角似乎有一团黑影。她害怕起来，便闭上眼睛。然而她还是怕，忍不住又把眼睛睁开，偷偷地望着纸窗。影子仍旧在那里。她连忙用铺盖蒙住头，虽然她觉得气闷，但是不到多大的功夫她又沉沉地睡去了。

现在她坐在朋友的客厅里，正端着茶杯在讲话，忽然一个陌生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对她们说：“怎么你们还不跑？放紧急警报了！”

“我们没有听见放警报，”她的友人回答道。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陌生人指着窗外的天空说。

这是强大的机声。她们连忙跟着陌生人跑到天井里去。她们也不知道往哪里逃好。耳边仿佛全是飒飒的声音，她知道炸弹在空中旋转地落下来了，并且一定会落在这附近，她不敢吐一口气。就在这时候一个大雷迎头打下，她不由自主地伏倒在地上。她只听见接连的炸弹声，只觉得房屋在摇晃，同时还有些破砖碎瓦打在她的身上。

过了一会儿炸弹声停了。她清醒过来，站直身子，拍了拍

身上的灰。天井里遍地砖瓦。她的友人也不去检视自己的衣物，就拉着她的手往外跑。

巷子里凌乱不堪，墙塌下一部分，厚厚的尘土使得平日光滑的石板道变成了沙滩，路给堵住了。她们不顾一切地往巷口跑去，虽然跌倒几次，终于走出了巷口。

晴朗的蓝天已经变成了灰黑，大股的浓烟黑云似地罩在头上。从四面八方吹来一种窒息人的焦味。成群的人潮水似地往右边流去，叫号声响成了一片。她们跟着那些人乱跑。

烟熏痛她的双眼，泪水又使她的眼光变成模糊。她一面用手揉眼睛，一面向前跑去。她刚刚转进一条街。突然一阵喧闹，前面的人马上退下来，后面的人仓皇地四处奔逃。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也跟着别人转身往后面跑。经过了一番拥挤，她忽然发觉她失掉了那个友人。她再也望不见她。她被后面的人推动着，自己也没法停下来，就这样地走过了两条街，人们又照样地后退一次。

“走不通啊，前面也是火。”她听见有人在嚷，她伸起颈项看，前面一股浓烟跟着风吹过来。她掉头看后面，人们还是不停地向前涌。于是又发生了一阵狼狈的拥挤。

天渐渐地红起来。夜来了。但是街道也被红光照亮了。漫天的火星在空中飞舞。五月初的天气却热得象盛夏一般。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她全身衣服都湿透了。火光逐渐扩大，烟雾四处弥漫。迎面扑来的焦味变得更浓。每张脸都烤得红红的，映着火光，好象涂上了鲜血一样。

她那位朋友的脸忽然在前面人丛中露了出来，朋友也象

在寻找她。她马上大声唤朋友的名字。可是她的声音完全消失在那些绝望的叫号里面，朋友的面影已经被无数的蠕动着、黑压压的头吞下去了。她用力往前挤去。但是那许多人的背构成了一堵铜墙铁壁，使她一步也动不了。她正在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又带着一片发狂的叫喊崩溃似地退下来。

“走不通，没有路啊！”许多声音嚷着，她的脑子里响起了铜铃般的声音。她觉得头快要炸了。她被人推挤着，膀子撞痛了，脚踏伤了。身子一偏一倒的。许多人从她的身边跑过，她仍旧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来。好象连脑子里也装满了烟雾。

“火烧过来了！”她后面忽然响起了这样的叫声。她又拚命往前面冲。前面一股红光扑过来，火花爆到她的脸上了。她不去看明白火头在什么地方，又盲目地向后面退。后面的路也被人堵塞了。她没有力量继续挣扎。她觉得四面都是火，她被包围在火中，再也逃不出去。

但是她仿佛听见一个惊喜的叫声：有路了。然后又是一阵拥挤。她被人推动着，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只觉得脑子稍微清醒一点。等她定定神往前面看，她才知道这条路是通往江边去的，火已经留在后面了。

她被人推到江边，又被人推下石级，一阵风把她吹得完全清醒了。她望着下面一片紫色江水，忍不住哭起来。她刚走到最末的四五级，看见一个怀里抱着婴孩的年轻女人正在上船，脚不曾站稳，只一晃就落进江里去了。她发出了一声惊叫。

眼前的景象消失了。没有水同火，也没有人和船。她躺在床上，棉被重甸甸地压住她，她满头是汗，心因为惊恐跳得很厉害。在外面天已经大亮了。雨也早已停止。阳光穿过窗户和蚊帐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

她把棉被掀起一角，又将帐子拉开，侧着头去接受金色的朝阳。阳光温暖地抚着她的脸，使她的心跳慢慢地平静下来。纸窗撑起了两扇。窗外两棵梅树上小鸟安闲地叫着，被雨洗净了的绿叶在空中微微舞动。一只苍蝇飞到她的脸颊上，她把头一动，苍蝇又飞走了。她的头落下枕边，她就让它平平地放着，帐子角绊住她的头发，她伸手把它拉开一点。她把两只手放在脑后，什么也不想，只是默默地望着眼前的景物。有时她的眼光会跟着一只苍蝇在空中打转，在中途又茫然停在糊着白纸的天花板上，有时她半闭着眼睛，仿佛落进了微睡的状态里。她的心这样地得到了一点休息。她觉得先前的那些梦景真的跟她离得很远了。她的脸上露出了宽心的微笑。

一阵脚步声把一个淡青色的人影带进房来。她把眼光移到房门口去。

一双大眼睛对着她微笑，一个愉快的声音说：“文淑，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起来？”

她笑了笑，顺口答道：“你起来为什么不叫我？”

那张瓜子脸带着大姐姐一般的关心的表情，素贞（刚刚走进房来的女子就是朱素贞）把手里拿的热水瓶放在屋角那张方桌上，亲热地说：“我看你睡得很甜，觉得还是让你多睡一会儿好。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做了什么怪梦，我仿佛听见你叫过好

几次。”

“对啦，我接连做了两个可怕的梦。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冯文淑答道，她皱了皱眉；“好象这并不是梦，全是我自己的经历似的。我还以为我已经把它忘掉了。”

“什么经历？你在想战地的生活吗？”素贞惊讶地问道。

“不，那是后方的生活，”文淑摇摇头说。

“后方的生活？是什么罗曼斯吗？”素贞笑问道，嘴微微张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呸，”文淑啐了一口，接着嘲笑地说：“哪个象你整天就想着罗曼斯，世界上哪儿有那么多多的罗曼斯？我看刘波在上海一定不放心你。”

素贞脸上略略发红，她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真是！我真心跟你讲话，你倒拿我开玩笑。你看我这一次会不会放松你！”说着她就走到文淑的床前，俯下身子，要去拧文淑的嘴。文淑带着笑声在挣扎。她们这样闹了一会儿，文淑穿着那件褪了色的旧睡衣下了床，走到挂在壁上的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的面容，一面用手拢了拢蓬松的头发。仍然是那张圆圆的脸，不过脸色显得黑一点，眼白上现了红丝。

“我老了，真快啊，”文淑感慨地自语道。

素贞噗嗤地笑了起来。她走到文淑背后，两手按住文淑的两肩，头伸到文淑的左颊旁边去看那面镜子，她又埋怨地说：“叫你晚上不要睡在床上看书，你不听，你看现在眼睛都红了。”

“你真凶，”文淑故意伸了伸舌头说；“人家老远跑来看你，

你也该对我好一点。你又是我的好姐姐，还不该纵容我？我也只住了十多天，你不知道干涉了多少趟。你这样欺负我，我明天就回去。”

“你的嘴真刁！”素贞爱怜地说：“我看你回到哪里去？你还想回到上海你父亲那里，等他给你选女婿吗？”

“不，我上前线去，”文淑昂起头说；她又望着素贞加一句：“我去找曾明远、李南星他们。”

那两个人都是冯文淑在战地工作团的同伴，关于他们的故事文淑这几天里已经对素贞讲了几遍。其实她以前在信函里也曾用了近于夸张的笔调叙述过他们的一些事情。李南星仍然在沦陷区中领着一支游击队跟敌人战斗，曾明远则跟着军队跑遍各个战区做政治工作。

“你最近还得到他们的信吗？”素贞缩回手在屋里走了两步，忽然掉转头问道。

“没有，我去过两封信都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曾明远不是在湖北，就是跑到陕北去了。李南星、方群文他们好久没有消息。跟他们通信很困难。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连他送给我的那本好书也给敌机炸毁了，”文淑带着怀念的调子说。

“在这个时代死一两个人也是很平常的事。不过为了抗战牺牲，也是很有意义的，”素贞两眼望着窗外自语似地说。

“可是我并不愿意听到我认识的人死去的消息。今年年初我得到周欣病死的信息，几个月都不舒服，”文淑皱着眉头说。

“其实愿意不愿意，都是空话，到了死的时候，还不是要闭

上眼睛。……我想起那年在广州的事。只差半个钟点我就粉身碎骨了。当时我一点也不怕。后来想起倒有点使人惊心，”素贞说。她走到窗前卷起窗格上的纸帘。

“这算什么！我昨晚一晚上都梦着这些事。我倒不害怕。我在哪个地方没有碰到过大轰炸？”文淑大声哂笑道。

“是啊，”素贞了悟般地点点头，她的面容突然变得庄严了，她的眼睛带了一点梦幻的光彩，痴痴望着窗外的蓝天。她这时看见的并不是这一小块没有被树梢遮去的天空，却是另一个大城市的景象和一个人的面庞。整整三年了。她仿佛听见这一句话，又好象有什么人的指甲在她的心上搔了一下。她觉得自己要哭出来了，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眼光收了回来，退了两步，看看自己的身上，慢吞吞地说：“许多的苦难把人锻炼得坚强多了。”她不愿意再说什么，就把头埋下去。

文淑惊奇地望着素贞，但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友人在想什么。她走去捏住素贞的手，低声安慰道：“你是不是在想刘波？我不懂他为什么老是守着上海不肯出来。”

素贞侧过脸去看文淑，她点了点头。但是她接着又把头摇了两摇说：“没有什么。我相信我终归会见到他的。他做事情负责，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岗位。”她略略停一下，又接下去：“只是我有点耽心他的安全。”

“我看不要紧。刘波聪明、能干，他在上海不会出毛病，”文淑说，“不过他应该早出来，就是走一趟也好。”

“在报纸上常常看到那些可怕的上海通讯，今天暗杀，明天绑票，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好象那里完全变成了一

个恐怖世界……”素贞的话没有讲完，就被文淑打断了。文淑抱着她的身子，用力摇了一下，一面带笑地大声说：

“我们不谈刘波了。你眼睛都红了，再讲下去，你就会哭起来的。今天是星期天，天气又好，等我洗好脸换过衣服，你陪我出去玩罢。”

素贞点一下头，应了一句：“好的，”便用力去关记忆的门。文淑走出屋子，到窗外栏杆前水缸里舀水洗脸去了。

素贞痴痴地立在原处。她听见窗外的水声，略略抬起头，咳了一声嗽。她忽然下一个决心，把记忆的门关上了，于是那个分别了三年的爱人的影子，又被埋在心底了。她走到方桌前从热水瓶里倒出一杯茶，把杯子拿在手里慢慢地喝着。她听见有人在叫：“朱素贞，朱素贞，”又听见同样的声音招呼“冯小姐”。文淑也在讲话，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插了进来。她便到外面去。

站在客厅门前栏杆旁石阶上的是女同学吴其华和男同学温健。吴其华是常来的客人，温健到她家来的次数却不多。她把他們请到客厅里坐下，又进房去端了茶出来。

这客厅原是人家的堂屋，屋顶很高，没有天花板，看得见粗的横梁，地上全铺着方砖，光滑而不潮湿。这里以前供过神，后来因为房主贪图高的租钱，便撤去神龛，把堂屋作为客厅，租给了一班大学生。素贞和一个同学从另外几个男同学的手里承租下来这三间屋子，虽然不过四个多月，房主已经加了两次房租了。但是在素贞和她那个同学看来，为了一点房租就放弃了这样宽敞整洁的屋子，也很可惜。因此她们仍然

安心地住下去。

这时她让两个客人在被一个藤茶几隔开的两把藤椅上坐了。客人们喝着茶，望着主人微笑，一面谈起话来。文淑在外面廊上听见吴其华的声音问：“谢质君呢？这么早就出去了？”素贞回答说：“到××村去看朋友去了。”“是去看那位陈太太吗？她好象每个星期天都去的，”吴其华说。“是啊，”素贞答道。吴其华又说：“星期天你还守在家里吗？今天天气好，你也该陪冯小姐出去玩玩。冯小姐来了这些天去过什么地方吗？……”文淑跨进了门栏，打断了她们的谈话。她对她们笑了笑，便走进寝室去换了一件蓝布短袖旗袍出来。

“你把前天《哲学概论》的笔记借给我抄一下，好不好？那堂课我简直弄不清楚，不晓得他讲些什么，”吴其华对素贞说。她看见文淑出来，便向文淑笑了笑。

文淑走到素贞旁边，就在藤制的长沙发上坐下了。

“好的，不过我也没有弄清楚，恐怕记得也不好。张先生讲得好象条理差一点，”素贞谦虚地答道。

“对啦，我们都是这样说。不过你很用功，还是懂得多些，”温健微微俯下身子带笑说。

“哪里的话，我还不是跟你们一样。你们太客气了，”素贞说着，她的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云。

文淑在这中间暗暗地观察这两位客人。温健，身体跟名字一样，是健康的。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眼睛相当大，眼珠显得极黑，脸形长，颜色白，两颊略略现出须根的痕迹。吴其华也是一个高个儿，长得过于丰满，全身都是滚圆

的，好象肉要挤破衣服突出来一般。脸上略略擦了一点粉，一头电烫的浓发披在脑后，并且遮去了一小部分面颊。她说一句话两腮就显著地动一下，脸上立刻堆出了笑容。文淑多看她一眼，就觉得要笑了，心里暗想素贞怎么能够同这样的人做朋友呢？

然而素贞的苍白色脸上并没有厌倦的表情，她反而带着温和、亲切的笑容跟客人讲话。

“这哪里是客气。不说别的，连张翼谋对你也跟对别人不同。别人都挨过他的骂，只有你一个没有挨过，”吴其华笑着说。

“我不过小心一点就是了，”素贞微笑道。

“其实我们也不见得就不小心，”吴其华辩道。

“我就讨厌张翼谋随时都把莫索里尼挂在口头上，”温健把头一扬，使身子坐得笔挺，脸色因兴奋略略发红。“好象就是他父母似的。学哲学不去德国，却跑到意大利去，也就够古怪了。说他在那里住了四年，我看他除了讲讲莫索里尼，吃吃马加洛尼^①外，最多也不过学会说几个乌奴、杜埃、秦国、狄埃奇罢了。”

吴其华吃吃地笑起来。冯文淑也笑了。她看了温健一眼，她觉得他讲话的神气相当好看。朱素贞带笑地说：“这句话未免刻毒一点。哲学的初步的知识他是有的。就是他太喜欢吹牛，爱谈课外的事情，叫人厌烦。”

“他为什么不谈呢？听他那口气，他是等着机会就去做官

^① 马加洛尼：意大利通心粉；下面的“乌奴、杜埃、秦国、狄埃奇”即意大利语“一、二、五、十”的意思。

的。教书不过是一个幌子，或者可以说是混混时间，况且这几天正是法国打败仗、意大利出风头的时候，”温健扬扬得意地说。

“这也难怪，现在做个教授也实在太苦了，靠那点薪水养活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做学问？我们刚才碰见历史系的高君允提个篮子在买菜，脸黄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装，真象上海的小瘪三，”吴其华说到这里，忍不住又笑起来。

“不过高先生倒是个有学问的人，我听过他的课。”素贞没有笑，她甚至带点尊敬地说。

“说起高君允，我倒记起一个笑话来了。密斯朱，你不知道罢？”温健兴高彩烈地说，他的眼光还在文淑的脸上掠过。

“什么笑话？我不知道，”素贞正色答道。

“就是昨天的事。昨天下午有个同学在高君允班上打瞌睡，高君允不大高兴，就说了他几句。你猜他怎么回答？”温健卖弄似地笑了笑，不等别人答话，自己又接下去说：“他说：‘高先生，我们没有你聪明，念书自然赶不上你。就算我们把你讲授的全都学到了，我们恐怕也难有机会到外国去求深造。就算我们跟你高先生一样在外国得了博士回来，也不过每月挣几百块钱，还得常常喝稀饭，穿破衣服。那么我们何必要绕这样一个大圈子！单靠我这点聪明和一些人事关系，挣千把块钱的薪水也不难。要做生意发财我更有门路。高先生，你也知道，那么又何必认真呢？’这番话说得高君允哑口无言。同学们都在旁边笑起来。我看见高君允脸都气青了。我以为他一定要发作了，可是他只是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就算了。”

吴其华高兴地笑着，素贞敷衍地勉强笑了笑。冯文淑默默地望着吴其华的打肿了似的笑脸，她起了反感，她觉得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她现在也不再看温健了。她微微翘了一下嘴。

“不过我觉得对高先生不应该说这种话，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朱素贞毕竟把自己的意见说出了，她略略皱起了眉头。

“你做人就是太迂一点。那个同学说的也是真话。书念得好出来饿饭，又有什么用？说句老实话，我们还不是来混一张文凭。”吴其华说到这里，便侧过脸对冯文淑客气地笑了笑，又插进几句解释的话：“我不怕冯小姐见笑，这也是实情，象这样的社会，也并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改得了的，我们不跟着潮流走，又能够做什么呢？有了文凭出来做事也要方便得多。社会上的人只重资格不重学问，只重交际应酬不重念死书，本来这种时候哪个还有心肠念书啊？”

素贞露出不自然的笑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看你越来越会讲话了。你最近是不是读了一些处世教育的书？”

吴其华红了红脸，接着又吃吃地笑起来。她拿小手绢擦了擦嘴，说：“怎么你连我也挖苦起来了？我倒是在跟你讲真心话，又没有得罪你。”

温健暗示般地瞥了她一眼，然后动了动他那对漆黑的眼珠，望着素贞说：“朱小姐是个用功的学生，”他的眼光又移到吴其华的脸上：“所以她听不进我们这种话。我们都不是好学生，不过，”他又把眼光移去看素贞的脸，略带一点惭愧的表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读书总读不进去，无论如何不能把心放在书上，即使勉强看下去，也是一点也记不住。其实不

止是我一个人，好多同学都是这样。”

“好啦，你不要把别人拉进去了，”吴其华笑得两只眼睛快要阖拢了。她一面把手绢当作扇子摇了几摇，“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四年中间这一百三十几个学分总得凑齐的。哪个又不是这样？话讲多了，倒惹得冯小姐见笑。”

“是啊，密斯冯一直没有讲话，是不是听不惯我们的胡扯，不肯指教我们，”温健接下去说，两只眼睛愉快地望着冯文淑。

“哪儿的话。你们讲得很有趣。我在听着……”冯文淑连忙笑着分辩道，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被吴其华打断了。

“素贞，你知道不知道余静给野玫瑰‘刷’了？”吴其华象报告一个重要消息似地大声说。

“我倒不知道，不是传说他们就要订婚吗？”素贞声音平淡地说，她虽不重视这个消息，不过她也感到一点兴趣。

“余静自己对人讲的。昨天有人碰见野玫瑰跟一个生人在路上‘拍拖’，不知道是谁，不过决不是我们同学。我早就说过她跟余静是不会成功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过余静家里好久不寄钱来了，这大概促成野玫瑰早点‘刷’他。”吴其华得意地笑了。

冯文淑并不知道野玫瑰是谁。不过，她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够笑得这么多。“难道她不觉得疲倦吗？”她暗暗地问自己道。

“老许在丽都看电影，也碰见野玫瑰跟一个生人在那儿，”温健接下去说，他马上又换了话题：“啊，密斯朱，丽都的‘Intermezzo’^①你看过吗？”

^① Intermezzo(英文)：即“插曲”。这部影片的中文译名是《寒夜琴挑》。

素贞摇摇头，淡淡地回答了两个字：“没有。”她平日很少去电影院，也从不关心电影院在放映什么片子。

“真是 marvelous^①！不可不看！那种淡淡哀愁的调子，那样和谐的音乐，连那个名字‘Intermezzo’，也是漂亮极了！我看了三遍还不够……”温健正在眉飞色舞地讲着，要不是被人打岔，他恐怕会把影片的故事叙述出来。不过他确实被人打岔了，一个本地女人的口音在天井里大声说：

“朱小姐，有预行了。”

“怎么，有预行警报了！温健，我们走罢，”吴其华站起来惊慌地说。

“等一等，我把笔记拿给你，”朱素贞不等吴其华答话，就匆匆地进房间去了。冯文淑也站了起来。

“快点，快点，等一会儿，怕来不及了，”吴其华在客厅里催促道。

“那么明天来拿也成，”温健提议说。

“不要紧的，单是预行警报，还没有发空袭警报呢，”冯文淑在旁边安慰地说。她想：现在总看不见你笑了。

“等着发了空袭警报就跑不远了。敌机来了，多可怕！”吴其华焦急地说，脸色似乎没有先前那样地红润了。她一面说，一面走，已经走下了台阶，朱素贞拿着笔记本赶出来。吴其华接到笔记本，匆匆说了一句：“抄完就还你，”回头看了冯文淑一眼，简单地打个招呼，就大步往外走了。温健跟在后面，他

① marvelous(英文)：即“了不起”的意思。

对朱素贞笑了笑，说了一句：“警报解除后再见。”他还想说什么，可是听见吴其华在唤他，便转身走了。

冯文淑同朱素贞立在阶上，看见温健的长长的身影转入门廊不见了，文淑含笑地问她的同伴道：“怎么你会跟这种人来往呢？”

“为什么不呢？我们是同学。我跟吴其华还同过寝室。她也是一个典型，多认识一种典型也有好处，况且她很老实，心地并不坏，”素贞笑答道。接着她问文淑道：“你为什么刚才连一句话不说，就象一个哑吧似的？”

“我有什么话可说？你们老是谈那些话！我怎么插得进来？”文淑带了点抱怨的口气说。

素贞侧过脸看文淑，她的大眼睛亮了一下，她点点头，低声说：“你究竟在前方住得久些。”

文淑看见素贞脸上的喜色，却不知道这喜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对面房门依呀地叫了一声，越过长着花树的天井，她们看见木匠的妻子正在锁门。那个三十多岁的瘦小的女人腋下挟着一个包袱转过身来，笑着对素贞说：“朱小姐，你家还不请走啊？”

“我们等到放了警报才走，张大嫂，你先走罢。”

“不要大意啊，”张大嫂关心地嘱咐道。

她的话刚说完，空袭警报的凄厉的哭声就响起来了，只有一分钟的功夫，这声音便响彻了整个天空。

“你家听，放空袭了，快请走啊，”张大嫂慌张地说，她马上

抱着包袱跑出去了。

“我们走罢，你到这里来还没有躲过警报，现在可以尝尝这里跑警报的滋味了，”素贞说，她把手在文淑的肩上轻轻地按了一下。

二

夜晚的空气很凉爽。微风吹动着湖边的树。月亮从天的一边上升，它的银光已经挂上了树梢，夹道上也渐渐地亮起来，在一道拱起的石桥上，两个年轻女子站在栏杆前，一边讲话，一边埋着头看水，水面上布满了水草和浮萍，一些黑影在淡淡的月光下微微晃动。

“我始终不赞成象你这样埋头读书，我觉得你应该到前方去看看，”那个身材较高的女子说，突然掷了一个石子到水里去。“扑通”一声，水溅起来，石子却落下去了。

“其实我也算是去过了。……那一年多的看护生活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只是那一种热诚不知道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了，”素贞用了一种类似叹息的声音说。“我觉得你跟从前完全一样。你还是从前那个冯文淑，我自己却变得多了。”

“我看还是把刘波叫出来罢……”文淑接下去说。

“今晚不许讲刘波的事，”素贞短短地打岔道。

“为什么呢？”文淑温和地问道。

素贞不回答，只是埋着头看水。水面显得亮了一点，有一部分地方成了缎子似的发光的东西。树影模糊地倒垂在水上。

文淑惊讶地掉头看了素贞一眼，她把脸移近素贞的，轻轻地问道：“你又想起了今天报纸上那篇通讯么？”

素贞点点头。她想讲话，但是五六个年轻男人唱着流行的电影歌《月亮在哪里》走上桥来。他们停住脚，望望她们，这个打岔使她的嘴闭得更紧了。

“不要紧，报上常常讲得过火一点，”文淑安慰地说。

“他三个月没有来信了，”素贞吐出了这句话，声音很低，文淑差一点就听不清楚了。她又加了一句：“法国投降了，法租界的情形一定更糟。”

“说不定是信丢掉了，现在交通不方便，信常常会丢掉，”文淑说着安慰的话。可是在心里她也想：“三个月！怎么会这么久？”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心总放不下……”素贞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声音仍旧很低。眼睛抬起来，仿佛在望着对岸的一丛树影。

“朱小姐，你在这里！”一个爽朗的笑声打断了素贞的话。两个女子吃惊地同时掉过头。一个长的身形立在她们的面前，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望着素贞的脸，被浓密的花白胡须掩着的嘴张开了。笑声接连地从那张嘴里滚了出来。

“怎么这位老先生会笑得这么天真？”文淑奇怪地想道。

“你们在赏月罢，兴致好啊，”老先生接着说，他又哈哈地笑起来。

“怎么，田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素贞惊喜地说，老人的笑声好象一阵风似地吹散了她心上的重压。

“我回来不过五六天，正打算明天去看你，”田惠世答道；“你好吗？这位是你同学罢。”他客气地对文淑点点头。他的清癯的面颜在月光下显出一种宁静的美，奕奕有神的目光配着孩子似地笑着的嘴，使这个老人在文淑的眼里显得非常可亲。

“我叫冯文淑，是素贞的老同学，”文淑含笑答道。这个老人给她的印象很好。

“她来了不过一个多月，就住在我家里，她是在前方做过工作的，”素贞介绍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你已经对我讲过几次了。”田惠世亲切地笑起来。“想不到今天会在这里见到。你们没有事，到我家里去，到我家里去坐坐，喝杯茶，我有好茶。”他的手动着，做出邀请的姿势。

“怎么样？”素贞侧过头低声问文淑。她其实很愿意去，她想向他问一些上海的事情。

“我去，我去，”文淑毫不迟疑地说。这时明月高高挂在天空，它周围的白云也已散尽。湖上的路象铺了一道霜似的，显得十分洁白。仿佛一层幕被揭起了，眼前突然亮起来，活动起来。行人谈着话从容地在那象树枝一般地往四处伸出去的湖上支路中来往。湖边草地上，到处坐着一对一对的喁喁私语的男女。一只小船从对面一簇荷叶间划出来，船中飞起一串铃子似的少女的笑声。这笑声象水泡一般在水上浮着，一个跟随一个地破了。

“冯小姐是痛快的人，我一看就知道，”田惠世满意地说。

“那么就走罢。”他又解释地加上一句：“地方很近。”他拔步先走了。

他走得快，不象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的身体相当结实，唯一带老态的地方就是他那微驼的背。文淑的眼光落到他的背上，她低声问素贞道：“他今年多少岁？”

“好象是五十二，”素贞轻轻答道。

“田先生，你为什么不拿根手杖？”文淑忍不住大声问了一句。

“为什么拿手杖？”田惠世站住了，掉过头来说，“你是不是说我太老罢？我不老啊！我不老啊！”他又哈哈地笑起来。

“是啊，田先生并不老，我有时候觉得你还比我们年轻，”素贞微笑说。

“朱小姐，你是在开玩笑。比起你们我怎么能说年轻呢？”田惠世笑道，他伸手摸一摸唇须，须上溅到了一点口水，他揩掉了。他想这不是上了年纪的表记吗？他不自觉地把胸部挺起来。但是他马上把背略略弯下。他有一种松弛的舒适的感觉。他想：我的确老了。他皱了皱眉。他抬头看看天，晴朗的高空恬静地挂在头上，玉盘似的皓月安闲地在这无边无底的碧海里游泳。天永远是这样，月也永远是这样，五十年来没有改变一点。它们不知比他多活了若干年，它们都不曾老，他又怎么会老呢？他又为什么怕老呢？

他的沉默叫素贞和文淑吃了一惊，不过她们觉得她们了解他的心情。尤其是文淑，她想，大概是“老”字使他不高兴罢。谁不怕老呢？她自己就常常说，她只要活到三十岁，她不

愿意让人把她同“老”字连起来。

“田先生，你在生气罢？”文淑爽直地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

“我生气？为了什么？”田惠世惊奇地问道。

“因为我说你老，”文淑忍住笑短短地说。

“哈哈，冯小姐，你太有趣了。我哪里会生气？”田惠世大声笑道。“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老。这次从海防来，有一段铁路被水冲断了，要换车。我找不到挑夫，自己提了两件行李走了那一段路，我一点也不累，好些同路的年轻人还比不上我，”他说着不知不觉地又把胸膛挺了起来，口里接连地发出得意的笑声。

“是啊，你的精神比我们都好，”素贞又说了这句恭维话。其实她心里也是这样想的。田惠世的乐观和坚毅的精神曾经使她感动过。她接着又问：“田先生，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来？有好几个月了。”

“还不是为了我那个淘气的孩子，”田惠世用了爱怜的声音说。“他倒是够磨人的。”他又哈哈地笑起来。

素贞低声对文淑说：“你知道田先生那个淘气的孩子吗？他是说他那个刊物。”

“这倒有趣得很，”文淑笑道。她已走进了雪白的石板路，觉得头上开朗多了，一个碧天罩在上面。她投了一瞥亲切的眼光在田惠世的脸上。月光照亮了他的笑脸，脸上现出一种安静、和悦的表情，嘴微微张开，胡须上有几颗象露珠一样的东西。她又说：“田先生，听你的口气，你一定喜欢你那个淘气

的孩子，是不是？”

田惠世只是满意地笑着，过了片刻他才说：“这是个最会磨人的孩子，所以我最喜欢他。”这时他已走到两扇紧闭着的黑漆门前，他站住，轻轻地敲了两下门。门开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拿着电筒走出来。他含笑地对田惠世说：“爸，你回来了。”

“世清，你来见见朱小姐同冯小姐，这位冯小姐你还没有见过，”田惠世点点头指着那两个女子说。

少年客气地对她们点头行礼，头埋得很低，就象在鞠躬一般。

“田先生，这位也是淘气的孩子吗？”文淑笑问道。

田惠世又哈哈地笑了。“他不淘气，他不淘气，”他接连地说。那个少年做了一个想笑又忍住笑的怪脸。田惠世客气地让两位小姐先进去，她们不肯。在他们谦让的时候，那个少年在一边噗嗤地笑了一声，又连忙忍住了。文淑想想觉得好笑，便第一个跨进了门槛。

石板铺的天井里摊着一大片月光，两把藤椅上坐了两位老太太，正在闲适地谈话。田惠世大声招呼了她们，一面陪着客人走过石阶，上了楼梯。楼梯尽处，由一道小门引入一个三合土筑的平台。平台被月光照得象银子似的，它的一边是砖砌的梅花墙，另一边的亚字栏杆，也是用砖砌成的。

“这里的景致还不错，”田惠世抬起头，向四面看了看，满意地说：“你们看这边，”他转身向着墙外，伸手指了指天边。文淑和素贞也跟着他站到墙边去。墙不高，只挨到素贞的肩头。

墙外蓝绸似的天幕下垂处耸立着一带城墙，一座古旧的城楼和几棵老树。

“现在看不清楚了，太阳刚落下去的时候最好看，”田惠世用了夸耀的调子说。文淑同意他的话。在她的眼里树和城楼都只是些不大清楚的阴影。不过这样的景致她在战地不知见过了多少，因此它在她眼里显得很亲切，这使她想到了一些忘却的事情。她望着天边出神了。

“冯小姐，冯小姐，”她听见田惠世在唤她。她吃惊地转过身来。在她的面前立着一位身材瘦小的太太，一张已经衰老但是仍然秀丽的脸和一双细小的眼睛对她慈祥地微笑。老太太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年轻人：一个是方才开门的少年，另一个年纪稍稍大一点，看相貌，文淑便知道他是那个少年的哥哥。

“这是我太太，这次同我一起来的，”田惠世高兴地介绍道；“这是世明，朱小姐也没有见过他，你们看他象不象他的弟弟？”

两张年轻的脸愉快地笑着。她们在月光下看这两弟兄，面貌非常相象，只是做哥哥的显得瘦一点，白一点，身材低一点；弟弟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哥哥却留着长发。

“真象，要是你不说，我在路上碰见，会把他当作世清的，”素贞笑答道。

“请到里面坐罢，”田太太用她那不纯熟的普通话客气地说。

文淑的眼光还停留在这两弟兄的脸上。她想着：“多么有趣，要是我也有两个这样的弟弟……”她没有听见田太太

的话。

“冯小姐，请进去坐，”这次世清开口了。文淑笑着答了一个“是”。

田惠世看见冯文淑站住不动（朱素贞已经跟着田太太走到廊上了），便说：“先进去看看，等一会儿把椅子端出来，在平台上喝茶，好不好？”

文淑接连说“好”。她陪着田惠世走出平台，进到廊上，再转入客厅。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客厅里陈设简单而整齐。中央一张小圆桌，围着四把藤椅，左角靠壁有一个装满了书的玻璃书柜，柜子不高，上面放了一个花瓶，里面插了一大束花，花瓶旁边放着一本厚厚的《新旧约全书》，是皮面精装本，还有一本赞美诗。花瓶的另一边有几件小巧的摆设。

“难道他是一个基督徒？”文淑奇怪地想道。她的眼光正要从书柜上移开去看其它的陈设，却突然被田惠世的声音引去了。

“冯小姐，我家里你还没有来过，有些东西还是我太太这次从上海带来的，有些是她来了以后才买的……”

“那么田先生，你是到上海去接太太来的，”冯文淑突然兴奋地说。

“我没有去上海，世明陪他母亲到香港，我们从香港搭船到海防，”田惠世答道，“可惜我这次时间匆促，不能够到上海去看看。”

“请坐罢，请坐罢，”田太太客气地接连说，她还为客人拉开小圆桌旁边的藤椅。

“我们到外面去坐，一面喝茶，一面看月亮，有趣些，”田惠世对他太太说；他又吩咐两个孩子：“世明，世清，我们来搬椅子。”

“我也来搬，”文淑说，她也端起一把椅子来。

小圆桌和藤椅搬到文淑和素贞刚才走过的那个平台上，新泡的铁观音斟进了茶杯里，田惠世陪着她们坐在月光下，喝着杯里芳香沁鼻的浓茶。这是同样的茶和同样的杯子，可是三个人的心情，甚至面部表情都不相同。素贞微微锁住眉头，埋着眼睛慢慢地喝茶；文淑却露出愉快的神情大口地喝光了茶汁，把杯子放回在桌上，她的眼睛清亮地望着天空；田惠世带着满足的微笑，安闲地一口一口很有兴趣地在领略茶味。素贞心里好象有什么使她耽心的事情。文淑却在回想一些痛快的事，她的心仿佛长着翅膀在天空里飞翔似的。田惠世这时似乎什么事情都不想。

“田先生，上海的消息你知道罢？”素贞抬起头压低声音问道。文淑的心马上从天空飞了回来，她同情地看了素贞一眼。

“我知道一点。法国投降以后上海的情形越来越坏，有许多事情简直想不到，痛快地说一句：那不是人的世界！”田惠世收敛了笑容答道。

“她问的是刘波他们的事情。田先生，你知道吗？”文淑连忙接下去说。

“他三个多月没有信来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素贞低声解释道，这次她两只眼睛牢牢地望着田惠世的带着茶汁发亮的唇须，等着他的回答。

“我知道，我想是不要紧的，”田惠世摇摇头答道。停了一下他又加一句：“在上海做工作的人并不少，他们知道对付日本人、对付汉奸的办法。”

“田先生，你见过刘波吗？”文淑问道。

“我从前见过他两面，是个痛快的人，”田惠世答道；“我这回在香港还听见人讲起他。”

“讲他什么？”素贞说，她的两眼发亮了。

“说是日本人很注意他，他接到几次汉奸的警告，不过他一点也不怕，”田惠世兴奋地说。

“那么你想他不要紧吗？”素贞变了脸色，声音略带颤抖地急急问道。

“我想不要紧，他们在一起工作的人不少，”田惠世毫不迟疑地、乐观地说。“我从前在上海也接到几次怪电话。我一点也不在乎。结果我还不是安全地出来了！”说到这里他又爽朗地笑起来。

素贞不作声，她沉思地望着天空。文淑带着赞美的眼光看田惠世，她想：这个老人倒很可爱。她忽然把嘴放到素贞耳边低声说：“我喜欢他。”田惠世没有听见她的话，他自己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田惠世独自笑了片刻，便给自己再斟了一杯茶，拿在手里，悠然自得地慢慢喝着。他的眼光在素贞和文淑两人的脸

上轮流地停留了一会儿，显然不同的两种表情使他感动。在一张脸上他看到青春的欢乐，在另一张脸上他看到深情的关切。“这都是年轻人的情感，”他想道。他觉得这样的情感多少有点可笑，但是他忽然又想起来：它们同样地表示着青春的力量，这正是他失去了的东西。现在他看出来她们跟他中间的距离了。他没有那种轻易起来的快乐，也没有轻易起来的悲哀。对一切的事情他的反应来得比较迟钝，因此他能够常常保持平静的心境。……一阵隐微的不快开始搔着他的心。他这时又想起了那个“老”字。同时他发觉他的背已经松弛地俯下来了，好象是五十年的生活从上面压下来似的。于是他开始挣扎，他的眼睛在天空中找寻助力，广阔的视野使他的眼睛明净了，刚刚一阵微风吹到他的脸上，他吸入一股清凉的空气。他感到一阵爽快，仿佛整个身子都轻松了许多。他忽然低声自语道：“我的感觉并不算迟钝！”他闭上眼，过了片刻，又睁开。月亮象一张熟习的脸亲切地对他微笑。他也想笑了。“我还能笑。我并不老啊！”似乎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复地说。他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

五十年的生活被这一笑吹散了。他立刻挺起胸膛，一口气喝完了杯里的余茶，把茶杯放在圆桌上，他的眼光挨到文淑的脸。文淑带笑地问道：“田先生，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笑起来？”

“我觉得有趣，五十年的生活一下就跑了来，一下又给我赶走了，”他笑答道。

“五十年！这样长的时间，你怎样过的？田先生，你怎么能够笑得跟小孩子一样？”文淑好奇地问道，她好象在跟田惠世

开玩笑，其实这真是她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她平日常常说：我只活到三十岁。她害怕想到三十岁以后的日子，换句话说，她怕老。素贞在旁边没有讲话，她出神地望着田惠世的笑脸，她脸上的阴云也慢慢地消散了。

“这种味道是说不出来的，”田惠世说着又想了想，“这句话也不大清楚，我觉得四十年糊里糊涂地就过去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意思，不过总不及最近十年有味。只有最近十年我才觉得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的，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文淑直率地说。

这时田太太捧了一个福建漆的盘子走来了。盘里放着三个杯子，都满满地盛着可可茶。田太太把杯子送到两个年轻客人的面前，她们都站起来伸出双手去接。田太太还笑着说了两句客套话，就在一把空着的椅子上坐下。她的两个面貌相似的孩子正站在走廊上讲话，并不曾跟着母亲走过来。

“请喝了可可，我慢慢讲给你们听，你们在这里多坐一阵也不要紧，”田惠世说。

素贞仰起头看天，月亮还没有移到她的头顶上，她并不作声，只是捧着杯子喝可可茶。文淑却兴奋地说：“好，好，我们等着你讲。”

田惠世看了素贞一眼，他暗暗地点一下头，同情地微微一笑。他从杯里喝了两口，便讲起自己的故事来，在讲了两段以后，他把可可茶喝光了，可是杯子始终捏在他的手里，有时候还跟着他的手在舞动。

三

田惠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严厉的父亲。那个虔诚、固执、拘泥地守着教义的基督教牧师在教义中看到的恨更多于爱。他颇象某一些初期的传教者，喜欢拿最后的审判和永久的受罪去吓人，却不肯给他们一点爱的安慰。在家庭中他是一个专制的君主，他的话全是法律，绝对地支配着子女们的生活。最大的女儿在未成年时就被他遣嫁到菲律宾去了，以后再没有得到她的消息。第二个儿子被他送到一个外国人办的学校里去研究神学，还没有得着做牧师的机会就死了。第三个是田惠世，他在小孩时候便以聪慧出名。他对文学感到极大的兴趣，喜欢阅读旧诗和小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国文成绩超过了全班的同学。可是不等到他把中学课程修完，他的父亲忽然决定送他到一个教会医院里去学医，他的抗议没有用，他只好顺从父亲的意思，抛弃了那些被父亲认为不良读物的书本。在医院中他度过了四年的长岁月，在这期间，他学会了忍耐。起初他极力压下年轻人所常有的种种幻想：使自己熟习于难闻的西药的气味和单调的生活。可是一年以后，他的心境开始改变了，他觉得他的眼睛也睁大了。他看见了人民的贫苦的情况。从那些每天拥挤在医院的挂号室里或者施

诊处的衣服褴褛的男女的口中，他听到种种惨痛的故事。一点普通的药，一句安慰的话，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不少痛苦。人居然可以这么容易、这么有效地帮助他的同胞，这是他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事。现在这些诚实、简单的脸上的笑容使他看到了一条新路。他的心安了。许多时日来他时常从他的先生，那个头发花白的英国医生那里听到的关于教义的话，忽然很清澈地在他的心里再现了。他似乎到了彻悟的境地。他父亲使他不明白、使他误解的东西，他那位外国的先生却给他解释清楚了，生活又贡献了旁证。所谓永久的受罪和末日的审判都象阴影似地消散了。他抓住的只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爱”字。从此每天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小小的屋子、关上房门、打开《新旧约全书》的时候，他觉得心里涌出了爱的泉源，他仿佛见到仁慈的“主”的面貌了。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读着福音书里面的句子：“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你还只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些新奇的教训，从前被他完全忽略了的，如今却象熟朋友似地叩着他的心的门，给他的心唤起了极大的喜悦。颤抖的不仅是他的声音，他的整个身子都震动了，好象被一种力量摇撼着似的。他的心的门大开了，爱

和同情没有阻拦地流进去。光明照透了他的全身，一切阴郁的思想都逃走了。他第一次看透了他自己。“天国是在你们的心里，”现在他知道这句话是如何真实了。从这时候起他开始笑起来。他找到了“乐观”。他忘了忧郁，他更勤苦地从事工作，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帮助人，爱人，尤其是爱穷人。过度的工作反而使他的身体强健了。他的心智也跟随着时日发展。他成了一个早熟的人，在二十岁的年纪，他看起来倒象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就在这一年他算是在医院里“毕业”了。院长在发了证书以后，还把他叫到家中去，起初着实夸奖了他一番，然后又说了许多激励的话。一条新路横在他的眼前。他到了自己开业的时候了。他的先生要他牢牢守住负责和牺牲的教训，他并没有违背一次。他把这作为职业，可是靠这职业养活的，与其说是他的肉体，毋宁说是他的精神。贫穷的人不断地来，他那小小的诊所永远是拥挤的。他不仅把药品拿给病人，他还给了安慰，他看见他的努力减轻了一些人的痛苦，然而贫穷却象潮水似地在他的四周越涨越高。他的乐观似乎受伤了。于是他又求救于他的“主”。晚上他努力睁着疲倦的眼睛，虔诚地翻读他所喜爱的福音书。那些熟习的句子在他的眼前发光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仿佛是对着他讲的话

似的。他的痛苦得着安慰了，信心得着巩固了。这仁慈而坚定的声音又在他心里唤起了爱的喷泉。每天看见那些没有血色的污秽的脸孔，带红丝的积着眼屎的眼睛和疮疤遍体的身子，他不由得想着福音书里的话：——“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欢笑。”他把实现“主”的这个教训作为他的生活的目标。他带着年轻人的精神整天不知疲倦地劳苦着。他完全忘记了有一个时期曾经被他爱读过的那些文学书籍。虽然他从那个教会医生那里学到的只是有限的医术，此后他也没有功夫继续研究，可是他对医道已感到兴趣，而且决定将这作为终身的职业了。他却没有料到他的父亲又为他定下了新的计划。

这计划的第一步是要他和一个亲戚的女儿结婚，他没有见过那位小姐，可是他同意了。结婚以后他才发觉他得到了一个了解他而又体贴他的同伴。自然，她有一个美丽的外表，但是他注意的并不是她的美。他满意的是那“善良的心”和“聪慧的理解力”（他自己这样对人说）。正如一个著作家所说女人是更容易了解爱的宗教的，所以抹大拉的马利亚当一切门徒都逃掉的时候还站在十字架下面，也是她最先传出看见基督复活的话。他的妻子也是一个了解爱的福音的女人。她给了他不少的安慰和鼓舞。在他那条路上他找到了一个同行的伴侣。现在在翻读福音书的时候，是两颗心跟着那些话悸动。这是他的最幸福的时刻。

他为这幸福感谢他的严厉的父亲：却料不到在很短的时

期以后，父亲忽然发出一个可怕的命令，要他跟着一个朋友到仰光去经商。他又顺从地离开了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去到陌生的外国。那个地方的生活是寂寞乏味的。他每天做些呆板的毫无意义的事情。要不是妻子不断地来信安慰劝勉，要不是他每晚还有翻读福音书的功夫，他恐怕也难支持下去，乐观和信心都会动摇了。天气的炎热和人们对于金钱的狂热，差一点闷杀了他。

但是他竭力忍耐着。一年……两年……他的工作并没有多大的成绩，而商店主人（他父亲的朋友）对他的不满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了。“怎么真的要在现世中实行基督的教训么？这个死读《圣经》的书呆子！”主人在背后这样批评他。主人自己也是基督徒！

在这里他的空时间相当多，他不满意同事们的那些娱乐，为了排遣寂寞，他又找到了那个老朋友——文学。自然他并没有离开他的福音书，不过他同时也很热心地读着他在仰光能够买到的一些文学书籍。诗歌，小说，散文，不论是新的和旧的，好的和坏的他全读了。这阅读给他的世界添了一点光彩，用他自己爱说的话，使他的精神生活丰富些。他觉得所有的书都引着人走向“主”的教训，不管是从正面，或者从反面，就象是万流汇集入海。书本上写出的都是生命的呼声，每个人都希求得着充实的生命。爱使生命繁荣，失去了它，生命就得枯萎。人并不单靠吃米活着。所有那些书本证明了两句话：——“你们拿别人的汗造宫殿的人有祸了，每块石头都是罪恶！”——“牺牲是最大的幸福。”这两句话包括了一切，它们包

括了整个世界。因此在读书的时候，他常常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但是终于彻悟地点头笑起来。

到第四年的雨季，他的父亲忽然来了一封信叫他回国。那个严厉的老牧师倒更象一个带兵的人，永远发布命令，却从不肯对接受命令的人说明理由。这“召回”完全出乎田惠世的意外，不过却是他心里盼望了许久的“好消息”。他可以和他的妻子见面了！他可以离开这个“沙漠似的地方”了！（这是他常常说的话。）这次他非常快乐地顺从了父亲的意志。

回家以后他过了一些愉快的日子。他得着朋友们的帮忙开设了一个西药店。到年终结账药店亏了本，这是很自然的事，他送了不少的药给贫苦的人，亲友中也有一些人不付钱到他的店里拿药。为这件事他受到父亲的责备，可是他自己很坦然，他觉得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

然而两年以后父亲的最后一个命令又突然下来了。父亲在教育界中为他找到了职务，要他在一个月内结束药店到另一个县城去就职。

这次他似乎应该反对，可是他并没有，他连一句不平的话也不曾吐露，好象顺从父亲的意志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

在学校里他做的是行政方面的事，工作使他感不到兴趣，可是他仍旧竭尽自己所能地做去。生活单调，呆板。他在表面上把事务安排得很好，许多人都称赞他，然而他自己有时候却感到了内心的空虚。忙碌剥夺了他的精神生活，肉体的疲倦使得精神渐渐地衰弱了。“软弱”不时来试探他。这个世界还有改造好的希望么？“主”听得见他的呼吁么？为什么他必

须长久生活在龌龊的环境里？近来他翻读福音书的次数也减少了。每天晚上他办完事略略休息，就觉得眼皮沉重地往下坠，他睁不开眼睛，倘若勉强睁开，也看不见什么，他只得简单地祷告几句就上床睡了。日子没有光彩地在他眼前溜过。别人开始说他瘦了，有一次他给父亲写信，无意间表示了要离开教育界的意思，父亲却固执地写了阻止的信来。严厉的责备的句子充满了两张信纸。他没有答辩，他也没有再向父亲提一句离开的话。他只是不住地在给他的妻子的信里诉说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妻接连地寄来了长信用温柔的话安慰他，鼓舞他。在某一封信里她引用了福音书中的一句话：“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只是一句极平凡的话，可是他那天傍晚却沿着学校后面的小河走了两个钟头来思索这句话的意义。在那开始亮起两三颗星子的淡青色天空中，他仿佛看见“主”的受苦的面颜仁慈地对他微笑了。回到宿舍里他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里他读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多么有意义的话，特别在这一刻，他感到了仿佛被一道强的光射透全身似的震动，他非常兴奋，彻夜不能闭眼，已经吹灭灯许久了，他又坐起来，点燃了灯，翻着那本快要翻破的《新旧约全书》，他把《启示录》中的三段话，翻来覆去地读了许久：——“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象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

收割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河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日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了解这些暗示。他为自己构成了一幅新时代的图画。从前的人所写的正是他多时来心里所想的。奇怪的是，《启示录》中的预言似乎和那些非宗教者的社会理想吻合！他在宗教者和非宗教者中间看出了一道桥梁。他的心有时候居然往返两岸。这发现使他震惊，使他惶惑。他再三思索，一直坐到天明。油干灯尽。朝阳从窗外射进金光。疲倦的身子忽然挺直，下垂的头也抬起了。他仿佛成了一个复活的人。他站起来，推开窗。小鸟集在院子里榕树上欢噪。淡蓝的天幕涂上了粉红的云彩。清新的朝气温柔地拂拭他的脸。他忽然从桌子上拿起那本《新旧约全书》对着树掷去。小鸟一下子全飞起来，仿佛整个树都在摇动了。他的眼里全是鸟的影子。接着它们又站在屋瓦上叫起来。书落在—块大石旁边，篇页散脱了一部分，飘落在各处。他惊醒似地开了门跑出去，珍重地拾起书和散页，他一面拾，一面笑。这并不是疯狂的举动。生命无处不在的景象唤起了他那满溢的生命力。他感觉到内部的膨胀。他需要爆发，他需要动，需要笑。他快乐。他觉得自己复活了。

这是最后一次打定信仰的根基了。他战胜了“软弱”的试探，而且比从前更有勇气了。他在心里否定了父亲所信的教义，他更不重视礼拜和祷告以及一切近乎荒诞的传说。他和许多非宗教者做了朋友。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诵读福音书的习惯，他认为这是同“主”晤谈。

这样他的思想和他父亲的思想相差得更远了。要不是他性情温和，他跟父亲一定会发生大的冲突。父亲不会了解他，而且不肯去了解他。那个老的信教者只是机械地读着《圣经》，念着祷告辞，保持自己的干净，严守教条，苛责自己，也苛责别人，不知道宽恕，也不知道了解。但是那个严厉的老人终于被“恨”磨坏了身体和精神，有一天在讲道的时候，正在大声重说着经里的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的高举的手还没有放下来，身子就倒在讲台上。人把他抬回家去。他以后便不能再在讲台上出现。他病了一年才痛苦地死去。

田惠世回到故乡去埋葬了父亲，他一方面哀悼父亲的死亡，另一方面却觉得呼吸得更自由，更畅快了。他又起了离开教育界的念头，后来还把这个心思对他的妻子谈过。妻并不反对他这个心思，不过也不十分鼓励。他想再开设药房，或者重理医业，可是他又耽心这些年在教育界的生活使他荒疏了医学，他不能做得象从前那样地尽责。在他这样踌躇着的中间，好几个年头又过去了。这都是一些平淡的岁月。日子过得不快不慢，不好不坏，没有大的欢乐，也没有大的痛苦。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他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渐渐地长高，都已

经进学校读书了。

这种清苦、平淡的生活也很容易消磨人的精力。要不是一个颇为知己的友人从上海接连地写信来邀他去帮忙编辑一个带文艺性的刊物，他也许会在教育界中度过他的后半生的。事实上他却接受了那位朋友的邀请，带着家眷到上海去了。

那是七年前的事。他对编辑刊物的工作感到大的兴趣。他现在有机会同更多的文学书报和研究文学的朋友接触了。起初是他同那位朋友分担编辑的工作，后来他从朋友的手里接过来整个的事业。他把全身心放在这个事业上。从刊物销数的增加和读者来信的赞誉中他看出了自己努力的成绩。“把你相信的去告诉别人，”仿佛有一个熟习的声音时常在他的耳边说。如今他真的把他的思想传播出去了。他也是在传播“喜音”！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他为它忙碌到连休息和睡眠的时间都牺牲了不少。可是他反而觉得精神爽快和身体健壮了。

抗战爆发后，国军撤离上海，他的刊物因为热烈拥护抗战的缘故，不能在租界上继续发行，他和两个同事带着几大箱稿件、账簿、纸型等等迁到广州。广州接连的大轰炸并没有妨碍他的事业的发展，刊物的销路反而不断地增加。他对工作的热心和对危险的镇静使他得到新旧朋友的称赞。他同朱素贞认识也是在这个时期。那时他的第二个儿子世清从上海出来，在广州一所私立中学里念书，他的女儿动身到重庆去念大学。他的妻因为体弱多病带着大的儿子留在上海。广州沦陷时他带着世清差不多和素贞同时逃出来，都走过不少的地方。

世清留在昆明念书，他为了刊物的缘故和同事们又到香港住了十个月光景，刊物也在那边继续编印，由邮局大量寄到内地来。到这一年他决定把刊物迁到内地出版，一个人先到世清念书的这个城市来作迁移的准备。在这里他又遇到了素贞。他从素贞的口中，常常听到文淑的名字和她的一些事情。他知道文淑要来；可是等不及跟她见面就匆匆地到香港去了。他却没有想到晚上他会在湖上遇见她们。

四

“这是缘啊！缘啊！”田惠世说着又哈哈地笑起来。他用力把杯子放到桌上去，杯子碰到桌面发出“砰”的一声。使得那个始终带笑听他讲话的田太太吃了一惊。素贞也把头动了一下。文淑望着那张带着快乐表情的脸，她也笑了起来，田太太也微微笑了，连素贞也微笑了。世明、世清两弟兄从走廊上跑过来，问他们母亲为着什么事情发笑。他们也笑了。

“的确，这是缘，”田惠世接着说，“我跟朱小姐在广州遇见认识，后来逃难在路上又碰到。我跑了几个地方都碰到她。回到上海我又认识了刘先生。后来再回到内地，又在这里街上碰到朱小姐，今天晚上又在湖上碰到，还见着冯小姐。我们跑来跑去，好象你追我，我追你，你躲我，我躲你。想不到会碰到，却偏偏一次一次地碰到了，就好象有一只手提着我们在动一样。这就是缘啊！”他又满意地笑了。

“对啦，打仗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很巧的事情，我在后方，在前线碰到好些朋友，都是很巧的，”文淑点头说。她看见别人都不讲话，便接下去说：“不过我对田先生刚才说的话还有点不了解。田先生太看重福音书了。我想如果把福音书当作小说故事看，那倒不要紧。其实……”她觉得素贞在旁边带

着暗示的意思轻轻踢她的脚，可是她仍旧说下去：“我也没有好好读过。从前有一回在朋友那里见到一本《圣经》，拿起来翻翻，读了两三段觉得很好，可是借回家去细看，又看不下去了。我始终不相信上帝。”

田惠世止了笑，用和蔼的眼光看看文淑，温和地说：“你仔细读过一遍，你就会了解的。上帝是一定有的，不管在什么地方，甚至就在我们的心里。”

“既然在心里，那么就是很抽象的了，”文淑说。

“怎么会是抽象的呢？”田惠世反问道。

“这是说，上帝是依靠我们存在的。没有我们，就没有上帝，犹如没有肉体便没有精神。”

“可是有的人死了，精神还存在呢，”田惠世理直气壮地说。

“那是靠着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并没有一点神秘，”文淑不加思索地笑答道。

“那么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不否认爱罢？”田惠世问道。

“从我们的生理的需要，从我们的生活的需要，从我们的社会本能……”文淑昂头应道，可是没有说完，就被田惠世带笑地打岔了：

“我知道，这就是社会性，还有同情，互助。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没有上帝，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社会本能。没有上帝，就没有爱……”

“我不相信，”文淑也笑着打岔道，她摇了摇头。“我要爱，只是因为我想爱，我需要爱，我心里充满着爱的情感，或者我

受到别人的好处，或者别人引动了我的情感。绝对不是上帝叫我爱，不是因为有了上帝我才爱。”

“那么你相信奇迹吗？这的确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你又怎么来解释呢？”田惠世兴奋地问道。

“我不相信奇迹，不过我承认信仰的力量。我一辈子就没有见过奇迹。素贞，”文淑忽然掉头看素贞，“你见过奇迹吗？”

“我倒等着奇迹呢，”素贞自语似地答了一句。

“我说的奇迹跟你说的信仰的力量大约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有信仰，才有力量，才能够做事。人必须有信仰，”田惠世接着说。

“不过要信仰并不一定信仰上帝，信仰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譬如革命家，他们里面也有很多的殉道者，”文淑起劲地说，她愈辩愈感到兴趣了。

“不过你看究竟是革命家多，还是信仰上帝的人多，”田惠世说，忍不住噗嗤笑起来。

“信教的人多，吃教的人更多，”文淑也笑着答道。

“文淑！”素贞打岔地唤道，她耽心这句话会使田惠世不高兴。

“不要紧，不要紧，”田惠世笑着对素贞摇手道：“冯小姐讲的也是真话。这也是免不了的。花园里面花也有，草也有，不能全是好花。”

“那么，田先生，你就是花了，”文淑含笑说，这时素贞又在用脚踢她的鞋尖。

“冯小姐讲话真有趣，”田太太在旁边笑着说。

“好了，好了，”素贞温和地劝阻文淑道。

“田先生，你还记得《沙宁》里面的一段话吗？”文淑忽然想起一段话，她不理素贞，却继续谈下去。

“我记不起了，”田惠世摇摇头答道。

“我记得几句：基督教：和善，谦卑，并且给人许多未来的福，它反对斗争，说着永久幸福的幻影，把人类催入甜蜜的睡眠。……还有，它将生命的重心转移到未来，到一个不存在的梦境中。因此一切的生命的美丽都消失了；勇敢，热情，美丽，一切都死亡了；只有一个责任存在着，还有便是一个未来的黄金时代的梦……”①

“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田惠世坚决地否认道。他奇怪冯文淑怎么会背出这样的一段话？这不是对他的信仰的一个大打击，可是他知道他一时说不出适当的回答使她信服，而且争论是不会得到结果的。他太太的眼光也在求他停止争论。他迟疑片刻，现在决定把这个争论结束了。他便接下去说：“不过冯小姐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好象你专门记住这些话来跟我争论一样。”他还没有把话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文淑，不要再讲了，我们应该回去了，”素贞低声对文淑说；她没有听见文淑的回答，便又加上两句：“月亮钻进云里去了。现在也有些冷了。”

文淑正在笑着，听见素贞的话，才注意到天上起了白云，而且云把月亮遮住了，平台上显得阴暗起来。她又觉得身上

① 借用郑振铎同志的译文。

有了一点冷意，于是也起了回家的念头。她便站起来说：“田先生，下次再来辩论罢，现在我们要回家了。”她笑了笑，又说：“我今天刚刚读过这本书，所以还记得几句。”

“不要紧，还早！”田惠世兴致勃勃地挽留道。

“时间不早了，”素贞也站起来说：“田先生，谢谢你的好茶，到现在我嘴里还有香味。以后还要常常来喝茶。”

“欢迎，欢迎！”田惠世高兴地说，他也站了起来。

“请多来，”田太太站起来客气地说。世明、世清两弟兄也说：“请常常来玩。”

冯文淑走在前面，快走到门口了，她忽然站住，转过身子问田惠世道：“田先生，你的刊物——不，我应该说你那个淘气的孩子——是不是要在这儿出版？”

田惠世的眼里突然闪出光来，他似乎满意地笑了。他点着头说：“是的，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搬到这里来的。”

“那么什么时候出呢？我们等着拜读啊。”

“快了，快了，”田惠世答道：“将来还要请你们指教啊。”

“指教？”文淑噗嗤笑了。

“还要请你把战地生活的经验写出来，给我那个淘气的孩子，”田惠世又补上一句。

“我哪儿会写文章，田先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文淑笑道。她又侧过脸对素贞说：“素贞，我们快走罢，田先生向我拉起稿来了。我以后也不敢再来了。”她连忙跨出门槛踏着楼梯走下去，素贞跟在她后面。田惠世一面带笑地嚷：“不要忙，不要忙，我不强迫人写文章，”一面领着两个孩子下楼去送客人。

他一定要把她们送到巷口，叫两个孩子在门口等他。

她们走出巷子，沿着湖畔的石板路走去。走了十几步，她们要转进湖上石牌坊的大门了，隐约听见田惠世的声音在后面唤她们，便回过头去看。这时明月刚出了云堆，向碧海飞去，湖上被照得十分明亮，石板路象一条白带子，田惠世在巷口立着，他的颀长的身子挺起来，右手伸得高高的，对她们不停地挥动。月光使他的瘦脸显得更和善，更清纯了。

“请回去罢，请回去罢，”两个女子同时挥着手大声说。她们见他掉转身子回到巷里去了，才走进石牌坊去。

“你以前见过象这样的老头子没有？”文淑忽然问道。

“好象见过似的，”素贞答道；接着她又摇头说：“不，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我觉得他很可爱，”文淑满意地说。

“我也喜欢他，他是个难得的好人，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做朋友呢？年纪差了这么多，”素贞答道。

“不过他那个淘气的孩子我并不喜欢，”文淑说。“它出了那么多期，我却没有好好地读过一本。那个刊物上虽然登了不少宣传抗战的文章，可是并没有明确的主张。”

“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明确的主张。不过内容太杂，田先生自己的文章又有点婆婆妈妈气，”素贞说。

“说得好，婆婆妈妈气，亏你想得出，”文淑满意地笑道。

“不过他办刊物的精神倒是难得的，”素贞又说。

“我觉得太可惜了，他拿这种精神做别的事情，岂不更好，”文淑说。

“这也难说。反正他自己满意就是了。他既然有了信仰，传道也就是他的使命，”素贞想了想，才说道。

“可是他的刊物也说不上传道。你不是说过内容太杂吗？我看他选稿标准太宽了，”文淑因为素贞不赞成她的意见，便加重语气地说。

“也不能一概抹煞，他也有他的道理。他的刊物上容纳各种文章，正可以看出他的宽宏大量。我并不信基督教，不过也不反对，”素贞声音平静地说。

“我明白，我还记得你先前那句话，你在等待奇迹啊，”文淑带点讽刺地说。素贞不作声，文淑马上后悔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拉着素贞的手，柔声说：“我不该这样说，好姐姐，你饶我这回罢。”

“为什么，我——”素贞的话突然被打断了。路旁树丛后面跑出来一个黑影，一只手伸到她们的前面，一个带哭的声音哀诉道：“小姐，行个好罢，你们有钱人不在乎。给我一块钱吃两碗米线也好，可怜我一天没有吃东西。”

两个女孩大吃一惊，楞了片刻，不知道应该怎样办。以后她们定下心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只是一个讨饭的女人，黑黑的瘦脸，干瘪的嘴，血红的眼睛。素贞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叠角票给了她。

“谢谢你，小姐，谢谢你，”女人接到角票，感激地说。

“你是江浙人？”文淑在旁边问道。

“我是从南京逃难出来的。在贵阳一家人都给敌机炸死了，我一个人流落到这里，生了病，没有办法，只好不顾羞耻出

来讨饭。……小姐，我从前也是个念书人啊！”她一面说，一面流泪，说完也不等文淑答话，就躲到树丛后面去了。她来得象一个影子，去得象一个影子。

文淑打了一个寒噤。她忽然忧郁起来，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了什么缘故。她生气般地对素贞说：“对这样的事，不知道田先生怎样说法？对这种人，他的上帝能够给她什么呢？”

“死后的天国罢，”素贞自语似地说，文淑看不出她是在认真说话，抑或话里有讽刺的意思。

“死后的天国对她现在有什么用处？况且有没有还是问题！”文淑气恼地说。“撇开这些人，空口讲爱的福音，那是欺骗！”

“我又不是信教的人，你跟我讲这种气话做什么？”素贞抱怨道，她因为自己回答不了文淑的问话而感到苦恼了。

就在这个时候田惠世正坐在自己的房里翻读《沙宁》。他在文淑和素贞走后，还同他的太太、儿子谈了一些关于这两个小姐的事情。在谈话中他忽然想起文淑引用的小说《沙宁》里面的一段话，便问世清可不可以在朋友处借一本《沙宁》来。他只是顺便讲一句话，他几年前读过这本书，对故事并不感到兴趣，因此没有读完就搁下了。凑巧世清手边有一本《沙宁》，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一个朋友寄放在他这里的，他读过几十页不大懂，便放在一边不去理它了。这时他便为他的父亲把书找出来。

田惠世读的是第二十四章中几段论基督教的话。

基督教是没有将来的。如果在它发展的顶点时，基督教还不能胜利，却只成了一群虚伪者的工具，则在今日而欲希望一个奇迹，乃是很荒谬的念头。……

这是什么话！多么武断！

最坏的是每一次改进了人类的生活，常常是要因流血反抗而始告成，虽然人们总是要将慈悲与爱怜作为他们的生活与行为的基础。全个事件的结果便是，一幕愚蠢的悲剧，虚伪，伪善……

这又是什么话！

在它的与人类兽性的冲突上，基督教却已自己证明了与一切别的宗教一样的无能。

然后他又读着文淑引过的那段话：“正当那些被践踏的人决心要推翻事物秩序的不平时，基督教便出现了，和善、谦卑……反对斗争，说着永久幸福的幻影，催使人类入于甜蜜的睡眠……将生命的重心移到了一个没有存在的梦境中……”

“武断！武断！”他气愤地自语道，“他们没有了解福音书的真义！”他不想再读下去，就阖了书站起来。可是他的平静的心境似乎被扰乱了。妻在旁边柔声催他就寝。他温和地回答了她，他想出去在平台上闲踱一会儿。妻也没有讲什么，便先睡了。他穿过客厅，世明弟兄的房间里没有灯光，也没有声音，他们已经睡熟了。他轻轻地走过他们的窗下，踏进了平台。

天空没有一片云，明月早已越过他的头顶偏向西方了。从墙脚唱起来小虫的幽扬的鸣声。古旧的城楼和城墙静静地立在隆起的土坡上，枝叶稀少的老树象几个寂寞的老人把瘦长

的身子倚在城楼旁边。夜是相当静，相当凉爽。他走了两转，还是不能静下心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心里翻腾似的。“武断，”他不能自主地低声吐出了这两个字。可是他的心还是不能安定。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些事情，不是奇迹，只是一些普通的、他常常看见的事。“为什么经过了一千九百多年人们还不能好好地生活呢？”一个声音在他心里问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人不认识主？”他抬起头望天，找不到一个回答。平台下面忽然响起一阵喁喁的私语声，然后又是年轻女人的笑声，空气里开始渗进了一种古怪的气味，这是他闻惯了而又极讨厌的鸦片烟的浓香，他知道这是从他脚下那间屋子里送出来的。那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两个人白天睡觉，晚上起来，除了跑警报的时间，他不会看见他们。“为什么容许这样的生活？”他这样一问，在他的脑子里便渐渐地浮现了贫穷、残杀、痛苦的景象，他仿佛落进了罪恶的海里。他记起了刚才读到的一句话：“在它与人类兽性的冲突上，基督教却已自己证明了与一切别的宗教一样的无能。”他现在看出这个非难里面含着多少的真实了。经过一千九百多年，连这一方面的胜利也没有能够完成，在“主”以后，就没有再现出一个奇迹。为什么？他不能明白。他开始为这个感到烦恼了。他走着，又走着。他感到徬徨的痛苦。“试探”，这两个字从他的脑中掠过。他觉得心更乱了。他不禁绝望地低声对着天嚷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话刚吐出口，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怎么他会念出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基督为了人类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为什么现在就不见一个信徒为人类牺牲？

没有牺牲，怎能有胜利？他觉得思想找到了一条出路，脑子里突然爽快了，眼界开朗了。“是主的启示么？”他感动地喃喃说道。

用牺牲代替谦卑、伪善的说教，用爱拯救世界，使慈悲与爱怜不致成为空话，信仰不致成为装饰。要这样做，基督教才能够有将来，才能够战胜人类兽性，才能够把人们引进天国。——这一个结论使他的心安定了。他恢复了他的乐观，他的勇气。他象一个战士似地挺直了身子，他在心里说：“我要奋斗，我要为建立真正的主的教义奋斗！”

“爸，你还不睡觉？”世清的声音使他略略吃了一惊。他掉头一看，世清穿着一件汗背心，光着两只膀子站在他面前，一双眼睛仍然带着睡意。

“你起来做什么？不冷吗？”田惠世慈爱地问道。

“我不冷。我睡醒了一觉，听见脚步声，知道你还没有睡，才爬起来看看你。”世清亲热地说，他微笑了，他笑得多么纯洁。“爸，你睡罢，你白天也够辛苦了。”

这纯洁的微笑给他的心带来不少的温暖。他的心更安定了。爱的喷泉又在心中涌起来。“试探”已经过去，他不再徬徨了。他亲热地拿着世清的手，柔声说：“好，我们都回屋去睡罢，”便往走廊上去了。

他一脸欣慰的微笑，象一个满开了小花的花坛似的。世清觉得父亲的脸今天晚上特别好看，可是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样快乐。

五

早晨，田惠世醒得迟一点，其实天还未大亮时，他已经醒过一次，不过后来又睡去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在前一个晚上睡得晚，并且想得多。

日光照在白纸糊的窗上，连屋子里也给染上了一层金色。他的妻子到下面厨房里去了。房里非常静，门仍旧掩着。窗外平台上有人在讲话。语声低，谈话的是他的两个孩子。他这时并不用思想，心也十分平静，因此无意地把孩子的谈话听进了一些。

“奇怪，怎么爸今天还不起来？”世明的声音。

“让他多睡一会儿，他太累了，”世清的声音。

“我看他精神倒比从前好一点，因此妈也很高兴。”

“我怕他心里有什么事情，昨天晚上我睡了一觉醒来，还听见他的脚步声，我起来看，原来他一个人在平台上走来走去。我轻轻走出去，听见他在说：‘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有什么痛苦吗？他为什么又不对我们说，让我们也给他分一点去。我在廊上站了好一会儿，才走过去唤他。他看见我，便拉住我的手说了一句：‘回屋去睡罢，’他又笑起来，好象他又高兴似的。以后我们就进

屋睡了。今天他到现在还没有起来。我耽心他昨天晚上回屋后还是没有睡觉。不知道他的心里究竟有什么事情？”世清带着极大的关心说。田惠世听着这个多少还带一点孩子气的声音庄重地、焦虑地谈论他的事情，他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那么他心里究竟会有什么事情？问问妈，妈一定知道，”世明沉吟地说道。

“我看妈不一定知道，妈知道了也不会对我们讲。不如我们自己留心观察，”世清说。

“你说是不是为了杂志的事情？”世明又说。

“也说不定，他为了这个杂志也苦够了，还是没有弄好。我将来读毕业一定给他帮忙，”世清说。

“中学毕业还有大学，那么还要等好几年。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帮他做点事情，就只是他不肯，他总说我们还是小孩子，应该好好读书，”世明说。

“我也不想念大学。我只想中学毕业就跟爸一块儿做事情，好好地跟他学习也是一样的。我看见他这几年跑来跑去也太辛苦了，固然是为了他那个杂志，一半也是为了我们大家的生活啊，”世清说。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太爱我们，他不肯让我们分他一点劳苦。爸脾气虽然很好，却有点固执，他不肯叫我们帮忙，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忙，只好忍耐着，等到将来念完大学再说，”世明说。

“我希望我明天就长大起来，爸就不再说我是小孩子，我就可以替他做事，”世清说。

世明笑了，他说：“你真是个小孩，怎么说出这种孩子气的话！哪儿有一天就长大的道理？要是真能够这样长，那么你会长得比爸更老了。”

“那么我就摩摩我的白胡子对爸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管我的这些事情，你好好地去念你的书，’……”他噗嗤地笑起来。

世明哈哈地笑问道：“那么你究竟有多少岁？你叫爸做年轻人！”

“至少总有七八十岁罢，”世清笑答道。

田惠世也忍不住在床上笑起来。他拿起枕边一张手帕，揩了一下嘴唇和胡须。

“嘘，爸醒了，”他听见世明低声对世清说。“都是你笑得不好，把爸吵醒了。”

“你也笑的，”世清轻声答道；“我们不要再讲了。我下去告诉妈，给爸预备早饭。你给爸倒脸水。”

“你不是说让他多睡一会儿吗？”世明说。

恰恰在这时田惠世无意地在床上咳出声嗽来。

“爸要起来了，我们进去看看，”世清说。

田惠世轻轻地掀开薄棉被，把帐子撩开一个角。他脸上浮着微笑，一对喜悦的眼睛望着房门。过了片刻就从那门外转进来两个面貌相似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同样的白府绸衬衫，同样的黄卡叽西装裤。椭圆形的脸庞上露出和阳光一样明亮的笑容。

“爸，你醒来了，”两弟兄差不多同声说。他们走到床前把

帐门挂起。

“我起来了，”田惠世微笑道，他慈爱地望着两个孩子。“你们刚才在讲什么话？”

世清对世明眨了眨眼睛，便答道：“我们随便讲些闲话。”

“我都听见了，”田惠世笑着说，“你们不要瞒我。”

世清对世明做了一个鬼脸，世明笑出声来。世清俯下身，笑着问：“那么你答应我们给你帮忙吗？”世明也把身子俯下去。

田惠世摇摇头，笑答道：“不行。我还是要你们读书。只要我能够供给你们读书，我不会让你们做事。”

“那么爸，你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了，”世清没有办法，只好开玩笑似地再问一句。

“不错，”田惠世笑道。他看见这张年轻的脸上有一种近于滑稽的失望的表情，他亲爱地用手拍了拍世清的头，又和蔼地看了世明一眼，责备似地说：“你们这两个顽皮的孩子。”

“世清，我去给爸预备洗脸水，你不是要去告诉妈说爸起来了么？”世明对他的弟弟说。

“去，我们一块儿去，”世清说。他对父亲笑了笑，然后转身跟着哥哥出去了。

田惠世的慈爱的眼光把他们的背影送出了房门。然后他躺在床上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他安慰地想：我并不是孤独的。他觉得心里非常畅快。他闭上眼，带着感激地轻声说：“我的上帝，你并没有离弃我。”

他下了床，走到书桌前面。桌上放了几封信，用砚台角压

着。他把信拿到手里。信一共四封，他就站在窗前拆开了：三封是投稿者的来函，另一封是一家印刷所经理写来的，通知他说他提出的办法可以接受，请他这天下午到印刷所商谈订合同的事。他看完信，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心里想，事情总算有头绪了。投稿者的来信中有一封是附寄了稿件的，那是一篇战地通讯，内容还不错，就是文字差一点，还夹杂了几个别字，他看到一个别字，就要皱一下眉头。

世明在外面唤他出去洗脸，他答应着，就放下手里的稿子，走出房去。

右边的平台上摊开一片金色的阳光。两盆海棠放在亚字栏杆上，两盆月季放在梅花墙上，都是刚刚开花，现出欣欣向荣的样子。世明立在栏杆前，他的梳得光光的头发沐着朝阳的光辉，显得非常光滑，他一对不怎么大的眼睛带着可笑的神气，不住地闪动。

他走进平台，看见脸盆盛着水放在栏杆上面。他弯下身子在洗脸，忽然听见世明在旁边说：“爸，姐姐有信来了。”他马上抬起头问道：“信在哪里？”一面还在用湿毛巾揩脸。

“在妈那里，妈已经看过了，我去拿上来，”世明答道，他便转身向门走去。他刚走了两步，忽然被父亲唤住了。

“信里讲些什么？她好罢？”田惠世问道。

“姐姐说，她知道爸跟妈出来了，高兴得很。她想到这里来跟我们大家聚一聚，住两个月，”世明答道。他又兴奋地加一句：“爸，请你写信去叫她马上来。”

田惠世不回答世明的话，却再问一句：“她上次不是说，她

暑假要到同学亲戚家里当临时家庭教师？”

“她已经做了家庭教师了，不过，她说反正是临时的，就是马上辞职也不要紧，”世明答道。

田惠世放下毛巾，摇了摇头，说：“这不大好，既然答应了别人，就应该尽责。”

世明碰了一个钉子，就不响了。他偷偷地看他的父亲。他看见父亲脸上仍然带着慈祥、和蔼的表情，又有了勇气，便央求道：“姐姐跟爸也有两年不见面了，跟妈更久一点。她想来看看大家，也是合乎情理的。姐姐原先没有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才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田惠世侧过头看了世明一眼，笑了笑，温和地说：“我也想见见她，我也盼望她能够来一趟。不过她既然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不该中途走开。”他耽心世明还不了解他的意思，便解释道：“一个人做事应该有始有终，应该负责到底，先求对得住别人，然后再顾到自己。别人比自己更重要。自己多受点委屈，多吃点苦，是不要紧的。”

世明低下头不作声。田惠世怜悯地看了看他，慈爱地问一句：“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了，”世明低声答道。他抬起头看他父亲，亲爱地说：“爸，你快刷牙罢。”从他的眼角绽出了两滴泪珠。

“你哭了？为什么？”田惠世惊讶地问道。“我的话使你失望罢。”

“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听着，我就想哭了，”世明揩了揩眼睛回答道：“爸，我相信你的话，我听你的话。”

田惠世感动地微微一笑，说：“那么你不要哭了，下去给你妈帮忙罢。我很高兴你这样说。”

田惠世刚刚刷完牙，便看见他的太太同世明弟兄提着稀饭罐子，端着几碟小菜走上楼来。他抱歉地对太太说：

“今天我醒得迟。其实你们可以不等我。”

“我们都不饿，”田太太笑答道。

这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小圆桌旁边吃稀饭。他们照例在举箸前做了片刻的默祷。田惠世本来对这种仪式并不重视，不过为了尊重他太太的意见，他也让他一家人奉行它。他做这样的默祷时，埋着头他只有一个思想：感激。这不一定是对上帝的感激，这可以说是对一切人的感激，对种田的农人，对挑米的工人，对供给他各种食物的各种人，对过去和现在对他的生存直接间接有过帮助的人。由感激而生爱，他对他的孩子们就这样实施着一种爱的教育。孩子们也能了解他的思想，甚至也信仰着同一的教义，不过他们没有达到他的那种深度和高度。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还是太浅，他们还没有经历到他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但是孩子们爱父母是平常的事，何况这里又是一对了解爱的父母。因此，全家的人聚在一处吃饭、喝茶、谈天的时候，整个屋子里都充满和平、甜蜜的爱空气。望着彼此的笑脸，四个人都有同样的一种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为了自己，对世界不应该再有所要求了。大家都感觉到再没有比这空气更舒适的了。众人随便谈话，没有拘束，也没有放肆，谁都可以坦白地献出自己的心。

这应该算是幸福的家庭罢，——田惠世望着妻儿的笑脸，

他这样地想道。他想到自己所享受的幸福，同时就记起了自己肩上的重担，那就是对社会、对同胞的责任。他有时想起彼得看见“主”复活的故事，在默祷辞中他会加上一句：“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我的同胞。”这是他的独特的地方。他违反了通常的习惯，他一直追到“主”的思想的根柢了。

这个早晨，他们谈的全是世明弟兄的姐姐的事情。姐姐比世明大三岁，名叫世慈，在重庆一所国立大学教育系念书，下学期开学时便是三年级生了。

“世慈现在一定瘦了，这两年来她在学堂里吃得坏，”田太太关心地说。

“她信上不是说在吴家过得很好吗？还说饮食起居都不坏，她平日心地开阔，我看不会瘦的，”田惠世微笑道。他的眼前立刻现出他女儿的带笑的面颜，还是那么可爱，那么亲切，脸黑黑的，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两根辫子垂到前面来。

“要是她能够来一趟，大家聚一聚，住上一两个月，那多好！”田太太接着她自己先前的话说下去。

“这有什么办法呢？她已经答应了吴家的事，走不开了，”田惠世安慰地说。

“我知道，我们只好等到寒假了，”田太太带点怅惘的神气说。

“寒假不成，寒假短，只够她来回跑一趟公路，来了也住不了几天，刚见了面又要分别，更使大家难过，”世清在旁边插嘴道。

田太太听见这样的话，也不去看世清，她想了想，又自语

般地说：“那么坐飞机也好，听说不太贵，来回不上一千块钱。我还有点金器，拿去换了寄给她做路费也够了。”

“你真的要世慈寒假来，我们就写信去要她来一趟。路费自然由我出，我不让你花钱，”田惠世温和地说。

“女儿是我们两个的，为什么我不该花钱？”田太太微笑道。

“我现在能够设法，自然不让你花钱。要是我有一天破了产，连我那个淘气的孩子也要交给你养的，”田惠世说，他哈哈地笑起来。

田太太起初楞了一下，不知道她丈夫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后来看见田惠世的愉快的笑脸，她马上明白了。她也笑起来。她也开玩笑地说：“那不是我生的，那是你一个人的孩子，我养不了。你问问世明、世清，看他们肯不肯认这个弟弟？”

世明弟兄都在笑，听见母亲的话，世清半开玩笑地答道：“爸太爱这个淘气的弟弟，我们都有点不平。倘使爸不拿我们跟他一样看待，我们就不认他。”

“你这个调皮的孩子，不要开玩笑。你们不要忘记今天给姐姐写信啊。你妈也写，我也写，我们大家都写，让她多接到几封信，她也会高兴些，”田惠世微笑道，他满意地摩了摩胡子。

一家人的谈话就在这种和平、快乐的气氛中继续下去，大约继续了半个钟点。两个孩子帮忙着母亲把碗碟罐子等等拿下楼去。父亲便出去找人挑水。

田惠世找到挑水人讲过话以后回来，正看见世清从厨房

走出，他便唤了一声：“世清，”一面点着头示意这个孩子到他的身边去。

“你真的不想进大学？”他没头没脑地问道。世清摸不清他的意思，一时答不出来。

田惠世拿起世清的左手，和蔼地笑了笑，说：“你还说不说要给我帮忙？”

世清明白了，他连忙回答：“爸，我完全听你的话。你叫我怎样办，我就怎样办。就是不念大学，我也不会懊悔。”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等候父亲的回答。他想父亲今天第二次跟他谈这件事情，一定是父亲改变主意了。

“等你高中毕业再说罢，”田惠世笑答道。

“那么明年暑假我就在你的手下做事了！”世清高兴得跳跃地说。

“明年暑假你多少岁？”田惠世忽然又问一句。

“十八岁，”世清正经地答道。

“太小了，还是多读两年书罢，”田惠世忍住笑又说了一句。

“你已经答应我了，你已经答应我了，爸，你不能反悔的！”世清拉着父亲的膀子笑嚷道。

六

刘波的信终于来了。信封上贴着香港的邮票，素贞看完信，使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念出下面的两段给文淑听：

……我寄过几封信，怎么你都没有收到？难道全遗失了，或者发生了问题？最近上海环境更坏。自从上月法国战败投降后，敌伪对法租界的压迫一天一天地厉害起来，法租界当局失了靠山，只好一味退让，徐家汇天主堂一带地方奉送给敌人了，法院也准备交出去。并且答应敌人随时进租界捉人。前几天早晨五点钟敌人进法租界大搜查，捉去十几个人。搜查前十多个钟头我们就得到消息，大家忙了一夜，到五点钟时，只听见郊外的枪声，却不知道搜查已经开始。我的住处未遭光顾。只是朋友中有一个人被抓去了。他是《中美日报》的编辑，本来报馆方面得到消息最早，重要职员都早早办完事走了，我那个朋友同编辑部几个同事等着把第二天报纸的稿子发齐就匆匆离开报馆，躲到一个亲戚家里去。却没有想到那个人家被搜查了，因此他也被抓去了。听说他现在关在极司非而路，他们正强迫他投降呢。今年一年中我们一块儿做事的人被敌伪抓去、绑去的一共七个人，这是第七个。另外有两个朋友被暗杀了。不过我们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只是不便在信里告诉你。其实我这封信还是托一个朋友带到香港寄发的，因此我才写了这些罗嗦的话，你看，我们在这种环境里还过得很好，你就用不着替我们

耽心了。……

我早就听说文淑回到后方来了，得你的信才知道她现在跟你住在一块儿，你们分别几年，一旦相聚，一定很快乐，我也替你高兴，请代我问候她，我想她一定还记得起我。你对她说，刘波还在想念她，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爱翘嘴巴？是不是还爱穿红毛线衣？是不是还爱吃刨冰？……

“岂有此理！我又没有得罪他，他为什么要挖苦我？”文淑睁大眼睛笑骂道。素贞也忍不住笑了。

“以后呢！再念罢，”文淑又说。

“没有了，”素贞含笑地答道，就把信纸折起来。

文淑看了她一眼，说：“有是有的，不过你不肯念就是了。”

素贞微微地红了脸，压低声音答道：“别的话都跟你没有关系。”她又提高声音加一句：“我不骗你。”

文淑亲密地拍了拍素贞的肩头，笑着说：“我知道，我不会看你的情书，你放心。……收到刘波的信，你也可以放心了。不过今天要请客啊，这是喜事。”

素贞暗暗地点了点头。“喜事”这两个字说准了，刘波在信末加了一段话：

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工作三个月以后便可以告一个段落，那时我要离开上海也没有问题，因此我想到你那里走一趟，其实在内地做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也应该换换空气了。至迟今年年底我一定可以站在你的面前。这次我决不会使你空等，我不会对你再失信了，你不知道我多么想见你一面，听你的声音，看你的笑容。我多么渴望拿着你的柔软的手，吻一吻你的热烈的嘴唇！

单单凝视你的照像，朗读你的来信，是不能压下我的热情的。……

素贞想到这最后的几句，她的眼前浮现了刘波的瘦长的身子、黑黄的长脸和那对奕奕有神的眼睛，她不觉微微笑起来。但是她马上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她用话回答文淑的逼视的眼光：“我请，我请。”

“那么请在什么地方？”

“你说罢。”

“西餐好不好？算我今天敲个竹杠。”

“你这张嘴真该打。人家好意请你吃饭，你还说什么竹杠不竹杠！”素贞笑骂道。接着她又正经地说：“只是我还想请一个人……”

文淑不等她再说，就接下去问道：“是不是田惠世？”

“奇怪，你怎么一猜就猜着？”素贞笑道。

“你不是说过要请他吃饭吗？这个老先生怪有趣的，五十多岁的人笑起来就跟小孩子一样。我真喜欢他，兴致那样好，一天笑嘻嘻的。他也关心刘波的事情，我知道你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文淑答道。

素贞正要讲话，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在叫“素贞！素贞！”那是住在对面房间里的谢质君，一个身材高高的、瘦瘦的女同学，她站在门外伸了一个头进来，一张相当美丽的苍白色的瓜子脸上淡淡地施了一点脂粉，两根细长的辫子垂到胸前来，使她显得年轻。她笑着唤了一声：“冯小姐，”接着问道：“你们出去吗？”

“我们等一下才出去，”素贞答道。她看见谢质君手里拿

了一把伞，腋下挟了手提包，便问一句：“你现在出去吗？”

“我有一点儿事情，”谢质君答道，把她的伞微微摇动了一下。“那么我先走一步。”她迟疑一下，又说：“回头吴其华来了，请你告诉她，我有一点儿事情不等她了。”

“不过……”素贞的话没有说完，就被谢质君打断了：

“你们出去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在门上留得有字条。好，回头见，”谢质君匆匆地说，她又笑了笑便转身走了。

冯文淑连忙跑到窗前，正看见一个穿白色西装的男子站在院里梅花树下，他刚刚转过身子，准备同谢质君往外面去。文淑瞥见了他的脸：长脸，大眼睛，漆黑的眼珠；还有高身材，宽肩膀，细腰……

“怎么温健又把吴其华‘刷’了？真快啊！”文淑回过头来笑着对素贞说。

“这是谢质君的本领高。不过温健这个人除了相貌漂亮外，就一无可取。其实谢质君何必多此一举，她不见得会跟他好到底，”素贞说，她皱了皱眉。

“我觉得还是谢质君比吴其华好。吴其华，单是她那吃吃的笑声就叫人受不了，”文淑说。

“你这样说，好象你就是温健，”素贞微笑道。“我看谢质君也不过逢场作戏，她是个最看不起男人的人。”

“你怎么知道？”文淑忽然问了一句。

“她自己常常这样说。我也见过她跟几个男朋友好过，后来都闹翻了。我还劝过她，她不肯听我的话，”素贞答道。她看见文淑的脸上还带着疑惑的神气，便接下去说：“就在你来

的前两三个月，有个年轻人从她家乡跑来看她。那个人是她中学的同学，还是她一个远房的亲戚，我觉得人还过得去，老实，却不带傻相，相当聪明，谈吐也不错。他待谢质君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住在旅馆里，一大早就跑来看她，约她出去玩，每次来总要带来一些礼物，不是花，就是吃的，穿的，也送得有书来。他花了不少的钱。可是不知道怎么样，谢质君总不喜欢他，跟他玩了不过十天，就跑到××村去躲起来，留了个字条说是到重庆去了。那个人还痴心等了一个多星期。他还是每天到我们这里来，看见房门始终锁着，只好失望地走了。有一次他找我谈了半天，他要我告诉他谢质君究竟在什么地方。他说起来眼睛都红了，差一点就哭了，后来他还是听我的劝，悄悄地走了。他还留了一封长信给她，可是她回来连看都不看就把信扯了。那个人回到家还写过一封信给我问起谢——”

“吴其华来了，”文淑忽然低声打岔道，素贞就闭了嘴，在书桌前坐下。文淑轻轻地走到门角。吴其华穿了一件粉红底白色小花的旗袍扭着身子走上台阶来。她到了谢质君的门前便站住，扯下那张贴在门上的字条，匆匆读了一遍，然后掉转身向素贞的房门走来。

“素贞，素贞！”她用了带忧郁的声音唤道，她站在门外不肯进屋。

素贞在屋子里答应着，连忙走到门口，一面客气地说：“进来坐坐罢。”

“不坐了，”吴其华摇摇头说；她又低声问道：“谢质君出去

了？”

“出去了，”素贞答道，“她说给你留了一个字条，在门口，看见吗？”

吴其华没精打采地点点头，她又轻轻地问道：“她一个人出去的？”

“她——”素贞吐了一个字，便迟疑起来。

“她到哪儿去，你知道罢？”吴其华连忙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她的字条上没有写着吗？”素贞带了点怜悯的神气说。

“温健来过罢？”吴其华看见素贞没有爽快地回答，便又问一句：“他们两个一块儿出去的罢？”

素贞不会撒谎，只得含糊地点头回答了。她看见吴其华变了脸色、咬紧牙齿、睁大眼睛的神态，只好客气地对她微笑，请她坐下休息。

“不坐了，我去找他们去，”吴其华气恼地答道；她又愤恨地说：“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说完这一句她便掉转身子走了。她的脚步下得快，她的身子扭得更厉害。

素贞站在门口，同情地叹了一口气。文淑却在屋里噗嗤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素贞转过头来问道。

“今天她不笑了，就该我笑了，”文淑笑答道。

“不要多讲空话了，我们快去找田先生，”素贞忽然催促道。

她们到了田家，刚走进平台，看见田世清在栏杆前洗东西，世清高兴地在外边唤道：“爸，朱小姐，冯小姐来了。”

“欢迎，欢迎！好些天没有看见了！”田惠世笑嚷着，从屋里走出来。他穿了一件咖啡色的绸长衫。

“田先生，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去，”文淑说。

“我吃过了，你们进来坐坐，”田惠世笑答道。

“吃过了，去喝杯咖啡也好，”文淑又说；“今天她请客，”她指了一下素贞。

“我们特地来请你，”素贞带着诚意地说。

“好，我陪你们去一趟，现在先进里面喝杯茶罢，我刚刚泡了好茶，好象等着你们来喝似的，”田惠世说着又哈哈地笑了。

她们跟着他进了客厅。“茶在我的房里，”田惠世说着便走进他的寝室去拿茶壶。文淑看见房里靠窗的书桌上摊着一些好象是文稿和印刷校样的纸件，它们引动了她的好奇心，她便跟着他走进里面去。

“田先生，这就是你那个淘气的孩子吗？”文淑笑问道。

“是啊，现在总算把那许多难题解决了，我为它不知跑了多少趟，找了多少不相干的人。这个月内总可以出版了，这个孩子真够磨人，”田惠世满意地笑答道，他随手翻了翻校样。

素贞也走了进来。她接着说：“田先生，你要是忙的话，我们可以帮你看校样。现在是几校了？”

“二校。我自己可以看校样。事情也并不忙。世清弟兄也可以帮我做点事。不过我总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好一点。这也是我的坏脾气，”田惠世答道。他又用爱惜的眼光看了看

旁边的一堆文稿，笑着说：“这一期很有几篇好文章呢！”

“那么我们等着拜读罢，”素贞应酬般答道。

“还是喝茶罢，到客厅里去喝茶，”田惠世把那个放在菜碗里面的小茶壶连碗一道端起来，左手另外拿了一个热水瓶，迈着大步第一个走了出去，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客厅里小圆桌上，开始冲起茶来。

“田先生，刘波的信来了，”文淑大声说。

“啊？”田惠世抬起眼睛看了看素贞。“倒是个好消息，的确应该请客，的确应该请客。”他又哈哈地笑起来。他递了一杯茶给素贞，然后摩了摩鬍鬚，又去给文淑倒茶。

“他在上海过得还好，没有什么事情，”素贞说着脸上浮起一丝笑意，同时浮出一片红云。

“我原说不要紧的，”田惠世笑着说，他把茶杯递到文淑的手里去。

“还有，素贞，你怎么不告诉田先生刘波今年就要出来呢？”文淑故意打趣素贞道，这个好消息还是素贞在路上对她讲的。“今年我们有喜酒吃了。”她得意地笑着。

“呸！哪个听你乱讲！”素贞啐了文淑一口。她掉转头，正遇到田惠世的询问的目光，便答道：“今年年底他工作告了一个段落，想到内地来看看。”

“那更好了，今天朱小姐真应该请客，”田惠世高兴地说。

“那么我们就走罢。田先生，你没有事罢？我有点饿了，”文淑仍旧站在圆桌前面，含笑催促道。

“好，好，就走，我陪你们走一趟，”田惠世兴致勃勃地说。

“到哪里去？”

“到丽都好不好？那里咖啡还不错，”文淑说。

“好的，好的，”田惠世答道。田太太同世明走进客厅来了。她们笑着跟这母子打了招呼，说了两三句客气话。田惠世又用他的家乡话对他太太讲了几句。田太太只是温和地点着头。后来他便同素贞、文淑两人走出去了。田太太也跟着送出来。

世清仍然在平台上洗东西，口里哼着西洋歌，他看见素贞和文淑，便抬起头对她们笑了笑，说：“走了？不多玩一会儿？”

“你不跟我们玩，老是在洗什么东西，”文淑开玩笑地说，就走到世清的身边。

“我自己的衣服，没有事洗洗衣服消遣，”世清答道，脸上做出一个滑稽的表情。

“我们在这里没有请着老妈子，都是自己洗衣服，小孩子多学点勤劳也是好的，”田惠世带笑地插嘴道。

“我们也是自己洗衣服，”文淑说。

“就是我太太辛苦一点。她身体不好，又要做厨房里的事情。可是她一定不让我自己洗衣服，我衣服刚换下来，她就给我拿走了，我自己找都找不到，”田惠世说，他带着深情看了太太一眼，真诚地、满意地微笑了。

“他……他太忙了，忙起来简直不肯休息。我并不辛苦。他才辛苦！”田太太指着她的丈夫，带笑地用普通话一字一字地说。

“走罢，走罢。不说啦，再说，冯小姐又要吵饿了，”田惠世

接着说，又带笑地拉他的胡子。

“冯小姐，朱小姐，对不起啊，”田太太陪笑道。

素贞和文淑都已走出小门，下了楼梯。田惠世走在后面，他刚刚跨过门槛，忽然听见他太太唤道：“惠世，惠世，回来！”他转过身子。他太太说：“天变了，怕要下雨，你带把伞去。”他点点头。她一摇一摇地跑进房里去了。田惠世也跟着走去，他走到廊上，便看见太太拿了黑绸伞出来，他接到手里对太太说一声“谢谢”，然后大步走过平台下楼去了。

文淑、素贞两人正站在大门外等他，文淑开玩笑地对他说：“田先生，你太太很关心你啊！”

“我们是老夫老妻了，结了婚三十年还没有吵过一次架，”田惠世正经地答道，脸上渐渐地泛起了满意的微笑。

七

素贞、文淑同田惠世到了丽都咖啡店，在角落里的一张圆桌旁边坐下来。茶房过来伺候他们点了菜（田惠世被她们逼着，在咖啡以外还要了一盆牛排和一碟煎饼），然后又给他们拿来刀叉和汤匙，还送来三杯冷开水。素贞刚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忽然听见文淑低声说：“你快看，他们也在。”

“谁？”素贞惊奇地问道，一面抬起头跟着她的手指望过去。

在斜对面靠墙壁的边座上谢质君同温健正坐在一张长桌的两面。两个头略向前俯，差一点要挨在一起了。温健不停地低声讲着什么，谢质君只是含笑地听着，偶尔也短短地讲一两句话。

“怎么，吴其华没有来呢？”文淑又在素贞的耳边说了一句。

素贞又转过头向这个厅子各处看了看，她仿佛在寻找吴其华的面颜似的。吴其华没有在这个厅子里。可是她看见了野玫瑰的头发烫得蓬松、眉毛画得又细、又弯、嘴唇擦得红红的脸庞。她咬了咬嘴唇，便把头掉开了。在她掉头的时候，她的眼光无意地掠过那个坐在野玫瑰对面的穿湖绉长衫的男人

的脸，她好奇地把眼光射到这张黑瘦的脸上去。“怎么是张翼谋！他今天穿起长衫来了！”她想道。她再把眼光移去看坐在张翼谋旁边的那个男人。光滑的头发，圆到快成扁的肥脸，鼻子下面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一对细小的眼睛：她认得这张脸是一个在这里相当活动的新式政客黄文通的。她听过他关于法国战败后欧洲局势的公开演讲，但是没有听完就走了。那天她并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些什么，不过她知道他的主张跟张翼谋的相差不远。她也听见别人谈起他是张翼谋的熟朋友。因此现在看见这两个人坐在一处同野玫瑰谈话，她倒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吴其华没有找到这里来倒很好，”素贞低声答道，“不然，怕又要闹笑话了。野玫瑰也在这里。”

“就是你背后打扮得象电影明星的那个吗？”文淑问道。她有一天在街上远远地见过野玫瑰，还是素贞指点给她看的。

“嗯。她的前一个爱人余静，你也见过的。听说得了神经病，已经休学了。他有一个时候相当神气，不过这大半年，他家里一直没有寄钱来，他已经不神气了。有人说他常常跟在野玫瑰后面，不过我没有遇见过，”素贞轻轻地答道。

“你们悄悄地讲些什么？为什么不让我知道？”田惠世笑着插嘴说。

素贞和文淑齐声笑了。素贞连忙把头凑过去，低声对他解释道：“我们讲那边桌子上一个同学的事。”

“哦，”田惠世点头说。茶房过来上菜了，他放了亮油油的一大块牛排在田惠世的面前，那是用一个漂亮的盆子盛着的。

文淑和素贞的面前是两盆红红的汤。

“田先生，你这份牛排我没有给你叫错罢，”文淑得意地笑道。

“很好，很好，”田惠世接连笑着说。他嗅到盆里的热香，觉得有一股强烈的感情震撼着他的心，他闭上眼睛，心里祷告道：“主啊，你的仆人有什么功绩可以享受这上品的食物呢？……抗战已经到第四个年头了，一般人都在吃苦……”

“田先生，”文淑唤道，她轻轻地笑起来。她看见他睁大了眼睛，惊讶地望着她，问着，“嗯？嗯？”她便抿嘴笑道：“你不是说过你并不注重仪式吗？怎么吃饭也要祷告呢？”

“我平日在外面吃饭也不祷告的。今天看见这样的菜，忽然想起抗战满了三年，我们还过得很舒服，因此起了感谢的念头。”

“你心肠也太好了。象你这样遇到什么事都要感谢，那也就太麻烦了。吃饭出钱，这是很平常的事。这几年来我们都吃过苦的，现在吃一顿好饭也是应该的。为什么还感谢上帝？”文淑一面说一面喝起汤来。

“我觉得唯其吃过苦，现在更应该感谢了，”田惠世停了刀叉，温和地笑着说。

“那么对那些一直没有吃过苦的人，你怎么说呢？”文淑追问一句。

“我们管他们做什么？我只问我自己好了，”田惠世答道。

“可是你——”文淑调皮地笑道。

“文淑，你又跟田先生辩论！我看你们辩下去，也辩不出

一个结论来。你不要打扰田先生吃东西，”素贞带笑地打岔道。她无意地朝门口望了望，便压低声音说：“余静来了。”她放下汤匙，一面用饭巾揩嘴唇。

文淑马上闭了嘴，她的眼光也射到门口去。一个中等身材、瘦长脸孔的青年正站在门口伸起颈项四处张望。他的五官生得端正，只是面容十分憔悴，眼光迟钝。他身上穿一套不大干净的白色西装，却并不合身，稍微显得宽大些。他站在那里身子一摇一摆，头无力地微微动着。忽然他的眼光朝她们这个方向射过来。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颜色，胸膛也挺起来了，他拔起脚急急地向这里走来。文淑低声说：“他过来了。”

素贞埋着头低声说：“不要响，你听着就是了。”

茶房来撤去桌上的空盆。文淑的注意力被他搅乱了，她看了茶房一眼。

“文婉，你在这儿，”这是男人的声音，不过略带一点颤抖。文淑侧过脸去。余静谦卑地俯着头做出笑脸在说话。

野玫瑰连头也不动一下，只顾跟两个男朋友讲话。

茶房端了菜来把文淑的视线遮住了。

“文婉，你让我讲几句话罢，我找了好些天，好容易找着了 you，”余静哀求道。

野玫瑰不回答，却声音清脆地对着张翼谋、黄文通笑起来。

“文婉，即使你不再爱我，为什么不让我做你一个普通的朋友呢？你应该明白我的心——”余静用了近似哭泣的调子

继续说。

“去，去，谁做你的朋友？”野玫瑰摇着头恼怒地打岔道，虽然是叱骂，声音却并不高。

“你应该记得从前的事情，你自己亲口说过——”余静把头俯得更低，声音抖得更厉害，即使野玫瑰不在中途打岔，他也难将心里的话全吐出来。

“出去，出去，告诉你我不是你的朋友，”野玫瑰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不耐烦地说。

“王小姐叫你出去你就出去罢，”黄文通在旁边插嘴道。

“你到底用眼睛看了我了。你看，我是不是没有一点改变，我是不是还是从前那个余静！你为什么不理我？从前你那许多话——”

“唉，你这个人真不懂事。既然她不理你，你还缠着她干吗？你也在大学念过几天书，怎么干出这种无聊的事情！你再不出去，我就要茶房去叫警察来抓你，”张翼谋昂着头，用教训似的口吻说。

“文婉要是肯跟我出去，我就出去，”余静固执地答道。

“她跟你出去干什么？你放屁！”张翼谋伸出手去，刷的一下在余静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

“岂有此理！怎么随便打人！”文淑不平地说，就站起来。田惠世也侧过头去看，他也接连说：“这不应该，这不应该！”三个茶房连忙过来看是什么一回事。一些客人站起来远远地望着。

余静用一只手按住他那被打的左颊。他不还手，也不吵

闹，只是温顺地、诉苦般地说：“为了你的缘故，我什么羞耻也不怕，我什么痛苦也受得了。我好容易找到你，我不会走的……”

“你看他这个疯子，你把他拉出去罢，”黄文通威严地吩咐旁边一个茶房道。

“是，”茶房答道；他动手去拉余静的袖子，一面说：“出去罢，人家吃饭，你在这儿闹什么？”

“我有话跟这位小姐讲，我从前常常带这位小姐来吃过饭——”余静望着茶房解释道。

“你来过，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你？就算你来吃过罢，今天你不吃，就请你出去，”茶房冷笑道。

“我出去还是要在门口等她的，”余静说。

“你再等一天，等一个月，也是白等。看你这样子还是个读书人，知趣点，好好地走出去，省得别人赶你不好看，”茶房说着，一面伸出手来，做出搀扶他的样子，其实是在拉他。

“你们把我赶不走的。文婉，你就走到天涯地角，我也要跟着你，”余静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望野玫瑰，用他那诉苦般的声音说。

“快走，快走，不要多讲了！”茶房用力一拉，就把余静的瘦弱的身子推到门外去了。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傻瓜！”黄文通用轻蔑的口气骂道，“真是没出息的东西！”

“今天便宜了这个疯子。要不是在这儿怕对王小姐有什么不便，我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顿，”张翼谋接下去说。

“这种人还值得多讲！今天遇到他已经算触霉头了，”野玫瑰撅起嘴道。

文淑在旁边气得不得了，她吃着菜，也感觉不出什么滋味。她接连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人家已经疯疯癫癫了，还要欺负他！”

“小心点，”素贞低声劝道，“给他们听见了不大好。”

“我知道他是你们的教授，”文淑讽刺道。

素贞还没有回答，田惠世忽然插嘴问素贞道：“那个年轻人是你们的同学吗？”

“他已经休学了。”素贞低声答道。

“那个打人的呢？”田惠世又问。

“田先生，你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张翼谋，”文淑抢着回答道，她觉得出了一口气。

“哦。”田惠世想了想，便说：“就是那个提倡征服的道德，赞美莫索里尼有大政治家风度的哲学教授吗？”

“对啦，你一定读过他的名文了，”文淑笑道。

“狗屁！”田惠世朝地上唾了一口，惹得文淑和素贞都笑了起来。

过了半晌田惠世忽然皱起了眉头说：“这种人，这种事情……，我以前简直没有想到，……这简直是不可能……”他痛苦地拉了拉鬃鬚。

“这样的事多着呢。田先生，你看，那边还有一对，”文淑说，便指了一下谢质君和温健坐的那一桌。

田惠世回过头淡漠地看了一眼。他心里想着别的一些事

情。他的脸上很快地堆起了乌云，他叹息地说：“这半年来我看了不少我不相信会有事。不过我总以为年轻人，尤其是学生，一定不同。可是最近我有点失望——”他埋下头去。煎饼已经光了，咖啡还是满满的一杯没有动过。

“为什么要失望？难道你们相信天国的人就不相信‘未来’吗？”文淑微笑道，她那年轻活泼的眼光鼓舞地望着他。

田惠世不作声，也不抬起头。

“这句话说得对，不管路隔了多少远，‘未来’终有一天会变成‘现在’的。田先生，你说是不是？”素贞柔声地说。

“我并不是不相信‘未来’，不过‘未来’的路也是‘现在’的人修的。譬如说没有好好的桥，我们怎么能够希望‘未来’到临呢？”田惠世答道。

“造桥的人是有的，而且多着呢。我们也有不少埋头苦干的人。好的青年比不好的青年多得太多。田先生，你忘记了我们一共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你还要为‘未来’发愁！”素贞带了一点热情地说，她这时的确是充满了信仰的。她说完了才觉得不仅是她自己在说话，她还在替一个远方的人说话，那个人是有权利说这种话的。

“田先生，你要相信她的话。她的刘波就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就是一个替‘未来’修路的人，”文淑说了，望着素贞笑了笑。

“呸！谁跟你开玩笑！人家说的是正经话！”素贞红了脸，啐道；但是在心里她却欢迎文淑的话。她又补充地加一句：“我指的是那些为未来的中国在流血、流汗的人。”

“冯小姐，你讲得对，朱小姐不应当生气，”田惠世笑道，他的左手在嘴唇上抹了一下。“不说别的，象刘波那样在上海敌伪的压迫下埋头工作的人我就看见不少。”他拿起杯子喝了两口咖啡。

“那么田先生，”文淑接口说，“你还用得着发愁吗？”

“是啊，就是来到内地以后我也见过不少使我感动的景象，”田惠世点头答道：“不过另外一些事情我总看不惯。我奇怪为什么还有种种的浪费？时间、金钱、物力、人力，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你们感到那种发财狂、奢侈狂没有？真是一种最容易传染的病——”

“田先生，你没有骂我们罢？”文淑笑着打岔道，她觉得谈话的空气渐渐地变得严肃了。

“不是，不是，”田惠世连忙分辩道：“吃顿饭不算什么。我们这种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譬如，我那个淘气的孩子，每一期花了纸张，花了印费，花了写稿人、编辑人、校对入、发行人的时间，但是我们至少是替抗战作宣传，我们教人作个正直的好人，我们教人为正义奋斗。固然他多少得到一些读者的爱护，但是这两年来为了他我也吃够了苦，碰够了钉子。”他的嘴角忽然露出了微笑。他又拿起杯子，把咖啡喝光了。

“可是你那个淘气的孩子也有影响啊！”文淑安慰他道。

“影响？哼，比起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比起那些东凑西拼的翻版书，这算得什么！我们的出版界现在还是被一班书商操纵着，哪里谈得上文化，哪里谈得上宣传？”田惠世说着就

动起气来。

“那么据你看，要怎样才能改革这种风气呢？”文淑问道；
“我们总不能就让它继续下去。”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除了拚掉我这条老命，”田惠世答道。

“田先生，你是在准备打架吗？”文淑噗嗤地笑起来说。

“不是，不是，”田惠世摇着头说；“我准备奋斗到底。我要苦干到底。弄到卖掉衣服，我也要把我的《北辰》出下去，就是销路减少到五百一千份，我也不停刊。”

“好，”文淑称赞道，她高兴地笑了。

“我是不怕麻烦的，我不怕惹人讨厌。我在《北辰》下期上就要登一篇骂翻版书商的文章。还有那些编书的，把别人文章集拢来，不征求作者的同意，也没有负责的编者。只要是什么小姨爱上姐夫的痛苦啦，什么抽烟的好处啦，都编在一起，一本一本地印出去。不说浪费物资，简直等于散播毒菌。还有编什么修养书的，自己都弄不明白怎样做人，却厚着脸皮东偷西抄，弄出一大本做人处世之道。更可笑是编什么模范作文一类的！有一本大概是模范初中作文罢，注解十条有七条是错的。譬如‘神往’两字，他的注解是‘精神不知所往’。这种东西居然以补充教材的资格在市面畅销。你们说气人不气人！所以我一定要奋斗！”

“田先生，我赞成你这种奋斗的精神，可见你并不老，”素贞微笑说。

“不过还有好些书，田先生忘记提了，”文淑含笑道。

“什么书？什么书？”田惠世着急地问道。

“就是那些委员、部长、教授们写的书，譬如张翼谋、黄文通他们的大著，”文淑低声说。

“狗屁！谁也不要看！”田惠世皱起眉头朝张翼谋所在的方向唾了一口。素贞和文淑都笑了。

“不过我总觉得，田先生，你不象是一个基督徒，”文淑忍住笑正经地说。

“为什么？”田惠世诧异地问道。

“吴其华来了，”素贞忽然抬起头低声说。

文淑向门口看了一眼。吴其华换了一件亮纱旗袍，脸上粉擦得又红又白，堆了一脸的笑，正把她的得意的眼光朝四处射去。她旁边站着一个服装入时的年轻人。这个人也是她的一个同学，不过相貌比温健差了些。吴其华好象看见谢质君和温健了，她对那个年轻人讲了几句话，两个人便朝谢质君的座位走去……

“冯小姐，我问你，为什么呢？”田惠世忍不住再问一遍。

冯文淑连忙掉转头来。她看了看田惠世的脸，知道田惠世急切地等着她的回答。她停了片刻，便答道：“因为你不要妥协，充满奋斗的精神，因为你很积极。”

“真正的基督徒就应当充满奋斗的精神。他信奉基督教，并非为了自己登天堂，倒是为了救同胞出苦海，”田惠世用一种坚定的、充满信仰的声音回答道。

文淑并没有反驳田惠世的话，她又把眼光掉去看吴其华。她以为会在谢质君的那一桌上找到吴其华。可是她却看见吴

其华同她的男朋友坐在一张靠窗的小圆桌旁边，正是在谢质君的座位的对面。吴其华兴高彩烈地谈着，笑着，不时把眼光掉去看谢质君，仿佛在骄傲地说：“你看，我并没有被打倒啊！”

谢质君和温健两人忽然站起来，埋着头，迈着快步穿过餐桌中间，走了出去。吴其华在后面清脆地哈哈大笑起来。

文淑收回眼光对田惠世笑了笑，又问一句：“可是象你这样的基督徒，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呢？”

八

《北辰》(田惠世的淘气孩子)应该在这天下午由印刷局送来。这是从香港移到国内以后的第一期。田惠世从大清早下床时起就非常兴奋。留在香港的同事说是已经动身,算日期也应该到了,可是田惠世还没有得到他们经过海防的电报。刚巧几天以前通楼梯这一边平台下面的厢房空了出来,那一对夜晚不睡觉、白天不开门的夫妇搬到别处去了。田惠世便向房东要求把那两间厢房租下,作为北辰社的办公室和同事的宿舍。办公室刚刚在前一天布置好,陈设简单,但家具都是新买来的。屋子相当宽敞,前后都开着窗,因此光线十分充足:前面是两扇玻璃窗,窗外便是石板铺的大天井;后面是一堵格子窗,开了窗可以望见一个小小的废园,乱草丛中正开着一片凤仙花,几只白蝴蝶忙碌地在花间飞舞。这个荒废的园子被一堵高墙封住了,墙外便是另一个人家。

时候还早。正房里没有一点声音,房东一家人除了那个三十岁左右的唯一的男子已经上机关办公外,都还不曾起床。一个年轻的女佣提着菜篮走出去了。一只白猫懒懒地躺在大天井里晒太阳。田太太在厨房里,世明、世清两个却在楼上。田惠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张光滑的新写字台前面。他起初满

意地把眼光向屋子里各处移动，脸上浮出微笑，接着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些纸件（信函稿件之类）随便翻看一阵，然后他又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口里念道：“现在又在这里开始了。”他又点着头说：“这一回应该顺利罢。”他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过去为了这个杂志他所经历过的种种困苦、焦虑和麻烦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听见正房的门打开了，那两个老太太在堂屋里讲话。他又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过了片刻，世明、世清两个孩子笑嘻嘻地走进房来。

“爸，你开始办公了，”世明说。

“爸，你不是说要抄写订户的地址吗？哥哥要到厨房里去给妈帮忙，我来写地址，”世清也兴高彩烈地说。

“好，我们就动手罢，”田惠世望了两个孩子一眼，兴奋地答道。

世明对他父亲笑了笑，说：“爸，你留一点工作给我做啊，我等一会儿就要来的。”他半跑半走地出去了。

田惠世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出订户地址簿和题头纸递给世清，一面叮嘱着：“你要小心，不要写错啊，写错了，会寄不到的。”

“不会错，不会错，”世清充满自信地答道。他把这本相当厚的簿子拿在手里随便翻了一下，就说：“让我一个人写罢，这很容易。”

“不行，有千多个地址，你一个人写不了，还是我们两个人来写，”田惠世说。他指了一下写字台的左角：“你就坐在这

里，我们两个一道写。”

“好的，”世清顺从地应道。他端了一个凳子放在写字台的左角，坐下来，他还没有写一个字，忽然抬起头把父亲看了半晌，含笑地说：“爸，你做事太小心了，其实这些事你尽可以交给我们做，我们也不会弄错。”

田惠世温和地看了世清一眼，他摩了摩唇鬚，带笑地答道：“并不是我不放心你们。不过这是我的工作，应该我自己亲手做。我不能轻易放弃责任。”

世清摇了摇头，眼睛睁得更大些，他接嘴道：“不过我们替你做点事也没有关系，不能说是放弃责任。”

田惠世忽然站起来，走到世清的身边，伸出手在这孩子的头上抚摩了一下，柔声说：“你又该理发了。”

“是，”世清应道，“我上街的时候就去理发。”他不知道父亲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这个顽皮的孩子，”田惠世笑了笑，又说。“你应该好好读书。你将来一定比我强，比我有用。”

“我不要比你强，我只要能够跟你在一块儿做事，让你好好指导我就成了，”世清认真地说。他还仰起头看他的父亲。

田惠世又在世清的头上摩了一下，然后又把孩子的脸看了半晌，他现出了沉思的样子，这使世清觉得奇怪。他忽然象考官一样没头没脑地问世清道：“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因为你是我父亲，”世清不加思索地答道。

“这不成为理由，”田惠世摇摇头说；“每个人都有父亲。我问你为什么特别对我好？”

世清把头靠在他父亲的身上，又仰起脸笑着说：“你是个好
好人，顶好顶好的人。”

田惠世全身起了一阵轻微的战栗。这个少年的天真的话
多么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真是一个好人么？不，他不敢承
认。可是那无疑地是他向往的目标。从这纯洁的嘴里随便吐
出来的一句简单的话使他的心跟他的孩子的心更接近了，使
他的眼前更明亮了。

“那么你了解我整天整夜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你了解我
的思想，我的希望吗？”他急切地抓住世清的一只膀子说。

世清惊奇地看他的父亲。他在父亲的清澄的眼里、和善
的脸上看到了惊喜的表情。渐渐地他的惊讶消失了。他感动
地答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了解，不过我爱它们，我喜欢它
们。”

田惠世抓起世清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他的眼里闪耀起
泪光来。他声音颤抖地再问道：“你将来长大了，高兴做什么
事？”

“将来？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我做你做的事情；我
只想跟在你身边，给你帮忙，听你指挥……”世清只顾高兴地
说下去。

“不，不要只想到我一个人，一个人太渺小了！”田惠世打
岔道：“需要帮忙的人也实在太多了。”

“我知道，我知道，爸，我想起来了，”世清忽然兴奋地说；
“你整天忙的不就是帮助人的事情吗？我给你帮忙，也就是帮
忙别人。”

“不，我希望你能够做一点更大的、更有用的事，”田惠世摇头道：“办刊物写文章究竟差一点。有时候我真怀疑：那些读《北辰》的人是不是真了解我，赞成我的思想，相信我的话，他们还是只把它当作消遣品？”

“爸，你为什么要怀疑呢？你不是常常说做事情要有耐心吗？你忘了福音书上说的：‘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句话？”世清同情地望着他的父亲恳切地说。他鼓舞地笑了：“你看，我就是你的一个忠实读者，我相信你的话，我赞成你的思想。”他看见他的父亲呆呆地看他，——不，不是呆呆地，却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他忽然想起一句话，便又说：“福音书上还有：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田惠世感情迸发地跟他的儿子拥抱了一下，他两眼发光地说：“你怎么这样聪明啊！不是你没有了解我，是我没有了解你；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

“爸，我早对你说过，我不是一个小孩子，”世清得意地打岔说。

“不，你是一个小孩子，”田惠世充满了喜悦地说：“小孩子的心是特别善良的。今天倒是你启发了我，我记住了，福音书上还有：‘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是的，我永远不会失去我的信仰。——”他还要说下去，却被世明的声音打断了。

“世清，你地址写了多少了？”世明走进屋来就笑着问道；他又对田惠世说：“爸，吃早饭了。”

“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世清答道。

“我在跟他讲话，可惜你不在这里，”田惠世接嘴说，他慈祥地对世明笑了笑。

“我刚才也在厨房里跟妈讲话，我们在讲你的事，”世明闪着眼睛，带点神秘意味地说。

“你们在讲我的什么事？”田惠世笑问道。

“妈跟我讲你年轻时候的事情。爸，你真是个有趣的人，”世明说。

“不，爸是个顶好的人，”世清抢着说。

田惠世微笑了。他自语似地说：“奇怪，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爸，我要听你自己讲，你自己讲一定更有趣，一定更多，”世明兴奋地央求道。

“自己有什么话好讲呢？我还不是无数平凡人中间一个顶平凡的人，”田惠世和蔼地说。

“不过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世清起劲地说。

“是，是，最好的，”世明拍手道。

“不，你母亲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田惠世感动地说。

“是，是啊！”世明第一个拍掌附和，但是提到母亲，他便想起她正在楼上等他们去吃稀饭，他立刻叫道：“爸，快去，快去，妈在等我们吃早饭。”他刚把话说完就听见母亲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

“你们都在这里，上去吃早饭罢，”田太太亲切地笑道。她向着世明：“世明，叫你请爸吃早饭，你忘记了？”

“妈，我没有忘记，爸在跟我们讲话，他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世明亲爱地答道。

田太太用感激的眼光瞥了她的丈夫一眼，她含笑道：“他在跟你们开玩笑，我哪里算得上最好的？只有他才是——”

“不要多讲了，我们快上去吃早饭罢，”田惠世笑着大声打岔道。于是父母儿子四个人高高兴兴地锁上门到楼上去了一路上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想：“要是世慈也来了，那是多么好。”

早饭后这一家人在楼上客厅里谈着闲话，忽然听见下面起了重重的打门声。“一定是印局送《北辰》来了，”田惠世兴奋地说。他连忙下楼去开门。两个儿子跟在他后面。

门开了。站在门外的并不是送书的工人，却是常来的两个女客：素贞同文淑。文淑看见田惠世，便笑嘻嘻地嚷起来：“田先生，我们来给你道喜。请吃酒啊！”

“冯小姐你又在开玩笑，什么喜事？”田惠世笑问道。

“今天不是你那位淘气的少爷的生日吗？”文淑说。

“哦，”田惠世省悟道，“你是指《北辰》……”

“你不是说今天一定出版吗？我们特地来给你帮忙，”文淑又说。

“等一等就会送来，他们讲过今天早晨一定送到，”田惠世说：“你们先看看我们办公室罢。”

五个人都进了那间厢房。但世明只停留了三分钟便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父亲低声对他讲了几句话。

“田先生，有什么工作，请分派给我们做，”文淑把屋内和窗外都看过了，便带笑地嚷道。

“冯小姐，你不要客气。杂志出版，也只有些打包寄递的事，况且现在杂志还没有送来，更没有什么工作，”田惠世说。

“田先生，我们的确是来帮忙的，既然杂志就要送来，我们就等一等罢，”素贞在旁边接嘴说。

田惠世满意地笑了。“那么，请坐下罢。”他指着角落里的三张木沙发说。

世清含笑地站在旁边。他看见她们坐下了，自己便坐在父亲先前坐过的那个地方，翻开地址簿看了看，然后拿起笔，在题头纸上写起来。他写得快，只顾埋着头写。他听见父亲在跟那两位小姐讲话，却也不去注意他们在谈论什么。他忽然听见大门打开的声音，父亲快乐地大声说：“这回一定送来了！”他也把笔放下。父亲已经站在门前了，但是不等他站起来，父亲又掉转身子回到房里。“还没有来，”田惠世自语似地说，便走到木沙发跟前坐下，继续和素贞、文淑两人谈话。

世明捧了一个茶盘从外面进来，盘中放着三杯浓咖啡。他把茶盘捧到木沙发那边，文淑和素贞都站起来接过了杯子。素贞便又坐下，一面喝咖啡，一面同田惠世谈话，她谈的不过是上海的情形和一些熟人的近况。她今天又接到刘波的信，她的心安定了。她的面部表情也是十分安静的。

文淑却拿着杯子，走到写字台跟前。她看见世清埋下头在写字，便带笑称赞道：“你的字倒不错。”世明也走过来，站了片刻，就拿着茶盘出去了。

“不成，”世清抬起头对她笑了笑，“我还在练字。”

“你写得很快，”文淑又说：“还剩多少了？”

“多得很，一共一千多个，”世清带着得意的表情答道：“爸起初不肯给我写，他还不放心我！他怕我写不好。”

“分点给我，让我也来写几张，”文淑把咖啡喝光，放下杯子，兴致勃勃地说。

“好的，你请坐在这儿罢，”世清说着就站起来，把椅子让给文淑，他自己仍然象先前那样坐在写字台的左角。

文淑拿起笔开始抄写。她听见素贞和田惠世两人的谈话声。她一直写着，他们也一直谈着，可是她只顾写字，却并不去注意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

大门开了。大门显然是掩着的，人并没有听到敲门声，只听见一个男人的响亮的声音在问：“请问，田惠世先生在家吗？”

世清大声应着“在家”，立刻放下笔跑出去。田惠世也站起来往外面走。

一个三十岁光景的男人把身子撑在一对木拐上一跳一跳地走下天井里来。田惠世连忙迎上去，一面说：“你找田惠世吗？就是我。请教贵姓？”

“我是洪大文，”来客回答道；他笑了笑，又一跳就到了田惠世面前，他的右脚着地，左脚却在膝盖下面截断了，两腋下各有一只木拐，全身的重量把这副木拐在石板上牢牢地压着。他又笑一下，便伸出手给田惠世。

“哦，洪先生，我记起来了，以前倒没有见过，”田惠世紧紧

地握了一下来客的手。他把客人打量了一番：这位《连云港血战记》的作者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上宽下窄的三角脸，头发剪光了，头顶上两条刀伤很显明地露了出来。身材不高，身子相当结实，一件蓝绸的长袍掩不了他的军人气概。脸色红红的，脸上露着谦虚的微笑。

“田先生，真是久仰，久仰，”客人愉快地微笑道。

“请到里面坐罢。洪先生今天来得正好，《北辰》现在在这里复刊，复刊的第一期今天就可以送来，”田惠世高兴地说。

“那么我今天来得真巧了。我是看到报上的启事，才找到这儿来的，”客人豪爽地哈哈笑起来，他一面跟着田惠世往办公室（就是这两间右厢房）走去。

房里的人看见田惠世陪了客人进来，便用惊奇的眼光偷偷看了客人两眼。素贞也早走到写字台前面了，她现在就在文淑的对面坐下来，她也提起笔抄写地址。

三张木沙发全空着，田惠世把客人让到那边坐下，便抬起头向写字台这面吩咐道：

“世清，你倒杯茶来。”

“是，”世清应道，就放下笔站起来，虽然客人接连说：“不必，不必，我是喝过茶的，”可是世清仍然走出房去了。他走到楼梯口，遇见世明捧着茶盘下来，茶壶、茶杯都放在盘上。他迎着哥哥，说：“你给我罢，爸叫我上来倒茶。”世明便把茶盘递给他，但也跟着他到办公室去。在路上世清低声告诉他的哥哥说，《连云港血战记》的作者来了。他们都读过那篇有血有肉的文章（虽然那篇文章并不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因此还

隐约记得作者的名字。

在屋里洪大文谈得正起劲。他是一个健谈的人，这时又受到田惠世的亲切招待的鼓励，便自由地谈起来。他听见田惠世称赞那篇文章写得好，他接着就说：“其实那篇东西还是我口说，一个同志给我记下来的，我那时候躺在医院里，半个身子动不得，我已经躺了快一年了，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穿衣吃饭也要靠别人。那种日子真难过。后来稍微好一点，我实在闷得没有办法，躺在床上精神好时，我就想起战地的那些事情，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壮烈的场面，譬如死守东西连岛的孙达如中队长的殉国，大龙顶的两次血战，墟沟和云台山的两天恶战，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我就是在七月九日争夺墟沟车站的战斗中受伤的——”

“我记得你的文章里没有谈起你受伤的事，”田惠世忽然插嘴说。他看见世清端了一杯茶过来，便加上一句：“请喝茶罢。”

“谢谢，谢谢，”洪大文接过了世清送来的茶杯，他含笑地看了世清一眼，问道：“这位是少爷罢？”

“是，这是二小儿，”田惠世答道；他又指着站在旁边听他们讲话的世明说：“这是大小儿，他叫世明，弟弟叫世清。”

洪大文的眼光跟随着田惠世的手指到了世明的脸上。“相貌倒很象，”他说，脸上浮出惊讶的微笑；“清秀得很。都在学堂里念书罢？”

“世清进了学校，世明新从上海来。”

“两位少爷都不错，老先生福气真好，”洪大文带笑赞道；

“将来一定是《北辰》的两支生力军。”

世明、世清两人都望着洪大文的红红的三角脸微笑了。

“他们都还在念中学，还说不上这种事情，”田惠世客气地说，同时用一种满意和爱怜的眼光看了看那两弟兄，这表示他心里同意洪大文的话。

“老先生，不必客气了，”洪大文哈哈地笑起来，“不说你自己，就是我看看也很羡慕的。你的《北辰》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这种工作真有意义。象我一个军人，现在残废了不能打仗，还有什么用处？——”

“洪先生，你也有一支笔呀！”世清忽然带笑地插嘴道。

“不错，我也可以拿起笔写几个字，”洪大文兴奋地接口说，“不过，田少爷，我哪儿赶得上你父亲呢？做军人拿枪杆倒是我本份。可是现在除了拿笔杆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说到写文章，还要请田老先生指教。”

“洪先生太客气了，你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有好些读者写信来称赞它，”田惠世笑容满面地说。

“这不是客气，我说的是真话，”洪大文摇头笑道，“说到拿枪杆打仗，我很有办法。我什么也不怕。就如我受伤那一天，我详细讲给你们听。我带了队伍担任右翼奉命守墟沟。天刚刚亮，陈庄方面的敌人就从陆上进攻，接着敌人的飞机兵舰都出动了，掩护着敌兵开始在西墅和墟沟车站登陆，我们也就拚命抵抗，敌兵几次进扑都给我们打退了。后来敌人兵舰上的重炮同孙家山的炮兵联合向着我们阵地发炮，把我们阵地全破坏了，敌兵又大举扑来，我们只好撤退。在下午四点钟光景，

墟沟车站便给敌人攻占了，那时候情势真是万分紧张。因为墟沟车站既失，墟沟市也就保不住，墟沟市失陷，云台山也就难守得住了，并且墟沟市是连云港的锁钥，墟沟不保，整个连云港也就难保。所以军部里接连来电命令我们死守，等候援军到来。我们也只好趁敌人立脚不稳的时候，猛烈反攻，彼此一进一退，到后来两方面隔得很近，敌人的大炮也没有用了，我们就用刺刀戳，杀得血流成河，尸首遍地。起初敌兵越来越多，后来被我们解决了三分之二，他们便开始从车站撤退。等我们收复了车站点一下队伍人数，可以作战的弟兄还不到一百人。我自己满身是血，衣服全扯破了，一天没有吃东西，也不觉得饿，反而人更加兴奋，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我计算着援兵快到了，可是又害怕敌人再来，正在重新部署，准备防守的工作。果然不到半点钟，敌人又扑上来，先是炮轰，后来是大队敌兵进攻，人数超过我们好几倍，炮火又很猛。可是我们弟兄死守阵地不肯后退。后来我们打得只剩了二十几个人，子弹也快完了，我只好发出退却的命令。就在那时候我掉转头看了看只剩下两堵断墙的火车站，想到这个用不少弟兄血肉换来的地方又要放弃，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的勤务兵正在催我快走，却不想一颗子弹打进了我胸膛，我不觉得痛，只觉得下半身麻木，站立不住就倒了下来，接连冒着血，我想我一定完了，我要勤务兵快走。可是他却用一块布把我伤口堵住，他跟一个兵轮流背着我出了火线。在半路上遇见援兵赶来了，到晚上又把敌兵打退，收复了墟沟……”洪大文愈说愈兴奋，两只眼睛闪闪地发光，头顶上的伤痕也在发亮，并且显得

更宽，好象整个光头要从这伤口裂开似的。他的鼻子时常发出响声，仿佛要擤鼻涕，却又没有鼻涕出来。两只木拐横放在他的膝前，他讲话时，常常在玩弄它们。他的举止有时显得拘束。他的嘴唇较厚，他喜欢讲话，却不擅长讲话。但是残废的腿和诚朴的脸貌给他的话增加了感人的力量。房内五对眼睛全向着他的脸，连写地址的人也都停止了工作。

“以后呢，伤口痛罢，怎么医好的？”世清出神地问道。

“以后我们的长官派人把我送到汉口医院里去。算我运气好，赶上了最后一次开武昌的火车，后来又移到湖南，再后又转到贵阳中央医院，整整医了二十二个月，还把左腿锯掉，现在可以用这个东西（他指着膝上那副木拐）走路了。起初大半年真痛苦，连身子都不能翻动，除了会吃饭说话外，就跟死人没有分别。后来才渐渐地好起来。其实要是子弹再向这边移过两三分光景（他的手指头在胸上比划着），我这条命早就完了。”他哈哈地笑起来。

“倘使是这样，我们就读不到你的文章了。其实你要不受伤，恐怕你也不会写文章。这也是缘啊。为读者着想，我们倒应该谢谢那颗子弹……”田惠世说着也张开口哈哈大笑。

“我也是这样想过，要是我不带伤，我怎么会跟老先生认识呢？”洪大文接着说，“不过说实话，我虽是军人，却也高兴看书，看杂志。老先生的文章我很早就读过。我还记得你有一篇文章论工作，说过这样的话：

工作是眼能看见的爱。

倘若你不高兴地却厌恶地工作，还不如撒下工作，坐在大殿

的门边，去乞讨那些高兴地作工的人的周济。……

下面还有话我记不起了。这段话说得多好，多有力量。”他停了片刻又说：“哦，我记起来了：

在你劳力不息的时候，你的确在爱了生命；

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这些话是我一生也想不到的。可是你写出来，我又觉得正是我想说的话。老先生，你的思想怎么这样清楚，高超！”

一股喜悦的光罩上了田惠世的脸，他感到安慰地微笑了。这个受伤退伍的军人的一番话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他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现在又多一个证明了。他谦虚地甚至带了一点感激地说：“是的，是有这样的话。不过这不是我自己的话，是一本叫做《先知》的书里面的话。洪先生，你的记性真好。”

“那也许是我心里没有装进什么琐琐碎碎的事情，因此读过的东西容易记住。不过象这样的话也容易背熟，”洪大文客气地说。“希望你以后多写，多引些这样的话，我想读者一定赞成我这个意思。”说到这里他忽然站起来：“我该走了，打扰了你这半天。”

“不，请多坐一会儿，我没有事，”田惠世诚恳地挽留道。

“我下次一定再来。现在我还有别的事情，不打扰老先生了。”洪大文把身子撑在木拐上，右脚动了动，他迟疑一下，便动着木拐朝房门走了两步。他看见写字台旁边坐的两个少女都站起来，仿佛在送客似的，他便停住问田惠世道：

“这两位都是你的小姐吗？”

“不，是朋友，”田惠世连忙应道。他便替她们介绍：“这位是朱小姐，在西南联大念书；这位是冯小姐，朱小姐的朋友，在前线做过政治工作的，来了还不多久。”然后又介绍他：“这位是洪先生，我们《北辰》的投稿者，一位民族英雄。”

“佩服，佩服，”洪大文连连点头说；他听到“民族英雄”四个字，立刻分辩道：“笑话！笑话！不过伤兵罢了。”

素贞和文淑对他微微点一下头，文淑象一个小女孩似地说：“我还读过你写的文章。”她要笑，却把一片红云挤到脸上来了。

“笑话，笑话！”洪大文客气地说；他又对田惠世说：“我住在××街十五号楼下，离这里很近。以后一定要来领教。”他恭敬地鞠一个躬，便移动木拐一跳一跳地出去了。

“这个人真有趣，”文淑望着他的背影，自语似地说了一句。

“我倒佩服他——身体残废了，精神还是那么好！”素贞接口说：“他哈哈笑起来跟田先生差不多。”

“我要是象他那个样子，我一天也不想活了，”文淑又说：“亏他有耐心在床上躺了两年。”

“不躺两年又怎么办呢？就是我也只好躺下去，”素贞笑道。

“是我，我一定不要活。这样活着多不方便，”文淑说。

“快闭嘴，人家才走呢，”素贞连忙说，“他那只脚也是为我们民族牺牲的。”

“不要着急，他又不是刘波，你何必这样袒护他！”文淑开

玩笑地说。

“呸，”素贞啐了一口，带笑地责备文淑道，“我不怕你嚼舌头，你忘了自己还没有爱人。”

“我不要，我要独身，”文淑正经地答道。

素贞不说什么，却大声笑起来，声音十分清脆悦耳。

“笑什么？”文淑问道。

“我不相信你会独身，”素贞笑着说。

“那么我就独身给你看！”文淑赌气地说。

这时候田惠世同世明、世清两弟兄进来了。田惠世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口里咕噜着：“不成，不成，一定要重印。”

“什么事，田先生？”素贞走过去柔声问道。

“我送客出去，刚刚碰到印局送《北辰》的样本来。书刚刚印好还没装订。可是错字多得不得了，都是校出来印局没有改正的。第一篇文章连题目连人名都弄错了，这怎么成？我那篇文章开头又漏掉了一段。第三段又跟第五段颠倒了。这怎么成？非重印不可。”

“那么杂志今天不能送来了？”文淑替田惠世觉得扫兴地说。

“岂但今天，恐怕还要一个礼拜！”田惠世焦急地说。

“那么怎么办？是不是一定要重印？”素贞关心地问。

“一定要重印！我去找印局交涉，我马上就去！他们真不讲信用！他们原先一口答应下来，至迟今天送书；可是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把封面印好，”田惠世气恼地说。他离开写字台走到门口，又马上从门口回到写字台，接着又走向门口，这样来

来回回地走了四趟。

“田先生，迟几天也是一样的，反正是搬到这里复刊的第一期，”素贞安慰他说。

“是啊，爸，只要以后不脱期就成了。这一次慢几天也不要紧，反正陈先生他们还没有到，”世清顺着素贞的口气接下去说。

“现在要不慢也不行了，”田惠世不高兴地说：“不过要是不早跟印局办交涉，恐怕又会出毛病。”他忽然坚决地说一句：“我现在就去。”

“我也主张你现在就去交涉，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文淑兴奋地说。

“好，”田惠世点头道。世明在旁边立刻接下去说：“我给你拿伞去。”

“素贞，你呢？”文淑问道。

“我留在这里帮忙抄写地址罢，我不去了，”素贞迟疑一下，回答道。

九

“朱小姐，你不去倒好。我们三个人写快点，等他们回来，说不定我们已经写完了，”世清高兴地对素贞说。

“好的，”素贞坐下来，说，“我先前没有写多少，现在也得多写点。”

“我一个字都没有写，我的成绩最差，”世明笑着说。他在另一张写字台前面坐了。那里两张写字台拼在一起，田惠世留着它们给两个就要从香港来的同事使用。

“世明，你为什么坐到那边去？只有一本簿子，你怎么写法？”世清说。

“这边宽一点，还是你们都过来罢，”世明回头含笑道。

“也好，朱小姐，我们过去坐，”世清对素贞说。素贞不说什么便跟着他搬到另一张写字台前面去了。

他们埋下头写字。过了二十分钟的光景，世清忽然抬起脸问素贞：“朱小姐，你会打包罢？”

“我不会，”素贞答道，她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我想我一定会，”世清自语似地说：“不然哪个给爸帮忙呢？他自己又做不了这种事。”

“要是你会做，我也会做的，我也可以给爸帮忙，”世明

笑道。

“不过你是妈的儿子，你还要帮忙妈做事情，”世清做出滑稽的表情笑道；他又对素贞说：“朱小姐，你还不知道，爸说过我是他的儿子，世明是妈的儿子。爸和妈两个已经把我们分了。所以我应该帮忙爸做事。”

“你姐姐呢？她是哪一个的？”素贞问道。

“她是我们弟兄两个的，”世清开玩笑地答道。

“你不要乱说，”世明插嘴道；“怎么姐姐会是我们两个的？”

“她不是我们两个的姐姐又是哪个的？难道她还是爸跟妈的姐姐不成？”世清说着自己也笑了。

素贞笑了。世明也笑了。世明说：“你这个淘气的孩子讲的都是淘气话。”

“我不是淘气的孩子，淘气的孩子现在还在印刷局，爸正在为他忙着，”世清笑着分辩道。

“你有点妒忌罢，你爸爸那么喜欢它，”素贞笑道。

“不，我倒只想给爸帮忙，可是爸总不肯让我们多做事情，”世清说着就撅起嘴来。

“你父亲也是一番好意，你们都是在读书的年纪，”素贞说。

“其实还不是一样，跟着爸学，反倒比跟先生学要好一些。先生对我没有一点感情，我学学好坏，跟他毫不相干。每个先生总要教好多学生，他哪里记得起我是什么样的人。父亲跟我关系不同，他是看见我长大的，我的什么他都知道，他也可

以细心教我。而且他不但教我念书，还可以教我做人。我觉得做人更要紧……”

世清的话还没有说完，素贞却带笑地打岔道：“你这番话自然有道理。不过你说起来还嫌太小一点。”

“我不小了，我今年十七岁了，我又是正月生的，”世清正经地说。

世明在旁边笑起来，他说：“朱小姐，他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太小。爸知道他的脾气，常常故意跟他开玩笑。只有爸这样说，他才不生气。”

“我现在就没有生气。朱小姐，你看他当面撒谎，”世清带笑分辩说。

“你给我说得不好意思生气了，”世明说。

“我不说了，再说话，又写不到多少了，”世清说。他又埋下头去起劲地抄写。素贞静静地用喜爱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朱小姐，你觉得爸怎样？”过了一阵世清忽然又问起来。

素贞呆了一下，然后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好对你批评你父亲呢？”

世清不作声。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对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觉得别人都不了解他——”

“小孩又在讲大人话了，给爸听见一定会笑坏肚皮的，”世明笑着打岔道。他的苍白脸在笑的时候也还是苍白色的。

“你不要开玩笑，我说的是正经话，”世清撅起嘴说，脸也挣红了。

“好，你说，我在听，”素贞说，她觉得好笑。

“的确，我看很少人了解他，”世清继续说下去；“写信给他的人也不少，可是讲的都是应酬话，就跟来看他的客人一样，总是说杂志销路广啦，他的文章写得好啦，《北辰》编得好啦，却没有一个人谈到他的思想怎样。他想什么，希望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都不关心——”他的脸红得厉害，眼睛也睁得更大，显然他很兴奋，可是说到这里，他又被他的哥哥打岔了。

“不过爸自己很高兴，他的事业一天一天发达起来，”世明不同意地说。

“不错。只是有时候，我看出来爸心里很寂寞，”世清答道。

“现在让我来讲一句，好不好？”素贞看见这两个孩子认真地讲话，觉得很有趣，便插嘴说；“我觉得今天那个客人也还不错。”

“洪先生倒是个好人，至少他是为了抗战变成残废的。不过他恭维爸的文章，说得过火了，”世清说。

“那么，你认为爸的文章写得坏？”世明不满意地说。

世清的话渐渐地叫素贞吃惊起来。她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她觉得这个孩子的心跟他的面貌并不象。他的心的深度她有点不了解。她赞成他这个意见，不过她仍然说出下面的话：“你觉得洪先生引的那段话不好吗？”

“那是别人的话。爸不是说过，是从《先知》引来的吗？那是爸平日爱读的书，”世清理直气壮地说；“我喜欢的是爸的为人，并不是他的文章。可是我却没有听见别人称赞他为人

好。”

“也许称赞过，你不知道罢了，”世明说。

“不会的，不会的，”世清固执地摇着头说。“你没有注意到他晚上常常在平台上散步吗？我看他心里一定很寂寞。我觉得他这个事业也是落空的……”

“不，《北辰》支持了这几年，销路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读者那么多，你不能说是落空，……”世明不服地辩驳道。

“那么，我问你一句：爸办了几年杂志，碰到一个真正的同志没有？”世清忽然站起来问道。他并不等世明回答，便又坐下去说：“固然《北辰》销路多，可以赚钱，可是这并不是爸办杂志的本意。那些人不过看文章觉得有趣，看过也就忘记了。每期看，每期忘记。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编辑人的思想是什么。所以即使《北辰》销路再多，爸的寂寞也不会减少。”

“你这番话说得过火一点，”素贞用了一种交织着赞叹和惊讶的眼光望着他，她的声音还是很柔和的。“《北辰》对抗战宣传多少也尽过一点力。况且你父亲从来就是很乐观的。”

世清的两只眼睛突然射出光芒，一张圆圆脸因为得意的笑容而显得更带孩子气，他拍一下桌子，大声说：“这就是爸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即使在寂寞的时候，在人面前还是笑嘻嘻的。他碰到最大打击的时候，还是很乐观的。譬如在广州，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稿子，看校样，敌机在头上飞，就在附近丢炸弹，他还是有说有笑的。那一次从广州逃难出来，我们坐船到梧州，船到得太迟，我们到半夜才上岸，找不到旅馆，已经是戒严的时候，不准人走，我们只好在一个店铺门前骑楼下面坐

到天亮。我们又冷又倦，我受不了，发了几句牢骚。爸便说，我们已经比那些留在广州逃不出来的人舒服多了。他端端正正坐在行李上，有时候还跟我们讲两句笑话，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这样的话我听说过好几遍了，”世明笑着打岔道，其实他倒高兴弟弟讲了这样的故事。他觉得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

“我讲给朱小姐听的，我又不是对你说话，”世清接下去说，他故意对哥哥做了一个怪脸。“你是妈的儿子，要你讲妈的好处，你讲十天十夜都讲不完。”他似乎对自己的话十分满意，他忍不住笑了。

“那么你说妈不及爸好？”世明加重语气地反问一句。

“我也说妈是个难得的好母亲，不过我更喜欢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世清骄傲地说。

“我觉得你不大了解妈。妈一生的处境比爸更困难。爸能够做出一点事情，有一点成就，全亏得妈。妈跟着爸吃苦，一点也不抱怨。妈什么苦都受过，她也不肯让爸知道。譬如你们在广州逃难，家里两三个月得不到消息，存的钱也差不多用光了，亲友们都欺负我们，老家的人写信来讥笑，叫我们不要在上海老等，还是趁早回老家去。”（泪水快要从小清的眼里落下来了，世清埋下头不作声。）“可是妈不肯，她一定要守在上海等爸的信。后来爸的电报来了。这封电报走了两个多月。妈得到电报，马上把她的一个金镯子卖掉，换了钱，给爸汇去。其实爸并没有向妈要钱，妈说爸逃难出来，身边恐怕没有多少

钱，比不得平日，多有一点钱也好。妈跟爸不同，平日不大讲话，不过两个人的心是一样的好……”

世清不愿意让素贞看见他的眼泪，便抬起头，带一点粗声对他的哥哥说：“我知道，我都知道！你不要再讲了，儿子夸父母，朱小姐听见多笑话！”

素贞停了半晌，才吐出她的柔和的声音：“这是正经的事，有什么可笑呢？你们两个人的话都有道理。哥哥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多，所以更了解母亲；弟弟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多，所以更了解父亲。其实你们的父母都好。”她说到这里，想起自己的身世，触动了久已忘却的隐痛，声音变了，她说不下去，就闭了嘴。她母亲早已亡故，父亲宠着姨太太，对女儿很冷淡。她三年前跟着医院迁离上海以后，她父亲一直不肯给她写信。后来她从广州逃难出来，到了这里，她的姐姐才劝她进大学念书，不时寄钱给她化用。关于她父亲，她只知道他健康，同姨太太过得很好。这两年她已经把他忘记了，可是她现在又无意地想起了他。

“朱小姐的话不错，”世明点头说：“我们怎么能够随便批评父母的好坏呢？我们自己年纪又不够大，知道的事也不多。”

院子里响起了自行车的铃声。“田家的电报！”有人在外面说。世清连忙站起来跑了出去。他很快地拿了一封电报回来，盖了章，又把回条拿出去交给送报人。

“一定是陈先生他们打来的，”世明拿起电报看了看，带着喜色，对素贞说：“他们来了，爸也多了两个帮手了。”他看见世

清回到屋里来，便又对世清说一句：“一定是陈先生打来的。”

“我想也是，”世清也拿起电报在看。他转头向门外看了一眼，又说：“怎么爸还没有回来？电报上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拆开先看看好吗？”他用眼光去征求哥哥的同意。

“也好，你拆罢，”世明点头说。

世清拆开电报看了看，大声叫起来：“他们明天晚车到！很好，我们到车站去接他们！爸这两天正耽心他们路上的安全，这几天日本人对安南又在搞阴谋。”

“我看这大概是谣言，日本人对安南一时还不会有什么举动。我们上次经过的时候，安南平静得很，海关上的法国人还很神气，”世明说。

“你走过安南的时候，法国刚刚投降，还在讲条件，总督也没有换，自然没有什么变动。现在不同了，”世清说。

“的确，日本的势力已经侵入安南了，迟早总会闹事的。近来常常有日本兵在安南登陆的消息，说的次数多了，我们就不大去管它了，”素贞说。她停了一下又说：“海防这条路还不知道能够通多久……”

在外面天井里响起了文淑的声音：“……我们要是拿教义来说，那么一般的基督教徒就少有相信教义的；我们要是拿一般的教徒来代表，那么教徒相信的只是耶稣的神性，只是那些离奇的传说。真正懂得基督教的精义在爱字上的人究竟有几个？每个教徒都会背几句《圣经》，可是，”她在门口站住了，“能念不能信奉，不能遵行，那又有什么用？《圣经》并不是装饰品。就是从这一点看，我也要反对基督教。”

素贞知道田惠世的宣传在文淑的身上又碰到了钉子。文淑先走进来，田惠世跟在后面。世明和世清都对他笑笑，唤一声“爸”。

“不过信徒们的了解和不了解跟教义本身并没有关系。你只要承认教义不错就成了，”田惠世微笑地答道。

“教义自然也有它的长处，”文淑点头道。“不过——”

“那就是我要的答复，”田惠世笑着打岔道。

“我还没有讲完啊！”文淑带笑地驳道。“它的缺点更多。一本《圣经》里面不知道充满了多少矛盾。我还要说，宗教杀死了人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所以我不相信宗教。”她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表情。

“文淑，你又在跟田先生辩论基督教了，”素贞带笑地责备道。

“冯小姐，《圣经》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福音书，你应该多读它。若说宗教毁灭反抗精神，那么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倔强的人，没有做听话的奴才呢？”田惠世说着又笑起来。

“就是福音书，就是耶稣的话也有互相冲突的地方，”文淑固执地说。

“那是你看法不同，你多想一下，就明白这不是冲突。”

“那么你说，那个爱字——舍身的爱，救人的爱，我们在哪个教徒身上看见过？”文淑逼着问一句。

“难道那些殉道者不是吗？在古罗马被屠杀的教徒都是为爱而死的，”田惠世答道，他庄严地挺起胸来。

“他们是为了死后的天堂而死的，这是在追求个人的幸

福，不能说是为了拯救世界，”文淑笑着反驳道。

“象你这样说，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舍身的爱了。”

“有倒是有的，那些杀身成仁的志士，那些革命家都是，”文淑充满自信地说。“其实用爱也拯救不了世界，连中国也拯救不了！譬如对日本军人，你讲爱罢，那就用不着抗战了。而且在教徒里面我觉得十八世纪那个被铁条打死的加拉斯老人^①是懂得爱的，可是杀他的人却是一群相信上帝的人，并且还借了上帝的名义。至于冒生命危险替他伸冤的人偏偏又不是教徒。”

田惠世略略皱起眉头，他的脸色也有点变了。这太过火了！她难道还要引证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吗？对这个攻击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不过他仍然勉强地笑着说了一句：“冯小姐，你这样说，我就辩不过你了。”

世清趁这个时候拿起电报走到田惠世的身边，带着亲热的微笑说：“爸，陈先生来了电报，明天晚车到，我去接他好不好？”

田惠世的眼光落在世清的脸上。他接过电报来，愉快地笑了。他读了电报，便说：“好，我也去。”他又问一句：“晚车几点钟到？”

世清迟疑一下，世明在旁边接嘴答道：“五点半钟，不过不一定准时。”

“田先生，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素贞问道。

^① 加拉斯是法国的一个新教徒，他是被天主教徒冤杀的。他的冤案是十八世纪的一大冤狱，后来靠伏尔泰的长期努力，终于得到了平反。

“久吗？我倒不觉得，我们一路走去走回来的，”田惠世答道。

“我们等经理等了好一阵，他还没有起来，”文淑说；“可是营业部的人又非等经理起来不能作主。等到经理起来了，说来说去，都是些空话，说到重印，他一定不肯。”

“后来呢？”世清问道。

“后来田先生答应照他的意思加钱，问题才解决了，”文淑答道。

“可是日期又得延迟一个礼拜，”田惠世皱着眉头加了一句。

“一个礼拜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以后不再脱期就行了，”世清安慰父亲说。

“不过……”田惠世沉吟了片刻，刚吐出两个字，就被世明接下去说：

“这是战时，不能跟平时相比啊！”

“田先生，你这两位少爷倒会讲话，我看你也不必着急了。你有这两位好少爷，正应该高兴呢！”素贞带笑地说。

田惠世笑着不回答，他用爱怜的眼光看了看他的两个孩子，忽然对素贞说：“朱小姐，你们今天就在我们这里吃中饭罢。”

“不，我就要回去，”素贞摇摇头说；“我差一点忘记了谢质君今天中午在家里等我。”她站了起来。“现在我应该走了。文淑留着罢。”

“好的，”文淑点了点头。

+

素贞回到了家里，谢质君正在对面房内等候她。“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谢质君带笑地抱怨道。

“我在田先生家里耽搁久了。后来记起了才赶回来的，”素贞微微喘气地答道。“你要跟我谈什么话？”

“等一会儿谈罢，看你跑得这样，还不先坐一会儿！”谢质君笑着说。她给素贞倒了一杯茶：“你先喝杯茶罢。”

“谢谢。怎么今天突然对我客气起来了？”素贞开玩笑地说：“是不是要找我办什么事情？”

“你真岂有此理！我好心倒杯茶给你，你还要说这种话！”谢质君笑着责备道。“我有一件事情要找你商量，因为冯小姐常常跟你在一块儿，不便说，所以约一个时间跟你谈谈。”

“你要结婚找我做傧相罢，”素贞笑道，“那自然没有问题。还用得着商量？什么时候？定了没有？”

“呸！”谢质君啐了她一口。“我跟你讲正经话，不要老是开玩笑。我们现在就出去吃饭去。”

“我刚才跑回来，你不让我休息一会儿？”素贞说，她就在谢质君的床沿上坐下。“你还是先告诉我罢。”

谢质君便在素贞的身边坐下来，她迟疑了半晌，几次掉

过脸去看素贞，后来终于耳语似地对素贞说：“温健向我求婚了。”

“这样快？你怎样答复他？”素贞带点惊讶地说。“是不是挖苦他一顿，或者教训他一顿？”

“我还没有答复他，”谢质君答道。

“那么就叫他滚蛋，把他‘刷’了就是了，”素贞说。

“素贞，我求你，你再说一句正经话，我就要生气了，”谢质君红着脸，略带一点不耐烦的神情说。“这一次我倒想认真考虑一下。”

“考虑？怎么这一次你要考虑起来了？”素贞惊讶地问道；“温健这个人，除了相貌外，还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我以为你这次也不过逢场作戏。”

谢质君仍然红着脸，她埋着头不回答素贞，过了半晌，她才慢慢地说：“他人倒老实，又很听我的话。”

素贞侧过脸看谢质君，她拿起她的一只手，微微笑起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做新娘了，是不是？”

谢质君红着脸在她的手背上敲了一下：“你不要说这种话，你不是等着你的刘波来吗？”她停了停又说：“我打算答应他。”

“那也好，”素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停了一下她又关心地加了两句：“不过为什么要这样快！你从前并不是这样的。你跟他的关系并不久。”

谢质君脸上的红晕已经消退，脸色反而显得更苍白了；两只圆圆的眼睛带了感激地望着素贞，她说：“我知道你的话有

道理，不过这次我自己也管不住。”她抓起素贞的手，紧紧捏着。“在你面前我也不说假话，我年纪比你大，再过四年就三十了。我念书也没有多大兴趣。老是逢场作戏也不是一个了结。我也倦了。所以这次我想答应他。他虽不是一个理想人物，但也有些可取之点，并且家里有几个钱，又没有别的弟兄。我答应了他，至少我手里抓到了一点东西，免得将来两手空空。我就是这个心思，趁我现在还能够抓住人的时候，把这件事定了局。你一定不会笑我。”

素贞怜悯地看了她一眼，点点头说：“我了解你的苦心。不过你为什么这样快就答应？你应当多观察他一下。”

“小姐，不是我性急，”谢质君笑起来，她笑的时候，鼻尖微微在动，两颊各现出一个小小的酒涡，圆圆的黑眼睛一闪一闪的，素贞觉得她在这时候很好看，也显得年轻。“要等，再等一年两年，我也等得。不过他就要离开这儿，他希望能把这件事办妥了才走。”

“他到哪儿去？他不读书了？”素贞惊讶地问道。

“他要到香港去做生意。他要我跟他 marry^①以后，一块儿飞到香港去过 honey moon^②。我想要不答应他，他从香港回来说不定会变卦的，”谢质君说。

“那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marry？”素贞问道。

“就在明天。飞机票已经定了，隔三四天就飞，”谢质君说着，无意间露了一点得意的口气。

① marry(英文)：结婚。

② honey moon(英文)：蜜月。

“那么你还来跟我商量什么？你已经答应了他，并且连日期都定了，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罢，”素贞故意做出不高兴的样子说。

“你不要生气，我还有一件事情求你，”谢质君殷勤地说，“我们结婚也不要什么仪式，只是在明天登个报，请一桌客。我们说好了，我请两个朋友，他请两个朋友，一共四个客人。我请的客是你同陈太太。”（素贞知道陈太太便是住在××村的袁家庆女士，她是谢质君的老同学。）“他请的两个都是他的熟朋友。你明天一定要到，算是给我帮忙。”

“我不来可不可以？”素贞马上问道；她略略偏着头说：“你知道，我害怕应酬。”

“不行，”谢质君摇摇头答道；“这次你一定要来，这点忙你非帮不可。这次 marry 我也不知道是成功或是失策，不过有你帮忙，我的胆子可以壮一点。”说到这里她微笑了。

素贞不讲话了。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无心地望着窗外，她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搔得很不舒服。谢质君的一些话在她的脑子里响着，象一种破旧的乐器发出来的噪音。结婚并不是解决女子生活的办法。这不应该是女子的结局、归宿、避难所。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女子也是人。她这样想着，忽然觉得一只手搭上了她的肩头，她知道这是谢质君的手，也不掉头去看一眼。

“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这两天上海的消息不大好？”谢质君关心地问道。她不等待回答又说一句：“你应该把心放宽一点，不要老是想上海的事情。这次刘波来了，你就拉住他，不

要放他走，免得你常常耽心。”

“我不是想上海的事，”素贞说。她掉转头来，两眼露出恳求的眼光：“质君，你这不是办法。结婚不是女人的保险公司，不是女人的出路，不是女人的归宿。你抓个男人在手里，要是你跟他中间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了解，那还不是一样地落空。登个报结婚，登个报不是一样可以离婚吗？要是他丢掉你另找一个又怎么办？——”

谢质君了解素贞的一番好意，不过她觉得话有点不入耳，便把它打断了，她取下搭在素贞肩头的手，说：“你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我也并没有把结婚看作保险公司。谁也管不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只要有把握过一年半载也就成了。不过对温健，我相信我还有把握控制他。老实说，我跟你不同，我书念不好，又没有能力，我不抓个男人在手里，我以后靠什么！”她笑了笑，拍了拍素贞的肩膀，亲切地说：“我们不要再讲这些事了，还是出去吃饭罢。”

“好，”素贞答道。她转过身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哭声打破了院子里的静寂：“你打，你打！你打死我，我也不还手。我没有错，天老爷晓得的。”

接着是一阵男人的怒骂。

“我得过你哪样好处？吃也没得吃，穿也没得穿，你动不动还要打人……”

“你听她怎么说！她这个木匠丈夫隔三天总要打她一顿，她还是象奴隶一样地跟住他，守住他。这种女人真没有办

法！”素贞烦躁地说。“这就是结婚的结局。”

谢质君噗嗤地笑出声来。“你这想法太滑稽了。你以为温健还敢打我吗？我相信他连小指头也不敢动我一下。你等着看罢。你太老实了。”她声音清脆地哈哈笑起来。她同素贞走到街上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好笑。

在丽都咖啡店里，她们坐的是靠壁的座位。这一天和往日不同，这个宽大的厅子里只坐了寥寥的四桌客人。中间一张长方桌上摆满了洋酒瓶，六个西装穿得很讲究的客人毫无拘束地在那里大声谈笑，都是上海口音，谈的又是香港和海防的事情。其余的三桌上却静静地没有响动，都是一男一女相对坐着，或者低声私语，或者相对微笑。

她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谈着闲话。谢质君的脸上常带笑容。素贞有时轻轻地笑两声，但是她自己也知道笑得有点勉强。她们坐得这么近，可是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隔在她们的中间。经过了那一番谈话以后，她对谢质君的决定还是不能够了解，她还是惋惜这个朋友选取了那一条路。现在要谢质君改变决心，是不可能的了。那么这一次的会谈便是分别的开始。一个朋友就这样地离开她了，她为这个感到留恋，感到寂寞。旁边那一桌上喝得半醉的客人的喧闹进了她的耳朵，引起了她心上的烦躁。

一个脸喝得通红的中年人拿着一个小玻璃杯，摇摇晃晃地走到另一个坐着的白脸人的面前，嚷着要那个人喝酒。那个人不肯喝，在这一让一推的中间，红脸人忽然失手把酒倒了

白脸人一脸一身，他自己却滑脚，“帕塔”一声，跌倒在地上。一阵大笑声几乎使得整个厅子都震动了。

“温健为什么要去做生意？你为什么阻止他？”素贞忍不住，带了一点痛苦地小声问道。

“他说做一趟生意可以赚点钱来花，”谢质君淡淡地说。

“他家里不是很有钱吗？为什么还要赚钱？”素贞又问。

“他说家里的钱总是家里的，没有自己挣来的花得痛快。”

“他念历史系，这跟做生意没有一点关系。他有功夫还是念他的书好，”素贞又说。

“其实念历史将来也没有什么出路，我倒赞成他改行，”谢质君笑道。

“念书并不是为着找出路的，”素贞有点不满意地说：“而且你说做生意赚钱就算是有了出路吗？”

谢质君惊讶地看了素贞一眼，冷冷地笑道：“至少生活问题是解决了，并且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积了钱再做别的事。……”

“积了钱除了花掉外，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素贞不等她讲完，就接着说下去。“你看，”她指着那一桌喝酒的客人，“这是一个榜样。他们就是发国难财的。钱是赚了，生活是舒服了。可是钱是从哪里赚来的？他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这里算是全国生活程度最高的城市。为什么最高，就是因为发国难财的人都聚在这里的缘故。”

谢质君用几声笑来表示对素贞这番话的抗议，她说：“我相信温健不是这种人。并且他还没有开始做生意，赚钱不赚

钱，谁也不知道。说到做生意，同学中间，开店、开饭馆的人不止一个，这也是平常的事情。”

素贞惊奇地，不，更应该说是痛苦地，看了谢质君一眼。她想道：怎么她现在会说出这种话？她以前不是常常批评那种种她们看不顺眼的事情吗？为什么变得这么快？那唯一的原因应该是——她说出来了：“奇怪，你还没有嫁给他，你的心就向着他了。”她一方面还想用这句话来结束她们的争论（假如这可以叫做“争论”的话，其实在素贞看来，这比“争论”还要坏，因为两个人的分离是确定的了），她知道再讲下去，会引出一个很僵的局面，她的话对谢质君不会有什么用处。

“呸，”谢质君啐了素贞一口；“你又在乱讲了。我说的只是几句公道话。我跟温健并没有那么深的爱情。”她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她也没有去想她的话在素贞的心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素贞不答话，只是呆呆地望着她。

“你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样呆呆地望着我？”谢质君推了推素贞的膀子，低声问道。

“我觉得温健的福气太好了，我替你不值得，”素贞冷冷地答道。她心里想的却是另外的几句话：——真的，你倦了，你要一个窠，一个笼子来关住你自己了。她忽然痛苦地想道：——为什么女人都要这样？为什么女人都少不了一个窠？她的脸兴奋地发出红色，她咬了咬牙，在心里对她说自己说：——我一定不要这样，我一定不要这样！

十 一

素贞准时到大观楼去参加谢质君的婚宴。她是坐船去的。谢质君同温健在那里的旅馆里定了几个楼上的房间，他们的新房已经布置好了。素贞去的时候，其余的三个客人早已到了。谢质君的另一个女友陈太太，年纪在三十上下，身子相当丰满，脸颊擦得红红的，头发烫得髻髻的，身上穿一件蓝色亮纱旗袍，光裸的脚上穿了一双木塞底鞋，耳边戴了一副绿耳环，手上戴了两只钻戒，一口上海话，叽里咕啦讲个不停。她正在跟谢质君谈她的阔绰生活，她的丈夫升任某银行的副理快半年了。谢质君仍然梳着两根辫子，不过这天多擦了一点粉，换了一件淡青色银花旗袍，她这简单的打扮倒跟她的瘦长的身材相配。她坐在陈太太的身边反而显得清洁，漂亮。女客坐在房里讲话，温健却陪着两个男客站在廊上倚着栏杆，望下面的湖景。他们的脸虽然对着湖水，可是他们的心却在别的地方。素贞坐的椅子斜对着房门，两个男客的背影正摆在她的眼前。房里陈太太眉飞色舞地讲她的事情，不让人插进一句话。谢质君带着笑，注意地听着；素贞也勉强唯唯地应着，可是她的心已经飞出房间到别处去了。她的心飞到了她自己的家里，飞到了田惠世的家里，飞到了上海，又折了回来，

但是陈太太的话还没有讲完。她也记不起陈太太讲些什么，只抓住一些字眼和断句：某家的跳舞会……买了一个冰箱……一件上海最新式的大衣……某公馆里面的富丽陈设……她丈夫送给她什么东西，带她去什么地方……她丈夫最近做生意又赚了多少钱。……

“没想到钞票到了手，又飞走了。要不是碰到那个安南赤老，我这趟绝不止赚这么一点点！”房外廊上的客人大声说。说话的那个矮身材方背的年轻人，一身法兰绒西装穿得整整齐齐，他刚刚拍了一下栏杆转过身来，把背压在栏杆上，给素贞看见了他的方脸，那上面没有什么特征，除了一根红红的糟鼻子。

“你为什么要省几个小钱，不叫茶房给你带上去？我那趟什么东西都没有查出来！你那许多药实在可惜！”另一个客人惋惜地说，他也跟着掉转了身子。这是一个过了三十岁的男子，据说是温健的远房亲戚，身材相当高，有一张白白的长脸和一根鹰鼻，鼻子下面是一撮小胡子。脸上最显著的是一种对什么事都有把握的骄傲的表情。

“我怎么想得到他要抄身上！这又不是第一次。只差五分钟！要是不碰到那个赤老，也就没有事了。做我们这种生意要冒冒险，才有大的进帐。失败一两趟，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弄进一批来，就捞回来了，”红鼻子带着毫不在乎的慷慨神情说。他忽然对温健笑道：“伯惠兄，你觉得怎样？”

“高论，高论！”温健拱手恭维道。“小弟这趟追随慕陶兄去香港，领教的机会很多。还要请慕陶兄、新之兄（他向鹰鼻也

拱了拱手)提携,提携!”

“哪里,哪里!”两个客人都拱手答礼,“都是自己人!……”

素贞觉得心在翻腾。她竭力忍下去。她看了看陈太太的脸,那张薄薄的小嘴,还是一张一阖地不肯休息,两排雪白的牙齿闪闪地象一些发光的珠子。她也忍不住把这张小嘴多看了两眼。

对素贞,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刻已经是够受的了;可是饭桌上的时刻还更难忍受。那对新夫妇预备了两张婚书,当着客人的面盖了章,并且要那位鹰鼻在证婚人的名义下签字盖章。然后是喝酒与开玩笑。每个人都喝了酒,连素贞也被逼着喝了四杯黄酒。喝得最多的是鹰鼻(虽然谢质君称他做“王先生”,温健称他做“新之兄”,可是素贞只记得他是一个鹰鼻),他愈喝酒,脸色愈青,他起初跟温健开玩笑,后来便缠住谢质君。素贞几乎要替谢质君生气了。可是谢质君仍然带着笑容在敷衍他,有时还靠陈太太来给她解围。在席上讲话最少的是谢质君和素贞。不过素贞是带了厌恶的心情听别人讲话,谢质君却是带了笑容静听。其余的人谈得非常高兴。话题是:上海、香港、物价、行市和做生意,还有:娱乐和一些有趣的事情。

散席后众人又到新房里去坐。红鼻子和鹰鼻借着酒意又缠起谢质君来。他们逼着她讲恋爱的经过,又逼着她唱《月亮在哪里》的歌。谢质君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唱了两句。鹰鼻忽然在房门口大吐起来,刚吐完他又一偏一倒地往外面跑,温健要拉他,没有拉住,他不知怎样却跌倒在自己吐的东西上面,

口里哼着小调，却不想再爬起来。

温健和钱慕陶（这是红鼻子的姓名）两人费了大力才把他拉起来，搀扶到为他预备的房间里去，让他睡下了。他们拉上门走出来，他一个人还在床上哼几句不成腔调的戏。钱慕陶有事情要赶回城里去，便告辞匆匆地跑下楼往园外走了。园外有人力车拉他进城。

这样一来陈太太也失去了兴致，收起她那悬河一般的口才，早早地睡了。新婚夫妇的房门也已经关上，从房里传出一阵唧唧啾啾的私语。素贞的房间在陈太太房间的隔壁，她听见陈太太上床的声音。她看见陈太太灭了电灯。陈太太似乎很快地就睡着了。素贞疲倦地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也懒得脱衣服。可是她越躺越有精神。电灯光不够照亮这小小的房间。几只蚊子在她的头上飞来飞去。从楼下园子里送来寂寞的小虫的铃子似的鸣声。她躺着，躺着，两只眼睛毫无目的地向四处移动，思想却象浪涛似地忽然汹涌起来。她仿佛在做梦。她想起这一天的见闻，谢质君的匆促的结婚和两个男客的丑态。

“这是在做戏么？”她痛苦地问道。“为什么需要这些？为什么需要我来参加？”她带点气愤地说；“为什么要我来演一个丑角？”她想起了那个红鼻子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过她，那个鹰鼻把酒杯送到她的嘴边，要不是为了谢质君的缘故，她一定不待终席就走了，她一定会把酒杯打落在地上的。可是她都忍受了，她只是默默地伸手接过杯子喝了酒。“我为什么要忍受呢？”她苦恼地责问自己。为了谢质君吗？她想：“那么这婚

姻是她终身的幸福么？”“不！”从她的心里吐出来这一个不字。单从她今天在席上和在新房里见到的情形看来，她也可以断定谢质君犯了一个怎样大的错误了。她想着温健这个人，又拿他跟谢质君比较一下，她心里更加不舒服。谢质君把她的一切——骄傲、幻梦、前途捏成一团拿来换取一点生活的享受，和一点未来生活的保障，便是这个保障也是相当空虚的、渺茫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悲剧！

“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她疑惑地问道。她想起了谢质君说过的那番话，那些理由，那些托辞。这个平日对恋爱问题很有把握的人现在竟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因为她是一个女子，就不得不走这样的路么？”“难道结婚真是女人的归宿么？”她愤怒地问着，没有人回答她，甚至没有一点声音来扰乱她的思想，只除了小虫的无力的悲鸣。

天花板似乎要从她的头上落下，墙壁似乎要从两旁缩拢，房里的空气快把她闷坏了。她忍受不住，连忙把身子靠在桌子前面。等她的脑子清楚了，她向四处看了看，便懒洋洋地走出房门，转到廊上去。

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旅馆的人似乎全进了睡乡。她看不见一点灯光。但是月光正照在廊上。下面园子里小虫还在酣唱，两棵尤加利树的树梢被月亮镀上了银光，繁茂的枝叶编成了两个巨筛，漏出不少的银珠在地上。中间一个圆形的花坛，上面正开着一些她叫不出名字来的白花。过了花坛，在一排石栏杆下面便是湖水。湖面不怎么宽，对岸靠着湖长

了一排柳树，树影横斜地躺在水上，使得一部分明亮的湖水也变成阴暗的了。一起风，树影便颤动起来。

她靠在栏杆上，让月光照上她的头，她的上半身。凉爽的感觉抚慰了她的脑筋，甚至她的全身。她的心上又平静了。温健去远了，谢质君去远了，那些她憎厌的客人更去远了。她一个人对着下面这个幽静的世界。起初她什么都不想。她只是望着湖水，后来又望着月亮，后来又望望她的四周。“怎么这样静？我在做梦吗？”她想着，心里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可是渐渐地一种莫名的忧郁侵进她的身体来了。她自己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虫声进到她的耳里，也变成了悲哀的调子，它们快要使她流泪了。

她忽然明白了，她的心在渴望着什么，她对生活有所要求，她的欲望没有达到，她感到不满足。“我到现在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想着，她觉得寂寞象一只长着长指甲的手指在搔她的胸膛。于是在天空（就在月亮旁边！），在水上（就在树影旁边！）现出来一个年轻人的脸庞，脸是瘦削的，颜色微黄，五官端正，没有特点，却有一对奕奕有神的亮眼睛，这是刘波。还是那样的面貌，一点也没有改变。“想不到一别就是三年，”她用温柔的声音轻轻说。她的脸上浮出了极柔和的微笑。“早知道一别就这么久，我也许不跟他分开了。”她又想：他说过至迟今年年底来，那么以后他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我可以跟他到任何地方去，什么事我都愿意做，”她低声自语道。象这样的声音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渐渐地兴奋起来。她想，对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应该分开呢？为

什么别的许多人都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都可以跟所爱的人在一起，而她必须永久尝别离的痛苦呢？“他来了，我决不放他走，”她对自己说。她高兴地望着月亮，圆圆的明月（不，已经缺了一点了）没有牵挂地在清朗的天空中移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月影已经下了栏杆，等她再去看湖水时，她才注意到水面更亮了。

“他真的会来么？”这个思想忽然钻进她的脑子里。她正想回答自己：他一定会来。可是话到了口边又退回去了。她的心上打开了一道疑惑的门。她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十分确定的。过去好几次他都用这样的希望在她的眼前照耀一下又拿开了。他永远给她希望，却又永远不让她抓到它。他在她面前失信好几次，可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她明白是一些什么原因使他对她失信，她明白是一些什么事情阻止他们相见。对那个抗战的大目标，她是没有权利抗议的。这三年来她自己也是为了这个目标才跑了许多路，吃了许多苦，冒了许多危险，而且她还预备继续为它牺牲。难道她不许他牺牲！她记起了他在某一封信里说过这样的话：“一件艰苦的工作既然开始了，就应该坚持到底，让它完成。”她是赞同这句话的。

“我们跟他们不同，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权利，”她想到这里感到了一点安慰，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使她感到满足了。

但这个满足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的心马上反抗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呢？既然我们交出去的并不比他们少？”不，只有多！只有多！她知道她的心要求得并不过份。她

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现在控制不住她自己。她的心饥渴着，欲望象微火似地在她的心理燃起来，没有一只温柔的手来使它熄灭。寂寞煽旺了火，她觉得勇气增加了。她决断地说，“我一定催他早来！”

“他真的能来吗？”仿佛谁在她的耳边说了。“怎么又是这个问题？”她对自己生起气来。为什么她的心不能够安静？为什么一定要想这些事情？她想不再去想这些。她的思想太乱了。可是她的脑子里已经充满了他的面影……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觉得他总是跟她离得相当远。她不能不想他，却又始终达不到他。

夜渐渐地凉了，风吹到脸上，使她打了一个冷噤。下面的庭院被月光照得十分明亮，湖水象光滑的缎子摊在那里，几片鱼鳞似的白云在水上漂浮。她的心似乎也跟着云在飘浮。云散了，水草的黑影却仍然留着。垂柳仍然在对岸缓缓地摇摆它们的枝条。夜的空气被一种幽微的浸骨的冷香渗透了。她站了这么久，现在才觉到这冷香一层一层地紧紧贴在她的身上，好象她动一步它们就会渗进她的身体似的。可是站在这里，她又觉得两肩有点酸痛了，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了一般。她不知不觉地发出了一声呻吟，这声音使她自己微微地吃惊了。

“他来了就好了，”那个熟习的声音又在她的心理说话了。她摇了一下头，好象她要把这个思想摔落似的。为什么还在想这些事情？为什么还在问这些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为什么她不应该有这个对一班人原是很寻常的幸福？“刘波，”她抬起

头充满柔情地轻轻唤了一声，她的眼睛望着明月，好象它便是她的刘波。

明月对她微笑了，这是凄凉的笑。于是她的脑子里响起了一句话：

“我们不是生来求快乐的！”

是这么熟的声音。她记起来了。三年前她离开上海跟她的刘波分别的时候，她也曾从那个友人的口里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现在他在她的心里找到应声了。

“可是……可是我这个时候……多么需要你，”她把两只手紧紧压住栏杆，挣扎般地吐出了这句话。她的眼泪象线一般地沿着脸颊落了下来。

十二

这一夜朱素贞没有睡到一个钟头。天快亮的时候她在床上咳醒了。以后她就一直没有能够闭上眼睛。她咳得不厉害，不过时常咳，咳后又觉得喉咙不舒服。她勉强躺了一阵，后来看见天大亮了，便起身叫茶房打脸水。她洗好了脸，隔壁陈太太房里还没有声息。她走到外面廊上去，客人们都不曾起来。谢质君夫妇的房间里粉红色的窗帷掩盖了一切，阳光正照在玻璃窗上。楼下庭院静静地躺在晨荫里。她又在廊上站了片刻，想起了昨夜的事，她觉得心里很闷，不想留着等谢质君起身，她向茶房要了一张纸，给谢质君留下一个字条，说是昨夜受了凉，人不舒服，只得匆匆地回去休息。她下楼去，在园子里散步一会儿，才走出园门，搭了渡船进城去了。

她回到家里，房门还关着，她唤了一声：“文淑。”里面马上起了应声，门开了，文淑穿着睡衣站在她的面前，手里拿着一本书。“怎么这样早就回来了？”文淑惊讶地问道。她只是点点头，就进了房间。文淑接着又问一句：“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你生病吗？”“不，”她答了一个字，就在床上倒下来。

文淑连忙走到她的床前，在床沿上坐下，拉起她的一只手，俯下头去柔声问道：“什么事？你对我说。我本来以为你

回来一定有很多笑话讲的。”

素贞摇摇头，看了文淑一眼，又闭上眼睛，她一面说：“真的没有什么。……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累得很。”

“那么，你好好地睡一会儿罢，”文淑亲切地说，就把她的手放下。

房里静静的，外面屋檐上有几只麻雀安闲地叫着，阳光给纸窗上半段涂了一层悦目的金黄色。文淑躺在床上看书。素贞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她不知道睡了若干时候，醒来时，只觉得满屋子都是阳光。房里没有一个人。她又躺了片刻，听见窗外的水声，她知道文淑在栏杆前洗东西。她觉得心里比较爽快多了，便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然后信步走出房去。

文淑果然弯着身子在栏杆前洗衣服。她看见素贞出来，便问道：“你现在好些么？”

素贞笑了笑，答道：“我没有病，我跟你说过我没有病。”

“那么你是不是在等上海的消息，算日期他应该动身了罢，”文淑笑道。

素贞不理她，却问道：“你昨天到田先生那里去过罢？”

“嗯，”文淑点点头。

“他的同事到了吗？”素贞又问一句。

“到了，只有一个陈先生。还有一个到了海防又转回去了，”文淑答道。

“为什么呢？”素贞惊奇地问道。

“听说到了海防，在旅馆里接到一个电报，是香港一家书店要他去，事情比田先生这里好，薪水也多，同时安南情形很

不好，日本人大批到了那边，贝当政府天天让步，形势紧张得很。他害怕日本人会打云南，又怕路断了，将来回不了上海，所以他不管田先生的意思怎样，就坐了原船回去了。田先生脾气真好，他虽然着急，也没有讲什么抱怨的话。倒是陈先生气得不得了。我也替田先生生气，”文淑说到这里，真的翘起嘴来。

“那么田先生怎样办？”素贞关心地问道。

“田先生说另外找人，刚巧洪大文在那里，你还记得那个守连云港带伤的军人罢，他一定要给田先生帮忙。田先生后来也就答应了，以后他还要搬到田先生那里去住，”文淑说。她又带着笑容加一句：“洪大文这个人很有趣，他高兴得了不得。”

“这样也好，总算有人给田先生帮忙了，”素贞答道。但是接着她又问：“你说安南的路真的会断吗？”

“据陈先生说，这条路一定会断，而且要不了多少天。昨天田先生得到一个消息说，日本人已经向安南总督提出最后通牒了。法国人说是要抵抗，恐怕是一句空话。日本人占领安南，这条路马上就断了，”文淑激动地说。

“我看不见得罢，法国人不一定就对日本人屈服，”素贞沉吟地说。

“一定的，我敢担保一定的！”文淑咬着牙齿带点气愤地说，“你没有听见陈先生说海防海关上法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那真要气痛人的肚皮！”

“那么以后进内地来一定更困难了，”素贞说。

“你耽心刘波吗？不要紧。他要来总有办法，走金华，走广州湾，都是路！”文淑看了看素贞说。

“路自然有，不过没有以前方便了，”素贞带着悬念地说。

文淑走到素贞的身边，拍拍她的肩头，含笑地安慰她：“好姐姐，怎么你今天想不开了！他别的都不怕，还怕这一点点路！他要来，总有办法，用不着你替他操心。”

“我不是想不开。不过这几个月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他的事就定不下心。尤其是你来了以后，当初我跟他认识，还是你介绍，我们那个时候常常在一起，看见你我就要想到他……”

文淑不等素贞说完，就紧紧地挽住她的一只膀子，打断她的话头说：“他不是就要来吗？你忍耐了三年，还怕这短短的三个月？”

素贞点点头，表示同意文淑的话，不过她的脸上并没有现出一丝的笑容。文淑后来又添一句：“那么就怪我不该来了。”素贞连忙摇摇头，把眼光射到文淑的脸上，这一次她微微笑了，接着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真正的原因是起初三个月接不到他一封信，以后知道他快来了，心里又静不下去，恨不得他马上到了才放心。这种心理想起来也有点可笑。其实我也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这几天因为谢质君的事情，心里不痛快，尤其是昨天看见了那些人的丑态。我现在也不对你说了，以后再说罢。不过我真替谢质君不值得。”

“有什么不值得！既然她自己愿意，”文淑打岔道，她对谢质君并没有好感。“况且——”

“朱小姐，冯小姐，你们都在家呀！”田惠世的清朗的声音忽然在天井里响起来，打断了文淑的话。

“田先生，你好早啊！”文淑带笑地招呼道。素贞也用笑容来欢迎他。

“不早了，”田惠世拄着手杖走上了石阶，望着她们微笑道：“我一早起来就到湖上散步。空气好得很，天刚刚亮，还看不见太阳，只有几片粉红色的云彩。草上、树叶上都还有露水，连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就象一颗一颗的珍珠。后来太阳出来了，路上好象画了一幅画，比画还要好，树叶时时在动……”

“田先生，你在做诗了，”文淑抿嘴笑道。素贞接下去说：“请坐罢。”

“冯小姐，你不要挖苦我了，”田惠世哈哈地笑起来。“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夸张的形容。今天在湖上走了一阵，心里非常高兴，就信步走到这里来了。”

“既然来了，就多坐一会儿罢，”素贞说。

田惠世在藤椅上坐下来，谈了几句闲话，他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说：“听说法国人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海防方面已经打起来了。”

“你看过今天的报吗？这倒是一个痛快的消息！”文淑兴奋地说。

“我没有看到报，刚才在湖上碰到一个朋友，他在绥署做事，是他说的。想不到法国人居然还有勇气抵抗！”田惠世说。

“法国跟日本打起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开到安南去，这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文淑继续说。

“不过我担心法国人支持不久，”素贞说，“要是法国人真的让步了，以后倒也麻烦。”

“麻烦？有什么麻烦呢？”文淑奇怪地问道。

“日本人占了安南，不说别的，以后空袭就多起来了，”素贞说。

“空袭有什么可怕？这些你我不是都经历过吗？多点空袭也没有关系，你看这里全是太平景象。要是没有警报，哪里象是在抗战时候！”文淑带了点气愤地大声说。

“冯小姐说得对，我也觉得这里的人需要受点刺激，”田惠世含笑地说。“我从前在广州，天天有空袭，警报声听惯了，好象是少不了的东西。后来在香港、在上海听不到警报声，倒觉得寂寞。在这里也是两三个月才碰到一次警报。……”

“在广州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敌机在旁边丢炸弹，我们还是埋头做事。现在好象没有那种精神了，”素贞回忆地说。

“所以我们在广州住过的人胆子比较大些，”田惠世得意地说，“这也是一种训练。”他又哈哈地笑起来。

“不过这也不是办法，”文淑不以为然地摇头说。“警报倒是应该躲的。炸弹没有眼睛。我在前线见过好多炸死的人。躲一下总比较安全些。”

“我相信我不会炸死，”田惠世说。

“为什么呢？”文淑笑问道。

“我们的城市很大，日本人的炸弹有限，所以我说中炸弹就跟中头奖一样不容易，我没有中过头奖，我一定也不会中炸

弹，”田惠世挺起胸膛笑道。他心里还想：我的上帝不会离弃我！可是他并不把这句话对她们说出来。

“田先生，吃杯茶罢，”素贞说，就走进房去拿了茶壶和杯子出来，给田惠世倒茶；“不过我们吃的是胜利红茶，比不上你的好茶。”

“不要客气了，我自己来罢，”田惠世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他伸手去拿茶杯，可是素贞已经给他斟好了。他端起茶杯说声：“谢谢，”放在嘴边喝了一口。他低声问素贞道：“听说你们学堂要搬走，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听说过，”素贞略带惊讶地说；“不过我们学校太大，要搬也不容易。”

“我听见人说教育部有命令叫搬到四川去，”田惠世又说。

“我倒没有听见说过，”素贞答道；“昨天我还到学校去看过，开学日期好象决定了，又好象还没有决定，一点动静都没有，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在这里。其实我倒希望早点开学，闲着也做不了什么事，反而心里发闷。世清他们学校快开学了罢？”

“是啊，我差一点忘记了，”田惠世笑道；“我还有一件事情，今天请你同冯小姐两位到我家里吃晚饭。世清就要搬到学堂去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我们买了一只鸡，一只鸭，做几样家乡菜，请你们一定要去。”

“那么我们还得送礼啊！”文淑插嘴道。

“冯小姐，你又在开玩笑，他还是个小孩子，要送什么礼！我们不收！”田惠世摆着手大声说。

“世清上了学，你们家里就清静了。世明也去吗？”素贞说。

“世明不去。我本来要他跟世清读一个学堂，可是他身体差一点，他母亲很耽心，要他在家里休息半年。我想也好，他在家他母亲也多个伴。他自己也愿意，”田惠世说，父亲对儿子的慈爱隐约地在他的眼里露了出来。“我先走了，我还要到印局去一趟。你们今天下午要早点来啊！”他拿起他的手杖，走下台阶，跨过天井出去了。他的背驼得更显著，可是他的脚步很快。文淑和素贞跟着走出大门，却看见他的背影到了巷口了。

下午这两个朋友到田家去。她们先到大街上去买了一点礼物，经过一家报馆门前，看见墙上贴着大幅的《紧急号外》，上面用大字写着：“日军在海防登陆，越督下令抵抗……”字是黑色，旁边加了红圈。她们便站住把《号外》读了一遍，全是些令人兴奋的消息，并且都是本报特讯。仿佛那如火如荼的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似的。她们在路上还激动地谈论这些消息。

到了田家，她们看见世清站在大门口。他用愉快的微笑来欢迎她们。

“小寿星，你站在门口做什么？”文淑大声说。

世清红了脸，答道：“爸要我来看你们来了没有，我出来看了三次了。”

“对不起，我们来迟了，”文淑说。她把手里提的两包点心递给他：“这是一点不值钱的礼物。”

“我不收，不收！”世清推辞道。

“这是一点小意思，也不算是礼物，”素贞在旁边解释道。

“我不好意思收，爸也不许我收，”世清仍然推辞道，他还是不肯接过纸包来。

“那么我跟田先生当面讲去，”文淑说着就往里面走。

“冯小姐，你等等，我有话跟你们说，”世清连忙唤住文淑，文淑果然站住了。他带着庄重的表情对她们说：“你们在爸面前最好不要问起《北辰》的事，爸刚才为《北辰》的事情生过一阵气。”

“为什么？《北辰》出了什么事吗？”文淑惊讶地问道。

“印刷局昨晚起火，印好的杂志全烧光了，他们也不来通知一声，今天爸去印刷局催杂志才知道，”世清低声说。

“那么《北辰》怎么办？印刷局损失大不大？他们肯不肯赔？”素贞关心地问道。她皱了皱眉头。

“印刷局损失并不太大，不过烧了一个装钉房，”世清答道；“可是印刷费已经付了大半，要他们赔偿，他们说这是天灾，而且合同上并没有说到这一类的事情。”

“你父亲的意思呢？他怎么决定？”文淑问道。

“爸跑了大半天，找了几家印刷局，都印不了。后来找到了一家印刷局，比较小一点，不过经理还客气。他不肯订合同，说是先印两期试试看。印费也不比原先那一家高，已经把稿子送去了。”

“这么一来，出版期又得延迟一两个月了，”素贞惋惜地说。

“不过原先那个印刷局太岂有此理，非叫他们赔偿不可！”

文淑气愤地说：“我主张跟他们打官司。我去跟田先生讲……”

“冯小姐，请你今天不要提这件事，”世清着急地说：“过两天讲也不要紧，爸就不会着急了。”他的眼珠不住地在转动。

“那么你收下罢，我今天就不提《北辰》的事，”文淑说着又把纸包送过去。这次世清不推辞了，可是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对她做了一个滑稽的笑容。他跟着她们到里面去。

楼下办公室里只有洪大文一个人埋着头在写信。他看见她们便站起来，招呼一声。

“洪先生，爸在楼上吗？”世清问道。

“他就要下来了，”洪大文答道；他又对文淑和素贞说：“两位小姐，请坐。”他把两只手压在桌子上。

“洪先生，你请坐下罢，不要客气了，你站久了也费力，”文淑关心地说。

“洪先生现在在这里办公，”素贞温和地说。

“是的，我来跟着田老先生学习，不算办公，”洪大文陪笑道：“今天刚刚开始。”

“洪先生太客气了，”素贞微笑道。

“哪里，哪里！——我坐下了。”他坐了下来。“我是个老粗，学着拿笔杆，不怕你们两位见笑，还要请你们两位常常指教。”

文淑噗嗤笑了起来，她连忙抿着嘴，唤了一声“洪先生”，又接下去说：“我们又不是见第一面。以后你再这样客气，我就不敢理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洪大文连忙笑道。“你们请坐罢。田老先生今天为《北辰》的事情跑了大半天，现在上楼去歇一会儿。

这里的印刷局也真麻烦，连薄薄一本杂志也印不了，也真够他苦了。陈先生送稿子到印刷局去了，本来田老先生还要自己去的。要不是我这两只腿不成，这些事倒应该我来办。我学会多办点事，也好让老先生少累一点。现在我只能看看稿子，写写回信。”

“现在杂志还没有印出来，稿子跟信件大概不会多罢，”素贞说。

“多着呢！”洪大文得意地笑道，他的眼光在面前一大堆信件上面扫了一下，他的脸发亮了，他的头顶的伤口也发亮了。“自从田老先生在报上登了启事以后，信来得很多，今天就有十几封。我也在帮忙田老先生回信。”

“朱小姐，冯小姐，欢迎，欢迎！”田惠世的声音在门口响了起来，他跨着大步走进房间，世清跟在他的后面。她们只顾跟洪大文讲话，没有注意到世清几时上楼去了。这时世清正对着她们微笑。

“田先生，听说你在睡觉，怎么不多睡一会儿？”素贞说。文淑马上接下去说：“是不是世清把你吵醒的？”世清对她笑了笑。

“我没有睡。我躺着看了一会儿书，”田惠世摩了摩他的胡须说。“你们看见今天的《号外》罢？”他又问了一句。

“看见的，”两个人齐声答道；文淑又说：“想不到法国人居然抵抗了，我看总可以支持一些时候。”

田惠世摇摇头说：“不会的，不会的！至多打得了三天。你们没有看见另一条消息，维琪政府不是训令驻日大使，向东京

交涉吗？贝当老糊涂了，他还做得出什么好事！我看，打两天就会投降的。一定的，到过安南的人对法国人就没有一点好感。”他的眉毛竖起来，笑容渐渐地收敛了，眼里射出火似的光。他提高声音说下去：“我们这次经过海防。在海关里耽搁了七八个钟头，就只为了我们那几件行李。那些法国关员把我们中国客人简直当作一群犯人看待。随意骂，随意打，随意罚。一个广东客人多带了两件新汗衫，两条新短裤，就被关进木屋子，还要罚他很多钱。一个江苏人穿了一双新皮鞋，不知怎么得罪了法国关员，一定要把那双皮鞋从他脚上脱下。陈先生来，看见了一件更气人的事：他们那天晚上在老街的‘廉访所’对护照，一个浙江学生没有揭下帽子，签护照的法国官发了脾气，叫他脱帽。浙江学生不懂法国话，没有把帽子脱下来。旁边站的安南兵马上走过来打了他一个嘴巴。学生动手保护自己，他就给他们抓下来关起了。据旅馆的人说这个学生至少会关个一年半载。我很奇怪，法国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况且又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已经给人赶到悬崖边上了，他们不想法保护自己，却拚命欺侮别人。我不知道他们脑子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愈说愈气，脸也挣红了，说到这里他觉得口干，便闭了嘴。世清马上走到他的身边，拉着他一只膀子，含笑地说：“爸，你又生气了。你今天够累了，歇一会儿罢。不要讲这种事情，好不好？”田惠世侧过头看了世清一眼，脸上浮出微笑，他和蔼地说：“你给我倒杯茶来。”世清便到方桌前面去倒茶。文淑和素贞用关切的眼光望着他。她们一时想不到适当的话。

“二少爷的话不错，田老先生今天真累了。虽说平日精神好，也不可以过劳，”洪大文望着田惠世，恳切地说。他的话并没有说完，这时世清把茶杯递了给田惠世，田惠世刚接过茶杯就咳起嗽来，洪大文也就把话咽住了。

田惠世咳了几声嗽便端起茶杯，接连喝了几口茶。屋子里很静。只有洪大文擤鼻子的声音听得见。田惠世诧异地抬起头看看文淑和素贞，问道：“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他不等她们回答，自己又说：“你们以为我生病吗？没有，没有！我很好，就是今天为了《北辰》的事情又跑路，又着急，又讲了很多话，有点累。现在好了。你们不要把我当作病人看待啊！”他想笑，可是他只能做出微笑；他想哈哈大笑，但是张开口，他就觉得喉咙发痒，他努力忍住不要再咳一声嗽。这忍耐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脸色都变了。幸好世明走进来给他解了围。世明在他的耳边讲了两三句话。他张开嘴咳了两声嗽，便站起来，对文淑和素贞说：“现在他母亲催我们上楼去吃饭了。请上去罢。”他又看了洪大文一眼：“洪先生，你方便罢，要不要叫世明弟兄两个来搀你？”

“不用搀！我很方便，我走得很好，”洪大文大声说，立刻站起来，那副木拐就放在写字台旁边，他取过它们来放在腋下，准备动步了。

田惠世看了洪大文一眼，称赞地说了一句：“你的精神倒比我好，我应该学学你。”他的面容渐渐地开展了，现在好象是云散尽了，那里只剩了一片蓝天。

晚上十点钟光景，素贞和文淑回到自己的家里。她们开了房门，在地上发现一封未封口的信。她们扭开电灯。信是给素贞的，是谢质君的笔迹。素贞拿出信笺，信封里还有一把钥匙。信上写着：

素贞：

你今早晨为什么不辞而别？是不是我昨天招待得不好？我知道你不喜欢那班人，你不习惯同他们应酬。可是那是他的好友，他一定要请他们，我有什么办法？不过这是小事，你不会介意的。你说你受了凉不舒服，那么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我等了你好快一个钟头，你还不回来？我知道那只是一个托辞。

我们进城来了。因为时局的关系，这班飞机提早飞，我们明早五点钟去机场。我回来收拾行李，我带了一点东西去，别的仍然留下。房间我留着，钥匙交给你，请你保管。房钱反正房东多借了三个月，最近用不着付。房东如果再来要钱，有你在这里应付也不要紧。只要时局不转坏，我过两个月一定回来。虽然结了婚，我还是决定把大学念完。今天我又把你劝我的话想了一番，我觉得有一张文凭究竟好一点，将来有一天要是我同健的感情变坏了，我还可以自谋生活。

等你到九点半钟，你还不回来，是不是看电影去了？我很想再见你一面，谈几句话，可是我不能再等了。我要走了。那么再见罢。祝

好！

请代问候冯小姐。

质君 ××日。

“谢质君问候你，”素贞看完信，抬起头对文淑说。

“谢谢她，”文淑答道；“她信上写些什么？”

“她明天飞香港了。你拿去看罢。”素贞把信递给文淑。

文淑看了信交还给素贞，一面批评道：“你这个朋友很古怪。刚刚结婚，就耽心感情会变坏，这样彼此不了解，又何必多此一举？老实说，我对你这些同学，实在莫名其妙！我觉得她们太闲了！好象这个大时代跟她们完全不相干一样！”她说的是真话，她完全不了解那些人的心理。

十三

第二天的报纸上并没有关于驻安南法军抵抗日本登陆部队的记载，似乎安南总督也不曾下过抵抗的命令。从早晨发卖的日报到下午在重要街道张贴的《号外》上，人们知道日本军队不断地在海防登陆，又不断地从海防开赴各地。日本兵不停地前进，法国驻军静静地连动也不动一下。

第三天的消息更多了，安南的新闻占了全报纸的四分之一：飞机场占领了，铁路接收了，日本军队一直开到了老街。维琪政府和安南总督却表示愿意接受日本的友善的条件，与日本政府诚意合作。

“岂有此理！这种出卖邻人的行为只有法国做得出来！前天还说要决心抵抗，都是骗人的话！”冯文淑掷开报纸气恼地骂道。

“这样一来日本轰炸机的航程缩短不少了，以后这里空袭的次数会多起来，”朱素贞接口说，她也十分愤慨。

“管它的！就是他们把这里炸光了，我们还是要抗战，”文淑撅起嘴赌气地说。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意见，许多、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田惠世甚至哈哈地笑着对人说：“他们有炸弹，我们有肉弹。”

洪大文在旁边听见了，便插嘴说：“老先生，你有的是纸弹。你的纸弹比炸弹还厉害。”

田惠世不明白洪大文的意思，用了疑惑的眼光去看他。他好象知道田惠世的心思，便带笑说：“你的纸弹鼓励人去求生，炸弹却只能够杀人。”

这个解释使田惠世很满意。这句无心说出来的话给了他多大的安慰，这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散播生命的种子，这正是他的任务，他的使命。他一个基督的信徒也就是为了爱生的缘故，才来拥护抗战，反对那残害生命的侵略者。生命是一道桥梁，把非战和拥护战争的两个极端连接起来了。这些天他早晨都在湖上散步，他看着叶上草间的露水在阳光里闪烁，看着荷花在绿叶丛中微微昂起头来，他想着许多事情，可是他对那一道桥所连接的两极端，却始终没有怀疑过。他热爱生命，所以不愿见人毁坏生命，对那残害生命的暴力（这几年来他看得太多了，家破人亡的惨剧、大规模的残杀、南京屠杀的记载、日寇暴行实录的照片！……），他充满了憎恶，而且把它看作仇敌攻击。战士的精神在教徒的身上出现了。他有时会背诵《以赛亚书》中的一段话：“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这好象是一根打在他背上的鞭子，鞭子是锻炼战士的东西，它在他的精神上唤起了更多的热情和勇气。

第四天以后日法合作更加表面化了。日本的轰炸机列队在安南的上空示威飞行。谁都知道这是对这个城市的威胁。日本军队的调动引起了种种的谣言。报纸上的消息自然还是

很堂皇的，不过人们心里揣想着，口里谈论着，他们甚至在报上发表的消息以外制造了更多的新闻。似乎战场马上就要移到这个城市的附近来了。少数神经过敏的人已经在作搬家的打算，一部分的学校和机关也开始准备疏散了。

在这期间中国政府接收了省境内的法国铁路，派遣了大军到边境驻防。这个消息使得一部分人放心地吐了一口气，谣言也因此减少一些。可是疏散和搬家的打算也有一部分成为事实了。防空司令部开始发出劝告市民疏散的布告，并且动员中学生在市区内作普遍的宣传。有一天报纸上登出敌人在河内嘉林机场放着两百架飞机的消息，下午一点钟在市内便发出了预行警报。这警报唤起的骚动是可以想见的。这天敌机并没有来，据说飞入省境的只是一架侦察机，飞到中途又折回去了。一般人都认为这是最初的征象，以为跟着来的一定是大规模的空袭。可是一连三天都没有人看见敌机的影子。这几天早晨出太阳，但不到正午就变了天，落起雨来，在晚上天又晴了。人心并不曾安定下来。那个就要到来的大空袭，在一些人的想象中好象大片的乌云似地遮盖了天空，只等着暴雨迎头落下来打破这难堪的沉闷。

就在这样的時候，素贞的学校开学了。素贞注了册以后的那天晚上，从女生宿舍一个同学那里回家来，看见文淑在屋子里写信，也不去打扰她。素贞在自己的书桌前面坐下，扭开了电灯翻看刚才借来的书。

天井里响起了熟习的脚步和手杖的声音。“田先生来了，”文淑忽然说，她刚写完最后的一句，便放下笔，站起来。素贞

听见这句话，马上阖了书，也站起来。这两个少女似乎有同样的感觉：她们盼望一个熟朋友来把屋子里的沉闷空气搅动一下。她们尤其高兴听田惠世的笑声。她们便走出去迎他，并且扭开了客厅里的电灯。

“真好，你们都在家用功吗？难得，难得！”田惠世上了台阶，跨进客厅的门限，大声嚷道。

“我也是刚刚回来的，文淑倒没有出去，”素贞答道。“田先生，你从哪里来？”

“我从印局来，心里闷得很，没有回家，就到你们这儿来了，”田惠世答道，他微微皱了皱眉，在藤椅上坐下了。

“怎么你这时候还去印刷局？田先生，你太热心了！”素贞惊诧地说。

“别人忙着逃难，你倒忙着印书。你总是跟别人不同！”文淑笑道。

“你们忘记了它是我的淘气的孩子。做父亲的自然喜欢他的孩子啊！”他哈哈地笑了。

“那么这期杂志快出版了罢，你又去印刷局催吗？”文淑问道。

“一共六十四面，现在还只排了二十四面，并且要等到把这二十四面版子拆了，才能够排以后的。真是慢得可以。我天天催也没有办法，”田惠世摇摇头说，一道愁烦的阴影在他的脸上掠过，但是它并没有停留，便消失了。“我愿意加钱，要印局加工排。可是偏偏这两天印局里有些人回家去了。你们看，有什么办法？都是自己惊惶。有一点消息，大家就慌张起来，

逃的逃，走的走。其实路隔得很远。就是轰炸，也用不着这么害怕。放了警报，再跑也来得及。工作还是应该照常做下去。象我们从前在广州，天天有警报，可是工作还是照常做，大家的精神非常好。”他向着素贞：“朱小姐，你说是不是？那时候你也在的！”

素贞笑了笑。她瞥了文淑一眼，然后回答他道：“田先生，这里不能跟广州相比。在广州因为没有地方跑，而且敌机来得太快，也来不及跑，只好壮起胆子照常做事情。那个时候连我也很胆大，不怕警报，我还记得有个星期天，敌机在上空飞，我还跟你一起在哥伦布喝咖啡。可是这里不同，地方小，敌机又乱投弹，今年春天炸市区死了几十个人，炸火车死的人更多。难怪大家要害怕。连我也不喜欢听警报的声音。”她又微微一笑。

“朱小姐，你的话自然也有道理，我也同意，”田惠世说；“不过敌机还没有来炸，自己就先惊慌起来，把工作也放下了，这总是不对的。你看，这么一个大城市，连一本杂志，象《北辰》这样薄薄的一本也印不出来，真是笑话！”

文淑在旁边笑了一声。田惠世惊讶地掉过脸来看她。她便说：“田先生，你也太喜欢你这个孩子了。我看，世清他们会说你偏心的。”

田惠世哈哈地笑了。“不会的，不会的！”他接连地说。他忽然换过话题问道：“你们听过张翼谋的演说没有？”

“没有，”素贞答道；“我本来也想去听的，后来有别的事就没有去。他的题目是《法国的悲剧》。”

“没意思！没意思！”田惠世摇摇头说，“还是他那一套！骂了法国又捧意大利！我有点好奇，所以去听了。真是胡说！”他笑了两声，马上又问素贞：“朱小姐，你们学堂还搬不搬？”

“不搬了，已经开学了，”素贞答道。

“好，很好，我就赞成不搬。前些天听见人说要搬，并且说车子已经准备好了，好象真要搬走似的。”

“前些天也有过搬的话，大约因为事实上有很多困难，便打消了。要是真说搬，哪里有那么多的车子？所以搬不搬，也不能由自己决定。我们好多教授都有一大家人，动一下实在不容易，想走又花不起这么一大笔路费，也就拖下来了，”素贞解释地说。

“对，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田惠世接着她的话说下去，“没有办法，只好糊里糊涂地拖下去，拖到不能再拖时为止。大家都拖。我现在也拖起来了，这一期《北辰》出了几个月还出不出来。这不是在拖吗？你们看，我有什么办法？”他失望地摊开两只手。

“田先生，你也不必着急。反正现在人心惶惶，杂志出版，也不会有人注意，迟些天也不要紧，”素贞劝慰地说。

“不过我们做事——”田惠世不同意素贞的话，他心里仍然记挂着杂志的事情，他带点固执地分辩道。可是他刚说了半句话，就被门外台阶下一个年轻的声音打断了。这是他的儿子世清。

“朱小姐的意思很对，爸，你应该信她的话，”世清说着，便走了进来。他先看看他父亲，然后招呼了素贞和文淑。

“怎么你也跑来了？有什么事情吗？”田惠世惊问道。“你从学堂里来？”

世清站到父亲的旁边，亲热地笑答道：“有个先生送家眷回乡下去了，明天上半天没有课。我请假回家来看看你们。”

“傻孩子，你这次回学堂才只三天。听你讲话好象你有一两个月没有看见我们似的，”田惠世爱怜地哂笑道，他望着孩子的天真地闪烁着的眼睛，他的焦虑、他的记挂全消失了。从这里可以知道，人说他爱杂志甚于爱他的孩子，这是不了解他的话。

“这些天学校里谣言很多，我不出来，就只有从报纸上知道一点消息，所以就是一天不看见你们，我也不放心。……听说学校已经找好房子，就要疏散下乡……所以我更不放心……”世清声音略带颤抖地说，但是以后的话却被他咽下去了。他改变了语调，用笑容掩饰了他的激动，迅速而简短地说：“看见你很好，我真高兴。”

田惠世喜悦地笑起来。他对两位小姐指着世清说：“你们听，他说起话来好象他是我父亲似的。”他又转头对世清说：“不要再说了，好好地给我坐下来。”世清便在父亲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了。田惠世接着又说：“你们学堂准备疏散，也好。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妈告诉我，你这两天，天天到印刷局去催杂志，今天出门的时候身体不大舒服。妈说你今天并没有约会，出去又没有别的事情，你没有回家吃晚饭，一定是跟印刷局生气，心里不痛快，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妈想叫我出来找你，又不知道

你在什么地方。我说你不在印刷局，就在这里，不然就在湖上。我便先到这里来。果然一进大门就听见你的声音，”世清快乐地说，他看见父亲的笑容，觉得心里畅快多了。

“我很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田惠世和蔼地答道。

文淑故意把世清打量了一下，笑着说：“不错，果然是一个好儿子。”她看看田惠世：“田先生，你也该满意了。”

田惠世并不回答文淑，只是默默地又把世清看了一会儿。素贞开始跟世清讲话，文淑也插了进去。田惠世带着笑容听他们谈论，他的眼光在屋子里各处移动，后来他的思想渐渐地移到别处去了。他们的话也就变成含糊不清楚的了。这样地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象梦醒似地站起来，短短地说：“世清，我们走罢。”

“还早，不多坐一会儿？”文淑挽留道。

“田先生，再坐一阵，你来了还没有多久，”素贞也在挽留他。

“不坐了，下次再来，”他用手杖点着地说。“我出来久了，我怕我太太耽心。”他忽然咳了两声嗽，但是又忍住了。世清关心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我们请田太太出来玩半天，她在家里也很闷罢，”素贞说，她的眼前现出了那张半枯萎的秀丽的脸。

“我也要她多出街走走，她总是不肯。她身体不好，怕走路。到这里来，找不到女工，我们自己做饭，她更累一点。幸好昨天请到女工了。她就是那个爱劳动的脾气。不过你们约她出来玩，她也许会答应，”田惠世温和地说。他讲起他的太太，

声音就变成非常柔和的了。

“好，我们过两天就去约田太太出来玩。请你回家先跟她讲一声，”文淑兴奋地说。

田惠世同世清一块儿走了。素贞和文淑把他们送到门口。“我们再送一段路罢，”文淑说。素贞没有反对，她们便陪着田惠世父子走出了巷子。

夜很凉爽，星星棋子似地摆满了整个天空，银河白闪闪地横在他们的头上，织女同牛郎隔着河相对闪眼。忽然一道光在墨黑的天幕上划了一下，一颗星落下去了。真快！转瞬就失去了它的踪迹。

四个人都没有讲话。他们转入了湖滨的马路。素贞和文淑还是不作声，却仍旧继续往前走。散落在各处的灯光，从树丛间透过来，好象是一些含笑的眼睛。湖水黑黑的，跟天成了一样颜色，灯光倒映在水里，就象是星星。在岸边单独立着的矮树常常欺骗了不注意的目光，变成了人形。这些树也不是沉默的，它们不断地在低声讲话。从树脚石板缝里送出来小虫们的哀鸣。夜象水似地在他们的身边流了过去。

“真快啊，一眨眼又是秋天了，”文淑忽然感叹地说。这时他们已经进了石牌坊，走在微微向上斜的湖上马路了。交柯的老树伞盖似地罩在他们的头上。风轻轻吹过，树叶跟着发出一阵轻微的叹息。她心里不大愉快地想着：我在这儿白白地住了几个月了。

“是啊，我一点事也没有做成，又过了几个月了，”田惠世响应似地说，他又为了《北辰》的脱期感到苦恼了。

“田先生，你太谦虚了，你不是天天忙着吗？”文淑接着说。

“忙了这么久，一本杂志还印不出来，这又有什么用？好些读者写信来问起，我真不好意思回答，”田惠世略带烦躁地答道。他又咳了两声。

“爸，你太累了，我替你写回信罢，我会写的，”世清在旁边低声说，他的声音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听得见。田惠世埋下头看了他一眼，阴暗中只看见他一对发光的眼睛。在儿子的眼睛里，父亲的亲爱的瘦脸只露出一个轮廓，颜色更加黑黄了。儿子的温暖的手紧紧抓住父亲的略微干枯的手，儿子的热传到了父亲的身上。田惠世的身子微微地颤抖起来。他的烦躁渐渐地被这颤抖赶走了。

“不要紧，你还是好好地读书罢。将来我会把这个事业交给你，”田惠世感动地说。

“我会好好地办下去，我一定要使你高兴，我一定要拚命努力，把《北辰》办得更好，”世清快乐地说，他把父亲的手捏得更紧了。

“我知道。我心里早有打算，将来有一天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会找你的。那个时候我就放心了。就是闭上眼睛，我也可以平静地去了，”田惠世点头说。世清觉得父亲的眼睛在黑暗中微笑了。

“爸，我离不开你。没有你，我做不好事情。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在你的指导下面工作，”世清带着孩子似的依恋对父亲说。

田惠世没有答话，这次他把儿子的手紧紧地捏住了。

“你看，他们父子感情多好，这样亲密，”文淑低声对素贞说。她听见他们的语声，却听不清楚他们讲些什么话，虽然她的耳朵偶尔也捉住几个字。

“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多讲一会儿。田先生今天有点心烦。现在似乎好些了。这一对父子都不错。可惜我没有这样好的父亲……”素贞说到最后一句话，她的声音倒象是叹息了。

“你姐姐现在对你不是很不错吗？我连这样一个姐姐也没有，”文淑羡慕地说。

“你哥哥也很好，他前天还给你写那样的信来，”素贞也用羡慕的调子说；“我姐姐这两年来对我好多了，可是她并不了解我。我还没有告诉你，她昨天那封信上说，她要结婚了。我不知道姐夫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姐姐以后会不会再改变。”

“即使她改变，你还有一个人啊，”文淑说着，差一点笑出声来。

素贞抓起文淑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她不觉得窘，却低声笑问道：“你是不是也想找一个人？”

文淑不作声，却轻轻地拧了一下素贞的膀子。

“爸，我看你这一向身体不大好，你应该多找一两个人来帮忙，”世清继续说；他把声音压得更低，又说：“冯小姐倒不错，她现在反正闲着，她一定肯的。她跟朱小姐两个对你都很好。”

“我……”田惠世刚刚吐出一个“我”字，“碰”的一声巨响

打岔了他。这炮声把湖上的空气掀动了。树丛间飞起几只鸟，扑着翅膀飞到别处去了。接着第二声炮响又冲破了天幕直上云霄。它好象把空气也带了去，然后又把它们全撒下来，这震动是相当大的。仿佛整个湖都在摇荡了。

“九点钟了！”田惠世自语似地说。他连忙掉头看素贞和文淑：“你们两位回去罢，九点钟，已经不早了。”

“不要紧，我们送你到家罢，”文淑答道。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石牌坊前面，眼前有灯光了，这是从牌坊外面石板路旁的电灯杆上射过来的。

“不必了，就快要到了，”田惠世客气地说，他还有几句话要吐出来，但是背着光迎面走来的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忽然在他的面前站住了，大声唤道：“田老先生，你在这里！”

“啊，张先生，你到哪里去？”田惠世连忙问道。

“我回家去。刚才去看了一个朋友。田老先生现在也回家？”

“是的，”田惠世答道。他又低声问了一句：“这两天有什么消息？”

“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泰国又在跟安南办交涉了，边境上已经冲突过了。”

“这一定是日本人在背后提线，结果一定是日本人调停了事。泰国国务总理叫什么銮披汶的早就不是个东西，他好些年前就做了日本的尾巴，”田惠世带着自信地断定道。

“啊，还有一个消息，敌人在广州广播说一个星期内要大炸这里，”说话的声音更严肃了。

“又在吹牛！这种吹法我在广州、桂林都碰到过。这回没有说炸平的话倒是比较谦虚了。”田惠世哈哈地笑了两声。

“我走了，再见，”那个人对他点一个头，便匆匆地走了。

“朱小姐，你相信不相信敌人的广播？你还没有忘记广州的经验罢？”田惠世觉得好笑地对素贞说。

“就是他们真的来大轰炸，我也不害怕，说句笑话，我们是身经百炸的了！”素贞带点骄傲地答道。

十 四

素贞说了那句话的第二天早晨，她同文淑在湖上散步。天已经晴正了，头上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蔚蓝，阳光温和地抚着绿树、灰土和淡青色的湖水，这一切似乎都在愉快地微笑。空气清新，还带着一点香气；微风吹过，人只觉清香沁鼻，仿佛肺腑也被这清香洗净了似的。

“天气真好，不过说不定敌机会来光顾，”文淑仰望着天空，说了这一句。

“也不见得真的就来，”素贞说。

时候不算早，不过也不迟。湖上来往的人还不多，可是行人却没有断过，三四个年轻学生拿着书坐在石凳上埋头读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地靠在一起，立在湖畔，对着湖水，低声讲话。

“你还记得我们从前游西湖的事吗？”文淑忽然问素贞道。

“记得有什么用？反正现在不能回去了，”素贞淡淡地答道。

“那一回多好玩，我还在九溪十八涧摔了一跤，”文淑想着就要笑起来了。

“你还把我也带下去了，都是你要光着脚在水里走，”素贞

抱怨道，她想想也觉得有些好笑。

“你看，那边不是田先生吗？”文淑忽然叫起来，她的眼睛在两棵树中间的空处瞥见了田惠世的影子，可是她们跟他还隔着一道水，她们要找他还得绕到对面堤上去。

素贞也看见了，便说一句：“我们过去迎接他！”她们立刻回转身到对面的堤上去了。

田惠世慢慢地走着；她们离他有十多步的光景，他忽然抬起头，看见她们在前面，高兴地大声说：“你们早啊！”

“真巧，今天又碰见你了，”文淑笑答道；“我远远地就看见你。”

“今天我起得特别早。世清要到学堂去，他走得很早，我送了他一段路。他一个人走了，我就到这里来散散步，”田惠世说；“你们早晨没有事，到我家里去坐坐。”

“不去了，改天去罢，”素贞顺口推辞道。

“你们没有用过早点罢，到我家里去吃，”他继续邀请道，“今天我太太在做我们家乡的米粉，你们不可不去尝一尝。我太太早就说过要请你们去吃米粉，今天真是巧得很。”他又哈哈地笑了。

“这是缘啊！”文淑说，她故意用了田惠世常常说的一句话。

“说得好！”田惠世大声笑道；“那么一定去，现在就去。”他把手杖按着地短短地咳了两声嗽。文淑和素贞的眼光一齐射到他的脸上去。她们第一次发觉他的清癯的脸上有一种枯萎的灰黑色，并且一条一条的皱纹，象铅笔画上似的，使这张脸

显得衰老了。她们吃了一惊。可是一转眼间他又用笑容盖满了脸，并且若无其事地大声讲话了。

“好，我们去，”素贞答道，她暗暗地看了文淑一眼，文淑点了点头。

三个人到了田家，上了楼，在客厅里坐下。他们喝了田太太冲的可可茶。田惠世又拿了装铁观音的罐子，准备泡茶。他看见世明捧着热水瓶从外面进来，便对这个孩子说：“你下去请洪先生、陈先生上来喝茶。”

过了一会儿世明回来说：“爸，洪先生就上来。陈先生到邮政局取邮包去了。”

“什么邮包？”文淑好奇地问道。

“在香港印的最后一期《北辰》，这里已经到过了，现在寄来的数目多些。还有一部分是合订本，”田惠世答道。

这时洪大文带着橐橐声一跳一跳地走上来了。他走到客厅门口，含笑地对她们打了招呼。

田惠世给客人们斟了茶。田太太带着世明到楼下厨房里去。

“田太太真好！性情好，心地好，又能干，又会吃苦。真难得！老先生真好福气！”洪大文看了一眼田太太的背影，他揉了揉鼻尖，大声地称赞道。

“是啊，我很少见过这样好的母亲，”素贞接嘴说，她想起了世明讲过的那番话。

文淑点了点头，可是过了片刻她又起了另一个念头：我做不到这样。怎么爱一个人会爱到把自己完全否定了呢？她有

点替田太太抱不平。她觉得田太太不应当为了丈夫，为了儿女，牺牲自己。

邮差在下面嚷着：“收信。”洪大文拿起木枋就要下去。田惠世立刻阻止了他：“我下去。我还有点事要下去。你陪她们多谈谈罢。”田惠世迈着大步匆匆地走下去了。可是走到楼梯口，他忽然送回来几声短短的咳嗽。

客厅里静了下来。这咳声象是一些长指甲，刮着每个人的心。文淑看了素贞一眼，素贞也看了看文淑。洪大文却忍不住在旁边讲起话来：

“这两天老先生身体不大好。他应该好好地静养几天。可是他是不肯休息，我劝他，他也不肯听。”

“我们也是这样想。他做事太认真，所以什么事都要自己来管。可是他究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况且一个人的精力也有限，使用时也应该有点节制，”素贞关心地说。

田惠世拿着信件回来了。“洪先生，这两封投稿信请你登记一下，”他说着把两封信递给洪大文，自己手里还拿着一封拆开了的信。

“田先生，是你的小姐写来的吗？”文淑含笑问道。

“是的，”田惠世答道，他的眼光还停留在信笺上面。

“我倒很想见见田小姐，”文淑说，“父亲是这样，女儿一定不错。”

“世慈倒象她母亲，”田惠世说，他的眼睛还埋在信纸上；“她来了你们看见就知道。”

“田小姐要来吗，田先生？”素贞惊喜地说。她从前在广州

见过世慈一面，只是匆匆的一面！从面貌上看，世慈跟她的母亲并不相象。世慈的圆圆脸、大眼睛，跟田太太的瓜子脸、小眼睛恰恰相反。此外她便知道了。不过她相信田惠世的话，因此她很想再看见世慈，同世慈在一块儿处一些时候。

“她寒假里也许会来一趟，她母亲很想她来。不过照现在情形看来，来不来还说不定，”田惠世答道；“她母亲很想念她。做母亲的人的心理很特别。”

“我也想见见她。不过我还不知道在这儿住多久，”文淑本来露出一脸的喜色，听见田惠世的话以后，她有点扫兴地说了上面两句话，但是过了片刻，她又接下去说：“她不来，我可以去看她，我说我是田先生的朋友，她一定跟我要好。”她忍不住笑了。

世明端了米粉进来，他把碗送到每个人的手里，一面说：“对不起，让你们等久了。”

“不久，不久，”除田惠世外，其余三个人都这样地回答他。他又下楼去了。除田惠世外（他吃的时候没有做声），其余三个人一面吃，一面称赞味道好。不久世明又端了四碗粉上来。接着田太太也端了两碗上来。

“味道不好啊，”田太太笑着说。“请坐，请坐，”她看见他们都站起来，便加了这一句。

“很好，只是你太累了，”素贞说，文淑也说了类似的话。

“不累，不累，”田太太说，她找到一个凳子坐下，她手里的碗已经被世明接了一个去了。他们看见她坐下，便也坐下来。

“田先生，田先生，”有人在下面天井里大声唤道。他们听出这是陈济民的声音。

“哎，哎，”田惠世答应着，连忙跑到栏杆前去。

“有预行了！”陈济民站在天井里，仰起头看楼上，手里抱着好几个邮包。

“你邮包取回来了？”田惠世顺口问了一句。

“都取回来了。我快到家了才看见旗子，你们快准备啊！”陈济民略带慌张地说。他转身把邮包抱进办公室去了。

田惠世也掉转了身子。他对屋里的人说：“有预行警报。不要紧，我们慢慢吃。”可是他们已经听见陈济民的报告了。

洪大文匆匆地放下碗来。他说：“我下去给陈先生帮忙，”便拿起木枋急急地走下去了。

“我们也去帮忙，”文淑兴奋地说，可是她却等着素贞放下碗以后一道下楼。田惠世用家乡话同太太交谈了几句，他比她们先下去，文淑和素贞到了楼下时，邮包都已经搬进办公室里了。田惠世和洪大文在整理稿件，把它们放进两个皮包里，陈济民收检了帐簿，又走进他的寝室去拿了一个布包出来。

“要我们帮忙吗？”文淑问道。

“不要了，我们快弄好了，”田惠世答道。

就在这时，凄厉的警报声突然嘹亮地响了起来，象一把利刀似地戳破了平静的天空。

“空袭警报！应该走了！”陈济民惶恐地说。他的圆中带扁的脸突然发白了。

“日本人倒讲信用，这回真是说来就来，”田惠世镇静地开

玩笑说。

“那么今天倒要领教他们的本领了，”冯文淑笑道。她看了洪大文一眼，她故意用了“领教”两个字，这是洪大文常说的。

“我看也不过胡乱丢几个炸弹罢了，日本飞行员还有别的本领吗？”洪大文正经地说。他没有想到冯文淑在取笑他。

“我要先走了，”陈济民一手提着小皮箱，一手提着布袋说；他走到门前，正遇着世明提了一个包袱从外面进来。世明拦住他说：“陈先生，给你留得有米粉，你现在要不要吃？”

“不吃了。大家快走罢，”陈济民慌张地答道，就往外面走了。

田太太提了一个布包在门口站住了，她问道：“要不要走？”

“走，”田惠世答道。他又对素贞说：“朱小姐，请你们陪我太太先走一步，我马上就跟来。”

素贞应着。文淑抢先把田太太手里的布包拿了过来，世明搀着他的母亲，素贞因为手空着，也扶着田太太的另一只手臂。四个人一起走了出去。不过三四分钟，田惠世和洪大文也锁上门走了。他们走出巷子，正看见冯文淑的头在人丛中动着。他们急急地赶了上去。洪大文的一只腿靠着木枒的帮助跳得很快。田惠世提着两个皮包却走得有点吃力了。他们赶上了文淑一行人，却看不见陈济民。“陈先生呢？”田惠世问世明道。“我们看不见他，”世明回答道，他看见父亲赶来，脸上现出了喜色。

“田先生，让我拿一个罢，”素贞看见田惠世额上在冒汗，口里在嘘气，她注意到他提着的两个皮包，便从他的手里接了一个过来。

他们六个人走出了城门。空中尘土飞扬，土地高低不平，人象水似地带着嘈杂声向前流去。男女老幼讲着各种方言，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有的打着彩色的伞，有的戴着白色或者别种颜色的帽子，跑着，走着，或者被人搀扶着，这样构成了一个奇异的行列。常常有一两部黄包车颠簸地从后面滚上来，引起了更大的骚动。

他们走过一片坟地。坟墓快要踏平了，偶尔有一两块断碑倒在地上。人们的脚已经走出了几条路。活人的脚毫无顾忌地踏着稍稍隆起的坟头，稀疏的草在践踏下已经变成枯黄了。这个人海的水从这里开始散流到各处去，旁边有山岗，下面有田野，小树林，水沟，草地……

突然间响起了紧急警报。连警报声也显得十分慌张，好象危险就到了眼前似的。人们狂乱地跑起来。在拥挤和喧闹中，每个人只顾到自己，只想给自己找一个安全的藏身处。人们本能地狂跑，乱撞，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部分人跑到下面树林中躲了起来，另一些人象一根长长的线，正在翻越山岗。还有许多人却继续往前面走，他们只想走得远远的，远远的。

机声听得见了。“敌机来罗！”一个拿着枪、袖上缠着黄布的壮丁嚷起来；“不要跑！不要跑！”人们仍然在跑。“我们到那边去！”文淑指着前面沟边有树荫的地方说。别的人也不讲

话，却向着那个地方走去。机声越来越响亮了。他们跑到树荫下，立刻在草地上坐下来。他们抬起头往四处看，他们惊奇地发见那许多人在刚才这么短短的时间里全消失了。一点影子也没有。四周是这么静，连远处的鸡犬声也听得很清楚。可是听得最清楚的还是敌人的轰炸机的摩托声。

“看见了，在那边！”世明仰首望着天空，低声说，他的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在哪里？”文淑问道。“在那边，九架，不，十五，不，二十七架，”世明一面看，一面答道。文淑已经看见敌机了，别的人也都看见了。蔚蓝的天空里一些蜻蜓似的小东西，远远地向着他们头上飞来，颜色雪白，数目果然是二十七只，九只一队，一共有三队，排列得十分整齐。声音越来越响亮，飞机也渐渐地逼近了。高射炮接连地响着。“我们躺下来罢，”文淑提议道。她便伏到地上去。“躺下好，”洪大文也是这样说。众人都伏在地上，却仍然时时抬头去看天空。

敌机正飞到他们的头顶上。这几个人都屏住呼吸，身子紧紧挨着土地，眼睛仍然注意地望着天空。他们以为炸弹就会向他们的头上落下。“孔隆”、“孔隆”的声音快要震聋他们的耳朵了。

敌机飞过他们的头上，还不多远，忽然撒下了一些东西，好象是一束雪茄烟，散了开来，在空中飘着冉冉落下，映着日光一路上闪亮闪亮的。

“投弹了，”文淑自语道，她埋下头，闭着眼睛。也没有人答话。耳里只听见一阵并不太响亮的爆炸声。这周围的空气，甚至土地也起了轻微的震动。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他

们仿佛从疲倦的梦中醒过来似的，嘘了一口气。以后他们才注意到机声渐渐地远去了。文淑第一个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别的人也立起来了。东南角上尘雾弥漫，黑黄色和灰色混在一起把那一段蓝天遮盖了。

“今天不知道炸到哪里，大概是东南门一带，”素贞说。

“是的，就是那个方向。今天投弹一定不少，”田惠世说。

在水沟的另一面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先前就只看见稻穗随着风在微微飘动，这时稻丛里却突然跑出来许多人，他们头上、身上还带着稻草和尘土。矮矮的土坡上本来什么都没有，现在也站满了人。谈话声代替了机声。恐怖的时刻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敌机的消息。人们逐渐地增多，这附近快要变成了一个闹市，挑担子卖米线和别的饮食的人出现了，并且大受人们的欢迎。人们吃着，谈笑着，抱怨着，使这个地方更象一个茶馆。

“应该解除了罢，”两个多钟头以后，他们已经坐在树下谈了许多话和许多事情了，文淑忍耐不住，忽然带着希望地自语道。

“恐怕还早，现在他们机场近得很，不比从前了，去了还会再来的，”素贞答道。

“高射炮没有打掉它一架飞机，算是便宜它了，”世明带点失望地说。

“它不敢低飞，高射炮自然难打着它，”洪大文解释地说，他用上嘴唇顶了鼻孔一下。他又加了一句：“最好我们自己有飞机跟它打。”

“将来总会有这一天的。前年在汉口不是一次打落它三十几架？”文淑说，她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就在这时候人群忽然骚动起来。大家闹哄哄地挤在一堆，开始向墓地那面移动。

“什么事？”世明问道。

文淑站了起来，她说：“他们回去了，一定是解除警报了。可是怎么没有听见解除的声音？”

“你听，这不是？”素贞指着天空说。文淑果然听见一种长长的汽笛声，不过声音有时低到使听的人疑心这是自己的耳鸣。

“我们也走罢，”洪大文站起来说。他动着木拐先走了。众人也都立起来慢慢地走回城里去。

进到城里，素贞和文淑两人跟田惠世一家人分手了。她们先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出去在一家本地小饭馆里吃过中饭。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她们打算去看灾区，走过一家报馆的门前，看见许多人围在那里读《号外》，她们也走近去看。文淑的身材高一些，眼光也快一些。她读完《号外》，脑子里只装进了一些××，可是从几个站在她旁边的人的口中，她却知道一些被炸的街名。

“走罢，这些叉叉街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文淑催促素贞道。

“是啊，其实这里本来可以不用叉叉的，”素贞掉转身来说。

“我们先到金碧路去看看，”文淑说。

她们离开报馆，又走了一条街，在十字路口，忽然看见田惠世坐了一部黄包车，从右边街中慢慢地转了出来。文淑欣喜地大声唤着：“田先生！田先生！”她走到车子前面，问道：“你到哪里去？”

车子停下来。田惠世脸色发黑，两眼睁得很大，眼珠没有一点光彩，手微微发抖，他声音含糊不清地答道：“我到世清学堂里去。世清——”

“世清怎样了？”文淑、素贞两人齐声问道。

“我不知道，恐怕……”他张开嘴吐出嘶哑的声音，泪水从眼眶里进了出来。他似乎还在努力控制他的感情，不给人看到他的软弱。

“是不是炸——”文淑刚刚吐了这四个字，素贞就连忙打岔说：

“我们也去，我们陪你去看看。”她们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打了一个冷噤。

“那么田先生，你坐车先去，我们就跟了来，”文淑说。

“我们也会坐车赶来的，”素贞说。

“我们一路走罢。我也不要坐车，这个车夫拉得太慢，”田惠世说，就跳下车来，伸手去取车钱。

“田先生，你还是坐车好，我们会跟来的，”文淑说。

“不，”田惠世痛苦地摇摇头说：“一个人坐在车上心里更难过，我更害怕。”他把车钱给了车夫。

“世明呢？”素贞问道。

“我要他在家陪他母亲，他母亲更受不了，”田惠世痛苦地

答道。

这两个女子也不再讲话了。她们默默地跟着田惠世走了几步。她们偷偷地看他，他脸色阴沉，埋着头，点着手杖，跨着大步，飞也似地向前走。

“田先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伤了，还是——”文淑忍不住终于发问道。

“我也不知道，”田惠世摇着头答道；“学堂里来通知，要我们马上就去，说是世清——”他说不下去了，忽然抬起头望着天空，停了半晌，才继续说：“这不可能！我不相信！”他又把头埋了下去。

“说不定受了一点轻伤，抬到医院去了，过几天就会好的，”素贞柔声安慰道。

“世清很聪明，他会躲的。多半是学校当局没有经验，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你也不用着急，”文淑接下去说。

田惠世含糊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他的意思她们并不了解。他知道的是，事情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学校的通知虽然没有明白写出那一个可怕的字：死，但是事情的严重性却已经在字句间流露出来了。他知道在学校那边有一个打击等待着他。这是一个极可怕的打击，它的重量是他可以料到的。他必须去接受它，他必须忍受那残酷的命运。他知道这是不可逃避的，可是他害怕去接近它。他害怕自己会在这个打击下面破碎。……他一路上用了绝大的努力支持自己，控制自己，他不让自己想过去的事，也不让自己想到未来。但是他的眼前老是晃着世清的影子，一些旧事象火花似地不断地在他的

脑际闪亮。他忽然疑惑起来。他看看天，他看看街，他看看人。这一切不都是跟往常一样的么？并没有一点改变。那么他是在做梦？他的努力失败了，他的思想更乱了。他又仰望无云的蓝空，天高气爽，阳光和煦地抚着他的脸颊。难道这是“主”的仁慈的手的抚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难道这是试探么？那个孩子还是好好地活着的罢……

他们走过了好几条街。他时而低头，时而抬头，却始终不讲话。在他旁边走着的两个年轻女子，时时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偷偷地看他，她们也不敢吐出一个字。她们只是希望在学校里看见世清的笑脸，这个孩子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害。

“主啊，为什么还要试探我？难道我对你还有不忠实的地方？”田惠世仍然沉溺在自己的思索里，他谦卑地、痛苦地发问，声音十分低，只有他自己听得清楚。他盼望着回答。

一声巨响惊醒了他。过了半晌，他定了定神睁大眼睛看，前面街中塞满了人和尘土，一座高楼倒塌了。瓦砾堆上七八个人躬着身子在工作。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只听见一个人叫道：“又是一个！”

他恐怖地站住了。难道这便是“主”的回答么？这不是梦。这不是试探，这是惩罚了。他绝望地想着：我犯了什么罪呢？

“田先生，走罢，”素贞在他的耳边温柔地说。他侧过头看她一眼，又默默地转身走了。

不久，他们就到了那个学校。校门口站着十几个学生，他声音发抖地对一个学生说：“我找校长。”

这个学生惊奇地看看他，又看看文淑和素贞，然后客气地答道：“校长就在那边，我带你去。”

他们三个人跟着这个学生走进操场，别的学生在后面唧唧喳喳地谈论着。

“请问你是田世清的父亲么？”走了十多步以后学生忽然问了一句。

“是，”田惠世短短地回答。

“我是他的朋友，”学生又说一句，他的年纪不会比世清大，他一定是世清的同班同学。田惠世看了这个孩子一眼，面貌相当清秀。可是田惠世觉得自己的眼睛湿了。

在操场的一角，围着一堆人，不知道在看什么。他们还没有走近人群，就看见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迎着他们走过来。“这就是校长，”学生低声说。田惠世立刻大步迎上去。

“我是田世清的父亲，”田惠世急急地对校长说。

“久仰，久仰！”校长殷勤地握着田惠世的手；“老先生来得正好。”

“我是得到贵校的通知赶来的。世清怎样了？”田惠世急急忙忙、战战兢兢地说。他的眼睛牢牢地望着校长的厚厚的嘴唇。

“这也是想不到的事，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老先生也不必悲痛……”校长皱起他的一对浓眉说。

田惠世不等他讲完，打岔地问道：“世清究竟怎样了？请你老实说！”

“我们已经把他装好了，棺木是学校买的，”校长还是慢吞

吞地说。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天早晨还送过他一段路。他现在在哪里？我要看看他！”田惠世带了一点疯狂的样子追问道。

“棺木就在这里。老先生今天要搬走也好。不然就暂时在敝校图书馆里停两天，等你找到地以后再来搬，敝校马上就要疏散了，”校长继续说。他诧异地看了看素贞和文淑。她们两个的眼睛都红了。

“我去看他！”田惠世说，也不去管校长，也不去管他旁边的文淑和素贞，就一个人向人丛中跑去。校长和两个女子也只好在后面跟着。

围成圈子的学生们给田惠世让开一条路，他进到了圈子里面。空地上四根矮长凳，上面并排放着两口白色棺木，盖子紧紧盖上。两口棺木的颜色和大小都是一样，他看不见世清的任何一個标记。

“就是这一口，”一个学生指着靠外的一具棺木低声对他说。

田惠世凝神望着那一具棺木。他不能够把这个白色的东西跟他的活泼的孩子联起来。他想，这不可能！这决不是事实！今天早晨他还对他笑过！周围是一阵可怕的沉寂。他茫然掉头看看旁边的人。文淑和素贞两个都是满脸泪水，她们出神地望着棺木。校长沉着脸，不作声。学生们带着忧郁和同情的眼光看他。

“可以打开盖子罢？让我看看他，”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校

长说。

“可以的，”校长连忙答道；“不过还是不要看罢，你的少爷倘使死而有知，他一定不愿意让你看见他。”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田惠世茫然地接连说。

“他整个脸都削平了，老先生，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光景！”校长用痛苦的声音说。文淑轻轻地叫了一声，她的眼泪泉水似地涌了出来。

田惠世埋下头，用右手手掌蒙住自己的脸，他的身子微微地抖了三四分钟。别人以为他哭了。过了一会儿，他放开手，他的眼睛却是干的。他对着棺木，用低到别人全听不见的声音唱着送别的歌。他忽然掉头问校长：

“那一口棺木呢？”

“这个学生，家在贵州，已经打电报去了，”校长答道；“他今天跟世清一起躲在田边一个浅沟里面，他的头也砍去了半边。今天遭难的就是他们两个。……”

田惠世含糊地应了一声，他不等校长讲完，忽然掉转身子问道：“世清的寝室在哪里？”

“在后面，”校长略带惊讶地答道；他又问一句：“老先生要去看吗？”

“请带我去看看，”田惠世低声说。

“这两位？”校长望着文淑和素贞问道。

“我们在这里等好了，”文淑答道，她看了素贞一眼，她们已经把眼泪揩干了。

校长陪着田惠世向宿舍走去。一群学生在后面跟着。他

们走了不过十几步，一个穿中山装的矮胖的人气咻咻地赶上来。校长把这个人介绍给田惠世道：“这位是训育主任刘先生。”刘主任马上伸出手来说：“田老先生，久仰，久仰！我还是《北辰》的读者。”田惠世含糊地吐出两个字音，勉强地握了那只伸过来的手。他的嘴就不再张开了。刘主任把嘴凑到校长的耳边讲了几句话，校长也用很低的声音回答。

他们到了世清的寝室。房间不太大，是长方形的，三面都放着上下两层的床，中央有几张条桌拼成一张较大的写字台。世清的床铺在左边的上层，帐子被褥等等都整洁地放在原处。桌上的书和笔砚，屋角的小皮箱也带着平日那种安闲的样子。这些东西在田惠世的眼里都是很熟习的。他想，这一切都平静地留在这里，他今天第一次来到世清的寝室，为什么世清不能来迎接他？训育主任在旁边对他讲话，两个和世清同寝室的学生也进来对他讲话，他们都在叙述世清在这个寝室里的生活情形和遇难的经过。他不住地点着头。他似乎注意地听着，可是他并没有抓住他们的一句整话。他呆呆地望着世清的每一件东西，仿佛连一管小小的毛笔上也有世清的影子。后来他觉得他们的声音没有了，他便向着刘主任温和地说：

“我想去看看他遇难的地点，请找个人带我去。”

“我陪老先生去，”刘主任恳切地说。

“谢谢你，”田惠世慢吞吞地说。他走出门，又侧头对刘主任说了一句：“他的东西我明天来收拾。”

“不要紧，我们整理好送到府上来罢，”刘主任客气地说。

“不必了，反正我明天要来，”田惠世的声音嘶哑了，他咳

了两声嗽。

他回到操场，看见文淑、素贞两人在跟学生们谈话。她们连忙跑到他的跟前来，文淑亲切地问道：“现在回去吗？”

“我去看看那个地点，”他低声回答。

“我们也去，”文淑说。

他没有说什么。校长送他们到校门口。刘主任和两个学生陪他们走到世清遇难的地点。他们沿着小路走，大约走了半点多钟，看到了一条浅沟。左边是一排稀疏的老树，树外横着一片白色的水塘；右边是一条小路，路外横着一片黄澄澄的稻田。“就在这里，”刘主任指着说。田惠世埋下头看。两滩血迹，相隔有四五步光景，已经被尘土吸干了，现着黑色。刘主任指的一滩比较大些。此外没有一点引人注目的地方。沟里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还有几个窟窿，和一些脚印。沟边长着寥寥几棵野草。他奇怪地想：“就是这个地方？这是可能的吗？这是他的血吗？”他的心忽然厉害地痛起来了。

“这两棵树也挨了弹片，”刘主任指着两棵离得较近的老树说。田惠世的眼光便射到树上去。一棵树被拦腰砍去一块，张开白色的大伤口，另一棵树树枝被斩掉大部分。

“那边一个大窟窿，”刘主任指着说。那是在田坎上，窟窿似乎并不太大，刚刚把田坎挖断，可是黄金色的谷穗却被削去了几大片。

刘主任的嘴闭上了。田惠世默默地掉头看四周。空气里充满了稻香。一丛一丛的熟稻在微风里摇摆着它们的埋下的头。越过水塘，在远处一带树林的后面，太阳正往下落，林梢

一片红光，象血迹又象火景，把淡青色的天空映红了一部分。水塘里也浮起了一阵光，一阵浅红。“火！”他忘了自己地轻轻唤了一声。于是他祷告起来：

“难道这是在焚烧罗马城么？主啊，为什么要流这些血？为什么不放过这个天真的孩子？难道这是公平？难道这是你的意旨？明示你的仆人罢。倘使应该牺牲，倘使我需要受罚，就是拿去我所有的孩子，挖去我的身上的肉，我也无怨言。可是为什么让那个暴力横行？为什么让它摧残这些和平的生命？这些不都是你的城市，不都是你的子民？主啊，你给万物以生命，你创造了光明和福佑。可是为什么让那个暴力在我们这里散布痛苦和死亡？仁慈的主啊，请你垂听你的仆人呼救的声音。……”

他睁开眼睛，又看了一眼沟里的血迹，他用极亲切的声音轻轻说了一句：“别了，”然后抬起头对刘主任说：“我们回去罢。”刚刚说了这五个字，他就大声咳起来，大约咳了七八声，又止住了。素贞关切地问他：“田先生，你不舒服吗？”

“还好，”他简短地答道。他把那条浅沟再望了一眼，他忽然问刘主任：“这块地是谁的？”刘主任答道：“不知道，大概是附近农家的罢。”他埋下头沉默了片刻，又抬起头来嘘了一口气。他对刘主任重说一遍：“我们走罢，”就大踏步走了。

“我害怕田先生受不了这个打击，他的举动有点失常了，”文淑低声对素贞说。

“我不敢想，”素贞答道；“偏偏他这两天身体又不大好！……”她的咽喉给堵住了，她挣扎了半晌，又吐出两句：“我们

又不能够给他帮一点忙。……世清是他最喜欢的孩子。”眼泪使她的眼睛花了。

他们回到学校，看见洪大文同陈济民正在操场里跟校长讲话。

“看过了？”校长迎着问了一句。

田惠世点点头，刘主任代答道：“看过了。”

“请到里面去坐一会儿罢，”校长殷勤地说。

田惠世摇摇头，他也不动一动。

“那么，老先生，你回去罢，后事让我跟陈先生两个来办好了，”洪大文走近田惠世，恳切地对他说：“你要怎么办，我们就照你的意思办。你自己身体要紧，还是回去歇一会儿罢。”

“田先生，你可以放心，我们待世清就象自己的兄弟……”陈济民说，他的眼睛也红了。

田惠世点点头，他的嘴动了动，可是并没有吐出一句话来。

“田先生，你还是回去罢。别的事情你让陈先生、洪先生他们去办好了。我们也可以帮一点忙，”文淑在旁边劝道。

过了一阵，田惠世哑声回答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要早点把他安葬就是了。他的东西让他哥哥给他保存。地，我希望就买刚才我们看的那一块。他的血还留在那里，让他的骨头也埋在那里罢。……我能够给他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

“你放心，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洪大文感动地答道。

“好罢，谢谢你们，”田惠世点头说，两手紧紧地按住手杖，他的背显得更驼了。

十 五

世清的葬礼十分简单。学校全体员生在出事的第三天就疏散到乡下去了，只留下四五个职员和工友办理未了的事，因此并没有一个世清的同学到墓地来看他的棺木入土。参加葬礼的人只有寥寥几个，田惠世夫妇和世明，陈济民和洪大文，素贞和文淑，两个学校职员和一个工友。这一天上午敌机又在城里热闹市区投过不少的炸弹。

工人们把棺材放进了墓穴。田惠世捧着一本《圣经》，念着福音书里的一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他阖上《圣经》，闭了眼睛，用颤抖的声音背诵着另一本书里的话：“怜悯的日子到了，幸福和安乐的日子；我对你们说，基督今天要把你们聚到他的周围，安慰你们，并且叫你们坐在他右边。你们总要有信仰，因为你们看上天的门为你们开了。”田太太埋下头在旁边低声抽泣着。他睁开眼睛将一把土撒在棺材上面，口里念着：“我们从土里来，又回到土里去……”

田太太忍不住哭出声来，但是马上又止住了。田惠世抬起头同情地看了她一眼。工人们正在用土掩盖墓穴。世明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小声哭着。文淑和素贞接连地用手帕揩眼睛。

洪大文的鼻子不断地发出响声，两眼已经通红了。

工人们做得很快，三个人盖土，另一个人在挖草皮。太阳还没有落下，他们就把坟做好了。

田太太还靠在一棵树上哭着，世明站在她旁边低声劝她。田惠世呆呆地望着新坟。工人们过来找陈济民讲话。文淑和素贞两人一面谈一些闲话（她们为了驱除心上的悲痛，才谈起闲话来的），一面看四周的景物。悲痛似乎渐渐地离开了她们，又似乎逐渐在增加。她们不知不觉间又想起了前几天她们到这里来的情景。四周没有一点改变，除了这新坟。依旧是那几棵老树，明镜般的水塘，黄金似的稻田；只是浅沟填平了，现在是一座坟，耸在它上面。在这土堆下就埋着那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的血和肉。素贞忽然想起了那天世清跟她谈过的一番话，她的同情增加了，她的痛苦也增加了。她看看那个父亲，他的头仍然埋着，她想：他怎么能够负担这么一个重大的损失？

“啊，这里……？”文淑忽然变了脸色惊叫道，不过声音不大，没有引起田惠世的注意。

“什么事？”素贞吃惊地问道。

“你看，”文淑指着她旁边一棵矮树的桠枝说，在那根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

素贞痛苦地叫了一声。她连忙掩住自己的嘴，把脸掉开了。

“不要嚷，”洪大文走了过来，他低声嘱咐她们说：“不要让老先生知道。”他伸手把它从枝上取下拿走了。

“你拿到哪里去？”文淑轻轻地问道。

“我等一会儿就把它埋到土里去，”洪大文镇静地答道。
“你去劝老先生他们回去罢，时候不早了。”

“好的，”文淑痛苦地应了一声，她看见素贞呆呆地望着远远的一带树林，太阳正向着林梢沉下去。她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肩头，问道：“你还在想什么？应该回去了。”

素贞猛省地掉过脸来，她那火似的眼光在文淑的脸上盘旋了片刻，她的脸上交织着悲痛与恐怖的表情。她说：“我看见那块肉，我怕极了。我不敢再看他父亲母亲。他们怎么受得下去？他们也是一样的人啊！”她求助似地望着文淑。

文淑紧紧地握着素贞的手，沉默了半晌，然后说：“我们过去劝田先生、田太太回去罢。”她只说了这一句，素贞默默地点着头。

田惠世夫妇同世明先回到家，他们在门口遇见印刷局差来送稿的工役。工役把一卷校样交到田惠世的手里，一面说：“王先生说请田老先生快点把稿子看好送回去，免得耽搁时间。”

“我知道，”田惠世顺口答了一句。他拿着校样往办公室走去。

“你不上楼歇一会儿？”田太太关心地看他一眼，在后面柔声地问道。

“我想看看校样，”田惠世温和地答道。

“你太累了，让世明给你看罢，不然留给洪先生看也是一

样，”田太太接着说。

“我还好，我不觉得累，你先上去休息罢，”田惠世固执地说，他勉强地对太太一笑，就走进办公室去了。

田太太望着他的背影，微微叹了一口气，她嘱咐世明道：“你去陪他。我先上楼去。”世明听从她的话到父亲那里去了。

“你，你回来……啦……？”田惠世看见世明进来，心里一跳，吃惊地问了一句。他刚在写字台前面坐下，还没有摊开校样，他以为他看见世清了，连忙站起来。

“妈叫我来陪你，”世明答道。“你要不要我给你做事？”

他听出了世明的声音。他揉揉眼睛，惊愕地注意他面前这个孩子，他看清楚了这张苍白的脸，他失望地跌坐下来，短短地嘘了一口气，他沮丧地答道：“不必哪，”便俯下头去看校样。他看了一页，又抬起头，看见世明还站在门口，唤了一声：“世明，”一面向儿子招手。世明走到他的面前。

他用亲爱的眼光看了世明半晌，又伸手捏了捏儿子的膀子，和蔼地问道：“你身体怎样？”

“很好，”世明亲热地答道。

“没有什么不舒服罢？”他又问一句。

“没有，一点也没有，”儿子爽快地回答。

“晚上睡得好吗？”

“睡得好。”

“我明天出去再给你买两瓶清鱼肝油来。这两天为了你弟弟的事情把鱼肝油忘记了，”他忽然咬了一下嘴唇，又仰起头去看天花板。

“爸，我现在好多了，不吃，也没有关系，”孩子拿起父亲的一只手说；“补药渐渐贵起来了，你又不是有钱的人。”

“还是吃的好，这一点钱不要紧。等我买来了你就吃罢。……给你姐姐的信寄出去了？”

“今天早晨就寄出了，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世明惊讶地说。

“哦，我忘记了。这两天我记性坏极了。你觉得我这个办法对不对？先对她说世清生病，以后慢慢地说病重，这样她容易受得住。”

“爸，”世明唤道，他把父亲的手捏得更紧了。“你想得很周到。不过，……既然姐姐都受不住，你又怎么受得住呢？”他的语声变做了哭声，眼睛里早包了一眶泪水，他把头放在父亲的怀里哭了起来。

田惠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的手爱怜地抚摩着儿子的头发。他又朝天花板望了片刻。“不要哭，哭多了也没有用。……现在我同妈，除了姐姐，就只有你一个。你要好好地注意你的身体。你弟弟要是活着，多么好。……他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也该好好地活下去。”世明哭得更厉害了。“不要过于伤心，这都是偶然。主的意旨不会是这样。我们并没有罪。……可是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个惩罚呢？”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突然爆发出来的，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张开嘴，声音嘶哑地哭了几声。这声音是空洞的，不象哭泣，倒象是喉咙里的痰响。世明吃惊地抬起泪眼看他，他的脸黑得可怕，略微陷入的眼睛里燃着快要熄灭的火焰。孩子痛苦地惊叫道：“爸，你生

病吗？”田惠世象从梦里惊醒似地答应了一声，埋下头来，看看世明。他摇摇头说：“我没有病。”可是他忍不住，发出了一阵无力的咳声。世明连忙站直身子，泪痕也不措，就到父亲后面去替他捶起背来。

“爸，你上楼去躺一会儿罢，”过了一会儿世明恳求地说。

“不要紧，”田惠世低声答道。他吐了两口痰，已经止了咳，便转过身子去翻桌上的校样。

“爸，你还是吃点药罢，你咳了好些天了，”世明望着父亲，关切地说。

“我没有病。我病了当然会吃药。你上去歇一会儿。等我把校样看完了，你给我送到印局去，”田惠世说，对世明微微一笑（孩子觉得父亲的笑容是很勉强的），他不再理世明，却俯下头去看校样。

世明只好坐到另一张写字台前面去，静静地等候他父亲看完校样。他拿过一本旧杂志，并不用心地看了两页。他又抬起头看父亲，父亲专心地动着笔在校样上写字。过了一阵他又看父亲，父亲放下了笔，却低声念着一段文章。又过一会儿，屋子里渐渐地暗起来了。他再看父亲，父亲用一只手蒙住眼睛，头就撑在手掌上。“爸，”他惊恐地叫了一声。

田惠世抬起头，望着他惊叫了一个“你”字，又闭上眼，摇摇头，然后再睁开眼来，颓丧地说了一句：“我没有什么。”他看了世明一眼，又说：“我头痛。”

“天黑了，你不要做事了，你会弄出病来的，”世明走到父亲的身边哀求道。

“你忘记了我是医生？我知道保养身体，”田惠世带笑地回答。“错得不多，就只有这一张了。等等你坐黄包车给我送去。我们等着你回来吃饭。”

“既然错得不多，这一张你让我来校罢，”世明又说。

“我马上校完了，你就站在这里罢，”田惠世固执地说。世明不响了。过了一会儿，田惠世放下笔，叹了一口气，把校样卷好，交给世明，还嘱咐了几句话。

屋子里只有近窗、近门的地方还有一点白日的余光。田惠世仍旧坐在写字台前，揉着他那发痒、发痛的眼睛。世明已经跨出门槛，却听见父亲又在那里咳嗽。他便回转去看父亲。父亲脸向着门，右手压在桌面上，左手按着膝，埋着头弯着身子，吃力地咳着。世明跑到他的身边要给他捶背。父亲却止了咳，摇摇头说：“不要捶了。你去罢。”

“爸，你这样咳，还是吃点药罢。你自己开个方子。我去给你配药，”世明哀求道。

“好罢，倘使明天咳嗽还不好，我就配点药来吃，”田惠世温和地答道。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你咳了好几天了，明天是不会好的，”世明说。

“你不知道，我这里（他指着自己的胸膛）伤了，这不是药医得好的。只好让它慢慢地拖下去，日子久了，也许会好起来，”田惠世痛苦地说。他又催促儿子：“你快去罢。”

世明看不清楚父亲的脸，可是他觉得那对眼睛里的余火渐渐地在熄灭。他知道父亲说的是真话。他不能够给父亲帮

忙，除了听从父亲的吩咐。他绝望地看了父亲一眼，短短地说：“那么我走了。爸，你休息一会儿。”他急急地走出门去，他快要哭出来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田太太忽然说：“惠世，我们为世清祷告罢，我们都是罪人。……”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她在床前跪下来，她开始念她的祷辞。

“我出去一下就来，”田惠世自语似地说一句，便走出去了。

他到了平台上。天空漆黑，密密麻麻地嵌了一天的星星。空气相当凉，晚风吹着，有点刺骨了。他觉得喉咙痒，连忙用手帕掩住嘴，轻轻地咳了两声。他的心仿佛被两个字刺痛着：罪人。他疑惑地问自己：“我为什么是罪人呢？”没有回应。他仰头望天，一明一暗地闪烁着的星星好象在对他霎眼打招呼。他不平地喃喃说：“我犯了什么罪？我们犯了什么罪，须得受罚呢？繁荣的城市化为废墟，房屋毁灭，人民死亡，血流遍地……这是谁的意旨？谁点燃暴力的火？谁使和平的土地变成恐怖的地狱？……为什么说我们是罪人呢？我们没有罪。我们一点罪也没有！……”一种诉于正义的欲望打击他的心。过去五十年的生活长长地拖在他后面，可是他每次回顾都没有看到一个暗点。他过得平凡，但是他过得正直。他虔诚地把自己献给了“主”。“主”在这一刻却不埋下眼睛来看他一眼。这些日子在他的周围哭声没有停过，死亡也是每日增加。难道“主”就不再从天空往下看这无数的人受苦？什么时候来“拯

救世界”呢？心灵的痛苦压得他快透不过气来，信心和希望渐渐地朦胧了。他绝望地伸出两只手对着夜空喃喃说：“还我的世清来，还我的世清来。”仍然没有回应，他觉得自己竟然被上帝离弃了。

一只温柔的手搭在他的肩上，柔和的声音轻轻唤着：“惠世。”

这个亲切的声音使他的心渐渐地静了下来。他掉过身子去。

“你还不去睡？”田太太带着凄凉的微笑说。

“我心里闷得很，你先睡罢，”田惠世答道。

“我知道你的心情，”她捏住他的一只手，柔声说：“不过你应该记得《以赛亚书》里的一段话。”她不快不慢、声音略微颤动地念道：“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

田惠世不作声。她把他的手捏得更紧，她慢慢地说：“我们应该相信，……应该有信仰。”

田惠世点了点头，痛苦地答道：“我想不明白。……我心里乱得很。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呢？……为什么世清……”他猛烈地咳起来，他感到肉体的痛楚了，他用一只手按住胸上发痛的地方。

田太太小心地给他捶背。一股风吹过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关心地、怜惜地说：“还是进屋去罢，外面冷啊。”

他勉强忍住咳嗽，说了一句：“我的信仰……我的心都伤了，”便跟着她回到房里。他疲倦地倒在床上，他觉得头发烧，身子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第二天早晨由于田太太和世明两个的苦劝，他开了一个药方，叫世明拿去配药。药配回来他吃了，并不见效。到晚上田太太焦虑地谈起这件事，他却带笑说：“我觉得好多了，好多了。”就在这时下面有人叫门，门开了，过了一会儿，陈济民送上来一封印局王经理的信，信是开封的，陈济民已经读过了，主要的话是：

贵刊已排好三分之二，不日即可全部排竣。兹因急需，请再付款一千元，交来人带回，否则耽误工作，敝局不负责任也。……

“这是什么话！不是才付过一千块吗？”田惠世变了脸色，生气地说，接着就咳了好几声嗽。

“我今天去的时候，王经理就露过这样的口风，照他的意思，要是我们不再付钱，他们不排下去了，”陈济民说。

“不排下去？他不是明明答应过，不必先付钱吗？前两天才拿了一千块去，现在又来要。太不讲信用了！我们办杂志又不是为了赚钱图利……我就去跟王经理交涉！”田惠世说着，就站起来要往外面走。

“惠世，你不要去。这一点小事你不必着急，明天请陈先生去交涉也是一样，不然就再付他一千块钱也好，”田太太关心地望着他，柔声劝道。她也站了起来。

“田太太的意思不错，我看就再付他们一千块，只要杂志

早点印出来就好了，”陈济民接下去说。

“不行，不行，我去——”田惠世一面说，一面往外走。他走了两三步，话也没有说完，忽然回转来，坐在藤椅上，皱着眉头，疲倦地挥着手，声音哑涩地说：“好，就付他一千块钱罢。请你写个信催一下。”他把信递还给陈济民。

陈济民走出去了。田太太和世明都跑到田惠世的身边，田太太惊恐地问道：“你怎么啦？”

“我不行了，明天请个医生来看看，”田惠世痛苦地说，他厌烦地闭上了眼睛。

从这时候起，他就没有下过楼了。

十六

早晨下着微雨。素贞上午没有课，她同文淑到田家去。她们先到楼下办公室。房里很清静，洪大文和陈济民各占了一张桌子，埋着头在写字，听见她们的脚步声，两个人一齐抬起头来。

“怎么今天这么静？田先生不在家吗？”文淑打过招呼以后，问道。

“你们几天不来了，我们正惦记着呢！”洪大文说，“田先生病了。”

“病了？”文淑惊讶地说。素贞也吐出一句意思相同的话，她还问道：“不要紧罢？”

“据医生说，这是肺炎，不要紧，只要吃他的药，一个星期包好，”洪大文答道。

“那就好了，”文淑放心地说，“他咳嗽好几天了，早就应该看医生的。他总说自己没有病。”

“他自己也是医生，因此有时会大意，把病看轻了，”素贞解释地说。她又问一句：“这个医生怎样？”

“就是刘亨利医生，在报上天天登着广告，说是香港、海防的名医。身体倒很结实，”洪大文答道，他伸手揉了揉鼻子。

“洪先生，你这句话太滑稽了，他的身体结实对病人有什么用？又不是请他来赛拳。”文淑噗嗤地笑着打岔道。

“冯小姐，你让我讲下去罢，”洪大文笑着接下去说：“我是说我不相信这种医生会治病；治内病我倒相信中医。而且他的名字不顺口——”

“我知道，外国名字亨利刘，中国名字刘亨利，”文淑抢着插嘴说，她又笑了。“不过他的药怎样？吃了见效不见效？”

“那是一种叫做沙尔法——什么的药片。^①他要老先生每天吃八片。药可是相当贵，都是他代买的，由他每天差人送来。说是外面假货多，他买的是真货，药吃了三天一共二十四片，不但没有见效，病反而加重了，”洪大文说，他的脸发红，光秃的头顶似乎更向上凸出些。刀痕很明显地横在那里。

“田先生自己怎么说呢，他觉得药怎样？”文淑问道。

“他没有说什么，”洪大文答道：“不过今天早晨他说药太厉害了，他不要吃了。他说就这样过几天便会好的。”

这些时候都没有作声的陈济民忽然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束信，插进来说：“我看还是另外请个医生罢。不过田先生不答应，他说这里的医生都差不多，这个不成，恐怕另外一个来也是一样。不过就这样拖下去，更不好。他这几天人瘦得多了。”

陈济民说到这里，世明忽然走了进来。他的脸比往日更苍白了，眼睛也失了神采。他看见素贞和文淑，带笑地招呼了

^① 沙尔法——：大概就是现在的“消炎片”。

她们，还说：“好几天没有来了，爸一直在念你们！”

“我打了两天摆子，她（文淑说时，指着素贞）又忙着上课，所以好几天没有来了，我们还不知道你爸爸生病！他好些了吗？”

世明摇摇头，说：“好象更差一点。不过他自己总说不要紧。从昨天下半天起就没有下床了。”他又对洪大文说：“洪先生，爸问你，最后一批校样送来没有？送来了，他要看一下。”

“刚刚送来，我还只看了四页，”洪大文客气地答道。他又问世明：“要不要现在拿上去？”

世明想了想，答道：“那么就请你把看过的给我罢。别的请你看好了再给他看，不然他又要自己动手校。”

“你们请坐罢，我出去一趟，”陈济民对两位小姐说了这句客套话，就匆匆地走出去了。

洪大文把四张校样交给世明。素贞在旁边对世明说：“我们跟你一道上去。”

“我看爸这个病恐怕不容易治。他自己说他的心伤了。弟弟的死对他是个大打击，”在上楼的时候，世明对她们说。她们含糊地答应着。他的眼睛却被泪水打湿了。

三个人进了房间。田惠世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幅薄被，枕头垫得高高的，黑黄色的瘦脸无力地落在枕上，陷落的眼睛闭着，鼻孔里短促地出着气。他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床前。田太太本来坐在一把靠窗的椅子上，戴着眼镜在读《圣经》，看见了他们，便放下书，取开眼镜，站起来，压低声音对两位小姐讲话。

田惠世忽然把头移动一下，睁开了眼睛。他看见她们，便把脸掉向她们这边。他提起精神，对她们微微一笑，可是只有嘴边两条肉线略略松弛了一点，嘴张了一下，露出一排黄色的牙齿。他吃力地说：“你们好几天不来了。”他说得很慢，声音却很清晰。

“我打摆子，”文淑走到床前说。

“好了吗？”他问道。

“好了，”文淑答道，她才注意到他的枕头旁边放着一张世清的半身照片，是放在镜框里的。

“朱小姐呢？”他的失神的眼睛望素贞的脸。

“我上课，”素贞略略俯下头，答道。

“上海有信来罢，他怎样了？”他问着，又勉强地笑了笑。

素贞迟疑了一下。文淑抢着代她回答道：“岂但信，连人也快来了。”素贞掉头瞅了文淑一眼，也不再说什么。

“那么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他差不多一字一字地说，又笑了一次。

“快了，等你病好了就请，”文淑又代素贞回答。

“田先生，你不要听她乱说，”素贞听见文淑的话，连忙插嘴分辩道。

“早点也好。我劝你拉住他，不要放他再回到上海那个鬼地方去。我这不算是病，都是我太太他们太小心，一定要我看医生。我不过太累了，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我现在连咳嗽也不咳了，”田惠世有气无力地说，说了两句，便喘一口气，说完了，又长长地嘘一口气。

“你晚上不是还咳嗽吗？你应该好好保养啊，”田太太站在文淑后面插嘴说。

“这不要紧，我知道，”田惠世摇摇头说；他又把脸微微移动一下，向着世明问道：“校样送来了吗？”

“在这里，洪先生刚刚看了四张，以后的他还在看，”世明把校样递给他，他接到手翻看了一下。他似乎想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字读下去，可是看了三段，他就支持不住了，手一松，让校样飘落在被上。他皱着眉头，绝望地叹了一口气。

“你不要看校样了，洪先生他们看也是一样的，你要好好休息啊，”田太太关心地劝道。她走过去把校样从被上拾起来，叠在一起拿开了。田惠世不作声，他的无力的目光跟着她的手移动。他的眼里绽出了两滴泪珠。

“看看校样是不要紧的，我太太也太小心了，她连报纸也不肯拿给我看，”田惠世对文淑说，他的眼光落到枕头下当天的报纸上面。

“田先生，你要是不放心，我替你校罢，好吗？”文淑感动地俯下头，在他的脸边说。

田惠世睁大眼睛看文淑。对文淑，这眼光起初是陌生的，她看不出丝毫的意义来，那里面空空的没有一点东西。后来这一片朦胧渐渐地澄清，平日的那个田惠世在目光里出现了，眼睛渐渐地亮起来。他忽然发出较大的声音，唤道：“冯小姐。”文淑应着，又把头俯下去。他说：“我精神不好，办不了事，我请你到北辰社来帮忙，你不拒绝罢。”文淑一时没有回答。他又接下去说：“你记得世清这个孩子罢，他临死前一晚上还劝

过我把你请来帮忙，他说你跟朱小姐两位都很好，反正你现在又闲着……可惜这个孩子现在看不见你们了……”他张开嘴，有泪无声地抽泣起来。

这时屋子里十分静，慢慢地响起一阵隐微的低泣。每个站着的人都在揩眼睛。文淑的嘴里迸出一声带哭的话：“田先生，我答应你，不过我在这里住不到多久，我要走——”

“好，谢谢你，”田惠世哑声打岔道。停了一下他又问：“冯小姐，你说要走，你要到哪里去？”

“我还要到前方去。我过不惯大后方的生活，”文淑直率地答道。

“那么请你等到我的身体完全复原了才走，好不好？”田惠世用力地说，他不瞬眼地望着她，可是看见她点了点头，他便闭上眼睛，昏睡似地把头偏落到枕头边去了。

众人还在床前立了片刻。后来田太太轻声对文淑和素贞说：“他睡了，你们两位请到外面坐坐。”

“好，”素贞答道，便同文淑走出房门到客厅里来。她们到了圆桌前，还没有坐下，素贞又对田太太说：“我看还是另外请个医生来罢。田先生这个病要小心啊。”

“我们劝他另请医生来看，他总不答应。不过我已经托陈先生出去打听了。有好一点的医生就请来，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田太太含着眼泪答道。

“那就好，”素贞略微放心地说；“不过田太太，你太辛苦了，你也要当心身体。”

“我知道。现在只求他早点病好，别的也顾不得了，”她说

着，一面拿出手帕揩眼泪。世明从房里出来。文淑问道：“你到哪里去？”

“爸睡得很好，我把校样给洪先生拿下去，”世明答道。

“给我，我拿下去好了，”文淑说着就伸出手来。世明迟疑地看了她一眼，她说：“你就在房里陪你父亲罢。反正我要下去跟洪先生讲话。”世明说一声“谢谢你”，就把校样交给她了。

文淑接过校样后，又看了素贞一眼，素贞还在跟田太太讲话。她也不说什么，便急急走下楼去。

洪大文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刚刚把校样看完，正在整理桌子上的稿件，文淑唤了一声“洪先生”，他连忙抬起头答应。

“这是刚才拿上去的校样，”她一面说，一面把校样放在他的面前。

“谢谢你，”他感谢道，接着又问：“老先生现在怎么样？你看是不是好一点？”

文淑摇摇头，皱拢了眉毛说：“我看这个病不轻。他床头还放着世清的像片，你说有什么办法？”

洪大文马上变了脸色，眼睛接连地闪了两闪，泪水快要落下来了，他伸手揉了揉鼻子，痛苦地问道：“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束手望着……”

“洪先生，你坐下罢，我有几句话跟你谈谈，”文淑说，洪大文果然马上坐下了。文淑拉了一个凳子过去，她同他坐在相邻的两个角上。

“我答应田先生暂时到北辰社来帮点忙，”文淑兴奋地说，不过声音并不高。

“欢迎！我知道老先生早就有这个意思，”洪大文快乐地笑了。他伸出手来送到文淑的面前，文淑把手迎上去，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差一点使她痛得叫出声来。可是她含笑地望着他，对他微微点一下头。她感到一阵热，一阵畅快。这紧紧的握手给了她一个鼓励，一个保证：她不是孤独的，要是她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在这里还有一只援助的手。

“谢谢你，”她温和地笑道。“所以我现在跟你商量，”她的语调又变成严肃的了。“我们要是在别的方面不能给田先生帮忙，至少我们可以使这期杂志早点出版，让他早点看到心里高兴，病也许可以早点好。”

“是的，是的，这个意思不错，”洪大文连连点头说。

“那么你有把握办到罢？”文淑马上接下去问一句。

“我看一定办得到，只要冯小姐，你肯接手做我这部分工作，我天天等在印刷局催他们，一个星期便可以赶印出来，”洪大文爽快地答道，他的眼睛发出光辉，他的鼻孔接连哼出气来。

“既是这样，就请你把工作交给我罢，我勉强可以担任，”文淑的眼睛也发亮了。她看见他伸出手用力揉着鼻子，她差一点要笑出声来，她连忙掏出手帕，装做擤鼻涕的样子掩住嘴，然后又问一句，“我什么时候来上班？”

“随时都可以，只要你高兴，现在就可以，”洪大文含笑地答道。“要快并不难，那个印刷局可以快，只要我们肯去催他们；我怕的是催了出来没有弄好，老先生看见反而会不高兴。我又丢不开手头的工作，陈先生一天也很忙。现在冯小姐，你

来了，我就放心了。”

“好，那么就请你把工作交给我，反正我没有事。现在校样看好了，你也可以去印刷局了，”文淑说着就站起来。

洪大文也站起来，转过身在抽屉里拿出一叠稿件和信函。

刚巧素贞在这时进来了，她问文淑：“你回去吗？”

“我不回去，我今天上班了，”文淑含笑答道；“洪先生在跟我办交代！”

“好的，那么我先回去，我还要预备下午的功课，”素贞说，她又向洪大文打一个招呼，便走出去了。

素贞回到家，在大门外正遇着邮差从院子里出来。“朱小姐，你有封挂号信，”邮差迎面招呼道。

“在你身边吗？”素贞连忙问。

“是的，”邮差把信从信袋里拿出来，递给她，一面跟着她进去取回执。

信封上贴的是香港邮票，地址却不是刘波的笔迹。素贞的心跳了一下。她连忙走进房间，在回执上盖了章，把它交还给邮差，打发他走了。

她回到屋子里，站在书桌前拆开信读着：

素贞女士：

写信给你的的是一个陌生人，你不会知道他的姓名，不过他是刘波的同志和朋友。现在让他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六天前下午七点钟左右，刘波在法租界环龙路被敌伪绑架去了，听说现在关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的特务机关里。我们正在设法探听他的确实下落。倘使关在法捕房还有办法营救。请你不要耽心，我们会想尽

一切方法救他。我们也希望你能节制个人的情感，为民族解放运动努力。以后有消息再告。你要有信寄上海，可寄交九龙太子道一三三号三楼×××转。祝

好！

抑 强 十六日

素贞读完信，手一松，让信笺落下地来。她也不去拾它，却跌倒般地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她浑身微微颤抖，眼光茫然望着窗外，耳里响起一阵隐约的铃声。在这时候她只觉心里空虚。眼前的一切完全黑暗了，连她自己也好象不存在似的。这样地过了二三十分钟，仿佛有什么东西针似地刺到她的心上，她微微一跳，站了起来。她俯下身子去找信。她捡起它来，低声念了一遍。她痛苦地唤了一声“刘波！”一个快到眼前的希望破灭了，一个未来幸福的依傍崩溃了，几年来热情的寄托消失了。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为什么在片刻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她是在做梦么？她的心还在渴望地呼唤着他，难道他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她不能相信。他的面貌，他的声音仿佛还在她的近旁，他和她还离得这么近！他跟她中间不能够发生什么事情！他还是她的，她也还是他的。

“这封信说了些什么话呢？”她疑惑地问她自己。她在房里踱了几步。她拿着信念了好几遍。她有点不了解那些话的意义了。“这是真的么？为什么他应该得到这个恶运呢？为什么我应该得到这个恶运呢？我们不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献出个人的力量么？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那个原本是极寻常的幸福呢？……”这些疑问象乱丝一般纠缠在她的脑子里，愈

理愈乱。她得不着回答。并且她愈想头愈重了。

“我这时候多么需要你，”她忽然柔情地轻轻唤道，她这时真的需要那只有力的手臂来扶持她，她需要热情的话语来鼓舞她，坚决的信念来支持她。可是她的眼光又落到手里那张信笺上，她仿佛要在那张纸上找回他来。然而她的眼睛被这样的几个字伤害了：“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那个可怕的地狱！伪组织的杀人机关！残酷的魔王丁默村的巢穴！她读过报纸上关于那个人的记载。人进了那个地方就不会活着出来，除了他卖掉自己的灵魂。刘波不是那样的人。那么他的结局就只有下面的两种：憔悴地病死在那里，或者被汉奸杀害。这是十分确定的！一个雷打到她的头上来了！她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她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什么也看不见地过了许久。右手紧紧捏成一个拳头，信笺被捏做了一个纸团。于是墙壁转动起来，天花板渐渐地往下落，她只觉心里难过，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后来她再把眼睁开。窗外响着淅沥的雨声。雨脚帘子似地挂在檐前。中饭的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了。她的脑子清醒了一点。她不想吃东西。她慢慢地坐起来。手早松开了，一个纸团从她的身上落下去。她懒懒地弯下身把它拾起，她又摊开它念了一遍，走到书桌前把它放进抽屉里。她刚打开抽屉，一叠刘波亲笔写的信封便出现了。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噤。她的眼光停留在刘波的笔迹上，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感情来袭击了她。她坐倒在椅子上，头压着桌面悲痛地哭起来。雨声陪伴着她，并且压倒了她的哭声。她哭哑了声

音，哭干了眼泪，觉得心里好过一点，便抬起头来。雨脚也小了，雨势已经断了，天有了晴意。她懒洋洋地走到窗前，立在那里，她又想起一些旧事。她的心被回忆轻轻刺着。她微微咬着下嘴唇。她忽然低声自语道：“三年的等待只得着这个噩耗。我还在做什么梦呢？”

雨脚又变长了，天空失去了那一点点晴意，单调的滴水声再响起来。声音仿佛滴在她的心上。她听着那声音，她数着那声音。后来她穿上雨衣匆匆地锁上门出去了。

她出门时，本想到田家去找文淑（上课的事已经被她忘却了），可是走出巷子，她却改变了主意。她在湖上散步了许久，朦胧的雨景适合她的阴郁的心境。有一次她立在桥边看湖面，她差一点要越过栏杆跳下去。可是她背后响起了一个女孩的声音，女孩讲的是她家乡的语言：“小姐，我是从上海逃难来的。在路上爹爹给东洋人杀了，姆妈……”她不要再听下去，顺手在雨衣袋里摸出几张滇票给了女孩，就逃开了。

等雨住了时她才回到家里。暮色已经降下，文淑还没有回来。屋子里显得冷酷可怕。她进了房，也不点灯，只是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等到天黑尽了，她还没有听见文淑的脚步声。她的胃隐隐痛起来，她便出去，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两碗米线，又到湖上走了一阵。这次回来她已经打定主意了。可是疲倦的身体在过度的紧张之后，不能再支持下去。她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没有能等到文淑回家，就崩溃似地倒在床上睡了。

这一夜她接连做了几个噩梦。早晨醒来，她看见文淑站在床前含笑问她：“为什么昨天睡得那样早？衣服也不脱，铺

盖也不盖！半夜里却只是呻吟，只是哭。你从来不是这样的。究竟昨天出了什么事情？你脸色很不好看。”

素贞不说什么。她一翻身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那封揉皱了的信笺，递给文淑，一面短短地说：“你看罢。”

文淑读完信，马上变了脸色。她不住地眨眼睛，泪水使她的两眼模糊了。她把信还给素贞，埋下头不敢看她，却短短地问了一句：“你打算怎样？”她极力管束着自己，不让自己的感情在这句话里爆发。

“我决定回上海去！”素贞坚决地答道。

文淑吃惊地抬头看素贞，从她的泪眼里她看见素贞的眼睛是干燥的。素贞的脸上没有血色，两颊也较前消瘦，可是整个面部表情是坚定的，甚至显得有点冷酷。“回上海？”她惊叫道，声音里充满着怜惜和友爱，也搀了一点痛苦：“那个可怕地方！你去干什么呢？你有办法救他吗？你既然逃出了鬼窟，就不该再回去。”

“我要去试试看，我能救出他，就不吝惜牺牲自己；我不能救出他，我就替他报仇，”她坚决地甚至冷冷地答道。

“不要去罢，”文淑拉着素贞的一只手真诚地恳求道。“你一个女孩子能够做什么呢？你又是这么良善的人。你还不如在内地做工作好得多。”

“我可以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工作，我可以做他未做了的事，我可以住在他住过的地方，我可以看见他见过的人，”她说着忽然兴奋起来，“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只要我能够——”她的

热情好象被浇上了冷水似地一瞬间就凉了。她转开身子，闭上嘴，怨愤地叹了一口气，她用力扭绞着手。

“素贞，我了解你，你要勇敢，”文淑同情地抱住她，温柔地说。

“我能够办到，我相信我能够办到，我的确需要勇气，”素贞点着头痛苦地说。

“那么你何必还去上海呢？我陪你到前方去好不好？”文淑半劝半求地说。“我们到前方去，可以换一种生活，我们可以忘记那许多事情。”

素贞摇摇头，酸苦地答道：“现在太迟了。我的心在那边。我非走一趟不可。能够救出他，我就跟他一块儿回来；不能，我就留在那边。你再怎么劝都没有用。你的好意我难道还不明白？我问你，你处在我的境地，你怎么办？”

文淑凄凉地微微一笑，回答道：“我处在你的境地，我也只有去一趟。”

“那么你还想劝阻我？”素贞接嘴问道。

“那是因为我也不想这么快就跟你分开！不过为什么要这样急？再等几天看以后的消息怎样，好不好？”文淑说。

“既然要走，还是早走的好，迟了会后悔的，”素贞叹了一口气说。

“好罢。你走一趟也好。我赞成你去。我去找洪大文给你弄飞机票，”文淑直爽地说，她也不再挽留素贞了。她又加上一句：“要走就快点走，好快点回来。”

“他有办法么？”素贞低声问道。“我本来想到中国旅行社

去打听的，路费我倒有，我姐姐最近寄来的钱我还没有花。”

“航空公司里他有朋友，卫戍司令部航空检查处那个副官他也认得。我们昨天无意中谈起，他说我要坐飞机，买票他有办法，而且很快。想不到今天对你就有用处，”文淑兴奋地说。接着她又问：“要不要我马上就去找他？”

“那么等我洗个脸，我们一道去罢，”素贞说。她向房门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问道：“田先生的病怎样？医生请着没有？”

“请着了。叫做汪什么，似乎比刘亨利好一点，他说是肺病，拿了痰去化验去了，”文淑答道，“田先生昨天一天还是你看见的那个样子，也没有变坏。”

“倘使真是肺病，那还不要紧。田先生是上了年纪的人，对他来说，肺病还不是致命的病，”素贞略微放心地说，她的脚跨出了房门。

半点多钟以后，她们到了田家。洪大文坐在办公室里，看见她们进来，他马上站起，高兴地招呼她们。文淑就把托他买票的话说了。

洪大文立刻点点头加重语气地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一定办到。下一班飞机，包朱小姐走得了。现在请朱小姐预备三张相片。我就去办手续。”

“洪先生，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相片，我身边倒有，”素贞感谢地说。

“一趟是不够的，至少得三趟，”洪大文微笑道。他的鼻子又在响了，他伸手去揉了几下。“就请你把相片给我罢，此外还

请你填个履历表。”

“履历表？”素贞惊讶地问道。

“不，就只要姓名、年龄、籍贯，”洪大文笑着答道。

十七

洪大文并没有失信。第四天的下午他陪着素贞在航空检查处领到了许可证，然后去买了飞机票。他们从欧亚航空公司出来，天已经黑了。在这天中午的空袭以后，这条马路的电线炸断了，街灯全熄，一部分店铺紧闭着店门，他们就靠一只电筒的微光照着走路。素贞的脚步下得很慢，她还没有习惯在黑暗中走这一段行人拥挤的大街。她的脑子里装了太多的东西，她的身子似乎显得重了。洪大文却若无其事地一直往前跳，因此他不得不常常站住等待落后的素贞。

“朱小姐，你还回来罢？”他忽然问道。

素贞惊醒似地看了他一眼，她看不清楚他的面颜，她低声答道：“我希望还能够回来。”

过了半晌洪大文又怅然地说：“你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朋友了。碰巧老先生又在生病。……我们真不愿意你离开。”

“田先生的病就会好的。我走了，还有文淑在这里，”素贞也带了点怅惘地说。“不过这次我走得成功全靠你帮忙，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感谢你才好！”她声音颤抖地说。

“朱小姐，你这就是看不起我了。一点小事，何足挂齿，况且这是我应该办的，”洪大文着急地大声说。

素贞正要讲话，她的膀子突然被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拉住了。她差一点要叫出声来。可是她马上认出这个人 是文淑。

“我想一定可以在欧亚公司找到你，果然没有预料错，不过来迟了几分钟。票子拿到没有？”文淑激动地说。

“拿到了，早晨六点钟飞。他们要我明早四点钟就到公司去，”素贞应道，她觉得心里一阵热。她捏住了文淑的一只手。“你怎么不在家里等我们，跑了许多路，到这里来做什么？”

“你有封电报，刚才送来的，我想里面或者有好消息，特地给你送来，你或者可以不走了，”文淑说，声音里带了一点希望，她把电报交到素贞的手里。

他们站在街口，可是四周漆黑，只有一点星子似的油灯光无力地在前面闪烁。他们走了三条街才看见电灯照耀的商店。素贞连忙跑到一个玻璃橱窗 前，拆开电报读了。

“是不是好消息？”文淑赶上来关心地问道。

“你拿去看罢，”素贞冷冷地答道，把电报纸递给文淑。

“波病危，请即来港。强。”文淑低声念了一遍。每一个字都成了铁锤一样的东西对着她的头打下来。她用手按住前额。大约过了一分钟，她拿下手。一个熟习的人影在她眼前一晃，她对他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眼前一片亮光，石板铺的人行道上，只有寥寥三五个人，风吹到身上，使人打起冷噤来。她忽然注意到素贞还埋着头，站在她旁边，她马上紧紧握着素贞的手。她不说话，可是她抽泣起来了。

“走罢，走罢，”洪大文感动地在旁边催促道。她们默默地向前走了。

“事情也真巧，我跟他认识是你介绍，现在这个电报又是你给我送来，”她们走了几条街，到了湖上石牌坊前面了，素贞发出一声喟叹，声音酸苦地说。

“那时我哪里想得到！……我从前还以为我喜欢他呢，”文淑想到了三年前在上海的旧事，她带着一种痛苦的怀念说。素贞不做声，她仿佛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文淑又说：“他倒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现在还记得他的相貌。”她的心被回忆带回另一个时间去了。她接着又说：“电报只说病危，可能还有转机。找你去也许是商量营救的办法。”

素贞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并不作声。

这时候快走到她们住的那个巷子了，洪大文忽然在前面站住，回过头来对她们说：“我们先去吃饭，再回家罢。”

“我不想吃什么，”素贞低声答道。

“我也不饿，”文淑摇摇头说。

“这不行，你们今天晚上预备不睡觉，怎么可以不吃东西？我跟你们两位不同，我即使有天大的悲哀，我也要吃个饱。吃饱了才有精神做事，”洪大文着急地说。

“洪先生的话也不错，素贞，我们还是吃点东西罢，况且他又是诚心给你钱行，”文淑觉得洪大文的话有理，便顺着他的口气劝道。

素贞迟疑了片刻，微微点一下头答道：“好的，不过我今天要喝两杯酒。”

“好，我陪你喝，我今天也想喝酒，”文淑接着说。

“可是千万不要多喝啊，你们不是还要去看老先生吗？”

“洪先生，你放心，我们不会喝醉的，”文淑微笑地答道，这笑容里含了一点兴奋，却没有快乐。

他们在附近一家较清洁的小饭馆里吃了饭。素贞和文淑两人饭吃得少，酒喝得较多。素贞差不多喝了三两酒，这在她，算是很多的了。可是她愈喝脸愈发白。文淑喝了一杯酒，连耳根都红了。只有洪大文好象没有喝过酒的样子，虽然他也曾喝了几杯。

从饭馆出来，他送她们回家。可是送到门前他就告辞回去了。她们也不留他，素贞却带着感激地跟他握了手，简单地说一句：“谢谢你，”然后又说：“我们等一会儿就到你们那边去。”

“你们还能够来吗？我看你们都喝醉了。你们还是在家里多躺一会儿罢，不必来了。老先生那里我替你说一声就成了。朱小姐，你看怎样？”洪大文关心地说。

“我想我可以来的，我没有醉，”素贞沉吟地答道，现在纠缠着她的是疲倦，还不是酒醉。

“那么我更没有醉，我一定来，”文淑坚决地说。

洪大文也不跟她们争论，只说了一句：“我四点钟以前再来。”他走了。

她们并没有到田家去。三点钟刚过，正是夜色正浓、寒气最重的时候，洪大文拄着两根木拐，一跳一跳地穿过那些静寂、阴暗、荒凉的小街和湖上的马路，走到她们住处的门前。

他刚刚敲了两下门，就听见应声，显然她们在等候他。门开了。文淑手里拿着一只电筒，电光照亮她的脸，也同样照亮

了他的。还是那张活泼可亲的圆圆脸。

“冯小姐，你不是说一定到我们那里去吗？”他问道。

她微微一笑，颊上立刻现出两个酒涡，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跟素贞两个回来，头有点昏，支持不住，睡了一会儿，醒来已经过了十二点，不便再到你们那里去。”

洪大文笑了笑，他说：“我知道你们两位一定会醉的。朱小姐起来了罢？”后一句是顺口说出来的，这已经成了多余的了。

“她比我早起来，还是她唤醒我的，”她说着微微嘘了一口气，无意地把两只手放在一起搓了两下。

“冯小姐，你想朱小姐受得住这个打击吗？我有点担心她……”洪大文把声音压低，严肃地问道。

文淑停了一下，才低声回答：“这也难说，这一下打击把她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知道她的心伤得厉害，不过她也许会更坚强。她会好好过下去的，即使她自己心里很苦……”她听见房里一声轻微的咳嗽，马上换了语调说：“我们进去罢，外面好冷啊。”

他们进了房间。素贞正坐在书桌前面椅子上出神地想着什么，她看见洪大文，便站起来说：“洪先生，你真的来了！我们倒失了信，很对不起。”

“我知道你们喝醉了，不会到我们那里去的。不过你们在家躺了一会儿倒也很好，我看你这一半天也够累了，”洪大文客气地说。

“田先生怎样了？晚上没有到他那里走一趟，总觉得少做

了一件事。我真有点想念他。”说到这里，她忽然断念似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等他病好了，请你们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罢，还有田太太同世明，也请你们替我问候他们。”

“我知道，你放心罢，”洪大文感动地说：“田先生晚上跟你下午看见他的时候差不多，只是更弱一点。第二次验痰的报告来了，的确有结核菌。可是汪医生好象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还要化验小便。”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应该送他进医院，”素贞焦虑地说。

“可是他自己不肯去，他说他没有大病，他连药也不大肯吃。他说汪医生配的药是极普通的，吃不吃都没有关系，”洪大文皱紧眉头说。

“那么应该多找几个人劝他。可惜我走了，文淑，”素贞把脸向着文淑掉过去，“你要好好劝他一番。”

“田先生有时候也很固执，劝他，他不见得就肯听，”文淑答道。“我总觉得世清死后，他的宗教信仰也动摇了，他存了一个跟着世清死去的心思，这样就难办了。”

“不过他平日求生的意志很强，希望这只是一时的现象，”素贞说。

“那么你呢？”文淑忽然抓住素贞的手，爱怜地望着她，“你明白我的意思。”

素贞感激地看了看文淑的眼睛，酸苦地答道：“我不知道。我也许还会回来，我也许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不过他的事情我总得给他办了。我跟田先生不同，你放心。”

“那么你会跟我通信罢，”文淑要求道。

“我会的，”素贞爽快地答道。她接着又说：“我们应该动身了罢？”

“是的，应该走了，”洪大文接嘴说；他用眼光在屋子里搜索，他问素贞：“朱小姐，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

“好了，就是一个小皮箱，和一件大衣，”素贞指着那两件东西答道。

“那么你还要回来，你的东西都没有带去，”洪大文脸上现出喜色说。

“要是她能回来，那多好！”文淑插嘴说；“可是我耽心她不回来了，”她说，便伸手去揩眼睛，因为泪水使她的眼睛模糊了。

“你这个妹妹也太好了，”素贞苦笑地轻轻摩了一下文淑的肩头；“我们走罢，在中国现在有多少万人在受苦，你为什么单单关心我一个？”她猝然掉转身子，从凳子上提起了皮箱，又走到床前去拿大衣。

文淑连忙跑过去，把皮箱从素贞的手里夺过来，她孩子似地说：“我来拿皮箱，你拿大衣罢。”

素贞凄凉地笑了笑，然后说：“你在这里多住些时候罢。我会回来的。”

“我等你的信，”文淑含着眼泪说。“你不来信，我就会提早走的。你走了，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他们关了灯，锁了房门，掩上了大门，走出了巷子。没有人影，街灯的微光在寒风里颤抖，几片大黑云象山峰一样横在

天空，仅仅在一个地方露出十几颗不明亮的星星。一路上只有自己的脚音做他们的伴侣。

他们走到欧亚公司门口，大门已经打开了，不过微微掩着，从门缝里射出来汽灯的金光。他们推了门进去。里面厅子里坐了几个客人，公司职员正忙着为旅客们办出发前的手续。

洪大文过去跟那个职员打了招呼，讲了几句话，让素贞很快地把手续办好了。在等候汽车出发的时候，她同两个朋友坐在一张靠壁的沙发上。客人陆续地进来。汽车还没有开到。这等待是相当令人难堪的。素贞疲倦地倚着沙发的靠背，她不想说一句话。两个朋友也沉默着。他们痛苦地在捱时刻。文淑慢慢地把右手伸过去，捏住素贞的左手。这只手是冰冷冷的，但是她紧紧地捏住它。素贞掉过头来看了文淑一眼，马上又把眼光掉开了。

“明天这个时候，你一定睡在香港旅馆里了，”文淑温柔地说，她勉强地笑了一下。

“是罢，”素贞简单地答了两个字，就把眼睛微微阖上了。

忽然汽车的喇叭响起来，车轮的声音在门前停止了。几个没有坐下的客人连忙奔到外面去。“车子来了，”不知谁这样地说了一句。

“车子来了，你要到机场去了，”文淑依恋地说，她轻轻地放松素贞的手。洪大文从门外进来，走到她们面前。他望着素贞，想说话，可是嘴刚张开又阖上了。

“现在要上车吗？”素贞冷冷地问一句。

“是的，已经有人上去了，”洪大文声音颤抖地答道，他把身子掉开了。

文淑忽然感情爆发地拖住素贞的膀子，恳求地说：“姐姐，你先前还叫过我做你的妹妹，那么你真的认我做你的妹妹罢。”

“文淑，你怎么了？不要难过啊，”素贞感动地拍拍文淑的肩头，温柔地说：“你看我都没有哭。”可是她的眼眶里已经泛起泪水来了。

“你去了，不要不理我啊……”文淑埋着头呜咽地说。

“对你这样的妹妹，我怎么能够不理呢？……好啦，不要哭，人家在看我们啊！”素贞凄凉地微微一笑，她觉得她的心被留恋微微地绞痛了。她站起来，把大衣挂在手臂上。

“朱小姐，上车罢，车要开了，”洪大文在旁边催促道。

文淑马上站起来，眼泪也不揩干，走到洪大文的身旁，恳求地说：“洪先生，你可以跟你朋友商量，让我送到机场去好吗？”

洪大文皱紧两眉摇摇头，答道：“我刚刚去问过了，说是航校最近限制很严，公司也不敢通融。”

“那么我们就这样分别吗？”文淑忍住泪望着素贞，勉强说出这句话来。她们已经走到门口了。

“这样也好，终归是要分别的，”素贞压低声音说，她跨出门槛，站到人行道上了。

“快上车，快上车，车要开啦！”人们在汽车旁边大声催促道。立刻有人扑到车门口去。洪大文已经到了那边。素贞也

向着汽车走去。

文淑赶到素贞身边，抓起素贞的手比先前捏得更紧，她亲热地唤了一声：“姐姐，”接着又说：“我们是在做梦罢？”

“文淑，好妹妹，我告诉你，痛苦的梦是不会醒的。你要好好保重啊，”她也紧紧地握着文淑的手。

“姐姐，你也要保重啊，”文淑牢牢地盯着素贞的脸，她把声音压得更低，差不多耳语似地说：“我等着你回来。现在我不哭了。”

“可是你把我引哭了，”素贞抽咽地答了一句。她猝然放开文淑的手，掉过身去，向着洪大文伸出手，跟他的手紧紧一握，感激地说：“洪先生，谢谢你。这次要是没有你，我恐怕还走不了。你替我照料，照料文淑啊！”她转过脸，把眼光在文淑的脸上扫了一下。洪大文正要回答，可是她已经上了车，而且汽车马上就开动了。

文淑忘了自己地挥手，洪大文也把手挥动着。可是汽车已经转了弯看不见了。

欧亚公司的大门关上了。门前的人都已散去。只有文淑和洪大文还立在原处，痴痴地望着空洞的街角。夜色逐渐地消散，天的一角开始在发亮了，房屋的轮廓在朦胧中浮现出来。空气比水更凉，浸透了衣服。文淑不觉打了一个寒噤。

“冯小姐，我们回去罢，你冷吗？应该多穿一件衣服啊，”洪大文关心地问道。

“还好，我这件绒线衫还是素贞的，”文淑摩着穿在身上的红绒线衫说：“她走了，留下好些衣服给我。我的厚一点的衣

服都没有带来，我本来说住一两个月就走的，想不到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在这里住下来了。”

“你也不能说没有做事，现在你不是在北辰社帮忙吗？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长久做下去。”

文淑叹了一口气，自语似地说：“我不会长久住下去。我做不惯这种工作。等到田先生病好了，我还是要再到前方去。”

“要不是为了这只腿，我早回到前方去了。可是现在——”洪大文望着自己的残废了的腿绝望地说。

“洪先生，你不要难过，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文淑柔声安慰他说。她又叹一口气，压低声音自语道：“我又想起了李南星送给我的那本书，我觉得我好象对不起它似的。”

十八

洪大文回到田家，太阳已经升上天空了。陈济民正坐在写字台前打算盘，看见他进来，便抬起头问一句：“朱小姐走了吗？”

“走了，”洪大文点头答道。

“印刷局刚刚差人来请你到那边去一趟。封面已经上了架子，等你看过就好印了，”陈济民继续说。

“他说，正文装好没有？”洪大文又问道。

“他说过，正文装好了，就等着封面。”

“那么明天一定有书了，”洪大文兴奋地说。他的脸上现出了喜色。但是他注意到陈济民始终板着脸，用平板的声音在讲话，他觉得奇怪。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便改变了语调问道：“田先生起来了吗？今天好一点罢？”

陈济民摇摇头，忧郁地答道：“今天更坏，刚才汪医生还来过，他除了打葡萄糖针，就没有别的办法。现在田先生更衰弱了，今天连大小便自己都不知道了。田太太急得不得了，已经哭过好几次。世明先前下来拟好电报稿子要我替他给他姐姐打电报，我刚刚要出去，他又来说不打了。可见田太太已经没有了主意。我怕这回凶多吉少……”他的眼圈已经红了。

“我上去看看，下来再到印刷局去，”洪大文慌张地说，他的心也乱了。应该怎么办呢？

他上了楼，走过平台，到了廊上。房里没有一点声息。他害怕他的木拐会惊动病人，便立在门前，踌躇着不敢进房去。可是世明听见了木拐声走出来了。

“爸刚刚睡着了，”世明轻轻地说，他的脸色比前一天更苍白，眼皮浮肿，眼睛无光。

“现在是不是好一点？”洪大文低声问道，他自己也觉得声音空虚。

世明痛苦地摇了摇头：“他刚才讲话也不大清楚，不是舌头转动不灵，就是喉咙不舒服。他又不肯好好地张开嘴给我们看，喉咙边上好象有一块白的东西。不过汪医生说不是喉症。”

“我看还是再请一位医生来罢，汪医生治不好的，”洪大文说。

“汪医生自己也这么说，他介绍一位张医生，叫我们今天下午去请他，”世明答道。

“我就要到印刷局去。现在让我进去看一下老先生，”洪大文恳求地说，“我小心着，不会惊醒他的。”

“那么，让我来扶你罢，这样好一点，”世明说，他真的动手来搀扶洪大文了。

洪大文由世明扶着，轻轻地、慢慢地移动他的双拐，进了田惠世的房间。田太太正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揩眼睛。她看见洪大文，便站起来，对着他摆摆头抽咽地说：“洪先生，田

先生不行了。”她又倒在椅子上，蒙着脸无声地哭起来。世明连忙到她的身边去，偎着她，说两句安慰的话。

洪大文站在床前，埋下眼光到田惠世的枕上。田惠世的头平平正正地放在那里，额上盖了一方折叠成半幅的手帕，脸色象蜡一样的黄，颊上有几颗黑点，眼睛深陷进去，两颊也变成了两个洞，颧骨显得异常地高，胡须上粘着发亮的口沫，嘴半张开，重重地吐着气。

“一个健康活泼的人怎么会变成了这种形状！”洪大文想着，他的鼻子一阵酸痛，眼泪就淌了出来。他注意地望着这张他一向敬爱的人的脸庞，他忽然觉得病人的眼睛没有阖上，黑眼珠还露了一点出来。他凝神地望着那对眼睛。眼睛慢慢地睁开了，黑眼珠渐渐地向着他这面移过来，它们停止了，病人的头稍稍偏了一下。洪大文轻轻地唤了一声：“田先生。”

病人的嘴阖上又张开，这样地动了几下，忽然发出一句问话：“今天几号了？”这句话是费力地说出来的，可是声音相当清楚。

洪大文把日期告诉了他。田太太和世明都站到床前来听了。

“《北辰》送来了？”病人又问一句。

“还没有，就在这两天送来，”洪大文答道。

“怎么这样慢啊，”病人现出失望的表情，他用力把头一摇，手帕落到了枕边，他皱紧前额说了这一句。

“说不定明天就送来了。明天！……我就到印刷局去催他们……”洪大文张惶地说。

“好……请你催催他们……迟了，我怕看不见了，”病人焦烦地、一字一字地说。他又把脸放正，不看洪大文了。田太太连忙俯下身子，在枕边拾起手帕轻轻地揩了揩他的前额和脸颊，拿开了，另外放一张到他的额上去。

“我就去！我就去！”洪大文连忙答道，他只是回答病人的前一句话。他看见田惠世闭上了眼睛，便不再作声，在床前停留片刻，转身走出了房门。

他下了楼，也不回办公室，就一直往外面走去。在巷口他坐上了一辆黄包车，车夫拉着他走过湖上，在石牌坊前，他看见冯文淑迎面走来。

“冯小姐，你为什么不在家多歇一会儿？”他叫车夫停了车，坐在车上大声对她说。

“我在家里睡不着，想想还是到你们那里去看看。田先生今天好一点吗？”文淑站在车子旁边说。她的脸上还有一点疲倦的表情。

洪大文摇着头低声说了一句：“不好，恐怕没有希望。”

“有什么不好的现象吗？”文淑变了脸色惊问道。

“也没有什么，不过……”他马上咽住后面的话，换过话题，短短地说了一句：“我现在到印刷局去看这期杂志的封面。”他叫车夫拉起车子走了。

文淑到了田家，进了田惠世的房间。田惠世昏沉沉地睡着。嘴张开大半，吃力地吐着气。显然他的呼吸困难，在睡梦中他也得不到安宁。这不是睡眠，这只是昏迷而已。文淑望着，望着，泪珠从眼角滚了下来。

这昏迷继续了几个钟头。文淑受不了他那单调的吐气声，受不了田太太的悲痛的抽泣，受不了世明的低声劝慰，受不了房里的窒闷的空气，她逃到楼下去了。

屋子里只有母亲同儿子寂寞地陪伴着昏迷的父亲。

田惠世忽然大大地呻吟一声，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挥舞了两下。田太太和世明连忙扑到床前去。

“我在什么地方啊？”他绝望地、痛苦地叫着，声音是这么空虚，这么可怕。

“惠世，你说什么？你要什么？”田太太温和地问道。

“我在什么地方？”他又问一句。他睁大眼睛望着他们。

“你在你家里，……你认得我们罢？”田太太忍住眼泪亲爱地说。

“我认得，”他点点头。他勉强地笑了笑：“我还活着，我还要活啊。”他努力挣扎着要抬起头来，可是刚刚把头举得离开枕头有一寸多高，它又无力地跌落在枕上。

“你要做什么？”田太太问道，她同世明两个抬着他的肩头，把枕头给他垫高一点，她还以为他嫌枕头低，睡得不舒服。

“我要下楼去，……我要办公，……我有很多事情，我不能整天睡觉啊！”他挣扎着，兴奋地说着，虽然是一字一字地费力说出来的，可是话里面还带着感情，因此也还有力量。

“你在生病，等你病好了，再下楼去办公罢，”田太太劝道。

“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要起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起来？”田惠世激动地说。他还在挣扎，他的脸上现出红色，眼睛张得大大的，里面射出火似的光辉，但这已是快要熄灭的余

烬了。

“惠世，你听我的话，静静地睡下罢，你生病，不能下去。你要安心静养，你的病就好得快，”田太太柔声安慰他道。

“怎么，你在哭？我不会死的！我不想死啊！洪先生呢？冯小姐，朱小姐呢？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他接着嚷道，他把眼光朝屋里四处看，好象在找寻那几个人似的。

“世明，你去请冯小姐上来，”田太太嘱咐世明道。她又对着她的丈夫说：“洪先生、冯小姐今天都上来过，你睡着了。洪先生到印刷局去了。”

“怎么《北辰》还不送来？我等着它啊。我要下去，我要下去。你们快来搀我下去！”他用了绝大的力量撑起身子，但是他还没有坐稳，马上又跌落下去了。他力竭了，绝望地嘘了一口气，就闭上了眼睛，头无力地靠在胸上。

文淑跟着世明上来的时候，他已经迷迷糊糊地睡去，吐气声不象先前那样重浊了。

“冯小姐，田先生不会好了，”田太太对着文淑呜咽地说，她的瘦小身子摇晃地立在床前，好象就会倒下去似的。

这一次的睡眠继续了更久的时间。连响亮的警报声都没有把他惊醒。这一家的人除了陈济民外，完全守在病榻旁边。敌机没有来。在正午的光景，警报解除了。下午三点钟张医生来的时候，病人还没有醒过来。张医生精细地诊查了一番。于是他板着他那张瘦长脸，忧郁地摇摇头说，“太迟了，没有办法了。”对于差不多屏住呼吸等候他宣布诊断结果的病人家属，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田太太和世明向医生哀求，要他

用尽力量救活一个人的生命，医生耸耸肩摊开手，无意地摹仿着西洋人的表情，冷冷地答道：“太迟了，只是今明两天的事了。”

“那么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文淑忍耐不住插嘴问道。

医生冷酷地摇一下头答道：“我看没有办法。找别的医生看也是一样。”

“可不可以打强心针？总得请张先生想个办法……”田太太怀着最后的希望战战兢兢地说。

“恐怕病人受不住，打下去，马上就会出毛病。我不敢打。”

“那么究竟是什么病呢？单是肺病不会有这个现象罢，”文淑又插嘴说。“害肺病的人总是很清醒的。”

“肺病是不成问题的，”医生充满自信地说；“不过致命的还不是肺病。我听见汪医生说起，刘亨利的那种药，象老先生这样的身体不说吃二三十颗，就是吃一颗也嫌多。每天吃八颗，把一个人的抵抗力都吃得没有了，所以连大小便也不知道了。这样的医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唉……”他说到最后，发出了两三声慨叹。

陈济民陪着医生下楼去了。房里剩了田太太、世明和文淑三个人。田太太垂着头坐在床沿上，文淑坐在一把靠窗的椅子上。世明立在母亲身边。他们都不讲话，屋子里只有田惠世的吐气声。沉默象苦刑似地折磨着众人。

吐着，吐着，气吐完了，他也就完了。——田太太这样想着，冯文淑这样想着，世明这样想着。尤其是世明，他再也忍

不下去，便悄悄地走出房门，回到自己的屋里，俯倒在床上低声哭起来。

又过了一点多钟，田惠世还是在昏睡的状态里，田太太时时用手帕轻轻揩他嘴边的口沫，用柔和的眼光抚慰他的枯瘦的脸。世明进来了，他起初俯下头，在母亲的耳边讲了几句话，后来在母亲身旁站了一会儿，便到屋角一个凳子上静静地坐着。文淑仍旧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这许久她没有讲过一句话。这样一种真正接近“死”的静寂压迫着她。她愈来愈觉得毛骨竦然，好象连她坐的椅子也生出了芒刺似的。她下了决心站起来，悄悄地走出房去。她走到门前还掉过头去看病榻。这时田太太正抬起头来看她，两个人的眼光遇在一起了，她们都不说话，又把眼光掉开了。

忽然楼下的院子里响起一个男人讲本地话的声音，接着一个清脆的女音在答话。静寂的网被冲破了，声音飘上楼来。文淑好奇地站在栏杆前看下面。一个年轻女子站在天井里，跟黄包车夫讲话。文淑看不见这个少女的面貌，只看见她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件淡绿色旗袍，罩着一件浅灰色短外套，在她的左边地上放着一口皮箱。“这是什么人呢？她讲的是普通话！她不会是房东家的亲眷。那么她是谁呢？”文淑想着。车夫提起皮箱，少女转过身子，他们朝着楼梯的方向走来。“难道是她吗？”文淑忽然惊喜地想道，她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黑黑的圆脸。

世明从里面奔出来，他兴奋地问文淑：“冯小姐，下面什么人在讲话？”

“我不认识，她上来了，”文淑答道，她指着楼梯口。从那里现出了提着皮箱的黄包车夫，然后上来了那个少女。世明唤了一声“姐姐！”便跑过去迎接她。

“世清——啊，你是世明！”少女笑了。“你好吗？”她欣喜地说，跟他握了手。车夫把皮箱放在平台上就转身下楼去了。世明伸手去提皮箱。他的姐姐又说：“爸跟妈在家吗？我进去看他们，”便匆匆地朝廊上走来。

文淑转身进了病房，田太太俯着头在替病人揩嘴，文淑激动地对她说：“田太太，你的小姐来了。”田太太吃惊地掉过头来，茫然望着文淑，仿佛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似的。但是用不着文淑再来解释了。田世慈已经进房来了。

“妈！”世慈亲爱地唤了一声，孩子似地笑了笑；“爸呢？”她刚刚吐出这两个字，马上就明白了实在的情形，她轻轻地走到床前，望着父亲的变得几乎使她认不出来的脸。

“世慈，你来迟了，”田太太捏着女儿的手抽咽地说。

“爸病到这样，我还不知道，”世慈含着眼泪说。

“你为什么先不写个信来？他常常挂念你……”

“我一个同学要回家，她家里做生意，有便车。我才临时决定跟她一路来看你们，让你们意外地欢喜一番。谁知车子在路上抛锚，一共走了十四天。想不到爸病成了这样。医生怎么说？不要紧罢？”

田太太迟疑一下，才摇摇头叹息般地答道：“你路上辛苦了，你到你弟弟的房里歇一会儿罢。”

“世清呢？他住在学堂里没有回来吗？”世慈问，她一面用

目光在屋里找寻。她的目光碰到文淑的了，她对文淑打个招呼。文淑也对她微微一笑。

“哦，这位是冯小姐，你还没有见过，”田太太说。

世慈笑了笑：“我已经从你们的信里认识冯小姐了。还有朱小姐呢？”她走到文淑面前，文淑跟她握了手。

“她到上海去了，她有点私事，今天早晨才走的，”文淑答道。

“我还说到这儿来，可以看见她。爸前年跟她一块儿逃过难。想不到又不凑巧，只差了半天，”世慈惋惜地说。

“轻声点，你爸——”田太太温和地、小心地打岔说，可是她的话又被一个意外的声音打岔了。

“世慈呢？你在哪里？我要见你啊！”田惠世忽然大声喊道。众人的眼光齐射到他的脸上。他的头不停地向左右摇摆，口里发出一阵呻吟声。

世慈走到床前，俯下头去，低声唤着“爸”。

病人好象没有看见她似的，仍旧半闭着眼睛，摆动着头，痛苦地嚷着：“我听见她的声音，她怎么不来啊？她在哪里？”

世慈把脸凑近去，在他的耳边温柔地唤着：“爸，爸，我在这里。”

病人慢慢地睁开眼，然后把头朝世慈这面掉过来。他看到世慈了。他的失神的眼光停留在她的脸上。这眼光是迟钝的。但是它们渐渐地活动了，发亮了。他嘴边的肉线松弛了一点，他笑了。他凄凉地对她说：“你到底来了，可是……我要走了。”他的头和背动得厉害，他要把手伸出被窝，世慈给他

帮忙。他的手向着她的手移动。她知道他的意思，便把手送过去。他捏住它不肯放。“你好罢？”

“爸，我好，”世慈忍住眼泪答道。

“路上辛苦不辛苦？你比从前黑得多了，”他吃力地、一字一字地说。

“不苦！”她只能吐出这两个字，她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不要哭，我不想离开你们，可是……”他说到这里，忽然换过话题问她：“你见过冯小姐罢，还有朱小姐。你们可以做朋友。……”

“见过，”世慈只答了两个字。

“洪先生呢？洪先生呢？”他一面叫着，一面用眼光去找寻洪大文。“他在哪里啊？请他来，请他到印刷局去一趟……”

“洪先生已经到印刷局去了好久了，”文淑在旁边答道。

停了片刻。病人又说：“《北辰》送来了罢，拿本给世慈看看。”没有人讲话。过了几分钟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可是再过十多分钟，他又睁开眼看看众人。他的眼里泛起了泪水。

田太太马上凑过脸去，她的嘴放在他的耳边，温柔地安慰他说：“惠世，你有什么事情不放心吗？你不要难过，我们都在这里，你放心罢，你安心静养罢。”

“我不要——”他刚吐这三个字，又马上改口说：“《北辰》怎么还不拿来？快啊，快啊……”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地不知道怎样办才好。田惠世只顾催着：“快啊快啊。为什么还不拿来啊？”

“就来了，就来了，”田太太答道，“你再睡一会儿罢。”

“我不要睡，我要起来，”田惠世皱紧两眉，焦躁地说。他接连摆了两下头。他望着世慈说：“你搀我起来罢，你母亲总不让我起来，我不会死，你们不要怕。……”

洪大文气咻咻地从外面进来了。他到床前把手里拿的一本杂志放到病人的面前，他一面激动地、还带了一点欣喜地说：“老先生，好了，《北辰》印好了！”

田惠世伸出两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拿起杂志，看了看。他放下杂志嚙了一口气，放心似地说：“我到底看见了。”停了一下他又拿起来翻了几页，然后偏了一下头，说：“世慈，你拿去看，我这几个月并不是没有做事啊。……”他要把杂志递给世慈，世慈连忙接了过去。“下一期我还有一篇关于安南问题的文章，现在不知道那边的情形怎样了？”没有人回答。他忽然叫起来：“世清呢？他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回答他。世慈转过头去低声问世明：“世清怎么不见？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来？”

“他不在这里，”世明短短地答了一句。

“哦……我记起了，”田惠世自语道；“我忘不了他！……我多么需要他！”他又看世慈：“你陪你母亲出去走走，她这些天也够累了。她老是在望念你。”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在世明的脸上停住了。他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但以后又阴暗了。他温和地说道：“你不是世清，你比他瘦一点。你是世明，世明，你要多运动啊，你是你母亲的宝贝。”

“你想不想吃点什么东西？”田太太俯下头轻轻地问道。

“我不吃，”他摇摇头说。“你们应该吃饭了罢。”他闭上眼睛，头差一点就滑落到枕下去了。于是又开始了长时期的昏睡。

众人在房里守候着。现在是世慈坐在床沿上替病人揩嘴。她母亲坐在屋角抽泣。文淑仍旧坐在窗前椅上，洪大文和世明坐在书桌前的凳子上。陈济民悄悄地从外面进来，他低声问世明和洪大文：“要不要预备后事？”世明不回答，却跑回自己房里哭起来。

傍晚，病人忽然又醒过来，他痛苦地嚷着：“怎么这样黑暗？为什么不开电灯？”田太太开了灯，走到床前。世明、文淑、洪大文、陈济民全在房里，他们都站到床前去。

“你们怎么在哭？”他温和地说，他看见了田太太母女的泪痕。他带点怜悯地微微一笑：“我恐怕要先走了，这是没法的事。我不愿意离开你们。但是我有什么办法？你们还好好地活着，你们可以看到抗战胜利，你们要好好看待我那个淘气的孩子啊，我交给你们了……”

世慈和田太太哭得更厉害了。别的人也都落了泪。他又说：“你们不要哭。我心里很难过。……世慈，你远远地跑来看我，你更不应该哭。……世明，你也哭了，你真象你母亲。……哦，世慈，我枕头底下……（他气喘得更厉害了）有……世清的相片……你给我拿……出来……”世慈站起来俯下身子去取相片。病人很困难地略略动一下头。放在镜框里的相片取出来了。“你……拿着……给我看看，”他又说。世慈双手捧着镜框，把相片放在他的眼前。他注意地望着相片，低声自言自

语：“还我的世清……还我的儿子……”他想伸出手去拿镜框，但是挣扎了一阵，却没法叫手动一下。世慈帮忙他把他的右手拿出来，放在他胸前的被上，然后把镜框递到他这只手里。他捏着镜框，轻轻唤了一声：“世清，”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过了两三分钟，他忽然睁大了眼睛，用力叫了一声：“还我的儿子来！”他的手也往上一举，他好象要把镜框放在眼前，可是他的手马上落在床沿上，手一松，镜框落在地上打碎了。同时他说了一句没有人懂的话。

“惠世！”“爸！”“爸！”田太太母女儿子一齐惊呼。大家都站在床前看他，唤他。可是他完全听不见、看不到了。

尾 声

田惠世的墓就筑在世清的坟旁边。现在这父子两个不会再分开了。墓前种了一些花草，四周长着长春的灌木，就是在冬天，这里也有绿色，也有花朵。每天早晨在七、八点钟之间，不论落雨或天晴，总有一个梳两根辫子的、脸黑黑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少女同一个身材高高、脸色苍白的少年到这里来，有时候他们还陪着一位身子瘦小、面貌清秀的老太太。他们在墓旁两块青石上坐着（这两块青石好象是专门放在这里给他们坐的。老太太来时，少年便立在她的身边或者身后），大约坐一点钟或者两点钟，常常不讲话，有时带点花来放到墓前，有时带来一本杂志。少女的手里有时拿一本《圣经》，有时拿一本新出版的书刊。她常常翻开书页，和着鸟声朗诵一段。念完了她便拉着弟弟的手默默地走回家去。

偶尔还有一个年轻女子和他们一起来。这个女子年纪二十二三，眼睛细小，头发长长，脸颊红红的，一开口两颊就会现出酒涡。她也曾在下午一两点钟光景来过几次，都是由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陪来的。这个人头顶剃得光光，左膝下只有一只脚，用一对木拐撑着走路。他们来了，也坐在青石上。不过他们一直谈着话，谈的大半是墓中人的事情。有一天，这

两个人在上午八点多钟就来了。他们坐了将近三个钟头。在谈话的中间，女子忽然打断了男子的话，惊讶地问：“喂，你听见笑声吗？”“笑声？谁的笑声？”男子奇怪地说。“自然是田先生的，他在对着世清笑呢！”女子做梦似地答道。男子笑了笑，说了一句：“冯小姐，你在做梦罢。”女子不作声，却做出在倾听的样子，仿佛田惠世拉着他的爱儿的手，站在她面前，另一只手拿着新出版的《北辰》，欣喜地发出他那爽朗的笑声呢。

读者诸君，你们不会责备我在故意地撒谎罢。我们怎么能把死当作终结呢？绵延不绝的生命和长春的树木正在对我们讲说永生。而我们的死者也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他们常常近在我们的身旁，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罢了。

不用说这个年轻女子就是冯文淑。她这次来跟她的朋友告别。过三四天，她就要离开这里到前方去了。

这两个多月来，常常有人（多数是素贞的同学）向她打听素贞回上海以后的消息，她无法回答一个字，因为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寄过一封信到上海，一封信到香港，托人转交素贞，却始终未得到回音，也不知道素贞究竟见到它们没有。可是就在她从墓地回家的这天下午，她忽然接到了素贞从香港寄来的信。她又哭又笑地把信接连读了几遍：

文淑妹妹：

分别后，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我们到香港也快一个星期了，我也没法早告诉你我的消息，我的好妹妹，请你原谅我，现在我们相距愈近，我愈想念你。可是我终日忙乱，哪有心肠写信？我至今还不肯提起我在上海过的那种日子！我好象在地狱中受苦刑。我

应当告诉你一件你最关心的事情：我同刘波在上海结婚了。

我的文淑妹妹，请你不要责备我。我不是故意不让你分享我们的快乐。你不会想到我们的结婚是什么样的结婚！你应该还记得上次你交给我的电报。当初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我不瞒你，我坐船回上海，那个月色朦胧的夜里我倚着栏杆望海，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差一点跳下海去。我忽然想到你，想到我临行你含着泪讲的话，我忍不住跑回舱里伤心地哭了一场，才打消了那个傻念头。我回到上海，见到刘波的朋友，才知道他虽受尽酷刑，几次谣传遭害，都未成为事实。朋友们正在设法营救他。我不告诉你那些详情了。朋友们花了钱吃够苦头。我至今也说不明白那些日子是怎样过去的。总之，在半个多月以前，刘波终于出来了。这哪里是从前那个生气勃勃的刘波？他瘦得真可怜，遍体伤痕，走路要人搀扶，说两句话也要喘气。他在朋友家养了几天，我用尽我的心力看护他。后来我同他结了婚，第二天就坐上加拿大皇后轮船离开了上海。我们到了香港，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一直到最近两天，他的脸上才有了一点血色，有时他也露出一丝笑意。昨天我送他进了医院。今天下午我还去看过他。医生说不到两个月他的健康就能完全恢复。今天他的精神很好。我对他说要给你写信，他也要我把他的近况告诉你。……

文淑好妹妹，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可是在这封信上怎么写得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我姐妹才能再见。今天从医院回家，在轮渡上，我把过去的事情仔细地想了又想。这两个多月我受尽了苦，我的体重减轻了十多磅，我经历过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可是我也懂得了不少的事。我的眼睛好象也睁大了些。妹妹，我好痛苦啊，可是我和他以后永远不分开了。我恨不能把我所见、所闻、所想的全告诉你。我不回昆明念大学了。我已经答应刘波，等他病

好，就同他一起到前线去。我们想到前线去做一点工作。我们想走得远一点。你也会明白我指的并不是你从前做的那种工作。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如今一般年轻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

文淑，我不讲了，你一定明白。你是不是也会到那里去？或者田先生会留下你帮忙他办杂志？我记得你说过不会在昆明长住下去。那么快写信告诉我你的打算。快写信来。我还要给你写长信。

我忘记告诉你，我当初在船上还想过替刘波报仇的计划。我想化装为交际花，去接近魔王丁默村，然后设法杀死他。现在想想，觉得实在可笑。让你知道是不要紧的。可见幻想多了，对自己并无好处。在这一点刘波就比我强。

请代我问候田先生一家，我想他的病早已痊愈了。请代我问候洪大文先生，谢谢他那样给我帮忙。

素贞 ××日。

这封意外的信给文淑带来多大的快乐是读者想象得到的。文淑不但马上到田家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几个关心素贞的人，她还当天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寄给素贞。在信里她除了祝贺这一对新婚夫妇“幸福无量”外，还告诉素贞她三四天后就要动身到前方去，她要去的正是素贞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圣地”。

其实这个目的地还是她反复地读了素贞来信以后才决定的。她当初还这样想：只要是前方，只要有紧张的工作，就比在昆明过安闲日子好，就比在昆明看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的悲喜剧好。

后 记

《火》第三部，一名《田惠世》，十九章，也只能算是我的试作。今年四月初动笔，九月底写成，算时间，应该有五个月的功夫，让我从容执笔。可是许多琐碎的事使我的心乱得没有办法，我常常对着面前的稿纸发楞，写不出一个字。在那种时候，我便读书或者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有时搁了十多天以后，我再找出《火》的原稿来，那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但是我还没有忘记书中的人物。他们早已变成我的友人了。我的心静下来时，我便渐渐地沉浸在他们生活里面，我的笔又跟随着他们的生活发展下去，虽然时写时辍，我终于把这本小书结束了。

我承认这本小书不是成功的作品。它的罪名应该是“草率”二字。但是我想，倘使我再有两倍的时间，我或许会把它写成一部比较站得稳的东西。^①我说没有时间，并不是说我年将就木，或者患病垂危。我怕的是拖久了，书印出来，售价会高得叫人买不起，不然就是印刷费涨得叫人不敢印书，再不然就是到那时，这样的书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

^① 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对。主要的问题还是我的生活面太窄，我对自己想写的东西，知道得太少。

在这本小书中,我想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我还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可是我并不曾写出来,或者可以说是写得不好。关于后者,我一点也没有写,文淑还只是一个孩子,她的思想没有成熟,关于前者我写得也不够。读了这本小说,说不定会有人疑心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书中的人物和事实全是虚拟的。不过我写田惠世时,也曾借用了一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对这个亡友我充满着感激的怀念。^①我想要是他能活着看见我这本小书,为着思想和别的问题,跟我争论一通,那是多么好!可是现在……现在让我把这个不象样的东西献给他在天之灵罢。

巴 金 1943年10月。

^① 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那位年长的朋友逝世不过两个多月。我们曾在一起共过患难(见《旅途通讯》),所以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损害了我的写作计划。说实话,我设身处地替他想得太多了。这次我把《尾声》稍稍改动了一下。我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让刘波和朱素贞都活起来,让人们想到这几个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在前方见面。但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并不能弥补我这本小说中存在的大缺点。(1960年1月注)

附录

《火》第三部初版本的“书尾”

田惠世的墓就筑在世清的坟旁边。现在这父子两个不会再分开了。墓前种了一些花草，四周长着长春的灌木，就是在冬天，这里也有绿色，也有花朵。每天早晨在七、八点钟之间，不论落雨或天晴，总有一个梳两根辫子的、脸黑黑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少女同一个身材高高、脸色苍白的少年到这里来，有时候他们还陪伴着一位身子瘦小、面貌清秀的老太太。他们在墓旁边两块青石上坐着，（这两块青石好象是专门放在这里给他们坐的。老太太来时，少年便立在她的身边或身后。）大约坐一点钟或者两点钟，常常不讲话，有时带点花来放到墓前，有时带来一本杂志。少女的手里常常拿着一本《圣经》，有时她翻开书页和着鸟声朗诵一段。念完了她便拉着弟弟的手默默地走回家去。

有一天下午她一个人来到这里，太阳正落进了那一排树林里，吐出来半天霞光，把林子映得血红，象着了火烧起来似的。她翻开带来的《圣经》念着：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

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華上帝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她阖上书抬起头出神地把那燃烧似的林子望了许久。

有时候还有两个人到这墓地来。一个是年轻的女郎，眼睛小小，头发长长，脸颊红红的，一开口两颊就会现出酒涡来；另一个是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头顶剃得光光，左膝下只有一只脚，用一对木拐撑着走路。他们来了，也坐在青石上。不过他们却一直谈着话，谈的大半是墓中人的事情。有一天上午，四围非常静，在谈话的中间，女的忽然打断了男子的话，惊讶地问：“喂，你听见笑声吗？”“笑声？谁的笑声？”男子奇怪地说。“自然是田先生的，他在对着世清笑呢！”女的梦幻地答道。男子不作声了。他们做出在倾听的样子，仿佛田惠世拉着他的爱儿的手，站在他们的前面，另一只手拿着新出版的《北辰》，欣喜地发出他那爽朗的笑声呢。

读者诸君，你们不会责备我在故意地撒谎罢。我们怎么能把死当作终结呢？绵延不绝的生命和长春的树木正在对我们讲说永生。而我们的死者也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他们常常近在我们的身旁，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罢了。

有人问起素贞到上海后的消息，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知道的很少。她到了上海最初两个月给文淑写过几封信，后来忽然通知文淑，说她到别处去了。从那时起文淑就没有收到她一个字，向各处打听，也得不到一点信息。有一天，大约在

素贞走后的七个月罢，文淑收到一封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只有一则从报上剪下来的消息，从记载的语气看来，报纸显然是伪组织的机关报。据这消息说，丁默村前一天在大新公司遇刺，仅受微伤，凶手当场逃逸，惟侦察结果，发觉丁氏女友朱曼丽实有主使嫌疑，刑讯之下，朱招认不讳，现已依法枪决。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信。并且她也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以后也没有人对她讲起朱曼丽的事或者素贞的消息。她后来不得不相信朱曼丽就是朱素贞了，因为她觉得英勇的死究竟比较无影无踪的消灭能够安慰朋友的心。

致 树 基(代跋)

树基：

《火》三部都是失败之作，我自己讲过不止一次，所以十卷本《选集》里没有收入它们。当然我也不会把它们从《全集》中抽去，而且我并不后悔编《文集》时将它们留了下来。“我写文章靠的是感情”。（一九八四年二月，可能以前还讲过这一类的话。）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就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我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

我没有毁掉这些作品，我说是“为了宣传（抗战）”，这也是事实。我的确在做宣传工作，我想尽我的责任。我知道，这样宣传，作用不大。但在四处逃难、身经百炸之后，还不曾丧失信心，不间断地叫喊几声鼓舞人们的勇气，也是好的。有总比没有好。不过这谈不上文学和艺术了。固然三卷书中都有“感情”，这“感情”当时还能打动人心，今天却不易争取到读者了。就留着它们作为“考卷”看吧。

我说过：“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火》的头两部都是宣传的书，第三部却不是，第三部写了阴暗面，因为我自己看到

了阴暗面，不少的阴暗面。我不能睁起眼睛撒谎，这不是宣传。我得讲真话，才能够取信于读者。因此我写了知识分子受歧视，写了人们向钱看，写了学生看不起老师等等等等。这说明即使在这类肤浅的作品（我的确写过不少肤浅的作品）中我也不曾无病呻吟。

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冯文淑是我的妻子萧珊，田惠世则是在桂林逝世的老友林憾庐。写萧珊，我只写了她初期的、表面的东西，不曾写她的成长。写憾庐，我想借他来说明真正的基督徒宣传的人道主义的教义。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我在以前发表的几篇《后记》中指出的原因外，除了刚才说到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关于《火》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的一本《创作回忆录》里有一篇谈《火》的散文，是将近八年前（八〇年一月）写成的，当时讲了不少，我那些意见、那些看法今天不曾改变。我希望《火》的读者有机会翻看这本小书。

巴 金 1987年12月4日。